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系列丛书

俄罗斯
最新历史著述暨评析
（2007—2017年）

Нов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труды по истории и их анализ (2007-2017)

吴恩远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扫一扫
获得更多新书信息

ISBN 978-7-5203-1496-1

定价：98.00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系列丛书

俄罗斯
最新历史著述暨评析

Нов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труды по истории и их анализ (2007-2017)

（2007—2017年）

吴恩远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最新历史著述暨评析：2007—2017年／吴恩远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7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系列丛书）

ISBN 978-7-5203-1496-1

Ⅰ.①俄… Ⅱ.①吴… Ⅲ.①史学—研究—俄罗斯 Ⅳ.①K0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7787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9
插 页 2
字 数 646千字
定 价 9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本书主要翻译或编译了2007—2017年期间、即最近10年俄罗斯出版的最新历史著述（个别篇章2007年前），并对某些涉及俄罗斯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最新历史资料加以评述。

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期的历史论著？主要是根据俄罗斯历史学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在2007年前后，俄罗斯历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期。其标志是：

一　俄罗斯调整了历史研究方向

1. 反对歪曲本国历史

2007年6月18—21日，俄罗斯政府在首都莫斯科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着重研讨历史及人文社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一线教师、人文社科工作者以及俄教育部和科学院等相关负责人到会。主要内容是探讨俄罗斯史学发展状况、特别是历史教科书问题。6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郊外官邸亲自接见并与部分代表进行座谈。普京指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俄罗斯国内历史教科书内容及版本混乱，不能客观反映国家当代历史事件，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科书充斥诋毁俄罗斯的内容。普京呼吁全俄科教工作者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普京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鼓励编写和出版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这就预示着在历史研究领域将出现方向性重大变化。

2. 代表国家主流意识的历史观点的出现

俄罗斯成立国家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以国家统一历史观点指

导全国学校历史教学。经过几年努力，在 2016 年 3 月俄罗斯国家教育出版社终于出版了第一套历史教科书。这标志着苏联解体以来，对苏俄历史存在的各种问题争论有了代表国家主流意识的观点。

3. 俄罗斯政府以立法形式反对篡改国家历史

2009 年 5 月 19 日，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 549 号命令，成立《与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的企图作斗争的总统直属委员会》。委员会直属俄罗斯总统管辖，其成员由俄罗斯总统确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那些目的在于贬低俄罗斯联邦的国际威望而被篡改的历史事实和事件进行汇总和分析，并向总统提交这方面的报告；制订开展这场斗争的战略计划；向俄罗斯总统提出在开展与歪曲俄罗斯历史的企图作斗争中拟采取的措施；审视俄罗斯联邦各级机构和组织在开展这场斗争中的情况并协调它们的行动；对有损俄罗斯利益而被歪曲的历史事实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并尽量减轻其消极后果，拨正历史航向。

二　提出俄罗斯历史“新概念”

2014 年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成员和作者。普京讲述了他对历史教科书修改的原则性意见，要求以客观、公正、尊重的态度对待俄罗斯历史，坚决反对以各种理由、甚至无中生有挑衅国家历史的行为，他特别强调要以“新概念”来修改教科书。

教科书修改小组主要负责人、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丘巴里扬谈到了他们讨论的某些“新概念”。他说：俄罗斯 20 世纪历史的讲述是一个难点。经过长时期的讨论，修改小组对 20 世纪的俄国革命有以下看法。

第一，1917 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与此相连的国内战争，较之其他国家类似的革命，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革命”。现在俄罗斯人民甚至不同派别的人多数能够接受这个观点。

第二，怎样评价苏联社会？学界专门召开了大型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最后终于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所经历的是苏联现代化道路的一种选择，其中存在积极的内容，也产生了某些消极的东西。把苏联 30 年代的发展与“现代化”这个词的内涵相联系，一开始曾经引起

一些人的不满，但最终还是被接受了。

在本书中我们比较详尽地收集了近年来普京关于俄罗斯历史评价的一系列论述。摘译了2016年新版俄罗斯历史10年级教科书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三 在此期间出版了一批颇有分量的历史著作

《苏联经济史》。该书由著名俄罗斯经济学家阿巴尔金院士主编、权威机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2007年第一版、2010年再版）。苏联解体以来，关于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国民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评价在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甚至认为以前公布的国民经济发展数据都是虚假的。这是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第一次出版的评价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权威书籍，该书写道："随着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塌陷……苏联经济史被说成是失败、错误和犯罪的象征，似乎导致苏联体制不可避免地崩溃。"但事实真相如何？该书没有否认苏联体制的弊端，但充分肯定了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占主导、文盲占多数、由于一战和国内战争而濒于崩溃的俄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在各领域都实现工业化、文化普及和科技发达的强大国家。所以该书坚决驳斥了一些人认为"苏联体制导致了苏联解体的"的论调，实际上70%以上的俄罗斯民众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本书由康晏如博士翻译了《苏联经济史》中由著名学者阿巴尔金、伊万琴科撰写章节的主要内容。

2010年，在俄罗斯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奥西波夫院士主持下，由哲学博士萨宗诺夫编撰的《是谁、是怎样摧毁了苏联？——依据档案文献还原苏联解体过程》一书出版[①]。作者当年为戈尔巴乔夫总统机关办公室副主任、曾亲自参与了戈尔巴乔夫－卢基扬诺夫班子与1990—1991年间宣布了主权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团队的谈判筹备。作者在书中新公布的文献资料可以进一步证实，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联手（具体来说，包括西方政治家、西方情报部门、苏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осква, 2010г.

联国内的代理人等），最终将苏联摧毁。作者在著作中整合了大量原始资料文献（约 400 份）：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等人签发的文件，此外，还有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总统，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等签发的文件。400 份文件中，有三分之二是之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苏联解体进程。本书也收集了侯艾君博士编译的该书主要内容。

重新编辑出版《斯大林全集》。原《斯大林全集》出版了共 13 卷，（《斯大林全集》中文版 13 卷已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但全集不全，只收录了斯大林到 1934 年 1 月的文著。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下令终止出版计划编纂的《斯大林全集》，并销毁了已制好版的其他几卷。长期追踪该问题研究的欧阳向英博士指出：1997 年十月革命八十周年之际，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牵头、工人大学主编的《斯大林全集》14、15、16 卷由莫斯科“作家”出版社出版。2004 年和 2006 年，俄罗斯先后编辑出版了第 17 卷和第 18 卷。

2010 年笔者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期间提议翻译《斯大林全集》后几卷的工作，并把这项工作申报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由苏联东欧历史研究室负责人吴伟教授担任课题组长。在吴伟教授主持下终于把俄文版《斯大林全集》第 14、15、16、17 和 18 卷一些文章翻译摘编。所选文章是各种中文版本《斯大林全集》《斯大林文论》和言论摘编中未被刊载的，当然也被收集进本书。这样，可以说在中国第一次出版了《斯大林全集》后几卷的文著。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所写《改革：成果与经验教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苏联社会发展及各主要时期的政治体制的变迁，史料丰富、语言生动，很值得一读。该文尚未正式出版。茹科夫院士 2011 年访华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粟瑞雪教授得到原始的该书手稿，并把其中部分内容翻译成中文。现第一次在中国出版，以飨读者。

本书基本是按照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历史等专题分类，这样大致能够涵盖俄罗斯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斯大林全集》新译文”“苏联解体”等部分单独作为专题列入。

本书作者基本上是近年来在俄罗斯历史研究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全书由吴恩远主编。尽管我们把近十年的论著作为编纂重点，但在此期间俄罗斯发表的史学论著也浩如烟海，只能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书中挂一漏万、评述不周之处敬请谅解。

吴恩远

2017 年 8 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篇　政治篇

普京论十月革命100周年 …… 吴恩远(3)
普京:妖魔化斯大林就是对俄罗斯和苏联的攻击 … 吴恩远　郑蓓蓓(10)
约瑟夫·斯大林:发展动员模式及其历史
　意义 …… [俄]B. H. 舍夫琴科著　武卉昕编译(17)
斯大林是不是暗探局间谍? …… 武卉昕编译(35)
对斯大林最无耻的诽谤 …… 伊戈尔·佩哈洛夫著　郑蓓蓓译(48)

第二篇　社会经济发展篇

《改革》:成果与经验教训 …… 瓦·伊·茹科夫著　粟瑞雪译(71)
阿巴尔金:苏联经济的命运、矛盾与发展阶段 …… 康晏如编译(148)
波尔杰洛维奇:《俄罗斯90年代改革的教训》 …… 欧阳向英(158)
丘拜斯式的私有化　私有化证券的
　骗局 …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洛兹科夫著　郑蓓蓓编译(164)

第三篇　文化篇

解析2016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文化政策战略》…… 李　琳(185)
普京保守主义分析 …… 吴恩远　李晓华(191)
集体主义在俄罗斯的回潮 …… 武卉昕(199)
俄学界对"苏维埃文明"当代价值的探讨 …… 李瑞琴(206)

第四篇　历史篇

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对苏联历史的新观点 …… 吴恩远(217)

《俄罗斯历史 10 年级教科书》
（主要内容摘译）…… 吴恩远　李　琳　郑蓓蓓(227)
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重塑“苏联记忆” …… 李　琳(247)

第五篇　军事篇

我的时代
——关于 1941—1945 年的伟大卫国
战争 ……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著　马晓明、孙建廷译(273)
斯大林在 1942 年是否想与德国媾和问题
——基于俄罗斯历史文献的探讨 …… 李晓华(285)
普京总统评第二次世界大战 …… 吴恩远(301)

第六篇　民族篇

舒宾：影响苏联解体的主观因素 …… 李瑞琴编译(309)
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侵略性”的
作用 …… C. B. 契什科著　李琳编译(322)
皮霍亚：苏联的民族问题与解体 …… 李琳编译(334)

第七篇　苏联解体篇

是谁、是怎样摧毁了苏联？
——依据档案文献还原苏联解体
过程 …… 阿·萨宗诺夫主编　侯艾君编译(349)
苏联道路不是历史的绝境 …… 弗·卡拉什尼科夫著　陈红译(398)
阿·舍维亚金：《巨大的地缘灾难：苏联是怎样被
摧毁的》…… 徐海燕编译(403)
巴纳林和他的《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 …… 郭　文(416)
久加诺夫论“8·19”事件 …… 康晏如编译(422)

第八篇　《斯大林全集》新译文

编辑说明 …… (435)
一　斯大林论党内工作和政治问题 …… 本节翻译、校对者为：
赵旭黎　余　哲　袁再旺(436)

二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和政治经济学 … 本节主要翻译、校对者为：
赵旭黎 袁再旺 余 哲 崔庆刚(454)
三 斯大林论共产国际和各国党 …… 本节主要翻译、校对者：
赵旭黎 袁再旺 崔庆刚(496)
四 斯大林论军事工作 …… 本节主要翻译、校对者：
袁再旺 崔庆刚 赵旭黎(527)
五 斯大林论外交 …… 参加本节翻译、校对者：
余 哲 袁再旺 赵旭黎(547)
六 斯大林论中国问题 …… 本节主要翻译者、校对者为：
赵旭黎 余 哲 袁再旺(579)
七 斯大林论文学艺术工作 …… 本节主要翻译、校对者为：
赵旭黎 袁再旺 余 哲(583)
八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 …… 本节主要翻译、校对者：
袁再旺 赵旭黎(600)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 14—18 卷版本及其翻译情况 …… (608)

第一篇

政治篇

普京论十月革命100周年

吴恩远

2016年12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布纪念俄国革命100周年的筹建措施命令。[①] 这里的“俄国革命”包括1917年二月革命（史称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史称社会主义革命）。总统令责成俄国历史学会组建纪念俄国革命100周年委员会，在一个月期限内筹建班子并提出纪念方案；俄罗斯政府文化部具体负责实施；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机构、社会和学术团体及有关科研、教学人员等参与这个工作。

一　普京纪念俄国革命100周年的初衷

1. 表达对国家历史、包括十月革命历史的尊重

针对俄罗斯社会在20世纪末曾经盛行的否定苏联历史、包括十月革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京多次强调要尊重本国历史。2014年，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修改委员会学术领导、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向普京总统汇报，指出历史教科书修改委员会认为：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与此相连的国内战争，与其他国家类似的革命，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革命”，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甚至包括不同派别的人都能够接受这个观点。普京对此表示赞同。

2016年12月1日，在联邦议会上普京宣读国情咨文再次明确指出：俄国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是一个再次探索俄国革命的原因和性质的重要节

① Главная > Указы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9. 12. 2016 N 412-рп.

点，必须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历史政治事件。[①]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的意义在于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俄罗斯政府现任文化部长梅津斯基再次肯定了这个意思。根据总统令，俄罗斯政府文化部负责实施俄国革命 100 周年纪念活动。梅津斯基在筹备会上明确说道：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件，我们绝对不能否定我们的先辈尝试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社会的努力。这不仅仅是改变了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也是给全世界各民族发展以巨大影响的决定性事件。[②] 显然，梅津斯基部长所指由俄国革命建立、并给全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新的公正社会”，就是指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而不可能是二月革命后短短几个月存在的临时政府。这应当看成是俄罗斯官方对十月革命的肯定评价。

2. 总结历史教训

庆祝俄国革命 100 周年，普京始终强调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今天俄罗斯社会的和谐和团结。他指出：历史的经验教训首先应当有利于今天社会的和谐。不能把过去年代的社会对立、仇恨、懊丧、冷酷等情感强加于今天，不能造成今天社会的分裂。[③] 他认为过去的俄国革命 100 年所带来的苦难几乎涉及俄罗斯每一个家庭，因此不容许任何党派出于自身利益或者其他考虑，以庆祝这一事件来投机。2017 年 5 月 25 日，普京再次指出：在我国历史上既有光辉的一页，也有悲剧性的一面。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100 年留给我们的主要历史教训就是防止社会的分裂，达成社会的和谐。[④]

承担这次纪念活动主体的俄罗斯历史学会。兼任该学会主席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拉雷仕金在筹备会议上说道：“纪念这个节日主要不是为了庆祝，而是为了思索。”他说：“俄国历史百年来最主要的教训在于：国家统一和公民团结的价值观能够使我们在历史转折的复杂关头找到社会的和谐。所以希望革命历史不再成为导致我国公民之间的分裂和冲突。”他特别强调历史学会的中心任务是：要使俄国革命的后代——无论是“白色的”（当年称为“白匪军”）或者“红色的”（当年称为“红军”）——实

---

①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1 декабря 2016 года.

② К 100-летию Вели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смысление во имя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ОРЕАНДА-НОВОСТИ. 25. 01. 2017.

③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1 декабря 2016 года.

④ 塔斯社，2016 年 5 月 26 日。

行和解。[①]

俄罗斯历史学会为庆祝俄国革命100周年专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俄罗斯历史学会共同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担任组委会主席。2016年12月27日在俄罗斯历史学会理事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他首先承认“俄国革命100周年是我国历史中非常值得纪念和重要的日期”，同样肯定了纪念十月革命的意义。同时他坦诚地指出：“直到今天，俄罗斯各派、各个阶层他承认对1917年俄国革命存在不同政治观点，谁也无法说服谁。但职业历史学家应当找到了不同立场可以妥协的黄金分割线。”[②]

因此，俄罗斯学界根据普京总统要求把庆祝俄国革命、包括十月革命100周年看成是总结历史教训，实现民族和解的重要契机。

3. 防止“颜色革命”

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俄国周边国家不停诱导和发动颜色革命，开展对俄罗斯的文化围剿和精神侵袭。所以普京历来对此反对并高度警惕。他说：“那些惯于借助军事武力手段‘输出民主’的国家往往客观地成为破坏性力量的帮凶。”[③] 俄罗斯联邦政府于2016年2月29日颁布了《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文化政策战略》就是专门防止西方从意识形态领域发动“颜色革命”。2017年3月俄罗斯发生了由群众集会引发的骚乱，以致普京总统3月30日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宣称：“俄罗斯开始了‘阿拉伯之春’。”纪念俄国革命怎么和防止西方颜色革命联系起来呢？

在2015年5月20日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俄罗斯历史学会共同召开、文化部长梅津斯基主持的“迎接俄国大革命100年：理解为了团结”的圆桌会议上。尽管与会者观点不一，但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借助国外力量来解决国内的政治矛盾是错误的，这指的是1917年到1920年外国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资本主义国家感到了威胁，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兰辛说道，苏俄的成立是“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

---

① “Коммерсантъ” от 27. 12. 2016, 22: 34.

② А. Торкунов возглавил Оргкомитет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оведению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священных 100-летию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http: //mgimo. ru/about/news/main/torkunov-vozglavil-orgkomitet* – 1917/30. 12. 16.

③ 《普京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的威胁”。他向威尔逊总统报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①] 威尔逊总统在 1919 年重复了兰辛关于苏俄制度对美国的威胁的意思。他说：“莫斯科政权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②]，于是组织据称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入侵苏俄。

今天，俄罗斯学界认为：当时俄国有八百万人因战争、饥饿、疾病等后果而死亡，两百万人流离国外，苏维埃国家处于战争的废墟上，经济崩溃。外国干涉使国家遭受了恐怖主义的灾难。

总结历史教训，俄罗斯认为必须防止外国发动新的干涉俄内政的“颜色革命”。正如俄罗斯历史学会主席、国家杜马主席谢尔盖·纳雷什金所说：结合当今俄罗斯和世界的形势，强调制定统一的、客观的关于 1917 年事件评价观点是必要的。他强调，近年许多国家被引进“颜色革命”，造成了公民的流血和死亡，致使国家遭到破坏和陷入贫困。吸取俄国革命历史一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教训，“不会再使我国公民彼此分开和相互推开，我们必须支持这一趋势并创造一切必要条件”。[③]

二　普京以评价十月革命上的二元对立思想促成社会和谐

在普京总统纪念俄国革命 100 周年的命令中，以及同期他关于评价苏联历史的讲话里，常常体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当然这是基于他自身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同时，也隐含了他力图消弭俄罗斯社会曾经分裂的因素，实现社会和谐的良苦用心。

1. 承认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对革命过程中一些行为提出批评

2016 年 7 月 31 日，普京登上十月革命发出“一声炮响”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这是该舰在维修 4 年后，驶回涅瓦河 100 年前炮打东宫地

---

① 《兰辛文件》第二件，转引《苏联和美国——它的政治经济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24 页。

② 罗伯特·布劳德：《苏美外交的起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3 页；Robert Paul Browder , 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

③ Заседан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освященное 100-летию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 http: //rushistory. org/proekty/100-letie-revolyutsii-1917-goda/pervoe-zasedanie-organizatsionnogo-komiteta-*po-podgotovke-i-provedeniyu-meropriyatij-posvyashchennykh*-100-*letiyu-revolyutsii*-1917-*goda. html24 января 2017* .

方的首次亮相。在舰炮炮身的铭文上写道："根据革命委员会命令于1917年10月25日晚向冬宫开炮。"普京仔细参观了舰上当年的历史文物，并检阅了海军舰队。俄各报均把普京视察"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看作是对十月革命肯定的一个信号。

普京也对被十月革命取代的沙皇专制制度评价不高。他指出"旧俄国的思想不适于今天"。2014年11月5日，普京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时，他说："如果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不是那样严酷，而是处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我们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吗？肯定不可能。"

与此同时，普京对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行为表达了严厉的批评。2016年1月25日，普京在"全俄人民统一阵线"会议讲话中，对十月革命初期，乌拉尔当地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采取了严厉镇压措施、枪毙沙皇全家包括其中的小孩，以及在内战中苏维埃政权杀害了上万个神职人员这些事情进行了批评。[①]

应当说，枪杀已经缴械的沙皇一家包括小孩是完全错误的行为。但过去对此问题存在把布尔什维克政党妖魔化的情况：一是大大夸大被枪杀的末代沙皇罗曼诺夫全家人数：被说成似乎高达几百人，实际上一共被杀害的有30余人；二是这件事情也有可解释的原因：当时（1918年7月）正值帝国主义对俄国实施武装干涉，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列宁就是在这个时刻被反革命刺杀受重伤；而且俄国历史的"皇权主义"传统（即盲目拥戴沙皇），也使得红军担心沙皇落入"白军"手里使斗争局势更为复杂。

2. 承认共产党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对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贡献，同时批评共产党是"极权体制"

普京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对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贡献是肯定的。他认为（苏联）"计划经济具有确定的优势，它能够集中全国的资源完成最重大的任务。例如，解决了苏联人民的健康保障问题，这毫无疑义是共产党的功劳"。

普京还说道：（苏联）解决了教育问题，这也毫无疑问是共产党的贡献。十月革命前，俄国文盲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是欧洲最低水平。列宁发动了"文化革命"，1940年苏联每千名居民受过普通教育人数达到245人，远远高于美、英、德、法、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① 《俄罗斯总统报》2016年1月26日。

普京特别强调苏联工业化提高国防能力的贡献。他说，如果不能集中利用全国的资源，苏联就不能做好应战德国纳粹的准备。而如果在卫国战争中遭到失败，不仅对我们国家、对俄罗斯民族、对苏联境内其他民族的悲剧性后果都是非常惨烈的。普京最后总结道：（苏联）所做这些贡献是无可怀疑的。[①] 所以他多次承认苏联解体是一个悲剧。

但同时他对苏联体制也有很多微词。他曾说过：如果（俄罗斯人）想恢复到苏联时期是愚蠢的（想法）；他曾评价苏联体制为“极权体制”。

2015 年、2016 年普京相继颁布了总统令和签署了关于建立永久纪念政治迫害受难者的法令。由于法令中提到“大规模镇压”这个词，人们一般容易把其和纪念被斯大林时期“大清洗”运动镇压的人相联系。根据法令，在莫斯科建立的纪念碑采用了雕塑家弗兰古良的方案——“伤心墙”。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普京颁布的关于建立政治迫害纪念碑的总统令（2015 年 9 月 30 日）[②] 或者他签署的建立政治迫害纪念碑的法令（2016 年 9 月 3 日）[③]，在内容中都没有指出这是在俄国历史什么时期发生的迫害行为，更重要的是，法令中完全没有指出谁是加害的“主体”、谁是被害的“客体”。怎么会颁布内容如此不明确的指令呢？这就体现出发令者不希望因此引起思想纷争、扩大社会分裂的用心。采用“伤心墙”的法令之所以没有明确指出是纪念所谓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者，就是这个意思。

2017 年 2 月，为迎接十月革命 100 周年，在靠近乌克兰的克赤地区，根据普京的委托，俄罗斯当地政府还修建了一座纪念 1920 年白卫军弗兰克尔在内战失败后由此渡海流亡国外的纪念碑，碑名就叫“和谐”，完整地体现了普京的思想。

俄罗斯文化部长梅津斯基指出：为纪念俄国革命，我们所建的每一座纪念碑都是为了达到社会和谐。[④]

所以那种认为普京建立“伤心墙”的目的是审判所谓“斯大林罪

---

① 《俄罗斯总统报》2016 年 1 月 26 日。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 09. 2015 г. № 487PDF, 39. 0 кБ.

③ В МИРЕ 14：22，9 марта 2016.

④ Владимир Мединский：Памятник единства должен символизировать целостность нашей истории. 25. 01. 2017.

行”、甚至认为普京政府将对列宁斯大林提出起诉等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三 俄罗斯各派对于普京纪念十月革命举措的评价

应当说，俄罗斯各个党派对于普京纪念俄国革命100周年的举措评价不一。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认为：纪念俄国革命100周年的计划应当是建设性的，而不应当在里面夹杂“仇俄”和“反苏”的因素，这些是导致国家消亡的主要手段。[①] 比如，俄罗斯共产党要求国家检察机关审核俄印古什议会在周年纪念日里通过禁止在该地区为斯大林修筑纪念碑的决议，因为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曾下令迁徙印古什人。[②] 针对修筑“政治迫害”纪念碑，俄共提出修筑“苏联”纪念碑，以缅怀苏联时期国家取得的重大成绩。俄共认为：不能把二月和十月革命混为一谈。俄共重申关于十月革命的立场，赞颂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历史意义和苏联时期的成就，以促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俄共准备单独举办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学术讨论会。

“统一俄罗斯党”因为是执政党，所以拥护普京提出的纪念方案，并表示要深入研究当年造成社会分裂的原因。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则认为：1917年对于国家来说不是一个节日，而是一个悲剧。因为在这一年一个伟大的国家被破坏和消灭了。

俄罗斯广大民众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呢？2016年3月16日俄罗斯就20世纪俄国领导人的地位进行民意调查，结果列宁、斯大林、普京并列第一名。2017年4月，据俄罗斯列瓦达中心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9%的俄民众表示应保留列宁雕像。该民调显示，56%的俄罗斯民众认为列宁在历史上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反对这一说法的占22%，表示难以回答的受访者占23%。同样的民调在2006年，认为列宁在历史上起到积极作用的俄民众仅占40%。[③]

---

① 《今日俄罗斯》2017年1月25日。

②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kavkaz-uzel. eu 2017 – 02 – 24.

③ 人民网－俄罗斯频道2017年4月19日。

普京：妖魔化斯大林就是对俄罗斯和苏联的攻击

吴恩远　郑蓓蓓

2017年6月26日，俄罗斯各大报登载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38%的俄罗斯人在回答“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时，把斯大林放在第一位，普京和普希金并列第二，列宁名列第三。在此期间，普京会见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时说道：对斯大林的过度妖魔化就是攻击俄罗斯和苏联。这句话几乎颠覆了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对斯大林的评价。俄罗斯民众和普京总统对斯大林新的认识必将对俄罗斯社会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普京：对斯大林评价转一大圈回到原点

苏联对斯大林的争论始于赫鲁晓夫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恣意妄为的攻击和谩骂导致苏联社会和国际共运思想混乱，并影响到戈尔巴乔夫等“六十年代人”，所以说苏联解体“始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从对斯大林个人的批判发展到对“斯大林模式”和整个苏联体制的全盘否定，1989年时苏联社会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只占8%，灭史亡国，顺理成章。

苏联解体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悲剧（普京语）令无数俄罗斯人怀念苏联时期的大国气概和稳定生活，对斯大林的认识更趋理性和客观，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开始逐步回升。此后多次民意测验表明，俄罗斯人对苏联社会的评价日趋正面，斯大林则稳居历史人物前列。

笔者在2003年曾经写过《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一文，当年产生

“重新评价”的原因今天依然存在，但“列瓦达中心”这次民意测验特点在于：

第一，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评价出现新的升级。俄罗斯过去有过很多次类似民意调查，斯大林被列为第一位并不鲜见（最近一次是2017年3月评价百年来俄罗斯最伟大领袖人物，列宁、斯大林、普京并列第一位）。但以往俄罗斯的民意调查主要是测评自己国家的历史人物，这次范围扩大到对全世界和全部历史发展阶段的最杰出名人。世界各国、各民族对此当然有自己标准，俄民众这个答案不一定被他人接受，但斯大林的地位在俄罗斯人眼里超过他们心中的“神”彼得大帝；超过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普希金等俄国全部历史人物、甚至认为其贡献应当居全世界所有杰出人物之首，把斯大林抬到这么高的地位在俄罗斯的民意测验中还很少见。

一次民意测验也许不能说明多大的问题。如果多年来、多种民意调查机构的多次测验都是同一个结论，就确实代表了广大民众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俄罗斯对斯大林看法这种如过山车式的急剧转变，正如6月28日《俄罗斯——波罗的海》报纸写道：“在俄罗斯现代史上，特别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人们始终对斯大林镇压的罪行感到恐怖并且咒骂这个血腥的暴君。但在新的斯大林式的普京体制时期，斯大林的个人威望从已经触底又得到了复兴。有这种感觉，我们国家对斯大林的评价似乎又回到了原点。”①

第二，普京总统对斯大林评价新变化。普京对斯大林第一次正面评价是在他刚上台的2002年。一方面他也谈到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另一方面肯定“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②此后他对斯大林的多次评价基本上在这个尺度之内。

2017年6月16日普京回答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关于评价斯大林问题时说：斯大林时代发生有悲惨事件，今天的俄罗斯确实还带有斯大林主义的某些遗毒，但是，我们大家不都带有各种遗毒吗？就是说任何人都难免犯错误。他还指出：“在世界历史上都存在有争议的人物：

① 《Росбалт》, 28 июня 2017.

② 2002年1月16日人民网。

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克伦威尔是独裁者和暴君；拿破仑当了皇帝后，把国家引向民族灾难，遭到完全失败。但是他们两人在国内仍然受到尊重”，这就阐明了普京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他举例说道：丘吉尔尽管有其反对苏联的立场，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坚决主张和苏联合作，并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统帅和革命者。所以，普京强调：“斯大林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人物。那些过分妖魔化他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攻击俄罗斯和苏联。”①

这是普京对斯大林新的评价：首先，承认过去有妖魔化斯大林的现象，而且“很过分”；其次，把对斯大林评价放到与国家平行的地位，指出对斯大林的攻击就是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攻击。最后，强调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

第三，抬高斯大林地位的不仅是左派，不仅是俄共，而且是各级政权。

6 月 27 日的《俄罗斯报》报道：最近关于斯大林的消息占据了俄罗斯各报头版，仿佛是在进行军队大元帅竞选。“斯大林从地下冒出来了”，俄罗斯报纸通栏大标题这样报道。几乎每一天，斯大林的各种挂像、雕像突然冒出在各个地方。俄报指出：主导这种行为的，不是左派，也不是俄罗斯共产党，而是能够揣摩上面意图的各级政权②。在莫斯科国际法学院发生的把原先取下来的斯大林挂像又挂在原处，就是校领导的决定；2015 年 7 月 3 日，俄罗斯当地政府在特维尔州勒热夫区竖立了一座斯大林胸像。俄罗斯政府现任文化部长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为此专门撰文阐述建立斯大林纪念碑原因。他写道：“我们社会不需要以丑化、回避的态度对待祖国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不实评价。以前靠随意推测或谴责性的论调对斯大林评价的那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早就不能立足了。”

各级政权出面的原因在于俄罗斯出现“新的斯大林式的普京体制”。

二　对斯大林评价变化的原因

应当说，俄罗斯目前出现的对斯大林又一轮重新评价有着深刻政治

① MOCKBA, 16 июня 2017, 07：49—REGNUM.

② 《Газета. Ru》27. 06. 2017.

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领域的背景。

1. 认识到过去有妖魔化斯大林的存在

斯大林问题得以回归理性，在于俄罗斯人认识到过去的确存在妖魔化斯大林的情况。

政治学者库利科夫指出：妖魔化斯大林起初来自西方，把斯大林说成是和希特勒并列的绝对邪恶的人，目的是使俄罗斯处于和西方在政治权利不平等的地位。①

首先就是集中攻击斯大林 30 年代的大清洗问题。这当中确实有扩大化的错误，但被西方肆意扩大。《俄罗斯报》写道：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由“纪念碑”等组织在群众大会上公布所谓被解密的档案：仿佛有成千上万的斯大林体制下的牺牲者，反斯大林活动达到顶峰。这个“纪念碑”今天已经证实为外国间谍组织。②

普里亚尼科夫在《俄罗斯人热爱斯大林之谜》一文中写道：指责斯大林“残忍”的一个罪行是对待农民。但是在俄国的执政者中只有斯大林完成了把一个农业国城市化的任务。1914 年俄国城市居民只有 23.2 百万人，1956 年达到 87 百万人。40 年城市人口增加了 3.5 倍，而欧洲国家达此目标花费了 200 年！③

妖魔化斯大林一个表现就是指责他“专制、独裁”。多年来一谈到“斯大林模式”就离不开“高度集权、专权”的特点。俄罗斯学者科尔尼多克特里内写道：“独裁”这个词是冷战时期西方理论家为战胜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发明的。其结果是，俄罗斯被摧毁了。④

到今天为什么这股反对斯大林的歪风没有继续刮下去？《俄罗斯报》指出：这是因为反对者指责斯大林似乎违背纽伦堡确定的法制、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事情根本不存在。⑤

2. 理性评价斯大林的一些错误

在《斯大林从地下走出来》一文中，作者认为：那些把自己选票投

---

① MOCKBA, 16 июня 2017, 07: 49 — REGNUM.

② 《Газета. Ru》27. 06. 2017.

③ 《Росбалт》27 июня 2017.

④ Корни доктрины: Рычаг《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а》— изобретение теоретиков《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MOCKBA, 8 июля 2017, 11: 07 — REGNUM.

⑤ 《Газета. Ru》27. 06. 2017.

给斯大林的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大清洗的情况，也完全不是斯大林主义的狂热拥护者。但他们知道："一切有效益的管理者都是借助于惩罚性手段。"卫国战争中"一步也不准后退的"227 号命令，对随便撤离阵地的人施以严厉惩罚手段。但不这样惩罚临阵脱逃者能保卫祖国吗？

斯大林大元帅的形象是国家的象征，俄学者叶莲娜指出：今天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想给自己提到大清洗的问题，人们已经对他的错误给以原谅。①

3. 重新认识到斯大林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意义

斯大林时期工业化、社会发展现代化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的成就，通过这些年来在俄罗斯各种书籍、刊物、甚至国家教科书、电视节目等等载体上的宣传，已经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对比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状况和国际环境，今天俄罗斯人对斯大林当年领导苏联与西方抗争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库利科夫强调原因在于：俄罗斯人知道，西方从来不承认俄罗斯人有与他们平等的地缘政治权力。整个 20 世纪俄罗斯一直在为击退敌人而斗争。这场斗争始于 20 世纪初，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在斯大林时期取得了从开始到中间阶段的胜利。当年与西方的"冷战"今天还在进行，实质是维护俄罗斯人的生存权，担忧这场斗争能否再次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人才对斯大林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认定。②

俄罗斯人还认识到：仅仅依靠自己的单打独斗取胜的艰难和被孤立制裁的无助。但当年在斯大林领导下，不仅战胜了法西斯，而且建立了一个几乎囊括地球一半的社会主义体系，依靠这个体系在巨大的地缘政治范围内与"文明"的西方多次竞争中取得胜利。俄罗斯人清楚斯大林在捍卫俄罗斯人生存中所起的作用，有了对斯大林高度的评价③。

4. 今天的普京政权需要斯大林

普京执政以来，由于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在国家电视频道上充满了对斯大林的赞美，这种宣传甚至比斯大林时代还广泛。原因是今天的俄罗斯总统需要这种形象。

---

① "Биржевой лидер" ссылка на http：//www. profi-forex. org.

② МОСКВА, 28 июня 2017, — REGNUM.

③ Тамже.

国家领导人需要以历史上的强国领袖为榜样。正如《俄罗斯报》写道：最近十余年，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降低，俄罗斯人又把眼光聚焦历史。这一次不仅仅来自下层，而且是来自上层政权领导人：正是这些领导者们试图在俄罗斯历史中探寻成为伟大强国的领袖人物，以此作为其榜样：如竖立了弗拉基米尔大公雕像。并且这当中不仅是要对历史反思、理解并且还要悔过。①

人们期盼俄罗斯总统重现稳定生活。在当代俄罗斯40岁以上的人常常愉快地回忆起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认为是自己生活最好的时代。勃列日涅夫虽然被认为是“停滞年代”，但人们认为那时的领袖虽然是严厉的，却是公正的。斯大林的崇拜者认为：如果还是斯大林执政就能够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② 表达俄罗斯民众对再现斯大林式的执政者的期盼。

普京政权在很多方面复活了苏联的实际做法。据最近俄罗斯民意调查：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支持总统现行的方针并希望未来总统执行现在的政策：这就是继续在国内外政策上采取比较强硬的方针。俄罗斯学者预言：由于这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克里姆林宫战略家们已经在考虑斯大林问题上怎样做更正确。根据一切判断，普京实际上已经为斯大林平反，所以人们希望俄罗斯总统应当成为类似斯大林那样的人。区别仅仅在于：不要再设立集中营，不要每周工作六天和封闭边界。③

三　对斯大林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影响

这次俄罗斯对斯大林等历史人物的民意调查结果和普京对斯大林新的评价，必将对俄罗斯社会、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拨开妖魔化斯大林的迷雾，恢复对苏联历史和苏联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有利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正本清源，夯实了俄罗斯执政者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历史终究证明：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长久丑化和攻讦为本民族作出重大

① 《Газета. Ru》27. 06. 2017.

② “Биржевой лидер” ссылка на http：//www. profi-forex. org.

③ Тамже.

贡献的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正名有利于为国家、特别是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

（2）多年来受西方“妖魔化斯大林”的思想浸淫，极大影响、甚至阻碍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当年建国时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至少要学习苏俄 1918 年宪法和 1936 年斯大林宪法[①]，前者规定了苏俄社会主义体制的国体和政体，斯大林宪法则补充了“共产党是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当年戈尔巴乔夫修宪就是取消共产党领导这一条，为多党制打开绿灯。所以妖魔化斯大林的核心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

（3）围绕斯大林的争论在俄罗斯还会进行。普京对斯大林的新评价绝不意味着俄罗斯要回到苏联时期，包括前不久普京签署“建立受政治迫害遇难者永久纪念碑”法令。尽管他有意在法令中回避在“什么时期”“谁迫害谁”的关键问题，人们感觉还是纪念斯大林时期被迫害的人，而很多俄罗斯人对“斯大林镇压”持否定态度……表明俄罗斯上社会对斯大林评价还有不同看法。但无可怀疑的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半个世纪以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在俄罗斯受到颠覆性的批判。

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8 页。

约瑟夫·斯大林：发展动员模式及其历史意义*

［俄］B. H. 舍夫琴科著　武卉昕编译

武卉昕：女，1973 年生，蒙古族，博士，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苏联史 苏俄伦理学

2009 年秋，国家领导层阐明了当前俄罗斯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俄罗斯的未来非常危险。国家领导层还注意到了俄罗斯对原料出口的依赖。但是国内曾经也步入过现代化阶段：斯大林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实行了国家全面现代化。如今统治精英试图推动对国家来说绝对必要的新现代化进程，阐明自己对斯大林现代化经验的态度是必要前提。

斯大林曾是我国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并且在 1923—1953 年的 32 年间是国家的实际领导人。他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的学生，解决了当时我国面临的最复杂的实际问题，创造了独特类型的工农国家和独特的苏维埃、斯大林社会主义。但同时也使我们国内形成了独特的环境。关于斯大林的文章非常多，其中以无法全部列举和评价的政论性文献居多。还包含大量官方文件，以及党员战友、朋友和敌人的回忆录，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亲自撰写的著作。但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不足以解释斯

---

* 此文节选编译自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政治行为哲学：20 世纪左倾政治思想史》，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1—150 页。

大林现象。

这是因为社会上对他的个性和行为存在着对立的评价，这是我国和世界知识界当前无法消除的事实。不但如此，无法避免的是因为必须经常谈到使得斯大林的名字成了我们知识界深切而痛苦的神经。实际上在现在每个圆桌会议或者学术讨论会上都能发现，不论它们的议题是关于社会哪些方面的，对斯大林的评价并没有达成共识的迹象。大量观众和读者常常陷入“斯大林是罪犯还是英雄”的两难思考。近几年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不断增多，几乎达到 50%。电视节目《俄罗斯的名字》（2008 年）显示，斯大林至今仍是俄罗斯的主要象征之一。

当然，希望我们这个已经承受了大量威胁和现代挑战的社会停止分裂。如果没有明确地解释国家历史中的斯大林阶段，并使这种解释得到多数俄罗斯人民的认可，社会前进的步伐将步履维艰。众所周知，2007 年启动了一个庞大的研究方案，准备出版 100 卷阐释斯大林主义的著作。目前已出版 70 多卷，主要撰写人为英语国家的研究者。该方案具有绝对的倾向性，旨在系统地贬低与斯大林统治有关的整个苏维埃时期。我们想从哲学、世界观层面更客观地看待斯大林现象，要在这个层面上寻找克服社会分裂的途径及客观科学地研究问题的坚固基础。

斯大林坚定的反对者 B. 科斯季科夫（В. Костиков）总体上准确地指出，即使是在文简图茂的群众性小报上斯大林依然拥有稳定的高支持率。斯大林已逝世半个多世纪，国家“重启”资本主义已有 18 年，按照苏联的算法，几乎相当于 4 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如果斯大林被遗忘，不是因为民智开启，也不是受民众谴责和咒骂的影响，只有在俄罗斯的地平线上出现胜利的曙光时他才会被遗忘，然而胜利暂时还没出现。那么，为什么胜利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出现？似乎是因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得到了罕见机会得以摆脱斯大林遗产，按照自己的样板在国家建立正确的标准的资本主义，但是没有成功。因此，必须再次仔细地剖析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时期国家所做事业的历史意义，详察他们进行社会全方面改造的独特经验。

斯大林和现代化政策。近几百年的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众多改革者，但毫无疑问，其中的杰出者是彼得一世和约瑟夫·斯大林。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已经过去了 300 年，但是直到现在对于他宏大改革的历史意义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广为人知的观点是，在追赶现代化的道路上，换句话说是在俄罗斯的西方化道路上，俄罗斯是从彼得一世开始力求缩小落后于西方的

差距，现在这个观点越来越遭到质疑。有足够理由认为当时的俄罗斯是首次尝试以自己的方式直面历史的挑战，俄罗斯第一次现代化尝试是为了寻找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坚实的发展道路。从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开启了社会历史特点与当时西方先进成就相结合的复杂过程。

俄罗斯帝国沿着自己的特殊道路走进死胡同并于1917年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治精英的失职和短视。直到帝国存在的最后几年，各种国家改革计划还在不断提出，但是由于缺少意志坚定且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实践主体，当时也只有国家应该承担这个实践主体的角色，改革计划只能停留在计划阶段，无法付诸实践。С. Э. 库尔吉尼扬是对的，他肯定了俄罗斯国家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国家是工具，人民利用它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历史使命就没有人民。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重新着手寻找俄罗斯的独特发展道路。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危机，从这时起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上迅速蔓延，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社会主义。欧洲思想界认为社会主义道路能够走出危机，危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爆发，在俄罗斯也是如此，几百年来在俄罗斯社会积累的巨大反对能量在1917年2月像炸弹一样爆炸了，俄罗斯帝国在三天内就垮掉了。1917年十月革命为国家开辟了继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前景。红色方案是选择在俄罗斯第一次尝试形成和实现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走坚实的独特的俄罗斯发展道路。Н. А. 别尔加耶夫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在1917年的俄罗斯……是空想色彩最少和最现实的，而且是最忠实于某些俄罗斯传统的，是俄罗斯探索的通用社会真理、可理解的极端方式和俄罗斯暴力管理和统治方式……共产主义是俄罗斯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俄罗斯人民命运的内在要素”①。

布尔什维克党从最开始就成为新的特殊型现代化发展主体。党是阶级和社会的先锋队、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对未来国家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理解并因此形成的联盟。斯大林是领导者之一，或者像那个年代所说的，是俄罗斯共产党（布）的领袖之一，他从1923年列宁离开活跃的政治生活之后开始独立推行政治路线，在讨论国家发展道路过程中斯大林成为党公认

① ［俄］Н. А. 别尔加耶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思想》，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的领袖。斯大林从当时苏联社会所面临的历史选择中选取了一个，这个选择开辟了国家特殊发展及全面改造社会的道路。由于 20 年代末一系列不可改变的情况，这个方案变成发展的动员模式，斯大林成为战略家和国家独裁者。随着它的实施，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使社会思想丧失了多样性。

斯大林作为国家领袖，首先对自己的理性思维类型感兴趣，他的思维类型是特殊的哲学和实践辨别能力的混合体，这种思维类型既能直觉地捕捉理想新社会类型，又能明确意识到在具体社会中实现这个方案的基本可能性。在这里可以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社会以可变的、具体现实的形式出现。在理性思维里斯大林指的是某种囊括一切的东西——根本改变旧社会的东西，而这意味着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新的人与人关系（新社会群体）和新苏联人。

如果在理性思维上解决了问题，那么从政治环境角度开始思考实施方案的具体方法，尽量改变国内政治环境以便加快和改善实施方案。在理性思维和政治的交叉点产生战略目标，成为达到理想途径的战略，但是运动总是与解决大量具体任务相关，正确的解决方式应该是促进运动。理性思维、政策和战略三位一体决定政治活动家的思维性质本身，而实际实施规模取决于他在政治等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竭力达到的党和政府中的领导位置。意识形态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居外在位置，借助于这个工具，社会实施具体任务和战略目标，在社会意识里建立正确的体系、目标和任务的从属性。

俄裔法国哲学家 A. 科耶夫写道，政权的四种类型中有“计划政权”。“未来掌握政权有多久，未来表现在计划方案中（以对过去的了解为基础，现在思考出来并形成的对未来的视野）。‘设计方案’是领袖政权，因此可以说，未来‘出现’在像领袖政权那样的‘专制’形式中，领袖政权有未来的潜在存在于现在的所有的一切之中作为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①] 换句话说，当政权以伟大的思想、全部的生活制度作为指导原则时，就是所谓的设计方案政权，同时也就是向未来示威的领袖政权。

斯大林对苏联情况的认识观点是：苏联这个国家是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到 1923 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立场形成明显差别。对于托洛茨

① ［法］A. 科耶夫：《对权力的理解》，普拉克西斯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5—86 页。

基来说，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只能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继续获得胜利为前提，因为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在世界仍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苏联不能消除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革命会很快遭到失败。斯大林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世界革命延期，国家应该做什么？当时的观点是，当革命浪潮暂时退去时，应继续试图计划欧洲的革命形势。

斯大林在党内讨论会上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一国能够也必须建成社会主义，他多次引用列宁在文章《论我国革命〈评尼·苏哈诺夫的札记〉》里的见解。列宁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① 这意味着，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这种道路具有可能性，并且它能为国家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前景。到1925年年底，斯大林路线在激烈的党内辩论后成为党的十五大会议的指导精神，理念逐渐发展为战略目标。

斯大林提出了哪些有利于自己思想的论据？他是怎样思考当时国内和世界形势的？

（1）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实现，欧洲开始暂时稳定。但是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仍是"火热""激昂"的社会，是巨大社会无组织能量的载体。处于革命情绪中的群众坚信，国内战争的胜利消除了通往新社会的主要障碍。人民仍旧急切等待快速而彻底地改造日常生活环境。工农群众希望向前进，社会发生了运动变化但社会进程并没有向前推进，而且新经济政策对于无产阶级意识来说是一种倒退。社会上的冷漠和不信任情绪正在蔓延，人们公开谈论革命思想背信弃义。斯大林在1924年5月党的十三大会议上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不久以前我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我说也许我们必须从党的方面或者工业方面调一万来个共产党员到商业工作方面去！"② 换句话说，与列宁的观点相悖，新经济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十分严肃。

---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372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页。

（2）新经济政策头几年的巨大成就使革命者陷入艰难境地。小资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也在增强。斯大林是首位看出这对苏维埃制度具有致命危险的领导人。热月政变的危险，也就是社会倒退的危险，正在变成现实，它来回飘荡在空气中，需要赋予社会主义因素新的发展速度以及与资产阶级分子斗争的新动力，将一切社会力量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斯大林来说，问题在于建设社会主义对国家生存和发展是非常必需的，而不仅仅是马克思科学理论原理，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非常新的，并且是至今未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的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里渐居首位的不是抽象地讨论革命，而是现实的革命目标，是那时国家人民熟悉而明白的：社会平等和社会公平。为此，需要组织紧张劳动，以及坚定对很快胜利的信念。这一切都成为作为新社会制度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描述。自此斯大林多次引用列宁的话：推行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会成为社会主义俄罗斯。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里也经常强调，他相信能建成社会主义，全体党员应该赞同这个信念并传达给群众。

（3）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现实道路，按照斯大林所说，国家摆脱对西方的经济依赖将成为可能。斯大林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的经济独立，只有在国内建成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这一点，这个思想非常牢固地盘踞在斯大林的头脑里。斯大林正确地认识到依赖和落后之间的联系：依赖产生了落后，而不是相反。沙皇俄国在几百年间都是欧洲国家的原料基地。苏维埃俄国在 1918 年 1 月拒绝偿还沙俄欠下的巨额债务，这使国家在财政经济方面不再依赖西方。1921 年西方提出 150 亿美元的账单，当时列宁针锋相对地提出 200 亿美元的索赔要求。于是，问题被推迟解决。斯大林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多次强调的思想是，苏联应该尽一切可能，不再重复革命前的情况。“工业化是维护我国经济独立的基本方法。”① 在对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里，斯大林写道：“提纲没有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根源和作为西欧帝国主义列强的后备军的沙皇政府在这个战争中的作用，同样也没有指出俄国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主义对西欧资本的依赖，因此，十月革命作为使俄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解放者的意义，没有得到

①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97 页。

说明。”①

（4）斯大林从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世界将分裂成两大不可调和的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更强大，国家发生战争的威胁也来源于此，斯大林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中心位置。一些学者现在认为，军事威胁被斯大林夸大了，但是事实仍然证明，20年代末武装干涉的威胁对国家来说仍是现实问题，“战争给我国造成了危险的威胁”②。斯大林强烈反对托洛茨基全力“燃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观点。党会帮助欧洲工人运动，但是革命只有在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内部冲突解决后才能发生。斯大林利用共产国际的国家组织，借助欧洲工人运动高涨，首先能降低、削弱武装干涉的威胁。

在20年代末斯大林认为，国家应该成为军事堡垒，坚决与内部敌人（后来被称为“第五纵队”）作斗争。他确信，在国内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不能避免外来侵犯，这个意义上胜利不是最终的”③，斯大林的这些观点确有先见之明。

发展的动员模式。斯大林在1929年转为用动员方式实现其理念，在30年代初他成为国家独裁者。动员模式的运用与特殊的、非常紧张的社会环境有关。根据一位研究动员理论的作者的观点，发展的动员模式“是利用非常手段和非常组织形式达到非常目标……它的突出特点是它在外来的、极端威胁国家完整和生命力的因素影响下发生”④。在这个因果链条中，作者认为居首位的是能够接受的极端的外来因素，而且利用外来威胁达到内部政治目的在政治史上非常常见，因此评价外来威胁的真实性在实施动员措施的国家里是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斯大林评价外来威胁从世界局势发展趋势角度看是真实的，并且是重要的。国家发展的动员模式在仔细思量后被迫使用的原因，在于动员模式是为国家和人民建立安全生活环境的绝对必要措施。伟大的卫国战争进程和结果证明了该模式的实施是非常及时的，对斯大林的批评通常忽略社会动员模式启用的外部因素，简

---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② 同上书，第297页。

③ 此句在《斯大林文集》中的表述是：“换句话说，当社会主义只是在一国内获得胜利，而资本主义包围还继续存在的时候，能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是已经免除了武装进攻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行动的胜利呢？”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190页。

④ ［俄］A. Г. 福诺托夫：《从动员社会到革新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单地把 1929 年伟大转折归为个人政权的专横和贪婪。

动员有开始和结束。承担动员责任的国家领导人能否预见它会怎样、于何时结束？动员的开始难道只是因为绝望吗？如果他不相信会成功，他根本不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而如果相信胜利，那么从他的角度看胜利，能解决提出的主要和基本任务，剩下的只是细节问题。众所周知，胜者为王。提前看出未来胜利的代价是不可能的，而且所期待的结果是远非任何这类意图所能得到的。但是，关于胜利的社会代价、得与失的对比、成就与牺牲的关系等问题始终是历史问题。发展的动员模式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严峻的考验，何况是对于苏联来说。

因为发展的动员模式意味着要特别努力使用特别组织形式，这种模式看起来是历史的险境，把国家、人民、领袖迅速拽入某种旋涡。发展的动员模式需要巨大的资源——财力、人力、原料和组织，同时需要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就历史影响来说，根本改造社会的社会动员规模在特殊环境下产生了巨大的问题，后来还发现，国家的这个历史阶段或早或晚会结束，对斯大林动员方案最激烈争论的意义也在于此。

动员方案，作为对非常性质的威胁的应对方案，使它的设计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坚定的观念，认为社会和人是具有无限可塑性的，这是一个特别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动员方案的强大机制改变人们什么，人民的文化历史经验由此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这是现今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公开命题。这也是对斯大林动员方案的评价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能否坚决克服当今基于其他的非动员方式的显而易见的国家落后？或者说，现代的动员应该首先指的是智力资源，而不是人力和物力资源？但是还留下一个问题：集中国家有限的资源进行现代化，并有力而高效地组织利用这些资源。

许多情况使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严重复杂化了，但是在 1929 年以前没有必然需要动员体系、发展的动员模式。斯大林认为外来威胁和内部威胁非常严重，但是并未达到极度危险的程度，应该会发生需要非常措施的非常情况。

决定使用非常措施并非来源于任何一个哪怕最正确的理论，也不是来源于任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国家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开启的新的以往没有的实现战略目标的机会的结果。机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暂时的、迅速发生变化的特点，所以发生特殊情况：现在或者再也没有。国家

领袖承担着转为利用非常措施的巨大历史责任，斯大林的主观主义受到各方批判，不论是欧洲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从思想上解释领袖的这个决定绝对必要，以使社会理解和接受，但是不能利用某些马克思主义原理解释，因为这会歪曲这个理论本身，理论在这里完全没有帮助，就像在前线上的具体情况：在前线上某一个点的意外突破会使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长的坚固防线失效。

斯大林的直接战略目标有三个：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对于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工业化，建成符合那个时代的现代工业体系。

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工业是属于自己特殊类型的工业。1925 年，他在论及赶上而后超过先进工业国家的任务时说道："我们只有在最新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①

1927 年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相当猛烈，但不是动员性的。1929 年发生了特殊情况，西方公司对苏联工业化建设的兴趣发生第一次飞跃。1929 年 2 月驱逐托洛茨基之后，对于斯大林来说与一系列美国大公司紧密而有效地联系成为可能，这些公司大规模订购设计和组织建设许多大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成了日益成长的新工业大国的基础和象征，包括汽车、拖拉机（坦克）、飞机制造、铸造工厂。设计总造价是那个时代的天文数字——20 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 2000 亿美元。在这方面的突破是巨大的，并且它发生在斯大林驱逐托洛茨基之后。

将斯大林推向动员的决定性事件是 1929 年秋季的"大萧条"。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机器、设备、仪器和优质钢的价格急剧下跌，以购买或者贷款就能获得整套工业设备甚至一些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重新修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期方案。

同时，斯大林彻底改变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1928 年粮食收购危机产生了一系列收购商品粮的非常措施，但是并没有取消以新经济政策为主导的战略路线。1929 年 12 月政策彻底改变。

动员问题首先变成财政问题，国家十分需要财力购买工业设备。资金来源有：①向西方出售各类农业产品、木材、自然资源；②农村实行集体化以稳定地获得工业建设所需的商品粮和劳动力；③开设外宾商店，吸引

① ［俄］A. H. 雅科夫列夫：《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二）》，李方仲、宋锦海、李永庆译，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94 页。

人们用黄金和贵重珠宝首饰交换进口商品；[①] ④扩大使用囚犯劳动力，其中包括开采黄金。

斯大林在 1929 年 12 月宣布开始伟大的转折。他给国家和党提出了在最短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在 1931 年他要求进一步提高运动速度，把速度和克服落后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②]

苏联工业化的结果是出现了拥有最新设备的完整工业体系。托洛茨基在 1931 年写道：“对外贸易的数字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和速度的指导性数字。”[③] 斯大林贷了很多款，但都按时偿还，没有出现大量外债，所以不能说出现对西方金融的贷款依赖。

显然，对外经济因素在转为发展的动员模式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历史经常详细描写各种对外政治和外交细节，而有意忽视对外经济因素的作用，忽视分析财源、货币信贷流（包括借款）的状况。顺便说一句，现在的政论作品非常愿意讨论货币问题，特别是从党、秘密组织、特工机关等活动角度出发。学院派的哲学研究很少与这些资料打交道，这当然是哲学研究的特殊题目，但是为了理解世界的和国家的历史，它的货币财政有首要意义。

从根本改造社会的动员模式观点看，制订计划的机制被坚决修改。Г. С. 斯特鲁米林院士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他的一部著作这样理解斯大林时代的计划：“我们认为所有国民经济计划的特点不是夹杂在这个计划里面的科学预见，而是计划的目标设置，像经济任务和指示系统……对现有资源和国家发展的客观经济趋势的科学研究是制订计划的必要前提，但绝对不是计划的内容。”可以制订各种计划，“但是实际上只能实施其中一个：而行将实施的计划是会得到劳动群众意志力量积极支持的”[④]，换句话说，计划是在集中和动员劳动群众的集体意志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者的能力。对作为政治战略家的斯大林制订计划的看法是

① 参见［俄］Е. А. 奥索金娜《工业化中的黄金：国有对外进出口集团》，政治学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74—275 页。

③ 引自《反对派公报》1931 年第 20 期，第 4 页。

④ ［苏］Г. С. 斯特鲁米林：《在计划经济阵营》，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22—223 页。

这样的，斯大林修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高数字首先是动员社会的目的。1933 年 1 月，动员机制已经建立并且开始卓有成效的运作，斯大林强调："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最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①，他认为，党要鞭策国家，使它加快速度向前奔跑……不能不催促国家，它已经落后 100 年并因为落后受到死亡威胁。

动员涉及了农村，它最复杂和悲剧的部分是消灭富农阶级和快速全盘集体化。农村转入新轨道导致多年的生产产品大量损失，几个世纪以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被破坏，引起了农村巨大的社会震荡。农业改革为新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劳动力。

为了数百万群众能接受和理解这个目标，斯大林被迫但完全有意识地走上思想上简化最终绝对目标的道路，否则动员是不可能的。

首先反对转入动员发展阶段的是那些可以称作居民的人。不论具体工作形式如何，居民意识总是拥护"正常的生活"，反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过度"改变。一些思想性言论也反对动员，特别是在那些因过去功绩获得名望而过着舒适生活的人。官僚集团、苏维埃资产阶级（新经济政策时期企业主的称呼）、苏维埃官僚的行为也反对动员。

官僚问题是斯大林应该解决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1917 年之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官僚体系规模庞大，多次企图摆脱党的监督，企图成为领导"阶层"。竭力摆脱党的监督的苏联国家官僚体系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平静生活会被打破，越来越不想发生新的革命震荡。托洛茨基指出，正是这种情况是自己政治和党务生涯衰落的决定性原因。"革命在国际范围内遭到一个又一个失败，控制权到了国家改良主义者手中，他们自发地巩固斯大林官僚体系，反对我和我的政治盟友。"②

但是俄罗斯的官僚体系不仅是为谋私利使用权力的"阶层"，准确地说，一直以来它都是俄罗斯国家结构的基础。官僚体系不能解散，需要正确利用，斯大林成功地驯服了官僚体系，他多次提到官僚主义，称官员比党务人员多很多。斯大林使整个国家管理机制服从于党机关，实际上成立了管理国家的行政命令体系。A. 别克在《新任命》一书中很好地描写了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67 页。

② ［苏］Л. Д. 托洛茨基：《我的人生》，全景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1 页。

这种行政命令体系在个体层面上的运行机理。[①]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走上国家领导岗位是受到官僚体系的支持，这个观点是部分正确的。官僚体系不想发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它对斯大林在20 年代集中精力处理国家内部问题的做法完全满意。但是斯大林不仅把官僚体系作为自己的支柱，在某种意义上他辜负了官僚体系的期望。在建立发展的动员模式下，官僚体系为了实现伟大目标，为了达到目标，不得不承担巨大工作量，其中许多人并不想参与完成斯大林的巨大任务，因此被解职或被镇压。斯大林经常把国家官员和党务工作者从一个地区调换到另一个地区，目的是防止出现官僚小集团和互相包庇的情况。

发展的动员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三四年的时间，它于 1933 年基本形成。必须指出的是，发展的动员模式计划建立特殊的平行政权组织，根据国家首脑的决定它拥有广泛权力，作为动员和监督机构绕开现存政权机关。

斯大林建立的发展动员模式依靠严厉的专制政权体系统，这种政权体系还是不能简单地评定为集权主义政权。为取得社会的动员团结一致，不可避免地依靠严厉的措施镇压反对动员方案的人。要知道在宽广的历史前景中我们再次强调，这里谈的是苏联社会的生与死。

“苏联人”的概念出现于 1934 年，并在十七届党代会、“胜利者”大会上宣布，对新人的概念做出了具体阐释，新世界虽然远未完善但已具备了现实轮廓，还创造了“俄罗斯奇迹”。奇迹真的在工业领域不可思议地实现了，教育、科学和技术领域实现了真正的革命。苏联成为全世界发展的标杆，是那个时代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朝圣成了所有寻找世界新道路的人的需要。B. 马雅可夫斯基称新俄罗斯是“人类的春天”。

新社会的最重要特点之一是，它是由规定约束的、定额的、理性的社会。当谈到苏联人形成过程——他的行为模式、言语运用、服装、共同文化程度时，新社会的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内形成集体的工业社会，相当部分的年青一代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业建设并进入城市，开始积极地投身到苏联人所做的事业之中。首先是定额劳动的义务，斯大林屡次指出需求增长、消费增长和贸易额发展的积极意义。国内形成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为他们成立了为数不多但品质极好的百货商店。虽然形式特殊，但是不能

① 小说在 1987 年改革之初出版，获得了很大知名度和大量反响。

以此推论30年代斯大林时期形成了消费社会。[①] 在根本改变社会的构想里没有它。在动员节奏框架下，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严格建立在高级精神目标优先于物质消费目标的集体意识上。因此那些研究者未必正确，他们中为数众多的人忽视了30年代存在于社会上的强大精神热潮，把那个时代的全部日常生活简单化为日常生活劳动。但是与构想相反，消费社会的萌芽出现在党－苏维埃官僚体系环境下，萌芽在几十年后猛烈爆发导致悲剧后果。

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出现各种社会团体和阶层，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政权的关系十分复杂，认为在产生新社会的框架下应该出现新型人民自发组织、新公民社会制度、新型民主。它们被认为是不属于旧的新经济政策的社会，而属于新社会和新人的现象。用各种方式包括残酷行为在内改造人们，严格监督国家居民的行为和意识并不是斯大林的独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甚至比斯大林更早地建立类似特工机构[②]，虽然发现较晚，但是在苏联斯大林时代它们的活动范围远超出理智框架。

斯大林作为理论家和苏联社会主义创造者，于1936年通过了新宪法，宪法第一章写道，苏联是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里斯大林说，新宪法草案来自于资产阶级制度被消灭的事实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取得胜利的事实，他列举了如下内容："苏联新宪法草案的主要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已经争取到和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现象的消灭；失业的消灭；劳动是每个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③] 为了从理论角度来说明到1936年社会主义是否已经建成，我们从开始便阐述了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特点和理论观点。

---

① ［俄］E. A. 奥索金娜：《工业化中的黄金：国有对外进出口集团》，政治学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页。

② П. 赫尔科维斯特：《通知——我们工作的起始与收尾》，布尔什维克时代民众倾向监督及其整个欧洲背景//美国的俄罗斯学：当前历史学研究标杆．苏维埃时代，文选/编者：莫斯科，代维德－福克斯，萨马拉：萨马拉大学，2001年，第68—73页。

③ 斯大林：《斯大林：列宁主义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8页。

在 1923 年开始的关于在一国——苏联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辩论中，斯大林是党的政治领导中最不妥协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当时作为社会主要发展模式的西方社会的人。一些作者确信，不妥协的原因来自于他童年和青年的生活环境。确实，斯大林是党的主要领导中唯一出身于非常贫穷家庭的人。

他自学了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一部早期著作《无政府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中，斯大林认为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被严格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一小撮资本家阵营和多数无产者阵营。从他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必然被摧毁。斯大林写道：不言而喻，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正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①] 1917 年 8 月，在俄罗斯共产党（布）六大上斯大林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②] 斯大林理解俄罗斯的作用类似救世主，俄罗斯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20 年代国内战争结束后这个想法逐渐在斯大林的工作和讲话中越来越重要和具体，30 年代斯大林开始谈苏联是强国，而且是伟大的强国。

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那么他在自己的整个一生中都相信，他信仰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然而批评斯大林的人，在后斯大林时代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一致同意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简单化，比如在著作《辩证和历史马克思主义》（1938 年）中。斯大林遭到强烈批评的原因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严重倒退。

在批判地研究斯大林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Г. 卢卡奇对斯大林方法论的论断引起我的注意，他指责斯大林建立了唯一事实和最普遍理论观点之间的直接联系不是把理论具体地说明适用于实践，而是正相反，按照通常只是可能出现的实际需要，把原则简化、庸俗化。毫无疑问，卢卡奇发现斯大林思想观点的独特之处是他倾向于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斯大林重要的是，给予每个积极向社会主义前进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310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74 页。

的现实国家一个通用的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新词汇。但是卢卡奇不认为那个历史环境产生的东西有任何积极之处，当时经典马克思主义不能回答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前景的问题。

Б. Н. 别索诺夫在1990年年末发表的自己的总结性文章《斯大林思想和行为的方法论》中写道，斯大林的思想过程简单而片面，他使历史规律过于接近自然规律，他在新经验基础上制定的新说法丰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根据不足等等。[①] 还有一个例子。三名乌拉尔学者即А. В. 盖达、К. Н. 柳布京、С. В. 莫什金，在自己的著作里写道："我们认为斯大林创造了一个俄罗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和庸俗化。"[②] 这种例子可以举很多，但毫无疑问，可以理解的是，所有这种对斯大林的批评都来自哲学家和学者，虽然斯大林自己对某些批评意见做出了回答，尤其在20年代。比如，他在1923年写了文章《对于俄罗斯共产党员提出的战略和策略的问题》，文章简略地但总体上文理通顺地叙述理论、战略和策略的关系。工作的重要部分是审查战略计划的问题，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认真地进行了研究："战略计划是组织能够最迅速地获得最大效果的决定性打击的计划。"[③] 但是与哲学家和学者不同，斯大林首先是政治国务活动家，因此对斯大林教条化和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抱怨并没有揭示出主要的东西，即在一个被孤立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动员方案是怎样成为现实的。

斯大林多次显示他对马克思著作、欧洲革命思想的深刻了解，他确信，他遵循马克思和整个革命欧洲的遗训。因此，在回答我们是否有过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有足够的理由回答：是的，有过。他列举在工业发达的欧洲以马克思的名义但并不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建设，在那里产生和发展了作为马克思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他的部分思想能帮助解释国内形成于20年代的情况。在这里也出现一个问题：是否有其他处于国家和政治政权机关高层的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正面、正确地运用哲学家和学者们认为无可辩驳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原则的例子？实际上这种例子不存在，并且按照我的深刻见解也不可能存在。斯大林作为马克

① ［匈］Г. 卢卡奇：《阿尔伯特·加罗奇的信》，《哲学科学》1989年第6期，第104页。

② ［俄］А. В. 盖达、К. Н. 柳布京、С. В. 莫什金：《约瑟夫·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探讨》，叶卡捷琳堡，2001年，第4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

思主义者和国家领袖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他提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显示了被称作理性思维的东西，斯大林的工作正是从这个方面出发引起特殊兴趣。他的思维观念是全面改变社会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具有自身强大的潜在的宗教成分。因此可见，斯大林能在最大限度上加强转折时期革命的人的作用，为革命赋予了新意义，提供了基础目标。

表示理性思维的现代形式在讨论社会方案的过程中形成，现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中国、伊朗、俄罗斯等的社会思想界都在积极讨论社会方案。这种方案的未来观点以非常多样的知识类型为依据，因此不论根据哪类科学也不能得出严格意义上的不是哲学或者科学的学说。因此，对斯大林理性思维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角度批评斯大林是完全过时的。因斯大林的理性思维偏离欧洲马克思主义而对其进行批评，并因这个原因拒绝承认苏联时期的建设，这使得苏联人民在苏联政权存在的 74 年间作出的所有贡献失去历史意义。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论述常常受到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最严厉的批评。据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与高度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而成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表面看起来相似，他的理论曾经指导苏联建立了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制度。应称它为军事的、国家的、行政的社会主义，但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斯大林谈到在国内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利用了社会主义的普遍准则。如果按照这个尺度判断，那么没有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而只是处于过渡状态，过渡阶段可能长达几十年，甚至更长。因此按照许多作者的观点，斯大林的观念超越了时代，他太急迫了。

但是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关于苏联、俄罗斯社会主义问题的观点。如果实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使它变成多方面监督的手段，成为今天的现实，会使所有非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迷失方向吗？如果在具有各类文明特征的不同社会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人道主义、新社会和新人等思想，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展途径吗？完全可能，没有唯一途径也没有唯一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准则，实际上斯大林在新历史条件下寻找与西方不同但并不对立的国家发展特殊道路，在解决社会问题方式上补充、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它，甚至超越西方道路。同样可能的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和俄罗斯（苏联的早期说法）的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是一枚奖牌的两面，从物质

与精神相互关系角度是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两种不同模式，同时会产生各种未来社会主义的观点。

继续解决斯大林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中问题的责任，落到了国家其他领导人肩上，他们不能或者不想利用群众活跃的创造性，以及“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形式，来补足斯大林管理时期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在斯大林死后，官僚体系成为苏联社会真正的统治阶级，它推翻了赫鲁晓夫，迫使勃列日涅夫接受了它的政治游戏规则，它改变并获得了属于政府的国家财产，这些财产被官僚体系成功地瓜分了。官僚体系把消费者赶到街上，社会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很少的物品，而且物品质量很差，最终使广大消费者亲手结束了“现实的社会主义”。正如托洛茨基警告过的，官僚体系对苏联制度有致命的危险，一旦由它掌握国家的实际权力，它便会不可遏制地竭力攫取国家财产。

官僚体系赢了——国家输了，国家回到了从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围国家的状态，斯大林所想的和所实现的都被破坏和丢弃了。在我看来，斯大林的形象，在今天首先被当权的官僚体系有意诋毁。俄罗斯的官僚体系一直是面目狰狞的古怪东西，也是俄罗斯社会的日常生活基础，但官僚体系在斯大林时期悲剧镇压中的作用至今未被研究。历时 74 年的苏维埃试验包含了所有的悲剧因素，付出了那么多史无前例的牺牲，具有史无前例的历史意义。

在 1922 年出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文明开始形成，它的意义和许多特点与斯大林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因为在他统治的年代，形成了被称为苏维埃一致性、苏维埃人的现象。70 年代的苏维埃一致性在它过去严格的意识形态形式下不再完全适合世界和国家改变的生活环境。80 年代中期的危机现象导致试图实施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所有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按照它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应该完全结束斯大林遗产，“唤起”革命洪流和多年停滞不前的社会，但是这个尝试完全失败了。被唤起的社会力量都被官僚体系应用到摧毁社会制度上，1993 年苏维埃文明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俄罗斯社会上相当部分的人隐秘地希望新斯大林的降临，在国家目前状况暂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希望将一直存在。俄罗斯不能长时间地游离于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之外，做西方发达国家的原料附庸，要么因经受不住与其他快速发展的世界领先者的竞争而退出世界舞台，要么

它重新成为伟大的大国，不论在军事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问题在于，俄罗斯能否向全世界展示新的独具吸引力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俄罗斯将在该价值体系基础上建立并在该价值体系内满足物质需要服从于精神上改造人和人类的伟大目标。在国内实践这个社会进程发展方案，必定需要使它回到特殊的、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上。

在科学的社会主义出现前，社会主义思想就一直存在于俄罗斯社会中。首先是但又不仅仅是农民社会主义。俄罗斯人根深蒂固的现代社会主义见解——首先与社会公正有关，这是俄罗斯社会几百年来最明显的特点。社会公正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今天我们正在走向 21 世纪的新社会主义，并且我们重温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因为它是某个人的思想，而是因为它能够对社会的迫切需要给予回答。但是这个需要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被满足，或者它将永远被忽视。现在又到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斯大林是不是暗探局间谍？

武卉昕编译

清楚的是，大家都确信，谎言越惊人，机会就越多。由于对斯大林的诬蔑变得更严重，以至于现在的揭发者坚信，斯大林就是沙皇暗探局的间谍。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类似的谣传就在流亡境外的俄罗斯侨民中传播，但谣传的内容十分荒诞，以至于连更乐于批判斯大林的传记作者都说："包括斯大林最凶恶的敌人列夫·托洛茨基在内，都反对这种骇人听闻又毫无根据的指责。"

确实如此，针对这些对斯大林的龌龊的责骂，托洛茨基不得不指出：

> 似乎是约瑟夫出卖了所有讨论会小组的参加者，这种言论毫无疑问是诬蔑。
>
> 英勇完全不是斯大林的风格。但面临危险时他确实具有大无畏精神。现实的苦难不会吓倒他。在这方面他不仅是真正职业革命家的代表，而且要大大超越其他职业革命家。

赫鲁晓夫发起的被称为"邪教的贪婪"的揭发性政治运动，促使国外的历史伪造者不遗余力地造谣。1956年4月23日，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伊萨克·列文在《生活》杂志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资料"——宪兵团长A. M. 叶廖民给骑兵大尉A. Ф. 热列兹尼亚科夫的一封信，按他的话说，该资料"来自于三个非常有声望的俄罗斯侨民"。信的内容如下：

内务部

警察局特别处处长

1913年7月12日

No. 2898

绝密

亲启

给叶尼塞警卫局局长 A. Ф. 热列兹尼亚科夫

[叶尼塞警卫局公章]

[前往叶尼塞警卫局所在单位公章]

收件编号 No. 152

1913 年 7 月 23 日

慈祥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

被行政机关流放到图鲁汉斯基边疆区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斯大林，于 1906 年被逮捕，给基弗里斯基省宪兵处提供了很珍贵的间谍情报。1908 年巴京斯基警卫局局长得到了来自斯大林的一些消息，随后，由于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他便成了彼得堡警卫局的代理人。

斯大林的工作以精准著称，但不连贯。

在斯大林被选举入布拉格的党中央委员会后，斯大林由于回到了彼得格勒，因而开始公开反对政府并完全中断了与警卫队的关系。

阁下，我告诉您，您寻找的工作是个人想象出来的。

请相信我对您的尊敬。

[签名：] 叶廖民

但是甚至是在支持反苏运动的侨民当中，这种文件也引起了怀疑：

> 最终，不能用沉默绕过在纽约《生活》杂志 4 月 23 日刊登的引起舆论哗然的试图证明拥护君主专制的斯大林是暗探局代理人的虚假的文件。这些假文件是 4 年前提交给 Б. 苏瓦林的，苏瓦林当时也是明确公布了伪造文件。

如果像苏瓦林这样激进的反共分子都承认文件是伪造的，那么应该认为，在他那儿对于这个来说是有力的理由。

它们究竟是什么样呢？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主要学术工作者，现代研究者季娜伊达·伊万诺夫娜·别列古多娃关于《叶廖民的信》的真实性写道：

·信的标注日期是1913年7月12日，但是上校叶廖民这时已经不是警察局特别处处长，他于1913年6月11日被任命为芬兰宪兵管理处处长。因此，他不能作为特别处处长给这封信签字。

左面：伪造的文件下面是“叶廖民的签名”。中间是伊萨克·列文为了证明该信件的真实性而假冒叶廖民的签名。右面是保存在档案馆的叶廖民关于休假的签名。

叶廖民在芬兰档案馆文件上的签名。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拥有许多叶廖民签名的文件，他的签名很有特点。笔迹鉴定同样确定：叶廖民信件下的签名不属于叶廖民本人。

·1913年7月叶尼塞警卫局根本就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是叶尼塞警察哨。

· 叶尼塞寻找点的领导确实是骑兵大尉热列兹尼亚科夫，但不是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而是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

·1910年下半年开始，特别处更换了新的公文用纸，在公文用纸的公章里“заведывающий”（负责人）被换为“заведующий”（负责人）。（注：前者是旧词）

·信角上的公章与印刷完成的公章是有区别的。

·信上注明输出的号码是2898。但带有这种号码的文件不能从特别处发出去，因为警察局所属分支机构带有类似号码的领域都是已被撤销的。因此，特别处是有号码的，从93001号开始，而2898属于第一事务工作处。

而现在掌握的文件是1913年3月16日从局里发送到2898之内的。它的简要内容如下：

> 叶卡捷琳娜二世古巴哈管理局给H. A. 塔季谢夫的信，三个不知名恶徒对坚守在城市供水管附近的岗哨采取了冒失的狂妄的行为，据此发出的通知是针对城市的。

·在“进”“出”公章上写入注明日期的字迹属于同一个人。

上述各点当中的每一个点都足以认定“文件”是伪造的。除此之外，信件的制造者还出现了一些“小”漏洞（是与上述失误相比而言的）。朱加什维利是被斯大林承认的，虽然这种署名刚刚出现，而且与他在党内的其他称呼相比是鲜为人知的，他的名字和父称被称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虽然根据俄罗斯当时的标准写法原则上应该写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夫”等等。

留下的只有赞同苏瓦林出版的杂志：“很少出现比这种文件还虚假的假文件。”

可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文件”首先“出现”在 1956 年，而不是更早，因为这种愚蠢的伪造物只有在由被赫鲁晓夫发起的“自我污蔑”政治运动背景下才可能被相信。

但是，就像是经常发生的与其他被揭穿的伪造文件有关的事情一样，“叶廖民的信”没有被遗忘，而是只要一经符合社会要求，就再次浮现出来。人们在下一次戈尔巴乔夫歇斯底里地反对斯大林的紧张时刻就会想起它。1989 年 3 月 30 日两名历史学博士即 Г. А. 阿鲁久诺夫和 Ф. Д. 沃尔科夫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文章，该文章引用“信件”内容，并作如下评论：

> 1961 年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当时在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国家档案馆工作的 Г. А. 阿鲁久诺夫找到了证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间谍的文件。
>
> 文件的原本保存在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莫斯科，大皮罗哥夫卡大街，17 号）叶尼塞省宪兵管理处警察局文献库，政府文献库共有约 90 万份收藏。我们得到的是完整的文件。

除“叶廖民的信”外，文章中还引用了一个看似是保存在档案馆中的“文件”：

> 给巴库警卫处：昨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央的朱加什维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库兹马”委员会成员及其他人。参会人员指责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是内奸、暗探局间谍，指责他窃取了党的钱。朱加什维利－斯大

林对他们以同样的指控给予回答。

最后，为强调指责的说服力采用了老党员 О. Г. 沙督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 1962 年，将成为共产党委员会和个人崇拜受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成员的奥利佳·格里高利耶夫娜·沙督诺夫斯卡娅，对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公布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间谍相关材料的请求，赫鲁晓夫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根据她的回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话是这样的："结论是，虽然国外也公布过相关资料，但沙皇暗探局领导了国家 30 多年。"

但 3 个月后《莫斯科真理报》不得不辟谣：

官方证明

《莫斯科真理报》刊登的 Г. А. 阿鲁久诺夫和 Ф. Д. 沃尔科夫所写的文章《历史的裁判前》，文章中涉及关于十月革命、国家政权最高机关以及来自苏联国家管理机关中央国家档案馆中的信息。

苏共莫斯科国家委员会和《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委员会机关于 1989 年 3 月 30 日（第 76 期）刊登了文章《历史的裁判前》，文章中证实，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间谍。

文章作者是历史学博士 Г. А. 阿鲁久诺夫和 Ф. Д. 沃尔科夫。

文章指出："1961 年该文章的作者之一 Г. А. 阿鲁久诺夫教授在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国家档案馆工作时得到了证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间谍的文件。这份文件的原本保存在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莫斯科，大皮罗哥夫卡大街，17 号）叶尼塞省宪兵管理处警察局文献库。"

后来发现了可能是被 Г. А. 阿鲁久诺夫在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找到的特别警察局局长上校叶廖民的证明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间谍的消息的信件（文章《历史的裁判前》）。

根据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和文章作者的证明，经

过对现存档案文献的认真全面检查，认为必须做出如下声明：

（1）文章指出，Г. А. 阿鲁久诺夫在“叶尼塞省宪兵管理处警察局文献库”找到了上校叶廖民的信。这个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库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此，上校叶廖民根本不可能在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的档案馆中找到上述证明信件。

（2）对上校叶廖民领导进行审查和研究的内务部警察局，包括警察局特别处文献库的档案馆业务证明在文章中出现他的信件是不可能的。不会在业务中发现任何例外的纸张。

（3）有警察局特别处发出的文件清单，包括 1913 年的文件。在 1913 年 7 月 12 日的清单中不存在叶尼塞省警卫局上校叶廖民发出的信的记录，因此应该可以明确：1913 年 7 月叶尼塞省警卫局已不存在，因为在 6 月份政治侦查审判制系统还进行了改组，改组后叶尼塞省寻找点代替警察局开始工作。叶尼塞寻找点领导是热列兹尼亚科夫·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而不是在所谓的上校叶廖民的信中指出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在相关档案馆文献库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的文献库中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该文件。

（4）文章中所说的上校叶廖民的信的日期是 1913 年 7 月 12 日。研究内务部警察局档案确定，上校叶廖民在此期间已经不是警察局特别处处长了，因为他在 1913 年 6 月 11 日已经被任命为芬兰宪兵队队长了。

最后由上校叶廖民签字的文件日期是 1913 年 6 月 19 日。当天印发的通知指示以后信件地址的署名更名为警察局特别处新领导的名字 М. Е. 博拉叶茨基。

因此，1913 年 7 月身在另一个工作岗位和另一个地点的上校叶廖民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机会签订 1913 年 7 月 12 日的带有警察局特别处印章的工作信件，因为这种工作是应由新领导完成承担职责的。

（5）通信部门的所有文件包括 1913 年 6 月 19 日的文件都有上校叶廖民和他的继任者博拉叶茨基在 1913 年下旬的签名，这些文件有“警察局特别处领导”的印章，左上角有警察局特别处领导的印刷体印章，而在上校叶廖民公布的文章中这个印章有“М. В. Д. 警察局特别处领导”的字样，与保存的其他文件区别开来。在已有的这些带公章文件中没有“М. В. Д.”的字样，“领导”这个单词一向应该使用“заведующий”，而不是“заведывающий”。（都是指“领导、负责人”的意思，但“заведывающий”是旧词）

（6）根据当时进行事务工作的实际规定，警察局的每一个组织部门发出的文件都拥有严格的编号。根据规定警察局特别处文件的编号是从93001开始的，上校叶廖民1913年7月12日的信编号是2898，完全属于另外一个体系，不符合为该部门确定的编号。

（7）作者确定，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巴京斯基警卫处文献库有奇怪的文件：非古斯警卫局间谍的情报。后来文章中公布的就是这个间谍的情报。

第一，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巴京斯基警卫处文献库。因此，一直没有文章中出现的文件，即非古斯警卫局间谍的情报。

第二，警察局特别处 M. B. Д. 巴京斯基警卫局的往来信件中有党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者”间谍消息的综合报告，报告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者由警卫局高加索区官方人员构成，其中被作者指出的关于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信息不存在。

第三，众所周知，警卫局间谍的情报是以口头形式传递的，发往中央的关于间谍消息的报告是根据该情报完成的。因此，文章的作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如他所写的那样在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发现令人存疑的文件：非古斯警卫局间谍情报。

（8）引用非古斯间谍的关于巴京斯基委员会活动的几个情报时，文章作者写道：“巴京斯基委员会的每一步工作警卫局都是知道的。他的情报员，即非古斯信息的提供者，是权威且忠诚地为秘密警察局服务的，我们可以推测他就是斯大林。”

作者的假设没有任何根据，像文中指出的，如果他们能辨认出非古斯间谍的名字（虽然信息在很长时间内送达他们手里），就有可能在档案馆中查询到关于“非古斯间谍”具体任务的特别精确的信息。非古斯即 H. C. 叶里科夫，第比利斯省农民，一个以不合法的名字 Д. B. 巴克拉德杰生活的工人。这个人在1897—1906年间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是高加索一个城市组织委员会的成员，1908年在巴库，1909年成为巴拉汉斯基委员会成员，是与社会民主组织领导联系得最近的联络员。

从1909年4月到1917年，叶里科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京斯基警卫局秘密成员。因此，非古斯间谍本人也有很好的机会得到这个区社会民主组织活动必要的信息，而不需要专门给他提供情报的间谍。而且如果没

有特别批准，他无权与其他人联络。

（9）在警察局文献库中有关于秘密沙皇警察局间谍个人信息的文件。这些名单中有提供消息的人的姓、名字、父称和他们的间谍名字。这些姓的名单中没有朱加什维利－斯大林。

（10）1917 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在革命民众中建立了一系列专门揭发秘密警察局内奸和间谍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对警察局的文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后苏联机关的工作很快就开始有特点地展开了，在揭发的内奸和间谍中没有朱加什维利－斯大林。

这样，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国家政权最高机关中央国家档案馆和苏联国家管理机关档案文件中央国家档案馆中，包括上校叶廖民 1913 年 7 月 12 日的信、间谍非古斯证明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间谍的情报根本不存在。

因此，无论是 Г. А. 阿鲁久诺夫，还是 Ф. Д. 沃尔科夫都不能在 1961 年前后的时间里在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找到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上校叶廖民的信和间谍非古斯的情报。

《历史的裁判前》这篇文章的作者把美国苏联问题专家伊萨克·列文 1956 年 5 月 14 日在美国《生活》杂志第 10 期上刊登的所谓上校叶廖民的信这种假文件说成是自己找到的重要的东西。

在被允许从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带出来的两个文件的复本中：左上角带有 А. 叶廖民的签名，该文件被档案馆工作人员认为是伪造文件的出版物《生活》杂志恢复的他的印章。

这份假文件散布出去得更早，现在仍在苏联传播。

不得不遗憾的是，《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委员会与其负责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在准备刊登 Г. А. 阿鲁久诺夫和 Ф. Д. 沃尔科夫的《历史的裁判前》这篇文章时，没有像平时一样采取标准流程，没有去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证实档案馆文献库是否有被这些作者刊登的所谓上校叶廖民和间谍非古斯的情报。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行政领导机构《莫斯科真理报》同一期也刊登了 О. Г. 沙督诺夫斯卡娅和 С. Б. 舍伯尔达耶夫合写的信：

> 我们不得不对今年 3 月 30 日《莫斯科真理报》刊登的 Г. А. 阿鲁久诺夫和 Ф. Д. 沃尔科夫的《历史的裁判前》这篇文章表达自己

的看法，令人遗憾的是文章在很多方面都失实。Г. А. 阿鲁久诺夫声称他在“六十年代曾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研究过与斯大林的活动有关的档案馆的文件”，但根据我们的资料，Г. А. 阿鲁久诺夫的声明并不能得到证明。文章作者没有为帮助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用“判断与斯大林本人有关的新文件”是否真实的方法，来认清历史真实及全面揭示其真实程度而做出应有的努力。这就是原因所在。

被 Г. А. 阿鲁久诺夫和 Ф. Д. 沃尔科夫利用作为证明斯大林与暗探局有关的主要文件，包括费舍尔《斯大林的生与死》的专题文章和叶廖民在国外不止一次被刊登的信。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爱都阿尔德·斯密特认为，所谓“叶廖民的信”是在当时被俄罗斯移民凭借对遗失原本的记忆转载的。根据他的观点，这使文件中出现误差，使得人们无法相信它的真实性。

根据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Ф. Д 沃尔科夫和 Г. А. 阿鲁久诺夫没有举出文献库和被他们刊登的几个收藏作为例子。这种文献库，不客气地说，是没有的。

……

证明是被作者杜撰出来的，“1962 年沙督诺夫斯卡娅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间谍的资料”，实际上赫鲁晓夫只了解国外这方面的资料，并在文章中给予了回答。

Г. А. 阿鲁久诺夫在 1987 年对自己“发现的东西”给予了解释。我们那时候相信了他，认为他是认真研究了问题。倒是因赫鲁晓夫的参与开始增加了材料的轰动效应。

有趣的是，如果像当时的克格勃间谍“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爱都阿尔德·斯密特”一样伪造“证明”信件，而当时欺骗是被隐瞒的，声明信件“是凭记忆参照原件恢复的”，解释为“偏离文件的真实性”，那美国法庭怎么看待类似的“理由”呢？

但回到刚才的话题，一点也不会因被披露的事情而感到难堪和丢脸的历史学博士，根据“厚颜无耻是第二幸福”这一原则做事。Ф. Д. 沃尔科夫在 3 年前出版的书中写道：

Б. И. 卡普杰洛夫和 З. И. 别列古多夫试图证明文件不正确，认为“第一，主管部门的同志应该知道，根据现有的文件来看叶尼塞省警卫局是存在的，但在 1913 年叶尼塞省警卫局根本不存在”。

在沙皇暗探局被流放移民叶丽扎维塔·卢姆巴泄露的 1911 年 12 月 19 日编号为 2804 的目录中说：“让叶尼塞省第三县警察所长知道，通知给叶尼塞省监狱，叶尼塞省监狱领导和宪兵队骑兵大尉热列兹尼亚科夫。”（我的分析——Ф. В.）

用著名的讽刺作家阿尔卡基·拉伊京的话说，我们“忽略了蠢货”。卡普杰洛夫和别列古多夫写道，1913 年不存在叶尼塞省警卫局，而 Ф. Д. 沃尔科夫“推翻了”他们用以证明 1911 年存在的叶尼塞省警卫局宪兵队与叶尼塞省警卫局是完全不同的机构。

沃尔科夫可贵的观点如下：

Б. И. 卡普杰洛夫和 З. И. 别列古多夫没怀疑文件的真实性，但声明，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没有该文件；说到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京斯基委员会会议文件。

合理的问题是：如果文件本身不存在，怎样“推翻文件的真实性”？

但这其中伪造文件的历史并没有结束。卡尔巴切夫斯基－雅科夫列夫斯基对揭发的狂热并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减少，人民开始反复评价斯大林在我们国家历史中的作用。为了让该过程不至于偏离太远，应该尽快持续地在报纸上和电视上进行“揭发”，不认真的历史学家从这样的工作中获取了非常多的利益。

于是，1997 年 9 月 19 日的《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间谍》，署名是某个亚历山大·涅恰耶夫，俄通社－塔斯社评论员。作者这样写道：

“整个时代人民的领袖”约瑟夫·斯大林几乎领导了苏联 30 年，从 1906 年被招募到沙皇暗探局，到 1910 年被选入党中央前，一直为宪兵队搜集“有价值的特务情报”，该文件的照相复印本证明最早出现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建筑大学教授、评论员、研究者尤里·赫奇

诺夫，不久以前在研究列·尼·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大·列沃夫娜·托尔斯泰的档案时偶然发现了这些照相复印本。

自然，会说到那封“叶廖民的信”。

赫奇诺夫毫不怀疑被他找到的带有签名的伪造文件的复本，原因是：第一，以前的暗探局将军亚历山大·斯皮里多维奇证明叶廖民的签名是没错的；第二，其原件被文献库存放到一个美国银行，直到被发现的那一天。

另一个对信的真实性的“证明”不在简讯中。我们回到斯皮里多维奇将军的证明上，关于第二个证据，信件不真实是因为“文件”没被放到美国银行，而是被转移到那里保存。

赫奇诺夫教授给“叶廖民的信”做出如下解释时，顺便清楚地证明了自己在该问题上的失礼：

在斯大林被选入布拉格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后（1910 年——作者查实的），斯大林就返回到彼得堡……

众所周知，斯大林是被选举出来的，确切地说，被增补进党中央不是在 1910 年，而是 1912 年。

当然，研究斯大林的“历史学家”也会出现这样的失误，但这里赫奇诺夫是冒进的，做得过头了，他企图将“文件”第一发现者的荣誉据为己有，也因此在两周之后得到机会在《真理报》上反驳在波士顿生活的历史博士 Ю. Г. 费里什金斯基。

在简讯《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间谍》（1997 年 9 月 19 日）中，尤里·赫奇诺夫教授公布了他在纽约托尔斯泰文献库中找到的警察局特别处领导叶廖民证明斯大林是间谍的信。但这个文件在国外和俄罗斯大家早就知道了！它最早于 1956 年 4 月被刊登在《生活》杂志上，随后的几周内被广泛地发布在移民刊物上并引起了争论。

1989 年 3 月，信件被刊登在《莫斯科真理报》上，从这时起开

> 启了对题为“叶廖民文件”的史料研究，它不止一次被刊登在俄罗斯报纸和杂志上……
>
> 《俄罗斯新词》详细地讲述了文件的历史。Ю. 赫奇诺夫在他不久以前的电视采访中评论了他所了解的关于文件的信息，他知道信件是从中国弄到并被转给 М. П. 卡拉瓦切夫教授的，1947 年转给移民政治活动家马卡洛夫、巴赫梅奇耶夫和谢尔盖耶夫斯基，他知道信件是在法国和美国被检验的，这些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想以第一个文件发现人的身份出现，但该文件已经被发表在国外 40 多个国家，而在俄罗斯的第一次发表也是在 7 年前。

赫奇诺夫在破坏费里什金斯基的优先资格时揭发他不止一次地提及这个“细节”：“叶廖民的文件”早就被承认是伪造的文件。这毫不奇怪，因为尤里·格奥尔吉耶维奇积极地传播着关于斯大林是“奸细”的文本。因此，在责备赫奇诺夫试图获取他人“荣誉”后，他在自己的刊物中说：“确实与‘斯大林是奸细’有关的新文件，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发表得更早。”那封斯皮里多维奇将军的最臭名昭著的信，最后证明了叶廖民签名的真实性。

这种证明的权威性有多少呢？请亲自判断一下：那封信是斯皮里多维奇将军在 80 岁写的，即在该事件发生的 40 年后对其进行讨论的时候。对于比较叶廖民签名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参照银罐子上刻的签名，而且与“文件”上的签名相比特点非常明显（看看上述照片复本就够了）。

是的，还有一种老军人的直觉。

> 但叶廖民的信是不是伪造的呢？它被写出来，既不是自己的契约，也不是自己的“秘密”，只是那种专门寻找其中的情绪并使人们相信他。这是很难解释的，但我感觉到了这个，我相信他。

很容易就能猜到，在这个历史当中画上句号还早。最近自由的大众传媒根据“斯大林回归”的理由开始了例行的激烈评论。意思是，应该等待新的“轰动一时的发现”，等待新的有关“叶廖民的信”的刊物。

这样关于斯大林与暗探局合作的整个历史是以粗制滥造的伪造文件为根据的。因此，在假文件的辩护者当中我们看到了至少 4 个历史学博士，他们抛弃的不仅仅是科学良知，而且还有作为人的基本原则。可惜，对待

斯大林的类似行为对许多科研和创作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典型的。

民主：

同西方的民主比较起来，十月革命所创造出的民主制度是不同的，这对苏联人乃至当今的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它区别于当今的政治侏儒们的做法，斯大林不需要那些看起来耀眼迷人的政治标榜，而需要的是事实上能真正给人民带来益处的东西。

那么，如何能从道德立场上去理解斯大林的行为和做法？要知道那些创造型知识分子喜欢夸夸其谈地表达自己的“民族良心”，只是他们的善恶观有些奇怪，一切对俄罗斯有益的，不管是对俄罗斯内部还是外部有益的，都一定要找出它不符合人意的地方。持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任何举动都看似符合西方人喜好，实则对自己国家吹毛求疵。

作为一种准确的科学界定，在概念领域，应尽量避免严重的价值倾向判断，当然被世界伦理所公认的排除在外，比如法西斯的侵略性质。而对于类似于“斯大林模式”这样的概念界定，“高度集权的”“至今仍未改变的”“僵化的”“残暴的”等一系列带有特殊语境意义的词汇，应该在学理层面上避免。

把“斯大林模式”作为“斯大林当政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运行机制和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及其对后来社会发展的影响”来理解，似乎更合乎客观科学的概念界定标准。我们的例证，是目前俄罗斯学者们对这一意义下斯大林模式的具体内容的探讨，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支撑其运行的内部机制。

对斯大林最无耻的诽谤*

伊戈尔·佩哈洛夫著　郑蓓蓓译**

郑蓓蓓（1982—　），女，河南郑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木犁到原子弹

斯大林毋庸置疑的功绩奠定了人们对他异常崇拜的基础。他是计划经济的开创人；他接手时的俄罗斯，还是使用木犁进行耕种，但他留下的俄罗斯，已装备有核反应堆；他是“胜利之父”。

《大英百科全书》第21卷
1964年版第303页

用什么样的标准评价斯大林的功绩？用强加于我们的，最近20年西方民主的标准，这是不合适的。被普遍的公正的秘密投票选举出来的今天的政治家们，呼唤出人民最卑劣自私的本性。对于他们来说，人民只是愚钝的牲畜，“全体选民”。

正如19世纪末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曾公正指出的：

---

* ［俄］伊戈尔·佩哈洛夫：《对斯大林最无耻的诽谤》，亚乌扎出版社2012年版，第7—34页。

** 本文的编译得到了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卉昕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民主制度并没有带给被他们管理的人们任何优越性。当选者们在同群众的直接交往中，为了获取他们的好感，应该奉承他们，满足他们哪怕最低程度的崇高要求，并给予他们最大的承诺。由于领导们为自己找寻同类的自然天性，群众受到虚幻的平庸的头脑吸引，使他们大批地加入了民主政府。①

幸运的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十月革命所确立的苏维埃制度，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有别于今天的政客们，斯大林不需要显得令人倾倒又很上相，发表空洞的言论，自吹自擂，就像当今的总统们这样。反而是，为了迎合选民们当下的意愿，他能够在人民真正的利益中发挥作用，为了未来的幸福，通过并不受欢迎的严格的决议。

那么，能否从道德的层面来看待斯大林的行为和举动呢？要知道，对此最爱高谈阔论的，是那些自称“民族良知”的创作界知识分子。只是他们对善恶的理解都是很奇怪的。一切，对俄罗斯有利的，无论是建立国家内部秩序还是在国际场合坚持我们的国家利益，作为不符合某种虚构理想的一切，都一定要被谈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阶层自由构建他们喜爱的事业，贪婪地寻找自己国家眼中最微小的尘屑。

在此响应他们的是某些爱国主义者，他们往往是很想给俄罗斯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因此，已故的瓦季姆·克日诺夫公正地指出，如果不是伊凡雷帝的统治，那么“那个时期西欧死刑的数量就会超过俄罗斯，是我们的一百倍”②。

针对伊凡雷帝的激烈的咒诅在他生前就已经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停止，否则我们就不是俄罗斯人。③

我们应该到最后都不会因为我们有伊凡雷帝而羞愧（因为他在传播邪恶方面远远地“落后”于同时代的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并且我们完全可以骄傲的是：我们，俄罗斯人，四百多年来，

---

① Прокопович С. Н. ,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ариж, 1956, с. 37.

② Кожинов В. В. , История Руси и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 Опыт 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 2001, с. 28 – 29.

③ Тамже. , с. 33.

是怎么都不可能和自己的沙皇的邪恶和解的。[①]

实际上，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只有对俄罗斯有利的才被认为是道德的和公正的。在这方面，斯大林以具有最高道德的人出现。统治者的职责是领导交付给他的国家。要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应该比较他接手时的国家是什么样子，还有他留下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此时，应该记住，奇迹是不存在的。国家元首的行动自由，被现实中非此即彼的选择所限制。常常这种选择来自于邪恶。

对于斯大林来讲，是否有可以接受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让我们看一看 20 世纪俄罗斯发展可能的方案有哪些。

我们失去了什么样的俄罗斯？

按照今天的布尔什维克的揭发者们的观点，1913 年的俄罗斯帝国是一个繁荣的国家，这可以用伊·卢·萨拉涅维奇的话来说明："香槟成河流向满是黑色鱼子的岸边。"[②]

这幅民间木板画上的具体细节在各个作者那里有些许区别。经常说到的俄罗斯农业的成就就是，农业增长"高于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之和"并且仿佛用它养活了"半个地球"，或者至少是"半个欧洲"。接着，通常该讨论关于"工业的空前增长"、铁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财政的卓越状况"。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是一方面，由于罗曼诺夫王朝保留下来的人口，今天的俄罗斯人口会有 5 亿—6 亿。

唉，这一切不过是美丽的童话，将瞬间消失在与现实的对比中。

确实，俄罗斯帝国曾经历过伟大和荣耀的时期。它的鼎盛时代是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1812 年消灭了当时攻入我国的"欧洲联军"，俄国军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 1814—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俄国被正式承认为同英国、法国、普鲁士和奥匈帝国并列的五大国之一。[③] 武装力量增强并发展壮大，按照当时的工业标准，俄国的生铁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这些光辉的岁月都已经时隔久远。20 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已经

---

① Кожинов В. В. , История Руси и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 Опыт 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 2001, с. 33.

② Солоневич И. Л. , Народная монархия, М. , 2003, с. 78.

③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 трёх томах, Т. Ⅰ, М. , 1984, с. 178.

深陷全面危机之中。

与斯托雷平的崇拜者的夸夸其谈相反，俄国的农业甚至不能够养活自己的国家。粮食的收成勉强能够跟得上人口增长。饥荒成了俄国农村的常态。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的粮食还输出国外。

那个时期，西方国家都在增强自己的工业实力，俄国本国的重工业在20世纪上半叶呈现全面萧条的态势。

表1　　1820—1860年的生铁产量　　单位：千普特①

年份 / 国家	1820	1830	1840	1850	1860
英国	25211	42230	86925	140056	237168
法国	7422*	13725	24538	24766	54778
美国	1240	10187	17690	34099	50094
俄罗斯	9333*	11169	11331	13892	20467

注：*为1822年统计数据。

如果考虑到1800年俄国生铁产量为1030百万普特②，那么可以认为，在1800—1850年，生铁产量实际上没有增加。

表2　　1860—1910年的生铁产量　　单位：千普特③

年份 / 国家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英国	237168	369595	480196	490016	549630	633318
德国	31177	84858	166471	284165	460910	867847
法国	54778	71858	105225	119682	165710	244061
美国	50094	101576	233946	561365	855310	1691835
比利时	19516	34479	37093	48058	70890	110044
奥匈帝国	19032	22790	28319	58888	80090	118860*
俄罗斯	20467	21946	27375	56560	176828	185587

① Гливиц И., Желез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Пб., 1911, с. 9－10 второй пагинации.

② Гливиц И., Желез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с. 15.

③ Так же, с. 10－11 второй пагинации.

注：＊为 1909 年数据。

1861 年改革导致乌拉尔的工厂急剧缩减生铁熔炼。结果在 1862 年生铁产量降至 15268 千普特[①]。到 1870 年才得以超过 1860 年的产量。这就已经丧失了 10 年。

随后的一些年俄罗斯的工业发展很快，尤其是在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但是它的增长速度还不足以赶上发达国家。这样，从 1870 年到 1910 年，俄罗斯帝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近 9 倍。同法国的 3.4 倍、英国的 1.7 倍相比，这样的增速是很体面的了。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德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 10.2 倍，而美国是 16.7 倍。如果再重新计算人口的话，那画面就太凄凉了：

> 这样的话，1912 年美国的人均生铁消费是我们——28 千克的整整 10 倍。消费不大，但是工业非常发达的比利时，在 1912 年，达到人均 190 千克，是我们的 7 倍，德国的消费是我们的 5.5 倍（在 1912 年为 156 千克），法国和英国是 4.2 倍，甚至最贫穷的、缺乏资源发展工业的奥匈帝国所显示的也是较高的数字。
>
> 在生铁消费方面，我们同贫穷的西班牙处于同一水平。不过，这只是在许多统计表和对比中的我们的邻居们。[②]

1913 年，俄罗斯炼铁 2.83 亿普特[③]或 4636 千吨。同年，美国炼铁 30970 千吨[④]，德国 16766 千吨[⑤]，英国 10479 千吨[⑥]，法国 3.24 亿普特[⑦]或 5307 千吨。

---

① Гливиц И. , Желез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 с. 10 второй пагинации.

② Гливиц И. ,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железа в России, СПб. , 1913, с. 9 – 10.

③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1913 году, Годовые обзоры важнейших отраслей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год шестой), Пг. , 1914, с. 372.

④ Тамже. , с. 3.

⑤ Выплавка чугуна в Германии вместе с Люксембургом составила в 1913 году 19310 тыс. тонн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1913 году, с. 3) . Выплавка чугуна в Люксембурге в том же году – 2544 тыс. тонн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1932, М. – Л. , 1932, с. 618) .

⑥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1913 году, с. 7.

⑦ Справочная книга металлиста, Л. , 1926, с. 41.

1913 年，俄罗斯炼钢 2.46551 亿普特[①]或 4039 千吨，美国 19.4 亿普特[②]或 31777 千吨，德国 10.46 亿普特[③]或 17133 千吨，英国 4.75 亿普特[④]或 7781 千吨，法国 2.86 亿普特[⑤]或 4685 千吨。

而在国内，工业的其他领域怎么样呢？

1913 年，俄罗斯的采煤量是 22.138 亿普特[⑥]或 36.3 百万吨。作为对比，美国同年采煤量是 629.5 百万吨[⑦]，德国为 278.6 百万吨[⑧]，英国为 292.0 百万吨[⑨]，法国为 40.8 百万吨[⑩]。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此时，俄罗斯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了。此外，更值得惊奇的是俄罗斯国民经济的贫弱，首先是黑色冶金工业，自己的煤不够，俄罗斯不得不逐年增加煤的进口。

表 3　　煤和焦炭的进口和出口　　单位：千普特[⑪]

年份	煤和焦炭的出口	进口	
		煤	焦炭
1902	3070	178780	26974
1903	4710	183214	30233
1904	5929	201564	35648
1905	3415	226128	26662
1906	6964	236991	30983
1907	13178	221171	28392
1908	4872	243871	25364
1909	5178	240963	24690

①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1913 году, с. 381.

② Справочная книга металлиста, Л., 1926, с. 41.

③ Тамже.

④ Тамже.

⑤ Тамже.

⑥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1913 году, с. 305.

⑦ В том числе 560 млн каменного угля и 69, 5 млн тонн антрацита, – Тамже, с. 19.

⑧ Тамже., с. 13.

⑨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1932, М. – Л., 1932, с. 610.

⑩ Миров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кризисы 1848 – 1935, Т. Ⅰ,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ризисов в важнейших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Под общ. ред, Е. Варга, М., 1937, с. 368.

⑪ Обзор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и по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 азиатской границам за 1913 год, Часть Ⅰ, СПб., 1914, с. 22, 42.

续表

年份	煤和焦炭的出口	进口	
		煤	焦炭
1910	6449	259348	27732
1911	5935	280580	42784
1912	12728	324246	46910
1913	5951	473612	59407

说到产油量，它的最大产量是在 1901 年，在那之后，国内石油工业陷入了长久和严重的危机期，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权都没能走出危机。

如果说 1901 年俄罗斯的产油量几乎占了世界一半以上，那么在随后的几年它的份额是在不断地减少。

表 4　　产油量　　单位：百万普特①

年份	产油量	年份	产油量	年份	产油量
1885	115.0	1895	377.0	1905	455.9
1886	123.0	1896	403.2	1906	491.3
1887	155.0	1897	449.8	1907	523.7
1888	182.0	1898	503.9	1908	528.6
1889	192.0	1899	550.4	1909	563.3
1890	226.0	1900	631.1	1910	588.4
1891	275.0	1901	706.3	1911	558.6
1892	286.0	1902	670.5	1912	569.3
1893	325.0	1903	630.2	1913	561.3
1894	297.0	1904	656.4		

表 5　　俄罗斯和美国占世界产油量的份额②　　单位：%

年份 / 国家	1901	1906	1910	1911	1912	1913
俄罗斯	50.60	28.73	21.87	19.74	19.67	18.20
美国	41.20	58.30	63.16	62.75	62.98	63.13

①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1913 году, с. 337 – 338.

② Тамже. , с. 359.

尽管俄罗斯的铁路绝对长度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①]，但是相对于俄罗斯辽阔的疆土而言这还是不够的。就像《俄罗斯年鉴》中指出的：

> 因此，尽管有相当大的自己的铁路交通网，但俄罗斯帝国在相对发展方面还远落后于其他的文明国家，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以幅员辽阔的疆土和人口不足为前提条件的，并且也是由国内便利的天然运输通道的存在决定的，这些通道以广泛分布在俄国领土上的内部水系的形式存在。[②]

此外，俄罗斯的铁路网发展速度在减缓。在1896—1900年间，俄国建成14887俄里铁路；在1901—1905年间，则仅建成7215俄里；而1906—1910年间，总共只有6000俄里左右[③]。“就像1913年例行召开的七大会议上，贸易和工业代表们在报告里指出的，最近几年铁路网的增长速度比最近四十年的任何时候都要慢。”[④]

俄罗斯铁路发展的无力，在战时表现得更明显。在日俄战争时期，铁路甚至都不能保障及时转运军队和军用物资到远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交通运输成为俄罗斯战时经济最薄弱的环节。

工业发展的落后导致了必然的结果：我们国家逐渐丧失了军事强国的地位。在战胜拿破仑之后，沙皇俄国没有赢得过一场匹敌的战争。战胜的只有一些落后的亚洲国家：土耳其（1828—1829年和1877—1878年）、伊朗（1826—1828年）、中国（1900—1901年），战胜波兰起义者（1830—1831年和1863年）和匈牙利起义者（1849年）。但是，俄罗斯帝国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并且居然还输掉了同日本的战争。

在一战期间，沙俄的贫弱和落后尤其凸显，一战要求各参战国竭尽全力。按照武器生产量来说，我们国家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强国。

---

① Ежегодник России, 1909 г. (год шестой), СПб., 1910, с. 454.

② Тамже., с. 455.

③ Гливиц И., Желез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 с. 79.

④ Бескровный Л. Г., Армия и флот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 Очерки во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М., 1986, с. 117.

表 6 一战期间的武器产量①

	机枪（千）	炮（千）	炮弹（百万）	飞机（千）
英国	239.0	26.4	218.0	47.8
法国	312.0	23.2	290.0	52.1
德国	280.0	64.0	306.0	47.3
俄罗斯	28.0	11.7	67.0	3.5

除此之外，如果说到航空，那么当时极其尖锐的问题就是国产发动机的生产：

> 和平时期俄罗斯是不能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如果不算上莫斯科格诺姆工厂分部，一个月生产的发动机不超过 5 台。因此，我们的空军航空发动机的供应主要靠从国外进口。但是我们盟军的空军实力却非常强大，并很吝于出售给我们发动机。②

不过，战争开始后，俄罗斯航空发动机的生产量大大增加了。在 1916 年，俄罗斯的工厂生产了 1398 台发动机③，但这是不够的。

在 1916 年秋天，战场上出现了新型高效的作战武器——坦克。在战争期间英国生产了 2800 辆坦克，法国为 5300 辆，美国为 1000 辆④。在另一个战场德国，1917 年 10 月开始派出 20 辆重型坦克 A7V，甚至还有一些其他型号的试验机型⑤。俄罗斯的第一辆坦克直到苏维埃政权时才被制造出来⑥。

现代战争武器装备的缺乏要用俄罗斯士兵的血来抵偿：

---

① 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 2001, с. 89.

② Головин Н. Н., Военные усилия России в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М., 2001, с. 224.

③ Бескровный Л. Г., Армия и флот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 с. 141.

④ 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 2001. с. 89.

⑤ Федосеев С., Танки в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Франция, Германия (1916 – 1918 гг.) //Техника 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 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2001, Но. 11 – 12, с. 44 – 55.

⑥ Первы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й танк《Борец за свободу тов. Ленин》, скопированный с трофейного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Рено》, был выпущен заводом《Красное Сормово》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 31 августа 1920 года. -Оружие победы/Под ред., В. Н. Новикова, Изд. 2-е, М., 1987, с. 190.

我还记得5月中旬（1915年）在佩列梅什利郊外的一次战役。第四步兵师进行了11天的激烈交战。11天德国重炮的可怕的轰鸣声，着实破坏了和保卫者们在一起的整个队伍的掩护。我们几乎无以还击。到最后阶段已经精疲力竭的军队用步兵或是直射击退了一次又一次进攻；血流成河，队伍减少，到处是坟丘……两个团几乎被消灭——对方用一次发射……①

布鲁希洛夫、卡列金、萨哈罗夫，——6月（1916年）国家杜马主席米·弗·罗江科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载，——他们请求务必要重视空军。那时正是德军像鸟群一样在我们上空飞来飞去，并且投掷炮弹，我们无力反抗……②

甚至步枪也缺。在战争初期俄军有4629373支枪。从1914年到1917年又制造3189717支。在这段时间内还从国外购入2461000支，并且从敌方缴获近70万支。总计大约有1100万支。而那时，俄军的实际需求达1770万支③。

就像曾在一战初期，在最高统帅下任军需将领的步兵上将尤·尼·丹尼洛夫回忆的那样：

由于缺乏枪支，虽然军队有极大的空缺，但那时候不能接收从后方来的支援军，因此士兵们就无所事事地集中在后备军，他们的存在给训练后续部队造成了困难。例如，在11月末（1914年），在后备军中有已受训人员80万人，那时作战部队正在为摆脱可怕的缺员而受折磨。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前来补给的兵员只能留在部队的车队旁，因为没有办法安排他们进连队中，由于没有步枪。④

---

① Деникин А. Н.,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Смуты, Т. 1, Вып. 1, Крушение власти и армии, Февраль-Сентябрь 1917, Париж, 1921, с. 30.

② Головин Н. Н., Военные усилия России в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М., 2001, с. 226 – 227.

③ Бескровный Л. Г., Армия и флот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 с. 77.

④ Данилов Ю. Н., 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1914 – 1915 гг., Берлин, 1924, с. 253.

俄罗斯历史的道路和分岔口

正如我们看到的，俄罗斯不可能再按照以前的独裁专制的道路走下去了。在那种体制下，最近 20—30 年间我们国家最终丧失了世界大国的领导地位，变成了半殖民地，事实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1917 年，在已经被战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俄罗斯爆发了革命。尽管之前经常有半官方的苏维埃的宣传，布尔什维克在宣传中号召推翻专制统治，但是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前只有大约 2.4 万人①，该党的积极分子或是在监狱或被流放，或是在国外，并不能参与到正在发生的事件中发挥实际作用。一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它的影响程度有多小，就是 1917 年俄历 2 月 27 日（公历 3 月 12 日）由布尔什维克成立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的最初组成只是两个 15 人的小组。②

国家政权掌握在当时代表临时政府的自由党人手中。并且，今天布尔什维克的揭露者们往往认为，此政权机关是被国家批准建立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事件是按照下面的方式发展的。俄历 2 月 27 日（公历 3 月 12 日）下午，杜马元首会议之后，进步同盟委员会召集了部分议员召开会议，出席者有 200 人左右。在他们开会的时候，“从圆柱大厅传来叫喊声，兵器碰撞声，好像，士兵也已经进入了大厅。罗江科急忙提出成立委员会——一致回应‘好’。他问，是否委托元首委员会进行组织委员会会议，——又是大喊回应‘同意’，但是，已经没有几个人留在会议大厅了，因为大部分人都忙着四散逃跑。会议闭幕”③。

就这样，创建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

> 委员会的存在没有在任何文件里有所证明，这也正说明了当时的极端状况，它的临时特征和非常有限的权力。罗江科（国家杜马主席）起初并没有领导此委员会，原因很简单——委员会历来就是纯

①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3-е изд., доп., М., 1987, с. 373.

② Тамже., с. 398.

③ Гайда Ф. А.,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удь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Но. 2, с. 33.

粹的工人阶级的附属机构。①

但是，违反法律所创建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赋予了自己权力：

> 情况发生根本改变是在那天晚上，在彼得格勒无政府状态加剧的影响下，委员会违反国家基本法律，控制了首都的主要执行机构的权力，并且试图派遣军队保护国家银行和国库。②

最终，最后一步，俄历3月2日（公历3月15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根据与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达成的协议将建立以格·耶·李沃夫为首的临时政府。“罗江科之后曾这样评价此事件：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和总委员会主席的公爵李沃夫的最根本和严重的错误在于，他们坚决地不愿意召集国家杜马作为工人和士兵议员委员会的对立面，他们认为自己作为最高权力的思想代表，政府总是能够依靠他们的。”③

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临时政府完全是不合法的。在临时执掌政权的不光彩的几个月内，竟然没有解决一件摆在俄罗斯面前的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反而非常成功地摧毁了它的一切。实际上，俄国崩溃的情景开始体现在生活中，这种情景我们在1991年也曾看到。

这一事件发展完全符合西方“关怀者”们对我们国家的计划。例如，英国驻法国大使勋爵弗朗西斯·贝尔蒂于1918年12月8日在自己的日志中写道：

> 再也没有俄罗斯了！它解体了，作为皇帝和宗教代表的偶像消失了，它曾经把信仰东正教的各民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如果只是我们成功获得了缓冲国们的独立，即在东部与德国相邻的芬兰、波兰、爱沙尼亚、乌克兰等，不管它们是怎样成功伪造的，那么，依我看，剩下的可以去见鬼，自行其是了。俄罗斯共和国也不再能够控制中亚的

---

① Гайда Ф. А.,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удь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Но. 2, с. 33

② Тамже.

③ Тамже., с. 35.

伊斯兰国家和高加索公国了。[①]

布尔什维克掌权摧毁了这些意图。俄罗斯从衰败中被解救，内外敌人近乎失望。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中，斯大林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军事革命中心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②]

截至 1918 年 2 月，苏维埃政权遍布俄罗斯全境，其统治的确立付出了相对较小的代价。并且，要知道从前的人们是决不顺从的。他们不惜代价，渴望回到断送了的政权和特权下，剩下的没有工作的俄罗斯的雇主奴颜婢膝地服侍着那些人，从德国开始，以协约国结束。在外国武力掩饰下建立的白军发动了大范围的国内战争，使俄罗斯陷入了流血内乱的深渊。但是与那时的“国际社会”的努力奔走不同，布尔什维克们不仅保住了政权，而且还恢复了我国的历史边界，收复了大部分失去的领土。

国内战争时期，那些挽救俄罗斯免于灭亡的人中，就有加入前线队伍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约·维·斯大林。

公正地说，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中的相当大部分把我国的事件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序幕。而“克里姆林宫的幻想者们”，继承了来自许多代的亲西方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的缺失，以及对自己祖国和俄罗斯人民的轻视，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把俄罗斯当干树枝，渴望点燃“世界大火”。与他们不同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同道者把希望寄托于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即明确建设强大的主权独立国家的方针。

“他是怎样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地位……”

渐渐地，斯大林从名义上的总书记成了党和国家实际上的领袖。当时的状况是极其困难的：由于革命和国内战争，在工业发展方面已经严重地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俄罗斯又丧失了 10 年。

“新经济政策”，被拥护者们高度赞扬的赫赫有名的新经济政策，只

---

① Берти ф.，За кулисами Антанты，Дневник британского посла в Париже，1914－1919/ 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Е. С. Берловича，М.；Л.，1927，с. 191.

②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3-е изд.，доп.，М.，1987，с. 393－394.

是使大部分领域恢复到了1913年的水平[①]。

表7

年份	生铁（千吨）	钢（千吨）	煤（千吨）	石油（千吨）	电能（百万千瓦时）
1913	4636	4039	36262	9194	1945
1921	116	—	7002	4001	520
1926	2269	3104	26044	8821	3508
1927	3050	3779	32333	10957	4205
1928	3375	4253	35808	12316	5007

但是，应该继续发展，并且应该尽可能快地发展。强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规则。这在最近那几年开始的新的世界大战中显而易见。正如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第一届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人大会上发言中客观指出的："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50—100年。我们应该在10年内赶上这段距离。要么我们做到，要么我们被践踏……"[②]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实行加速工业化计划。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保障工人劳动力和整个国家生存的唯一现实的办法。

为了弥补落后的10年，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实现了飞速前进[③]。

表8

年份	生铁（千吨）	钢（千吨）	煤（千吨）	石油（千吨）	电能（百万千瓦时）
1929	4347	4878	41668	13684	6224
1930	4964	5761	47780	18451	8368

① Данные за 1913 год: выплавка чугуна-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1913 году, с. 372.; выплавка стали-Тамже, с. 381; добыча угля-Тамже, с. 305; добыча нефти-Тамже, с. 338;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и-Кафенгауз Л. Б., Эволю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России, М., 1994, с. 250. Остальные данные: Голубничий И. С.,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цифрах (1860－1938 гг.), М., 1940, с. 74, 75, 83.

② Сталин И. В., О задачах хозяйственников, Речь на первой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аботни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4 февраля 1931 г. //Сталин И. 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13, Июль 1930-январь 1934, М., 1951, с. 39.

③ Данные за 1929 год, кроме нефти: Голубничий И. С.,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цифрах (1860－1938 гг.), М., 1940, с. 83. Остальные данные: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60 году,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1961, с. 241, 254, 262, 269.

续表

年份	生铁（千吨）	钢（千吨）	煤（千吨）	石油（千吨）	电能（百万千瓦时）
1931	4871	5620	56752	22392	10686
1932	6161	5927	64360	21414	13540
1933	7110	6889	76333	21489	16357
1934	10428	9693	94160	24218	21011
1935	12489	12588	109634	25218	26288
1936	14400	16400	126826	27427	32837
1937	14487	17730	127968	28501	36173
1938	14652	18057	133263	30186	39366
1939	14520	17564	146208	30259	43203
1940	14902	18317	165923	31121	48309

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 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 年）并未圆满完成任务，但是苏联和主要西方国家的差距确实缩小了。

表 9　　1929 年的生产状况①

国家	生铁（千吨）	钢（千吨）	煤（百万吨）	石油（百万吨）	电能（10 亿千瓦时）
苏联	4347	4878	41.7	13.7	6.2
美国	43298	57339	549.7	138.0	120.0
德国	15344	18232	351.5		31.6
英国	7711	9791	262.0		15.8
法国	10364	9699	53.8		14.4
日本	1266	2294	34.3		13.3

表 10　　1937 年的生产状况②

国家	生铁（千吨）	钢（千吨）	煤（百万吨）	石油（百万吨）	电能（10 亿千瓦时）
苏联	14487	17730	128.0	28.5	36.4

① Итоги выполнения второго пятилетнего плана развития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оюза ССР, М., 1939, с. 170 – 173.

② Тамже.

续表

国家	生铁（千吨）	钢（千吨）	煤（百万吨）	石油（百万吨）	电能（10亿千瓦时）
美国	37721	51378	442.3	175.0	150.0
德国	15957	19817	369.2		50.0
英国	8633	13172	244.3		28.8
法国	7961	7902	44.3		18.3
日本	2800	5800	45.8		26.7

因此，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军事工业发展到不仅能够与德国工业相抗衡，而且还能与被占领的服务于德国的欧洲国家的工业相抗衡。

表1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生产状况** 单位：千件①

	苏联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步枪和卡宾枪	3.0	10327.8	3569.5	2457.1	12330.0
冲锋枪	6173.9	1256.8	8.0	3919.9	1933.3
机枪	1515.9	1175.5	449.5	938.6	2614.3
大炮	482.2	319.9	160.1	389.7	548.9
迫击炮	351.8	78.8	7.8	100.9	102.1
坦克和自行火炮	102.8	46.3	4.8	29.3	99.5
战斗机	112.1	89.5	55.1	94.6	192.0

正如列·阿·戈尔登和艾·维·克罗波夫在自己的作品中公正地指出的那样：

> 在此值得再次将1928—1940年加快工业增长时期，同正常的1900—1913年间俄罗斯工业非加快发展时期做一对比。在两个时间长度相同的时期内，我们国家同样都发生了与外敌的军事冲突。战争是测试发展成果的最好检验。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较之第一次世界

①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 В 12 т., Т. 12, Итоги и уро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82, с. 168, 181, 183, 200, 202.

大战是更为严厉的检验。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它的盟军在两线作战，只是分出了小部分军力同俄军作战；大部分军队都在西战区。四年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三年，苏联实际上是同德国法西斯一对一地战斗。1914—1918 年战争中的敌军武装力量不到其全部军力的 1/3，而 1941—1945 年的战争大约集中了德军武装力量的 3/4。并且革命前的俄罗斯没能获得战争胜利，而苏联消灭了法西斯。①

斯大林不仅在战争到来前为经济奠定了基础，筹备好了军队，而且在战斗开始后亲自领导苏联武装力量。1941 年 6 月 30 日他成为国家国防委员会主席，7 月 19 日成为国防委员，8 月 8 日成为最高统帅②。

这是阿·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的：

斯大林成为最高统帅是否合适？要知道他不是职业军事家。

当然，毫无疑问，合适！

这是在那个极其困难的时期最好的决定，考虑国内战争时期最伟大的列宁的经验，是将党、国家、经济和军事领导职能集于一身。那时我们只有一种可能：快速地把国家变成军营，把后方和前线变成统一的整体，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用于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当时的斯大林，作为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还是最高统帅、国防人民委员，为我们顺利取得战争的胜利开创了最有利的机会。

当然，接受领导对敌战斗武装力量任务的斯大林，并不完全具备那些当代作战艺术领域要求的军事知识。但是，他有国内战争的经验，他熟悉苏联军队建设和军事发展的过程。但是，我认为，斯大林巨大的政治威望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是人民和军队对他的信任。

我坚定地相信，斯大林，尤其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后半程的斯大林，是最强有力的、最富军事才能的战略指挥家。他成功地实现了对

① Гордон Л. А., Клопов Э. В., Что это было?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едпосылках и итогах того,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с нами в 30 – 40-е годы, М., 1989, с. 67 – 68.

②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 трёх томах, Т. III, М., 1986, с. 424.

前线的领导，在党的方针的基础上领导国家全部的军事力量，并且能够给予战争盟国中担任领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以极大的影响。与斯大林共事是很有趣的，同时也是异常困难的，尤其是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我记忆中的他是严厉的，是一位刚毅的军事指挥家，并且不乏个人魅力。

斯大林不仅具有极高的天赋，还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最高统帅部常规工作中都能显现出他善于分析问题的才能。他不慌不忙，微微有点驼背，一边踱步，一边仔细地聆听发言者讲话，时而提问，时而作即兴发言。而当讨论结束时，将会得出准确的结论，并进行总结。他的总结很简短，但是内容很深刻，通常会成为党中央委员会或是国防委员会决议的基础，甚至成为最高统帅的指示和命令的基础。但是，通常是某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在会议上直接准备方案。斯大林到会时，看完所写方案，有时候会做修改，如果方案不令人满意，会亲自口授新的方案。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最高统帅部。在讨论的时候，如果有必要，斯大林就让某个人，也包括他自己，立即策划，下达指令。指令是手写的，由作为最高统帅或是国防人民委员的斯大林签字，并快速地编译成密码电报传递到军队。即便是对待这种文件，斯大林也不降低对它的内容和文字规范性的要求。①

斯大林作为军事统帅的成长过程不断地完善起来。我已经写过，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他会尽可能地直接参加苏联军队的前线作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尤其是库尔斯克大会战之后，达到了他战略指挥的顶峰。那时斯大林用现代战争的思维熟练地分析作战前和战斗中的所有问题。他要求，军事行动要讲求创造性，要充分考虑军事科学，要灵活果断，鼓励对敌实施分散瓦解和包围战略。在他的军事思想中，明显地表现出“集中武力、各个击破”的战略趋向，倾向于在战争开始和进行中运用所有可能方案。斯大林不仅深谙军事战略，还极具政治战略艺术天赋，因此作战技艺超群。

① Василевский А. М. , Дело всей жизни, М. , 2002, с. 489 – 490.

我认为，斯大林在苏联军事力量战略进攻时期表现出了苏联统帅所具有的一切主要品质。他能够领导前线作战，在战争年代中苏军的所有战术展现了力量、创造性，明显高于被西方吹捧的德国法西斯军事学校的军事艺术。①

朱可夫元帅是这样评价作为统帅的斯大林的：

可以说，斯大林是后来才掌握了组织前线作战和作战军群的基本原则，并且是很专业地领导指挥他们作战。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的这些才能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开始展现。

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最高统帅是依据地球仪研究局势和作出决定的，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他没有使用军事指挥图工作，并且他不需要这样做。但是标注有战势的作战地图他是研究得一清二楚的。

天赋的才能、丰富的直觉力、渊博的学识、广泛的情报消息加之政治领导经验帮助斯大林领导了武装斗争。他能够在战略局势中找到并抓住主要环节，为对抗敌人指明道路，为顺利组织进攻拟定战术。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②

斯大林使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摆脱了奴役和毁灭，而苏联的武装力量则歼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法西斯德国的军队。

在二战中苏联实现了领土面积的增长。收复了革命叛乱纷争时被侵占的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佩琴加区。扭转了俄国沙皇令人愤懑的短视政策的影响，收回了亚历山大一世赠送给芬兰公爵的维堡省的大部分地区，收回了根据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战败而割让给日本的南萨哈林岛、库页岛。东普鲁士的相当大一部分，还有北布科维纳都加入了苏联，取得了欧洲和亚洲的影响范围，苏联成了当时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

① Василевский А. М. , Дело всей жизни, М. , 2002, с. 491 – 492.

② Жуков Г. К.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13-е изд. , испр. и доп. по рукописям автора, В 2-х т. , Т. 1, М. , 2002, с. 342.

二战还没结束，美国就部署原子弹，谋求世界霸权，开始对苏联发起进攻。1946 年 3 月 5 日，丘吉尔在美国大学城富尔敦发表演说，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告针对苏联的“冷战”开始。

但是这一计划被打破了。苏联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被破坏的工业之后，1949 年 8 月 29 日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的试验。正是在斯大林时期开始的火箭 - 核轨道建造，至今还让“国际社会”诟病我们的民主（已经如此对待南斯拉夫和伊拉克了）。

国家正在努力治好战争的创伤，工业发展迅速，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只有造谣者和蛊惑者们才真的相信，好像这些成就的获得“不是要感谢斯大林，而是要反对他”。

第二篇

社会经济发展篇

《改革》：成果与经验教训*

瓦·伊·茹科夫著　粟瑞雪译

粟瑞雪，1973年生，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已出版专著《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和译著《十二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俄国19、20世纪之交法政文献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发表各类文章30多篇。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进步

1917年的革命开始时是武装起来的人民抗议一小部分俄国资产阶级的原始利益，后者通过与英国、法国、美国结盟而获利。布尔什维克赋予其社会主义性质。但外国的武装干涉将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变为帝国主义革命提上议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导致1920年前俄国的工业产值减少至1913年的1/7。

国家遭受了400亿金卢布的经济损失。与1913年相比，国有化的工业领域生产减少了4/5，生铁和煤炭产量减少了2/3，石油产量减少了1/2。工业和运输潜力减弱，技术装备率已经变得非常低下，设备丧失了运行能力。工人阶级人数减少了一半，并逐渐丧失其阶级属性。农业的情况也不太好，农产品减少了40%。

---

* 本文是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В. И. Жуков）于2011年完成的手稿《〈改革〉：成果与经验教训》（《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ТОГИ И УРОКИ）摘译而成。

此外，150 万名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管理人员、工程师和企业领导离开了祖国。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接近于零。货币贬值，经济关系出现实物化。俄罗斯国家的领土和人口都有所减少：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都脱离了它。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划归到相邻的其他国家。俄罗斯国家失去了约 100 万平方公里土地及这部分领土上的 4000 多万名居民。

1921 年与 1913 年相比，俄国的石油生产减少了 60%，电力生产减少了 3/4，煤产量减少了 1/3，生铁产量减少了 97%。

国家处于一片废墟之上，工业、文化、科学、金融——一切都被摧毁。国内土匪猖獗。人的生命价值在民众的意识中已经无足轻重。1917—1922 年俄国减少了 1300 多万人口。旧的社会体系及其机构被彻底粉碎。

看来，俄罗斯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帝国已经不可能再复兴了。但接下来的苏联社会经济历史却反映了苏联经济发展的积极成果并提供了不少成功改革的例子。1917—1991 年国内经济史最完整、最准确的报道包含在一些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中，其中突出的有阿巴尔金、伊万诺夫、雷日科夫、索罗金、沃洛达尔斯基、格拉德科夫、巴伊巴科夫及其他一些科学家、国务活动家和专家的作品。

病情已十分严重的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作出了智力贡献。新经济政策将国家从废墟中拯救出来。

但同时也不应高估新经济政策的成果。它在国家经济史上的地位——只是使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见表 1。

表 1

年份	生铁（千吨）	煤（千吨）	石油（千吨）	电力（百万千瓦/小时）
1913	4636	36262	9194	1945
1921	116	7002	4001	520
1926	2269	26044	8821	3508
1927	3050	32333	10957	4205
1928	3375	35808	12316	5007

几乎用了 10 年才达到这些指标。在此期间，主要的生产总量提高了 136%，工业和建设领域提高 132%，交通和通信领域提高 131%，农业部

门提高 141%。

新经济政策框架内使用的机制不仅产生了积极的成果，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国内市场显得不平衡了。实际上，国内生产的所有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都要经过众多中介。价格上涨使居民买不起食物；高昂的租金迫使工人从公寓返回到简易宿舍；小资产阶级氛围滋生了卖淫、吸毒、抢劫和行贿。

到 20 年代末已经很明显的是：新经济政策瓦解了政治阶层，也不具备实现技术突破的潜力。发展小商品生产只能填补消费市场，这种政策无法应对 30 年代的挑战。在当时不仅美国，苏联也需要新的方针。

列宁的身边有很多人觊觎理论家的角色。斯大林算是个实用主义者。时间证明，斯大林不仅有钢铁般的意志，还具有组织者的品质。他是得到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接力棒，但对建设苏联帝国的战略方针进行理论论证的荣耀却非他莫属。

新政的组成部分有：建立教育、科学和文化的有效体系；从小商品农业向产业化农业生产过渡；国家工业化；等等。

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记忆中保存着苏联在国家历史上的成就。到 1941 年年初，国家的生产收入与 1922 年（内战结束后）相比就已经增加了 10 倍，工业生产提高了 23 倍（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提高了 44 倍，消费品的生产提高了 13 倍），农产品增加 1.1 倍，铁路运输周转量增加了 22 倍，固定资产投产增加了 23 倍，投资增长了 25 倍，工人和职员数量增加了 4.4 倍。

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还发生了其他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因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而丧失的领土重新回到苏联的版图。苏联的领土恢复到了俄罗斯帝国的边界，人口数量还超过了它。

可以根据对各种数据的分析来评价苏联 1929—1941 年取得的成就。但最好是重复在马林科维奇的一本书中所阐述的、对这一时期的评价，作者是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的成员，从 1981 年开始成为侨民，曾任《论坛》杂志的编辑，是重要的政治评论家和《自由》广播电台的节目编辑。

你不会怀疑一个有这样经历的人会对斯大林有好感，但是他写道："在斯大林专制统治的头 11 年（从 1929 年到 1940 年），电力生产增长了 7 倍，从 60 亿千瓦/小时到 480 亿千瓦/小时。苏联当时的电力生产超过

了英国和法国，在欧洲仅次于德国（只有美国遥遥领先）。国内钢铁产量比 1928 年增加了 3 倍，煤产量增加 3.5 倍，石油产量增加 1.5 倍。这段时期国内汽车拥有量增加 30 多倍（尽管苏联在这方面仍严重落后于欧洲主要国家）。拖拉机的产量从 1928 年的 2.7 万台增加到 1937 年的 36.6 万台。当年苏联的工业制造出 10.5 万台联合收割机并为农村提供了 6 万辆汽车。道路里程增加近 6 倍（但这仍然落后于欧洲，尤其是铁路）。国民收入按联合国采用的方法计算，增加了 2 倍（人均增加 1.5 倍）。我已经写过，社会总产值在此期间增加了 80%（按 1975 年的美国美元计算）。当然，武装力量的技术装备也大大提高。与 1930 年相比，1939 年的大炮生产提高了 6 倍，飞机产量增加 5.5 倍，坦克增加了 42 倍。大多数坦克虽然不怎么样，但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制造出 400 辆重型 KV 坦克和 1000 多辆 T－34 坦克（这是二战时最好的坦克）。农业方面的成绩给人印象不深，确切地说，几乎没有。如果集体化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那只能是现在对农村的压榨比以前更多，依靠的是使农民变得更加贫困，而根本不是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伊萨克·多伊切尔在自己关于托洛茨基的书中提供了以下数字：农业生产总值从 1928 年的 124%（1913 年为 100%）下降到 1933 年的 101%，1936 年只有 109%；牲畜头数从 1928 年的 137% 下降到 1933 年的 65%，然后才开始缓慢回升——1936 年达到 96%。”

人口的社会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 20 年代城市人口约占国内人口的 18%，战前几乎达到 1/3，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在 12 年中增加了 75%。这些城市人口中约有 1300 万名工人和 1800 万名职员。而且工人人数在这 11 年中增加了 2 倍以上。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说大多数集体农庄的农民仍在贫困中勉强过活，那么战前城里人的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工人技能的高低决定了收入的显著差异，刺激人们去受教育和完善职业培训。事实上，所有城市公民在此前都是识字的，很多人从中学和技术学校毕业，在校大学生人数明显增加（10 年增加了 2 倍）。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了 3 小时（从 45 小时减到 42 小时），这是在欧洲除法国之外最短的工作时间（确实，这种优势常常因为突击完成计划而失去意义）。城市人均寿命提高了，医疗保障改善了：医生人数增加了 1.5 倍，医院病床数增加 2 倍多。轻工业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市民们能够精心打扮并购买自己需要的家用电器。所有这些商品的质量远不如国外，但没人在乎——国家与外界是隔绝的，对于昔日的农民而言，他们全都觉

得尽善尽美。无线广播覆盖全国，很多人买了留声机。周末人们去看电影（福利，票价很便宜），看亚力山德罗夫的电影时哈哈大笑，看《誓言》或《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德》时哭泣——钦佩肖尔斯和恰帕耶夫（夏伯阳）的壮举。年轻人在公园和市区的舞场跳舞，有的甚至去过疗养院和休养所。总之，数百万人过上了完全不同往日的全新生活。很多人喜欢这种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整个国民经济转为战时体制而具有其特殊性。但在这时候，政治领导也没有放弃计划。因此，已经到了1941年6月末，战争爆发一周后，还通过了1941年第三季度的“动员计划”，8月份产生了《1941年第四季度的军事经济计划》。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制订和实施的不仅有季度计划，还有月计划。恐怕不会有人怀疑，对军事经济活动的专业规划已成为有效工作的条件和赢得伟大胜利的原因之一。

在战争年代，即在经受严酷考验时，胜利的主要源泉已经显示出来：教师和图书管理员给公民们传授知识，科学家讲解军事装备，有文化的公民使用有效的武器履行自己的职责，保卫自己的国家。由于全面开展文化革命、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转为工业体制，这一切成为可能。

如果不实施这些改革，苏联不可能在战争中生存并获胜。苏联和德国武器生产能力的简表让人不会对此有任何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

表2 单位：千件

	苏联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步枪和卡宾枪	12139.3	10327.8	3569.5	2457.1	12330.0
冲锋枪	6173.9	1256.8	8.0	3919.9	1933.3
机枪	1515.9	1175.5	449.5	938.6	2614.3
炮	482.2	319.9	160.1	389.6	548.9
迫击炮	351.8	78.8	7.8	100.9	102.1
坦克与自动控制系统	102.8	46.3	4.8	29.3	99.5
作战飞机	112.1	89.5	55.1	94.6	192.0

战争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完全或部分摧毁了1710座城镇，7万多个乡村，31850家工业企业；战前钢产量约占60%的冶金厂倒闭，国内煤

产量超过 60% 的矿井遭废弃；6.5 万公里的铁轨和 4100 个铁路车站被摧毁。

在战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 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额如下：1946 年较 1945 年增长了 20%，1947 年较 1946 年增长了 22%；1948 年较 1947 年增长了 26%；1949 年较 1948 年增长了 20%；1950 年较 1949 年增长了 23%。

战后工业的五年计划用了 4 年零 3 个月完成。1950 年的国民收入比 1940 年增加了 64%，超过了计划增加的 38%。

五年计划期间（1951—1955 年），国民收入较 1940 年增长了 71%，1955 年生产总值比 1950 年提高了 85%（计划提高 70%）。工人的工资增加了 39%（计划增加 36%），农民收入增加了 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44%。

1929—1955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苏联工业生产的发展（按 1913 年前的百分比）

年份 / 指标	1932	1937	1940	1945	1950	1955
全部工业的生产总值	267	588	852	782	1476	2729
生产资料的产量	424	1013	1554	1744	3185	6054
消费品的产量	187	373	497	295	613	1079
行　业						
电力	696	1860	2484	2224	4690	8752
钢	140	419	433	290	646	1070
煤	221	439	570	513	897	1344
石油	232	309	337	210	410	767
水泥	229	359	373	121	671	1479
化工	460	1528	2461	2413	4500	10243
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	699	1977	3473	4474	7451	16183

表 3 仔细研究了苏联工业成功发展的态势，显示出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几年的成就。如果将机械制造和金属生产总值与 1928 年相比，其变

化为：1928 年为 100%，1932 年为 399%，1937 年为 1128%，1940 年为 1982%，1945 年为 2553%，1950 年为 4252%，1955 年为 9235%。在斯大林之前，世界经济史上国内生产总值从未有过这样的增长速度；斯大林死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顺便说一句，1952 年 2 月建造第一艘核潜艇的命令也是约瑟夫·斯大林签署的。

总的来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每 29 小时会有 1 家新的企业投入生产，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是每 10 小时产生 1 家，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是 1 天出现 3 家新企业，也就是每 7 小时产生 1 家。

关于苏联生产的产品质量如何，可以举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的例子进行说明：在 1937 年巴黎世界技术博览会上，苏联的 C－60 和 C－65 拖拉机被评为世界最佳，赢得了最高奖项——“大奖”。到 1940 年，车里雅宾斯克工厂生产线共生产这种拖拉机 10 万台。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成为二战中最好的坦克生产工厂之一。此外，曾获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大奖的嘎斯－21 牌“伏尔加”汽车，并不是在获奖那年即 1958 年制造出来的，而是在斯大林时期。后来再也没有一辆苏联或俄罗斯的小汽车获得过这种荣誉。同样，第一架飞上蓝天的喷气式客机图－104，也早在“波音”和“道格拉斯”的设计师、工程师、技师及工人们之前就被发明了出来。这三项产品引发的轰动，使 1959 年访美的赫鲁晓夫及其随行人员脸上有光。

所有这些独一无二的机器都是在斯大林时期产生，而非由他的继承者幻想出来的。

可以对斯大林抱任何态度，但我们不能不承认，20 世纪有 3 个 10 年与他的名字相关。正是在这 30 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创造性活动，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增加了国家财富，保持了劳动和战斗中的成果。难怪知名学者和记者苏霍杰耶夫在其著作《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百科全书》中表达了获得数千万俄罗斯公民签名支持的立场：“斯大林时代是我国彻底发生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是尊重劳动人民和每个人天赋的时代，无论其社会地位、民族属性和宗教信仰如何。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为争取和平和各民族友谊而斗争的时代。在反对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斯大林能够团结一切进步的力量。在斯大林时期，即使像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和其他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这样的社会主义的无情对手，也认为能与苏联的政府首脑打交道是自己的荣幸。”

1964 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对斯大林有如下评价："他是计划经济的创始人；他得到的是一个用木犁耕地的俄罗斯，留下的却是装备有核反应堆的俄罗斯；他是'胜利之父'。"

与西方史学不同，许多现代精英的代表，首先是政治精英们，否定斯大林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中的作用，并极其愤怒地看待社会学研究出的、表现斯大林在民主俄罗斯的居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结果。

大清洗与卫国战争

现在一些评论家认为，在最艰苦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获胜的不是斯大林，不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也不是苏维埃制度，胜利的组织者似乎是人民本身。人民是违背而非依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能力而行动的。

这是真的吗？

同样的人民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每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比如，俄罗斯的人民也参加过很多战争。1380 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带领人民在库里科沃荒原上取得了胜利，但在 1382 年，脱脱迷失汗占领并烧毁了莫斯科。人民还是同样的人民，但出卖人民的大贵族却不像德米特里·顿斯科伊。

18 世纪初，俄罗斯人民与瑞典人作战，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年轻的沙皇彼得一世，建立强大的教育培养制度，取得了波尔塔瓦战役的胜利，并成为大帝。但沙皇陛下的人民在 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又经受了最惨痛的失败。

20 世纪初，人民放任日本帝国摧毁了俄罗斯的海军，消灭了陆军，占领了千岛群岛、萨哈林岛的一部分等。

1917 年，人民撤离了前线，在 1917—1922 年分散为很多相互交战的军队和民兵。还是这些人民，不靠任何一位苏联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和他的人民委员及将领，战胜了猛攻苏联的希特勒率领的整个欧洲……

在这种结构中既无逻辑，也不合情理。这其中也没有政治合理性：政权在灌输对斯大林不敬的同时，使自己疏远了人民。应当提醒人们记住，历史是国家的主要财富和政权皇冠上的明珠。

在此重申：如果不承认自己先辈的功绩，诋毁大公和领袖，我们会把

自己变成乞丐，我们正在比赛向祖国倾倒更多的污垢。

这样做或是由于无知，或是由于自己的经历，因自己的熟人或亲人受迫害而意欲报复当局而故意为之。但常常是因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追求实际的、唯利是图的动机。

同时，即使一些不属于现代维权运动、敌视一切的群体，他们也愿意变得更客观一些。其中，人权组织基辅分部领导人之一的马林科维奇写道："看来，不得不承认的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斯大林的政治制度。是的，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但动员人民取得胜利的是斯大林制度。而这，唉，也是为数不多的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理由之一。"①

因镇压自己人民的代表而犯下的罪行影响了对斯大林的积极看法，出现了大清洗及其评价。大清洗不仅是极其痛苦的话题，而且是大规模造假的领域。

我们不重复那些作者的"政治"算术内容，他们认为被斯大林政权杀害的人数似乎在2000万至1.5亿之间。原则上，对于任何一种哪怕造成一个无辜者死亡而刽子手未被惩处的政策，都不应以肯定的语气来描述。但我们不应忘记，历史学家的著作必须依靠事实。学者的使命是确定真相。夸大的事实和诬告已经不是真相，而是卑鄙的世界观。

我们来看一下人口统计数字。如果1913年俄罗斯的人口为1.59153亿，1959年同一疆界内的苏联人口为2.08827亿，那苏联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为0.6%。

这是多还是少呢？让我们和其他国家比较一下（见表4）。

表4 单位：千人

年份	英国	法国	德国
1920	43718	38750	61794
1960	52559	45684	72664

不难确定，从1920年至1960年，英国每年人口增加为0.46%，法国

① См.：Малинкович В. *Три революции и дв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Этюды на темы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ИГПИ，2008. с. 121.

和德国为 0.41%。[①] 比较性的分析表明：苏联每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为未经历大清洗这种社会现象的欧洲主要国家的 1.5 倍。

从 1926 年至 1936 年，也就是大清洗期间，苏联每年人口增长为 110 万，从 1937 年至 1940 年为 150 万。[②]

代表科学而非其他活动领域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们深知，斯大林死后很快就出现了有关大清洗的第一手可靠资料。赫鲁晓夫是最早得到这些资料的人之一。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和司法部长戈尔舍宁就赫鲁晓夫于 1954 年 2 月 1 日所作的质询做了答复。他们向赫鲁晓夫通报，在 1921 年至 1954 年 1 月期间，因政治指控被判处监禁的有 236.922 万人，判处流放的有 76.518 万人，判处死刑的有 64.298 万人。[③]

后来，研究者们有机会研究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地方分局和其他机构的档案，并对向赫鲁晓夫提供的材料做了补充。莫佐兴确认，在 1918—1953 年间，有 430.8487 万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 83.5149 万人被判处死刑。[④] 1926—1941 年间的数据如表 5 所示。[⑤]

表 5　　1926—1941 年间被判死刑人数一览表

年份	判处死刑人数	年份	判处死刑人数
1926	990	1934	2056
1927	2363	1935	1229
1928	869	1936	1118
1929	2109	1937	353074
1930	20201	1938	328618
1931	1481	1939	2601
1932	2728	1940	1863
1933	1824	1941	23786

① См.：*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е стран мира*. -М.，1974. с. 23.

② См.：*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Официальное издание*. -М.，1996. с. 37；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Крат. Стат. Сб. / Госкомстат России. -М.，2001. с. 68；http：// www. gks. ru.

③ См.：Дугин А. Н. Сталинизм：легенды и факты // *Слово*. 1990. №7. с. 26.

④ См.：Мозохин О. Б. *ВЧК-ОГПУ. Карающий меч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М.：Эксмо，2004. с. 169.

⑤ Тамже.，с. 167.

当代研究者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在那些被捕和被判刑的人中不仅有政治犯，也有刑事犯。其中，在波波夫发现的档案资料里，1921—1938年被判刑的294.4879万人中，刑事犯有106.2万人，也就是占30%。[①]原因是刑事案件要按照苏联刑法来处理，需要大规模和长期的法律诉讼程序。而处理政治案件有另外的程序，这让最热心的调查者把刑事案件转为了政治案件。

要描写有关1993年10月前对政治对手的残酷迫害情况相当困难。在苏联史学中，为夺取或保持政权而进行刑事犯罪的政治动机实际上全部被描绘成暴君及其爪牙的嗜血成性。但这已不是在20世纪30年代为选择苏联的发展模式而艰苦作战了，1993年10月，鲁茨科伊在广播里号召轰炸克里姆林宫；马卡绍夫将军的走卒攻打军事和民用设施；列别德将军在选择向谁射击和保护谁；忠于叶利钦的坦克手用大炮保障了民主的总统战胜民主的议员们。现在，当这种事发生在新的、期待已久的民主时代时，人们开始明白：引用人格类型来理解暴力的天性是不够的。它并不总是合适。现在很少有人回忆起，在1993年10月初，一支奇怪的棒球队是从哪里飞到莫斯科的？为什么科尔扎科夫亲自迎接它？如果知道他们是来自快速反应部队第六分队的狙击手，“教练”是上校肯特，那在“运动员”的球套下藏的是什么？狙击手运动员们在包围白宫的射击掩槽中做过什么？“运动员”们为什么不表演棒球技能，却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则去了基辅？[②]

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和斯大林的战友之间为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原因至今没有被全部研究出来。从这个角度看，需要对一些人为夸大的结果和另一些具有律师式激情的成果进行仔细分析和修正。

我们立刻发现：这些结果从未表现出政治的微妙性。无论是托洛茨基、斯大林，还是库恩和图哈切夫斯基都不是政治素食者，更不要说年轻的盖达尔或传奇的科托夫斯基。而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年轻的苏沃洛夫将军在与外敌的战斗中成名之前，消灭了不少普加乔夫麾下的内敌。

每个时代的历史事件都以自己时代的语言来描述。当然，被枪毙的红军元帅、各级指挥官和其他人在极少数情况下曾是其他国家的代理人

---

① См.：*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1992. №2. с. 29.

② См.：Кузьмин Н. П. “*Чёрные тюльпан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М.：Профессионал，2010. с. 60.

（虽然这些人很多）。但是，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布利亚赫尔、亚基尔、普特纳等人为推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代表的政权进行了严酷的斗争。

在 30 年代的红军中，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支持者对部队指挥员的影响很大。低级指挥员和普通士兵喜欢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但在回答权力斗争加剧时军队跟谁走这个问题时，答案不由他们决定。仅仅为了这点平淡无奇的利益就发动了大清洗。1937 年，14.43 万名中初级指挥员中有 1.1034 万人被清洗（占 8%），1938 年 17.9 万人中清洗了 6742 人（约占 3%）。其中不仅包括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支持者，还有被追究盗窃、酗酒、淫荡和其他工作失误的人。①

红军中有无“第五纵队”，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事件就表明了。

1941 年 6—8 月，数十名红军飞行员飞到了纳粹一边。其中有两名苏联英雄：大尉贝奇科夫和上尉安季列夫斯基。希特勒未来的王牌马尔采夫也获得了“英雄”称号，后来却“因履历材料”而受迫害。

西北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特鲁欣少将于 1941 年 6 月 26 日投降。1941 年投降的有：第二突击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第 19 集团参谋长马雷什金；第 32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日连科夫；第 31 集团军军长叶戈罗夫；第 21 步兵军军长扎库特内。

1941 年 8 月 22 日，布良斯克前线的第 13 集团军 155 步兵师 436 步兵团几乎全团投降了纳粹，其指挥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红旗勋章获得者、从 1929 年起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苏共党员、少校科诺诺夫。他是和团政委潘琴科一起投降的，带着战旗和全部武器。1941 年 9 月，科诺诺夫指挥的德军第 102 哥萨克营有 1799 人。②

少将波格丹诺夫曾是西北方面军第 8 集团军 11 步兵军 48 师师长，1941 年 7 月 17 日投降了德国的骑兵侦察小分队。7 月 22 日，波格丹诺夫被安置在苏瓦乌基的战俘集中营。9 月 18 日，波格丹诺夫被转移到柏林的一所监狱，在那里他写了一份申请，建议组建战俘部队与红军作战。之后他被转移到武力哈伊德的宣传部集中营，1942 年夏天他参加了间谍政

---

① См. подр. Бушков А. А. *Сталин: ледяной трон. Хроникип великого и ужас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М. : 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2010. с. 73.

② Ибатумин Т. Г. *Война и плен.* СПб. , 1999. с. 119.

治组织“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战斗联盟”，该联盟由“齐柏林”（帝国安全总局第六处的分部）监管。8 月，波格丹诺夫写了两封呼吁书，1942 年 12 月作为普通士兵参加了“党卫军第一俄罗斯义勇军团”。3 月，在第一、第二俄罗斯义勇军团联合成党卫军第一俄罗斯民族团后，波格丹诺夫被任命为反间谍机关负责人，并晋升为少校。4 月，他成为将军并参与了针对游击队和当地居民的清剿行动。[①] 因此，对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进行清洗，如果说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能力，那也是向加强的方向影响。

最高指挥员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战前，欧洲国家的情报部门和外交官就已熟知红军上层指挥官分裂的情况。例如，苏联大使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一次谈话后报告说，贝奈斯正确地判断了苏联的情况，他不认为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普特纳等人是间谍，但也不怀疑他们是阴谋家，目的是要推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人并夺取政权。法国、英国和波兰的情报组织都掌握类似的情报。我只想说，1936 年，法国总理莱昂·布卢姆拒绝与苏联签署军事同盟协议。因为据他掌握的情报，“苏联总参谋部的领导与德国保持着可疑的联系”。他指的是乌博列维奇。这个情报促使斯大林采取回应行动。

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戴维斯在回忆录中写过这段记录：“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认为，1935—1938 年众所周知的背叛和清洗过程是野蛮、忘恩负义、歇斯底里和令人发指的行为。然而，现在明显的是，这证明了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远见卓识……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删除了背叛的元素。”[②]

希特勒进攻苏联几天之后，有人问戴维斯：

——您能谈谈有关俄罗斯第五纵队成员的情况吗？

戴维斯平静地回答说：

——他们那儿现在没有第五纵队，都被枪毙了……[③]

无论是在学术资料还是在其他文献中采用的资料，往往都需要核实，包括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历史学家保罗·卡雷尔（又名施密特）

---

① См.: А. Буровский *Великая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1939 – 1945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10. с. 297 – 298.

② Цит. по кн.: Бушков А. А. *Сталин: ледяной трон. Хроника великого и ужас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М.: 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2010. с. 82 – 83.

③ Тамже.

所做的研究。他这样描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事件："1937 年 3 月，图哈切夫斯基和斯大林的秘密代理人之间的交锋尤其具有戏剧性。反斯大林的政变定于 1937 年 5 月 1 日发动，主要是因为五一阅兵能调动大批部队进入莫斯科而不引起怀疑。或者是偶然，或者是由于斯大林的阴险狡诈，计划推迟了。克里姆林宫宣布，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将率领苏联代表团赴伦敦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于 1937 年 5 月 12 日举行的加冕典礼。图哈切夫斯基把政变推迟了三周，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战前冲击红军全体指挥员的大清洗，其性质并不像对这个话题进行高谈阔论的业余爱好者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当时最先遭迫害的是那些反对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也就是反对斯大林在军队中的支柱的人。

毫无疑问，任何战争中的军事天才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那些认为自己比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库利克等更有才华的人作为军事指挥官和战略家到底有多少天分是另一个问题。在内战中正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伏龙芝等人成了胜利者。而像图哈切夫斯基，没有战胜白军的将领们，只是在镇压喀琅施塔德起义的水兵和坦波夫州、沃罗涅什州和其他州的农民时表现得不亚于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或共产国际的库恩。

图哈切夫斯基的崇拜者、由前者提拔的库兹涅佐夫将军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在担任西北方面军司令时，表现得完全没有能力。当阵地被突破，数万士兵和指挥官牺牲在包围圈中，西北方面军的几十万士兵和军官被俘时，受命接替库兹涅佐夫的天才瓦图京也无力改变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的"鹰派"瞎指挥的结果。

同时，那些不觊觎伏罗希洛夫式和布琼尼式天才的军官们所指挥的军队，也就是图哈切夫斯基所说的"轻骑兵"部队，虽然撤退了，遭受了损失，但这些部队中从未有一个师让德国人包围过……而与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站在一起，逃过了大清洗的库兹涅佐夫所指挥的前线部队，整师整师地陷入包围，而且不止一次。

朱可夫的调离

战后初期，真正觊觎斯大林继承人角色的是苏联元帅、传奇式的人物

---

① Бушков А. А. Сталин: *ледяной трон. Хроника великого и ужас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М.: 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2010. с. 86.

朱可夫和另一位苏联元帅、万能而险恶的贝利亚。其他竞争者中有马林科夫，以及一大群别的领导人，其中包括赫鲁晓夫。

斯大林去世前不久注意到了亟于掌权的贝利亚和野心膨胀的朱可夫。胜利元帅在日常生活中的奢侈行为对斯大林来说非常意外。一切就从科韦利附近的海关发现7节从德国发往莫斯科给朱可夫的车厢开始了。

在有布尔加宁签名的备忘录中报告说，这些车厢里有朱可夫在德国“阿尔宾·马伊”家具厂订购的85箱家具。

在朱可夫的别墅进行了秘密搜查。斯大林得知，那里没有一本苏联出的书，在书橱里却有大量带烫金字封面的、装订很好的纯德语书。

元帅别墅的整个陈设，从家具、地毯、餐具、装饰到窗帘全都不是国产的，而是外国的，主要是德国的。①

在苏联元帅们和胜利元帅的战友们出席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研究了朱可夫案件的材料。身着元帅制服出席会议的还有贝利亚。

朱可夫被指控参与阴谋夺权和非法占有缴获的财产。会议非常激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都发了言。据说是朱可夫骄傲了，既不尊重中央政治局，也不尊重斯大林同志，现在弄清楚了一些新情况，对之必须思考并采取行动。

如果不是苏联元帅瓦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发表了充分有力的讲话，大概，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的情况会很不妙。在批评了朱可夫的各种错误之后，元帅们一致宣布，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过去和现在都绝不是什么阴谋家，没有怂恿过他们任何人从事违法行动。

斯大林脸上的乌云消散了，他走近朱可夫问：

——您本人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朱可夫坚定地回答：

——斯大林同志，我不想找任何借口辩解。我永远忠实地服务于党和我们的国家，我没参与阴谋。

——但朱可夫同志，您还是得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这样比较好……现在敖德萨军区司令员的职位还空着。

——什么时候下令动身？

---

① См.：Кузьмин Н. П. “*Черные тюльпан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оман-хроника.* -М.：Профессионал，2010. с. 30.

——交接工作并即刻动身。这对大家都会比较好，——约瑟夫·维沙里奥诺维奇重复说道。①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开始被发配敖德萨，然后被流放到乌拉尔，这抑制了格·康·朱可夫的政治野心，而他凶狠的敌人贝利亚则成为原子能委员会主任。

1953 年春天之前，苏联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的迹象。但斯大林的死打乱了所有政治力量的计划。

斯大林之死

有很多理由认为，斯大林不是正常死亡。关于贝利亚参与谋杀斯大林的说法占主导地位已经不下 10 年。

贝利亚确实有理由为保障权力和自己的生命担心。但同时有两个问题悬而未决：贝利亚有机会杀死斯大林吗？或者只有他对杀死斯大林感兴趣吗？

显然，在任命伊格纳季耶夫为国家安全部部长、任命科鲁格洛夫为内务部部长之前，这种可能性（如果不注意斯大林和贝利亚关系的性质）还是有的。但在 1953 年 3 月，无论是伊格纳季耶夫还是科鲁格洛夫，都再也不服从全能的贝利亚了。

同时也负责保卫斯大林的伊格纳季耶夫是由马林科夫推荐的。科鲁格洛夫是在贝利亚时期升迁的，但从 1947 年至 1954 年 3 月，担任他第一副手的是赫鲁晓夫的亲信之一——谢罗夫，后者能制止贝利亚的秘密行动计划。因此，如果有关斯大林神秘死亡的说法可信，那么不应在贝利亚的亲信中寻找凶手。

如果猜测，是失去对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控制的贝利亚制订和实施了消灭元首的计划，那么即使是在斯大林去世 50 年后，也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智力极端枯竭的表现。

斯大林死亡的原因，如果研究其暴毙性，想必应该有别的原因。早在二战前夕的 30 年代后半期，斯大林就制定了方针，解除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与其政治组织不符的责任。党保留了自己的宣传作用，展现

---

① См.: В. Успенский. *Тайный советник вождя. Роман-исповедь в 5 томах.* – СПБ: Правда, 2000-2002. Том 2. с. 882 – 883.

制定政治方针、培养和安排领导干部的智力，但工程技术方面的精英和学术精英，以及经济领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之外积蓄了力量。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很清楚了：指挥中心从党务办公室转到了苏维埃机关的、经济和行政部门的办公室。

在苏共历史上，只有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党才真正符合了自己的使命。它在前线和后方都开展了政治工作；共产党员在劳动和战斗中以身作则；党委书记领导了军队和企业的政治机关。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变成了有战斗力的党。几乎有 300 万共产党员牺牲在战场上。

斯大林相信他所采取的决定——在党的机关和其他机关之间根据实际情况划分职能、权力和责任是正确的。二战胜利后，他开始重新分配国家管理体系中的权力。国内开始了“去党化”运动：在 1936 年的“斯大林”宪法中，苏联共产党未被视为领导和指导力量；从 1939 年到 1952 年，违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现行党章，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 1939—1952 年间也极少召开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也就是说，12 年中苏联共产党总共只召开了 7 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丧失了作用。我想说的只是，从 1950 年到 1952 年，它只集中了 15 次。

以斯大林为主席的苏联部长会议逐渐成为全部生活的中心。

1952 年 10 月 5—14 日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没有改变力量格局，随后召开的全会更大地限制了苏共的领导活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被取消了；出现了 10 位苏共中央书记，其中既无总书记，也没有第一书记；代替政治局出现了苏共中央主席团，25 位成员中只有 9 人是党务工作者。斯大林亲自宣布，他将不长期担任苏共中央书记，打算集中全力履行部长会议主席的责任。

如果认真研究斯大林离奇死亡的说法，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会消灭他，那些斯大林打算剥夺其权力、荣誉、特权的人：党务领导人。在战争期间，他们的作用无足轻重。过去没有把胜利归功于舰队军事委员会成员或军队政治部门的负责人的军事天才。后来，随着崇拜逐渐形成，他们将被赋予辉煌的军事才能。只对权力病态般珍惜的人，不可能自愿放弃权力。被斯大林提拔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人（马雷舍夫、科罗琴科、库兹涅佐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波诺马连科等）不具备权力斗争的经验，在他死后都被击败了。

曾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人，在斯大林的葬礼上满怀悲痛和哀伤。只有赫鲁晓夫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在与领袖告别时放声痛哭。但对他在葬礼上的心境可以有两种解释：花圈和窗帘上的带子既可因悲伤，也会因喜悦而颤抖。我把话说在前面："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面前感受到的动物般的恐惧被激起的仇恨取代了。"在将斯大林的遗体移出陵墓之前，他下令摘掉斯大林胸前的胜利勋章，剪掉肩章和纽扣。在克里姆林宫城墙旁埋葬了大元帅的军官们，没有动手这样做。赫鲁晓夫大怒。指挥军官们的上校科涅夫因此未能当上将军……

赫鲁晓夫上台

斯大林的死开启了苏联进一步发展的两种方案：（1）在进一步限制苏联共产党干涉解决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实现管理体制现代化，弱化思想专政，提高社会经济主要成分的作用并加强科技知识分子在国内生活中的作用；（2）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活动领域恢复并加强党的官僚统治。

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国家未来发展模式的这两种代表都有。

无论这显得有多么奇怪，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是改革的拥护者。贝利亚什么也没做成。权力斗争对他而言突然以悲剧结束。马林科夫的命运虽然悲惨，但不是悲剧。

逮捕贝利亚之后，马林科夫有了某种实现自我及其思想的空间。1953 年 8 月 8 日，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在受到热烈政治颂扬的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把"大幅加强对居民食品和工业品的保障——肉、鱼、黄油、糖、糖果点心、服装、鞋类、家居用品、家具"确定为迫切的任务。苏联部长会议取消了对农民个体经济的税收，允许将自家院落的田地增加 4 倍。马林科夫的社会计划包括逐步增加退休金，降低零售价格，打算增建 30% 的学校、40% 的幼儿园和托儿所、60% 的医院。

马林科夫在不放弃计划经济发展的同时，认为计划不应是指示性的，而应是预测性的。

为了制定社会经济改革的方案，马林科夫责成院士克日扎诺夫斯基组成一支学者和专家队伍，起草一份关于国家发展前景的详细报告。在 3 个月的时间里，该报告阐述并评论了酝酿成熟的变革，设想有可能在共产主

义学说的框架内建立一个人道、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马林科夫未能实现下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执政不到两年。赫鲁晓夫在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帮助下搞掉了马林科夫。但在1957年6月，赫鲁晓夫本人也处于危险的境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多数人投票赞成中央委员会解除赫鲁晓夫共产党领导人的职务（投票赞成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谢皮洛夫，以及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国防部长朱可夫，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苏共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卡皮塔诺夫和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福尔采娃的支持挽救了赫鲁晓夫。①

赫鲁晓夫的回应是——在1957年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粉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加入他们的谢皮洛夫组成的反党集团。该集团还包括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这几个人一开始“只受到”较轻的处罚（伏罗希洛夫在1960年前仍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别尔乌辛从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但实际上不再参加其会议；萨布罗夫被贬为中央委员会普通委员）。后来也对他们进行了惩罚，尤其是布尔加宁被取消了元帅的称号。

在消灭贝利亚和抬高赫鲁晓夫的地位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朱可夫。但他也成了阴谋的牺牲品，失去了自己苏联国防部长的职位。

最终，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赫鲁晓夫的手中，这是个骑墙于先进经济干部和党政官僚之间的人。赫鲁晓夫的特点是，他从二者中吸取了最坏的东西：他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只是猜想到变革是必需的。做什么和怎么做，他都不知道，只能借助党的鞭子和意识形态的狂喊乱叫来实现其政治上的突发奇想。

60年代的苏联社会

“60年代的人”骄傲地把自己称为“解冻的孩子和创造者”，他们将赫鲁晓夫奉为自己的思想之父。对于我们这些6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全都是偶像，其中包括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主义的罪行，释放了几十万名集中营的囚犯。

---

① См.：В. Малинкович. *Три революции и дв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Этюды на темы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ИГПИ，2008. с. 142.

开始给农民发放护照。他实行了“化学化”，他当政时奠定了成功开发宇宙和发展高科技的基础。

此外，共产主义的宿舍不再是“几家合住一套住房”，取而代之的是小型公寓，后者为家庭的独居和安排个人生活创造了条件……产假从 70 天增加到 112 天，这强化了孕产制度，提高了出生率。退休金与平均工资相等，这种退休金保障水平迄今仍是最高纪录。这种比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丧失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被遗忘了，对新俄罗斯的退休者来说已是遥不可及。

也不能抹杀一些经济成就。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 年）中，国民收入增加了 54%，工业总产值增长 64%，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38%。7 年间（1959—1965 年）国民收入与 1955 年相比增加了 1.1 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增加了 29 倍。仅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151%。与 1950 年相比，到 1960 年电力生产提高了 2.3 倍。从 1956 年到 1960 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一半。建材，特别是水泥生产增加了几倍；机床生产几乎增长 2 倍。对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和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来说，最典型的是经济领域结构的快速变化。在赫鲁晓夫时期电子计算技术、仪器仪表、化工、航空航天和汽车制造等现代工业发展尤为迅猛，掌握了生产稀有金属的新能力，彻底改造了整个铁路系统。

但变化最大的是农业。粮食产量显著提高。1949—1953 年，每公顷平均产量为 7.7 公担粮食（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相同），1964 年达到 11.5 公担。牛的数量明显增加。

人们的生活逐步改善了，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早在 1953 年 8 月，从每个农户征收的农业税就降低了一半。实物税取代了现金，对余粮的收购价格也提高了。农民的宅基地摆脱了沉重的税收负担。赦免了集体农庄会员先前的税收债务。1954 年再次调低了宅基地税，取消了对牛和猪的税。这些牲畜的头数立即大幅提高。[①]

在赫鲁晓夫时期（尽管比预期的程度要低），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增加

---

① См.: В. Малинкович. *Три революции и дв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Этюды на темы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ИГПИ, 2008. с. 143 – 145.

了。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到 40 小时。废除了指定工人生产、因迟到而解雇工人的斯大林法律，通过了退休金法，确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老百姓消费的肉类增加了 20%，牛奶增加了 25%，黄油和油脂增加了 30%，蛋增加了 70%。每千人拥有的医生和病床数量增加了 1 倍。道路网增加了，城市和城际交通改善了。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通常被称为“住房问题”的领域。赫鲁晓夫关于在寿命为几十年的新楼中建造小型公寓的思想得以实现，直接改变了数百万名城市居民的生活。因为在斯大林时期，住房建设落后于城市化进程，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持续下降（从 1928 年的 6 平方米降到 1940 年的 4.5 平方米）。大量的城市居民当时蜗居在城郊的简易住房或集体宿舍里（“38 个房间共用一个厕所”——维索茨基）。当然，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没能彻底解决住房问题，但在那 10 年里，数百万的城市家庭能够分到自己的房子并过上了全新的生活。人们曾经多么嘲笑赫鲁晓夫式的住房呀，据说厕所连着浴室，天花板连着地板。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而在当时，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家庭的幸福。①

但也有另外的情况。

“所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为先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作了补充。在赫鲁晓夫之前，共产主义与苏维埃政权和全国电气化联系在一起。在赫鲁晓夫时期，是玉米、化学化和土壤改良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钻研苏共的纲领并记住题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准则》这篇文章进入了日常的生活。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执政给国家的进步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奥西波夫院士在其著作中列出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负面的结果。它们是：

古巴导弹危机，在其背景下出现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危险；

血腥镇压柏林和匈牙利的武装起义；

枪杀游行示威的苏联公民（1956 年用坦克和机枪镇压举行反赫鲁晓夫示威游行的第比利斯居民；1961 年在新切尔卡斯克枪杀大人和孩子……）；

搞垮农工联合体（“只有成为超级天才，才能让俄罗斯人没面包可

① См.: В. Малинкович. *Три революции и дв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Этюды на темы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ИГПИ, 2008. с. 145 – 146.

吃”——丘吉尔）；

取消坦克集团军（“坦克——这是铁罐头”）；

撤销舰队（“战舰——这是漂浮的棺材”）；

反文化运动（加强新闻检查，批判电影、美术和文学作品，许多杰出的文化活动家被排斥在创作过程之外）；

传播侵略性的无神论，摧毁教堂（“我会在电视里向你们展示最后一位教皇”）；

破坏副业和宅院经济；

将克里米亚非法转让给乌克兰；

为被清洗的人恢复名誉，不考虑其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附敌行为；

破坏与中国的正常关系；

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的粗暴政治压迫；

没有足够的证据就为事实上的刑事犯平反；

在对居民有害的原始技术基础上实行国家化学化；

崇拜玉米（它甚至被阿谀奉承的伪科学家宣布为耐寒作物）；

意识形态恐怖主义，打击创造性的知识分子；

觊觎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因个人原因搞迫害和复仇（针对斯大林和他的很多战友）；

无任何根据地诋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统帅们；

反对所谓的建筑上的多余装饰（赫鲁晓夫式预制板房建设后几十年，造成了更多的城市建筑问题）；

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恢复与破产；

试图撤销科学院（1964 年 5 月 11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的讲台上大放厥词：“我们将解散科学院，因为我们不需要科学院，因为科学应当在生产部门。”[①]）谢天谢地，他没来得及：到 1964 年 10 月只剩下 4 个多月；

建立双重的州委会组织（工业的和农业的）；

---

① См.: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747. Л. 1 – 22. Подлинник. Машинопись.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1964: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 МФД: Материк, 2007. с. 52 – 61.

依据罪犯实施犯罪后通过的法律处罚刑事犯（法律的回溯效力）；

“恢复”党的生活的伪列宁主义规范；

共产主义建设的乌托邦方案；

言行不一；

按个人动机挑选和补充党的机关人员；

大规模酗酒；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恶化（“我们将埋葬你们”）；

大众消费食品短缺加剧；

取消居住在环境艰苦地区的优惠条件（北方、远东等）；

党和国家的权贵阶层拥有不应有的特权；

挑唆和支持反对以色列的战争；

撒谎和篡改历史；

将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思想家与组织者”）；

泄露科技秘密；

在社会科学中灌输教条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32条必然准则等）；

可能导致与西方战争的柏林危机等。[①]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其权威领导人——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的无理批评造成了长久的消极影响。

赫鲁晓夫的子女

尼·谢·赫鲁晓夫是一个报复心重且残忍的人。他既不原谅自己在斯大林身边的丑角地位，也不原谅自己儿子的死。

回想一下：中尉雅科夫·约瑟夫维奇·朱加什维利被俘后，表现出应有的尊严。他断然拒绝与纳粹合作而被枪决。斯大林本人压抑住父亲的情感，否决了用德国元帅保卢斯交换朱加什维利的提议。他知道，希特勒将为自己的军事长官安排一个怎样的表现过程并会带来什么后果。后果很明显：希特勒将打消自己的军官和将军们对于投降的兴趣。

一般来说，把斯大林的儿子们与他身边人的孩子们相比较一直是引人

---

① См.：Осипов Г. В. *Летопись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Год* 1989. -М.：Вече，2007. с. 13 – 16.

注目的，并在回忆录、文学作品、学术政论作品和定期出版物中有所记载。

乌斯宾斯基讲述了一个和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的生活方式有关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高官的孩子们想出了一种娱乐方式：业余时间就在军官的宾馆进行狂欢活动，畅饮之后把苹果或酒瓶放在自己的酒友或女伴头上，比赛枪法。在一次这样的消遣时，小赫鲁晓夫打中的不是苹果，而是自己那半裸女伴的额头。

法庭表现出令人惊奇的人道：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只是被降职并派往前线。抱怨父亲、政权、法院和世上所有人的小赫鲁晓夫一有机会就投降了。很快他出现在敌人的战壕里，用扩音器说服苏联的士兵们以他为榜样。

因此，乌斯宾斯基这样写道："一种荒谬的情形：父亲是乌克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前线军事委员会成员，组织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教育和激励人们；而他的儿子却通过广播、传单和报纸呼吁所有人唾弃党和苏维埃政权，并与希特勒分子合作。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也被俘了，但他没有背叛，不为法西斯分子做宣传，没有带来危害。因为他的家庭，德国人把他深锁在德国国内某个地方。而小赫鲁晓夫巡回在前线，在麦克风前大声喊叫，往士兵们的心里灌输怀疑和动摇。要知道这不是随便什么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①

一组游击队员接到有关任务后，深入到被占领城市，在短暂的交火之后，抓住了小赫鲁晓夫，他被活捉时几乎完全无损，除了一点擦伤和碰伤。他为罪孽接受惩罚的时候到了。叛徒本应交给游击队法庭审判。但赫鲁晓夫干预了此事。他在被派到莫斯科参加一个会议时，请求斯大林把儿子从德国后方救出来由普通的军事法庭审判。当然，这就有了某种保全自己儿子性命的机会。

赫鲁晓夫拼命请求，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没有马上答复。他下令询问游击队是否有用飞机把小赫鲁晓夫运到非敌占区的可能性。回答很坚决：游击队说，抓捕叛徒时牺牲了几位战友。需要做大手术的伤员都无法运送，何况让飞行员冒险驾机来接叛徒。游击队没

① См.：В. Успенский. *Тайный советник вождя. Роман-исповедь в 5 томах.* -СПБ：Правда，2000-2002. Том 2. с. 319－321.

有同意这样做。

“他们是对的，”斯大林说，“让他们自己判断吧。他们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吧。”①

要判断赫鲁晓夫传记中的哪些内容可信是很困难的，但很多作者都以乌斯宾斯基的基调来写。② 大量快速的复职任命成为对这一指责浪潮的回应。③ 我举飞行员米高扬的回忆录为例，其中有涉及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回忆，说他 1941 年在古比雪夫陆军医院认识的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是一位善良的好同志。后来在莫斯科的时候，米高扬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朋友那里得知不幸的消息：1941 年秋在古比雪夫发生了悲剧。一位从前线回来的水手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一伙人玩。当所有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时，有人说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是一位神枪手。这位水手打赌，提议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用手枪击碎他头上的瓶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多次拒绝，后来还是开枪打碎了瓶颈。水手认为这还不够，说必须打碎瓶身。列昂尼德再开一枪，打中了水手的头。列昂尼德被判处 8 年有期徒刑并到前线服役（战争期间军人有这种服刑的方式）。

米高扬的另一位熟人、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最后一次空战的参加者——伊万·茹克讲述了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死。1943 年 3 月 11 日，他看见列昂尼德·赫鲁晓夫被德国的“银狐”飞机击落。

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不相信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没有牺牲，而是被俘且表现不好的消息。

---

① См.：В. Успенский. *Тайный советник вождя. Роман-исповедь в 5 томах.* -СПБ：Правда，2000-2002. Том 2. с. 319－321.

② См.：Серго Берия《*Мой отец-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1994）；Дмитрий Язов《*Удары судьбы*》（2000）；Феликс Чуев《*Молотов：Полудержавный властелин*》（2000）；Елена Прудникова《*Сталин：второе убийство*》（2003）；Владимир Карпов《*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2004）；Н. Зенькович（он же Хотимский）《*Тайны ушедшего века：лже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фальсификация，компромат*》（2004）；и др. Статьи：Евгений Жирнов《Советский принц》（*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25. 11. 94）；Николай Хотимский《Отцовская месть》（*Вечерняя Москва* 4. 01. 95）；《Сын Хрущёва расстрелян за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26. 01. 96）；Вадим Удилов《За что Хрущёв отомстил Сталину》（*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7. 02. 98）；Н. Нада《Предатель или герой?》（*Версия*，20－26. 06；1－7. 08. 00）и др.

③ См.：Хрущёва Н. Презумкция невиновности Леонида Хрущёва. Н. Окопов-2004-№ 31（2. 08. 04）；Бондаренков. Рада Хрущёва об отце и семейный тайнахII. *Ведомость*-15. 11. 2003；Последний полёт Леонида Хрущёва II. *Труд*-14 августа 1991г.；Сухомлинов А. *Без вести пропавший.* -：http：//www. sovsekretno. ru/magazines/article/461.

因此，关于射击的版本已被证实。米高扬还写道，有几个姑娘参加了酒会，但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开枪射击的瓶子是放在水手头上的。[①] 关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成为德国俘虏，与德国人积极合作，被斯大林下令抓捕、审判并枪决的情况，可以在很多文件中找到。[②]

还有另一些关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失踪的说法。其中乌基洛夫版本最广为人知，他声称列昂尼德·赫鲁晓夫自愿叛逃到德国人一边并与他们合作。后来，似乎是应斯大林的要求，他被“锄奸部”的特别小组暗中抓捕并在莫斯科被枪决。另一种猜测是——在斯大林知情的情况下，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因别的罪行被判处极刑，其中细节尚不清楚。乌基洛夫推测，这里隐藏着尼基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怀有病态仇恨的秘密。

很多作者把细节的差异归因于在赫鲁晓夫政治独裁时代，涉及其家庭成员的所有档案材料都被彻底清查，进行过一丝一毫都不放过的清查。

全部家庭成员在刑事法庭上都是清白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或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罪证都没有。只能根据一些知道或听到点什么的人所回忆的情况审判他们。而这创造了利用争议开始为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平反的良好基础。首先是赫鲁晓夫自己试图这样做。他要求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授予“失踪”的长子列昂尼德·尼基塔耶维奇·赫鲁晓夫苏联英雄的称号。

不难想象朱可夫的反应。赫鲁晓夫的回应也不难理解。在这一事件之后，马林诺夫斯基很快成为苏联国防部长。

赫鲁晓夫无法给予自己长子列昂尼德的一切，小儿子谢尔盖·尼基塔耶维奇·赫鲁晓夫都得到了。

谢尔盖·赫鲁晓夫 1935 年 7 月 2 日生于莫斯科。1952 年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 110 中学毕业，1958 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成为一名动力真空技术和专业仪器制造方面的专家。

他在切洛别领导的实验设计局工作了 10 年（1958—1968 年），当过室副主任，曾参与研制巡航和弹道导弹、制造飞船着陆系统以及“质子”运载火箭的研发。24 岁荣获“列宁奖金”（1959 年），27 岁时以匿名方

---

① См.：Микоян С. А. *Мы-дети войны：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лётчика испытателя.* -М.：Яуза Эксмо，2006. -Гл. 6.

② См.：Смыслов О. С.《*Пятая колонна*》*Гитлера. От Кутепова до Власова.* -М.：Вече，2004г. -Гл. 6.

式成为技术科学博士（1962 年），28 岁时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3 年）。直到 1991 年前，还曾担任电控机械研究所副所长、“电动机械”科学生产联合企业的副总经理，从事计算机和编程工作。

1991 年后，他以美国公民身份长期居住在美国，在布朗大学国际研究所任教。

谢尔盖·赫鲁晓夫现在已经不是导弹技术方面的专家了，而是“冷战”史的诠释者，歌颂其父对世界文明民主成就的贡献。

赫鲁晓夫在位 10 年，3 次荣获“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在授予自己及其家庭成员称号和奖励数量方面成为苏联的冠军，并为进一步抹黑国家的奖励政策奠定了基础。

在赫鲁晓夫揭露个人崇拜的功绩和他本人是如何参与大清洗的这二者之间也存在出入。赫鲁晓夫与别的刽子手没什么不同。他下令彻底“删除”档案，因此很难估算在大清洗和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因赫鲁晓夫而丧生的人数，以及在和平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下令在第比利斯和新切尔斯克枪杀的人数。

苏联为尼·谢·赫鲁晓夫的即兴政治付出了很大代价。问题不仅在于把克里米亚送给苏维埃乌克兰，他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国外的行为也很古怪。

赫鲁晓夫着手在伊拉克建设 600 公里铁路，也就是在别的国家建造全苏联 1 年修筑的铁路数量。巨额资金投放到埃及，花费到古巴。在印度尼西亚，赫鲁晓夫为喜欢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苏加诺同志建造了大型的体育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比巨额的国防开支更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经济。

赫鲁晓夫在所有方面都表现为一个职务上的国务活动家和市侩生活中的俗人。这种反差以两种颜色表现在赫鲁晓夫的墓碑上——白色和黑色……

我认为，我国著名学者罗曼诺夫说得很对，戈尔巴乔夫和鲍·尼·叶利钦只是拆完了“……因赫鲁晓夫已经下沉的苏联地基……”①。

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开始，启动了苏联政治体制退化的机制，党的干部在政治道德上没落，人民对选定的国家发展方式普遍感到

---

① Романов П. В. *Преемники. От Ивана Ⅲ до Д. А. Медведева.* -СПб. : Амфора, 2008. с. 291.

失望。

这帮人没有抓住自己的机会。

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等温和的保守政治家取而代之。其中，柯西金表现出一位杰出经济领导人的高超专业水平和非凡的才能。

勃列日涅夫与所谓“停滞年代”

实际而有效的改革典型例子是与柯西金有关的国家经济现代化。

西方把 60 年代的改革称为利别尔曼改革。叶夫谢伊·格里高利耶维奇·利别尔曼教授在哈尔科夫的一些机器制造企业进行了几年的研究和试验。1962 年 9 月 7 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计划·利润·奖金》。

这篇文章的全部思想得到了涅姆钦诺夫和斯特鲁米林两位院士的支持。①

柯西金改革

60 年代中期，在以柯西金为领导的专家们的努力下，启动了以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为导向，采用劳动生产力、价格和利润等市场工具的经济改革。

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65 年）确定了经济现代化的政治方针。随后公布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完善计划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激励》的决议（1965 年 10 月 4 日）。

从广义上讲，柯西金的改革规定五个方面的彻底改变：

完善工业计划并扩大企业的经济自主权；

强化对企业的经济激励并加强经济核算；

确定工人在提高企业业绩中的物质利益；

提高信贷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提高工业产品的批发价格。

柯西金的改革不仅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科学论证的，而且具有现实性和重要性。所有的措施预计分步实施：仅 43 家轻工企业和食品行业改用新

---

① Замостьянов А. А. *Сталинская гвардия. Наследники Вождя*.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10. с. 43.

的管理体制，到1965年年底之前，所有部门应当制订出组织活动的计划；1966年间应当仅有个别领域触及这些措施。1967—1968年考虑将改革充分而广泛地推广到国民经济中。

大部分计划都得以实现了：1967年，国营农场开始向经济核算过渡，1969年在运输领域采用新的奖励形式，社会文化领域开始迅速发展。

无疑，柯西金的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总进程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第八个五年计划中显现出成果，是国家整个战后历史的最好水平。

这是一个发展的时代，也是实际应用科学，创新解决经济、金融和经济问题的时代。

国民经济的效率体现在几个方面：工业和农业生产增加了，积极开展了住房和社会文化建设，建造了核电厂、热电厂和水力发电厂，开发出了新的、最丰富的矿区。

苏联的科学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现状博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羡慕和钦佩……

但维护政治权力的斗争逐渐把经济问题推到次要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柯西金的改革在政治阴谋的海洋中终止了。

70年代的苏联社会

1976年2月，有人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这些话："天空越纯净，就能飞得越高，翅膀将获得更多的力量。当人们全身心地奔向高处，飞向纯净的天空，追求共产主义的光辉顶点时，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与他光荣的战友们和我们全党，在我们头顶上创造了一片万里无云的纯净天空，营造出一种氛围。"

这些话是时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谢瓦尔德纳泽说的。也许他说得很诚恳，不仅仅表现为东方式的欣快，这也是有理由的。从1969年到1978年是苏联社会经济史上最有成效的时期。正是在这时候创造出一种潜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发达社会主义"学说。

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一些有名气但令人反感的人所作的评价与谢瓦尔德纳泽的说法完全相反。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说："勃列日涅夫在人们的记忆中将是一个软弱平庸的人，不知为什么他履行了国家首脑、最高统帅和唯一政党领袖的职责。对他没有尊重或仇恨、崇拜或不容忍的感觉。"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说："很难把他称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罗伊·麦德维杰夫："……他是一个如此平常的人和如此平庸的政治家，不能指望他有长久的政治生活。"

费多尔·布尔拉茨基说得最重，他甚至直接给勃列日涅夫起了个外号——"一根空橡皮管"。①

而统计资料与这一切完全不相符合。

在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国民收入增加 41%，工业生产增长 50%，农业增长 21%，投资增加 43%，工资增加 26%，营业额增长 48%。

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 年）国民收入增加 28%，工业生产增长 43%，农业增长 13%，投资增加 40%，居民实际收入增加 24%，劳动生产率增长 25%。

从 1928 年国家经济恢复到 1913 年的水平开始，到 1978 年之前发生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惊人变化（见表 6）。

表 6　　最重要产品的产量②

名称	年份		
	1928	1932	1977
电力（百万千瓦/小时）	5007	13540	1150074
钢（千吨）	4251	5927	146678
石油（千吨）	11625	21414	545799
水泥（千吨）	1850	3478	127056
金属削切设备（千件）	2.1	20.8	292.4
矿物肥料（千吨）	135	921	96752
皮革鞋类（百万双）	58	86.9	736

50 年中，主要的经济指标上升了：电力生产增长近 230 倍，石油增长 47 倍，钢增长 34.5 倍，水泥增长 69 倍，金属加工设备增长 139 倍，

① Хинштейн А. Е. *Сказка о потерянном времени. Почему Брежнев не смог стать Путиным.* -М.：ЗАО《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2011. -с. 20.

② См.：*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справочники за указанные годы.*

皮革鞋类增长 12.7 倍。

在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 年）国民收入增加 21%，工业总产值增长 24%，农业增长 9%，投资增长 29%，劳动生产率提高 18%。

在“十一五”期间（1981—1985 年），国民收入增加 16.5%，工业生产增长 20%，农业增长 11%，劳动生产率增长 16%，投资增长 17%。

1966—1985 年，苏联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下：国民收入增长 2.8 倍，工业总产值增加 3.3 倍，农业增长 0.8 倍，投资增加 3.1 倍，生产的主要资产增加 5.8 倍，实际收入增加 1.6 倍，外贸额增加 3.7 倍，国民消费品生产增加近 2 倍。

1961—1990 年经济发展年增长速度见表 7。

表 7　　1961—1990 年经济发展年增长速度　　单位：%

年份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8
国民收入	66.5	77.8	55.7	44.3	33.6	22.4
工业	88.6	88.5	77.4	44.4	33.7	22.5
农业	22.3	33.8	22.3	11.7	11.4	11.9
投资	55.4	77.3	66.7	33.7	33.7	66.1

苏联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资料对产业发展的分析进行了适当的补充。

1950 年，苏联和 45 个国家建立了对外经济关系，到 80 年代已经和全球 145 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1986 年，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占外贸总额的 67%。

表 8 提供了苏联 1940—1986 年外贸成交额的数据。

表 8　　苏联 1940—1986 年的外贸成交额　　单位：百万卢布

年份	外贸额	包括	
		出口	进口
1940	485	240	245
1950	2925	1015	1310
1960	10073	5007	5066
1970	22079	11250	10559

续表

年份	外贸额	包括	
		出口	进口
1980	94097	49634	44463
1985	142093	72664	69429
1986	130934	68347	62587

从所列数据可以推出，在这 40 年间，无论是苏联的进口量，还是出口量都增加了，与世界各国的贸易额也增长了。同时，在 20 年里，也就是从 1940 年到 1960 年，苏联的进口高于出口。

60 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到 1986 年（含 1986 年）出口交易开始占优势。

为进行详细分析可以把这些汇总的有关苏联进出口的最终资料分割成它们原始的组成部分。表 9 显示了苏联出口的特点。

表 9　　**苏联工业产值中出口的份额**

产品种类	年份			
	1960	1970	1980	1986
金属切割车床	4.6	7.2	7.8	6.4
锻压设备	3.5	4.6	3.6	2.8
轧制设备	31.0	42.9	26.1	12.0
食品业设备	0.4	12.9	14.6	6.7
纺织业设备	5.1	7.9	24.1	12.6
化工设备	7.0	17.3	7.7	6.4
木材和造纸业设备	3.2	13.6	34.5	28.6
拖拉机	8.0	6.7	11.4	6.9
石油	12.1	18.9	19.7	21.1
燃气	0.5	1.7	12.5	11.5
铁矿石	14.3	18.3	15.6	14.4
煤炭	3.3	5.1	1.6	5.7

注：用百分比表示按价值计算的总产量。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组成部分在国内工业更直观的行业剖析中是什么，也就是确定一下，苏联制造的哪些产品（以实物或价值计算）卖到了国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提出两年的数据——1960 年和 1986 年（见表 10）。

表 10　　苏联 1960 年和 1986 年的产品出口

（鉴于 1961 年的货币改值，确立货币单位之间的关系为 10∶1）

产品种类	年份	
	1960	1986
金属切割车床（千个）	2.1	9.1
锻压设备（百万卢布）	4.7	41.7
电力设备（百万卢布）	22.9	1260.0
电气设备（百万卢布）	14.8	185.0
食品工业设备（百万卢布）	1.3	86.9
纺织工业设备（百万卢布）	8.7	141.0
化工设备（百万卢布）	5.3	124.0
木材和造纸工业设备（百万卢布）	0.7	50.2
拖拉机（千台）	18.9	39.1
电力（十亿千瓦/小时）	0	30.2
石油（百万吨）	17.8	130.0
燃气（十亿立方米）	0.2	79.2
铁矿石（百万吨）	15.2	36.0
煤炭（百万吨）	12.3	33.5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所有产品的出口都大幅增长，同时按总量来看，增加了数十倍。比如，电力设备出口增加了 54 倍，化工设备出口增加了 19 倍，等等。

而且，如前所述，苏联贸易顺差时，进口几乎占国家外贸总额的一半。

在苏联的整个进口结构中，购买机械、设备和车辆在 1950 年占 22.4%，而 1985 年占 37.1%。就机械制造而言，看上去是这样。国内消费这些进口产品的份额在 1960 年和 1985 年的构成如下（以该产品在国内

总消费量的百分比计算）：金属切割机床为 4.9% 和 7.8%；锻压设备为 7.0% 和 3.6%；轧制设备为 21.6% 和 27.1%。

专家们知道，1980 年苏联的电力生产和消费与 1940 年相比增加了 25.8 倍，而在美国，同一时期电厂的生产只增加了 12.67 倍。正如我们看到的，不仅赶上了，而且能超越。

1960 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只占美国的 55%；20 年后，1980 年，超过了 80%。

到 1980 年，苏联的工农业产量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①

发展达到的水平允许创建可观的国产商品的内部市场。

工资和当时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创造了足够高的社会福利水平。

1 公斤糖卖 94—97 戈比，1 升牛奶卖 28 戈比，肉类卖 1.1—2.2 卢布，盐卖 7 戈比，一盒火柴卖 1 戈比，煮香肠卖 2.2—2.8 卢布。1 公斤谷物类卖 15—25 戈比，面粉卖 22 戈比，1 公斤鱼卖 36 戈比（鳕鱼和比目鱼）到 90 戈比（银鳕鱼和鲤鱼），1 升植物油卖 96 戈比，黄油卖 3 卢布 60 戈比，人造黄油卖 1 卢布 60 戈比，10 个鸡蛋卖 90 戈比（食用鸡蛋）到 1 卢布 30 戈比（易消化的鸡蛋）。核桃仁大蛋糕卖 2 卢布 19 戈比，“布拉格”蛋糕卖 3 卢布。

食堂的午餐在 25—30 戈比到 75—90 戈比之间。学校的早餐 1 份 16 戈比，午餐 1 份 26 戈比，白面包 1 个 4 戈比。饭店用餐（不含伏特加）在 1.5—3 卢布之间。

制成品也很便宜。一件男式衬衫 5.6—20 卢布之间，一件男式西服 70—130 卢布。一米面料 30 戈比到 3 卢布，一套工具顶多三四卢布，一把圈椅 15 卢布，六把一套的座椅 70 卢布，沙发 60—80 卢布。一件大衣在 70 卢布到 150 或 250 卢布之间。一件男式夹克在 100—200 卢布之间。②

当然，苏联生产的国民消费品在各方面都逊于进口商品：包装、品种、颜色系列、配件等。国家领导人得在火箭和牛仔裤之间作出选择。火箭取得了胜利。

然而，国家保障了自己居民的一切需要，还出口了很多东西。

---

① См.：Буровский А. М.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Застой》*！-М.：Яуза，Эксмо，2010. с. 166.

② См.：Буровский А. М. Указ. соч. с. 194－195.

1961—1981 年，苏联的出口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增强。机械制造的增加和科技成就的发展使苏联成为一个设备出口大国。在这种出口中占显著地位的是核电站设备、电子计算机、数控机床和对经互会国家的军事技术帮助。

关于苏联的进口，它的增加首先是依靠增加国民消费品的份额，以及提高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外贸活动的作用。

1986 年，苏联对 74 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为建设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提供设备和材料。到 1987 年，它们的数量（已建成和正在建的工程）达到 5050 家，其中 3342 家都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表 11　　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核心指标的年增长率　　单位：%

指　标	年　份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生产的国民收入	7.8	5.7	4.3	3.6
所有经济部门生产的固定资产	8.1	8.7	7.4	6.4
工业生产	8.5	7.4	4.4	3.7
生产资料的生产	8.6	7.8	4.7	3.6
消费品的生产	8.4	6.5	3.8	3.9
农业总产值	3.9	2.5	1.7	1.0
固定资产投入	7.3	6.3	3.5	3.1
投资	7.3	6.7	3.7	3.7
各种运输方式的吞吐量	8.5	6.2	3.6	2.5
各种客运交通	8.5	6.2	3.6	2.5
社会劳动生产率	6.8	4.5	3.3	3.1
国民经济的利润（按可比价格）	15.4	9.9	4.5	6.1
实际人均收入	5.9	4.4	3.4	2.1
国家贸易和合作社贸易的零售额	8.2	6.3	4.4	3.1
外贸成交额（按可比价格）	8.3	7.7	5.3	3.9

由基本指标的动态来看，1965—1985 年的苏联处于有利于国家进行合理改革的状态。

勃列日涅夫评价

到 80 年代中期，也就是 1985 年 3 月前，苏联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能提供所有类型的资源、人力和其他潜力，足以应对时代的一切挑战。[①] 从 1966 年到 1985 年，在这被称为“停滞”时期的 20 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 3 倍，工业生产增加了 4 倍，固定资产增长了 6 倍。苏联的工业为居民提供了所有满足消费需求的产品。国家生产了照相机、电视机、收音机和计算设备、服装、食品等。同时，苏联食品的质量比国外生产和加工的食品好。在出口结构中，石油和天然气约占 15.6%；机床、机械和设备等约占 26%。现在只得梦想这种出口结构：2010 年，俄罗斯超过 60% 的出口是石油、石油产品、天然气等。俄罗斯把出口原材料得到的钱花在购买食品、日用必需品、次需品和其他必需品上。

适逢“改革”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1986—1990 年），应当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时代，却变成大规模灾难后果的先兆。

苏联的经济逐渐变得不能接受集约化和科技进步，它具备了封闭性。落后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型的倾向、疲弱的消费部门扭曲了生产结构，不允许有质量地解决很多社会问题。

农业部门也积累了严重的缺陷，国家继续依赖到国外购买部分粮食。

苏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在国防潜力上与美国持平。军工业是国家的骄傲，它保障了大国地位，但耗费了大量资金、稀缺的资源、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正是在这里集中了优秀的专家，动用了国家的智力、创造力和管理潜力，这无疑影响了“民用”部门的工作效率。

社会文化领域经历着停滞。消费市场不能给居民提供种类齐全和优质的商品。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放缓。

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

企业盈利下降。所有机器的技术状态都不能令人满意：40% 多的机械的磨损程度超过 50%（比较一下：在当代俄罗斯超过 70%）。

在管理体系充斥着不负责任。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纪律涣散。治理国家的渐渐地不再是法律，而是有权解释和使用法律的人们。

---

① См.：Сорокин Г. М.，Володарский Л. М.，Гладков И. А. и др. *Шаги пятилеток*. -М.：Экономика. 1968；*Байбаков Н. К.* Указ. соч. с. 15-21 и др.

随着剩余潜力，包括管理潜力——勃列日涅夫的团队老化和消亡，负面的趋势增强了。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刹车机制”，不能应对科技革命的挑战，阻碍了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勃列日涅夫是苏联具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勃列日涅夫的成就与失败可以首先用他采取的干部政策的特点来解释。

与企图夺权的贝利亚和朱可夫不同，勃列日涅夫主要依靠的不是特殊部门和军队，而是党的机构。布罗夫斯基公正地指出：“勃列日涅夫公然把党的机构带到政权中来。从一开始他就试图加强自己的地位。在苏联共产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在讲‘加强党的领导作用’。”部委和执行委员会成为党机关决议的简单执行者。非党的领导人即使在基层组织中实际上也已完全消失。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国家机关就已经完全由党的机关领导。党的机关实际拥有绝对权力。从1966年开始，勃列日涅夫已经不是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而是总书记了。

选拔、分配和培养党务干部，以及共青团、苏维埃、工会、军队和其他干部——是对勃列日涅夫团队取得成就的主要解释。在他执政时期，达到了与美国的军事平衡；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在赫尔辛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这反映了苏联在世界上的最高权威；在关键的高科技领域，像能源、造船、金属加工、航空航天等，国家开始处于领先的地位；他执政期间建造了160亿平方米的住房，也就是苏联1980年拥有的几乎整个住房总量的一半。1.6亿多人无偿分到了新公寓。统计史反映了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积极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创建了强大的石油天然气行业、有色冶金工业和大规模的肥料生产。国防综合体得到进一步发展。今天的俄罗斯以之生存并能追求世界应有地位的一切都在发展。

苏联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因此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1》和《限制战略武器协定-2》，以最低调的方式处理了印度达曼地区的军事行动后果，恢复了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苏联支持下的北越使美国遭受了惨败。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对社会主义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推广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0年，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了，但直到“改革”开始前的增长速度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来说也是望尘莫及，与叶利钦的继任者们的工作

成果相比，增长速度仍然更高一些。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新俄罗斯的经济水平不及勃列日涅夫的“停滞”经济水平的一半。

也有另外一些后果：党的机构腐化；所号召的事物与日常行为相左；虚伪、奴性、酗酒和放荡。勃列日涅夫时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形成了一个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领袖的社会。

形成这个的原因不在于人的意识反常，而在于压制个性，忽视其利益、权利和自由。这些禁锢又与政治头面人物，那些被认为是不仅失去了理智、荣誉和良心，而且丧失基本本能的、教条的老人群体联系在一起，包括让他们在能出成果的政治年龄继续卓有成效地工作。让我们回忆一下：斯大林去世那年，政治局成员的平均年龄是 55 岁，赫鲁晓夫去世时是 61 岁，勃列日涅夫去世时已超过 70 岁。这引起的不是基督教徒式的怜悯，而是真正的激起公愤的停滞。

劳动标准和消费程度不匹配成了“刹车机制”的核心，导致劳动与分配方面的关系受腐蚀，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引起类似社会公平这种现象的社会关系发生基础变形。

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苏联人民已经不想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豪了。形形色色的机关工作人员，正所谓是“弄到了”一切。

许多政治迹象表明，勃列日涅夫死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应当由谢尔比茨基担任。

就此卡皮托诺夫曾回忆说，1982 年 10 月列昂尼德·伊里奇邀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指了一下自己的椅子，坚定地说：“一个月后，坐在它上面的将是谢尔比茨基。要基于这一点来处理整个干部问题，问题应当在最近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解决。”接到指令后，苏共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立即着手执行。在此任务范围内，开始在特殊任务车库里为苏共中央新一任总书记准备轿车。

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于 1982 年 11 月 10 日去世。11 月 7 日他出席了红场阅兵，然后前往扎维多沃。11 月 8 日外出打猎，11 月 9 日，他精力充沛而愉快地回到苏共中央委员会。12 点他安排与安德罗波夫会面。大概，安德罗波夫在这次会面时得知：勃列日涅夫计划担任党的名誉主席一职，并推选谢尔比茨基任总书记。之后，列昂尼德·伊里奇去往自己在扎列奇耶（昆采沃）的寂静别墅，看完电视节目《时代》后立刻就寝。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丘尔巴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列昂尼德·

伊里奇睡前服了几片药，早上就发现他死了。

安德罗波夫时代

1982 年 11 月 12 日，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安德罗波夫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任该职的全部时间里，谢尔比茨基一次都没去过他的办公室。[①]

对安德罗波夫政绩的评价褒贬不一，从极端负面的评价到有分寸的颂扬都有。比如，普罗汉诺夫指出，安德罗波夫领导的克格勃掌握了国家权力，战胜了苏联共产党。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苏联和美国开始‘合并侦察’，在其内部产生了一个将社会主义从世界舞台上消除的方案”。安德罗波夫还找到了这一方案的执行者——斯塔夫罗波尔的野心家来代理两家联合的情报部门。[②]

麦德维杰夫支持另一种观点，他本人对安德罗波夫所做的详细研究 2006 年被刊登在《优秀人物生活》的系列中。[③] 这部作品荣获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的奖金，并创造出一位在世代肃反工作人员中享有绝对权威的、理想的军事政治家形象。

安德罗波夫的工作具有矛盾性。在电影院、商场、餐馆和咖啡厅搜捕来出差的人，这种“加强社会主义纪律”的奇特方式造成相当奇怪的印象。这种方式不仅没能加强“社会主义的”纪律，反而动摇了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情。

“由于迄今我们尚未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这些事就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事实上，安德罗波夫的文章开辟了修正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道路，这表现在当年的文学和政论作品中。

安德罗波夫执政时似乎加强了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比如，萨哈罗夫院士去了高尔基城。一次残酷的流放！权威学者失去了与自己的同事合法沟通的机会。他的境遇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同情。那些不顾惜自己的院士都一致拒绝将萨哈罗夫开除出自己的队伍。由于政府本身的努力，萨哈罗

---

① См. : Шутов А. Д. *Россия в жерновах истории.* -М. : Вече, 2008. с. 134 – 135.

② Проханов А. А. КГБ и ГКЧП // *Завтра*, август, 2007, №34 (178) .

③ См. Медведев Р. А. *Андропов.* -М.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6. с. 23.

夫本人变成了抗议行为的象征。社会对维权运动的兴趣加强了，对制度本身的态度变得不那么忠顺了。

萨哈罗夫的妻子博涅尔的能量强化了这种情绪。她自由地行走于苏联各共和国与全世界，不遗余力地描述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和克格勃对苏联核武器及其他武器的天才创造者之一施加的迫害。

韩国飞机事件给世界对苏联的认识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事件情形如下：

1983 年 9 月 1 日至 2 日的凌晨 2：45，苏联的雷达探测到一架美国的 PC－135 侦察机。凌晨 5 点左右，雷达在同一区域又发现一架飞机，其雷达显示与 PC－135 无异。

两架飞机有一阵子平行飞行，后来其中一架穿过苏联领空，飞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勘察加。有关这些飞机的情况首先报告给了安德罗波夫，然后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后者亲自控制局势。“波音”飞机刚一越过苏联边界，一架发现入侵者的截击歼击机便从军用机场起飞了。“波音”飞向了驻有军事基地的萨哈林。在空中迎接它的是三架苏－15 截击歼击机和一架米格－23。没有任何特征显示出，他们面前的是一架民用飞机，舷窗没有亮灯。

地面广播用英语向入侵者发送消息：“你们已经越境。”没有反应。苏－15 飞机的驾驶员收到战斗号令：“开炮警告。”位于入侵者左侧的奥西波维奇连开了几次炮——约 200 发炮弹，是顺着飞机航向发射的穿甲弹和杀伤爆破弹。机上没有曳光炮弹，是按照国防部长的命令这样决定的，目的是为了不暴露开火的飞机。四门炮排放的火焰十分耀眼，即使是在白天。最高射速为 1 分钟 5000 发。火焰更亮了，看不见火光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还是没有任何反应。[①]

苏－15 的飞行员奥西波维奇鸣炮警告后，“波音”没有回应，于是发射了两枚导弹。被击中的飞机开始急剧下降。[②]

飞机上的 269 人全部丧生。其中有 60 名美国人，包括国会议员拉里·麦克唐纳。

---

① Замостьянов А. А. *Сталинская гвардия. Наследники Вождя*.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10. с. 229.

② Тамже., с. 228.

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在海里寻找“波音”的“黑匣子”，但被苏联海军找到了。鉴定显示，“波音”与另一架韩国飞机保持着联系，因此不可能不知道侵入了苏联的领空。①

1993 年夏天，国际民航组织宣布，撤销里根政府提出的对苏联（及其后继者俄罗斯）的指控。过失归咎于韩国飞行员玩忽职守。这一结论是 1988 年由美国的法院作出的。②

然而事件本身，尤其在 1993 年之前，被巧妙地利用了，为的是把苏联说成一个“邪恶帝国”。

应当注意的是，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

> 苏联停止了研制对美国战略计划构成威胁的反卫星武器；
> 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明显缩减；
> 通向西方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加快；
> 1983 年初，所有商品价格大幅上升；
> 伏特加酒降价，并开始被叫做“安德罗波夫卡”③ 等。

把年轻的共青团积极分子提名到党机关的领导岗位任职，这一干部政策带有模棱两可性。同时优先考虑的是明显热衷钻营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是其中之一。

但安德罗波夫不只有一项政绩，如先前认为的，他还有三项重大的人事发现。这三项全都是致命的。

正是安德罗波夫在政治的苍穹中点亮了戈尔巴乔夫之星。

安德罗波夫在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将雅科夫列夫从加拿大召回了莫斯科。同时，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助手，也是以后的继任者克留奇科夫后来说了些什么，克留奇科夫认为，雅科夫列夫戈是尔巴乔夫与“异乡中心”之间的牵线人。④

---

① Замостьянов А. А. *Сталинская гвардия. Наследники Вождя.* -М. : Яуза: Эксмо, 2010. с. 230.

② Тамже. , с. 231.

③ 安德罗波夫卡指 1982—1984 年安德罗波夫任苏共总书记时降价销售的莫斯科牌伏特加酒（译者注）。

④ См. : Шутов А. Д. *Россия в жерновах истории.* -М. : Вече, 2008. с. 127.

叶利钦的升迁也应与安德罗波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情况是这样的：

1975 年，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到苏共中央政治局来建议拆除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伊帕基耶夫的房子。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表现顽固，预先获得了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俄罗斯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保留了下来。神秘的巧合加强了对这所房子的兴趣：罗曼诺夫王朝曾在伊帕基耶夫的教堂、在美好的科斯特罗马城开始，而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生命终止在伊帕基耶夫工程师的房子里。这种神秘为政治解释创造了很多空间，而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毁坏伊帕基耶夫的房子增加了对沙皇一家命运的兴趣，这不符合执政党的利益。

到 1977 年，安德罗波夫才得以实现他的计划，也就是为对抗奠定了基础。新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书记叶利钦顺从地迅速摧毁了伊帕基耶夫的居所。

安德罗波夫很喜欢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果断。担任总书记以后，他指示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去一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看看”叶利钦对调他到莫斯科有什么想法。[①] 尽管调任得以实现已经是在米·谢·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但对苏联致命的人事制度的不良声誉仍归于安德罗波夫。

还有其他一些人事上的变动，但不像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的职位变动这么大。这里说的是卡卢金将军，他在安德罗波夫时代曾担任“K”局（反间谍局）的领导。由于对年轻的将军产生了怀疑，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慈父般地与卡卢金交谈，没有解除后者的职位和职级，而是把他派到了苏联克格勃列宁格勒分局。

直到 2002 年，莫斯科市法院才将卡卢金的行为定性为叛国。[②]

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又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戈尔巴乔夫认识了撒切尔夫人……

尽管政治神秘莫测，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还是不能不考虑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国家就已经需要变革，于是开始模仿积极的政治活动。1983 年年初，在安德罗波夫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分

---

① См. : Полторанин М. Н. *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 Наследие царя Бориса.* -М. :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 2010. с. 414.

② См. : Шутов А. Д. *Россия в жерновах истории.* -М. : Вече, 2008. с. 126 – 127.

析事务的实际状况，查明国家发展速度放缓的原因，揭示主要矛盾，提出如当时所说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革新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纲领。最著名的学者、专家、党与商界的领导人被吸收参与这项工作，包括雷日科夫、多尔吉赫、戈尔巴乔夫。

专家们注意到不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最近三个五年计划中，速度降低了一半），还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征兆，如与其他国家在生产与开发新技术、科技发展、信息技术与产品质量方面的差距增大。商品与服务市场对拥有大量积蓄的居民消费反应疲软。

20 世纪 80 年代，不仅是持不同政见者和苏联问题专家在谈论和阐述彻底改变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而且在国内最著名学者的信息分析材料中，首先是奥西波夫院士的著作中也不止一次地对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刻而详细的分析。在《论苏联社会发展的指标》报告中，奥西波夫特别提请注意苏联的劳动者对其生活的社会条件所持的低满意度。在这方面，以下数据值得注意（见表 12）。

表 12　**苏联劳动者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受访者以百分比计算）**

满意指数	地　区			
	高尔基州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工作	64.1	65.9	70.9	56.3
教育	32.6	37.3	31.8	29.9
物质状况	35.4	35.1	35.6	27.6
住房条件	33.1	42.4	39.7	31.1
居住生活条件	44.4	50.2	49.6	45.5
社会工作	35.3	43.7	36.2	34.1
度过业余时间的方式	41.0	38.7	41.6	35.9
人际关系	65.7	56.7	68.5	61.4
与家庭成员的关系	71.5	77.9	79.5	73.1
健康状况	45.9	42.1	57.9	45.8
整体上的生活	42.9	42.2	49.0	32.5

苏联劳动者对生活的一些方面满意指数低不仅证明了一些客观困难

（如住房条件），而且还证明了部分社会机构职能的相对低效率（如保健）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缺陷。①

同样地，上述数据反映出广大居民已做好进行大规模改革的准备。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国家发展的主要成果与苏联的潜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1985 年 3、4 月份，戈尔巴乔夫公布自己的方针时，“改革”在国内开始了。

这次“改革”旨在解决累积的矛盾，不可能不得到全面的支持：80 年代中期前，无论是在政界的头面人物中，还是在市民中都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也得到了信任，他声称“……改革的实质正是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连在一起，在理论与实践上完全恢复社会主义建设的列宁主义思想……”“……我们全部的改革纲领——在戈尔巴乔夫的一本重要的书中，我们读道，‘为了我们国家和全世界，改革与新思维’——完全基于以下原则：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②

依据戈尔巴乔夫的承诺，改革——“首先是满足人们对完全合格食品的需求，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民众必需商品和所需的高质量服务，实施住房建设方案，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国民教育和文化水平。其中首要的任务是——加大力度保护自然环境，根本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只有用这种办法，我们才可以偿清停滞时期遗留的债务，使我们的经济进入有利于人民的健康发展轨道。”③

在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安慰那些认为“改革”会威胁其世界观的轻信的公民说：“我们改革的某些批评家，强调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令人难受的现象。他们向我们预言了通货膨胀、失业、物价上涨、社会分化加重，也就是西方因之‘富裕’的事物本身。”

---

① Эти и другие записки Г. В. Осипова,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в ЦК КПСС,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в открытой печати. См.: Осипов Г. В. *Социальное 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М., 2000. с. 69.

②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 1987. с. 32, 33.

③ *XIX 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 34.

从表面上看，米·谢·戈尔巴乔夫奔放的思想超过了苏联学者们所达到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水平，这使普通市民为了感悟源自年轻的、接替他半死的老前辈的总书记的政治能量而大大张开了眼睛，并让他在凡人的眼中变得高尚。

但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谁也不怀疑，改革将导致通货膨胀、失业、物价上涨和社会分化加强。苏共中央总书记巧妙地使社会丧失了警惕性。①

戈尔巴乔夫认为，建立一个非社会主义社会是毫无前途的事情。他声称："……我们将走向更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远离它。我们在诚实地谈论这一点，不对自己的人民和外国撒谎。期待我们将开始创造某个另外的非社会主义社会，并将转入另一个阵营，这是无望而不现实的事情……"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项声明中没有社会悲观的迹象。甚至没有暗示社会主义的衰落。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在苏联社会各阶层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假冒游戏名家"就利用了这一点，正如波兰诗人与讽刺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耶日·列茨（1909—1966 年）所说的那样。似乎在 1985 年春天，国家正在进入新的社会关系现代化建设周期，旨在形成政治民主、消除经济垄断、发挥个人主动性、调动劳动积极性。

这些改革应当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为展示个人的精神、创作与道德潜能创造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

同时，为保持居民在前一发展阶段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与人权，国家应起到保护者的作用。但期望没有实现。

一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1981—1985 年），国民生产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 3.6%，1986 年为 4.1%，1987 年只有 2.3%。工业品生产（1986 年为 4.9%，1987 年为 3.8%）与农业生产（1986 年为 5.3%，1987 年为

① См.：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 *Россия при смерти*-М.：Яуза-пресс，2010. с. 435.

② М. С. Горбачев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1988. с. 33.

0.2%）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二十年之后》的纪念报告中的论断——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经济增长率已几乎下滑至零——是不符合实际的。直到改革政策快结束时，它们才变为零的。

可以用国家崩溃的所有指标具有的某种倾向来证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的无能（见表 13）。

表 13　　苏联经济增量　　单位：%

指标	年份	
	1986	1987
国民收入	4.1	2.3
工业产量	4.9	3.8
农业产量	5.3	0.2

表 13 显示，“改革”的负面结果早在 1987 年之前就已经浮出水面。

在谈论用来描述 80 年代前半期苏联经济特点的“停滞”与“落后”时，应当考虑到，它们规定了相对的范畴。从绝对数字来看，1980—1991 年，食品业最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如下（见表 14）。

表 14　　最重要食品的人均产量①

产品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1
砂糖（公斤）	21.6	25.4	24.3	20.9
精制糖（公斤）	6.1	6.7	7.3	6.0
肉（公斤）	32.4	37.1	44.9	39.2
香肠制品（公斤）	12.8	13.5	15.4	14.0
肉类半成品（公斤）	5.2	6.5	7.3	5.9
动物油（公斤）	4.4	5.0	5.6	4.9
全奶制品（用牛奶折算）（公斤）	112	125	141	125
奶酪，脂肪（公斤）	2.4	2.8	3.1	2.7

① См.：*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2.-М., 1992. с. 159.

续表

产品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1
植物油（公斤）	5.9	5.4	7.8	7.8
人造奶油产品（公斤）	5.2	5.7	5.5	4.2
罐头（盒）	43.2	49.2	55.5	46.7
干果（公斤）	12.0	7.5	14.3	7.4
通心粉制品（公斤）	6.6	6.6	7.0	7.5
无醇饮料（升）	12.9	13.1	19.4	15.3
盐（提炼）（公斤）	49.6	42.1	28.4	27.7

这些数据表明，从1980年到1985年，除干果、盐和植物油外，最重要食品的生产是有增长的（按人均算）。虽然增加的速度和总量不明显，但没有发现衰退的迹象。

80年代后半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只有几种产品还保持着80年代初的地位，到1990年，尤其是1991年，衰退取代了萧条和停滞。

总产量下降伴随着并不明显的物价上涨（1980—1985年），然后是很显著的（1985—1990年），后来变成急剧的价格上涨（见表15）。

表15　　全国食品平均零售价格（每公斤以卢布计算）①

产品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1
肉	1.75	1.81	1.90	4.79
香肠制品	2.67	2.72	2.96	9.14
鱼	0.78	0.81	0.93	3.46
动物油	3.44	3.42	3.43	8.39
植物油	1.62	1.61	1.63	3.17
奶酪和干酪	2.41	2.49	2.49	5.36
鸡蛋（10个）	1.04	1.05	1.10	2.27
糖	0.88	0.86	0.91	2.15

① См.：*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2. с. 207.

续表

产品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1
茶	7.25	7.56	8.51	17.66
面包	0.36	0.37	0.35	0.82
面粉	0.36	0.37	0.45	1.29
通心粉制品	0.53	0.54	0.55	1.52
土豆	0.13	0.14	0.28	1.09
蔬菜	0.39	0.40	0.61	1.74
伏特加酒和甜烧酒制品（升）	8.54	10.68	18.61	20.71
白兰地（升）	17.58	21.12	28.52	54.24
啤酒（升）	0.49	0.51	0.58	1.10

在改革的最后一年，大部分食品的价格增加了 2 倍。更引人注目的是，价格是在城市消费合作社的系统内和集体农庄的市场上抬高的（见表 16 和表 17）。

表 16　城市消费合作社中农产品的平均零售价格（每公斤以卢布计算）①

产品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1
肉	3.22	3.56	3.99	10.02
香肠制品	4.82	5.99	7.64	17.81
鱼	1.23	1.40	4.96	8.90
动物油	5.30	6.90	7.20	18.37
植物油	1.72	1.83	2.82	5.87
牛奶和奶制品	0.31	0.38	0.53	1.17
鸡蛋（10 个）	1.10	1.02	1.14	2.86
土豆	0.31	0.32	0.57	1.56
蔬菜	0.74	0.92	1.63	2.98

① См. :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2. -М. , 1992. с. 207.

表 17　集体农庄市场上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每公斤以卢布计算）①

产品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1
肉（包括禽肉）	6.94	6.74	7.86	20.45
鱼		2.24	2.87	7.74
动物油	6.88	8.17	9.69	30.34
植物油	2.53	2.84	4.25	12.24
奶酪	5.42	5.59	8.33	23.00
鸡蛋（10 个）	1.34	1.17	1.60	4.96
土豆	0.48	0.57	0.99	2.68
蔬菜	1.46	1.75	2.80	5.88

在实行“改革”政策的整个时代，在国家经济部门中就业的居民收入（工资、退休金、奖学金等）实际上没有变化。这些收入总量的增长完全不能与价格上涨相比较。然而，公民“停滞时期”的积蓄保持了国内居民的高购买力。

随着食品和非食品的生产总量减少，在保持高需求的情况下，短缺成为消费市场的主要特征。这导致变革之风把商店的商品与食品席卷一空。首先是急需的生活用品与商品，然后是次要的、再次要的等等，纷纷从商店消失。

商品严重短缺和有辱人格的配给卡分配制度成为消费市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票证制度几乎遍及俄罗斯的所有地区。

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于 1991 年 3 月 7 日为国家领导人起草的有关最近的经济形势的秘密的《第六号报告》有充分的说服力。其中包括：

> 主要食品的储备只有规定零售量的 70%—100%……在接受调查的区域，按票证销售的肉制品每人每月只有 300 克—2.3 公斤……由于储备缺乏，今年 1 月在雅罗斯拉夫尔州取消了购肉票……几乎到处都在使用购买通心粉制品和谷物的票……在利佩茨克、伏尔加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和伏尔加格勒州的很多城市，每人每月只有 0.5 公斤

① См. :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2. -М. , 1992. с. 207.

的谷物或通心粉制品……

70% 的地方实行凭票购买植物油……对提供给居民的茶实行严格规定……凭票购买的还有盐（标准为每人每月 0.3—1.0 公斤……）和面包（每人每天 0.5—1.0 公斤）……资源有限导致排队……商店开门前很早就排上了队，列出名单，点名……

大部分家用电器和设备、家具、车辆、地毯、进口与国产的服装鞋类、床上用品等会分发到企业、组织和机构……但……收到的商品数量不多，不能保证人民的需要。因此，在基洛夫市，1000 名工作者 1 年才分到了 3 辆摩托车，8 台吸尘器，10 台录音机，41 只电熨斗，2 个冰柜，92 双国产皮鞋。登记购买冰箱的队排到了 9—10 年后，洗衣机和缝纫机的登记排到 5 年之后，电视机和全套家具登记排队排到了 2000 年。

关于“改革”政策遭遇危机时刻和“改革”产生的危机加剧的情况，国家领导人是知道的。在这方面特别典型的是 80 年代末在奥西波夫院士领导下起草的报告《苏联社会及社会政治的情况：现状与预测》。该报告呈交了最高领导，1990 年公布后为广大社会人士知晓。报告怀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指出：“从一些共和国试图不惜一切代价脱离苏联和几百万公民移居国外开始，社会与社会政治的离心趋势就开始增强并具有不可逆性。社会局势的紧张程度增加，社会毫无出路的感觉增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根据社会学研究的资料）在于：

丧失了明确的生活方向；

进入最高权力阶层的人不够专业，缺乏社会责任感；

在通过一些即使不能制止，但哪怕能减缓离心倾向和流血的重要社会决议时行动迟缓、瞻前顾后、延误时机；

继续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信息，对所通过的决议不做科学的鉴定；

设立各种顾问‘专用办公室’，其决策往往是不称职的，其实际运用造成了国家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损失；

整个社会生活进一步官僚化（特别是在中层决策者中），国家逐渐使社会进入瘫痪状态（比如，据估算，外国投资酒店建设，要在 20 年后才可以开始营业，也就是拨给这家酒店建设用地的租赁期满后，等等）；

既保障实际建设活动，也造成对所有事情的唠叨都逐渐变成废话。

还可以指出一系列原因。但问题不仅在于原因，而是社会活动的总方向。该活动的特征是权力斗争，在这里个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都是次要的。”①

报告的重要结论之一极其准确：“……造成这些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匹配。非系统、不综合的改革方式导致了经济发展不景气，通货膨胀加剧的危险，对居民食品和日用必需品供应的急剧减少，主要居民群体生活水平下降，这也导致了社会环境更加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居民对尚未解决的经济问题日益不满，民族与地区间关系的尖锐化，对改革的成就没有信心，人们感觉社会缺乏保障……”②

当局仍然实行了符合其真实意图的政策。它对国内著名科学家报警性的呼吁已经不感兴趣了。“……1989 年末国内形成的危机状态”，奥西波夫院士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例行报告书中写道，“在 1990 年有转变为全国性灾难的趋势，对作为完整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其后果可能是致命性的。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数百年来形成的经济联系正在被快速破坏，居民生活水平在下降，不同社会团体之间产生民族与地区的不容忍性在增强，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的进程以几何级数发展，白白浪费人民的财产：石油、钻石、黄金、有色金属等，地方开始独断独行，犯罪率增加。人民不确信能摆脱已形成的危机并对社会感到绝望，这是即将来临的灾难的特征……”③

80 年代后半期，苏联共产党各地区、市、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委员会书记们，都收到了对事态作出深刻分析的报告。几万名演讲者和宣传家在党组织中发言。苏联人民拼命阅读报纸和杂志文章，花几小时看电视，体验参与辩论的感觉。

离奇的只是：苏共领导人没有利用被唤醒的政治兴趣来形成负责任的政治文化，而富有激情的反对派毫无障碍地利用“公开性”来破坏了苏联。

没有人与苏共的领袖及“改革”的实施者们分担此项责任。

1989 年前，不可避免的灾难已经具备了全部特征。

---

① Осипов Г. В. Указ. соч. с. 74 – 75.

② Тамже. , с. 113.

③ Тамже. , с. 184 – 185.

二

这种情况下，对于“改革”的合理性与国家领导人扭转事态不良发展的能力所产生的疑虑在公众舆论中散播开来。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变得很少与本国公民见面，而常常出国了。滚滚而来的现金奖励、荣誉称号、金质奖章和电视特别报道，“文明”国家欢庆的居民和同胞们阴沉的面孔，最终确定了总书记兼总统政治飘移的反苏方向。

在苏共中还留下一些有足够影响力的人，他们试图重振共产党的威信。但在苏联共产党或党的其他组织（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层面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产生了创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思想。

若是在其他情况下，由别的领导主持工作，这项决定可能会取得积极的成果。但领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是一些无个性的工作人员，只会温顺地服从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命令。算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账上的至少有两项“反党”功绩：他两次挽救了叶利钦免于不可避免的垮台。第一次是在选举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时，当时有两个人竞选这一职位：他和叶利钦。两轮投票后，谁也不占优势。按照规定，如果第三轮投票后还是没有结果，就取消两位候选人的资格。但这就意味着，叶利钦将从政治舞台消失。于是，波洛兹科夫为有利于对手，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

第二次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试图让叶利钦辞职时，波洛兹科夫宣布说，俄罗斯的共产党员支持“亲爱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受“民主集中制”精神培养出来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领袖，这为叶利钦消灭苏共，实行激进改革开辟了道路。

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中找到的不是对手，而是实际上的帮凶，他们在社会政治制度的彻底改变中起了破坏性作用，哪怕是不由自主地。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重要的情况，在选举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前夕，被提名担任这个职位的不是波洛兹科夫，而

是弗拉索夫。

那时他手里有几张重要的王牌：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俄罗斯政府总理，拥有一个受尊重的公众形象。在投票前夕举行的代表意见试探表明，弗拉索夫被提名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在投票的前一天夜里，戈尔巴乔夫突然建议弗拉索夫放弃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当天早上，波洛兹科夫被提名为叶利钦的唯一竞选对手，前者明显逊于弗拉索夫。[①] 因此，还是这个戈尔巴乔夫，为叶利钦开辟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道路……他不停地愚弄人民、媒体和他身边的下属。

曾几何时，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过一句睿智的话："……你可以总是愚弄某些人，可以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但不能一直欺骗所有人……"

1988 年 6 月 28 日—7 月 1 日，当"改革"带来的破坏性已经变得明显时，召开了第十九次苏共全俄代表大会。我们不用理会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们所做的报告：根据判断他们应该对"改革"的成果感到高兴。

但在会议代表中有一些人担任党的各个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们是相当聪明的人；还有著名学者，包括一些院士；以及先进工作者等。这些代表由于自己的公民地位与人民相当接近，了解普通人的思想和愿望。

那么，他们在苏联共产党全苏代表会议上都谈了些什么呢？

时任苏共莫斯科州党委第一书记的麦夏茨说，他在会议前夕接到了大量指示，其中主要的一份是"要让党不以任何理由放弃已经采取的、坚定的改革方针"[②]。

人民大概是向环境保护委员会主席莫尔贡提出了任务，"捍卫并坚决实行 1985 年 4 月苏共中央全会制定的、挽救国家的纲领"，也就是改革的政策。[③]

从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格罗斯的发言中可以得出结

---

① См. : Капто А. С. *На изломе века. Записки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а.* -М. :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2006. с. 122.

② 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 2, с. 3.

③ Тамже. , с. 14.

论，摩尔多瓦党组织的代表团完全支持改革的方针。[①]

如果相信那些在会上发言的共和国、边区及党的其他委员会的书记们，塔吉克斯坦[②]、爱沙尼亚[③]、土库曼斯坦[④]、罗斯托夫[⑤]、鞑靼[⑥]和其他党组织的共产党员都委托他们要“深化改革并使之不可逆转”。在近 5000 名与会代表和几十位发言者中，没有一个人就“改革”政策必然引起的负面结果表示出担忧。

同时，在 1988 年夏天，距苏联解体还剩 3 年的时候，即将发生灾难的所有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出现了一个问题：执政党推选的是什么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大会？是年轻而幼稚的政治家吗？或是平庸的科学、文化与教育活动家？还是文化水平低的工业巨头及农工联合体负责人？

不是的。在这之前，所有真正拥护社会主义选择的人已经失去了职务，不能影响政治进程了。在会议大厅还有一些有良心的规矩的人，但阴谋家们已经做了榜样，他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多攫取一些社会主义的财产。他们的面具都还没摘掉，但已经非常明白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了。

到 1988 年年底，在苏联实际上每个人都清楚：国家进行的不是改革。苏联开始的是消灭科技实力、生产潜力、农工综合体、智力储备和道德准则的毁灭工作。

国家开始变得像战场。同时，又尚未向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战：战争在任何时候都是反俄罗斯的，不管世界是“单极”（记得克里米亚战争和联盟组成的例子）时，还是分裂出“两种制度”和“第三世界”时。随着戈尔巴乔夫执政，同俄罗斯的战争被转移到俄罗斯的领土上，这场战争主要是由俄罗斯人自己操纵的。

政治头面人物以改革为幌子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其结果是多层次和具有毁灭性的。

首先，到 90 年代初，工业经济几乎完全被摧毁，并丧失了适应新

---

① 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 2, с. 38.

② Тамже. , с. 44.

③ Тамже. , с. 70.

④ Тамже. , с. 94.

⑤ Тамже. , с. 52.

⑥ Тамже. , с. 63.

的——首先是金融和政治再生产的条件。

其次，在这之前，创造性劳动实际上已被彻底破坏，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是虚假的。

最后，经济管理体制混乱。官员的小团体利益导致一些封闭机构形成，以新群体的自私计划代替国民经济的目标，并迅速占有了“改革”前他们只能管理的一切。

不能把改革的必要性绝对化。

从改革是历史的需要这一情况出发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改革”之称的政策开始变得适合迫切的需求，除了该政策本身，似乎没找到别的选择。

众所周知，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民共识，除了彻底重建社会主义的政治方针别无他途……”①

在这句话中，无论是就“全民共识”，还是追求“社会主义的彻底重建”，或是在“没有选择”的坚决声明方面，都没有任何真理可言。斯捷平院士公正地指出：“同一种真实的历史进程可以借助不同的，甚至是可供选择的历史重构而变得具有某种意义……”②

遗憾的是，俄罗斯领导人的政治意识，无论在其生活与工作的任何时代，都缺乏一种概念：历史进程永远是可以选择的，而在过渡时期，选择的自由没有界限。在缺乏政治稳定的情况下，社会选择模式的可替换程度会提高，而建立稳定的社会发展条件的可能性趋于零。

“改革”不能被视为一项因人民的社会运动而引起的政策：它产生于党、苏维埃和行政经济寡头的精英阶层中，是由于福利和特权分配领域的斗争而引发的。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前，政治特权阶层（苏共的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委员会、克格勃、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开始失去自己独有的统治地位。行政与经济特权阶层（厂长团体、科技贵族等）地位的加强不仅使党的领导人感到焦虑，而且遭到后者的反对。

---

①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Первый съезд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М. , 1989. с. 437.

② Степин В. С. 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общества и проблемы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артины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В кн. : *Философ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 , 2004. с. 4.

在安德罗波夫的活动中以及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活动中，为维护政治统治地位的斗争都是从“净化”与“重建”社会主义，并赋予它“新”的形式开始。

政治特权阶层能够以“重建与净化社会主义”“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思想和经济领导人选举制等思想吸引民众。而民众也确实付诸行动了。但“改革”的倡议者没能阻止党与苏维埃特权阶层的利益所引发的进程。

“市场关系”思想取代了“社会主义重建”思想，并获得吸引力。

因害怕失去权力，上层的政治权贵很快转向了市场经济立场，剽窃行政经济与科技贵族的口号；借用“持不同政见者”的术语，他们掌握了“新政治思维”的用语，走上了将从前只由他们管理的事务进行私有化的道路。

政治特权阶层，首先是凭借无限权力独享国家财富的党的工作人员，他们认识到，只有以所有者身份变成国家全民财产的占有者，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苏联特权阶层打算为了精心设计的目标而进行“革命重组”。

祖国历史上曾有一个有趣的情节与拉斯托普钦伯爵有关。当得知是有名的贵族领导了十二月党人起义时，拉斯托普钦说：“通常，鞋匠闹革命是为了当老爷，而我们的老爷们却想变成鞋匠。”

与十二月党人不同，苏联统治者们闹革命不是为了当鞋匠：行为的动机和性质首先是由将国家的全民财产重新分配的意图来决定。

最好以反酗酒运动为例来评论这一点。其真正的目的早已消失，很多人到现在也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本人只有一次无意中提醒说：“别让人想到，这场运动可能会引起刑事犯罪猖獗。”这句大意的话自我暴露出：“禁酒法令”在所有国家（美国、芬兰等）都导致了原始资本积累的加速，并以大规模宣传“民族健康”来掩饰自己。正如当时民间所说的，“矿泉水书记”本人和他的助手们都知道这一点。这也可以理解：如果仍保持对酒精的社会需求，而国家拒绝满足它，影子经济就会开始快速发展；每笔交易的资金快速周转和超成本回收率使幕后的酒精生意具有全世界规模；在几个月时间里就积攒了巨资，并产生出一个阶层的人，这些人的财产可与许多州和边区的预算相比拟。开始形成“有组织的犯罪”，也就是贿赂官员，创造出一个安全体系，形成一些武装集团，腐败渗透了国家管理的各级组织。因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政权属于苏共，那么依靠

“反酗酒运动”发财的优势条件首先在党机关和接近党机关的人和组织那里。国家犯罪经济不是盖达尔发明的：它的创始人是戈尔巴乔夫。

“反酗酒运动”不仅有财政、经济的内涵，还有政治意义。大资本家在影子经济成分中处境艰难。在毒品作为酒精的盟友出现之后，资金周转加速，资本增加，对闲置现金的需求也会增加。从上面操纵酒精和毒品贸易的精英分子，在所谓的“合作社运动”中找到了出路。

1988 年 5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合作社》的法律。该法允许创建附属于企业的合作社并接收统一的国家资源。

合作社被赋予独立从事出口业务，建立商业银行，在海外创建自己的公司的权力。外币收入不能被没收（《关于合作社》第 28 条），合作社只对自己的监察委员会汇报整个金融和经济活动。

《关于合作社》这项法律补充了苏联部长会议的二十个决议，取消了对外经济活动的国家垄断，禁止海关扣留合作社的货物，允许在境外保留货款等。①

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年就从苏联运出了三分之一的我们生产的消费品，第二年也一样。国内市场就垮了。

政府命令拨出苏联的部分黄金储备来购买进口商品（两年时间储备下降到 1500 吨）。黄金流向国外，而来自国内市场的“本地”粮食常常冒充“进口”食品。例如，在列宁格勒、里加或塔林的港口装载了便宜饲料的船只，沿海路绕行西班牙和希腊之后，来到敖德萨则是“进口”的小麦粮食了，1 吨能卖到 120 美元。②

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合作社都是为了用能为居民提供服务、生产日常需求商品的小型工厂、企业和机构补充国家经济，而我们的大部分合作社不生产任何东西，也不提供任何服务，它们带有投机和中介性质，完成两项主要功能：（1）“洗”赃钱，保障其合法化；（2）把预算资金转给私人。第一种功能的机制当时就很明了，现在更是众所周知。第二种工艺，也就是把预算资金变成个人财产，更复杂和多样。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掌握了“洗钱”和“私有化”的最初经验。当时的

---

① См.：Полторанин М. Н. *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 Наследие царя Бориса.* - М.：Эксмо：Алгоритм，2010. с. 55.

② Тамже.，с. 56 – 57.

“基金会”和“子公司”还很少，因为阻碍掠夺国家的“红色厂长”集团仍保持着自己的实力。但是，对企业领导、厂长和托拉斯经理等实行民主选举之后，“极端的保守派”被赶下台；在很多情况下，当选的是煽动家和损人利己的家伙；他们转向自己的信仰或者排挤所有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并提出一个厚颜无耻的口号：“法律不禁止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做。”

出现了影子经济成分，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其规模达到 1500 亿卢布。每年侵吞额为 650 亿卢布。全国登记的吸毒者有 13 万人，“法律上的小偷”512 人。最初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现在实际上换成新的、前所未闻的：“一切权力归罪犯！”

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还成功地搞掉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从原有的 2500 吨到改革末期只剩下 240 吨），并以巨额利息借款 650 亿美元。①

因此，苏联政权的历史成果所剩无几。世界最伟大强国的人民重新受到贫困和社会无权的压迫。

戈尔巴乔夫在破坏社会选择方面的不懈努力产生了结果，并团结了国内有“民主化倾向”的活动家。与此同时，增加了更大胆暴露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开始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越来越重要的服务。

1988 年 12 月 7 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震惊了国际社会，他放弃了所有他以前宣布的在欧洲分三步裁军和削减常规武器的原则，宣布要同时实行所宣布的措施。此外，还表示，莫斯科是单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最后，戈尔巴乔夫宣布，准备将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这一问题转到严格控制的轨道上来，而当时的西方，对于该问题仍是停留在宣传领域。

专家们的评价很快就应验了：“1988 年 12 月 7 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发言等同于政治珍珠港的意义”；“他一句话就免掉了北约成员国在国防领域中不能胜任的上万亿花销；在西方看来，他大大降低了苏军的威胁程度”；“为使西方确信不疑，戈尔巴乔夫调整并补充一些衡量削减的极为重要的标准——地理、民族、部队类型、装备数量及落实所需的时间等。被这些结论紧急武装起来的有北约秘书长韦尔纳、北约军事委员会

① См.: Кузьмин Н. П. *《Черные тюльпан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оман-хроника.* -М.: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 2010. с. 19.

主席阿尔腾堡和所有北约成员国大使”。①

向所有“冷”战的参与者发出一个信号：投降开始了。凯特尔和朱可夫元帅的继承人交换了位置。

1987 年，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宣言《为了我国与全世界的改革与新思维》中说：“有两个实行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德意志国家。它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它们都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二者中任何一个都可以为欧洲和世界的事务作出自己的贡献。100 年后将发生什么——历史会决定。”②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昂纳克的私人朋友的背叛经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同时，在柏林墙倒塌时，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还滔滔不绝地说，他们一直主张德国统一，并相信历史的公正将实现，《雅尔塔协议》将被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在时间上都是同步的，而所有离心力都是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自由社会选举学说之后才开始表现出来的。

“自由选择”概念成为作为完整国家的苏联解体的基础。在其基础上积攒了民族分裂主义的，首先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然后是其他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潜力。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分裂了，华沙条约组织被解散。

雅科夫列夫在周游全国、各加盟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时阐述了“自由选择”学说的真实含义。结果没多久，在同一时间，各地都出现了同一类型、宣布为“非正式的”组织、社团和协会，这些组织与其毫不相符，其活动空间广阔，特别是在官方的、正式的，首先是执政党所建立的媒体当中。

事实上，按同样的模式还成立了一些经济组织，首先能把财政资金变成个人财产，其次允许实行昨天还被叫作投机的商业运作。在苏联，这表现为创办合作社和苏联—外国的联合公司。同时，政府“没有指出”，在 2500 个苏德合作社和其他合作社中，1989 年生产商品的不超过 10 个。其余全是贸易采购的中介，原则上扭曲了国民经济体系中有关合作社用途的

---

① См. : Капто А. С. *На изломе века. Записки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а.* -М. :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2006. с. 301 – 302.

② См. : Горбачёв М. 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 ,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概念。这绝非偶然，1990 年第一季度，从合作社的账户上看，银行划拨了 60 亿卢布，而记账的却只有 45 万卢布。瓦解党的经济精英是准备和实施国家政变的昂贵但必需的条件。不劳而获成为特权阶层腐化堕落的主要源泉。

苏联第十八次全俄代表会议加速了毁灭过程。这次会上，“选择自由”方针从政治上得到论证。“改革”领导人口头上对这一主题的论断是这样的：

> 选择自由这一概念是新思维的关键所在。我们相信，当文明的生存成为主要的、普遍性的全球问题时，原则对于国家关系来说会具有普遍性。
>
> 这一概念取决于前所未有的正在发展的世界多样性。我们正在目睹这一现象，数百年来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几十亿人正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之中。这数十亿人在全新的条件下走上独立自主进行历史创作的舞台。在民族自我意识普遍增长的环境中，在寻找自己选择的道路时，他们将表达自己的心声。
>
> 在这种情况下，以任何方式（不要说军事、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政治的方式）从外部强迫接受，都是过去的危险武器。（我强调这一点。——笔者）主权和独立，平等与不干涉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这本身也是 20 世纪的重大成就。反对选择自由，意味着与历史本身的客观进程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形式和表现的强权政治在历史上都终将无用。①

时间证明，对政治一知半解的人或是叛徒都能轻易摆脱“从前的危险武器”。这两种人都不是大公无私的。德国赞赏戈尔巴乔夫的功绩，戈尔巴乔夫成为“最优秀的德国人”和柏林的荣誉公民。同时，确保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苏联军方领导人，从荣誉公民的名单中被删除掉了。

谢瓦尔德纳泽也获得了奖金。确实微薄了些：只是伊曼努尔·康德

---

① *XIX 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 43.

奖金。[①]

于是，出卖苏联重要的国际立场辅助了国家内部的崩溃和蜕化的过程。

到9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所有条件和可能性。国家灾难的火车头与组织者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工会和共青团的机关以及党、苏维埃和经济的特权阶层。

原来，“改革”政策的创立者和传播者很会“游泳”：他们能顺利地克服乱世的急流，从自己的区委会、市委会流动到银行、保险公司、企业（康采恩）的办公室。而“沉不下去的人”根本不着急，仍然留在1991年8月政变前他们工作的那些大楼里。

在财产与特权的再分配过程中，首先是合并整个权贵阶层的部分代表；其次是新的权贵阶层把财产分配闹到了中央崩溃和苏联解体的地步；最后是新的政治精英取消了对财政经济活动的所有限制，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社会利益。

俄罗斯的另一特点是：国内向新状态过渡的方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而是刑事官僚的方式。

权贵阶层私有化的创始人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盖达尔或丘拜斯。

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改革”的最终，出现了一个奇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在苏联人民的努力奋斗下，苏联在20年中创造出了一个天然气帝国。缩减社会开支和其他费用，在严酷的条件下，建设了新乌连戈伊、诺亚布里斯克、扬堡、普洛夫斯克等城市。开发出新的矿区，为向国外销售原料建造了交通基础设施，出现了乌连戈伊—波梅里—乌日戈罗德（全长4500公里，管道直径1420毫米）和扬堡—苏联西部边界（全长3473公里）的天然气管道。

突然，苏联天然气工业部被取消了，中央的基金和联盟部委对外经济活动的职能都划归给了康采恩。[②] 而其他所有的一切——商业银行、合资企业、中介机构、发给管理人员的梦幻般的薪金、游艇、足球队和别的球

---

① См.：Капто А. С. *На изломе века. Записки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а.* -М.：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2006. с. 310－311.

② См.：Полторанин М. Н. *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 Наследие царя Бориса.* -М.：Эксмо：Алгоритм，2010. с. 79－80.

队——仿佛不知不觉就出现了，并冠以新的所有者姓名。

我们把话说在前面：

特权阶层私有化和官僚自由化产生出一种依稀让人想起市场关系的综合体。至于它们的形成，除了时间，还必须有一系列其他条件。其中的关键是改革要符合社会文化空间，俄罗斯人的心里对改革是否认同，以及社会重组这一政治行动的合法性（在合法的同时应当明白，与其说是法律形成的执政权，不如说是社会自愿承认某种政治力量具有执政权）。

但几种说法都不够圆满：被当作政府活动之哲学基础的个人主义被祖国的集体性和一统性所摈弃，而由于从传统上来看，新的政治寡头允诺的比能给出和打算给予的要多，其政权的合法性不被承认。

所有这一切，和其他很多情况一样，影响到了“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成果。

因此，在改革前，俄罗斯的人均农产品产量位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到 1990 年，这种对比为如下情形（见表 18）。

表 18　　1990 年俄罗斯与发达国家人均农产品产量　　单位：公斤

国家（地区）	谷物	土豆	牛奶	肉
俄罗斯	787	208	376	68
美国	1262	72	269	116
欧盟（12 国）	518	149	353	95

在谷物、土豆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俄罗斯超过了欧盟 12 国，只是在肉的人均产量方面逊于它们。俄罗斯国内的土豆和牛奶产量超过了美国。①

而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农工综合体存在重大的弊端。大家知道，俄罗斯农业生产的特点之一是劳动生产率低。在 90 年代，按农业中每个就业人员的增加值计算，俄罗斯在世界上排名第 37 位。

从绝对数字（47 美元）来看，这个数字与最发达国家差了几乎 100 倍（荷兰为 41338 美元，瑞典为 40734 美元，芬兰为 37803 美元）。

俄罗斯农业综合体发展的另一特点也广为人知——高比重的产出损

① См. :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 реальный шанс*. -М. , 1994. с. 289.

失。在产品的运输、储存、加工和使用阶段，俄罗斯损失了60%的奶和10%的肉。其损失水平为农业发达国家类似损失的10—20倍。

尽管农业生产的效益低，但在90年代初，俄罗斯的小麦生产仍占世界第4位，大豆生产居第10位，大米生产居第16位，玉米生产为第18位。

而这些都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和拨给农工联合体发展的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完成的。①

在农业部门，一切都缩减了：拨款、种植面积、牛的头数、矿物肥料生产、技术设备等。由于这样那样的改革，国家的农村居民对苏联政权和工人阶级的党——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信任。

苏联社会曾经享有特权的部分——工人阶级本身因为无权而闹腾起来。最受尊敬、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力量——煤矿工人充当了抗议行为的催化剂。带有反叛情绪的组织者办事巧妙：从采矿定居点开始丢失商品。首先是粮食和肉奶制品，然后是黄油和面包。很快，内衣、袜子、肥皂、香烟、茶叶、洗衣粉也不见了。

巧妙的、人为制造的短缺导致了罢工。首先是在梅日杜列琴斯克。后来中央委员会有人要求，让基谢廖夫斯克的工人们联合到梅日杜列琴斯克的矿工。罢工工人的要求十分典型："按固定的时间表发放专用服装；给每位工人发一条毛巾和人均800克洗涤用的肥皂；给所有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发放棉袄；安排好食堂一周7天的工作，在黑板上标出矿场工程师的收入；安排好夜班矿工人均1卢布的免费饮食；改善工人家中的食品供应！"②

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总体结果。一些大的领导、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们开始感到焦虑。其中，在一份有舍宁、巴拉克诺夫和弗拉索夫签名的、写给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讲道："情况很紧急。原材料和汽车、轻工业及其他行业的物资供应不超过30%。只能保

---

①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 развитых стран, в том числе имеющих лучший, чем в России, био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субсидируют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Так, фермеры стран ОЭСР в 1994 году получи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субсидий 175 млрд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в США аналогичные расходы составили 26 млрд долларов, в Японии-46 млрд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② См.: Полторанин М. Н. *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 Наследие царя Бориса.* -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2010. с. 71 – 72.

障国防综合体三分之二的物质和装备。只有 30% 的资源分给住房和社会文化生活设施的建设者。很多企业，用帕尼切夫、普根和达夫列托娃部长们的话说，都快停工了。”报告进一步指出：“特别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必须坚决制止在国外市场上浪费原材料，防止对外经济联系中出现混乱。”①

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在文件的页边上勾画一番，就把它放入档案中了……

1985 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人均 4953 美元；到“改革”末期，俄罗斯国内总产值的实物总量不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0%，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我们提醒一下：1985 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 2 倍，在这一指标上与日本不相上下。

到 1991 年年底，像生产效率低、生产积极性缺乏激励机制、结构失衡等这些现象，事实上使国家的发展能力瘫痪。在“改革”政策框架内采取的措施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系统，使经济失衡，造成商品短缺，为苏联解体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 1991 年夏天之前，关于苏联何去何从的问题，已经不再被神秘地谈论了。严酷的危机撕下了它的某种神秘面纱：国家已经脱离体制危机的轨迹，进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倒退的阶段。

“改革”以其主要后果决定了在过渡时期国家发展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选择最差的一种。

在经济领域的生产衰退和技艺落后发展成摧毁工农业潜力、历史形成的联系与基础设施的阶段。国内生产商的商品开始从内部市场上消失，科技进步受到阻挠。

在 90 年代初，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的三大特点最为重要：

经济发展的源头遭到破坏（中止大型投资；科技集约生产被削减；中止了科研活动；基础科学的人才、物资和实验基地被破坏；地质勘探工作和矿产开采停止；劳动资源丧失专门技能；劳动生产率下降；等等）。

生活保障系统处于崩溃的前夕（国内粮食和工业保障缩减到危险的

---

① См.：Полторанин М. Н. *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 Наследие царя Бориса.* - М.：Эксмо：Алгоритм，2010. с. 56.

界限；交通、电信和其他系统开始解体；公用住房管理下降；出现了针对精英的、价格高昂的有偿医疗服务；负担不起高等教育；生态灾难逐渐临近；等等）。

国内出现两大人数和能力皆悬殊的阶级：第一种是完全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人；第二种人中，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连基本的最低生活费都没有。用作家和道德说教者尼古拉·塞巴斯蒂安·沙姆冯（1741—1794 年）的话说，这些是食不果腹的人。

这一切和很多别的事务一样，都是注定了苏联经济发展消极变化的“改革”成果。

三

我们这样来描述情况吧，在“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社会的天堂”，确立了公平，坏人来了以后，将光明熄灭——这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有害的。在一个名叫苏联的、异常富裕的国家，天才般凭空创造出来的“短缺”陛下是国家的主人。全国的民众成为短缺的牺牲品。不知怎的，火柴突然消失了，出现了长长的排队。弄到火柴的人变得高兴不已：到手了。于是来换火柴的有蛋黄酱、奶油、谷物、罐头等，没完没了。

国内所有人都不寂寞。人们收集到并交出 20 公斤废纸，为莫泊桑的书排一夜队，互相转述非法出版物中的新作品和有关“亲爱的伊里奇”[①]的笑话，买到一本朝思暮想的书并作为幸运儿享受被其他藏书家羡慕的乐趣。同时大家也知道了，在苏联境外的藏书家没有机会建功立业。短缺使社会感染了反苏主义情绪。

其他人中还有注定反苏的——未获得城市永久居留权的临时工。他们是一些奇怪的人，竭尽全力把农村的广大空间换成城市的贫民窟，注定成为奴隶，接受农奴般的工作条件，忍受无尽的屈辱。他们这些剥削、贫困和专横的牺牲品，为什么要热爱“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像苏斯洛夫、索洛缅采夫、契尔年科和格里申这样的鼓吹者呢？

---

① 指有关勃列日涅夫的笑话（译者注）。

国内那些通过先克维奇[①]的节目了解到世界的人们，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想为自己打开这个世界。人们调整收音机收听不同的“电台声音”，却听到“无线电干扰”的尖叫声和吱吱声。他们应怎样对待这个封锁了整个世界，让信息无法获得的政权呢？

在难以计数的党的、共青团的和其他会议上，领袖们号召的是一回事，自己做的又是另一回事，这给大家的头脑里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按富足程度可以购买小汽车。一个“获得”而不是买到了“汽车”的人会引起普遍羡慕，但车主给别人指出的实现幸福的道路是什么呢？以这种方式开上车又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呢？

苏联时期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是在反对其他社会阶层和民众集团时，虚伪地推行无产阶级霸权。这里首先讲的是知识分子。

60 年代开始为实行反苏革命创造条件。该战略构想是在各阶层人中积蓄对苏维埃政权、对党的机构，然后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不满。

首要任务是让斯大林时期社会地位很高的知识分子变成反苏的力量。通过相当原始但有效的方法达到了这一点：学者、科研人员和大学老师，包括一些精英，都在蔬菜基地上忙活，去弄“土豆”吃。工人反对设计师、建筑师和发明家，劳动人民反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强迫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前所未有的好处，他们通过有损尊严的程序加入苏联共产党，在分配住房、汽车、商品券时学会了耍花招和作假。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这项任务完成了，知识分子成为反苏的力量。梁赞诺夫的电影《车库》是民间抗议的一种温和形式，被放到土豆包里的、著名学者兼实验室主任马尔科夫的名片，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情绪和对“苏联”社会准则的态度。

“改革”的其他动力还有：“影子人物”、古玩和旧书市场的倒腾的人物、贩卖酒类大王及毒枭，等等。

按照他们的预定，反苏的知识分子通过屏幕、舞台、原创歌曲、非正式团体、文学晚会等，卓有才能和阴险地破坏着苏联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揭露得如此笨拙，以至于不能不引起羡慕。在社会学中，必须“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成为传播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确立反共产主

① 著名旅行家和电视节目《旅行者俱乐部》的主持人。——译者注

义学说的方式。

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开始，历史就证明，社会各阶级的团结是使人民在文明发展中得以占据主导地位的最重要条件。依靠社会团结、适度财产分化、培养自由个性和公民，小小的斯巴达成为受人尊敬的国家；并不强大的希腊成功地抵御了东方君主制国家，并使整个东地中海进入希腊化时代；在古代罗马，平民和贵族享有平等的权利，提高了潜力，使迦太基和东方国家与之作战时遭到失败。

无论对哪个时期进行分析，文明发展的社会历史都保持自己的逻辑。让我们转向不久以前，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国历史。在1914—1918年战争中遭受屈辱失败的德国，一贫如洗，它就是从民族团结、把居民变成人民开始了自己的强国之路。纳粹们相互尊称“同志”。希特勒的政权以意识形态强大的机构和有活力的党组织为基础，在很短的时间就创造了一个有效的垂直政权。犯罪和异端被无情铲除。

希特勒保留了财产分化，但摈弃奢侈。他在民众社会团结与培养公民的基础上形成了侵略性军事政策，其公民在爱国主义和争取胜利的知识和才能方面表现突出。

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社会、思想和其他进程比较矛盾，对此难以描述。但对国家成就的主要解释，包括胜利，都是类似的，一种解释为成功，而另一种说明失败的原因。所有国家的彻底失败——从迦太基、罗马、拜占庭到殖民帝国和其他帝国，包括苏联的崩溃，首先被解释为教师和学者们社会地位的贬值、“上层人物”的自私、领袖的虚伪和产生社会冷漠的平民阶层的赤贫。

在这样一些“理论家”，如费多谢耶夫、波诺马廖夫、齐米亚宁，然后是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掩饰下，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歧转化为尖锐的矛盾。这是因愚蠢或特意制造的——没有意义。事实上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社会种族主义，因为它，苏联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比成为地位最低的种族。人为矛盾增长的政治后果可想而知。

打着“公开性”的旗号伪造历史意识是苏联社会分化的又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大规模的挑衅为虚假情报和混淆视听的渠道大开方便之门，许多国家的人民至今仍在消除影响。这就是切尔诺贝利灾难。

怎么说才是正确的呢：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爆炸了还是被点爆了？这

是技术成因的灾难还是新政治进程的导火索？公开性——这是信息认知的工具还是国家政变的武器？它诞生于旧的土地上还是因切尔诺贝利而出现？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有很多著作。当时曾掀起且至今未落定的种种议论牢牢地隐藏了许多可靠的事实。但有关核电站实际所发生情况的信息，在今天已逐渐传开。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事情，技术上在其他核电站从未发现过，原则上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规模的事故也并非反应堆的设计特点。这种类型反应堆中的任何故障都必然被工程技术保护系统所阻止。就像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前在今天俄罗斯及国外所有的核电站所运行的那样。

然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动力机组爆炸了。库兹明是这样讲述有关情况的：

> 4 月 26 日早晨，莫斯科的使者，一个矮小的、发音不纯正的、官味儿十足的男人来到普里皮亚季。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对防止可能超负荷的系统进行检测。核电站站长布留哈诺夫无条件服从。他既没敢反对这个莫斯科人，甚至也没敢向他指出设想要进行的实验具有危险。与像核反应堆这样的“野兽”打交道，任何擅自行动都是不能允许的。
>
> 莫斯科人命令关闭第四个涡轮机组的保护系统。
>
> 众所周知，整个反应堆在不停地产生巨大的能量并把它驱动到配电系统。保护网能预防反应堆过热，保持水温在恒定水平。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观察温度指数，时而减轻反应堆本身的压力。过热的危险在于会瞬间形成大量蒸汽，对壁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
> 在场的人眼看着水迅速烧开，水温上升到了 2000 摄氏度。当班工程师发出恐怖的叫声。
>
> “站住！”莫斯科人命令说，“我对一切负责！”
>
> 正如所料，蒸汽完全扩散到反应堆的壁上并发生了那场爆炸，当代人回忆起来至今仍不寒而栗。向大气中抛出了四吨多使用过的核燃料，数量约等于 350 个“广岛”！
>
> 随后是为驯服肆虐的反应堆进行英勇斗争。国家见证了真正的壮举与人类极端的卑鄙。由于这一切仿佛完全脱离了意识，在这样的灾

难中必然存在阴险的肇事者和顺从的执行者。

司法机关用核电站站长布留哈诺夫来敷衍了事，后者的权力不超出选择围栏漆颜色的范围。他被判7年监禁。这一判决把人们的兴趣引到了空前灾难的后果上来。①

补充一下，这强有力地推动了被阴险地称为“公开性”的事务。现在可以公开一切了。但时髦的和需要的只是帮助诋毁苏维埃制度、篡改国家的历史和歪曲民众的历史记忆。“改革”的施工员向社会意识注入了“公开性”的毒药，而不是民主形式的长命水。

还有一个领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加剧了，其中的对抗具有最强大的离心潜力，这就是民族间的关系和种族基础上形成的矛盾方面。

地方上的精英，不光是国家的，还包括地区的精英分子，总是表现出致力于中央政府和受封民族之间的对抗。对抗可以表现为一种小的形式，也可能转变为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在日常生活层面，这可以反映在祝酒词和笑话中，在政治层面，则表现在自治的程度和等级服从制度的形式中。同时，永远倾向于玩“反俄牌”。

地区分裂主义成为多民族的苏联解体的起因。

苏联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全面的不平等，不是物质的，是党政社会的不平等。各个级别的蛮横无理成为生活中的社会规范，虚伪是达到仕途目的的方式，撒谎是行为的准则。同时，祖国历史的教训，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祖国文化的传统，东正教的道德伦理，教育程度和许多特定条件下的事物可以但没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当把国家财产转变成私人所有的计划成熟后，就很容易积攒反社会主义的情绪。特别是那些制造反社会主义形势的人，他们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几十年了。

如果我们从矛盾积累的角度评价“改革”政策，那么将会很明确的是：拒绝通过协调机制解决矛盾是蓄意的，整个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已经预见的。戈尔巴乔夫集团唯一没考虑到的是，这让他们丧失了统治权。在政治中常常会这样。连俾斯麦都并非偶然才说：天才们想出要革命，狂热分子来闹革命，而革命的成果却被败类们利用了……

---

① Кузьмин Н. П. “*Черные тюльпан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оман-хроника.* -М. :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 2010. с. 177 – 178.

在俄罗斯，没有天才和狂热分子是无法革命的：想出要革命、实现革命和利用革命成果的是同一类人。

毫无疑问，共同的政治、经济、生态、贸易、交通、意识形态、信息矛盾，以及其他国家间和民族间的矛盾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为争夺发展资源，为面包、天然气、石油、矿产和饮用水的斗争曾经并仍将具有国家民族的性质并产生尖锐的冲突。解决它们的方案可能有所不同（战争、通过有影响的间谍动摇内部状态、挑起冲突并达到激烈状态等），但实质只有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私性导致各种形式的对抗。

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会选择最短的途径强化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抵御它的能力则取决于社会内部团结的程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之前，苏联变成了一个尖锐和巧妙制造的矛盾俱乐部，已经无法抵御外来扩张了。即使苏联的精英们或部分精英想要抵抗也不行了。

到 1991 年年末，也就是“改革”末期，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到世界第 30 名之后，按人均计算，已经步入发展中国家行列。

四

俄罗斯人民清楚地知道外国媒体针对“改革”政策及其策动者的热情赞誉。

实际上不为人知的是专家们的结论。其实是有结论的。包括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比如 1991 年 12 月 15 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给出了以下数据（见表 19）。

表 19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成果

	1985 年	1991 年
苏联的黄金储备（吨）	约 2500	240
美元的官方汇率（卢布）	0.6	90
经济增长速度（%）	+2.3	-11
每公斤肉的价格（卢布）	2	100
石油出口（百万桶）	1172	511

续表

	1985 年	1991 年
外债（10 亿美元）①	10.5	52

换句话说，据美国专家估计，苏联的黄金储备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卢布兑美元贬值到原来的一百五十分之一；石油出口下跌了一半以上。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外债增加了 4 倍。

2011 年 1 月 30 日，“独立电视台”在电视观众最感兴趣的时间，播放了由被称为“国之瑰宝”的俄罗斯人民演员韦尼阿明·斯梅霍夫主持的固定节目：他在节目中对苏联共产党的黄金和其他珍宝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搜索。

在这个节目中展示了一切：基于俄罗斯人百年发财梦的阴谋，没办法；承认自己是懦夫的大官名单，他们只敢从自家的窗户里往外跳；对一个先后在三位苏共总书记执政时都负责管理苏共“事务”的人巧妙地产生兴趣；媒体极少使用的术语“秀”而不是“政变”被应用到 1991 年的八月事件上；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背景下，重新阅读《天鹅湖》的剧情简介；等等。

在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克鲁奇纳跳窗和从 1965 年到 1983 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担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巴甫洛夫飞出窗外格外引人注目。随着 1991 年 8 月 25 日克鲁奇纳打开窗户之后，1991 年 10 月 6 日，巴甫洛夫也这样做了。不过，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重复这一自杀特技很复杂：年纪一大把了（81 岁），还需要把椅子挪近窗户，费力地爬上去，打开窗框。总

① Для справки: Общая задолж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на 1.01.1997 год превышала 127 млрд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Согласно приняты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стандартам,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д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ситуация, когд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нешний долг превышает 40% вал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родукта (ВВП). По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м оценкам, этот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 превысили: Киргизия (внешний долг составил в 1996 году 51% ВВП), Молдавия (52%),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и Грузия (по 70%), Армения (75%), а такж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внешний долг вдвое выше, чем объем ВВП) и Туркмения (внешний долг на 27% превышает ВВП). Меньше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уровня ожидается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внешнего долга и ВВП в Украине (31%), Узбекистане (29%), России (28%), Казахстане (22%) и Белоруссии (14% ВВП). См.: *Финанс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 - 1996. 19 декабря. с. 5.

之，操作很不容易。

节目还揭示了一些其他秘密。原来，两位特权巨头——巴甫洛夫和克鲁奇纳，在 25 年中虽然掌管着包括苏共财政在内的一切，但并不能就外汇和其他金融问题单独作决定。

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管辖范围包括：4228 座行政大楼；131 个社会政治中心；134 家酒店；112 个档案馆；16 所研究机构；41 所学校；54 家列宁故居；23 个疗养院和休养所；145 家汽车场；840 个车库。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个人专用的汽车、公交车、卡车和其他车辆停车场，以及医疗、疗养、科研、教育机构的设备和档案、图书馆的珍藏（仅苏共中央下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馆就有价值不低于 30 亿美元的 230 万册藏品）等。根据俄罗斯检察院调查组的资料，1991 年年底，苏共中央机关的账上有 60 亿 9117 万零 3703 卢布 19 戈比和 1418 万零 2214 美元 25 美分（现金）。

假定这一切还只是苏共拥有和巴甫洛夫及克鲁奇纳掌管的无数珍宝中极小的一部分，那么，按节目制作人的说法，他们带走了关于党的珍宝的秘密、有关两套账本或三套账本的秘密，以及资助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共产党活动的机构的秘密。同时，在法林任职之前，在多勃雷宁时代，也就是在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种用途的钱是从苏联国家银行拨出，并通过苏联克格勃转交的。参与过转交的历史学博士麦德维杰夫解释说，在“改革”年代“创办了一些半商业的组织，包括向国外出售武器的各种合作社。雷日科夫签署过文件，戈尔巴乔夫签署得最多”。

据调查显示，克鲁奇纳死后，在家中的保险柜里留下了一些文件，使一项计划曝光，根据该计划，在苏联时期就实现了新俄罗斯资本的原始积累。把党的财政转托给所谓的“代理人”，任命这些人到新的、受苏共监督，但法律上独立的商业机构就职。作为交换，需要他们提供一份“对苏共的个人保证书”。内容如下：“我是某某，于某年加入了苏共，特此确认自觉自愿成为党的代理人，在任何岗位都要完成党委托给我的任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暴露自己所代理的机构属性。我承诺保存并爱惜使用为了党的利益而委托我管理的资金和设备，一旦需要则保证返还。签名。”

可以说，有关负责保管和增值苏共经费的人所作的个人保证的故事成

了头号轰动事件。确实，没有足够的例子，也就是说，那些签署了“对苏共的个人保证书”的人，用他们的姓名来补充说明情况，可能会成为真正的信息炸弹。但是，没有，这引起了头号的惊奇。

然后是2号轰动事件：还有一份企业的名单，克鲁奇纳把党的钱投给这些企业。如果相信“画外音”，那这份名单能打破一种猜想：“那些能够被确认并证明属性的企业，大约才600家。而据某种估算，有整整1000家，光是银行就有十几家。”就算是指出前10家最大的企业，再加上两家银行也好，节目制作人似乎都没下什么功夫。只是提到资产为3000亿卢布的“银河”公司和“逻各斯”联合公司（4000万卢布）就完事了。这是第2号惊奇。

同时，“画外音”在继续揭穿阴谋：1991年秋，一些报纸公布了提交给叶利钦的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指出：“近几十年中被苏联领导人秘密运走和卖到国外的有1500多吨黄金、国家储备的所有白金，这总计价值2.5亿美元；还有价值50亿美元的宝石。”这是第3号大新闻——从苏联运走的珍宝价值数百亿美元，究竟运到哪里去了？到了哪些国家？谁下的命令？还有几十个其他问题。但都没有答案。这同样让人十分惊讶。确实，有些文件被提到了，在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中也确实找到了一些定期寄给苏联海关人员的、可疑的外发邮件的复印件。比如：

> 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1986年7月2日。致谢列梅杰沃海关关长瑙莫夫同志。
>
> 请您允许30件货物出境，总重630公斤，已加盖53个铅印密封。持外交护照的奥夫奇尼科夫同志随行。护照号067054。
>
> 部门负责人——别祖什科。

“画外音”解释说：“货物以绝对保密的级别运送，铅封上出现最细小的划痕都会被看作是意外事故。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视线一秒钟也没离开过集装箱。它们最终到哪里去了，永远没人知道。”有如侦探小说的运送情节是第4号大新闻，而断言永远无人知道货物被送到哪里交给了谁，已经是转为惊异的第4号惊奇了。如果签署了几百份可疑文件和收据的官员有名有姓，为什么会查不出来？为什么断言，没人知道苏共的黄金、白金、宝石和其他珍宝运到了哪里？

没有更轰动的事件了。只是对调查发现的情况感到惊讶，调查得出奇怪的结论：

> 苏联共产党不掌握自己的黄金储备；
> 根据大量审计结果，没有发现党的领导滥用职权；
> 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个人独断地管理苏共的巨额现金；
> 该案在 1994 年因缺乏犯罪内容被中止。

让人相信巴甫洛夫和克鲁奇纳把“苏共的黄金”秘密带入了坟墓，这是不可能的。不经总书记们和如雅科夫列夫、多勃雷宁、法林、国家银行、克格勃和苏联海关委员会的领导们这样一些掌握拨款的人同意，像巴甫洛夫、克鲁奇纳或利索维克这样的苏共中央机关普通工作人员不可能成事。甚至现在，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结束时，至少还有几十位能揭示苏共秘密的、了解情况的活动家还健在且生活顺当。其中包括苏共珍宝的主要管理人戈尔巴乔夫。1985 年，他掌握黄金 2500 吨，留给叶利钦的只有 240 吨。连 90 年代的几十位“盖达尔分子”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有关党的珍宝的命运。1992 年 2 月 18 日，盖达尔亲自与美国克罗尔公司签订了合同。该公司因找到菲律宾独裁者马克斯、海地总统杜瓦利埃和被绞死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钱而闻名。想必是“克罗尔”公司的专家们找到了钱。几十亿美元，和手稿一样，并没有烧掉。但他们工作的结果至今没有公布。

节目制作人使“苏共的黄金”问题变得很尖锐，但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尽管可以回答。

节目制作人对巴甫洛夫或克鲁奇纳这些人死亡的原因诊断很精确；他们知道，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的新体制，是在党的系统内产生的，其创始人不是盖达尔、绍欣或布尔布里斯，而是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

我们再回到主题，回到“改革”的成果上来。

绩效标准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大部分可以被抹黑或伪造。比如，可以用术语“残酷的、榨取血汗的剥削制度”来描述汽车装配的流水传输工艺；在确定健康的生活方式时，可以找到“侵犯人权”的特征；等等。最困难的是诋毁如人口和领土方面的积极变化这样一些成果。

回顾一下国家的历史，在第二个千年中，俄罗斯顶住了蒙古鞑靼的入

侵，打退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多次进攻，依次摧毁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波兰、瑞典、法国和德国。

因此，在伊凡三世统治公国之前，1466 年，俄罗斯的领土达到 55 万平方公里，在他死的那年，达 222.5 万平方公里；1584 年（伊凡雷帝死亡那年）为 520 万平方公里；到费多尔统治末期为 710 万平方公里；1613 年（米哈依尔登基）为 850 万平方公里；1645 年为 1230 万平方公里；到彼得一世有 1550 万平方公里；1796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那年）为 1930 万平方公里，到尼古拉二世统治末期是 2180 万平方公里。三百年中，俄罗斯的领土增加了 38.6 倍。

它的面积与欧洲最主要的国家相比，增长如下（见表 20）[①]：

表 20　　俄罗斯与欧洲主要国家领土面积增长　　单位：百万

年份	1480	1580	1680	1780	1880	1895
俄罗斯（只算欧洲部分）	2.1	4.3	12.6	26.8	84.5	110.0
奥地利	9.5	16.5	14.0	20.2	37.8	44.8
英国（不算殖民地）	3.7	4.6	5.5	9.6	35.0	39.3
法国（不算殖民地）	18.6	14.3	18.8	25.1	37.4	38.4
意大利	9.2	10.4	11.5	12.2	28.9	31.2
西班牙	8.8	8.2	9.2	10.0	16.3	19.0

换句话说，在四百年中，法国人口增加了 1 倍，西班牙增加了 1.1 倍，意大利增加了 2.4 倍，奥地利增加了 3.7 倍，英国增加了 25 倍，而俄罗斯的人口增长了 51 倍！

到 1985 年之前，苏联的领土达 2240.3 万平方公里，比俄罗斯帝国增加了 60.22 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 2 亿 9007 万 7000 人，世界上一半的国家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盟国。在所有这一切中，那些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生活过、工作过、保卫过自己祖国的人，其贡献尤其醒目。

不需要在这一说法中为某些人所犯的罪行寻找平反的特征，是斯大林委托他们管理国家及各个地区。尽管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政治评价，但目前尚未对国家发展作出现实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包括在 1924—

① См. : Солоневич И. Л. *Народная монархия*. -М. : Алгоритм, 2003. с. 181 – 182.

1953 年期间。

“改革”造成的完全是另外的结果。

世界地图上的苏联有 2240 万零 3000 平方公里。①

截至 1991 年年底，我们这个曾经占据世界六分之一陆地面积的国家，只拥有八分之一了。

国家领土减少了 532 万 7600 平方公里，也就是将近 24%；人口减少到 1 亿 4654 万 3000 人，几乎少了一半。

这些后果——不是证实了统治的负面结果，而是实行叛变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应当受到审判。

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运用各种词汇，采用不同的措辞，得出了这一可悲的结论。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索戈林最精确地总结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特征：“……1985 年戈尔巴乔夫选择的改革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模式失败了，而从 1987 年开始采用的民主改革模式引起了更具毁灭性的经济后果，活着的几代人注定遭受痛苦，未来的发展前景显得极不明朗……”②

从“社会主义重建”的经济后果看，“改革”政策阻碍了以科技进步、创新、发展基础和应用科学为方针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进步方案。它给俄罗斯新任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在规模和解决方式上类似 1945—1948 年间的任务。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遗产不太好：国家获得了一种“程序上的民主”，具有一些凌驾于政治自由和民众的公民责任之上的民主仪式。“改革”抹黑了作为执政形式的民主，给予其很低的政治收益，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改革”把民主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提升到国家政策一级的虚伪和两面手腕导致人民完全疏离了政权。从 1985 年开始，真正的民主已经开始按收益递减规律发展。至今仍不能克服这一过程出现复发。

精神道德领域的折磨是最严重的。首先，在这一领域形成了社会仇视态度、攻击性、倾向于用武力实现自己的野心、恣意妄为和逍遥法外；其

---

① См. :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90 *г.* :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 Госкомстат СССР. -М. :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1991. с. 68.

② См. : Согрин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 1994. с. 107.

次，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怀有极端社会政治情绪的阶层；再次，能转化为尖锐的大规模冲突的社会紧张情绪增加；最后，出现了一些民族不满的策源地，形成了民族间危机和分裂主义言论产生的基地。①

这些就是“改革”的主要成果和由此得出的教训。

① См.：Серебряников В.，Хлопьев А. *Соци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М.，1996. с. 80.

阿巴尔金：苏联经济的命运、矛盾与发展阶段*

康晏如编译

康晏如，198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助理研究员。

一　应客观评价苏联经济

苏联经济至今没有得到足够客观的评价。大量的苏联文献，一方面充斥着不计其数的事实与统计数据，另一方面又存在众多理论建构，年青一代人只有极其谨慎地利用这些文献才能对苏联经济形成相应的印象。这些文献并没有展现苏联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和苏联经济发展的命运，也没有对苏联因何解体这一问题作出回答。这些文献都被意识形态所束缚，当时政权号召其完成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这一任务。在完成上述任务时一些事实被加以列举和引用，这些事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完全的，因为可以描述苏联经济成就的事实为数众多。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构建，结果苏联经济的发展就成为一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运动。

---

* АбалкинЛ. И.，ИвановЕ. А.，Судьба，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АбалкинЛ. 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М.：НИФРА-М，2007. 列·伊·阿巴尔金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改革理论家、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摘自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苏联经济史》，莫斯科2007年版。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塌陷，评价的钟摆急速摆向另一边。现在苏联经济史成了失败、错误和犯罪的象征，导致苏联体制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证明这一评判，就像苏联时期的文献一样，一些被证实但远不完全的事实被选取并被消极地加以阐释。反映上述观点的著作相对不算多，但正是这些著作在年青一代人中形成了有关苏联经济历史的印象，这是极其有害的。

上述提到的两种对苏联经济史的评价并不是不同的科学流派。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被意识形态化：宣传方法相同，对一些事实缄默不语，对另一些事实则极力关注。《美国历史周期》的作者小亚瑟·M. 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的观点能够说明对苏联经济史描述的意识形态化。他认为，历史文献通常具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英雄式”阶段上，一切都归结为对成就的描述；在第二个“修正主义”阶段中，所有的成就都经过怀疑主义的重新评价；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政治情绪平息以后，历史学家才能进入所谓的学术阶段。我们已经历了前两种阶段，但仍未进入第三个阶段。当前的任务是，在描述自己并不久远的过去时远离自我吹嘘和自我鄙视，客观地评价一切。

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完全漆黑或完全玫瑰色的历史，历史是多彩多姿的，一切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光明和黑暗、温暖和寒冷。苏联经济史也是这样，曾经有过失败、错误，这些不应忘记，但也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辉煌成就。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对此沉默不语是错误的，我们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很重要。

不应忘记，落后的、农业占主导、文盲占多数、由于一战和国内战争而濒于崩溃的俄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在各领域都实现工业化、文化普及和科技发达的强大国家。与 1922 年相比，1940 年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了 10 倍，工业产值增长了 23 倍，农业产值为原来的 2.1 倍，铁路运输货运周转量增长了 22 倍，固定资产增长了 23 倍，基建投资增长 25 倍，工人和职工数量增长 4.4 倍。[①] 一个现代技术工业强国横空出世。具体种类的产品在实物形式上的生产增长速度也符合上述指数。

上述数字说明了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的一些特征。第一，与其他大部分指标相比，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增长速度完全不高，这说明工业化

①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1922 – 1982 *гг.* ЦСУ СССР. Стат. сб. М. , 1982. с. 52.

实际上首先是靠新技术来实现的。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整个工业产值增长了 51%，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 79%。这段时期的第二个特征是消费资料的生产落后和农业经济的落后。国家长时间不能克服这点，这是一定的非经济因素导致的结果。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由在整个 20 世纪都存在的战争威胁而决定的。国家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付出了沉重代价：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的长期落后，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住房长期紧缺，日常生活设备和设施较为落后。

然而，苏联经济能够保证国家在艰苦卓绝的二战中取得胜利，这一点至关重要。

苏联经济有能力应对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损失。实际上在 1942 年，特别是年初，疏散到东部地区的企业还不具备生产能力，生产直线下降。1942 年工业产值是 1940 年的 77%，农业经济为 1940 年的 38%。但是到了 1943 年，在战争最紧张时期，经济开始实现增长且增速明显。国民收入在这一年增长了 12%，工业生产增长了 17%。对生产下降的克服有助于企业向东部地区的大规模转移。在战争年代通过铁路从受到侵略威胁的地域大约转移了 150 万车皮或者说 3 万列车的疏散物资。从西部地区转移了 510 万只羊、20 万头猪和 80 万匹马，以及许多农业机械、谷物和粮食。仅仅从 1941 年 6 月至 9 月（疏散高峰）就向东部转移了 2593 个企业。企业的转移要求在到达当地后可以立即进行生产，这要保存生产的技术完整性。为此企业的员工（及其家属）、大部分设备、技术文件以及现有的原料和成套零件也被转移到新的地方。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无先例。沃兹涅先斯基和柯西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到 1950 年，社会总产品是 1940 年的 1.6 倍，国民收入是 1.9 倍，工业生产是 1.7 倍，就连农业生产也达到了战前水平。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成功保持了足够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到 70 年代中期，社会总产值每年增长速度保持在 6%—7%，国民收入在 6%—8%，工业生产在 7%—9%，居民实际收入在 4%—6%。这种增长速度保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无疑是巨大成就。这一时期建立了强大的工业综合体，在未来它将长时间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基础。此外还创建了和平利用核能与国防核能的新领域，苏联率先飞向宇宙并在此领域掌握着领先地位。苏联成为公认的世界强国之一。

然而这些成就没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所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产品按照计划价格有计划地分配消除了市场经济中尖锐的销售问题，保证利润有计划地获得，免于破产，建立起稳定的环境。但这种经济模式的缺点没能被克服：对劳动和创新较弱的激励机制，日常用品的长期短缺和无用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到了70年代后半期，当时世界上科技飞速发展，而在苏联技术创新应用却受到压制。柯西金开启的经济改革尝试昙花一现，没有触动经济关系的深层基础并很快中断。所谓的停滞时期到来。

在整个苏联时期，尽管是上层所倡议和全面支持的，然而事实上也是真诚的群众建设热情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年轻人的激情。年轻人自愿出发到远东，进行共青团建设，开垦荒地。然而另一方面，大清洗、古拉格、恐怖氛围、告密和怀疑成为苏联建设过程中的污点。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劳动农民所遭受到的灾难和悲剧是不能忘却的。强大工业国家的建立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劳动热情与古拉格——这些都是同时并存的。只有综合这些现象才能理解苏联经济的真实历史。

在分析俄罗斯经济史的时候，对于其各个发展阶段都不能用国外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搬硬套。客体和情况本身从来都不是标准的，况且任何不考虑国家历史特点、社会文化特点和主要大众意识范式的纲要，在过去和未来都是毫无成效的和无法实现的。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在苏联整个时期，国家都受到其他国家侵略的威胁，国家时刻面临新战争爆发的威胁：芬兰战争、卫国战争、冷战以及西方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脱离苏联的企图。持续的战争威胁不可避免地赋予苏联经济以动员性，这不仅导致中央集权的加强，还有政治体制的严格化。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长期用于应对外来威胁、竭力巩固形成的经济体制，阻碍了自身的改革。

二　苏联经济的发展阶段

苏联经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各异，这要求分阶段对苏联经济历史进行考察。阶段划分的主要标志是经济发展的特点。此外，苏联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一阶段由于国家领导人的更替而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因此每一阶段经济发展不同特征的表现经常与这一或那一领导人掌权阶段所重

合。这里指的是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苏联经济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七个时期。其中前六个时期的跨度为 10—12 年，最后一个是 5 年。

第一阶段：1917 年革命后至 20 年代末。

这一阶段并不是完整和统一的，而是由三个各不相同的时期组成。让这几个时期合成一个大的阶段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在寻找适合新的政治体制的经济管理模式，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被称为是新经济模式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初期，国家经济全面瓦解（工业生产只相当于 1913 年的七分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国内战争的爆发和新政权在法权基础与管理体制方面的全面缺失。

此阶段的第一个时期是从革命后到 1918 年中期，当时只对大型企业进行了国有化，对生产进行工人监督。应该说，大型企业国有化对经济体制的改变不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新经济政策和农业集体化的影响大：其一，大型国有制在沙皇时期就存在；其二，大型企业的国有化没有触动居民的大多数——农民。

这一时期国家机构开始组建，这一进程实际上持续到 20 年代中期。《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被通过，然而这些法令并不包含具体的涉及经济管理的指令。稍后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对经济管理形式与管理方法进行了经验摸索。成立了人民委员部，其任务是在国内战争条件下首先恢复经济管理。建立了专门的经济机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部，对经济体制结构进行了探寻。有关租赁的决定很具前瞻性，如果没有被取消，它会建立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模式。到 1918 年中期为止的这段短暂时期为经济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完全不同方向的机会——排除中央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严格管理的机会。然而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这一机会未能被利用，战争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保障城市食品供应。

明确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低效性后，政权在国内战争末期转向了这一阶段的第二个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部分地承认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有制。这一举措是对更灵活的经济体制的探寻，这种体制结合了中央对大型工业的集中管理和市场关系两个因素。但这一机会依然未被利用。苏联国家在外交上没有得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承认，它们继续军备竞赛。苏联如果不加速实现工业发展将手无寸铁。

需要制定国家摆脱技术落后状态的长期目标，解决计划管理经济的任务。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出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于1922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成为国家经济管理的主要机构，符合政治体制和国家面临的经济任务。发行了10卢布金币，实现了财政稳定。这一时期还制订了首次年度计划。到20年代末消除了失业和劳动力的买卖。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经济事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正是在制订这一计划的过程中对苏联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优先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或者立即实行工业化。相互各异的五年计划方案被提出。这是一个对经济管理方式进行积极改革的阶段。建立了经济管理机构和计划体制——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长远计划，研究了计划方法及预算体制。可以说，到20年代末完成了改革，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起来，这一体制及其主要特征持续了60年之久。

总体上，这一阶段是对经济模式的探寻阶段，进行了建立具有许多市场经济因素的模式的尝试。但是这些机会因为客观因素（军事威胁）和主观因素没有实现。

第二阶段：20年代末至卫国战争初期。

进入这一阶段时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的体制已形成。在该阶段初期还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了给农民带来悲剧的农业集体化。1929年的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会议上，支持灵活的、在很大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指令性计划的人受到尖锐的批评。

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加速工业化，把苏联变成强大的超级大国。为数庞大的大型工厂建成，拓展了新的工业领域。消灭文盲，建立教育体系、职业学校和大学，加速发展科技是工业化的组成部分。到该阶段末期食品配给制被取消。

尽管这一阶段的五年计划中的许多指标没有正式完成，但仍可以说是苏联经济发展的成功阶段。国家面貌得以真正改变，并在很大程度上做好了战争准备。同时，在此阶段中苏联的矛盾和悖论表现尖锐——巨大的成就和不少的错误甚至是罪行，人民的热情和严酷的镇压，古拉格和文化繁荣并存。

第三阶段：战争时期和战后的经济恢复（1941—1952年）。

苏联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专业军事管理机构，实现了经济轨道的军事转

变，进行了资源动员，保证了战时经济。事实表明其卓有成效。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经济的胜利。

战后苏联经济重新回到和平建设轨道。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以史无前例的速度（5 年）恢复到了战前规模。稍晚些时候恢复了战前经济结构，取消了食物配给制，进行了货币改革。同时冷战的开始使繁重的、在很大程度上以发展军事工业综合体为目标的生产结构丧失改革的机会。

苏联经济在这一时期更明显地表现出具有严格计划性的动员性质。正是在动员体制下，计划经济作为经济管理方式显示出了自己的高效性。

在这一阶段末期，苏联巩固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国际影响力，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国家表现积极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有影响力的参与者。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开始的冷战使苏联陷入军备竞赛泥淖，这对苏联经济具有长期和极其消极的影响。

第四阶段：1952—1964 年。

该阶段的特点是经济政策发生原则上的转变，同时也是经济矛盾和政治解冻的时期。

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转变是宣布实行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相接近的路线。化学工业受到格外重视，这对消费领域和农业经济（化肥）具有积极的影响。尝试提高农业经济，开始发展住宅建设，人们从公社中搬到单独的住宅。

重工业继续发展，机器制造业实现了重要的飞跃，进行了氢弹试验，奥布宁斯克建成了第一个核电站。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国家在铁和煤等资源的开采量上位居世界第一。航天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尤里·加加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宇航员。建造了自动破冰船“列宁号”。

经互会的成立对苏联经济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影响巨大。

然而冷战对苏联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保持军事对等无法让经济平衡发展，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这一时期的经济不单单是按照已取得成就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正确的创举和方案，但是缺乏加以支撑的资源，因此未能完成。也出现不少错误决定，工程项目拖延多年或长期不能完工。经济计划越来越从属于“建成共产主义”计划的政治野心。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对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进行了探寻，管理方式从部

委管理体制过渡到国民经济委员会，与积极一面同时产生的还有消极的后果。农业经济中通过了一些正确的决定：发放集体农庄庄员身份证，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此外，党的机构按照工业和农业被分割。出现了“唯意志论”决定的现象。

第五阶段：1965—1975 年，经济实用主义的 10 年。

在这一阶段首先提出要建设强大的能源综合体，为此对西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地区进行加速发展，为利用石油和天然气改变了燃料平衡结构。提出依靠石油和天然气保障出口潜力的激增，扩大消费品和粮食为先的进口。

总体上，这一任务得以完成。然而在进口已实现增长的条件下，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给饱和的国内消费品市场带来困难。对消费品的生产下了一番功夫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私人生产和日常用品技术的进口改变了苏联人民的生活品位。电视、冰箱和洗衣机等电器开始走入大众家庭。汽车制造取得巨大进步，建立了大型汽车工厂，同时也生产轻型汽车。这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加速发展，改善了工业结构。新的生活标准呈现，汽车成为苏联成功人士的重要目标。宇宙空间计划和住宅建设事业继续发展。

这 10 年的两个五年计划的结果并不相同，更为成功的是 1966—1970 年。正是在制订这个五年计划时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政治野心，开始制订更加实用的在现实中能够完成和客观上目标明确的计划。结果在国民收入、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居民生活水平等许多重要指标方面都取得了迅速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实际持平。1971—1975 年的五年计划与前一个五年计划不太一样。首先，在前半期，上个五年计划积极的经济发展趋势仍具有较有力的影响。然而到 70 年代中期，健康的经济思想被政治野心重新取代，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停滞的迹象。

总的来说，在这 10 年对改变经济管理方式进行了尝试，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决定，经济管理重新回到了部委体制，同时还对经济职能进行了深刻变革。实施了柯西金经济改革，优先进行对经济管理方法的转变。提出要克服计划体制的主要不足：缺乏对劳动和创新应有的激励机制；技术创新利用不足；对生产集体的劳动收入进行过多的保障，而不是依据其努力程度进行调节。然而改革中断了。改革不够彻底，严格的计划体制没有被克服，行政命令体制与经济核算相结合的尝试失败了。党组织也没有给予改革应有的支持。

第六阶段：停滞迹象的积累阶段（1976—1985 年）。

经济出现了衰落的迹象，然而政权却极力忽视这一迹象并拒绝对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第十个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成绩平淡无奇。已有的生活水平得以维持和些微的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能源的出口和消费品的进口，因此外汇储备并没能用来进行生产的现代化。

为了发展经济，克服生产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消极趋势，经常通过一些试图完善经济管理的突然决定，这些决定没有触及根基。强化劳动纪律和克服酗酒的运动广泛开展，通过了《劳动集体法》。反腐败斗争虽然开启了，但是，像往常一样并非在应有的领域。减少计划指标数量的工作继续进行，但并不坚决。

第七阶段：1986—1990 年，苏联最后一个五年计划。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加速发展经济。1986—1987 年实施这一方针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济增速确实有所提高。然而也是在这两年，加速经济发展方针与解决社会尖锐问题之间出现了矛盾。

国家开始了经济非军事化的进程，这导致生产资料生产的绝对下降，尽管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在 1990 年仍然继续。与此同时，国家预算赤字急剧扩大，货币发行同时进行。上述综合原因导致零售市场状况迅速恶化。零售价格的自由化一方面抑制了消费品的供应，另一方面导致 1991 年年末零售市场的全面失控。

毫无疑问，在经济加速发展与改善社会领域问题之间的困难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这首先是世界能源价格的下降，冷战的继续和苏联经济无法承受的军备竞赛。克服过去积累的停滞现象困难重重。然而主观因素对经济的危机态势起了重要的作用，一系列明显错误的决定被通过。首先是严格的反酗酒运动的展开，急剧降低了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收入，引起居民不满和社会紧张，在实际中也没有减轻酗酒现象。

这一五年计划的特征是在改变国内经济关系方面加大了力度，意识到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不应只是停留在表面。毫无疑问，实行合作社形式的生产的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原则上承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可能性，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性。然而在这一领域采取的行动操之过急且前后不一，《企业法》的通过就是如此。根据该法，在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时，企业就不再受到来自国家的严格管理，结果是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所有这些决议都是政府在制定市场改革纲要前就通

过了。

然而当时出现了更加迅速地向市场关系过渡的纲要——500 天计划。在苏联解体的一系列事件中，经济问题引起的分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包括选择市场过渡纲要的问题，国家领导层之间的问题，首先是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之间的分歧。经济和管理上的困难被一些更为激进的政治家所利用。

三　未被利用的机会

苏联不止一次地尝试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实际上，苏维埃政权从 1918 年上半年就开始了尝试。第二次是新经济政策，柯西金改革也是这样的尝试。这些尝试都没有贯彻到底，机会也未被利用。

事情也不仅仅归结为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实际经验显示，经济模式高效运行的重要和必要条件是具有复杂结构的公民社会及其制度的形成。这里指的是企业家联盟和工会的建立，消费者权利保护组织和慈善团体的建立，地方自治和公民权利与自由发展的保障。如果这些机构存在，许多牺牲和悲剧可以避免。

考察苏联经济史的时候可以认为，国家一直在寻找适合现代技术和文明发展的经济管理模式。然而持续的战争威胁不允许苏联走能够进化改革苏联经济，在实际中把计划、市场和公民社会体制相结合和创建经济高效运行的道路。

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不是乌托邦。苏联经济曾经有机会走这一结合的道路，但是机会未被利用。在当代俄罗斯，发达的公民社会体制的缺乏仍然是阻碍建立高效经济运作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波尔杰洛维奇：《俄罗斯90年代改革的教训》*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欧阳向英

欧阳向英（197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兼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新兴经济体学会副秘书长。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访问学者，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步入转轨经济，已经有20个年头了。后10年的经济增长大大好于前10年，这固然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但对转轨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促进改革政策朝着合理化方向转变，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2011年3月，在独立经济分析中心举办的“经济政策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总结和教训”研讨会上，新经济协会总裁、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维克托·波尔杰洛维奇（Виктор Полтерович）对90年代改革的教训做了总结，提出总结基本教训是重新理解改革的基础。

波尔杰洛维奇认为，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经历了一场社会－经济灾难——生产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犯罪上升（凶杀、影子经济、贪污）、预期寿命减少、对民主价值失望。资本主义是建立起来了，但却是完全无效的：劳动效率低下、不平等十分严重、所有权保护乏力，看不到任何发展前景。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经济学是罪魁祸首，因为它没能阻

---

* 原文见 http：//opec. ru/text/1351286. html，题目为《俄罗斯90年代改革的教训》。

挡在发展中和后共产主义国家实施错误战略的改革。他将俄罗斯转轨经济中的误区归结如下：

误区 1："宏观经济规律是普遍的"

宏观经济的基本理论认为，要想避免长期和快速通货膨胀，必须控制货币总量的增长速度和通胀预期。1992 年 1 月 2 日价格放开后，第二个因素显然没被充分估计：休克性质的改革和燃料价格急剧上调给通胀预期以十分不好的影响。另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由于转型经济的特点没被充分考虑，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限制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被大大高估了。

企业账户资金的大幅贬值和信贷不发达，导致违约大量出现、易货交易量增加。这促进了经济进一步衰退。由于生产的产品交换成货币的数量越来越少，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在原则上，它甚至可能导致更高的价格！

类似的现象在许多其他转型经济体中也已经观察到，但没被深入思考。甚至某些著名的西方专家坚持认为，"宏观经济规律是普遍的"。

错误的结果：1992 年俄罗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 26 倍。对放开价格是否有其他方法？毫无疑问是有的，况且改革前就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的一些方法中国人早在 1989 年就实施了。中国的价格自由化历时 15 年，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误区 2："私有制（几乎）总是好于国有制"

不是所有人都记得，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有人鼓吹神奇的"主人的感觉"，私有化后企业会立即从无效向高效转变。不久前，在世界银行的报告《私有化的效率和转型经济体的所有制》一文中[①]考察了 35 个样本，以比较转型经济中私有化和国有企业的效率。下面是报告作者的结论（第 28 页）：

"……私有化本身并不能保证，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不能保证，运营的改善"……"私有化对国内所有者的影响……在东欧是正面的，而在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为零，甚至是负数。"

误区 3："民营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条件恶化时它们解雇多余的工人"

---

① Saul Estrin, Jan Hanousek, Evžen Kocenda, Jan Svejnar.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 and Ownership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World Bank, 2009.

在产品需求下降、资金不足、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俄罗斯私有化企业经理人想尽办法耍花招，为的是不裁员。有些人甚至雇用更多工人，就像西方经理人通常在经济繁荣时期所做的那样。

关于这点和其他令人惊奇的转轨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还在 1995 年，布兰查德（О. Бланшар）、科曼德（С. Коммандер）和克切利（Ф. Коричелли）等人就详细介绍过。2007 年，波尔杰洛维奇在其著作《改革的理论基础》[①] 中也曾指出。这种公司治理的类型在南斯拉夫十分典型，但在西方极其罕见。

误区 4："硬预算约束总比软的好"

在苏联，当成本超支时可能会责骂经理，但通常债务一笔勾销。科尔奈·亚诺什（Янош Корнаи）称之为财政软约束。显然，柔性财政约束不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由此人们普遍相信，在改革之初，就应通过银行提供资金，后者如人们料想的一样，总是对硬性预算约束更感兴趣。但改革的经验和后来的理论成果表明，在一个不好的制度下严格控制对社会可能更不利，因为它将导致过多的破产。

误区 5："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守夜人'"

这一论断意味着，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是通过"正确的"法律，并确保其实施。此观点长久以来在国际专家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正是这些专家 20 世纪 80 年代在拉美国家和 90 年代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激进的自由化计划。难以置信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研究者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在公共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前瞻性的"课程里关于国家的工业和社会政策的论述也不少。在赛弗（Cypher）和迪茨（Dietz）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1987 年）中论断竟然完全相反，即所谓的"正统悖论"："改革时期国家的作用加强。有效的自由化要求巩固国家的力量。"数据显示，改革时期，在那些更为成功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国家干预公司决定的程度比俄罗斯要高。

令人吃惊的是，2000 年，政治时尚有了如此大的改变：数百篇文章宣传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合作形式——公私合营、技术平台，等等。就连传统产业政策也已不再是禁忌。

误区 6："计划没必要，市场自行解决一切"

---

① В. М. Полтерович, *Элементы теории реформ*. М. : Экономика, 2007.

作为第五个误区的后果，这个误区特别值得一提。俄罗斯改革之初计划体制就完全被摧毁。到了2000年，我们才开始明白，没有规划不可能实现快速发展。中国人抵抗住了摧毁的诱惑，由“社会主义时期”的计划体制一步步创建出指导性计划的现代企业制度。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体制对成功赶超、创造“经济奇迹”是必要的。①

误区7：“必须继续改革——不计成本”

90年代有人不断跟我们重复必须继续改革，没人想到过什么成本。今天我们知道，任何改革都伴随着从传统投资领域抽出资源、消解结构和寻租过程加快（游说、腐败和影子活动等）。改革作为一个项目，开始之前我们就应该比较它的预期收益和成本。一旦发现它的延续不能带来正面效应，就应该准备改变改革计划，甚至放弃它。不幸的是，即便在现在，这个错误也经常重复。

误区8：对制度互补性的误解

为了有效地改变这些制度，需要同时改变那些制度，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讲制度的互补性。举例来说，外贸自由化和开放国内市场是两项改革，完成后将对彼此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然而，不能得出结论说，两项改革应同时进行：静态时它们是积极互补的，动态时它们可能就会对彼此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如果外贸放开了，而价格改革没有跟上，正如俄罗斯1992年创造出巨大的、利用国内外差价来寻租的机会，极大地刺激了寻租行为的产生。1992年，俄罗斯有色金属价格是世界价格的十分之一，而世界燃料价格是国内价格的2倍。巨大的而且逐渐减少的利差使企业主不惜任何代价寻求出口权，以运出上述资源的现有储备。这时就不仅存在保障国内需求的任务，增加这些出口资源生产本身（需要时间）也失去了意义。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新西兰大约在同一时期正推行类似的改革，一个专家（Bollard，1992）坦率指出：在放开国内市场前不能实行外贸自由化。

在中国，两项改革从1979年逐渐展开，到1992—1993年，在国家监督下基本完成。

---

① 参见 В. М. Полтерович（ред.）. *Стратеги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М.: Алетейя, 2010。

误区 9：“政府不应实行‘民粹主义’政策”

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另一个口号。这反映了过去的许多改革者脑子里的典型意识：愚昧的民众无法估计到改革给他们带来什么，因此应该尽可能地对他们的意见置之不理。

1992 年自由化使居民失去了存款，公司失去了周转资金。生产和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第一阶段 1992—1994 年私有化改革完全没有按照计划执行。改革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社会调查结果和 1993 年秋季议会反对政府政策的“起义”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无视这些信号，政府仍“继续改革”。抵押拍卖是最可恶的措施之一，很长一段时间确定了在俄罗斯私有财产的非法性。

经验表明，为使改革成功必须形成一种积极的体制预期，也就是人民对体制效率要有信心。为此必须在改革的各个阶段不断提高主要居民群体的生活水平。因此，要考虑对体制改革中的失败者给予补偿（Roland，2001）。顺便说一下，不仅中国的改革者，欧盟的创立者也严格遵循这一原则。

误区 10：“休克疗法是最好的策略”

这一论断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的改革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事实上，它违背了业已存在（但没被充分认识）的国际经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中国的“大跃进”（1958—1961 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都是休克疗法最鲜明的事例。对奥古斯托·皮诺切特（Аугусто Пиночет）1974—1983 年在智利的改革和 20 世纪 80 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Маргарет Тэтчер）改革的最初评价使休克疗法更为流行。

皮诺切特改革的最初成果被视为“智利经济奇迹”。但是，后来人们认识到，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①] 现在智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低于俄罗斯。撒切尔改革的“休克”在激进程度上与转轨经济改革没有任何可比性。况且就连这些改革的成效也遭到质疑，有些人甚至认为，正是 1986 年进行的证券交易自由化，当时也被称为“大跃进”，给现在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

① 参见 Ricardo Ffrench-Davis. *Economic Reformsin Chile. From Dictatorshipto Democracy*. Second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科尔奈对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支持者之间的辩论总结道："……大多数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具有影响的西方专家主张加速私有化……而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俄罗斯。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不可逆转的坏作用……导致财产和权力令人难以置信地集中……现在，十年十五年过去了，多数专家都不得不承认，主张逐步过渡是正确的。"①

误区 11："引进的总要好一些"

波尔杰洛维奇列举了俄罗斯改革中犯的一些错误，到现在为止这些错误仍在发挥影响，并且经常反复。

- 五级所得税（1992 年）；
- 破产法（1992 年）；
- 建立短期国债市场（1993 年）；
- 以住房抵押贷款代办处为基础形成的抵押（1997 年）；
- 渔业份额拍卖（2000 年）；
- 福利货币化（2005 年）；
- 养老金改革（2010 年）。

波尔杰洛维奇指出，总结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主要教训是重新认识改革的基础。从上述 11 条误区可以得出基本结论：为了从某个较为发达的制度环境中引进制度，将其植入欠发达环境中，需要从与后者环境相匹配的制度入手，努力消除其现有的文化、体制、技术和其他方面的限制。随着限制被削弱，在最终目的实现之前，应该采用新的过渡性体制。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按照这个路线进行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合适的制度空间构建出具有连续性的过渡体制。没有终极药方，但找到合适的路径，并选择最为合理的方案，这是准备改革和正在改革的人们的任务。②

---

① 参见 Яношь Корнаи. *Силой мысли. Неордына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бодно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м пу тешествии*. М. : Логос, 2008. с. 372 – 373。

② 参见 В. М. Полтерович. *Элементы теории реформ*. М. : Экономика, с. 446。

丘拜斯式的私有化　私有化证券的骗局*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洛兹科夫著
郑蓓蓓编译

一　“不可知论者”——伊戈尔·吉姆洛维奇·盖达尔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矮子和侏儒管理着国家的时候，人民很难等到它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盖达尔只是个人符号而已。

现在由于他的过早去世，并且鉴于证明其完全无罪的必要性，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们围绕他冠以让人难以理解的、不切实际的天才的荣耀，甚至还给其戴上了受苦受难者的光环。

保守主义者则相反，把他塑造成一个自觉破坏国家经济的怪物。

依我看，他只不过是苏联杰出人物“花花公子”的典型代表，被宠坏了的人。他曾习惯于他的每一个小成绩都被亲人们当成一个伟大的事业的诞生，所以，他完全不能客观地评价自己。

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典型的少爷形象，娇生惯养，任性，并不是很有才能。

当他成为副总理的时候，他曾经度过童年时光的别墅区的居民们只是感到很难堪。其中一个人大声说：“这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所有的居民都记得这个任性的小孩，为了消遣寻开心，他让一群人用棍子击打着鼓，像行军一样，走在去池塘洗澡的路上。世界很小，告诉我这些的是一个莫斯科当地人。

---

* ［俄］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洛兹科夫：《丘拜斯式的私有化　私有化证券的骗局》，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6—200 页。

并且盖达尔亲自向“俄罗斯工业家企业家联盟”副主席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弗拉基斯拉夫列夫承认，他从没参加过少先队夏令营，从没有过和同龄人的交往。

原来，他只是通过车窗看到国家，所以，可能他并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也不爱它。

我有一个熟人，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出生于遥远的乌拉尔的一个城市，他出席了某一次选举前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那时还不为人知的伊戈尔·盖达尔在城镇俱乐部讲解市场经济的好处，滔滔不绝地说出许多莫名其妙、难以理解的句子。

在大厅里坐着的主要是少先队员，当然，他们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在未来的改革者发言完毕后，一个中年人从另一侧走过去问他：“朋友，你在这讲了许多有道理的话，但是，请问，你信上帝吗?”盖达尔是怎么回答的呢？他想了想，摸了摸头说：“您知道吗？我更是个不可知论者!”①

该说说我本人和他的交往了，那次交往给我留下的是某种奇怪的感受。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你的眼睛，噘着嘴，好像早就在生你的气。他的脸特别大，因为生病有些肿胀，尽管那会儿他才 35 岁。

他在六大上和我们会面，为了说明必须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因为这还关系着，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将不能得到 250 亿美元的贷款。他的说明无精打采并且有点不自信。然后，所有人都散了之后，我们三个人还是四个人留下来，他开始神神秘秘地解释说，他们（意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会好好地检查完成的情况。您是否认同，这更像是管中学生，而不是管理一个大国。

他根本完全就不像一个领导者。后来和他有一次秘密会面，我和安德烈·克洛文，作为“变革—新政治”党的领袖，这是我们最早的寡头古辛斯基和班杜吉德兹给我们建立的政党。

这是在七大前夕，详细的情况稍后我会讲述，但是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事实，古辛斯基个性是很蛮横的，很多时候是令人不愉快的，他抗议对待他太漫不经心，差点吆喝起来了，而盖达尔耐心地忍受了这一切。

好吧，他的拥护者说，可能作为组织者盖达尔确实能力欠缺，但是他

① 不可知论——哲学认识论，认为世界原则上是不可认识的。

是学者，是经济理论的创新者。

但是，任何特别的著作也没有看到，除了他毕业时的副博士答辩论文。在全苏系统调查科学研究所研讨会上的闲聊不算。当时所有的闲言碎语都是在诟病体制的衰弱。

所有最著名的经济学者，像科学院院士阿巴尔金、彼得罗夫从本质上抛弃了那些无知的、愚笨的改革。

自由主义者们当然可以说："从他们那里，从长了青苔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拥护者那里能得到什么？"

但是，并不是这样的，首先，阿巴尔金和彼得罗夫提出了通向市场的自己的方案，其次，证明改革无知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学者，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甚至因此集体写信给叶利钦。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改革者们对经济的认识的缺憾，"那么多不正常的，思想上歪曲了的人，他们甚至不会解决最简单的经济增长速率的问题，因此他们导致了最纯粹的经济的衰退"。

而盖达尔政府的经济顾问，颇有名望的杰弗里·萨克斯，惊叹道："俄罗斯的领导们完全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不切实际的认知：他们认为，国家的使命是服务于少数资本家，把钱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放入他们的口袋中。这不是休克疗法。这是邪恶的、蓄意的、深思熟虑的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大规模重新分配财富。"①

直到最后，盖达尔还试图说服自己和周围的人，只是没有给他做完他想做的事情的机会，没有让他把财政稳定进行到最后，就开动了印刷机，用切尔诺梅尔金替代了他，在光明的前程到来前什么也没留下。

要知道，很少人记得，叶利钦在国家变革前三天的 1993 年 9 月 18 日又一次任命盖达尔为副总理。请继续冒险吧！

好在，盖达尔本人于 1994 年 1 月 20 日带领自己的议会党团离开了政府，也就是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为力。

当然，盖达尔并不想表明自己的无能，作为被描述成不可理解的、被赶下台的改革者形象，他甚至几年后还准备去伊拉克。你们记得这则媒体上的趣闻吗？伊戈尔·吉姆洛维奇非常严肃认真地希望在伊拉克进行经济

① http：//vk. com/note3143_ 9689331.

改革。这得是多么愚昧的人才能想到的啊。

有些人确实试图证明，问题并不在于盖达尔的智商有问题，而在于他是很有知识文化的人、很彬彬有礼的人、随和的人。有一次，一个盖达尔的拥护者向我解释说，他是个属于未来世界的人，他对于这个不文明的世界太有益处了。

但是这个知识分子盖达尔在1993年10月把武器分给了最早落入圈套的公民，使他们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而宪法会议召开的时候，盖达尔说是因为瓦洛佳·马扎耶夫，那个在发生了丑事之后佯装离开的人，“这些人，像马扎耶夫这样的人，就应该第一个被枪毙。”

故事的结尾是关于这个主要的改革者的。

后来有一次，是在疗养院度假的时候，我很久都没搞清楚，坐在我邻桌的是个什么人。您知道吗，就像童话电影《魔镜王国》里的那个“阿巴什”：胖、秃头、浮肿的样子。他用尖尖的嗓音和总是不满意的表情使唤着女服务员，傲慢地、大声地说话，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表现自己。

之后，有人告诉我，这是退伍的副海军上将铁木尔·阿尔卡奇耶维奇·盖达尔，伊戈尔的父亲，著名的儿童作家阿尔卡奇的儿子。

我马上回忆起了《铁木尔和他的队伍》这本书，令所有苏联儿童，包括我都对它着迷的一本书。同时让我感到忧伤的是，人物原型完全不像书中的主人翁那样，并且渐渐明白，我们那些剖腹自杀的人的古怪行为从何而来，为什么他不是伤害自己，就像一个真正的自我牺牲者那样，而是给我们的俄罗斯经济造成扼杀。

二　没有钱的经济

由于没钱，企业不能生产商品，因为配套设施、原材料处处都在涨价。而即便是生产了，也很难挣到钱。所有都是相互影响的。可以贷款，但是利息高得离谱。所以，到处都开始不发放工资了。

金钱不仅仅是以工资的形式消失了，实际上更是以存款的形式蒸发了。四五千卢布在苏联时期是很大一笔钱了（可以买一栋别墅或是支付合作社房屋股份），却瞬间化为乌有。

要知道，这些贬值掉的钱，完全可以用在专门需求上，比如用于建设，用于购买可以长期使用的本国产品，像汽车、冰箱、电视机等。这是

一举两得的事情，既能满足居民需求，又可以支持国内生产者。但是没有一个改革者想到这点。继续下去越来越严重。既然企业没有钱，那么就没有税收。没有税收，老师、医生、军人、警察就没法发工资，退休人员也领不到退休金。太多的死亡、不幸、悲剧在那一刻在全国爆发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过这些，甚至没考虑过和货币流通相关的技术因素。

核算系统已经很老旧了，电子系统还没有使用，现金支付需要几周才能完成。

在人为造成赤字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加剧。除此之外，还允许那些没有诚信的人们进行阴谋诡计（所有人都不会忘记那起伪造单据的丑事）。

下诺夫哥罗德的副州长伊万·彼得洛维奇·斯克良洛夫已经不止一次提醒我说，解决这个问题，像他本人说的那样，依靠工农，建立一个财政信使机构，由他们在州内运转现金进行支付。

但是这在全国范围是不可能做到的。最终引发了不付款危机，并且持续了几年，产生了大量的变相货币，各种各样的票据，商人们靠此发财了，并且他们还拖延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属于真正的生产者的资金。改革者们通常最后才会考虑这些。

我们的改革者们首先考虑的不是生产，而是买卖。

1992 年 1 月 29 日签署了关于自由贸易的第 62 号总统令。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件，在此引用一二。

规定之一：

“不论所有制形式如何，也不需要特殊许可，给予企业和个人进行贸易和中介业务的权利（包括用现金结算）”，武器、弹药、爆炸性、有毒性和放射性物质、麻醉药剂、药品及其他商品的交易除外，以上物品禁止销售或依据现行法律限制销售。

也就是说与卫生要求、防火要求以及安全准则相关的任何许可都不做要求了。

还有一条：

“禁止拦阻和没收用交通工具或其他方式转运的任何货物，并且不得索要这些货物的任何文件。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除外。”

对于法律的相关补充是为了严肃起见，而实际上这意味着，会有这样的可能：从企业里运出偷窃的物品，也没有人有权检查。

我想起好像是在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时，在1992年年初那严寒的日子里，一些坏家伙直接从纸箱里取出冰激凌卖，并且他们只有一两箱，并没有更多。警察走近其中一个问他，从哪儿来的冰激凌，他开始大喊，这是商业秘密，而且他并不需要出示任何证明（规定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杰作，就是几年内国家变成了一个又大又脏的旧货市场：

“规定：企业和个人可以在任何他们方便的地方进行买卖（包括卖二手货、摆地摊、在汽车上交易），街道的通行部分、地铁站、与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建筑相邻的地方除外。”

出于公正，需要指出，这个荒唐的文件的创始人并不是盖达尔本人，而是米哈伊尔·基谢列夫——来自彼得堡的人民议员。他说服盖达尔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之后叶利钦也签了。

米沙·基谢列夫——他认为盖达尔的改革不够自由主义。

但是要知道，管理国家并不是创作科学著作。著作权是次要的。所以，谁编写了这个文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签署并允许了它执行。

最重要的管理决议的通过取决于谁最后一个走进最高权力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在那时显得像个穿堂院。

由于全国都没钱，企业的领导们不得不开始用商品支付工资。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些人，他们在地上摆上水晶玻璃花瓶、盘子、杯子还有闹钟。也就是说，我们好像又回到了自然经济时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好像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但是，所有发生的一切我们都称之为“市场经济改革”。

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赞许”

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确实很荒唐。但是，糟糕的是，盖达尔和他的支持者们被财政稳定的思想所干扰还不止于此，他们的“想法”还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崇。

1992年3月3日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大会上，盖达尔声明转入改革新阶段，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了俄罗斯管理经济战略正式备忘录，其中规定了限制预算赤字的强硬措施和实行能源载体价格放开。

履行这些要求是俄罗斯加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条件。备忘录里的有关此内容并没有被刊出。因此最高苏维埃大闹了一场，计划实行价格

放开如此重要的文件和有悖于人民的强硬措施竟然被隐瞒了起来。

当然了，新闻会制造个烟幕，目的是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说成是一个不容争辩的最高指示。据说，那些权威经济学家都来了，怎么能怀疑，他们不是想帮助我们呢？

这确实起了效果。我想起了因此事与一个记者的交谈，他完全已经相信了他们，但是他知道我不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可以跟我开诚布公地聊聊，就好奇地问我：

——您怎么这么担心呢？要知道这是 IMF 啊，他们不会给我们不好的建议的。

——那您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我激动地回答，——难道我们就不应该认真、详细地检查核实一下吗？

——嗯，原则上是应该的。——他惊讶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那时我是否说服了他，只记得他走的时候一脸困惑。

其实，那时我们对 IMF 一无所知。

后来，尤其是在《经济犯的自白》一书出了之后，我们才完全明白，IMF 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在这本书中，前货币基金组织上层官员坦诚，IMF 是一个金融组织，就是为了使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美国，并且维护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那时，我感觉到了相关知识的欠缺，并努力自学。我读了很多专业文献，并且了解了大量阐述 70 年代“石油危机”事件的材料。从中我惊讶地发现，西方国家 10 多年都没能消除由于能源价格增长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它们却建议我们也这样做。

1992 年 3 月，我们政党领袖们与叶利钦进行了一次会面（那时他还会见各党派议员），武装了新知识的我向他发问：“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即使在西方国家，石油危机期间石油价格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几年都没能消退，您想象一下，我们国家将会怎样？”——我很激动地对他说。他听着，点点头。

我还向他说了自己一些粗浅的想法：IMF 的方法主要是推荐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并不适合我们，因为对于它们来说工业的衰败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工业，可我们不同。

叶利钦又点点头，并允诺不实行价格放开，并且可能，就在这次谈话之后，公开宣布，俄罗斯将不再听命于 IMF。

但是，这仅仅是说说而已，因为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先生实行的外交政策，客气点说，是很奇怪的。在所有国家面前，科济列夫真的是卑躬屈膝。例如，在批准同匈牙利外交部的合约时，竟出人意料地提议，要对1956年事件中的匈牙利人进行忏悔，以示补偿。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我对“政治受虐狂”的这一举动表示强烈反对，这引起了外交部工作人员们的极其特殊的反应。他们开始用各种方法邀请我们，大概是想让我们更好地明白我们的处境。这样，我就被派去跟丹麦外交部长会面，后来又接待了一些外国官方代表。

初出茅庐的外交官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共产党人、青年人反对。我清楚地记得同科济列夫的一个副手的争辩，在回答我们指责他们放弃立场时，他辩解说，俄罗斯现在很弱，从没有过如此之弱。

叶利钦队伍里的灰衣教主，那时毫无争议的他的亲信——布尔布利斯来到我们中间。当时，我们正准备参加党组织大会，他把我们叫到跟前，好像是为了表示“商量商量”。

实际上，他只不过想看看我们，并且，搞清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会面的有我、戈尔温、奥列格·普洛特尼科夫和热尼亚·卡若金。

我们并不喜欢布尔布利斯。他的外表不能给人很好的印象。典型的尤杜什卡·科洛夫罗夫（伪君子，假仁假义的人，来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ёвы》主人公的绰号）。说话小声，目光混沌。整个人看起来很呆板。他无精打采地建议我们做好青年政治工作，暗指，这比怀疑改革的正确性更有意义。分开时，我们和他没有达成任何一致。

我们彼此间叫他“Дон Рэба”，这一名字来自斯特鲁卡茨兄弟的小说《很难成为神》中的著名人物。

这样，我们可以在公开谈话时，秘密提及这个权力无限的宠臣。

四　给政府打两分

由于改革带来的经济混乱，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这不能不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这种情况下，新政府并没有客气地对待人民。2月23日，发生了不可理喻的屠杀老兵事件，老兵们想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而不被允许。3月17日，在全民公决一周年之际，就保存苏联问题反对别洛

韦日协议召开了抗议大会，这一协议无耻地置人民意见于不顾。

大量工厂停工，有关不发放工资的信件、控诉书简直堆满了白宫。最终，4 月 6 日，召开了第六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旨在讨论政府工作。我们政党严肃激烈地争辩，该给政府打几分。我、安德烈·戈尔温、伊戈尔·穆拉维耶夫态度很坚决，但是，许多人态度很摇摆。这从现在的立场来看，许多是显而易见了。

忘却苏联时期的种种问题，在当下贪污猖獗、财富不公的背景下，它也引起人们怀念过去。那时候，一切都是相反的。苏联时期，是全面缺乏的时期、排队的时期、徇私的时期。而改革被看作是通向光明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纵身一跃。如果谁表示反对，马上被标记成反动分子。表达反对改革，是要有胆量的。1991 年 9 月发生的，我已经提到过的，非法指令的外交行动，表决反对补充权力的行为，确有此事，这一行为反对的是进行改革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反对改革本身。

他们委任我作报告，当我在政党会议上宣读主要提纲时，引起了辩论，并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我的发言以一票还是两票之差，勉强获得通过，差一点啊！在发言中，我表明，要给政府打两分。并指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么将来将会有一个“盖达尔的人口学的回响”的到来，因为，很快妇女们就不生孩子了，到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上学和工作的年轻人将会很少。叶利钦要为夺取权力付出代价。

我发现，在整个现代历史中，这样的权力都被国会让给了一些首领，其中，包括 1926 年给墨索里尼也让出了权力。

第二天，叶利钦在沙皇宫会见了我们，并且向我们表达了不满：“在这里，你知道吗，他们拿我和墨索里尼作比较。”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有看我，而是看向另一个方向的某处。

改革者们的政府也很不愿接受批评。直到故意示威地从会议大厅离开。在他们的野心之下这也只有等待，总有那些阻碍他们道路的无知的人，激怒那些在终审法院拥有真理的人。

其实，他们也不是自愿走出会议大厅的，而是按照上级的指令。并且，是上级的原意。

午饭后，当我们从俄罗斯大饭店走出来去开会的时候，倡导民主的一群人，认出了我们当中的谁，叫喊着，嘲笑着。当然很不愉快，一切就按照普希金的方式发生着：

赞扬和诽谤都一样冷漠地接受
不要和愚蠢的人辩驳

大会通过了不明确的决定，经理团体的代表加入了政府，财政紧缩这一极端强硬方针被放宽。格拉申科领导的中央银行，开始发行货币，但这仍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政府方面不能给农业提供任何特惠权，企业急剧缩减生产规模。

五　激进式改革失败的原因

盖达尔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实行价格自由化。

·开放对外市场和实行外汇自由兑换。

·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抵抗通货膨胀。

所有这些改革都严重地破坏着国家经济。

（一）实行价格自由化

放开价格，是由于严重的垄断和利己主义，由此引发了以下的负面反应。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了产品生产的减少，并引发价格上涨，因为相同的生产花费却制造了更少的产品数量。产品价格的上涨减缓了销售，同时造成了更大的生产缩减。结果大量的企业缩减生产规模至低于盈亏平衡点。所有人都缺乏资金用于当下的支付，出现了全体不支付的爆发。企业奋起斗争。总之，通过降低价格进行竞争是改革者们所希望的，企业是很难做到的。学术上称之为通货膨胀，任何一本经济学的教科书对此都有描述。

（二）开放对外市场

开放了市场，制定了卢布对美元的自由汇率，根据上述我所指出的原因，改革者们就把俄罗斯的企业置于同西方生产者相比不利的条件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缺乏经验。要知

道，即便是象棋世界冠军也会输给中级朴烈费兰斯（一种纸牌戏）的选手，当他第一次坐在牌桌前时。

同时，要注意，有别于价格自由化，它是任何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并且实行价格开放是多少可以解释得通的，在对外市场上如此弱势的国家，实行汇率自由化，这是与世界经验相矛盾的。在进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时候，保护私人生产者，这是公理。现代化条件下，从别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通常是最高的，贷款是最划算的。韩国，还有其他“亚洲四小龙”就是这么做的，从前，美国也是这么做的。

很少人知道，虽然解放黑人是美国南北战争发生的原因，但实际上，斗争是在美国两个发展派别之间进行的。是应该这一方的优势取得胜利吗？——即在种植园使用廉价奴隶，种植棉花的原材料部门，并且交换以此取得从前宗主国那里得到的，不征税的低价的工作品，或是，这一方取胜？——即用实行高关税的方法发展私人工业，并保护自己的生产者。众所周知，获胜的是北方，并且在战后他们开始快速发展，根本地区别于新北方的其他前殖民区。这一状况给一个美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由，用来说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也发生了内战，并且还有不少是南方这派获胜，但注定了这些地区近 200 年的落后和极度贫困。由于我们的改革者，我们现在就处在这种状况中。

并且保护私人生产者的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议会团在激烈的辩论中常常试图证明这点，但是改革者们故意不理会任何意见，并只听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这是一个服务于美国私利的，那时急需开辟苏联地区国家新市场的组织。现在，可以坚信地说，这就是俄罗斯，成了西方经济顺从的资助者，最后，自己负担延续了别人的繁荣，延缓了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

甚至是在国际关系中，各国政府也总是站在自己的生产者一边，最大限度地被容许疏忽。进入国际市场，是很复杂的，像在日本，就有专门的国营公司来支持自己的企业。而我们一切放任自流。像学游泳一样，捆上双脚扔进水里。最终，市场平衡确立了，但是，是畸形的，实际上造成了机器制造业和其他高水平加工生产行业的消亡。

我们把工业政策的缺失解释为不想增加政权腐败。刚一开始特惠，就马上等着推翻。但是，这种批评是庸人自扰。一切正相反。

如果有政策、有规范的文件，当中会分别写明，哪些生产领域需要支

持，哪些区域需要补充发展，在制定这些文件时是很明确的，在会议上（最好是在国会委员会和国会会议上）商讨，为什么，以什么为基础，必须给予这个领域或区域特惠待遇。而当只有官员、没有政策的情况下，他就可以自由地支配预算资金用到他想用的地方，包括并不是正当的用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受任何框架束缚，就可以支援并不是国家上层需要的某种节能设备的生产，而是支持北方河流通向俄罗斯岛的现代化的搭桥方案，沿此通道就能到冬奥会的主办地索契，这个俄罗斯唯一的亚热带气候的地区。

假绅士的想法是，政府不该支持生产电子产品、拖拉机和飞机，政府是“守夜人”的思想是19世纪初幻想的产物，没有任何现实意义。1992年，我成为出访奥地利国会代表团成员。他们领我们到国会大楼。我记得，议员马伊丹尼科夫——民主派的激进分子那酸溜溜的表情，当他看到奥地利的国徽时，哇，惊恐，令人憎恶的镰刀和锤头，紧握的鹰爪。我因此十分开怀，但同时很感兴趣的是，奥地利议会当时在研究什么法规。

得知，议员们在研究《有关利用热带雨林的法规》。并且，我还了解到，他们还有关于帮助山地农场主的法律。确实，由于成本高，他们生产的农产品很贵，但是，如果他们停止耕种的话，土壤会被侵蚀，所以他们的国家会给予补贴。这就是发达国家进行国家干预的细节，我们的激进分子不是总喜欢拿发达国家来引证吗？

我们的改革者们完全不切实际地对待企业。对于他们来说，织袜厂和发电站一样都是法人，他们并不想明白，发电站与织袜厂有什么区别，如果因为不能买到燃油，发电站停业了，那么一切由发电站供给的企业都要停工。

（三）货币政策

只是通过提高税收、紧缩货币量和增加信贷率来调节通货膨胀，必然走进死胡同，因为在财政政策上，我们的改革者们遵循的是极粗浅的、早已过时的18—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政策。

与之相应，早就沾染上了陈腐气的市场平衡正是在不正确的需求和建议下到来的，这些需求和建议完全符合社会要求。所以，那时高呼口号：“市场决定一切。”

尽管有20世纪的全部历史经验，尤其是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

但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的研究证明了，市场平衡的到来完全不是在那个把社会生产中不需要和被抛弃的作为几百万人民的需要的地方出现的。同失业、同贫困的斗争不可能没有国家的干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不干预市场的，市场自行解决一切。

改革者们将所有政策都用于抑制货币发行，而不明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不是货币数量（货币的通货膨胀），而是我们说得更多的消费的通货膨胀。

最终，我们用了 10 年时间形成了一种状况，在此状况下钱变得很贵。正因此，尽管说的是中小经营者，但是他们的发展也停滞了整整改革的 20 年，由于掠夺性的高利贷，又加剧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速度在最后时期增长得非常快。

至于 IMF，它之所以给我们如此愚蠢的建议，是因为这是该组织当时的主要任务。因为，这种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是西方繁荣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①]他们不强迫接受贷款，美元将不能成为世界货币，地方工业将不会被他们压制，就不会销售美国全球垄断生产的产品，等等。

此时，任务对于 IMF 来说是很轻松的，并不需要将此政策强加于谁，因为在国家里找到了一群虔诚相信提供的药方是良药的傻瓜（和/或是叛徒）。

请回忆一下，他们好像并没有特意欺骗我们，从最开始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走第三世界国家的道路。在报纸上，作为模仿的榜样，皮诺切特来了，对阿根廷改革发起人到来的兴趣高涨起来，而阿根廷人民是用反抗和游行来回应这些改革的。

总之，即便是从建设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改革者们的行为也完全是没有水平和令人谴责的。但是，现在我想谈论一下的是，市场和资本主义本身究竟是不是那么好？

六　私有化，目的何在

苏联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低刺激劳动、平均主义、管理官僚、不具有

① 这完全不是无法理解的秘密。伊玛努伊尔·瓦列尔斯泰恩创建了一个世界体系分析理论，该理论证明，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用一些国家掠夺周边国家。

主动精神。苏联后期，最受欢迎的一句话就是“不是主人!”，道出了灾难的本质。最初，当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劳动集体主动发展的思想积极地为自己开辟了道路。通过了相关法规，按照法规创立了劳动集体委员会，由它们来实际管理企业。但是实际上，由于机关部门的强制，再加上人们的惰性思维造成了劳动集体委员会只是在纸上起作用，或是开始暗中替换了工会。当时出现了一些思想，如果把国家所有权变成这些企业的工人所有权，那么企业将变得真正独立。在苏联时期，存在着没有被资本主义破坏的公社思维，还有它的企业们，这些企业很像大的乡村公社，因为人们在其中不仅工作，还有别的生活。企业里有自己的休息站，人们在一起休息，企业的工人们都住得很近。所以，有很大的机会实现集体所有制形式。

如果主人翁的感觉能给企业管理带来最好的结果，那么，按照此逻辑，最好就是让更多的人成为主人。

说到这，在当时，列宁曾说过，要声明，社会主义是文明的公社社员制度。

并且，那时所有制民主化的拥护者主要在西方。他们感觉可以把这个思想灌输给苏联，苏联人民当时还没有被西方世界的贪婪和营私腐化，就这样猛扑向我们。

我还记得 1991 年，在经济改革委员会上，美国该问题专家，约翰·西蒙斯那次热情洋溢的讲演。后来，我认识了帕吉欧·凯尔索，路易·凯尔索的遗孀，她能够在里根时期通过这样一个叫作 esop（员工持股制度）的法律。这个法律把实际的优惠条件给了企业所有者，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企业卖给这些企业的工人们，也就是工人本人。最终，在这些企业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强了纪律，亏损企业变成了盈利企业。

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卖主少得很，而在苏联，国家成了这样的卖主。

所以，1991 年通过了关于私有化的法令，计划全体公民都将有记名私有化的账单，这些账可以用作获得企业的股份使用。此时，企业的工人们，首先是想获得那些他们工作的工厂的股份。但是并不属于私有化范围的国家机关和组织的职员们、医生、老师、警察等，甚至也能用他们的账单上的财产来换取企业的股份。

道理很简单，他们作为其他参与创造计入私有化财富的公民，剥夺他

们的机会是不公平的。

私有者和工人的结合消除了我们早已知的固有理论，而现在用个人的性命让我们所有人知道了劳动和资本的矛盾。

正是这些私有化法规的最进步的因素，给了改革者们当头一棒。

并且，领导这场斗争的不是伊戈尔·盖达尔——这个意志品质不高的人，而是安纳托利·鲍里斯耶维奇·丘拜斯。一个传奇的人物，甚至是个不祥之人。

原因在于，关于私有化的法令在他们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通过了，在 1991 年 6 月，甚至，很少人记得，任命了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列伊为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在一次开会讨论方案的时候，那时已经不年轻了的（当时 50 岁）马列伊，就应该向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的职员们提出要求的原因对我说："这应该是'改革的基路伯（九级天使中的第二级——司智慧）'，因为舞弊的诱惑将会增加。"

看到根源了吧！

1992 年夏初，当我们开始研究改革者们的政府提交的《有关私有化法规》的修正案时，整个争论围绕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企业固定资产指数化。价格在改革几个月之前那段时间增长了 20 倍，而设备的价值仍旧没变。因此，国家财产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

在工业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就这个原因激烈地争论。那时，我申明："你们明白吗，由于你们的伟大的改革，固定资产价值开始比流动资本价值少了。"

丘拜斯冷笑一下，回答说："还没有开始"——并且是用这种腔调，表示他明白了，这正是给了他们这样一个任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固定资产价值指数化，为了尽可能便宜和快速地把它们卖完，并且他不做任何妥协。

第二个问题——也正是企业所有者，首先是他们的职工的想法。实际上，这个问题如下：私有化下是否提供给劳动集体更多的优惠，或是对所有制的冲击方面给予倾斜，允许用属于个人私有化账单上的资金作为交换，将企业大部分的股份转给全体居民。此时，改革者们努力做到一切，为了让那些工作的人，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成为私有者。他们需要典型的资本主义和戴着大礼帽的大资本家们，就像马雅可夫斯基宣传画中的

那样。

当然，在斗争中他们还使用报刊的力量。借助于报纸发出愤怒的号叫："最高苏维埃夺去了人民的所有权，一切都给了工厂的工人们，教师、医生和军人的命运任凭摆布。"

但是，在通过法律修正案的时候，我们成功坚持了之前的方案。而这之后，盖达尔和他的团队耍了个著名的花招，把记名的私有化账单变成私股证券，这清楚地表明，医生和教师被他们无视了。对于他们来说，主要是尽可能快速地集中所有权到少数人手里。

七　私有证券的冒险行为

这个故事已经成了传奇，所以，作为那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我想详细地解释清楚。

按照法律，应该有记名的私有化账单。它们应该作为账单在储蓄银行办理手续，最主要的是，按照收归国有的要求有所限制。而且，保护它们避免伪造，这是相当重要的。

法令（俄联邦 1991 年 7 月 3 日第 1531－1 号法令《关于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和市营企业私有化》）规定如下：

> 第 11 章　为获取国有企业和市营企业的资金来源
>
> 1. 为获取国有和市营企业可使用公民的个人储蓄、记名的私有化存款、个人记名账单、现行法律中 9 章 1 条确定的法人的私有财产，甚至还包括借入资金。
>
> 国有和市营企业所有权无偿移交给公民的程序，是国家按照记名私有化账单私有化存款的目录进行，在私有化过程中这些存款的使用按照俄联邦的法律《关于记名的私有化账单和存款》进行。

第二段已经失效。——俄联邦 1993 年 12 月 24 日第 2288 号总统令。[①]

1992 年丘拜斯团队提出了大量的修正案，包括计划改变这些规则。

---

① 炮打白宫之后废除。

但是，就像我说过的，这些修正案并没有加进法律。但是《关于记名的私有化账单和存款》的法律那时并没有准备好。

那时，在确立 1992 年私有化大纲的时候（实际是在他们的修正案没有通过之后一周），他们偷偷地，没有任何说明地加入了伪善奸诈的表述。

> 7　公民记名的私有化存款的使用
>
> 7.1 记名私有化账单（私有化证券）体系的确立不晚于 1992 年 11 月 1 日。俄联邦政府不晚于记名私有化账单（私有化证券）支付开始前一个月，将作为记名私有化存款（私有化证券）属于支付的总额的部分，以及向每个公民支付的数额，提交俄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
>
> 7.2 为了管理流转和分配记名私有化账单的资金，将建立全级别的财产管理委员会和财产基金会，并促使建立各种财政机构（私股证券公司、基金会等等），保障最广泛地吸引企业家组织加入。

也就是说，所有的账单和存款好像都是按法律存在的，只是附带出现了谁都不明白的私有化证券。并且，没有任何补充解释。

6 月 5 日，激烈的辩论之后一周，在一个极其平和的氛围中，依法通过了大纲。“而鉴定委员会，经济改革委员会究竟在哪儿呢”——克拉萨夫琴科领导着经济改革委员会，他完全听命于丘拜斯，所以没有必要等待委员会的帮助。

总的来说，鉴于议会工作的特点，这里必须稍作解释。在分析研究法律草案时议员获得的那些信息，再重新修订实际上是不可能了。

如果议员不侧面研究法律草案的话，他实际上不可能亲自掌握材料。我记得，我长久地为此伤脑筋，尝试仔细研究每一个法律草案，而之后，当我在奥地利议会中看到，大的垃圾箱里堆积如山的没有被看过的法律草案时，我明白了，这是普遍现象，难以克服。

实际上，当然是能够找到摆脱这种状况的方法。在党团中有鉴定委员会，他们和议员们一起为本党团确定总体立场，并且传达给议员们，同时，结合党纪，根据已通过的决议投票。

但是，1992 年所有的机制都还处于萌芽状态。

在那之前，丘拜斯团队一方还没有太过欺诈的行为。

后来，一切不出所料。借助于现总统的补充权力，他们把含有以下规则的命令方案带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 为了加快国家财产向俄罗斯公民流转，并且吸引更广大的居民阶层加入私有化进程，为必须完成1992年俄联邦国有企业和市营企业私有化国家大纲要求，通过以下决议：
>
> 1. 从1992年10月1日起，俄联邦私有化证券（私有化账单）系统生效。
>
> 2. 每一个俄联邦公民都有权获得相当于每一次发行名义价值的一份私有化证券。

也就是说，只是重新配置账单和证券到不同的地方，现在，在括号里是账单，而另一部分，那里说是证券支付，关于账单什么也没说。并且，在此基础上实行私股证券系统。

那年8月，最高苏维埃会议也没有召开。按照补充权力惯例，这种情况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应该研究命令。

那时掌管经济的是菲拉托夫（现任叶利钦基金会会长），在克拉萨夫琴科经济政策委员会，他们把它束之高阁，并没有仔细研究，就在两周后成了法律。[①]

请同意，这是高水平的欺诈。后来，故作委屈，丘拜斯不止一次地发表煽动性的蛊惑人心的声明："但是，议员们为私有化证券投了赞成票。"

于是，私有化证券代替了账单。他们差点就可以在大街上买卖了。这样一来，实际上，丘拜斯团队尝试更公正和公平分配所有权的努力化为乌有。私有化证券直接可以用钱买，尽管，所有人还记得丘拜斯一句名言，一股私有化证券的价值相当于大约两辆"伏尔加"汽车的价值。正是如此，改革者们做到了这点。

同时，最高苏维埃召开了1992年秋季会议。除了私有化证券令，如

---

① 尽管，当然，在关于私有化的法律中有直接指出，私有化账单和存款的问题用单独的指令进行调节，这对于改革者们来说，是眼中钉，所以在炮打白宫之后，他们用单独的指令代替了这种状态。

法炮制，在没有我们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另一个命令，按照此命令，所有俄罗斯企业要在 1992 年年底，五个月之内，成为股份公司。因此，要进行财产登记和大量的工作。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真正实现股份制是在好几年之后）。显而易见，一切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加入到资本家阶级制订的冒险计划中。

第三篇

文化篇

解析2016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文化政策战略》

李　琳

李琳，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学士、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与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后工作人员，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俄罗斯文献翻译、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

2016年2月29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历经一年多的讨论和完善，最终颁布了《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文化政策战略》[①]（以下简称《文化战略》），全面拉开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复兴计划的帷幕。此战略由俄联邦政府文化部根据2014年6月28日联邦法律性文件《俄罗斯联邦战略规划》和2014年12月24日普京总统令《国家文化政策战略的基本原则》，经过历次草案修改，并于2015年12月提交公众讨论后，由国家联邦政府文化部联席会议表决颁布实施，文件有效期截至2030年。

一　《文化战略》的出台背景

被普京总统称为“上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政治灾难”的苏联解体，带给俄罗斯民族近10年经济社会的严重停滞，甚至倒退，也使俄罗斯文化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席卷而来的西方文化使整个国家的社会精神和文化

①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 29 февраля 2016 года №326-р.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до 2030 года.

水平急剧下降。这在社会思想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原有的价值观念崩溃，价值观定位出现偏差，许多人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个人主义情绪增长，无视他人权利，社会人际关系淡漠。在社会情绪方面，社会上的相互敌视情绪激增，反社会的行为表现大幅增加；在社会教育方面，歪曲历史记忆，甚至完全否定国家历史的重大时期，传播俄罗斯历史落后性的虚假概念；在文化建设方面，人才外流严重，学俄语的外国人数量逐渐下降，各种历史遗迹缺乏保护，社会文化机构生存状况堪忧。特别在文学创作领域，有人公开提出文学“私有化”的主张，强调文学只是作家个人的事，文学作品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反对文学发挥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

后苏联时期的文化危机可以用“混乱”一词诠释，不仅是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外部文化传媒的大肆涌入，更是国家内部道德体系、语言文化、社会价值的全盘“混乱”。最为可怕的是，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文化人道主义危机，社会知识和文化层面的减少；国民共同价值观的扭曲；反社会行为、恐怖行为、侵略行为增多；具有错误落后的历史观念；个人主义、无视他人权利；等等，而这一切将极大地威胁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将瓦解俄罗斯多民族国家团结，将侵蚀传统高尚的俄罗斯精神和道德价值。对此普京总统多次指出，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流行文化、劣质产品的泛滥，导致世界充满动荡，种族分裂和暴力纵容、民族分离和宗教攻击、外语入侵和俄语消亡，俄罗斯时刻面临着外来文化的侵蚀和攻击。所以《文化战略》开篇写道：“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化影响力日益衰退，经济下滑、国外文化入侵、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艺术匮乏、学习和了解俄罗斯语言文化的越来越少；外国势力企图篡改俄罗斯历史，甚至修改伪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俄罗斯各地种族和文化多样性明显，文化区域差异显著，缺乏俄罗斯联邦统一的文化空间……”

为了防范风险和威胁，俄罗斯联邦一方面对文化投入了大量资金，采取了多种措施吸引赞助和慈善，促进文化融资和额外投资，以确保俄罗斯文化在全球化世界中得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2015 年 12 月 25 日塔斯社发表《确立国家文化政策战略》文章指出：“国家文化政策不应仅限于单一领域，应推行国家文化统一政策的战略实施，以避免某国或某种文化的入侵”；普京总统也指出：“要尽快落实国家文化政策实施战略。只有明确的发展战略，才能完成国家文化遗

产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明确国家文化价值的总体导向。此战略具有全面性、多面性和复杂性，涉及了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多个方面，覆盖了俄罗斯全体民众，以及文化组织和各社会机构”。

二 《文化战略》的总体目标战略和任务

被俄罗斯联邦奉为“文化《圣经》”的《文化战略》长达44页，详尽地阐述了俄国家文化政策的战略目标和规划部署，涵盖了六大部分：总则、战略基础、战略目标、战略实施、战略机制、战略阶段。

《文化战略》阐明国家文化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形成明确而统一的国家文化政策的价值导向；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强化俄罗斯公民的文化教育。在具体实施中有七个现实目标：形成民众和谐统一的人格；促进俄罗斯文化价值观和人类福祉的一致；加强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养成；创造良好的公民教育条件；维护历史文化遗产；促使传统的社会价值观、规范、习俗代代相传；为公民获取知识、信息和文化提供条件，促进创造力的实现。

围绕文化战略的总体目标，《文化战略》规定了八大任务，即保障俄罗斯联邦人民的文化遗产；促进各类文化活动和相关产业发展的实施；加强人文学科建设；维护俄罗斯联邦文字和语言；在国际上扩张俄罗斯文化和人道主义；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支持儿童和青年运动；保障良好的信息环境；等等。

三 《文化战略》发展的优先领域和战略重点

《文化战略》不仅指明了国家文化战略的总体任务，而且致力于解决国家层面出现的现实问题，确定了国家战略实施的优先领域和战略重点。

1. 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大力推广俄语在全球传播领域的扩张，营造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国外学校和文化中心扩张的有力的体制和环境；发展跨国境和跨区域的文化合作；强烈打击西方社会抹黑俄罗斯历史、歪曲俄罗斯在世界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历史观念、重新修订国外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利用俄罗斯丰富的民族文化开展多边国际合作；促进俄罗斯电影、电视剧、文学、音乐在国外

的传播，推广俄罗斯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充满活力现代文明国家的良好国际形象；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进行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传播；推进俄罗斯文化机构与境外文化组织的合作交流。

2. 保障国家领土安全和文化安全，维护全俄罗斯的文化统一性

促进俄罗斯公民身份的认同；保障俄罗斯联邦多民族统一团结；积极促进并推动传统俄罗斯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加强对传统文化活动和民俗活动的扶植力度；在俄罗斯全境增加国家重点文化单位，推进国家文化政策和战略。

3. 维持俄罗斯文化优势，激发各区域文化潜力

缩短俄罗斯地区文化差距，调整各区域不平衡的文化基础，为民众提供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维护各民族、各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发展本土文化和旅游潜力；保持并促进俄罗斯杰出文化人物的纪念日活动，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传承的主人翁意识；制定和实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的文化建设，推进城乡文化环境的良性健康发展。

4. 增强教育的基础文化功能

确保俄联邦教育计划在全国范围的顺利推行，俄语、民族文学、国家历史是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创造条件和激励机制，提高俄罗斯文学语言在教育中的优先地位；发展多途径的爱国主义教育，考虑到公民的年龄等特点，开展跨部门合作，提高爱国主义教育方法和手段；加强公民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利用媒体宣传俄罗斯军事历史和哥萨克民族历史，延续伟大卫国战争的精神和传统。

5. 提高家庭进行教育和传播俄罗斯文化价值和规范的社会作用

强化传统家庭观念，改善家庭地位，维护传统家庭模式，树立俄罗斯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复兴代代相传的俄罗斯传统家庭，改善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鼓励多子女家庭，提高多子女家庭的社会声望；鼓励和促进家庭历史文化的传统；创造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承担责任，建立教育体系中的法律、经济、医疗、心理等问题的家庭咨询服务。

6. 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发展

通过立法和激励措施，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建设文化设施，改造修复文化遗产项目；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发展文化旅游事业，提高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促进文化古迹的规划和保护，加强文化遗产立

法和规制；在民众中大力推广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支持民间手工艺品的传承；加大古典音乐、歌剧、芭蕾舞剧、话剧等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提高俄罗斯艺术专业水平，促进其在国际艺术舞台的影响力。

四 《文化战略》的意义及其启示

1. 以《文化战略》对抗西方“文化侵略”与“文化殖民”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经历了漫长纷繁复杂的显性或隐性西方“文化侵略”，充满了对“文化殖民”的担忧。因此，制定一个稳定的、中长期的“文化战略”，一方面得以缓冲文化碰撞，保证一定程度上新旧文化的兼容，避免文化同化与扩散；另一方面在文化现实变迁的环境下，对抗异域文化，维护自我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观。

文化学者阿·卡捷丘克认为，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由于文化环境的变化，原有文化不断受到“文化冲击”和“文化碰撞”，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习惯也会随之发生“文化同化”和“文化异化”。从西方的“文化冲击”，到“文化同化”，再到“文化殖民化”，最后显示西方的“文化侵略”的成功。《文化战略》首要意义就在于防止西方的“文化侵略”。

2. 《文化战略》强调发展俄罗斯民族与斯拉夫文化以保护国家文化安全

国家《文化战略》认为：俄罗斯传统文化悠久而独特，历经千年的不断传承，以斯拉夫文化为核心的俄罗斯文明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俄罗斯硬实力的增强，斯拉夫文化在国外，包括东方和西方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发挥在文化战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引领国家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提供资金和物质资源，加大对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从而复兴斯拉夫文化的优势地位，提升俄罗斯文化软实力。

所有的主权国家中保证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建立以国家文化安全为中心的文化政策原则和文化基本战略，并实施国家软实力建设方略。俄罗斯制定国家《文化战略》也是将发展俄罗斯和斯拉夫文化视为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中之重。

3. 发展俄罗斯民族语言重振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与主权独立

俄语作为俄罗斯传统、民族最重要的国家语言，承载了重振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作用。据俄罗斯官方统计，联邦数十所高校在所有的独联体国家、中国等东亚国家都开设了分校，共有 7 万余名学生在境外学校学习俄语。俄联邦政府在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设立了俄罗斯文化中心，提供语言培训和语言服务，截至 2012 年语言培训学员总数超过 1.9 万人，并呈上升趋势。国家创造各种条件和激励机制，提高俄罗斯语言文化的普及和推广，2015 年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维·萨多夫尼奇被授予别尔嘉耶夫奖章，以表扬他对民族传统文化推广中的卓越贡献，“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和文化值得代代相传，应了解我们的过去，遵循民族传统文字和文化，恢复俄罗斯民族价值观，以保证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完整”。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主体的联邦共和国确立一个中长期文化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文化战略有利于打造持续的文明正面形象，提高国家文化影响力，对于社会普遍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品牌”的建设更具有深远影响。

普京保守主义分析

吴恩远　李晓华

2013 年 9 月 3 日，普京在接受美联社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联合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信奉“保守主义”。他说：“我是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实用主义者。”此后，他在当年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发表国情咨文以及参加年度记者招待会等多个场合强调了自己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倾向（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在 2008 年）。普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强调自己的“信仰”问题呢？这一问题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

一　普京“保守主义倾向”提出的背景

1. 苏联解体后国家信仰的缺失

当代俄罗斯知名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亚科夫曾说过：苏联解体的最大悲剧，还不仅在于丧失了多少领土、多少人口，更重要的是中断了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主线，俄罗斯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①

苏联解体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被抛弃，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粉墨登场，各个阶层和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的混乱导致了国家认同缺失，思想道德退化，社会停滞不前。叶利钦当政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 1996 年总统选举后发出制定新民族思想的呼吁，但统一的民族思想并未形成。普京上台后也意识到“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南辕北辙价值观念的国家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工作是不可能的”。因

① Поляков Ю. А. , *Россия в xx в. :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М. : Наука, 2002, с. 17.

此，他指出：国家和民众“在目标、价值观、发展水平这样一些主要问题上意见一致是十分重要的”[①]。普京提出“保守主义”，目的就是为了填补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保持俄罗斯自己的民族认同。他认为获得和巩固民族认同是俄罗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实现了精神、文化和民族的自我认同才能继续前行，否则将不能应对国内外挑战，不能在全球竞争中取得胜利。[②] 2009 年 11 月 21 日俄罗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圣彼得堡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把“俄罗斯保守主义”确定为党的意识形态。在其纲领性文件中写道：“党的意识形态是俄罗斯保守主义。这是稳定和发展的意识形态，避免停滞和革命，不断进行创造性的社会革新的意识形态。”

普京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提出，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国家信仰的缺失，同时更有利于加快俄罗斯寻找民族思想的进程。

2. 对意识形态领域全盘倒向西方的反思

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人，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在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后，全盘接受以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

当时的俄罗斯精英承认了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普京在作为第一任总统的时候曾明确地表示过，俄罗斯尊重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不打算搞有俄国特色的民主。这说明在价值标准方面，俄罗斯的政治家曾经非常努力地接近于西方的标准。[③] 俄罗斯人把“西方民主”等同“生活富足”，认为只要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改革，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他们开始积极地“融入西方文明的大家庭”。

然而片面追求西方价值观对俄罗斯文化形成强大的冲击。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讲话时谈到这个冲击的后果：“今天俄罗斯不仅遭受到全球化给民族认同带来的客观压力，还要饱尝二十世纪我们的民族灾难——国家两次解体所带来的恶果：民族的文化和道德价值遭受致命打击，传统中断、

---

①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30 декабря 1999. http：//www. ng. ru/politics/1999 - 12 - 30/4_ millenium. html.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ого клуба《Валдай》. 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www. kremlin. ru/transcripts/19243.

③ 冯绍雷主编：《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兼及新帝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5 页。

历史割裂、社会去道德化、相互的信任和责任感缺失。这些正是我们所面临严重问题的重要根源。”[①] 这就是说，俄罗斯民众对西方式的民主已经厌倦，他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照搬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恶果。

现在普京明确说道：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不适合俄国国情。

3. 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需要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政治上照搬西方的模式；经济上实行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休克疗法”。但激进经济政治民主化改革未给俄罗斯人带来预期收益，反而造成国内政治持续动荡、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社会发展在经历了自由主义的挫败之后，俄罗斯人渴望稳定和安全的生活，希望加强国家权威，使俄罗斯走出困境，走上大国之路。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社会调查表明，俄罗斯民众渴望“权威”，希望“铁腕人物”出现。比起“民主、自由”来，72% 的俄罗斯百姓更希望“稳定和秩序”。[②]

早在 2000 年《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就指出“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经济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俄罗斯再也不能经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与灾难以及激进改革了”，因此，他认为“经济和民主改革应该采取渐进的、审慎的方法进行，保证政治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不下降”。2012 年国情咨文中，普京强调“稳定是发展和改善生活的主要条件”，当年 12 月 20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再次坦言，“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稳定。”

俄罗斯“战略通讯中心”的迪米特里·阿布扎罗夫对此评论道，在经济环境比较困难的背景下，人们更趋于谨慎，“对很多人来说，保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传统习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倾向于保守，这是正常的，是全球性的趋势”。所以普京发表 2013 年度国情咨文时，他的演讲获得了 34 次掌声，关于保护传统保守价值观的论述也得到全场鼓掌欢呼。

二 普京保守主义内涵

普京认为有三种意识形态不适合俄罗斯。首先是苏联时代的思想，如

① Заседании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Валдай》. 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 // www. kremlin. ru/transcripts/19243.

② 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0 页。

今的俄罗斯社会已跟它分道扬镳；第二种为君主制，有人习惯为十月革命前的沙俄做各种粉饰；最后一种当属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论证了他为什么选择俄罗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因。①

统一俄罗斯党主席、前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把“保守主义”作为党纲原因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保守主义来源于‘保持’一词，现代化则意味着变革。保守主义和现代化之间不存在矛盾。现代化是过程，是任务，而保守主义是意识形态”，“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就是爱国主义、重视家庭、历史记忆、尊重传统、健康和民族繁荣、保护私有财产、尊重法律；就是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和谐；就是对自己命运和家庭的责任，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感。俄罗斯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新加坡。我们需要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②

普京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缘起于西方，又独具俄罗斯的特点。

1. 强调稳定发展为保守主义精髓

2013 年 9 月 3 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前夕，普京在接受美联社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联合采访时强调，“保守主义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保守主义意味着立足于传统价值观，意在发展是其必要元素，这是绝对原则性的东西。”③ 在同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他引用了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别尔加耶夫的一句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保守主义的含义不是阻碍向前和向上（发展），而是阻碍向后和向下（发展），阻止混乱局面的产生”。

俄罗斯学者杜金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界定，它包含了对进步根本不同的理解。它从一个盲目畸形发展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惯性运动转变为有选择的、深思熟虑的战略，这个定义中没有故意鼓励的成分，也没有明显阻止的现象。这句话包含了保守主义的本质：不是反对进步，而是实现多元化和选择的多样性。与自由主义不同，它是在精神目标指引下的

---

①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Валдай》. 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www. kremlin. ru/transcripts/19243.

② Грызлов. Б. Сохранить и приумножить：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1декабря 2009. http：//izvestia. ru/news/355987.

③ Интервью Первому каналу и Агенству Ассошиэйтед Пресс. 4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www. kremlin. ru/events/president/news/19143.

发展。[①]

一般说来，保守主义都重视社会秩序，而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是存在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这个权威只能是国家。与西方保守主义者相比，普京更加强调国家在改革中的作用：在政治层面，加强在国家权威的基础上发展民主，强调有序和控制；在经济层面，发挥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寡头绑架国家的局面，理顺了市场经济秩序，增强了俄罗斯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普京还重视对国家媒体的控制。按照政治分析师帕维尔的说法，普京收回了公共电视台、独立电视台的控股权，重组国有媒体，这是克里姆林宫与反对派、西方国家舆论阵地争夺战的结果，是俄罗斯保守派的胜利。

2. 强调尊重本民族历史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奉行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特别是苏联时代的历史，从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所以普京当政后多次要求澄清历史领域的乱象，并为此专门成立由国家杜马主席拉雷什金领衔的国家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2014 年 1 月普京在接见这个委员会指出：人们时常有意无意轻视我们的先辈在过去的年代所做的一切，或者轻视近百年来俄罗斯国家的存在，我实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说道：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稍后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100 周年。无论我们对它们怎样评价，这些日子都具有全民族的意义。这些结论是对当年充斥否定这些重大事件言论的反驳。

普京主张尊重历史传统，强调家庭观念，更重视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他认为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同时，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批评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人们只有历史的耻辱感，蔑视甚至仇恨自己国家的历史，否认国家的历史经验，任何民族认同都不可能形成。“如果没有尊严感、没有对祖国的热爱，这种批评是对自己的贬低，毫无成果可言。”普京强调对祖国历史的认知和尊重应该建立在真正的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缺乏爱国主义思想而妄谈民族认同是无益的。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公民认同的建立需要共同价值观、爱国主义意识、公民团结及责任感、遵纪守法、共

① Дугин А. Новая формула Путина. 30 января 2014. http：//zavtra. ru/blogs/novayaformula-putina.

同参与决定祖国的命运。”①

普京认为，争夺价值观的斗争，是不同于军事战争的另一种战争形式，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同样能够导致国家崩溃和分裂。2012 年 9 月，普京邀请俄罗斯各界代表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座谈，主要讨论爱国主义问题。他认为，爱国主义是决定青年人精神状态的道德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建设自己的生活、培养孩子、发展社会，最终巩固我们的国家。他指出，有些国家力图影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世界观，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推崇自己的价值观理念——这就是当前的现实。信奉“人人为己”、自私利己和不劳而获的理念，不可能建起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平安的国家。我们应该在牢固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未来。这个基础就是爱国主义。

俄罗斯学者杜金指出：普京保守主义的重要内涵是正面评价历史传统，把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社会史看作仿效的榜样，尊重和继承民族文化传统。②

3. 反对盲目照搬外国模式、强调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维护世界多样性

普京奉行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反自由主义和反西方主义的。他主张世界多样化，指出“一些国家企图用某种方法恢复单极世界的统一模型、侵犯国际法和国家主权。这种单极世界的统一模型需要的不是主权国家，而是附庸。在历史层面，这是在拒绝自己、拒绝神赐、否定世界多样性的本质。”③

他强调俄罗斯文明国家属性，重视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2012 年 1 月，在为竞选总统而发表的有关民族问题文章中，普京首次把俄罗斯称作独一无二的文明（国家）。普京的这一思想得到多数俄罗斯人赞同。正如莫斯科与全俄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所说：“俄罗斯是一个文明国家，它有着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自己的社会发展规律、自己的社会和国家模式、自

---

①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Валдай》. 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 // www. kremlin. ru/transcripts/19243.

② Дугин А. Новая формула Путина. 30 января 2014. http: //zavtra. ru/content/view/novayaformulaputina/.

③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Валдай》. 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 // www. kremlin. ru/transcripts/19243.

己的历史和精神渊源体系。”①

普京反对盲目照搬外国模式。他指出，那些企图迫使俄罗斯借用外来文明的粗鲁行为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对思想、意识形态及外交主权的向往是我们民族性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文明国家模式决定了我们制度的特点，它灵活地照顾到不同地域的民族和宗教传统，保障了多样性的统一。

4. 反对霸权主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政策，避免与西方产生对抗。1992 年担任俄罗斯政府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甚至说过：如果西方的外交政策已经很好，我们何必还要自己的外交政策？1995 年 5 月 31 日，科济列夫宣布俄正式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签署了北约与俄的《双边军事合作计划》等条约。俄罗斯以为这样就能得到西方的援助。

但西方不仅口惠而实不至，还不断蚕食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昔日的超级大国沦落为“西方国家的小伙伴”，俄罗斯的民族尊严受到极大伤害。在 2014 年 3 月 18 日讲话中，普京深刻总结了自己思想的这个变化。他说：“我们曾经真心希望能与西方的盟友展开对话，一直希望能就重要议题与西方国家展开合作，能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开放且诚实的。但我们没有看到回应。相反，我们一次次地受骗。”②

因此，普京在国际关系中坚决主张反对单一霸权主义。他批评“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已经走上数典忘祖的道路，包括抛弃了构成西方文明基础的基督教。许多道德基础和传统认同遭到否定：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性的……并试图将这种模式强压给其他人及全世界。”③与此同时，普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否定主权过时论，支持走不同的民主发展道路。在 2013 年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强调，“主权、独立自由和俄

---

① Патриарх Курилл: Россия—это страна-цивилизация. 31 октября 2013. http://www.georg-eparhia.ru/437-patriarh-kirill-rossiya-eto-strana-civilizaciya.html.

② Обращ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③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Валдай》. 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19243.

罗斯的完整统一是无条件的，这是一条禁止任何人跨越的‘红线’。”

西方媒体对此评价道：普京在瓦尔代的演讲则印证了他作为欧洲保守主义政客的特点，即不遗余力捍卫国家主权：公民与政治家可以持任何观点，但重要的是，任何势力不能从外部将观点强加给国人。

普京上台前后，俄罗斯以及西方的媒体纷纷对普京及其思想进行猜测，一些分析家试图给普京贴上这样或那样颜色的标签。有人断言普京是“反共分子”；有人认为他是恢复苏联标志的“保守克格勃”，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有人说普京是“民主派”，反对意见则称普京是“铁腕专制主义者”；有人认为普京既不属于右派，也不属于左派；也有人认为他政治上非白，也非红……

普京自己多次强调：要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他提出信奉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普京的思想定位，使普京的思想成为可以捉摸的，俄罗斯国家发展有一定思想轨迹可循，这就是其现实意义。

集体主义在俄罗斯的回潮

武卉昕

起源于13世纪的俄罗斯村社制度在延绵数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培育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特质，并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基础，而集体主义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苏联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元素，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巨大的道德感召作用。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终结，民众价值世界里的集体主义道德观被个人主义代替；舆论界一度将集体主义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等同视之，对其恶语滔滔，愤然谴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集体主义和其他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念一起成为被攻击和嘲笑的对象，被起伏不定、变幻莫测的思想浊流排挤，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但是，情况在近期发生了转变，集体主义在俄罗斯初现回潮之势："个人主义正被集体主义所冲淡"①。"集体主义"的字样重新见诸包括自由电台、"俄罗斯之声""文学报""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等各大报纸电台及其《自由思想》《社会科学与当代》《人》等重要学术期刊；电台和电视台也多有举办关于集体主义的讨论和访谈节目；中小学重拾集体主义教育；在常用俄文搜索引擎 http：//yandex.ru 下输入"коллективизм（集体主义）"一词，出现的相关词条多达41.6万，而与"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个人主义）"相关的词条才66.2万，要知道，目前的俄罗斯社会毕竟是以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为主导的。

集体主义在俄罗斯的回潮之势并非偶然现象，亦非主观臆断，而是有着历史及现实依据的：

---

① 见 http：//rus.ruvr.ru/2009/02/20/928019.html，2009-й год объявлен в России Годом молодёжи，Голос России，2009，с.2－20。

一　文化传统的辗转传承

俄罗斯的集体主义并非人为培养，而是特殊自然及社会环境影响的产物。疆域辽阔、气候寒冷、人口稀缺，这些先决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滞其经济发展、社会组织运行、基本价值体系形成，也注定了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悲剧。于是，“共同体（община）”就成了对抗严酷自然环境的社会组织保障，并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村社”。这种从“血亲公社”自然演化而成的地域联合体，实行土地公有、集中生产、合作劳动和产品私有制度。这一社会组织模式甚至起到了独立行使司法权力，审理民事案件，管理组织生产，重分土地，救济贫困、赡养孤老、抑制分化、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互帮互助之风渐趋成型，个人主义被唾弃，“集体主义”则成为“村社”组织的特殊文化符号，构成俄罗斯民族稳定的文化心理传统；被赫尔岑称为防止资产阶级革命“避雷针”的“农村公社制”，后来在事实上“将农村公社与自由的技工合作团体直接变成农业与工业生产组合”①，在形式上构建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组织胚胎，在价值观念体系上铸造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坐标。

可以说，作为苏联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集体主义在俄罗斯的文化当中是有历史渊源的，从“村社”产生的 13 世纪辗转传承，在前十月革命时期已经变成了“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活方式”。“合作”不但是生存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特殊的文化存在范式。而“‘合作’永远都是针对集体而言的，无论认可还是不认可，集体主义因素的作用是显见的，它是合作实现的条件”②。可以说，集体主义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要素已构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模式。

苏联解体前后，价值世界的混乱无序、“去道德化”的盛行、对“个人主义”的极度吹捧都只能被看作是一种外在的批判，并没有产生一种能够超越自身的文化要素，也不是一种自觉的批判性重建。毕竟，作为一

---

① 参见［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怀栋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6—267 页。

② http：//www. apn. ru/publications/article20927. htm，Игорь Бойков：О природе русск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изма，2008 - 10 - 29.

种经久不息的文化传承，“集体主义是不可能被摆脱的”①，而“社会转型则是暂时的，就如搬家一样，迟早会完成”②。相当多的事实证明，个人主义在本质上并没能打破集体主义的自在性存在：荷兰著名文化学家2008年在全球范围内所作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与集体主义价值立场相逆的个人主义的认同，在不同的国家呈现不同的比例：澳大利亚为90%，加拿大为80%，荷兰为80%，比利时为75%，英国为89%，德国为67%，丹麦为74%，意大利为76%，新西兰为79%，美国为91%，而俄罗斯只有23%，并指出“俄罗斯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③，俄罗斯著名文化社会学教授 Никовская Л. И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并得出“集体主义在俄罗斯依然占优势”的结论；俄罗斯著名政治家、国家管理规划和问题分析中心主任 C. C. 苏拉克什 2009 年 9 月 16 日在接受“新时代”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强调：“同心同德、集体主义和崇高的精神世界是俄罗斯的文化价值源泉”；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在自己的发言提纲中也指出：“强大的国家、社会平等和集体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本质”④。

二 历史发展的价值澄清

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在苏联解体的前后，几乎遭到全民摒弃：相当多的人将其直接等同于官方意识形态，认为这种公有制的衍生物是社会改革的绊脚石；但是，对集体主义的否定和厌恶并非意味着这个社会不需要它。历史经验证明，社会改革的有效性往往直接取决于某种典型的、确定的、有效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否。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这样重演：1848 年革命前，俄国对西方自由主义顶礼膜拜，但是1848 年欧洲诸次革命的失败导致俄国对自由主义的迅速摒弃，俄国知识阶层从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能成为解救社会危机的灵丹妙药；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自由

---

① http：//www. evotehno. ru/kak-ucheniki-treh-pokoleniy-sryvali-uroki-v-shkole/kollektivizm-nelzya-vylechit. html，коллективизм нельзя《вылечить》，2010 - 02 - 09.

② 余秋雨：《历史的脸谱》，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 页。

③ 参见“俄罗斯国家管理规划和问题分析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 rusrand. ru/enotes/enotes_ 103. html，Никовская Л. И. ：И все же коллективизм в России преобладает，2008 年 5 月 9 日。

④ Марш“красных белогвардейцев”，Правда ，07. 11. 2006.

民粹派推行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受到热捧，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加以曲解和非难，但因其指引的社会革命屡遭失败，最终也在现实面前迅速走向覆灭；同样，制度解体导致的近 20 年的尘土飞扬之后，在整个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中，以往那些超过社会发展实际的、脱离了特定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开始理性回归，俄罗斯需要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来指导社会走向正轨。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开始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包括重新评价斯大林及其主义、重新评价苏共二十大、再版联共布党史教材、官方明令禁止肆意抹黑和否定自己国家的历史、重建少先队组织、恢复官方道德教育、倡导爱国主义、以“俄罗斯思想”来拯救千疮百孔的社会……而集体主义几乎是上述行动的时代印记，是在苏联时期在核心位置的“公有制”背后的价值支撑。并且，集体主义回潮绝对不是一个单个的、孤立的现象，而是社会整个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发生变化的表征之一，它们彼此互为有力论据，构成价值澄清的大潮。

三　共同利益需求背后的价值需求

在集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真正起作用的年代，社会平稳运行，人民安居乐业；而解体后对个人主义的追捧，不但没有换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而且连原来相对平静富足的生活也不见了踪影。追求“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代价是物质生活水平的丧失，这使那些在歧路上饱受挫折的人认识到那些全无物质力量支持的观念思潮的浅薄无能，正应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农民与工人需要食物、栖所、靴子，至于投票权、自由宪法、个人自由之保障，这些对三餐不继、衣不遮体的人并无多大意义”①，因为根据历史唯物论，是社会因素决定政治因素而不是相反。当代俄罗斯在制度上的“伪资本主义”特色使人认识到当初把国家彻底搞垮的社会改革的巨大欺骗性。“如果‘政治’被理解为‘经济的集中表达’，那么群体思想观念就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后果的集中表达”②，集体主义回潮的背后是俄罗斯人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任危机，而这

①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怀栋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6 页。

② *Борис Славин.*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идеологии.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8（6），с. 26.

一切都是俄罗斯实行的不清不楚、不伦不类的私有制的后果。事实上，从1998年至今的相当多的民调结果中都能看出，“俄罗斯人对那种具有全民共识性的社会价值和观念体系的要求在不断地加剧，直至今天，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在痛苦地承受着对苏联时代造就的强大的人民共同体的归属感丧失的剧痛，这一点就可以在很多方面解释，‘苏联范式’无法从当今俄罗斯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消失的原因了”①。

社会发展的迷途、价值世界的乱象导致国力衰退、民不聊生；社会需要安定的秩序，民众要求过上稳定富足的生活。既然还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需要，必然就存在着共同的价值需求。当“自由”导致了涣散，当“竞争”导致了无序，当“平等”失去了社会根基，当“私有制”导致贫富鸿沟……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后果与他们先前追求的“自由”“公正”价值之间的千里之谬了；这时，传统价值开始逐渐回归。虽然俄罗斯与苏联已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就是这个与集体主义截然对立的个人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造了社会贫富鸿沟；而普遍富足的物质生活及其和谐高尚的道德生活图景也只是在集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时代才真真切切地存在过。毕竟，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个人，而是人民群众组成的集体。此时，集体主义已经成为消除贫富分化、促进全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预期良方。

四　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价值重建

依靠能源支撑得以实现复苏的俄罗斯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显得尤为脆弱。国际油价下挫直接导致俄股市领跌、卢布价值锐贬、金融资产外逃、社会失业激增、消费大幅走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较单一的复苏模式尚未锻造出完整有序的国家应对机制，导致俄罗斯在危机丛生的诸多问题面前殊别于他国，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

在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上进行有效施救恐怕还来日方长，但是日子总得过，社会向好发展亦是人心所向。于是，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献计献策，为俄罗斯摆脱危机寻找务实可行的思路。2009年3月19—21日俄罗斯联

① 《Граждане новой росс，кем себя ощущают и ка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хотели бы жить（1998－2004）.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М.，2005. с. 14－15；с. 82－83 и др.

邦政府直属的财政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所举办了以“经济危机的心理应对”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在危机时刻，国家和集体的力量更为可靠，“我们的调查研究显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存在着平衡，在稳固的情况下，个人的作用发挥得较多，而在利他主义指导下，集体主义更能战胜危机”①；伏尔加联邦区官方网的新闻更直言：“事实上，经济危机就会导致集体主义，后者使社会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变得简单”②。

合作创新之路的意图渐趋明确：在主权民主框架内，实现俄罗斯的复兴是长期目标，而应对危机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为实现此目的，社会应停止无序竞争，这就需要彼此合作、相互帮助；需要鼓励公民创造性劳动，而不是像从前一样消极等待，依靠单一的被动能源出口；需要打破低效、分散的生产经营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在生产和消费合作的框架下重新分配商品，以对抗国际商品壁垒，增加出口，增强国际贸易竞争力；要使廉价劳动力增值；要把过少的人口团结起来应对过大面积的国土……这样，在管理模式上，实现从“自由个体的有效管理”向“有效的国家活动机制”转变。

而谁都知道，合作劳动必然造就集体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集体主义”浮出水面。

俄罗斯“集体主义”回归的逻辑路线如下所示：

复兴俄罗斯↘
（核心任务）　　↗ 合作 ↘
应对危机↗ ⟶营造社会有序竞争局面 ⟶ 创造 → 整体活动机制 ⟶集体主义
（当前任务）　（途径）　↘ 管理 ↗ （机制模式）　（价值模式）
（形式）

此外，集体主义的回潮还表明着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个人主义

① 《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нновации в экономике и финансовом бизнесе 》,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газета , №4 (152) апрель2009года.

② VolgaRegion ,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АВТОВАЗ с альянсом Renault-NISSAN, http: //volgaregion. com/2009/10/sotrudnichestvo-avtovaz-s-al-jansom-renault-nissan. html#more, 03. 10. 2009.

思潮推进之路在俄罗斯受阻。在严酷又充满机会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认识到用“西式疗法”治不了“俄国病症”。

俄罗斯集体主义回潮发生在隐性的思想意识层面，同其他一些浮光掠影般的变化相比较而言，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变化使我们不难看出，从前那种肆意的、单纯的、极端的假想和盲动正逐渐被理性的、现实的、可行的观念和行动所代替。集体主义并未终结，符合历史和现实依据的道德价值观念正在重建。

俄学界对“苏维埃文明”当代价值的探讨

李瑞琴

李瑞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国外社会主义研究部主任，法学博士。曾发表学术论文、翻译作品、出版著作、完成研究报告百余项。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有关部委交办课题。出版学术专著《“改革新思维”与苏联演变》（2012）、《俄罗斯反腐败透视》（2014）、《〈共产党宣言〉与世界社会主义》（2013）、《民族问题与苏联演变》（2013）；发表论文《当代俄罗斯重现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论苏联解体的主观因素》《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党派的多样化特征》《腐败对原苏东共产党的毁灭性影响》《俄罗斯当代社会价值基调》等。

苏联解体20多年来，尤其是自遭受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重创以来，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成为俄罗斯社会各界的头等大事，从各个角度，以各自不同的立场总结和回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的70年历史经验，是所有领域都绕不开的关键。呼应着社会情绪，俄罗斯学界先后出现了重评斯大林、重评苏联历史及对俄罗斯人怀念苏联的思考。在纪念2012年十月革命95周年时，俄罗斯学界进一步提出，要结合当今俄罗斯社会科学领域全面退化的现象，探讨“苏维埃文明”在当代的价值。如，2012年10月16日，俄罗斯《真理报》以“苏维埃文明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为题召开了圆桌会议；俄共中央总书记久加诺夫于2012年10月25日发表长篇文章《未来的复兴——苏维埃文明》；俄罗斯当代著名政论家卡拉－穆尔扎推出两卷本著作《苏维埃文明》；俄罗斯著名网站《反对电视屏幕》专门开辟讨论“苏维埃文明”的专栏；等等。俄罗斯学界研究

“苏维埃文明”的群体不占多数，其研究的目的也不为当局肯定，但是学者们依然坚持信仰和信念，肯定俄罗斯历史中曾经在苏联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苏维埃文明”。这一点尤其值得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作进一步的思考。

以下是俄学界当前的关注重点。

一 “苏维埃文明”的根本特征是消灭了剥削

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说：“研究‘苏维埃文明’是一个复杂而艰苦的事业，今天，我们只能确定这个科学和政治问题的轮廓。自1917年以来，世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下，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由此，它从根本上确立了其不同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所研究的文明类型。”

“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随后列宁、斯大林在实践中发展了这一学说。按照这一科学理论建立的‘苏维埃文明’体现了对人类幸福未来的期盼。这种新的、合理的社会关系已经证明，苏维埃的社会形态是有机而充满活力的，是俄罗斯文明发展史的重要阶段。在世界上，‘苏维埃文明’第一次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特权地位，推翻了寄生虫和投机者的政府，结束了无止境的贪婪和依靠掠夺他人而获利的状况。‘苏维埃文明’在世界上首次盛行这样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将成为世界的主宰’。苏维埃政权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采取措施，确保劳动者最主要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劳动者在社会中获得了各种奖励，热爱劳动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代表着英雄主义的气概。”①

俄罗斯《真理报》圆桌会议的与会学者谈道，“‘苏维埃文明’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文明，它既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同于像托洛茨基那样的共产党人提出的文明类型。在十月革命期间，托洛茨基等人机械地肯定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作用，并试图阻止苏俄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尝试。列宁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从社会主义革命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事实出

① 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будуще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5. 10. 2012.

发，领导俄罗斯人民建立了这一新型文明。因此，‘苏维埃文明’是广泛吸收历史上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经验的产物”。

学者们认为，“‘苏维埃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最重要特点、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建立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社会，创造了辉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前，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曾经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现在它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因为私有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走向灭亡”。“苏维埃文明”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符合俄罗斯的历史和国情。列宁在 1917 年 4 月就开始考虑到俄国可能的前景，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一种思想：“如果符合各个国家的历史特点，在不同国家实现不同性质的革命是可行的。经典作家认为，革命由法国工人开始，德国继续，但历史为俄国革命的开始提供了可能性。不仅是因为俄罗斯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不只是因为那里有最专制的统治，劳动人民经受着最深重的剥削，还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带有村社农民的心理，拥有团结大多数阶层的力量。”①

另有学者在其专著《通向未来的关键》一书中认为，“苏维埃文明”是 20 世纪上半叶在俄罗斯出现的属于世界文明范畴的人道主义文明。它以多个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次为其基本特征。在人类文明史上，（1）第一次从社会意识形态上确立这样的观念，禁止人对人的剥削；（2）对自然的征服，需要借助于科学和技术，科学被宣布为社会生产力；（3）第一次宣布不存在宗教教义，倡导无神论；（4）第一次宣布其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社会创造力是基本人权之一。这项权利保证以人的全面发展代替墨守成规的“机械式”的工作，并逐渐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②

由上可见，学者们对“苏维埃文明”的认识基本一致：（1）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确立了劳动最光荣的新型价值观，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文明。（2）这一新型文明符合俄罗斯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 20 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3）“苏维埃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

---

① 《Круглый стол》в редакции《Правды》, “Каковы же опыт и уроки совет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http: //za. zubr. in. ua/2012/10/16/18249/.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Лазаревич, “Ключ к Будущему: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http: //techno-cosm. narod. ru/k2f/soviet_ civilization. htm.

上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二 “苏维埃文明”全方位体现了社会平等原则

久加诺夫说：“由于俄罗斯工人阶级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苏维埃文明’就是俄国最好的文明实现形式。这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实行了社会平等原则。在世界上第一次使每个人都获得了免费学习的机会，并获得各种免费的医疗服务。苏联人的住房、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支出都是微不足道的，这在苏联的几十年间没有改变过。食物支出足以负担得起。”

“‘苏维埃文明’首次结束了自父权制以来妇女被压迫、受歧视的不平等地位。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就实施了保证妇女在政治上平等的原则，妇女获得了与男性同工同酬的权利。这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是被公然践踏的。‘苏维埃文明’还致力于保护妇女和儿童，妇女分娩前后都获得了带薪休假的权利。全国普遍建立了免费诊所和妇产医院网点，托儿所、幼儿园几乎是免费的。母亲被荣誉和尊重包围着。在伟大卫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苏联在世界上第一次为多子女的母亲设立了‘母亲奖章’‘光荣母亲’和‘英雄母亲’等奖项。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成为苏联最喜爱的节日之一。”

“‘苏维埃文明’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形成了有针对性的集体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新模式。儿童在成长阶段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以避免道德败坏和不良习惯的诱惑。在世界上首次创建了少年儿童先锋队组织，绝大多数青年男女都要加入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家庭、幼儿园、学校、少年儿童先锋队和共青团组织这种集体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培养年青一代健康的道德精神，创造了最好的学习、实践条件。”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国家创建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医疗卫生机构网络，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年青一代健康成长。苏联时期居民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国家关怀人民的身体健康具体体现在了苏维埃体育运动的成就上。在奥运会和其他国际比赛中，苏联运动员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苏维埃文明’在世界上首次确立了民族平等的原则。许多世纪以

来，俄罗斯一直存在着民族冲突和暴力，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年起，各民族的关系即在平等友好的原则下得以重建。‘苏维埃文明’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建立了不同民族区域的教育。为那些从前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国家为几乎所有的苏联民族都建设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影剧院，根据其原有的基础，精心保护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了各民族的文学事业，为各民族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苏维埃政权的那些年里，创造了大量的各民族人民喜爱的音乐、文学、绘画、建筑、戏剧、电影等优秀作品。肖洛霍夫、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马雅可夫斯基、斯维里多夫和穆欣娜、爱森斯坦和哈恰图良等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被收入世界文化宝库。”①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里叶有一句名言，以形象而生动的比喻说明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对于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而民族平等观念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一再标榜的“平等、自由、博爱”口号下被利用却不能真正奉行的虚假原则。历史上，只有“苏维埃文明”以切实的行动，以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伟大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特征。

三　“苏维埃文明”对国家和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久加诺夫在其长篇文章《未来的复兴：苏维埃文明》中集中谈了“苏维埃文明”的贡献。

1. 对国家的贡献

首先，“‘苏维埃文明’展示了国家抵御敌人侵犯的力量。二战期间，苏联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制造出最完美的武器：传说中的‘喀秋莎’火箭炮、T－34 坦克、IL－2 飞机等。甚至纳粹士兵都向德国军备部长 A. 施佩尔报告，他们更喜欢苏联的冲锋枪。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基于世界上最好的国防工业技术水平。德国的枪炮技工曾多次试图仿造 T－34 坦克，均失败了，他们没有能力冶炼出合金钢和生产 T－34 坦克电机使用

① 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будуще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5. 10. 2012.

的铝”。

“战争培养了具有高超的军事艺术水平的苏维埃军事家，出现了最高统帅斯大林领导下的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瓦西列夫斯基等著名苏联将军。”

“战争证明了苏维埃国家无与伦比的能力，顺利完成了成千上万个企业的转行、数百万人的疏散，并在后方组织国防工业生产的庞大任务。战后，迅速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国家，并开始和平建设。国家确保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航空航天领域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实现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人类第一次飞向宇宙，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核电厂等。国家积极发展工业生产、科学和技术，在几年内赶上了美国，研制了核武器，使国家免遭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威胁。在人民的记忆中，伟大卫国战争中建立功勋的英雄永不褪色。”

其次，“苏联首次在世界上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家五年计划等经济体系的稳定发展，成为苏联社会稳定发展的保证。工业生产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越来越高，国家消灭了经济危机、企业倒闭和失业现象。几十年来，苏联工业份额从开始不超过世界生产的4%，达到工业产值占世界20%以上的比重。在‘苏维埃文明’下，国家兴建了数以千计的现代企业，数百个新的城市。苏维埃人民充分地相信国家的未来，相信‘明天会比昨天好’”。

最后，“‘苏维埃文明’形成了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苏联人。苏联人民摒弃了资产阶级道德残余，忠于职守，勇于牺牲，睦邻友好。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准则建设者的风范：‘人人皆朋友、同志和兄弟。’苏联人民得到了全面发展，社会对文学、科普读物、科学技术书籍的兴趣快速增长，成为世界上阅读量最大的国家”。“苏维埃文明”培养的卓越代表的著作、学术活动和文化，影响、鼓舞、推动着国家和社会的进步。[①]

2. 对世界的贡献

久加诺夫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在苏联影响下，在社会和政治等领域作出了让步，不得不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采取了部分消除妇女不平等待遇的措施；迫使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放弃明目张胆的种族或民族歧

① 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будуще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5. 10. 2012.

视的做法和立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也开始尝试采取计划经济。苏联的成功还刺激了世界空间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苏维埃文明’还积极地在世界范围内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着影响。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国家就计划全面彻底裁军，维护集体安全，遏制侵略者。其后，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国家粉碎了德国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及其盟友的反人类恶行。由于‘苏维埃文明’的存在，阻止了世界各国人民无休止被奴役和无限种族灭绝的灾难。由于‘苏维埃文明’的存在，还维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均衡状态，防止了爆发全球核灾难。由于苏联的不断努力，新的世界战争得以避免。”

“‘苏维埃文明’对世界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建立了苏维埃类型的社会制度。在欧洲，建立了社会主义联邦国家，如东德、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在亚洲有中国和越南；在美洲是古巴；在非洲有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苏维埃文明’仍然保存着。像社会主义中国，变得更强大。世界许多地区至今还仿效着‘红色’‘苏维埃文明’的首创精神，浇灌着自己千年的文化之树。”①

四　苏维埃文明被破坏后的恶果

久加诺夫说：“伴随着‘苏维埃文明’的破坏，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在苏联时代建立的成千上万的工业企业停止了生产。农业走向没落。科学、教育和文化机构被关闭。在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城市，已经成为犯罪和社会性疾病蔓延的温床。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工作，对未来丧失信心。自杀率急剧增加，出生率大幅下滑，人口开始下降。”

“‘苏维埃文明’由野蛮时代的资产阶级取代。知识的衰退，文化的退化，酗酒和吸毒现象的猛烈增长伴随着不道德原则的横行：‘人人皆狼。’好战的利己主义道德成为国家的主流，年青一代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投机者，靠欺诈、舞弊致富，公然掠夺、窃取公共财产和数百万人民的财产。”

---

① 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будуще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5. 10. 2012.

“人民虽然失去了苏维埃时代的生活，但记忆是很难被摧毁的。因此，俄罗斯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苏维埃文明’的邪恶。其媒体帮手每天向俄罗斯人民灌输，苏维埃74年的文明是一个历史的失败。他们试图抹黑伟大历史的每一天，苏维埃生活的每一个重要事件，诋毁共产主义学说。然而，这是不可能得逞的。”①

参加《真理报》2012年10月26日圆桌会议的学者们认为：“苏联解体20年来，俄罗斯在原始资本主义下飘移着，没有发生经济上的突破，没有任何新的文化形式的发展和思想理论创新，更没有社会关系的优化和可以团结各民族的能力。所有领域都是衰减和后退。这就是对俄罗斯新自由主义‘反动文明’的奖励。他们对世界没有带来任何建设性的方案，主要是吸收西方精神生活的残渣。社会充斥着越来越明显的腐烂和分化，再现的只是社会病态现象：缺乏信仰和暴力，滥用毒品、酗酒、道德败坏和无法无天，狭隘的实用主义和最深的黑暗。所有这一切都引发了自杀波，迸发了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和一些人反对另外一些人的战争。这一切都是反文明的。”

学者们还表示：“历史表明，伟大文明的存在，作为一项规则，具有时代自身的特点。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其遭遇的磨难有时是如此之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苏维埃文明’会再次复兴，会有更高度的发展。”②

五　提供解决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方法是“苏维埃文明”的当代价值

《真理报》圆桌会议与会学者说：“今天的世界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和北约咄咄逼人的进攻政策正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地球。”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对‘苏维埃文明’的兴趣大大增加了。这与覆盖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深陷其中的世界性危机紧密相连。寻求走出

---

① 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будуще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5. 10. 2012.

② 《Круглый стол》в редакции《Правды》, “Каковы же опыт и уроки совет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http: //za. zubr. in. ua/2012/10/16/18249/.

危机的方式，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向研究‘苏维埃文明’的经验。即使奥巴马在他 2012 年的竞选纲领中，也不得不谈到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化生活的必要性，关于加强国家的作用和遏制资本的必要性。看似繁荣的欧洲也面临着关键性的挑战。”①

久加诺夫说：危机发生的最严重的国家在亚洲，但是社会主义中国、越南等国家却能够化解危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一个更明智的政府调控，更有效的管理和规划，更社会主义化的财政政策方案。这正是我们苏维埃国家当年建立的主要政策。

“在当今腐朽和衰败的时代，文明的选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尖锐。俄罗斯必须认真研究‘苏维埃文明’的经验，作为一个独立和独特的文明现象，要争取保留它的记忆，促使腐败的资产阶级政权崩溃。必须把苏维埃的文明成果，运用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有效地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②

---

① 《Круглый стол》в редакции《Правды》, “Каковы же опыт и уроки совет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http: //za. zubr. in. ua/2012/10/16/18249/.

② 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будуще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25. 10. 2012.

第四篇

历史篇

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对苏联历史的新观点

吴恩远

苏联解体10余年来，在俄罗斯社会、广大历史学家的意识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多数群众对肆意贬低国家历史的不满，要求尊重自己的历史，因而增长了对过去值得肯定的东西、对本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兴趣。

当这股思潮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时，必然引起当局注意，从而使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发生重大变化。

2007年6月18—21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着重研讨历史及人文社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一线教师、人文社科工作者以及俄教育部和科学院等相关负责人到会。主要内容包括探讨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问题。6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郊外官邸亲自接见并与部分代表进行座谈。①

教师代表列昂尼德·波利亚科夫向普京汇报道：在1990—1991年我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学说。在思想领域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所谓全人类价值的一些抽象、模糊的概念：如“自由”“民主”“市场”“人权”“公民社会”等。俄必须改变盲从西方民主的观念。普京指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俄罗斯国内历史教科书内容及版本混乱，不能客观反映国家现代历史事件，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科书充斥诋毁俄罗斯的内容。普京呼吁全俄科教工作者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普京警告出

① Путин предупредил российск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об их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при изготовлении учебников NEWSru. com // Новости России // Четверг, 21 июня 2007 г.

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出版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我们民族的历史。

2007 年 7 月，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批准出版了给教师参考的历史书：《俄罗斯现代史 1945—2006 年》[①]。

俄罗斯历史教师参考书的出版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从对苏联历史的评价而言，应当说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出版这本书是由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的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长亚·丘巴里昂，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维·萨多夫尼奇，俄总统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秘书沙·巴雷耶夫以及教育科学部代理副部长伊·加里宁共同做出的，具有学术权威性；加上普京总统对教科书的亲自关注，使它又具有了官方色彩。这是苏联解体后，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学参考书，当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第二，更主要的是这本书对于苏联历史和苏联历史人物有了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完全不同的评价，可以说是震动俄罗斯思想界的一次“拨乱反正”。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小，“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就宣称要出 100 本关于斯大林的书与之辩论。

第三，这本历史教学参考书的出版已经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世界各国有影响的报刊，如《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和英国《独立报》、西班牙《国家》报……都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报道和分析。今年 3 月 1 日日本颇有影响的《朝日新闻》报竟然连续两天辟专栏评述俄罗斯这本书。引起西方震动的是，认为普京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为苏联历史“平反”，是“从民主体制的倒退”，意味着普京政权开始走向不民主。

我们具体介绍书中一些观点：

1. 苏联体制确实存在弊端，但断言苏联体制完全失败的观点是幼稚的

国内外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问题，苏联体制或曰苏联模式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

---

① 这本书由吴恩远等翻译，张树华、张达楠等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的确，当时的苏联体制确实存在许多应当否定的因素，这就是必须改革苏联模式的理由；但绝不存在“这个体制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而必然灭亡的根据，因为其体制自身也还有肯定的因素。这本教学参考书也持同样观点。书中引用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承认：“在我执政的时期，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说明这个体制并非到了必然灭亡的地步。参考书指出：当时的苏联体制，对内“在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面，是有保障的”；对外则“百分之百地可以抵御外来危险”。“不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更迭。”书中写道：“苏联体制的激进反对派断然回答说：不！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将其摧毁！随着经济困难的加重，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普遍。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15 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说服力。”所以这本书最后做出判断：“断言说苏联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这种说法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①

所以，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不同，这本书对苏联 70 年历史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在书中论述苏联 30 年代的国家制度时，从没有使用“集权制度”这个词。书中写道：“苏联不能说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对全世界千百万人民来说，它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早在 1918 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证明必须立即在英国实行普遍选举权时援引了俄罗斯的例子。按他的说法，如果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不能尽快地看到国家社会体制发生好转的情况，他们会效仿俄罗斯的样子。众多西方国家在内政方面所做的有利于人权的调整，就是受到实现了社会革命和赢得了最残酷战争胜利的超级大国苏联存在 70 多年来很大的影响。”对苏联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予了肯定：“我们这个由于战争而濒临消亡边缘的国家能够飞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在探索宇宙、和平利用原子能、大规模建设和许多其他方面取得惊人成就。”

书中引用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普京的话评价苏联解体事件：“我深

① ［俄］亚·菲利波夫等：《俄罗斯现代史 1945—2006》（教师参考书），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8 页。

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

2. 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

学界有一种论点：认为苏联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成就不大。

苏联在战争中的物质损失估计达 2.5 万亿卢布，其中敌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达 6790 亿卢布。

这大约是苏联国家全部财富的 30%。占苏联战前 45% 的国民生产总值和 47% 的农业可耕地的苏联人口最稠密、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经济遭到破坏，苏联最发达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被拖后了 10—15 年。

但在斯大林领导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苏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难以置信的努力为代价，不仅恢复了过去的实力并保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1948 年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总体水平。成功地恢复了在战争年代被毁坏的电站、冶金、机械制造和采掘业。俄罗斯联邦的西部地区、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工业重新投入生产。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提高工业生产的总体计划。根据正式资料，1950 年工业生产水平超出战前水平的 73%。1950 年苏联国民经济总产值（以 1964 年的 10 亿美元计算）达到 1260 亿美元，当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中美国是 3810 亿美元，英国 710 亿美元、法国 500 亿美元、德国 490 亿美元、日本 320 亿美元、意大利 290 亿美元。国民经济总产值苏联已占据了世界第二位，这已经超出了战前水平。①

战后科技的发展。很快恢复了众多科学研究机构，对科学的投入规模比战前扩大了 2.5 倍，科研部门的威信和科学家的劳动报酬都提高了。从 1949—1950 学年起，国家开始把教育转为实行七年义务教育，着手启用“劳动后备军”制度培养工人干部，开办了手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和厂办学校。企业开设了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分校来培养本生产企业的专家。通过采取这些措施，1960 年大学生的人数比战前增加了 3 倍（达到 240 万人）。

1949 年 8 月 29 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试验场上成功进行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而 1948 年 10 月 10 日，苏联发射了第一枚弹道

① ［俄］亚·菲利波夫等：《俄罗斯现代史 1945—2006》（教师参考书），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 页。

火箭 P－1。1953 年夏天，完全由苏联独创的研究成果氢弹爆炸成功。1954 年在奥布宁斯克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电站。苏联还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功率为 10 万千瓦的蒸汽涡轮机等。①

民族政策。这本教学参考书没有回避 1949—1950 年在新的共和国和各个州开展全盘集体化以后，许多农民出于对强制性的集体农庄化的抵抗而成为民族主义者。莫斯科当局不得不“承认错误”，发出“纠正过火行为”的指示。同时，也强调了苏联当局对民族主义者镇压的必要性。因为民族主义者采用了大规模残暴的恐怖手段，甚至对本民族人民也不例外。杀人与恐怖手段的受害者是普通党员、军人家属、教师，不少是集体农庄的农民。1944—1954 年间苏联西部地区有 4 万名平民死在民族主义分子手上，其中 2.5 万人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战后苏联军队和内务部队的军事损失可以同卫国战争的战略行动的损失相比。

10 年内仅在乌克兰西部就损失 3 万名军人。因此苏维埃政权加强了对民族主义者地下活动的打击，并取得人民的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在失去了居民这个群众基础的支持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共产党最终赢得了西部地区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参考书总结道：“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形成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既有作为国家组成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的政治支持，也有来自民族共和国的物资支持，而在这两种支持之间保持平衡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特征。”

战后清洗问题。战后确实存在又一次清洗高潮。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列宁格勒案件”中，受害人中有联共（布）第二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辛斯基、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伊·罗季奥诺夫；还有一些部长们、一些大党组织的书记以及其他有影响的领导。“列宁格勒案件”受害者人数约有 2000 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枪毙。

和 30 年代的大清洗一样，也存在一些人无辜受害和目无法纪的情况。但斯大林为什么会发动又一次清洗？其目的是什么？该书指出了其中一个人们以往对此比较忽略的情况。书中写道：“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开辟的先河，使后人把大恐怖的发生仅仅归结为斯大林残酷、专横、

① ［俄］亚·菲利波夫等：《俄罗斯现代史 1945—2006》（教师参考书），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 页。

不容他人意见等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正如当时著名诗人达·萨莫伊洛夫所说：‘只有是一个完全的非决定论者[①]才能相信，1937 年大清洗唯一的历史目标是巩固斯大林的政权，他贪图功名、追求虚荣和残酷性的力量就能够任意扭转俄罗斯历史的方向，他一个人就制造了 1937 年骇人听闻的现象。’”参考书进一步指出：“国内和国内历史学家的研究都确认了 1930—1950 年镇压的主要受害者正是党内统治阶层这一事实。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说：‘40 年代许多人害怕被提拔到国家高官的位置并不是什么秘密。这直接就意味着危险。大清洗主要针对共产党的性质甚至连大多数非党人士也一目了然。在那些年代，这些非党人士夜里睡得比共产党员要安稳得多。’”那么，为什么要针对党内官员？教科书分析道：“对管理阶层的人员实行强制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并保证管理机构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恢复经济时期运转更为有效”，指出当时的镇压不全是“滥杀无辜”，执政党的初衷是对自己内部“统治阶层”的清洗。[②] 参考书引用巴伊巴科夫的回忆录《在政府工作的四十年》中的一个事例，说明当时是如何采用严厉的手段对待管理精英的。1942 年时任石油工业副人民委员的巴伊巴科夫接到斯大林命令，要他前往北高加索，在苏联军队撤退时炸毁采油场。斯大林是这样指示的：“必须竭尽全力做到不给德国人剩下一滴油……因此我警告您，如果您给德国人留下哪怕是一吨石油，我们将枪毙您。但是如果您毁掉了采油场，而德国人没有来，我们又没有燃料用，我们也枪毙您……”管理集团的中高层人员成为镇压的主要对象这一事实，说明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③]

3. 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参考书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巨大功绩：“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而且某些地方还超过）；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不仅使得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

① 非决定论：非决定论者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的选择、意向、决定、行动等都不受客观社会关系的制约，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作者摘自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7 页。

② ［俄］亚·菲利波夫等：《俄罗斯现代史 1945—2006》（教师参考书），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2 页。

③ 同上书，第 71 页。

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俄罗斯高达47%的人对斯大林在苏联发展中所起作用给予肯定的评价。参考书中称“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①，可以说甚至斯大林生前也没有使用过这样高的评价。当然对于斯大林时期苏联“领土扩大”的“功绩”，笔者也有不同看法，必须指出这里面有大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因素。

4. 参考书也指出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问题

第一，轻工业的恢复落后于重工业。“国家领导人没有把人民日用消费品的生产看成如同发展国防力量和资源那样紧迫的任务。在一系列轻工业部门中（例如纺织业）不仅没有完成计划，甚至没有完成战后重建。”第二，农业的落后面貌没有大的改善。书中写道：“农业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仅达到战前生产规模的99%。换句话说，五年计划在农业领域是失败的。战后农庄经济恢复得比莫斯科预计的要慢得多。农村劳动力不足。似乎被宣布为最重要任务的农业机械化，经常是按剩余原则进行的，即最后才轮到它。”第三，他取得的成就是通过极大压制民众取得的。

斯大林时期国家经历了几次大镇压浪潮。斯大林本人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倡导者和理论家。

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经济学家（叶·斯·瓦尔加）、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物理学家（尔·德·兰道、普·尔·卡皮察等）、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都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导致某些学科领域（如遗传学、控制论、世界经济研究等）、学术流派遭到封闭或者其研究受到实质性的限制。

产生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是管理的高度集中，压抑了地方、企业、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这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也是今天我们改革开放、突破斯大林模式弊端需要吸取的教训。这本参考书完全没有回避、隐瞒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错误。但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这些事实简单的批判、否定不同，它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谁应当对此负责。

首先是迫于形势的需要：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很明显，不可避免

① ［俄］亚·菲利波夫等：《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地对德大战、战争的进程，国家战前工业化和战后经济重建需要加速进行，这些事实成为苏维埃时期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具有高度集中特征的重要决定因素。为什么会残酷剥削人民？因为急缺资金。迫于战争威胁需要“争先恐后地同时间赛跑”，不仅决定了实现工业化的时间不够，而且加剧了现代化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因为无论国家总体积累还是国防开支在预算中都注定占很高份额，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就会减少。根据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亚·格·兹韦列夫的说法，甚至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也只积蓄黄金储备，而不曾卖过 1 克黄金。这使得人们劳动的强度和被迫处于不断动员状态中的人力资源的使用程度也超乎寻常。

参考书认为：斯大林个人性格、心理特征对形成高度集中体制的影响仅仅是第二位的，主要还是客观环境的需要和俄国历史的传统。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要求有相应的权力制度和建立能够实现这一方针的管理机构。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和历史传统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的部门集中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那些能够实现这种集中的人被推出来作为国家的第一人，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以及实行严酷的集中管理体制。

尽管当时有存在这种集中的必要，但该书同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指出这种集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统治的变形。主要的变形是把对强权的现实需要变成对强权最大限度地服从，而使这种必要性逐渐消失了，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约瑟夫·斯大林的统治都符合这种论断。

5.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在我国学界一直存在对苏联解体是现实因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错误）还是历史因素（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为主的争论。但在俄罗斯，多数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执政者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这本书再次论证了这个观点。

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假设”：如果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不搞他所谓的改革，苏联会不会解体？作者引用戈尔巴乔夫自己在 75 岁生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不搞那样的改革，他到现在仍然会继续“当苏共中央总书记”。作者的意图当然不是说不应当对苏联旧体制弊端进行改革，而是证明：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乱“改革”，苏联至少不会解体。

参考书认为：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造成混

乱。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也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他给苏联公民政治自由先于向市场过渡的完成。由于党组织和全社会不断激化的讨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是形成全党、全国统一的意志，而是“汹涌而来的社会大辩论”，使得对国家的发展前景缺乏统一意见；“由于宣布了公开性路线，劳动者走上街头喊着抗议的口号，罢工潮在全国蔓延”，招致经济的崩溃……

其次是经济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不够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导致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①

在和平时期，货架上原因不明地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从肉到火柴。为了调整局势，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香皂）实施配给制，商店前排起了长队。从市场的商贩那里可以买到商品，但是价格要高好几倍，大部分居民买不起。结果，一些日用品的国家定价多年以来首次迅速攀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

第三，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990 年 6 月 12 日，身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鲍·尼·叶利钦将《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提交代表大会表决，在走向独立、摧毁苏联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也是果断的一步。根据规定，如果苏联法律、法规破坏俄罗斯主权，俄罗斯权力机关可中止其效力；法律还规定，只有在得到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批准之后，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苏联总统的命令和其他法规才能生效。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通过的主权宣言和法律，实际上破坏了《苏联宪法》，导致联盟国家爆发宪法危机。紧随俄罗斯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相继通过了独立宣言。接着又爆发了在加盟共和国内部宣布主权的洪流。叶利钦在一次讲话中甚至对俄罗斯各自治地区提出：“你们能消化多少主权，就去拿多少主权。”这本书认为，在这条路上，叶利钦走得实在是太远了。

第四，民族问题的爆发。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分析当时局势的时候说：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错就错在对民族主义的能量估计不足。但正如

① ［俄］亚·菲利波夫等：《俄罗斯现代史 1945—2006》（教师参考书），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6 页。

参考书指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困难在于中央领导权的削弱。

第五，这就涉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苏共领导权是怎样丧失的？书中指出，在戈尔巴乔夫修改苏联宪法时，“废除了关于作为政体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的《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原则”。这不仅意味着削弱了苏共的领导，同时削弱了国家政权。因为“苏共本身也是苏联国家管理机构的基础”。同时叶利钦又发布《关于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活动》的命令，“这是对苏共在社会和国家中地位的第二次严重打击，削弱了苏共对俄罗斯和苏联政治进程的影响”。而当时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面对“非党化”命令采取了妥协态度，参考书指出，“总书记的绥靖立场使苏共领导机构瘫痪，党进一步解体，大大削弱了联盟中央，因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仍然是苏联体制的重要环节”。①

根据上面的叙述，这本书最后对苏联解体的责任人有十分明确的结论。它写道：“苏联解体并没有命中注定的必然性。被改革唤醒的活动家（首先是俄罗斯政治家）的政策和改革者们自身的错误，导致苏联不复存在。”参考书最后引用 2001 年俄罗斯民意调查的结果证明：56% 以上的民众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国家造成危害，只有 14% 的人认为他的作为对国家是有利的。②

① ［俄］亚·菲利波夫等：《俄罗斯现代史 1945—2006》（教师参考书），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6 页。

② 同上书，第 311 页。

《俄罗斯历史10年级教科书》（主要内容摘译）

托尔库诺夫院士主编　俄罗斯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吴恩远　李　琳　郑蓓蓓

译者按：

当今俄罗斯什么书可以称之为《俄罗斯历史教科书》？有两个标准：

第一，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必须经国家教育科技部审定。

2007年，普京总统召开全国社会科学会议，第一次提出要加强教科书出版。2013年普京总统正式提出确立国家历史文化统一标准，成立国家新版历史教科书编撰委员会。三年多来，在国家教育科技部、国家历史学会、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通过国家审定，正式成为俄罗斯学校统一使用教材（教材或封面或扉页注有："本书经过俄罗斯教育科技部推荐"语）。涉及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有两个版本：一是教育出版社发行的《俄罗斯历史10年级教科书》（托尔库诺夫院士主编），共有3册；二是大鸨出版社发行的《俄罗斯历史10年级教科书》，共有1册（沃洛布耶夫院士主编）。

我们摘译的即是托尔库诺夫院士主编的3册书的主要内容。

第二，必须按照国家历史文化统一标准编写教科书内容。

一本书的核心是写什么、宣传什么观点。统一教材这方面有严格规定：即按照国家规定的"历史文化标准"内容编写（这句话必须标注在教材封面）。所谓"历史文化标准"实际上就是规定教材所写内容的提纲。规定非常详细，不仅包括了每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外交等各领域要写进的内容，而且每一时期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都没有遗漏：如斯大林时期，不仅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大清

洗等重大事件，而且要写像“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口号的提出；“斯达汉诺夫竞赛”这样比较具体的事件。

这样规定的意义在于：

第一，至此，对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评价有了一个国家的评述标准。本书对苏联历史事件的评述，至少代表俄罗斯官方观点和学界主流观点；

第二，今后，教师在课堂上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必须按教材规定内容讲课（我们同时对照了大鸨出版社沃洛布耶夫院士主编的《俄罗斯历史 10 年级教科书》，两本作为国家历史教材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基本一致）。这样有助于达到国家希望的学生培养目标。

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俄罗斯最新出版的历史教材，也为了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我们摘译了教科书中十月革命前后即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时期的内容；同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全书的主要观点，我们也译出该书《序言》和《结束语》部分，以飨读者。

序　言

20 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复杂和最富戏剧性的时期。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国家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两次衰落，又重新恢复，继续发展。

1917 年开始的伟大的俄国革命以及 1917 年 10 月爆发的能够影响世界进程的“苏维埃试验”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1914—1921 年间俄国处在剧烈震荡中。战争和革命的结果使国家遭到毁坏。尽管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是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但是国家找到了办法，不仅用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国民经济，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急速推进了经济发展。

1922 年苏联的成立是最重要的事件。20 年代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在消除大规模的儿童无家可归和消除文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妇女平等，推广了卫生措施，建立了妇幼保健体制等。30 年代实行了全民免费初等教育，在城市实行了七年免费教育。

苏联的现代化触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工业和农业开始，终止于教育、科学、社会和日常生活。

苏联在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的发展具有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有

快速的工业现代化，文化革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人民的热情和社会积极分子的奖励。另一方面，民主收缩，意识形态书刊检查增强，寻找“人民的敌人”和大规格的政治镇压。这一高峰出现在1937—1938年。

对于俄国来说最严峻的挑战是伟大的卫国战争（1941—1945），苏联为取得反希特勒联盟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1945—1953年这一阶段，以斯大林模式著称，在确定未来几十年世界发展新的主要趋势之后，斯大林巩固了自己在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召唤背景下的国内外的地位。

非斯大林化时期是战后最初几年积攒的社会愿望的结果，尤其是在实现社会纲领和政治自由这部分。实际上，这一过程具有不彻底的、自相矛盾的特征，这些反映在1953—1964年“解冻”时期的特点中。

1950—1970年间国家经济主要依靠粗放型发展取得了快速增长，超过了许多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实现了第一次载人宇宙飞行、建设燃料动力综合体和军事工业综合体工业项目）。为了补充财政预算，加大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这导致了苏联对世界能源价格行情的依赖。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认为是20世纪俄罗斯最稳定的时期，但是到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国家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危机。执政党并没有专注于彻底地改革，而是利用各种可能加大出口能源，侧重于维持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系统危机，苏联的改革政策（1985—1991）对这一危机作出了回应，随之而来的是苏联的解体。改革阶段，在现有的“发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试图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模式——人道的社会主义。

1994—1999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稳定经济和巩固新的政治体制。但是，这些举措都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国家在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削弱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2000—2008年国家取得了稳定局面，进行了各种措施巩固政权。有利的局势促进了经济增长。开始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发展中的俄罗斯经济放缓，俄罗斯联邦面临的新任务是建设创新型的发展模式。

第一章　剧烈震荡年代的俄国

一　二月革命

1. 革命危机发生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1917 年年初，俄国的形势极其紧张。价格增长、投机倒把、战事的不顺、许多急迫的问题得不到当权者的解决等一系列因素引发了社会民众极大的不满。

彼得格勒尤其不太平。居民对粮食供给中断已忍无可忍。2 月 18 日普悌洛夫工厂开始罢工。这成了大规模行动爆发的导火索。2 月 23 日，开始了游行示威活动。经济罢工发展成全体的政治罢工，人们高喊口号“打倒沙皇专制主义!”“让战争滚出去!”有超过 30 万人参与其中。

2 月 25 日尼古拉二世从莫吉廖夫大本营给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发了一封电报：“着令于明天终止首都的混乱!”第二天沙皇解散了国家杜马。这一天在彼得格勒发生了禁卫军巴甫洛夫团后备营第四连士兵起义，对于镇压游行示威的决议让他们感到愤怒。其他军团也纷纷追随他们的行动。开始大规模发生士兵转变到工人一方的行动。

起义者占领了军火库、火车站、最重要的政府机关，到监狱释放了所有被“沙皇封建专制镇压”的犯人。最终在这一天，他们占领了冬宫。2 月 28 日，沙皇的大臣们被逮捕或是囚禁于彼得巴甫洛夫斯科要塞。

推翻君主专制、成立临时政府。2 月 27 日晚，人们聚集在塔夫利达宫周围。从早上开始这里就有已经不听命于沙皇的国家杜马议员在此。为了管理首都和国家，他们成立了以罗江科为首的国家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

2. 1917 年的主要政党

二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政治力量分布。君主制的政党终止了活动。十月党人也不能在新形势下开展行动了。立宪民主党从主要的反对党变成了执政党。立宪民主党人明显是左倾的。1917 年春天，他们表示支持在俄国建立共和国，支持同社会主义政党合作。

社会主义政党纷纷从地下秘密状态转变出来，他们的影响不断扩大。1917 年春天，孟什维克团体和组织的数量达到 10 万人。

布尔什维克没有能积极地参与二月革命事件，因其许多领导人当时身

处监狱或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有不超过2.4万名成员，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只有几百人。但是，情况在1917年4月发生了变化。

1917年4月3日，以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为首的一队社会民主党人从瑞典经过德国回到俄国。列宁了解了国内两个政权并存的状况，并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指明了方向。4月4日发表了名为《四月纲领》的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1) 临时政府的政策不符合人民期望。他们不能带给国家快速的和平稳定和土地。

(2) 如果消除两个政权，并把国家政权完全地交由苏维埃，那么就能解决很多尖锐的问题。

(3) 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领袖并不能快速地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

《四月纲领》包含着政权和平过渡到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它体现在以下口号中："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列宁号召进入新的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即"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和最穷苦的农民手中"。他认为，领导这一进程的应该是布尔什维克政党。

二　十月革命

1. 布尔什维克党影响的提高

从1917年初秋开始，克伦斯基成为总理和最高统帅。新政府没能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立宪会议延迟召开。

战争持续进行。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和居民生活。各个城市都面临着严重的粮食不足。临时政府继续发放纸币。没有食品增援，货币快速贬值。社会不满情绪持续增长。9月至10月罢工总人数达到250万人，几乎是春天的7倍。农民占领了地主的土地，摧毁了村镇庄园，完全不听命于政府。

危机状态也出现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是常有的现象。德国人占领了蒙海峡群岛，逼退了芬兰湾的波罗的海舰队。对彼得格勒的威胁越来越紧迫。

布尔什维克以他们通俗易懂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平给人民、土地给农民、工厂给工人，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在1917年9月初进行了彼得格勒委员会补选。布尔什维克取得大多

数席位。9 月 5 日，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莫斯科委员会的大多数席位。

2.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准备和进行

10 月 10 日，回到彼得格勒的列宁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12 名参会者中 10 人支持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进行起义。他们认为革命的力量还不够充足，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太早，关于政权问题应该由立宪会议解决。

1917 年 10 月 12 日，彼得格勒委员会建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预备起义指挥部。除了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左翼代表也加入其中。托洛茨基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实际上的领导人。10 月 22 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派驻自己的代表到彼得格勒驻防军所有军部。布尔什维克的宣讲者们在城市的各个区域组织集会。

3. 推翻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

10 月 24 日，一队警察和士官关闭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工人道路》的印刷厂。在临时政府会议上关于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早前刊登了关于逮捕列宁的命令）成员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布尔什维克评价这一举措是“反革命阴谋”。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彼得格勒驻防军全体部队和波罗的海全体舰队发出关于全体士兵和船员进入战斗准备的“1 号法令”。在同一天红军武装部队开始占领桥梁、邮局、电报局、火车站，没有发生多少抵抗。10 月 25 日早晨之前，除了冬宫，一切都掌握在起义者手中。军事革命委员会向俄国公民声明夺取政权。21 点 40 分根据“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大炮发出信号，开始发动向冬宫的猛攻。在 10 月 26 日夜间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武装力量占领了冬宫。

有别于平静爆发的二月革命，这次行动是布尔什维克精心策划的，并且所有的政治力量都知晓。在城市的街头，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和他们的胜利被人们热烈讨论，但是临时政府中央的行动是消极和自相矛盾的。在国内找不到任何一个严肃的军事或是政治力量准备保卫临时政府。

4. 布尔什维克党和左翼社会革命党联合政府的成立

10 月 25 日晚上召开了第二次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支持起义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占大多数。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地讨论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并且要求大会开始和临时政府谈判关于组建基于全体社会阶层的新的内阁。

10 月 25 日在苏维埃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政权的法令。会议

正式宣告政权转归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会议选举了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62名布尔什维克和29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占一定数量席位。列宁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左翼社会革命党同意加入人民委员会，并领导了7个人民委员部。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也同意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三　布尔什维克最初的革命变革

1. 新政权最初的法令

1917年10月，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历史决议。列宁在大会发言中提议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正式宣告俄国退出战争。大会向所有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议缔结民主和约，即不割地不赔款媾和。

农民要求取消土地的私有制，平均分配土地使用权。列宁非常清楚，没有农民的支持未必能夺取政权，《土地法令》赢得了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

1917年11月2日刊发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告俄国各族人民平等。全体居民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男女拥有平等的权利。1918年1月23日颁布了教会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从1918年2月1（14）日俄国开始时使用格里高利历法（比原俄历延长13天）。

2. 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的思想在民众中声望很高，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取消临时政府拟定于1917年11月12日的选举。但是这次选举的结果使临时政府失望。他们获得的票数不足25%。布尔什维克最终战胜了社会革命党人（超过40%的票数）。

3. 委员会政权组织

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第三次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俄中央委员会组成成员中除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有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

4. 新的军队和情报机关的建立

新的国家需要新的军队。1918年1月15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宣

布成立工农红军。1 月 29 日成立了工农海军。

1917 年 12 月 7 日建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目的是为了同反革命活动和破坏行为作斗争。全俄肃反委员会是共产党中央的直属机构。肃反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制止任何反革命行为，把所有破坏分子和反革命者移交革命法庭。

5.《布列斯特和约》

和平符合数百万人民的愿望，他们厌倦了流血屠杀，渴望和平生活。1917 年 11 月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向各交战国政府提议缔结和约。同意缔结和约的只有德国。列宁要求快速单方面缔结同德国的和约。他明白，苏维埃政府没有足够的实力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以布哈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反对列宁的意见。他们坚持继续革命战争。托洛茨基表达了妥协的看法："主张停战，复原军队，但是不签署和约。"最终在列宁坚持下，1918 年 3 月 3 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俄国同德国签署了和约：规定俄国让出其占领的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部分地区、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俄军队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乌克兰撤离。

6. 1918 年第一部俄国宪法

1918 年 7 月召开了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题是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它从法律上确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宪法确立了国家的联邦制度和它的名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是执行机构（政府）。

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主要权利和义务。不劳动者不得食。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最初阶段的政治政策的特点即致力于确立一党专政。

四　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

1. 工业国有化

在布尔什维克的执政纲领中，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经济政策问题被视为最具全局意义的。在这一期间必须消灭私有制，将生产集中到工农国家手中，建立由统一中心分配产品的经济联系。

1917 年 12 月 1 日建立了直接调节和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国家银行更名为人民银行。在 1918—1919 年间除了人民银行，所有的银行被清算。

在 1918 年 1—2 月进行了铁路运输、江河船队、对外贸易等一系列部门国有化。苏维埃政府宣布不承认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职责，取消继承权。1918 年 6 月 28 日所有的最重要的工业领域的大型工业企业都收归国有。8 月所有的城市不动产，包括市民的房屋和住宅都收归国有。

2. 农村的政策

1918 年 2 月 19 日是废除农奴制的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颁发了土地国有化的法令。1918 年春天之前，在全国范围重新分配土地基本上全部完成，土地的私人所有制被消灭。土地所有权归国有，国家免费和永久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

在 1918 年春天到来之前国家经济状况越发恶劣。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饥荒笼罩着城市。1918 年 4 月底彼得格勒一天口粮定量降至 50 克。在莫斯科工人每天平均获得 100 克粮食。因此，爆发了饥荒。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委员会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对待农民，决定加大力量没收粮食。谁不上缴粮食就是人民的敌人。

1919 年 1 月 11 日颁布了分配粮食和饲料的法令。余粮征集制按照阶级原则实行：贫农不收，中农适中，富农多收。1920 年余粮征集制征收范围扩大到土豆和其他的农作物。

3. 战时共产主义

伴随着国内战争的开始，原料产区、国家粮食供应区同工业中心的联系就被切断。企业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断裂。城市里开始了饥荒。

同白军激烈的战斗，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连续不断地保障红军物资需要：武器、弹药、衣服、鞋子、粮食。需要让经济服从于战争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资源。

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

为什么叫“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观点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政策。他们希望能快速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在新的社会，他们认为没有私有制、没有买卖、没有市场关系，生产服从于统一的计划，进行共同劳动，

财富的分配是平均的。积极干预国家经济管理的俄国传统思想对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工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国有化措施。

4.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

在国内战争时期，国内（尤其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发生了严重的燃料危机：巴库的石油和顿涅茨克的煤炭都不够需求。早在 1918 年年初，列宁就下令在莫斯科郊外建设沙图拉泥炭发电站。需要指出的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极热衷于电力，他认为，这种能源在社会变革中将起到关键作用。

1920 年 2 月，列宁签署了建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命令。在短期内顺利制订了规模宏大的详尽的全国电气化计划。

拟定建设新的企业和工业区以满足未来电能的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从属于国家发展计划的。事实上，国家电气化是俄国的第一个国家计划。

五　国内战争

俄国的国内战争是 1917 年革命的后果。国内战争的导火索是《布列斯特和约》和 1918 年春夏在农村实行的非常政策，这些导致了爱国阶层群众和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同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冲突。

从 1917 年 10 月到 1918 年春天，军事行动主要发生在局部。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进行了政治斗争，或者只是形成了小规模的行动。大部分被布尔什维克纲领所吸引的人民还是支持苏维埃政权的。

为什么尽管白军取得过阶段性胜利，并且获得了国外势力的巨大支持但还是输掉了战争，而红军为什么能够最后获胜？

首先，白军的领导们不善于为人民提供有吸引力的纲领。其次，在农业问题上白军尤其没有处理好。白军领袖没能认识到，没有农民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的。而要获得农民的支持就必须准许重新分配地主土地。最后，白军阵营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缺乏统一性，没有共同承认的权威领袖。

相反，布尔什维克擅长提出人民乐于接受的口号。他们能够获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人民是为在俄国建立世界上最公平正义的社会而战。外国武装干涉支持白军使布尔什维克成了俄国民族独立的唯一保护者。

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权，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事管理。能够更加高效地集中资源，更善于动员军队，更善于调动经济和人力

资源以备前线所需。人民群众相信他们，是因为新生活的美好前景召唤着他们。

第二章　1920—1930 年的苏联

一　20 年代初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1. 战争对俄国人口状况和经济的影响

经历了一战、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截至 1921 年，俄国人口同 1917 年秋天相比减少了 1000 多万人，工业生产降低了 6/7；运输处于全面衰落；煤炭和石油的开采相当于 19 世纪末的水平；播种面积急剧下降，农作物产量相当于战前的 67%。人民痛苦不堪，缺少食品、衣物、药品。1921 年春夏在伏尔加河流域爆发了严重的饥荒。

国内战争的影响也蔓延到城市。由于缺乏原料和燃料，许多工厂被迫关闭。

2. 农民起义

严重的饥荒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从 1920 年至 1921 年间，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库班河流域、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乌拉尔河流域、白俄罗斯、卡累利阿、中亚同时爆发了农民起义。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为“小国内战争”时期。农民组成自己的军队，进攻、占领城市，提出政治要求，组建政权机关。

3. 转入新经济政策

很快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军队中、无产阶级群体中都充斥着不满情绪。罢工运动增多，参与人数有几十万人。

1921 年春天的事件被布尔什维克认为是严重的政治危机。喀琅施塔得叛乱被列宁视为比邓尼金、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反革命更危险的事件，因为这是农民自发的不满同部队军事力量的联合的结果。列宁最早看到了其危险性。他从中得出了两条教训。为了保卫政权，首先，必须团结农民。其次，要更加严厉地同一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作斗争。

1921 年 3 月，第五次俄共布代表大会宣布进入新经济政策。

二　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就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为提

高农作物产量创造了物质刺激因素。但是，为了使这个刺激因素产生效应，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允许自由贸易。

工业生产领域发生了根本改变。首先是取消了工业国有化。小型企业和一部分中型企业又重新回到了私人手中。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允许租借给私人经营。允许同外国资本订立租让合同。大部分情况是在国家自身难以恢复生产的工业领域提供租让，这些领域要求投入大量资金、新技术、有经验的专家。最积极地参与到苏维埃俄国租让中的是德国、英国和美国。截至 1928 年，苏维埃俄国从租让中获利约 1 亿卢布。

农民有权用多余的农作物按照市场原则交换工业品，也就是说可以进行自由贸易。方式之一就是整顿自发市场以合作社为交易。截至 1926 年年底合作社调控了 52.2% 的贸易，有 10.9 万家贸易企业参与其中。

新经济政策允许市场关系存在于国家经济生活中。但是，按照列宁的思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

1921 年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有管理领域、科技领域的许多著名专家。1927 年开始编订五年计划。选择五年为期是因为这是任何一个大型方案建设的平均周期（如建一座大型的重工业工厂）。并且，五年时间周期经济可能会发生重大进展。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俄国部分地回到了市场经济道路。国民经济开始快速恢复。

三　苏联的建立和 20 年代的民族政策

1. 苏联建立的前提条件和意义

截至 1921 年，前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版图彻底改变了。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远东共和国和两个中亚人民共和国——花拉子模、布哈拉，它们组成了苏联政权的疆域。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还有芬兰、波兰争取到苏联对其主权的承认。波兰还占领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部分区域。

在苏维埃的各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有自己的宪法，但实际上政权都归属于作为俄共（布）组成部分的各地方共产党。

关于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原则问题，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列宁对自治计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苏维埃各共和国

应该在平等和保留主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一个共同的国家联盟。每一个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赞同列宁民族国家机制的原则。

2. 苏联的建立和1924年宪法

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聚集了各苏维埃共和国全权代表，确立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1924年1月31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会议召开期间，最高权力机关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执行和行政机关是苏联人民委员会。

总之，布尔什维克把前俄罗斯帝国大部分领土集合成了统一的国家。联合各个前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确立和发展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苏联确定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会导致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其他民族的权力受到限制。

四　20年代的政治发展

1. 转折的困难

新经济政策同布尔什维克获得国内战争胜利所提的口号是相悖的。国家出现了小企业主和商人，取代了人们所期待的全体公平、没有了市场和货币的社会主义，而农民也有权自由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这就加剧了财产的不平衡。作为城市新兴资产阶级的耐普曼和富农并没有政治权力，但是他们可以用钱贿赂官员。许多布尔什维克感觉自己被欺骗，无法在新生活中找寻归属。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反对新经济的趋势盛行。

发起新经济政策的国家最高层领导们明白，不利用市场关系经济最终会崩溃。但是，他们也担心城市和农村资产阶级势力的增强会威胁到政权。可以看出，20年代政权在建立相对民主社会和加强镇压之间不断摇摆。

同样的摇摆也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很大程度上是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的。

2. 列宁病中和政权斗争

在20年代初公认的党的领袖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加里宁这些领导人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最主要的冲突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托洛茨基享有很高的声望，并且

有很多的追随者。

形势随着列宁的生病而变得复杂。他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政治局组成“三驾马车”，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列宁看出党内领导的平衡力量被打破，他试图防止分裂并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1922 年年末至 1923 年年初，列宁口述了几篇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和信。列宁建议扩大党的领导成员组成，预料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将引发分裂，甚至建议因斯大林的粗鲁行为应将其从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

但是，实际上列宁的建议并没有实现。

3. 更加严格的政治方针

党内斗争对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内干部损失相当严重。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体制都遭到破坏。根据对党的领袖忠心的原则推荐干部获得了极大推广。为了遏制反对派，国家安全机关职能加强。总之，这为独裁政治的确立创造了先决条件。

残酷的党内斗争使国家领导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现实问题上，丧失了必要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常常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做出决定。国家向富农和城市企业主加压，限制他们的权力，向他们额外征税，拘捕他们，这加剧了经济危机。

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作战准备。进行军队动员，加强镇压。9000 名地主、富农、商人、神职人员等在 1927 年 6 月被逮捕。这些人被视为战争发生后的潜在威胁。

1927 年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破坏了本来就很薄弱的新经济政策体制，为接连不断地镇压和非常手段浪潮到来创造了前提条件。有关可能将要发生战争的传闻导致了大量购买工业品和粮食进行储备。更加严格的政治方针是 1927 年年底发生全国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一危机彻底摧毁了新经济政策体制。

五　“伟大的转折”和工业化

1.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25 年年底，第十四次联共（布）代表大会确立了国家工业化的方针。目的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道路来确保苏联经济独立。确立了赶上并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任务。

布哈林团队的方法是建立在经济学者研究基础之上的。他们赞成平衡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计划尽量利用市场关系、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私营经济，不允许急剧降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方法是建立在改革经济方式之上的。

而斯大林和他的拥护者赞同另一种方法。由于工业化缺乏外部财政来源那么就依靠利用内部资源。他们提议一开始靠最大可能没收轻工业和农业资金以加快重工业发展。

垄断对外贸易所产生的收益是工业化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家从出售粮食、木材、黄金、艺术品以及教会财产中获取外汇，以此来购买机床和设备。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了这两个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最高和最低方案）。1929 年 4 月第十六次党代会上通过了最高方案。在会议上布哈林团队的拥护者被指责为“右倾”，也就是说他们力图在苏联保留资本主义元素，他们被撤职并且再也不能影响斯大林领导的政权。

2. 苏联工业化进程和特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的任务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过高的。数百座工厂同时建设，所需大量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都不能完全满足。为了完成计划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数量大量增加，还开办了夜校。最优秀的工人被派去党和共青团组织学习。那时的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应该掌握技术!”，“改造时期技术能够解决一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共培养了 12. 85 万名具有高等和中等学历的专家，并且他们中大约一半以前都是工人。

从 1929 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突击手运动。在全国范围有数百万人参加到社会主义竞赛中，他们相信，通过忘我的劳动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和物质条件。人们的热忱成了加速工业化的重要资源之一。

为了加快工业建设进程还进行了镇压。斯大林加强阶级斗争的方针是其理论依据。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一些专家被指责为中断计划的“破坏分子”。1928 年发生了沙赫特事件。1930 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逮捕了三个大的专家团体：工程师和学者、农业专家、经济学家。逮捕和追究刑事责任的约有 2000 名专家。他们都被认为是“破坏分子”。同时，确立了苏维埃机关的“社会清洗”任务。

开发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自然资源是重要任务之一。这些地方气

候干燥，不合适生存。1929 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使用囚犯当劳力。1930 年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建立了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其中最大的部门是远东劳改营管理局。

斯大林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加强管理和高度集权基础上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最终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国家取得了巨大进步。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在 1934 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这一计划更具现实性。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的突出特点是优先发展国防工业。苏联积极利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从国外进口机床和设备以及其他工业必需品。

3. 工业化的代价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但是轻工业和食品领域的拨款不足，没法保障居民高水平生活需求和物质福利。

在商品短缺的条件下，苏维埃党政领导者、工程技术工人、生产先进分子、红军高层人员的工资明显高于普通工人。

30 年代末，由于轻工业和食品的拨款不足，苏联经济出现了严重危机。商店排起了数百上千人的长队。投机倒把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4. 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和成就

苏联在 30 年代建立了新的工业中心，东部工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苏联出现了新的工业领域：拖拉机制造业、航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发动机制造业。化学工业、动力学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了自己制造机床的工厂、重型机械制造工厂、农业机械制造工厂。1935 年 5 月莫斯科开通了第一条长度超过 11 公里的地铁线。在许多城市有了新的交通工具——公共汽车、无轨电车。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来自德国和美国的专家帮助调试进口设备和新工厂的流水线。这一时期，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但是，由于专业技术人才的不足，产品生产受限制，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斯大林提出新的口号——“专家决定一切”。

社会居民构成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大学和中等学校培养了 200 多万名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专家。工人阶级数量达到 2400 万人。

截至 1940 年苏联建成了约 9000 家新的工业企业。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苏联的工业生产指标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苏联产品总量规模在一系列领域超过德国、法国、英国，但是人均工业产值落后于这些

国家。

六　农业集体化

1. 关于苏联农村发展道路的政治讨论

1927 年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使苏联领导层面临一个严峻问题：未来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克服困难局面。斯大林认为，危机引发经济比率失衡。薄弱的工业不能保证必需品的生产。小农经济原则上并不能满足工业增长的需要。加之富农有意识地暗中破坏粮食收购。斯大林建议投入所有资源用于工业化，并且进行农业改造，加快建立大型集体经济。

布哈林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错误的领导引发了危机：没有建立工业品后备金；农村的货币收入增长，而税收还是停留在之前的水平；确立了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布哈林不反对建立大型集体经济，但是，他认为在乡村主要应该长期保留个体农民经济。

斯大林指责布哈林及其拥护者“右倾”。国内举行了会议和集会揭露他们的观点。媒体猛烈抨击“右倾分子”。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李可夫丢掉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2. 全盘集体化政策

加快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源。农业不仅是粮食来源地，还是工业化资金的最重要来源。工业化开始就采取了农业集体化方针，宣称其任务是“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村开始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强制过程：建立集体农庄、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消灭富农经济是为了保障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从 1929 年年底到 1930 年年中没收了超过 35 万名农民生产资料和土地，并把他们的财产转交给农庄。

苏维埃政权并没有给富农准确的定义，究竟什么样的人应该被认为是富农。传统地认为那些使用雇佣劳动的人为富农，但实际上有两头牛、两匹马或好房子的中农也被算作富农。那些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富农被迫迁移，流放到边远寒冷的地区为了帮助地方政权，派遣了 2.5 万名城市共产党员去到农村。

3. “胜利冲昏头脑”

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农民反抗大规模地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

1930 年春天前，斯大林意识到加快集体经济的建立将引发灾难。3 月 2 日《真理报》刊登了他名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他把罪责归咎于地方工人的“激进”，并声明，“不应该武力推行集体农庄”。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大部分的农民开始接受斯大林，把他视为人民的庇护者。

集体化政策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粮食和牲畜急剧缩减。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影响到大约 2500 万—3000 万人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政权采取的政策诱发的。

尽管谷物生产缩减，但是对国家的供给增加了一倍。集体化给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保障了工业发展必需的原料，为将农村物资转移到城市满足工业化所需创造了条件。集体化消灭了市场经济最后的栖息地——私有小农经济。

七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体制

1. 1936 年宪法

1936 年 12 月 5 日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宪法宣布国家将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宪法规定国家将消灭私人所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还规定苏联共产党是全社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分别由民族院和联盟院两院组成。

2. 镇压政策

在 1930—1933 年农业集体化进程中的大规模清洗之后迎来了平静期。1933 年通过决议停止镇压。1934 年 12 月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杀。斯大林指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这这一谋杀负政治责任。

1936—1938 年间按照斯大林的指令组织了对布尔什维克党重要领导人的反革命活动的指控。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布哈林在不同时期都对斯大林的方针提出批评。他们都被控告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被处决。

1937 年国际形势日趋复杂。西班牙的国内战争、日本入侵中国都证明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决定大清洗苏维埃社会潜在的“第五纵队”。“第五纵队”是指代内部敌人、暗探、破坏

活动和颠覆活动的实施者的术语。

在此期间，大约有150万人遭到逮捕，其中约70万人被枪毙。

(全书)结束语

从1914年到2014年100年间，是俄罗斯历史上可以称为最为复杂的时期。在不足一百年时间俄罗斯经历了两次衰落，但依靠自己的力量她又重新复兴。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付出了超过3000万人死亡的代价。

俄国开始于19世纪末期的现代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之初，1917年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国内战争中断了这个进程。俄国现代化新的阶段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这是世界历史此前从未有过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仅仅在10年之内苏联就奠定了成为工业强国的基础，在世界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下保证国家有了巨大国防生产能力。在经济生产规模方面苏联稳稳地占据世界第二位。但强大的经济潜力并不意味着苏联天生就具有绝对的优势。这种体制的运行需要集中动员国家巨大的内部力量。在苏联建成了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基础，形成了这种特有的现代化模式。

当前，俄罗斯关于苏联的评价，即苏联社会和苏联政权的特点的争论仍然存在。其中每一方观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论据。但是苏联文明这种罕见的现象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这不仅是出于解决当前俄罗斯社会深刻矛盾的需要，也是回答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世界文明出现的危机现象。

20世纪俄罗斯国家民族利益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怎么样理解沙皇政权、临时政府、俄国内战时期存在的各个政府的行为以及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政府行为？它们作出的关于国家重大决定基于什么逻辑思考？能否把我们今天国家行为局限于当年俄国、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因为怎样的情况在20世纪的许多年代里我国对外政策和西方强国一起积极向东方和南方开拓？很有效率的和极其专业的俄国和苏联外交学说是怎样形成的？出于什么样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怎样的方式苏联在20世纪不仅保持了世界伟大强国地位，而且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因为怎样的原因形成的苏联教育体制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并公认为当时世界最优秀的？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苏联）能够在极短的历史期限里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贫穷、饥荒的落后面貌？我们怎样不仅成功保持了俄罗斯特有的民族文化和

语言，而且俄罗斯人以极大努力，在建立起强大工业基础的我国不同地区依然保持了民族属性？

20 世纪乃是俄罗斯各民族探寻国家统一道路的充满困难和痛苦的年代。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有很多的付出和牺牲。如 1917 年革命的发动者，他们很多人都是真心希望在我国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人民政权，但他们的战斗热情却导致建立了一个较之过去更为严酷的政治体制。斯大林的古拉格式集中营，1937—1938 年的大恐怖，上百万的牺牲者是无辜的。这是多年来、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治愈的伤口。

1941—1945 年的伟大卫国战争是对我国各民族的一个严峻考验，我国面临是否还能在地球上继续存在的问题。全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苏联各族人民在前线和后方显现出的众多英雄主义行为，对于取得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胜利创造了条件。二战后，苏联成为当时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和实力。随之而来征服宇宙的行动和加加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飞向宇宙的宇航员，是苏联历史上星光闪烁的时代。

此后，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巨大转折导致政权和社会经济发展两次陷入的危机，削弱了国家的作用，也引起国家的解体。

一切都会保持在历史记忆中。经过许多年后，我们的后代将面临这样的评判：较之其他年代，20 世纪是怎样的一个世纪；20 世纪人们的世界观、日常生活与他们先辈相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还必须了解俄罗斯民族的一种独特现象：即使在最困难的年代，人们依然在自己的同时代人和前辈中探寻和宣传最崇高的精神和道德品质的榜样。

俄罗斯——这是最大的世界强国，她在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她在维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同时实行热爱和平的对外政策。她在世界文明发展和创造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举世公认的。

现在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制定了俄罗斯在 21 世纪发展的优先任务。这就是不仅仅要克服以前遗留下来的危机现象，还要建立信息文明的基础，进一步发展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要解决这些历史性的任务俄罗斯必须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与东方、西方的强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但这必须是在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上。

21 世纪应当成为新的、复兴的俄罗斯的世纪。

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重塑“苏联记忆”

李　琳

2016 年年初，俄罗斯基于新历史文化标准的新版历史教科书正式出版发行，联邦政府教育与科学部（以下简称“教育部”）要求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校在 2—3 年的时间内全部使用新版教材。从 2013 年 2 月普京总统正式要求重新修订历史教科书的三年内，俄罗斯联邦政府组织教育（Просвещние）、俄罗斯语言（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大鸨（Дрофа）三家权威教育出版社和几百名历史学教授、历史教师，就新版教科书的争议内容和历史标准等重点问题进行了线上和线下的近百次讨论和修订。2015 年 6 月 8 日经教育部正式批准，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内容通过严格审查，纳入国家基本教育系列教材体系。

通过教育部审查批准发行的 2016 年新版历史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共有三个版本：一是教育出版社发行的 6—11 年级教科书，共有 11 册；二是俄罗斯声音出版社发行的 6—9 年级教科书，共有 4 册，截至十月革命前的历史；三是大鸨出版社发行的 6—11 年级教科书，共有 5 册。这其中最为权威的当属《教育》版本，11 册 1547 页的历史教材由俄联邦最著名的 14 位历史学家合力完成，内容丰富、结构完整、史料严整，书中有 1048 幅插图、400 多个概念解释、100 多幅历史图表，内容涵盖从罗斯建国直至 21 世纪俄罗斯联邦的全部历史。[①] 出版社针对俄罗斯历史重大疑难问题，同时出版了教材配套的五本教师用书：《伟大的 1917 年俄国革命》《伟大的卫国战争（1914—1945 年）》《斯大林：时代肖像》《古

① 2013 年 10 月，俄罗斯联邦历史学会制定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历史教学方法新概念》草案，并提交俄罗斯政府审定；2014 年 5 月历史学会正式发布修订后的《历史教学方法新概念》，确立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历史文化新标准，并开始编写统一的新版历史教科书。2016 年俄罗斯发行的新版历史教科书三个版本均依据历史文化新标准编著，具有历史观点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罗斯国家》《形成历史统一概念的教学方法》，以指导历史实践教学。

一　新版历史教科书重塑“苏联记忆”

俄罗斯教科书序言中写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伟大的俄国革命直至现在，百余年的国家历史充满伟大的英雄壮举，也付出惨痛的代价。新版教科书中能够看到联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能感受到祖父、祖母等父辈们生活的历史记忆；能学习到每一个俄罗斯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国家历史；能发现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选择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对国家历史的思考和学习探索，是自觉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和承担国家责任的前提和基础。”①

（一）客观看待苏联模式

1. 1917 年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价值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攻击和否定十月革命、抹黑列宁等苏联领导人、歪曲和篡改苏联历史的思潮甚嚣尘上，媒体大量的苏联负面报道对俄罗斯唯物史观产生巨大冲击，俄罗斯史学界和教育学界一度无视苏联成就，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价值。教科书实事求是地指出，“1917 年伟大的俄国革命不仅是俄罗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也是整个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狭义上 1917 年革命指的是 2 月至 10 月期间，即推翻沙皇俄帝国到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时期；广义上伟大的俄国革命应理解为沙皇帝国覆灭直至布尔什维克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确立政权。1917 年俄国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世界四大帝国的军事政治灾难背景下，建立起全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②

教科书高度评价俄罗斯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入的军事力量和发挥的巨大贡献，称“俄罗斯为了阻止德国侵略者入侵欧洲及全世界，为保卫祖国利益，进行正义战争，展现了俄罗斯军队和士兵的伟大英雄主义

---

①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5.

②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1）.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5.

精神。战争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俄罗斯军民参与正义战争的重大损失（参见表1）导致国家政权和社会民众的对立，从而引发国家政治变革”。①

表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军事损失对比图（1914—1918年）②

国家	战争损失（百万人）					
	军事力量	总损失	百分比（%）	死亡人数	被俘人数	伤亡等其他人数
俄罗斯	17.6	11.4	60.6	3.3	3.6	3.8
法国	8.2	4.7	57.3	1.4	0.5	2.8
英国	9.5	3.0	31.5	0.7	0.3	2.0
意大利	5.6	1.8	31.3	0.5	0.5	0.8
美国	3.9	0.3	7.6	0.08	0.04	0.18
德国	13.3	7.5	56.3	2.0	1.0	4.5
奥匈帝国	9.0	5.3	58.8	1.5	1.8	2.0

1917年俄国革命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使得国家社会各领域得以复兴。教科书中引用马克西姆·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一段话：“俄国人民同自由举行了婚礼……由于这一结合，在这个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备受折磨的国家里将诞生出强有力的人……在俄国人身上，他那理智和意志的力量，那被警察制度数百年压迫所扼杀和压抑的力量将像明亮的火焰一样熊熊燃烧。”③

关于1917年革命的意义，教科书强调“革命意义不仅局限于国内，布尔什维克创建的新兴社会体制更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世界各地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成为世界革命的先进代表。1919年3月俄罗斯成立联合其他国家的共产国际组织，并力图组成‘全世界苏维埃联盟’。十月革命的思想不仅影响到革命者，‘资产阶级’国家领

①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1）.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25.

② Тамже. , стр. 26.

③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79.

导人也明确意识到，剥削与压迫劳动人民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革命。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影响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改变政治制度和政策，试图解决社会内部矛盾，以避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①

2. 苏联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辩证关系

教科书对 1925 年年底的苏联工业化建设使用“伟大的转折”标题，称：“工业化的目的在于通过优先发展国家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以保障苏联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在与西方各国不可避免的竞争形势下，苏联只有‘追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才是国家立足的根本。”②

1925—1929 年国家领导层讨论过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为首的领导人召集众多经济学者共商国家发展道路，制定国家重工业和轻工业平衡发展、运用市场与商品货币经济关系、发展私营经济等保障工农阶层生活质量水平的经济改革草案。斯大林对此提出意见认为，由于外来资本的缺失，应优先发展依靠本国国内资源的重工业，同时最大限度地从轻工业和农业中提取资源。③

苏联 30 年代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重要工业品产量均大幅提高 5—10 倍，拖拉机、汽车等重型机械由原来的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优势产业（见表 2），极大地保障了国家的军事工业和国防科技建设。

表 2　　苏联主要工业品产量④

	各年度工业产量			
	1913 年	1928 年	1932 年	1937 年
生铁（百万吨）	4.2	3.3	6.2	14.5

①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79.

②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1）.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123.

③ Тамже. , стр. 123 – 124.

④ Тамже. , стр. 131.

续表

	各年度工业产量			
	1913 年	1928 年	1932 年	1937 年
钢铁（百万吨）	4.2	4.3	5.9	17.7
煤炭（百万吨）	29.1	35.5	64.4	128.0
石油（百万吨）	9.2	11.6	21.4	28.5
电力（十亿千瓦时）	1.9	5.0	13.5	36.2
拖拉机（千台）	—	1.8	50.8	66.5
汽车（千台）	—	0.8	23.9	199.9
纺织品（百万米）	2582	2678	2606	3448

教科书对苏联工业化的总结为：“苏联人民通过艰苦的劳动和非凡的努力，建立了完全独立、无依赖的工业强国，能够自主生产各类工业产品。国家具有强大的工业发展潜力，能够基本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① 根据官方资料统计，1940 年苏联建立近 9000 个工业企业，工业化建设成就仅次于美国，成为超越德国、法国、英国的世界第二位工业强国（见表 3），工业化发展速度是德、法、英的 3 倍。②

表 3 **苏联与资本主义大国工业产量对比③**

国家	1928 年			1939 年		
	电力（十亿千瓦时）	钢铁（百万吨）	生铁（百万吨）	电力（十亿千瓦时）	钢铁（百万吨）	生铁（百万吨）
苏联	5	4	3	48	18	15
德国	17	15	14	37	18	15
英国	16	9	7	40	13	8
法国	15	9	10	20	8	80
美国	113	52	39	188	62	43

①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1）.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133.

② Тамже.

③ Тамже.，стр. 131.

苏联工业化建设成效显著，但轻工业和农业的落后却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阻碍。1930 年年底苏联经济出现轻工业和食品农业危机，国家粮食产量逐年减少，而国家粮食收购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农民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苏联领导人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变和解决面临的农业危机。教科书解释农业集体化的动因："斯大林认为，经济比例失衡是导致食品供应危机的主要原因。小农经济从根本上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国家工业建设的需求，同时大富农阶层有意识地破坏国家粮食供应，加剧国家轻工业和农业危机。"① 为保障国家工业的高速发展，斯大林建议应加强农业建设转型，加快全盘农业集体化。

实行大规模农业集体化后，尽管国家的粮食产业发展缓慢，但国家粮食收购量已高出原有的两倍之多。农业集体化保证城市工业建设，保障基本工业原料供给，消除苏联市场经济最后的残余——农业私有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集体农庄生产模式。30 年代苏联农村状况相对复杂，首先是廉价的粮食供应和大量劳动力来源，国家为保障粮食供应，将一半以上的粮食作物收购，维持不变的粮食价格，以保障国家工业建设。另一方面，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几乎接近最低生活标准，直至 30 年代中期（1935 年 2 月）允许农民拥有私有农耕地、牛、羊等农产品，允许自由买卖后，农民的生活状况才出现好转。

教科书总结农业集体化问题："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核心目的是获取农业资源以保障工业所需。农业集体化采取强力措施剥夺农民私有财产，引发了富农和中农阶层的反抗。"②

3. 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成就

教科书肯定苏联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格局，形成两大超级强国：美国与苏联。二战前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世界 17% 的领土和 9% 的人口，战后共产主义政党领导 26% 的领土和 35% 的人口，欧亚大陆上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具有普遍性和扩大化，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主义政党进入政府机

①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1）.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135 – 136.

② Тамже., стр. 140.

构、参与国家决策，共产主义阵营得以极大加强。”[①] 面对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抛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等，对苏联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加剧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对抗。

伴随着苏联对外政策的“赶超与争霸”，苏联国内进行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家防御能力的经济科技改革和食品工业建设。教科书称“50 年代中期，苏联跨时代的科学技术变革具有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改造和结构创新的特征。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现代信息手段被运用到工农业生产建设中，改革取得巨大成绩。苏联第七个五年计划（1959—1965 年）结合经济改革和科技创新，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以消除部门差异和地区差异、促进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超额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务，取得了工业建设的卓越成就（见表 4）”。[②]

表 4　　苏联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工业产品产量（1959—1965 年）[③]

工业产品	1958 年	1965 年（计划产量）	1965 年（实际产量）
电力（十亿千瓦时）	233	500—520	507
钢铁（百万吨）	55	86—91	91
石油（百万吨）	113	230—240	243
天然气（十亿立方米）	30	150	129
煤炭（百万吨）	340	—	578

五六十年代后，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改善。一是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从 1950 年至 1964 年城市住房资金投入提高两倍，居民搬迁至独立而舒适的住房，这段时期亦称为“住房改革”；二是民众工资收入大幅提高，尤其是普通体力工作人员的工资增加，而工程师等脑力劳动者的工资仍低于技术工人；三是食品供应出现平衡发展趋势，1958 年粮

①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216.

② Тамже. , стр. 232 – 233.

③ Тамже. , стр. 233.

食需求比 1940 年减少 25%，而肉类和奶制品的需求增长 2 倍和 2.5 倍，但某些食品（如蔬菜、水果、鱼类）供应仍达不到预期标准；四是退休金保障体系完善，1956 年起工龄 25 年的 60 岁男人和工龄 20 年的 55 岁女人都获得国家退休金保障；五是国家建立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居民平均寿命显著提高。①

教科书中引用苏联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莫伊谢维奇·涅克里奇（Александр Моисеевич Некрич）的观点："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历经十一个五年计划，苏联从工业落后国发展成为具有完备的工业基础，在航空航天、热核武器和海军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强大国家。"② 面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军事包围，面临随时发生反苏战争的威胁，苏联进行卓越而艰苦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经济高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形成人类历史上宝贵的"苏维埃经验"。

（二）辩证分析斯大林

2014 年 10 月 12 日，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在俄罗斯教育机构的历史教师中发起"斯大林印象"的大型讨论会，并邀请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斯大林时代研究专家奥列格·维塔利耶维奇·赫列夫钮克（Олег Витальевич Хлевнюк）主持并参与讨论，会议主旨是探讨新的历史文化标准下如何看待斯大林问题，并提供历史教师以科学的教学研究方法。奥·赫列夫钮克在近四百人的网络讨论会中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和翔实数据，解析与斯大林相关的重要历史事实，强调"复杂历史背景下的斯大林性格应多角度研究"。会议一致认为，斯大林形象不应该被妖魔化，历史人物都在扮演历史所赋予他的作用，对斯大林应客观全面地研究。

1. 对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评价

俄罗斯历史学者关于斯大林问题尚存重大分歧，有的用"冷酷、残

---

①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234 – 236.

②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2）.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155 – 156.

忍、独裁”形容斯大林本人性格和政策；有的用“伟大、高尚、神圣”说明其历史功绩和成就。教科书教师用书《斯大林：时代肖像》中开篇解释：“就影响苏联历史的最重要人物而言，斯大林在历史进程中具有最为关键的时代意义。苏联历史与这些词紧密联系，诸如‘列宁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现代化’‘斯大林社会主义’等，这些概念准确地传达了苏联的时代特征。”① 斯大林的确犯有历史性错误，但他仍不失为苏联社会主义的重要和关键人物。

斯大林作为苏联建设的重要领导人，对其分析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他应既非神话亦非妖魔。教科书认为，一方面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效显著，甚至是摆脱社会危机的唯一解决方式，是现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根据经济学家统计，1928—1940 年间苏联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介于 7%—13% 之间，现代技术和新产品被开发、高效率的生产设施被创造，国家高速工业化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基础。综合国力提高和重工业发展带来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变革，人民享受社会平等、福利、降价，普及儿童的四年义务教育，城市里普及七年和十年教育体系，大学和学院培养众多年轻的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中流砥柱。②

另一方面，斯大林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是“国家工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任务。1930 年 1 月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农业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中，确立农业集体化的基本形式是享有土地使用权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的集体农庄，并要求在农民自愿参加的基础上，五年之内完成农业集体化改造。尽管政策是为了保障国家工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平稳发展，但是“实践的方式上出现了压迫和强制”，剥夺富农和中农的生产资料，甚至将其处死或驱赶出农村，造成农民的群体性反抗。③

---

① Олег Витальевич Хлевнюк. И. В. Сталин：портрет на фоне эпох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16г. стр4.

②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125 – 128.

③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1）.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136 – 137.

教科书指出："1930 年春，斯大林开始认识到推行农业集体化方法的错误，3 月 2 日《真理报》发表他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认为集体化的重大错误在于促使地方政权采取了暴力，应减少强制性手段。"① 集体农庄步入正轨后，尤其是"随着工业化成果进入到农村，大量的拖拉机、耕种机和新型农业机械运用到农业建设，年轻农业专家参与到村庄农业化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效率提高。30 年代中期农业建设趋于稳定，1935 年农民允许拥有少量私有生产和生活资料，国家农业产量稳步提高"。②

2. 卫国战争中斯大林的领导作用

苏联解体引发对俄罗斯历史文化和传统信仰的巨大非议和冲击。以维克多·苏沃洛夫（笔名 Виктор Суворов，真名弗拉基米尔·博格达诺维奇·列佐 Владимир Богданович Резун）为首的"破冰者"利用所谓最新"解密档案"，对苏联历史和斯大林问题重新解说，提出苏联在 30 年代就已经确定世界霸权的外交政策，斯大林极力促成世界大战和革命战争，并为希特勒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进而说明斯大林发动了苏德战争，企图争夺世界霸主地位。这一观点得到后继者弗拉基米尔·达尼洛维奇·达尼洛夫（Владимир Данилович Данилов）、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梅里久霍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Мельтюхов）、鲍里斯·瓦季莫维奇·沙克罗夫（Борис Вадимович Соколов）等人的追捧。

这种已经偏离学术研究轨道的观点在网络和媒体大肆传播，引发俄罗斯民众对苏联历史的猜测和臆想，也形成历史学界关于苏联和斯大林问题的巨大争论和辩论。尽管其后许多历史学家如奥列格·维克托洛维奇·维什廖夫（Олег Викторович Вишлёв）、鲁道尔夫·格尔曼诺维奇·皮霍亚（Рудольф ГерановичПихоя）等用科学文献无可辩驳地反击了苏沃洛夫"抹黑"历史的言论，但国民历史文化的迷失和爱国主义情感的缺失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模糊和矛盾的历史观束缚着俄罗斯前进发展。

教科书重新解说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斯大林形象："1941 年 7 月 3 日苏德战争开始，斯大林在广播中发表俄罗斯人民记忆犹新、慷慨激昂的演

---

①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103.

②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1）.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140.

说：‘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调动了全体苏联人民夺取胜利的决心。6 月 23 日根据联共（布）决议成立卫国战争军事指挥部，成立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为首的最高统帅部，8 月 8 日斯大林被正式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① 斯大林掌握军事指挥的最终领导权和最后决策权，他也成为战争年代和战后苏联人民眼中的胜利形象。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战争任务，如击溃德军的闪电战计划；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创建民兵营、战斗营，国家成为庞大的军事基地；工业中心向东迁移，调动国家经济资源为战争服务；民众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理解和支持保家卫国的重要性。历史学者弗拉基米尔·古洛夫（Врадимир Гуров）指出：“我们应该向伟大卫国战争的领导者斯大林致敬，在国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斯大林成功地将苏联的欧洲工业转移到东部，并创建强大的国防工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苏联人力和物力，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②

3. 斯大林个人崇拜与政治运动

教科书并不回避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党内“大清洗”的历史问题，但抛弃“夸大其词”带有感情色彩的批判和评论，采取客观而平实地还原历史事实态度。《教育》出版社教科书以题为“镇压政策”的章节阐释：“1934 年 12 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被害，斯大林要求格里戈里·耶夫谢维奇·季诺维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等领导人为此承担政治责任。1936—1938 年根据斯大林指示，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接受调查，被定为反革命而受到迫害”，“许多参加过武装运动的旧白军分子和孟什维克也被列入镇压名单，在被逮捕的 150 万人中有近 70 万人被处死”。③

---

①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156 – 157.

② Врадимир Гур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оли И. В. Сталин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 – 1945 гг. Вектор науки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титета. ном. 7. 2010г.

③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1）.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144 – 145.

大鸨版本有三页两节描述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1936 年苏联宪法被称为'斯大林性质'，所有苏联人民的建设成就、当时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与斯大林名字紧密联系，主要宣传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影、书籍等都出现'伟大的人民领袖'称呼。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十月革命领袖和卫国战争领导者，国家形成统一的宣传口号'斯大林—列宁事业的继承者，今天的列宁！'国家政权领导层也出现斯大林'一言堂'，即他的指令无须讨论而被无条件执行"。①

针对"大清洗"事件，教科书对此史实梳理："斯大林专政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重要特征。1930 年苏联出现劳教营管理总局（古拉格 ГУЛАГ），秘密劳教和杀害与当局意见不合的政治犯。1934 年基洛夫遇刺事件引发全国性肃反清洗运动，按照斯大林指示，应以'加快程序''不延误死刑判决执行'的态度调查此事，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成百上千个所谓'人民的敌人'，包括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和外国间谍组织。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1937—1938 年间为'大清洗'高峰，大约逮捕了 160 万人，有 68 万人被处死，其中包括老布尔什维克、白军分子、孟什维克、富农和社会革命党人。"② 其后，教科书列出劳教营（古拉格）之一，著名的德米特拉格（Дмитлаг）囚禁与死亡人数对比图（见图 1、图 2），并提出问题："对比两图，能否得出德米特拉格'群体性大规模死亡'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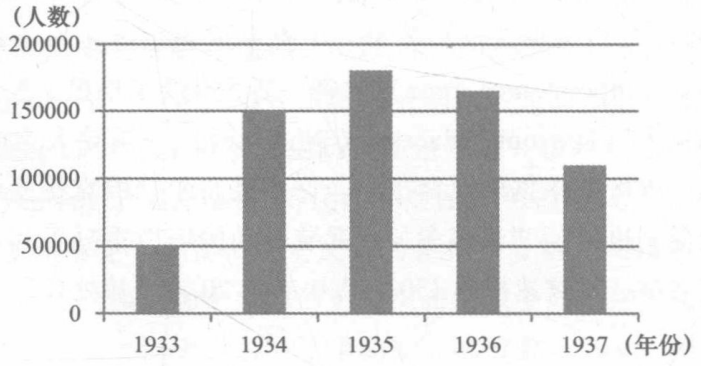

图 1　1933—1937 年德米特拉格囚禁人数③

①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112 – 113.

② Тамже. , стр. 114 – 115.

③ Тамже. , стр.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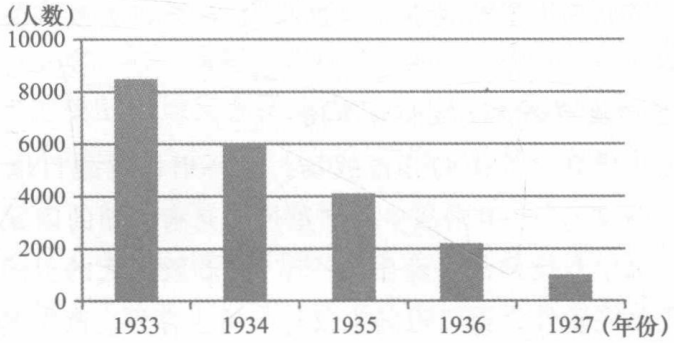

图 2 1933—1937 年德米特拉格死亡人数①

教科书提出的上述权威数据，显然是针对斯大林问题研究中某些“抹黑”苏联史、“滥杀无辜”斯大林形象问题而提出。德米特拉格囚禁犯 1937 年仅有 1% 的犯人被处死，1933 年处以极刑最多的年份也就有 15% 左右，这说明劳改营中并不存在“大规模群体性”的屠杀行为，更说明那些漫无边际的“大清洗”夸大数据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高度评价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俄罗斯人民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记忆莫过于 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凝聚了人民无畏的历史英雄主义，而且决定国家命运和民族认同。教师参考的教科书中指出：“遗憾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价值观和历史研究范式的转变，我们的史学家竟然重新质疑苏联卫国战争的性质，尤其是前苏情报官员维·苏沃洛夫‘调查研究’后得出令人惊愕的结论：（1）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挑衅性的外交政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2）苏联红军的卫国战争具有侵略性、非正义性；（3）1941 年苏联与德国进行同样的战争准备，具有相同的战争意图；（4）基于以上三点，纳粹德国的战争是防卫性和防御性。”② 苏沃洛夫的观点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芬兰、乌克兰、波罗的海等国出现了拥护

①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114.

②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годов.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ител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4 – 5.

者和传播者，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被“歪曲”，甚至成为改变公众意识的政治斗争工具。

1. 苏联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和神圣性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场，教科书标题醒目地写着“伟大的、神圣的、国家的”① 卫国战争，字里行间充满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绪。书中专设“战争性质”一节：“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是基于保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性，保障祖国主权与人民生存权。战争具有真正的全民性。在前线和后方，俄罗斯人民为祖国的自由而战斗，‘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战斗口号鼓舞着人民与敌人斗争的勇气和决心。苏联卫国战争是正义的、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②

苏德战争到底是由谁发动的？苏军到底是自卫还是侵略？教科书回顾战争的缘起和进程：“1939 年 9 月 1 日，德军突袭波兰、英国和法国，发动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界大战。9 月 17 日，当波兰政府已经全面放弃领土，苏联红军实际上已经收复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9 月 28 日，苏联与德国再次签订《边界友好条约》，确定两国互不侵犯的边界区域。1939 年秋，苏联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签订互助协议。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德军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猛烈攻势，成千上万的火炮、飞机、坦克和战舰对准苏联的领土，轰炸我们的机场、军事基地，以及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的大型工业中心，苏联军民被迫应战，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持续了 1418 个昼夜，是英勇无畏、付出巨大损失的四年正义战争。”③

教师参考的教科书中强调两次苏德条约和德军单方面撕毁条约的背信弃义：“苏联政府已经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在德国的侵略意图暴露后，只能采取最果断的措施防止侵略扩大。1939 年 8 月 23 日，苏联要求德国给予安全保障，《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德国方面承诺对苏联‘不会采取任何暴力、任何攻击、任何武力、任何威胁’，保证苏联的政治和领

① 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буе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ачёв.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начало 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рофа. 2016г. стр. 152.

②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2）.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13.

③ Тамже. , стр. 12.

土安全。1939 年 9 月 28 日，苏德再次签约《边界友好条约》，德国再次承诺不会武力进攻苏联。这两次条约均无两国军事合作的条款，亦无要求他国参与军事冲突的强加义务，或协助他国联合军事行动的要求”，“纳粹德国是非常不可靠的合作者，放弃了国际缔约原则和基本道德”。①

教科书回答了苏德战争发起的两大问题：一是战争的发动者是纳粹德国，战争意图具有明确的侵略性和攻击性；二是苏联无任何参与军事合作的意图，无任何军事进攻的意愿。相对于纳粹德国的侵略性和攻击性，教科书称苏联军事防卫行为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具有不可辩驳的正义性和神圣性。

2. 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主义精神

教科书指出，1944 年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为解决威胁列宁格勒的德军并歼灭北翼德军集团，苏联红军在 1944 年 1 月开始发动号称“斯大林十大打击”的连环战役，北部和中东欧的连续胜利彻底改变战争局势，德军至此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并走向灭亡。② 1940—1944 年战争初期，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尚处于劣势，战争初期由于德军突如其来的“闪电战”和大规模入侵，苏军军事防卫一度失利，损失很大。维·苏沃洛夫等人就此认为，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并没有投入兵力和物力，采取消极抵抗等战争不作为行为，并借此抹杀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Гео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Жуков）、卓雅·安纳托利耶夫娜·科斯莫杰扬斯卡娅（Зоя Анатольевна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等英雄形象，否认卫国战争的英勇行为和英雄主义精神。

那么，苏德战争初期是否存在苏联红军消极抵抗、兵力不足而造成了战场失利？教科书教师用书写道：“1939 年前的德国为发动统治世界的战争做好了准备，创造强大的军事工业。煤炭开采、钢铁生产、机器和机车的生产均优于苏联，德国是飞机材料电解铝生产的全球领导者，钢铁产量是苏联的 2 倍，铁矿石产量是苏联的 6.3 倍，石油产量是苏联的 7.3 倍，

---

①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годов.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ител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16 – 17.

②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2）.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56.

而且这种工业优势一直保持到了 1944 年（见表 5）”，[①] 德国生产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储备能力远胜于苏联。

表 5　　苏联与德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对比（1940—1944 年）[②]

工业产品	苏联产量	德国产量	对比
电力（十亿千瓦）	195.9	352.7	1∶1.8
煤炭（百万吨）	607.4	2924	1∶4.8
钢铁（百万吨）	63.7	162.5	1∶2.6

面对备战已久的德军以及突如其来的战争，苏联军队猝不及防，战争初期有所失利。教科书指出：“根据历史学家统计证明，德军 1941 年 6 月 22 日突然发动的闪电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抵抗的。战争初始，敌军向苏联投入其 70% 的军队、75% 的枪支和迫击炮、90% 的坦克和飞机。”[③] 但德军最猛烈的进攻遭遇到苏联红军最顽强的抵抗，“按照德军计划，应在三十分钟内攻克苏联防线，但红军战士顽强作战，许多边境线上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昼夜，没有一个师、没有一支边防支队主动放弃防线，苏联红军表现了史无前例的英雄主义与英勇精神”。[④]

战争初期，苏联红军积极应战，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列宁格勒保卫战、斯摩棱斯克会战、基辅战役、莫斯科会战等防御战争。不仅如此，“战争初始，苏联各地就建立了众多游击队伍，成立全俄布尔什维克地下反抗组织。苏联共有 6000 多支由俄罗斯人与他国人民组成的游击队，英勇的游击队员击毙、击伤、俘虏了 100 多万敌军，摧毁 4000 多辆坦克和装甲汽车、65000 辆汽车和 1100 架飞机，炸毁 1600 多座桥梁和 2 万多列火车。”[⑤] 可见，没有任何理由证明苏联红军消极应战而导致战争初期失利。

1941 年至 1944 年年初的苏德战场中，德军损失巨大，但仍不失为一

①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годов.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ител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34 – 35.

② Тамже. , стр. 35.

③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2）.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14.

④ Тамже.

⑤ Тамже. , стр. 29.

支强大的军队，1944 年后德军被迫转为战略防御状态。苏联人民为了取得战争最后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继续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军事力量、武器与迫击炮、战斗机的数量都大于德国纳粹军队（见表 6），逐步确立了英勇的苏联红军在苏德战场的优势地位，实现保家卫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表 6　　苏德战场双方军力对比（1944 年 1 月 1 日）①

指标	苏联	德国
军队总人数（百万）	6.4	4.2
枪支与迫击炮（千台）	96	47
坦克与自行火炮（千辆）	5.3	5.3
飞机（千架）	10.2	2.8

3. 苏联在二战中的决定性作用

抨击和否认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学者还认为，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指挥无方、装备不良，致使苏联军民巨大伤亡，死亡人数超出德军数十倍。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76 年采访时说是 30 倍，1991 年 6 月 4 日著名的《共青团员真理报》以此为题举报“斯大林灭绝人性的罪行”，引发了反苏联反斯大林的社会反响。2000 年历史学者鲍·沙克罗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一书中称，德军和苏军在战争东线的人员损失，包括被俘期间的死亡人数比例是 1∶10。②

教科书积极评价苏联红军在二战胜利的决定性作用：“苏德战场中苏联军民在前线和后方都表现了艰苦卓绝的英雄主义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对德国纳粹和日军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苏德战场苏联消灭德军 607 个师、80% 的德军士兵、75% 的德军军事武器；远东战场上苏军三天内消灭大约 80 万日军。”③“胜利日”已经成为俄罗斯最伟大、最重要

①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2）.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56.

②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годов.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ител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55.

③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2）.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65.

的节日。

针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具体死亡人数，教科书称："苏联军民为胜利付出巨大代价，战争夺走大约 2700 万苏联人民，其中包括前线近 1000 万苏联将士，敌后牺牲的 400 万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和普通民众，还有 850 多万民众遭受到德国法西斯奴役"，[①] 苏联军民的伤亡是重大的、惨痛的，但绝不能片面得出苏联军民牺牲人数是德军数十倍的结论。教科书教师用书认可俄罗斯联邦政府"卫国战争年代损失统计部门间委员会"的官方数据，即苏联军民共损失 2660 万人，前线损失将士近 900 万人，苏联红军与德军的战斗损失比例为 1.3∶1，驳斥鲍·沙克罗夫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夸大数据，强调："苏军损失的最高上限是德军的 1.3 倍。"[②]

"苏联军民在消灭法西斯德国、日本及其仆从国的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苏联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取得胜利，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胜利者的功勋永远会被铭记。"[③] 教科书在总结苏联在二战历史的重要地位后，援引斯大林在 1945 年 5 月 24 日的讲话："我们政府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 1941—1945 年红军撤退，离开了我们的村庄和家乡……因为当时是没有任何办法。但是人民相信政府，奉献生命夺取胜利，这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保证了战胜敌人的历史性胜利，这是战胜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感谢人民！"[④] 引用这段话的用意一则在于斯大林实事求是地检讨政府决策所造成战争初期的损失，同时更肯定和颂扬苏联军民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是卫国战争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二　新版历史教科书重塑"苏联记忆"的重大意义

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是教育部审查认定、国家历史学会编写，具有权威性和国家意志性，代表着当前俄罗斯学界的主流观点，并具有明确的

---

①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2）.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65.

②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годов.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ител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63.

③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Морук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часть 2）. 10 кл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ние. 2016г. стр. 65.

④ Тамже. , стр. 66.

国家历史观导向。从教科书“苏联问题”的史实分析中发现，俄罗斯联邦已由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全盘否定斯大林，回归承认历史真相，尊重苏联历史的功绩和成果，实事求是看待斯大林的功与过，承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注重对某些重大事件做出尊重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价。在此意义上，体现了俄罗斯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历史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以及俄罗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建。

（一）抛弃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垃圾”

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国家历史，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共识。2014 年 1 月 16 日普京总统亲自接见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并就修订标准发表谈话：“最重要的是还原历史真实，现有历史教科书不仅贬低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人民的作用，而且存在某些深层次的‘思想垃圾’，这些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举例说“战后苏联在东欧历史的作用问题上，有人认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东欧陷入斯大林政权的黑暗统治，东欧的泛苏维埃化对这些国家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我认为就二战后果而言，如果非苏维埃胜利而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那产生的后果就是这些国家‘完全被击溃’，应以最客观的方法还原历史”。①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国家历史学会主席谢尔盖·叶夫盖尼耶维奇·纳雷什金（Серг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Нарышкин）称：“现有历史教科书充满了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思想偏见、国家和民众都不能接受的历史评价，尤其是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问题，要摒弃这些无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历史观点。”② 原历史教科书“思想垃圾”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现代史，如片面看待斯大林、否定苏联卫国战争意义、抹黑苏维埃十月革命、错误评价苏联解体等，陈旧的、错误的历史态度和历史观念将直接导致俄罗斯人轻视国家历史、缺乏国家认同，成为俄罗斯前途和未来发展的阻碍。

教育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编写组认为，抛弃原有“思想垃圾”的基础在于树立新的苏联历史观，正确看待历史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整体评估苏联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正确评价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以

---

① Путин объяснил, зачем нужен единый учеб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 http://ria.ru/society/20140116/989593596.html.

② Егор Созаев-Гурьев. Путин призвал избавиться от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мусора в учебниках истории. Исвестия. 16 января 2014.

及这场胜利对苏联在战后世界地位的重大影响；苏联战胜纳粹德国及其盟国对世界的深远影响；苏联人民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苏联快速实现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如用于和平目的的空间探索，利用热核反应、大型电站、运河和水利枢纽等”①，随着近年来俄罗斯在苏联历史问题的澄清，否定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垃圾”，还原真实历史故事成为新版历史教科书的第一要务。

（二）找回“被遗忘的历史英雄”

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已经超越了历史学术的研究范畴，成为意识形态和思想舆论的主要控制工具。受西方资助的歪曲和丑化苏联的教材占领课堂，抹黑苏联的历史文章充斥媒体，否认英雄人物的历史功绩、否定国家历史的重大史实、歪曲布尔什维克形象等，形成俄罗斯混乱的历史观，造成国家意识形态迷失和国家认同困境。总统普京认为：“历史教学需要的是历史连续性和事件发展关联性，俄罗斯历史教育是确立国家民族、文化和历史认同的基础，历史教育的任务应还原历史重大事实和英雄人物事迹，不能像以往历史教科书中贬低历史英雄人物和曲解历史事实。”②

针对某些原有教科书中否定历史英雄人物，丑化国家领导者的情况，新版教科书的最大价值在于还原俄罗斯历史英雄形象、树立当代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2013 年 10 月联邦政府文化部部长弗拉基米尔·拉斯基斯拉沃维奇·梅津斯基（Владимир Ростиславович Мединский）在俄罗斯历史学会扩大会议上说：“历史教育的最重要任务是使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准则和爱国主义精神，新版历史教科书应该呈现鲜明的公民意识、服务于祖国、奉献于祖国的历史事实。”③ 历史教科书不仅正面描述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历史史实，而且歌颂了卫国战争中英勇奋战的将军士兵，如朱可夫元帅、飞行员伊凡·尼基托维奇·阔日杜布（Иван Никитович Кожедуб）、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波

---

① Дани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и т. д. Концепция учебника《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 – 2008 гг.》. Посла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2016г. .

② Путин избавит учебники истории от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мусор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 16 января 2014г. .

③ Итоговое обсужден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единого учебника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состоялось сегодня.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 30 октября 2013 г. .

克雷什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Покрышкин）、女英雄卓雅、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веевич Матросов）等英雄的历史事迹。

“令人担忧的是，俄罗斯青年人在具有强烈的创新和独立意识的同时，也更容易接受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和新纳粹青年组织有扩大趋势，青年犯罪比例逐年提高”，教育学博士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戈尔博诺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研究发现：“国家仍存在模糊和矛盾的道德观念，传统文化价值和爱国主义被视为因循守旧，而伪外来文化往往被年轻人视为‘现代文明’，青年的精神迷失和歪曲爱国主义理想的现象非常严重。”① 为了防范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侵略、价值观扭曲、玩世不恭等反爱国情绪的蔓延，联邦政府教育部把找回历史英雄人物、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视为修订历史教科书的重要任务。

（三）弘扬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辉煌成就”

俄罗斯民族具有较强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能力，当苏联解体、经济休克和社会混乱之时，勇于直面国家创伤、进行自我修复，但后苏联时期的现代文化重建中，由于缺乏历史文化的整体记忆传承，造成了俄罗斯文化主体和公民主体身份的认同缺失。学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娜·罗杰诺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Логинова）在全俄中小学生中进行广泛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5.54%以上的儿童不清楚俄罗斯联邦的国歌与俄罗斯传统文化，而只有12.87%的学生为祖国感到骄傲自豪，19.31%的学生称自己具有爱国主义精神”②，社会价值观混乱和对国家历史文化缺乏统一认识，务实主义、自由主义、个体意识等与传统俄罗斯价值观冲突问题，成为俄罗斯历史教育的重大弊病。

普京总统对此指出：“国家最终的经济繁荣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来源于

---

① 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школьников в условиях город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Кемер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3января 2000г..

② Александ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Логинов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школьников средствами интернет-проектов.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ном. 8. 2009г..

国家公民的每个人，因为他们植根于国家历史、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具有共同目标和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强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是俄罗斯发展的根本和基础。教育的作用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我们需要恢复伟大的俄罗斯文化和文学，需要具有高度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俄罗斯公民。教师和教育是国家价值观、思想和观念最重要的守护者，应教育俄罗斯公民感受到俄罗斯国家和土地的神圣，履行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① 历史教育应使国民了解并掌握俄罗斯独特的历史文化、卓越的文化艺术成就，培养珍视传统和遵循传统的道德观念。

新版历史教科书囊括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俄罗斯帝国、苏联、俄罗斯联邦等历史各个阶段的文化成就，阐释了建筑、音乐、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巅峰成果和世界地位，包括苏联时期的诺贝尔文学奖、侨民文化和航空航天等军事工业重大科学创新。正如教材主编、莫斯科国家关系学院院长安纳多利·瓦西里耶维奇·托尔库诺夫（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Торкунов）所说：“我们确定这是一本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的优秀教科书，它集合了俄罗斯人民历史与文化多样性，能够唤起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和公民身份认同。”② 新版历史教科书与国家历史文化紧密相关，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休戚相关，重塑俄罗斯历史文化辉煌成就，以实现国家气质和民族精神的世代传承。

三　余论

俄罗斯国内对联邦官方历史新标准与新版教科书仍有争论和质疑。历史学家鲍里斯·亚历山大洛维奇·卢奇金（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учкин）发表文章《新版教科书：国家意识形态的标准》，尖锐地指出根据国家意志形成的历史教科书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历史教科书修订吸引了科学家、学者、教师和家长的讨论，其目的在于消除国家内部矛盾和避免历史事件解释的相互冲突。俄罗斯历史被重新解释，许多历史名词被替换：鞑靼蒙古的桎梏更改为金帐汗国政权、教会分裂更改为宗教传统

① ПетрАкопов.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звал к обретению и укрепл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Деловая газета：Взгляд. 20 сентября 2013г..

② Анатолий Торкунов. Не сомневаюсь：получились хорошие,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ные книг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http：//old. prosv. ru/info. aspx? ob_ no =45335.

形成、专制变为国家保守主义、废除农奴制变为社会法制现代化、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更改为伟大的俄国革命、集体化和镇压变为苏联现代化模式，重新解释体现了对祖国历史的重新认识，但是也造成政治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科学性的干扰”①。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联邦如何解读过去、评判历史，不仅在于修正现状，更决定着构建未来的发展道路。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иновьев）认为：“受苏联教育的几代人在当代俄罗斯已成为过去，而新俄罗斯人在对西方世界的模仿下成长，缺乏祖国和公民责任等概念，道德观念缺失，加之国家教育程度低下，出现了嫉妒、贪婪、贪图享乐，甚至犯罪等动机和行为。”② 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已经超越了历史教育、历史研究范畴，围绕着历史重大问题争夺的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道路的较量。

---

① 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учкин. Новый учебник истории: ориенти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Знание Понимание Умение. ном. 5. 2014г. .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иновьев. 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и зла.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ом. 10. 1994г. .

第五篇

军事篇

我的时代*

——关于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著
马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
孙建廷（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院副院长） 译

个人背景

因为我将要讲述的是我个人对这场战争的理解，所以有必要先谈谈我自己。

早在1938年我就是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批评者。但我并不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敌人。我曾是个理想的和浪漫的共产主义者，将我当时认定的苏联生活中的消极现象视为是对理想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的背弃。我认为，这种背弃的错误就在于斯大林的领导集体和斯大林本人。我一直到斯大林去世都是一个积极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在过去的岁月，我得以有机会像在实验室里一样来观察和研究苏联社会方方面面的现实情况，我观察了战争的情况，而且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形式参加过战斗。我也观察了后方的情形，了解了国

---

* 本文译自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2005年第5期。

**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也曾是试图暗杀斯大林的恐怖小组成员。现将他为庆祝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而发表的《我的时代——关于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全文翻译刊载。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卫国战争的流行观点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否定“斯大林对战争准备不足”的说法，认为当时已经尽到最大努力；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当时唯一选择；认为如果不是在军队中实行了清洗，“苏军将输掉这场战争”……更重要的是，针对目前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尽量不提苏共、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贡献的问题，明确指出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取得的胜利”。季诺维也夫是当事人和见证人，他的见解应该有某些参考价值。

家在战时的状况。

然而，我对苏联社会、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的理解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着变化。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使我能用客观的学者的立场来看问题，于是我的反斯大林主义失去了理性根据。我下面想要说的，正是这种科学研究的结果。

我不止一次地在我的论著中谈到过与二战有关的题目，其中包括两本分别在 1980 年和 1983 年首次出版的名为《俄罗斯的命运》（离经叛道者的自白）和《我们青春时代的飞翔》的书。在完成上述论著之前，我形成了对 1941—1945 年战争的理解。那些观点，我一直坚持到现在，而且今后大概也不会改变。

备战

从 1933 年起，我在莫斯科居住并上中学。当时我们这些学生不断被灌输的思想就是：同西方帝国主义首先是与德国的战争即将来临。我们准备着打仗！不是准备着打侵略战，而是保卫战。虽然有的时候人们也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卫，说要打先发制人的战争，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免受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德国颠覆是我们的核心思想（那时候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被说成是法西斯）。我们战前的一代人准备的正是这场战争，而不是泛泛所指的战争。我们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继承者和保卫者成长起来的。

许多年过去了，多少事情的看法都已改变！现在我可以信心百倍地说，我这一代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任何别的一代人都不可能取得的胜利。尽管我们这一代人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尽管上年纪的几辈人在战争时期生活过也战斗过，尽管更年轻的人们成长起来并加入了战斗，但归根到底是我们这一代人决定了这场战争总体上的道德、心理和意识形态基调。套用俾斯麦的一句话，他说普法战争中的关键之仗是普鲁士的人民教师打赢的[①]；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并且现在还要重复，1941—1945 年的战争是靠 1937—1941 年间毕业的、思想上一直“准备打仗”的十年制学生打赢的。

国家长期处于备战状态。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十分清楚，战争是不可避

① 意指普鲁士的教育和培养体制比法国优越。——译者注

免的。大家都已明白谁是敌人，国家在物质方面也进行了备战。但这是在特定的历史现实中进行的，而并非是在抽象的空谈中进行的。如果注意到具体的条件，那么令人惊讶的不是做了些什么、做错了些什么，而是最终在实际上干成了什么。我相信，任何其他的领导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战略指导下都不会像斯大林做得那么多。斯大林所做的准备，就当年的条件而言已达到最好程度了。那些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们确信，好像没有斯大林并且如果采取别的战略的话就可以避免当年的恐怖和损失，他们简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不负责任的饶舌家。绍塔·鲁斯塔维利[①]是这样说这些人的："从旁观战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战略家。"

就物资、技术和纯粹的军事意义上的备战而言，国家在1941年6月之前的确没有在应有的水平上做好准备，但这不是斯大林也不是他的领导班子的过错。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仅仅取决于斯大林，西方战略家们不是傻瓜，如果他们等到苏联全副武装地准备好才打就太奇怪了。国家如果再有几年的时间（两三年，不用再多）用来准备战争的话，损失就会比实际小得多。但要完全避免重大的损失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敌人拥有巨大的实力。他们既有军事经验，又拥有高度的知识水平。德国军队的精神状态高昂，具有极明确的方向性。侵略者有时也是不赖的斗士。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观点。在战争开始阶段我在离西部边境不远的坦克团服役，坦克团的装备是БТ－5型坦克，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不足以抵御德国的坦克。而且实际上这些坦克并没有参战。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发明了T－34型坦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坦克。但是这种坦克的批量生产和装备军队最少需要一年或两年的时间。类似的情况在空军中也有。在1941年前就已经发明了天才的攻击机，而装备军队也至少需要一年。我还在空军中服过役。我开的飞机还是伊尔－15和伊尔－16，它们无力对抗德国的技术装备。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有著名的"喀秋莎"大炮了，但总共只装备了一个炮兵连。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存在类似的情形。如果将这些问题单独拿出来看，似乎可以解决得更好些，但是这样的问题多得不计其数！所有上述问题都得到解决简直是不可能的。当时西方世界（包括德国）也无人相信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

① 绍塔·鲁斯塔维利是12世纪格鲁吉亚诗人。——译者注

互不侵犯条约

人们就这个题目不知胡扯和捏造了多少东西出来！特别是针对斯大林！对任何头脑健全的人来说事情的本质都是简单和显而易见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推迟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爆发。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斯大林的战略是正确的，而且在当年是唯一正确的。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斯大林主义的揭露者和批判者通常只会拿表象当本质大做文章，而对真正本质的东西却看不到或是故意避而不谈。我承认，连我也没有马上学会分清事情的实质与表象，因为这在我当时的情况下是不那么容易做到的。过了几年以后，我首先给自己制定了这样一个方法，那就是在评价斯大林政权的时候，将自己放在斯大林的位置上自问：如果我处于他的位置该如何做？几乎每一次都不得不承认：我不能比他做得更好。

大清洗

人们就军队中的清洗问题谈了很多，现在还在谈而且还将要谈下去。对这一问题流行的看法是：清洗削弱了军队并且成为战争初期失利的一个原因。甚至那些对斯大林貌似忠诚的人也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并向斯大林的揭发者们妥协。

我根本就不接受大清洗这一被索尔仁尼琴清晰描述并从意识形态角度加以歪曲了的苏联历史概念。问题不在于大清洗是否存在，它确实有过。它当然没有达到大清洗揭露者们夸大的规模，但规模的确相当大。事情的本质在于，大清洗一般是被想象成什么样子：这些描述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所有的被清洗者都被描绘成是罪恶的斯大林及其手下人的无辜的牺牲品，似乎当时苏联没有发生任何社会斗争。而实际上这种斗争有时是相当尖锐的。我参加的恐怖主义小组，不管有多荒诞，它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如果被挖出来，我早被枪决了。难道说这也要算是斯大林的刽子手们恣意妄为的暴行吗?! 为谋杀斯大林还该给我发奖章不成吗?!（当然，如果谋杀成功了的话，早晚会有人给我授勋的。这也会成为社会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简而言之，我研究了很多年的战前情形，包括军队中的清洗情况，得出了所有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人们都认为是歪理邪说的结论：如果战前军队中没有进行清洗运动，我们就输掉这场战争了。别说一个弗拉

索夫[1]，几十个弗拉索夫也会出现，而且可能个个比他危害更大。

战争的开始

许多人讲过而且还在讲战争的突发性。说什么斯大林错过战机了！事实上这是不对的，必须分清战争的突发性和它具体爆发时间的突然性。此外，还有我上文所说的为拖延战争爆发所做的努力。

下面讲讲凭我自己的经验了解到的事实。我 1940 年参军到了远东。年底，许多部队开始向西调遣。我们的团也在其中。当时上级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要我们准备和德国人作战。什么时候？就是明年，天气暖和一些的时候，可能就要打仗。顺便提一下，我发现，早在 1940 年，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家领导就下达了从东向西调遣军队的命令，也就是说，当时领导人曾经认识到可能会同日本作战，后来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要不然斯大林不会走削弱远东军队的这一步。

当载着远东军的军列向西慢慢前行的时候，可以推断的是，西方媒体出现了有关的报道，因为塔斯社反驳了西方关于苏军调动的报道，说这都是些“谣言和诽谤”。

到了西部边境，我们已经毫不怀疑战争必定要爆发了。我们当然还没有想象到它将会是怎样的悲剧，我们甚至为它的到来感到高兴。上级教导我们说，战争从一开始就是要取胜的，而且将在敌人的土地上进行。我曾对此产生过疑问。我曾有机会在秘密部门工作（我会画图纸而且会德语），我知道将是多么强大的德国人与我们对抗，而我们只集中了一些骑兵团和几支装备着老式坦克和装甲车的坦克装甲部队。但是这种疑问并没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1941 年年中，朱可夫大将视察了我们部队。当时我在营房值班。我们的营房好极了，以至于朱可夫大呼：“战争迫在眉睫，可他们把这儿布置得跟疗养地一样。”第二天部队给我们发了“死亡相框”——一个塑料袋，里面塞进记录着我们个人资料（包括血型）的证件。很快（好像是 6 月 19 日）我们就离开了营房，全副武装地开着坦克和装甲车奔赴战斗阵地，准备好参加战斗。夜晚是在野外度过的，我们一直等候着进攻的命令。而早晨又回到营房，把炮弹交回仓库，把车辆放回车库，甚至把武器

① 弗拉索夫是苏联卫国战争中一个叛变的将军。——译者注

和机枪进行了防腐处理（抹上厚厚的一层润滑油）。傍晚时指挥部的人都离开部队去参加指挥训练了。

如何评价战争初期部队的这种情形呢？如果把它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单独拿出来，那么对部队的准备情况可以这样评价：有点盲动，准备不力。但是如果注意到高层领导完全合理的无论如何也要拖延战争的意向，那么这将被看作是许多悲剧事件中的一件，只有在纯粹的想象中才能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

战争初期苏军的失败

这些失败是众所周知的，对此不计其数的文献描述过。对这些失败的评价都有很大的局限，但是我要使自己超越这些局限。

首先，我认为这些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失败可能会小一些，但不会很小。必须要注意到德国的总体备战情况，它的军队的经验，强烈地企图征服和占领我国领土的现实。

苏联在当年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但它无法不以付出巨大损失的代价来阻止这样强大敌人的进攻。而且正如后来战争进行的情况表明，无法想象战争初期不付出巨大牺牲就能扼制住德国军队。况且，德国人不会像斯大林战略的批判者们想的那样，恰好在苏联做好准备的时刻发动战争。

其次，双方在战争初期打了些战役，而且是相当激烈的战役。我在 1978 年被迫移民德国后遇到过曾与我在同一战场（在奥尔什附近）作战的希特勒军队的一名军官。他早在 1941 年 6 月底，在一次与一支退却的苏军部队作战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将输掉这场战争。

再次，失败教会了苏联领导人、指挥员以及广大苏联人民很多东西，使国家、军队各个阶层的组织状况发生了深刻转变。凭借这种转变，终于挡住了德国人的进攻，使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我们在这一阶段主要的胜利是德国闪电战思想的失败。闪电战中断了。这使德国人对战争的顺利进行产生了疑问，许多德国人甚至坚信将输掉这场战争。我们迫使德国人打持久战，这一点他们想都没想过，而且他们也不会打持久战（至少比我们差）。又有谁考虑过战争中这一因素的重要程度呢?!

最后，正是战前几年和战争开始后的进程让地球上的亿万人民（特别是西方人）对我们国家产生了好感。这些好感在战争进程中起到了如

此重要的作用，以致后来绰绰有余地补偿了我们战争开始时的失利。常言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战争的进程

战争几乎持续了四年。对于和平时期的生活来说这是极短的，而就于这样一场把全国各个重要领域的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全面战争而言，这个时期是漫长的；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这段时间则是无限漫长的。

虽然关于这场战争，人们写过太多的东西，但是我却没有见到真正的科学研究。出现过许多堆砌了各式各样事实信息和不负责任的空话的洋洋万言的大部头，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大量涌现。但是浏览这些书的时候，我甚至在最不错的书中都找不到对那场战争的现实描写，而这场战争是我和周围所有人生命的组成部分。

在战争年代和战争结束初期，我写了相当多战争题材的诗和散文，但要把它们刊登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当我的创作成果不知怎么流散出去的时候，要想标明自己的作者身份都是危险的。例如，我就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胜利的宴会上的祝酒词写的诗《祝酒词》，就是我在宴会后写的即兴诗（它只是 1978 年才在西方刊登在《光明的未来》一书中）。幸亏我的朋友用书写体记了下来。其他的军官也读到了这首诗。自然，有人把它送交了“机关”——在当时这是很平常的事。“机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试图找到作者。如果找到了，我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不计其数的书对当年的大清洗运动都有相当多的详细描写。我不否认确实有过大清洗，但是我认为，这些描写完全是片面、有偏见和带有很大夸张成分的。必须指出的是，战争年代在相当广泛的苏联人中，特别是在军队服过役的人们中（当时军队里有 1000 万人）产生了一种战后成为反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思想倾向，而在当时这种思想倾向被认为是敌对的。

我那个时候就自己对战争的观察和感受而创作的有关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仅从当年写的一首诗中摘录一段为例：

我知道，战争不是嘉年华，
而是饥饿、寒冷甚至是折磨。

但行军中总会有休息，
而且战争中会不会有奇遇？
会有的。如果肚子填得饱饱的。
你会高枕无忧地大玩战略游戏。
靠着无数的死伤，
搂一把勋章和荣誉。
如果后方的庄稼地沉寂。
如果野狗跑进新建的指挥部里。
对于其他上百万的人，
战争就是让人头晕的孤寂。
对于年轻后生就是进攻，突击。
对于报纸和荧幕才有意义。
战争是对结束的期冀。
心灵的伤口还没有痊愈，
对它本质的谈论平淡无奇。
死掉的人默默无语。
活着的滑头货承受功勋业绩。
偶尔幸免于难的人们会抱怨几句，
但他们早已不愿被人记起。
长官们将军事科学胡编一气，
对过去的罪过没有些许悔意。
作家们也胡诌些战地浪漫曲，
反反复复又无聊又没趣。

但是，我上面说的，只是当年生活的一小部分。这丝毫不能降低这场战争的宏伟规模和它的社会意义。我集中精力于我认为最主要的事情，尽量从科学的高度去理解苏联社会，而战争使人几乎能够在实验室般清洁的状态下来观察社会。尽管我对苏联持批评态度，尽管我坚持反斯大林主义，但在当时（20 世纪 40 年代），我就得出了以下结论。

对战争的评价

1941—1945 年的卫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当然，从社

会性质上讲，二战包含的并非是同一类型的战争，它包括了两种类型的战争：一是西方以及日本等同一社会类型国家之间为重新划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即列宁思想中的帝国主义战争；二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战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希特勒德国反对苏联的战争从其社会本质来说反映了西方国家毁灭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企图。西方并不认为发动这场战争有罪。苏联没来得及准备好这场战争，正是西方发起战争的原因。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美国和法国）想借德国之手毁灭苏联，同时在战争中消耗德国。这样看来，这场战争不是列宁思想中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部分。苏联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这场社会战争显示出共产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方面，显示出它战胜时代及全球规模的困难和灾难的能力。胜利的结果是共产主义开始在全球传播开来，苏联开始成为世界强国，能够为指引人类进步而同西方世界作斗争。

仅举一个事实为例。德国及其西方世界的敌国，从战争开始直到战争结束，军事技术的进步不是很明显。原子弹不必算在内，为摧毁日本丝毫没有必要用到原子弹。而苏联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都极其困难的战争年代，在完善作战部队的武器和供给方面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被窃取了的胜利

1941—1945 年对德战争的胜利日被正式宣布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家节日。看上去，这好像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如何解释这场胜利而且如何具体实现对胜利的承认与庆祝呢？这场战争和我们的胜利中最主要的东西被阉割掉了，而这最主要的东西便是社会的实质和能表现其特征的具体历史事实。官方在新闻媒体中老讲什么抽象的俄罗斯而不是苏维埃的俄罗斯，也不讲苏联。即便提及苏联，也是一些无足轻重或者反面的话。有一个人，如果没有他，这场历史上最伟大战争的胜利难以想象，这就是斯大林——他或者完全不被提及，或者即使被谈及，也好像胜利恰恰是违反了他的意志才取得的，而他似乎只是妨碍了胜利、犯了许多错误并犯下了罪行。

有人说是什么抽象的人民取得的胜利。是的，战争是人民进行的并取

得了胜利。但是，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民而是苏维埃人民。我强调一下：苏维埃！而苏维埃人民——这是 1917 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是社会进步的新道路开辟者的人民，是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影响了全世界历史进程的人民，是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培养的人民，是共产党和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层领导下的人民。这是历史的事实，忽略了这个事实就意味着蓄意篡改历史。

无可争议的是，胜利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综合的历史因素，其中包括俄罗斯忍受最困难生活条件的能力、爱国主义、西方国家的援助等。但是胜利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以斯大林为统帅的国家领导，包括军事领导。不论他们实际上有怎样的缺点，也不论反共产主义者和反苏维埃者如何给他们编造缺点，战争首先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取得的胜利。在战争年代以及战后年代这个历史事实甚至对最不共戴天的反共分子和反苏分子来说都是毫无争议的。这正是历史事实——正像输掉战争的首先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国家民族主义者那个历史事实一样。忽略这个事实并歪曲它，意味着毫无廉耻的意识形态宣传的谎言，意味着愚弄广大俄罗斯民众以迎合那样一群实现了反共剧变并靠其发财的俄罗斯人和西方势力，而正是西方在我们取得胜利后立即开始了反对我国的名为“冷战”的新阶段战争。

而西方把我们在反希特勒德国的胜利中起到的作用说成是次要的，几乎把胜利的功劳（至少是主要功劳）完全据为己有。当然，西方国家为战胜德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帮助我们国家顶住并摧毁了侵略者，但是要知道它们付出这些并非出于对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热爱。它们从我们还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反对它。它们付出巨大的努力，要把希特勒的扩张引向苏联。后来由于西方世界本身的内部冲突等历史条件的变化，促使它们成为苏联的盟友。它们之所以开辟反对德国的第二战场，是因为苏联军队开始取得胜利，没有给西方留下半点苏联战败的希望；是因为害怕没有西方同盟国的参与，苏联军队也能彻底击溃希特勒德国并占领整个西欧。同盟国开辟了第二战场，想让自己摆脱对共产主义会在全欧洲取得胜利的恐惧。必须承认，这种恐惧对促使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的胜利被一些人从真正承担了所有战争重荷的人们、遭受了最巨大损失的人们、显示了最大耐心和勇气的人们、为胜利事业付出最高和最灵活智慧的人们那里

窃取了。

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观点，1941—1945 年的对德战争是解放战争和卫国战争，俄罗斯人是为祖国而战。我同意。但是为什么样的祖国而战，这是问题所在。在战争年代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对此有任何疑问（极少数情况除外）：绝大多数苏联人是为苏维埃（强调是苏维埃!）祖国而战。在战争来临前夕，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于大多数苏联公民来说已经成为习惯的生活方式，要让人民大众脱离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简直是不可能的。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人们所做的保卫自己和自己国家的事情就是保卫新的社会制度。俄罗斯和共产主义并非并列存在的，而是统一在一起的。绝大多数积极的公民首先将自己视为苏维埃人。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破灭对他们来说等同于俄罗斯本身的灭亡。在战争过程中这种感觉实际上是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得到了加强，甚至那些知道苏维埃社会制度不足之处并对其持批评态度的人们也是这样评价它的。他们明白，侵略者威胁着他们的生存。所以“爱国主义”在这儿并不完全符合苏联人实际的思想趋向。

1945 年斯大林（正是斯大林）的苏联反希特勒（正是希特勒）德国的胜利意味着人类社会进步的共产主义路线反对资本主义（西方）路线的胜利，它标志着第一阶段西方世界（西方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划时代的社会战争的结束。此后立即开始了名为“冷战”的第二阶段的战争。它以 20 世纪末苏联向西方的投降而告终。在决定这种失败的总体因素中，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毁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方为自己在 1945 年的失败捞回了老本。“冷战”的胜利者们展开了对苏维埃历史的全面篡改运动，同时从 1941—1945 年卫国战争的胜利者们手中窃取了“热战”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结论

战争开始的时候，在我正常生活突然中断了的那一刻，我写了一首诗，里面有这样的诗句：

就让战斗永不停息!
就由着罪恶横行肆意!
反正我还将属于你，

那个生我的时代，
那个生我的世纪。

我感谢命运，是她让我在那个苏联时代出生并度过了大半生的时光——最阴郁的和最光明的、最残酷的和最豁达的、最卑微的和最高尚的时光。让我最难以忍受的心痛是我成为苏联灭亡的悲剧的见证者。

斯大林在1942年是否想与德国媾和问题
——基于俄罗斯历史文献的探讨

李晓华

李晓华：外交学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曾想与德国媾和的说法并不鲜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卡尔波夫的于2002年出版的《大元帅》（中文译名《斯大林大元帅》）一书。在书中作者提到，他在1999年撰写该书时曾看到一些文件，证明斯大林在1942年曾谋求同德国的媾和。卡尔波夫的观点似乎证据确凿，但俄罗斯国内学者却认为这些说法及所提供的档案纯属伪造。

问题的源起——斯大林在1942年曾想与德国媾和

根据卡尔波夫的说法，斯大林曾下令情报部门设法与德国统帅部取得联系，并以他的名义提出和谈建议，甚至想更进一步（走得很远的计划）——提出根本扭转战争的格局。卡尔波夫认为，当时存在着进行这些秘密谈判的现实可能性，因为早在1938年就签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盖世太保之间合作的协议。情报人员和德国“同事”接上了头，1942年2月20日双方在姆岑斯克进行了会晤。此前，斯大林亲自签署了《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该建议一式两份，一份留在斯大林那里，另一份给了进行谈判的人。这份文件看来并没打算交给德国人，这只是个大纲，列出了苏联代表作为依据的问

题。但是双方看来此前曾进行过会谈，因为斯大林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像是对双方已经涉及的问题所作的反应。书中列出了《建议》的正文：

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

1. 从 1942 年 5 月 5 日 6 时起，战场全线停止军事行动。宣布休战到 1942 年 8 月 1 日 18 时止。

2. 从 1942 年 8 月 1 日到 12 月 22 日，德国军队应该撤至图 1 标出的地区。建议按照图 1 标出的延伸线确定德国和苏联的边界。

3. 在双方部队变更驻地后，苏联武装力量准备在 1943 年底之前和德国武装力量一起对英国和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4. 苏联愿意研究宣布两国和平、指责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各国犹太人挑起战火、在 1943—1944 年间实施进攻性联合战斗行动、重新安排世界空间（图 2）的条件。

注：德军如果拒绝履行上述第 1、2 条的要求，将被歼灭，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将从政治地图上消失。

要提醒德国统帅部应承担的责任。

苏联最高统帅（约·斯大林）

1942 年 2 月 19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卡尔波夫认为，斯大林的签名证明这些“建议”是他起草的，这些不是打印在国家机关或党机关公文用纸上，而是打印在一张普通纸上的“斯大林式”的简短语句，既没有指明官方文书中不可缺少的执行人，也没有注明共复印几份，表明这只是个大纲。他还提醒大家注意斯大林提出建议的日期，这正是苏军进行总攻的时候。认为这是斯大林以实力为依托在同希特勒统帅部对话，还威胁一旦他们不同意将彻底歼灭他们。

谈判持续了一个星期，德军方面的代表是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最后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给斯大林呈报了如下报告。

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第 1/2428 号　　1942 年 2 月 27 日

给斯大林同志的报告

1942 年 2 月 20—27 日在姆岑斯克与德国统帅部的代表、党卫队

帝国长官私人参谋总部部长、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谈判的过程中，德国统帅部认为无法满足我方的要求。

他们向我方提议，以1942年底前现在战线为边界，停止战斗行动。

苏联政府应该立即消灭犹太人。为此，首先应该把所有犹太人迁移到远北地区，加以隔离，然后完全予以消灭。同时，当局要负责外围的治安工作和劳改营范围内严格的警卫制度。消灭（销毁）和利用犹太居民尸体的问题由犹太人自己负责。

德国统帅部不排除同我们建立反英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沃尔夫同柏林商量后声明，如果苏联领导人接受德方的要求，德国可能在重新安排世界的过程中，把其在东方的边界作有利于苏联的收缩。

德国统帅部为了表示这些变化，愿意把国旗上卐字表示的颜色从黑色改为红色。

在讨论图2时出现了以下的立场分歧：

①拉丁美洲。应该属于德国。

②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态度复杂。德国统帅部认为，中国应该被日本帝国占领，成为其保护国。

③阿拉伯世界应该成为德国在北非的保护国。

因此，应指出会谈出现了全面的观点和立场分歧。德国统帅部代表沃尔夫完全否认德国武装力量在战争中将被歼灭和打败的可能性。他认为，同俄罗斯的战争很可能会持续几年。会以德国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他们认为，主要依据是，俄罗斯两三年后，由于在战争中耗尽了人力和物力，不得不回到和平谈判上来，但是谈判条件将会更苛刻。

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梅尔库洛夫

为了证明进行秘密谈判的基础，卡尔波夫还在《大元帅》一书中提供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盖世太保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如下：

总协议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

党安全总局（盖世太保）之间的合作、互助和共同行动。

（接下来是《总协议》的九页文本，我跳过几页，只引用最后一页。——本文作者注）

协议文本用俄文和德文各印一份，每一份都有同样效力，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盖世太保的代表签名盖章证明无误。协议的俄文文本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保存，德文文本由盖世太保保存。

1938 年 11 月 11 日 15 时 40 分于莫斯科

双方签名：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一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

拉·贝利亚

党卫军旅队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第四局（盖世太保）局长

赫·米勒[①]

卡尔波夫在该书中所提供的文件复印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相信书中所披露的这些材料，那么斯大林就是在准备与德国乞和，同意割让给德国大片苏联土地。事实的确如此吗？俄罗斯学者们为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斯大林的《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是无知的造假

在《反对俄罗斯的挑衅》一书中，将军丘尔沃夫对斯大林在战争初期意欲与德国媾和的谎言进行了驳斥。文中指出，斯大林的《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一文是无知的造假，并大致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

一、文件中斯大林的职务指称得并不正确（应该是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二、当时姆岑斯克附近正在打战，正处在战争前沿的姆岑斯克不适合此规模的谈判。

①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著：《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5—398 页。

三、《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涉及的内容特别重要，在特定条件下为了进行谈判而把《建议》写出来已是情非得已，因此很难想象，斯大林竟在这样的文件中签名并标注日期。

四、将军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指出文献最主要的漏洞出现在进行谈判的时间上，“它不仅是伟大卫国战争的转折点，也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拐点，苏联和经军的国际威望获得很大提升，而对方呢？德国正在‘舔舐’自己失败的伤口”。第一，当时的伟大卫国战争的战略主动权已经发生转移，“伟大的莫斯科战役已经结束，德国军遭受重创，已经撤离，战略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中，闪电战失败。上校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1945年5月15日纽伦堡审判中曾承认，‘从1941—1942年冬季，希特勒就明白灾难降临了，更不要说取得什么胜利了’”。第二，整个国际形势开始有利于苏方。“整个世界为红军所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被奴役的欧洲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反法西斯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在苏联政府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压力下，美国和英国政府被迫答应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线（但是不久就遭到否决）。但苏联、美国和英国的战时同盟在法律层面已经结成，斯大林和丘吉尔在1941年夏天就不与德国单方面谈判进行协商，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两国在7月12日签订的协议上明确写道：“两国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除非双方都同意，否则既不进行谈判，也不签订《停战协定》及《和约》。”[①] 第三，莫斯科密切关注着德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首先，莫斯科注意到当时德国军队的人员频繁变动。1941年12月，希特勒解除了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元帅的职务，自己亲自担任；中央集团军司令冯博克元帅退休；在整个12月至次年2月间，更换了4位第四集团军司令（克鲁格、施图姆、库伯勒、海因里希）。莫斯科也曾得到消息，说在柏林和德军将领中到处弥漫着战败的情绪。1941年11月29日弗里茨·冯·托德请求希特勒：“我的长官，必须马上停止战争，因为不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我们已经输了。”元帅冯·龙德施泰特（南方集团军区司令）建议希特勒退守到德波边界，通过政治手段结束与苏联的战争。上将赫尔曼·霍特认为，进攻俄罗斯是政治失误，因此所有的军事努力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此作者指出，斯大林在取得莫斯科战役胜利的条件下，违背不与希特勒单独媾和的承诺，寻求与德国

① Н. Ф. Червов Провокация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Прайм-Еврознак. 2003. с. 188 – 189.

和解，以共同发动对美国和英国战争的说法是荒诞的。①

五、从军事战略的层面来考虑也不存在媾和的可能。当时斯大林已经得到情报，敌军的军事力量将主要集中在德苏前线的南部地区，莫斯科所面临的军事威胁已经减小，因此促使斯大林与希特勒单独进行谈判军事考量并不存在。②

历史学家马尔季罗山在《斯大林与伟大的卫国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 年 2 月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的通信，证明当时苏联和西方盟友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他认为，主要三个国家领导（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间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斯大林没有必要给德国统帅部提建议，尤其是和德国武装力量一起对英国和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对抗世界犹太人。③

马尔季罗山还对《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进行了细致全面的分析，他认为该文从文本的格式、撰文内容及签名都存在着诸多疑点。

一、在签名方面。（1）它不符合斯大林的签名习惯，作者分别例证了斯大林 20 年代末期、1949 年、1934—1935 年、1941—1944 年亲笔签名，指出“斯大林在决议文本中总会签上‘同意（或者确认），约瑟夫·斯大林（或简写）’的字样，或者简简单地签上‘约瑟夫·斯大林’，这些签名经常出现在左上角，略微遮住文本的第一段（有时是二段），而该文本中并非如此”。（2）它并不是斯大林的亲笔签名。在《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上斯大林的签名好似是盖的小型印章，而不是斯大林的亲自签名——斯大林的笔触奔放。而且，作者还指出，这种以斯大林真迹为模板的印章的确存在，1951 年 2 月 16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曾做出制作这样一种印章的决定，为的是在斯大林缺席政治局会议时，把它加盖在政治局会议纪要上。这个橡皮图章是斯大林笔迹的缩小版，这是由政治局会议纪要和政治局问询记录的格式决定的。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及橡皮印章曾出现在 2003 年举办的展览《1953 年——承前启后》上。④

二、作者随后对正文内容进行了分析，指出该正文存在着许多漏洞。（1）首先，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写法不对。在斯大林的《给德国统帅部的

① Н. Ф. Червов Провокация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Прайм-Еврознак. 2003. с. 189 – 190.

② Тамже. , с. 191.

③ А. Б. Мартиросян Сталин и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ече. 2007. с. 403.

④ А. Б. Мартиросян Трагетия 1941г. 2008.

几条建议》一文中，并没有明确具体收件人，而是德国统帅部，但发信人则写得十分明白，尽管不太确切，这是不可能的。在该文件中所涉及的问题属于国家元首的职责范围之内，在战争条件下，也属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只有国家的最高统帅才能处理国家层面的世界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收信人应该这样写："纳粹帝国总理、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德意志国家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发信人应该是苏联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①]

（2）在《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第一条中提出停战提议、宣布休战和开始撤军的时间不符合逻辑。"建议从5月5日至8月1日宣布休战，而在8月1日到12月22日，即结束休战时间开始撤军？难道是建议侵略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安静地进行日光浴，在俄罗斯的河里游泳，掠夺被占领的土地，把居民的一切都骗光，消灭不同意见者？除了这样，还会发生什么？在希特勒在发动侵略之初就很清楚，要消灭所有的'非人类'，也就是斯拉夫人、犹太人等。"斯大林提出停战提议之后65天才开始实施停战的建议也不符合历史惯例。"斯大林比总参科学院任何一个教授都懂得历史，包括战争史。战争史无一例外地证明，如果交战双方中一方想要宣布停战，那也不会是在提出建议65天后才发布！直接交战的双方在65天内可以发生一些任何狡猾外交都不能弥补的事情。""历史无一例外证明，停战建议意味着从提出建议第二天，通常是第三天宣布。在二战中，即使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暂时休战（确切地说是停火）下最后通牒的时间最多是一昼夜。除此之外，《建议》第一条中时间的表示方法也不符合俄语惯例。[②]

（3）在《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的第二条也存在着严重问题。首先，它不符合斯大林在战争中一贯遵循的主要目标——全面、无条件地恢复苏联的独立、主权和1941年6月22日早上4点之前的领土完整。因此，该条不符合历史现实。其次，仅从俄语及政治文献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以下失误："世界上边界的确立是根据界线（по линии），而不是面积（по протяженности），斯大林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想出这样的词语：'建议（用这个词的原因可能是文献本身的名称是《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

① А. Б. Мартиросян Сталин и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ече. 2007. с. 406.

② Тамже. , с. 406 – 408.

议》）按照图 1 标出的面积来确定德国和苏联的边界。如果斯大林的确需要，那么这一条至少应该是：2. 应该沿……一线建立苏德边界，随后指出相关的居民点及其通过的河流。但可确切地肯定，实际上如果有某种需要，这一款应该写为：从 1942 年某月某日起沿……一线确立苏德边界，然后指出相关的居民点及其通过的河流。……随后应该写道：关于确立边界的相关协议签署和批准之后，德军应该撤离至指定的苏德边界。撤离至指定边界的行动应该从 1942 年 8 月 1 日零时零分至 1942 年 12 月 22 日零时零分在苏德共同委员会监督下进行。作者认为，只有这样写才符合政治文书的基本规范。其次，作者还指出在第二条中德军撤军和两国边界确立的先后顺序也不对。“因为首先应该有《边界协议》的签订和批准，然后才会有撤军，不是撤至边界（на рубежи）（因为这是个军事术语），而应该是边界线［на（за）линию границы］。最后，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第二条也不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人类历史上国家间边界的确立不是仅仅建立在停战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先签订《和平条约》或者至少是《和平协定》，这是建立国家间边界的基础。①

（4）作者认为斯大林不反对德国人民，因此他不会写下：“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将从政治地图上消失！”因为“斯大林在战争期间说过，‘希特勒们来了，滚开！而德国人民——留下。’如果有了德国人民那就会有德国。如果斯大林想要恐吓希特勒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摧毁纳粹制度，而不是国家。”②

三、《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签订时间的写法也不正确。“在苏联从来没有人写过：‘莫斯科；克里姆林 1942 年 2 月 19 日’。而应该是‘莫斯科，克里姆林，1942 年 2 月 19 日’。莫斯科后面应该是逗号，而不是分号，克里姆林后面也应该有逗号。克里姆林宫一直沿袭着这样一种书写方式。”③

四、《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一文不符合世界单独谈判常规和斯大林对该类事情的做法。“进行单独谈判的世界实践证明，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双方都不会使用自己领导的书面指示。也就是说它们能够以某种形式

① А. Б. Мартиросян Сталин и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ече. 2007. с. 408 – 410.

② Тамже. , с. 410.

③ Тамже. , с. 410 – 411.

存在，但从来不会带去谈判，更不会在谈判过程中展示出来。情报人员更不会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记在脑海里，进行口头谈论。”随后马尔季罗山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斯大林在类似情况下所持的态度：1940年11月，在派莫洛托夫去柏林和德国元首会谈时，斯大林就做了口头指示！作者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即使是对自己最亲近的战友——莫洛托夫，而且在和平的条件下，斯大林也不会交出任何书面的东西。斯大林在处理类似事情时是极其谨慎的。①

作者随后又对梅尔库洛夫的报告进行了分析，指出不管是从文本格式、具体内容，还是梅尔库洛夫的签名都存在有不少漏洞。第一，文章所反映的事情不属于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的权限，它只归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一级管。而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在任何情况下从来没有与希特勒进行秘密谈判，包括单独谈判，他切实履行对反希特勒盟友的应尽的义务，坚决不与希特勒单独媾和。②

第二，该报告的书写格式不规范，不符合战争年代情报机关与斯大林秘密通信的书写格式。“从1941年6月30日到1945年5月9日，苏联情报部门（包括内务部在内）给斯大林的情报都严格遵守以下秘密通信的格式：在文件的右上角有‘绝密’的字样，然后是份数，发给斯大林的情报自然是第一份。收信人应该是国家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如果文件不是贝利亚签署）。在不同阶段，特别是1941—1942年收信人的写法不太一样，但收信人不可能只是报告一文中的斯大林同志。”③

第三，报告的抬头及下面“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的签名也有漏洞，在战争年代苏联内务部写给斯大林的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文件。1943年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开之前，内务部情报局局长是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菲京作为情报局领导签署了大量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给国家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的情报。因此该文档的收信人应该是苏联国家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下面的签发人应该是内务部情报局局长是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

① А. Б. Мартиросян Сталин и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ече. 2007. с. 410 – 411.

② Тамже. , с. 412 – 413.

③ Тамже. , с. 414.

而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只能是收信人，补加收信人梅尔库洛夫的名字是要附带通知一下身为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如果信息特别重要，那么签发人只能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而不可能有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的签名。

除了具体日期和编号外，发信人的所有信息应该打印在页面左上角。苏联情报机关向上级报送情报的格式只有一种：在干净的 A4 白纸上写上所有属性特征、收信人、内容和国家安全（侦察）机关领导签名以及带有编号的日期（一般出现在文件最后一页的左下角），在战争年代收信人则是国家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①

第四，该报告中的登记号 1942 年 2 月 27 日№1/2428 也有破绽。情报机关发给国家领导的信息情报是单独分开的，因此编号就是情报的序列号。这个编号意味着仅仅一个内务部的情报机关在 1942 年 1 月 1 日至 1942 年 2 月 27 日期间的 58 天内（世界各地的任何书面登记的起止时间都是从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发给斯大林的情报就有 2428 条，每天平均 42 条。作者分析道：在这 58 个昼夜的一两天或者最多 5 天内，侦察机关确实可以每天发送 42 个情报，但不仅是发给斯大林，还包括所有对情报感兴趣的收件人。但在连续 58 天几乎平均每小时发两个情报的工作强度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战争年代。因为情报机关可以在一昼夜收到大量的情报，但并不是所有的情报都符合上报给国家领导的要求，上报领导的情报只占 10%，最多是 20%。而根据文件的内容判断，这个文件应该是绝密文件，当时类似的文件是要单独登记的，因此序列号应该更小才对。②

第五，该文件上梅尔库洛夫的签名与斯大林的签名一样与现实文件中的签名有天壤之别，作者为此列举了两份由梅尔库洛夫亲笔签名的文件。

对《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的现实基础——《总协议》的批判

卡尔波夫认为在姆岑斯克进行秘密谈判具有现实可能性，因为 1938

① А. Б. Мартиросян Сталин и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ече. 2007. с. 415 – 417.

② Тамже. , с. 414 – 415.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盖世太保之间曾签订过合作协议。马尔季罗山对《总协议》进行了文本分析，指出它也是杜撰。第一，该条约的名称既不符合现代俄语惯例，也不符合国际文件规范。作者指出，该谎言首次出现在报纸《记忆》（1999第1（26）期）上面，在罗马佩兰于2001年出版的《恶魔断头台》一书中也引用过。但这两处出现的文件与卡尔波夫所提供文件的开端有所不同。马尔季罗山对比了这两版文件，认为该国际条约的名称不符合国际文件规范，它至少应该是：《合作、互助和共同行动的总协议》（Генераль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и совмес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而不应该写成《合作、互助、共同行动总协议》（Генераль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 совмес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作者还认为，通过逗号列举出三个同义词是毫无意义的。“合作”与“互助”涵盖了“共动行动”的意义，因此，按照现代俄语规范，它应该写作：《合作与互助总协议》或者是《互助和共同行动总协议》。

第二，在前两处出现的文件中曾指出，《总协议》由9个段落、两个议定书组成，而在卡尔波夫所提供的文献中则指出协议由9页组成。马尔季罗山指出，在指明文档结构时不该写由几个段落组成，而是由多少条款组成。作者认为，当时不会犯这种形式上的错误。因为：一、尽管斯大林和贝利亚是格鲁吉亚人，但他们熟知俄语；二、在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有包括国际法领域在内的业务熟练专家，不至于犯如此低下的错误。更何况，在战前内务部以及更早以前的联盟政治保卫总局曾在相关条约基础上与蒙古、土耳其及捷克斯洛伐克侦察部门展开过国际合作，他们了解如何书写文本。①

第三，苏德双方代表职务存在错误。文件中贝利亚职务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但当时他的职务是自1938年8月22日起被任命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第一副委员一职，而1938年11月29日起，他才兼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一职在签订条约时，则应该采用签署人的最高职务。缪勒的职务也不正确。截至1938年11月11日，缪勒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第四局（盖世太保）的局长。在文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被称作盖世太保，而在条

① А. Б. Мартиросян Сталин и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ече. 2007. с. 106 – 107.

约的序言中则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第四局称作盖世太保。作者认为，出现该错误的原因则是不了解情况：盖世太保在 1939 年 9 月之后才成为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局，1938 年 11 月 11 日海因里希·缪勒不可能以第四局局长的身份，更不能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身份签署《总协议》，他当时只是安全警察总局的一个部门头目，也不可能是德方签署者，因为当时他当时的职位是党卫队旗队领袖，相当于国防军上校。

第四，在第一版本的《总协议》序言中存在漏洞。“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文中简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代表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一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劳伦斯·贝利亚”的俄文书写不对，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词中，除苏联之外，只有第一个单词“人民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其余的单词都应该小写；能够代表内务部人民委员部的应该是内务部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委员，而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劳伦斯·贝利亚”名字的写法不符合国际官方文件的规范；随后德方的信息也存在严重错误。首先，根据希特勒 1938 年 11 月 1 日所颁布的命令，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应该是第三帝国的国家安全机构，1938 年 11 月 3 日缪勒不会收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的委托，也不可能在 1938 年 11 月 11 日代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其次，事实上，自 1936 年 6 月 26 日起该系统称作安全警察总局，下辖秘密警察局和刑事警察局。因此，《总协议》中也不可能出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第四局（盖世太保）的字样。①

第五，两人的笔迹不对。作者提供了贝利亚在 30 年代末，即 1937—1944 年的亲笔签名，指出该签名模仿的至少是 1944 年贝利亚的签名。作者详细分析了缪勒的签名，总结出了 6 个方面的失误，认为该名字是讲俄语人的“杰作”。②

第六，该文本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格式。其中：（1）根据国际谈判中的规则，应该指出一共有几份和几种语言组成（而不是打印）；（2）双方的签名应该左右并列，而不是有先后顺序；（3）签名中应该指出所代

① А. Б. Мартиросян Сталин и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ече. 2007. с. 107 – 109.

② Тамже. , с. 116 – 117.

表的机构；（4）签名中必须指出委托方；（5）协议中没有指出编码页、装订页及文本加盖印章。

第七，签署协约的时间、地点的写法也不符合苏联惯例。[①]

第八，作者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造假者所提供的档案盒封面字样似乎是想让人们相信文本是从1938年开始存放的，但事实上，封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再次证明文本是伪造。例如：上面盖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但共产党在1952年之后才叫苏联共产党，在之前叫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除了考虑到法律记录的精确性及文本处理的特殊性之外，马尔季罗山还注意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该条约的签署时间不符合逻辑。他首先指出，1938年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好。1938年6月24日，苏德于1926年4月24日签署的《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已经失效。在签订总协议的前42天，希特勒与西方国家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对此苏联曾坚决反对。在1938年苏联关闭了所有的德国领事馆，只保留了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领事司，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未必使两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合作。

第二，不符合情报机关国际合作的一般准则。在情报机关的国际合作中一贯遵循的原则是要以国家间《条约》，至少是《伙伴条约》或者是《合作与互助条约》的签署为前提，在战争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和军事侦察机关都是如此。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缪勒在1938年11月11日不可能出现在莫斯科签署《总协议》，因为11月9日夜到11月10日凌晨全德国正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后来称作“水晶之夜”，而缪勒正是该行动的直接领导人，11月10日到11日他正在清点“行动”的“胜利成果”。[②]

这些文件来自哪里？

卡尔波夫提供的材料引来了广泛争议，《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

① А. Б. Мартиросян Сталин и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ече. 2007. с. 117 – 121.

② Тамже. , с. 126 – 127 .

报》为此也展开了调查。2007 年 5 月 9 日，《消息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①]，记述了就该问题对相关权威人士的采访，著名的历史学家、国际记者列夫·布热明斯基在接受记者斯大尼斯拉夫谢尔盖采访时说："我认识沃尔夫将军，战后数次见过他，并看过他的回忆录，他从来没有提过、暗示过姆岑斯克的事件，而他对我完全是开诚布公的。这是设计得并不巧妙的谎言。"布热明斯基还谈道，"《大元帅》再版后，我曾询问卡尔波夫相关材料的来源，但回答有点令人费解：在某个地方他的侦察员高官朋友曾让他看过这些'文件'。它们在自然界的确是不存在！但并不能从书面上来证明这些，就让它们为历史而留存吧，而不是为斯大林，也不是为梅尔库洛夫"。

在 2007 年 6 月 21—22 日出版的《共青团真理报》上，维克多巴拉涅斯发表了题为《斯大林曾建议希特勒结盟吗?》[②] 的文章，记者首先采访了卡尔波夫，询问他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情况下看到有关姆岑斯克的谈判文件的。卡尔波夫回答道："这还是在苏联时期，我当时正在准备撰写《大元帅》的第一版，那时我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可以接触到秘密文件。我要求参观一下斯大林的办公室，并看一下保存在那里的档案。在翻档案时，我看到了保存在那里的文件清单，发现了有关姆岑斯克的材料。"而当他被问及现在这些文献原件保存在哪里时，卡尔波夫回答道："据我所知，斯大林的档案在 90 年代初被转移到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然后放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那里应该能够找到这些文件。"记者就此采访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馆长西里尔·安德尔松。安德尔松告诉记者，斯大林的所有档案的确都存放在该档案馆，但他强调工作人员经过反复查找，并没有看到卡尔波夫所讲的这些材料。档案馆有专门记载每个材料的清单，作为一个档案员，他认为卡尔波夫书中提供的档案资料是假的，在总统档案馆也不会存在这些材料，那里所有的文件都已经悉数移交给了他们，许多曾经在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过材料的学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最后安德尔松断定，这是无知炮制的伪造物。著名作家尤里昂·谢苗诺夫在写作《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书时曾寻找过幸

①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ли 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 и Гитлер о войне с союзниками? http：//izvestia. ru/news/324441.

② Предлагал ли Сталин союз Гитлеру? 21 июня 2007г. http：//www. kp. ru/daily/23921/68943/.

存的希特勒军事精英，并与其见面以了解战争秘密。他数次找到过沃尔夫，与其交谈。据谢苗诺夫称，在谈话过程中沃尔夫讲述了许多自己在二战期间与美国谈判的事情，但却一次也没提到姆岑斯克的谈判，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提到过这次谈判。

该《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令人生疑的又一例证是梅尔库洛夫在去参加谈判前后，甚至整个1942年并未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这不符合常理。《历史档案》杂志在4年间曾公布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每日接见访客记录，该杂志副主编、历史学家奥列格·戈雷洛夫说："根据访客记录，斯大林1941年在克里姆林宫与梅尔库洛夫见过23次面，1943年见过12次面，1942年根本没有见过面。"①

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克劳斯（柏林）也证实，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件，沃尔夫也从来没有向别人提起过。"我曾经在德国联邦档案馆及德国和世界各地其他大的档案馆'翻'文件，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明沃尔夫或者其他人参加过德俄在姆岑斯克谈判。不仅如此，沃尔夫在写作回忆录时经常向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寻求帮助，我询问过我的同事们，所有的人都说沃尔夫从来没有提到过姆岑斯克。这是他一生中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沃尔夫不可能不提（他死于1984年），即使不是沃尔夫，其他的德国见证人也应该谈起过这样的事情！至于1942年11月，我们发现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德国人打算（强调一下，打算）与斯大林联系，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希特勒。他后来回忆说，元首为此十分生气，命令他忘掉这个想法。"②

2009年6月4日，约瑟夫·德里曼在《秘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卡尔波夫为什么歪曲历史》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据说卡尔波夫利用获准看秘密文献的机会所找到的'文献'，是由纳扎罗夫第一个公布的。他是一个著名的反'共济会阴谋'斗士，常常在臭名昭著的《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一些反犹太人的文章自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起，该杂志就把与犹太人做斗争当作自己的主题。纳扎罗夫还光顾《奇迹和冒险》杂志，他想用似乎在国内档案馆中找到的重要文献来满足这本娱乐

① Предлагал ли Сталин союз Гитлеру? 22 июня 2007г. http：//www. kp. ru/daily/23921. 4/69012/.

② Тамже.

杂志的读者……对于纳扎罗夫来说，谈论的对象和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犹太人斗争。纳扎罗夫的这些‘文献’发表在 1998 年，弗拉季米尔·尔卡尔波夫在自己的《大元帅》一书中引用的‘引起轰动的档案文献’来自《奇迹和冒险》。”①

关于《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的来源，学者们并无定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馆长西里尔·安德尔松认为，这些材料是德国人或生活在德国的人写的。因为在修辞上的一些句子不符合常规：“重新安排世界空间”说法实际上在俄语中好多年都没见过，而与法西斯喜欢的“生存空间”“生活空间”相仿。此外，“犹太人”的说法即使在奥热果夫词典里也找不到这一词语，这是第三帝国的词语。“远北地区”地区的说法也不符合凭俄语习惯（《Дальний Север》вместо《Крайнего》）。馆长认为，很多证据都说明该材料是出自德国人之手，他们需要借此来挑拨斯大林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不排除，他们把这个假情报偷偷传给我们的情报员，然后这些所谓的材料就落在了贝利亚的机构和内务人员委员会那里，可能情报员又把这些材料给卡尔波夫看了。

扎意德曼则推测，该谎言也有俄罗斯国内杜撰的可能，它们来自反犹太主义。“德国（杜撰）的目的是为了让盟友知道，从而离间他们与斯大林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尽量杜撰得更加完美；此外，在德国、英国和美国都无人知晓此事，因此该谎言很有可能是国内制造。”②

在分析类似卡尔波夫这样的文章广受欢迎的原因时，历史学博士、俄罗斯文献档案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米哈伊尔·梅尔玖哈夫对《消息报》记者埃拉·玛克西莫娃说：“现在越是年轻的读者，越不关注文章内容的详尽程度，他们的主要旨趣是——更激烈、更恐怖、更黑暗！他们才不管没有文献出处呢！作者虚构出来，他们就上钩。……这一切反映了整个社会对真相的冷漠！”③

---

① Зачем писатель Карпов исказил историю? http：//www. jewish. ru/history/press/2009/06/news994274789. php.

② И. Зайдман Дегенеративные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ыhttp：//www. rubezh. eu/Zeitung/2009/09/13. htm.

③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ли 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 и Гитлер о войне с союзниками? http：//izvestia. ru/news/324441.

普京总统评第二次世界大战

吴恩远

2014年11月5日，普京总统在俄罗斯现代历史博物馆会见青年历史学家，就如何评价俄罗斯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展开讨论。此前普京在2014年1月16日会见俄罗斯国家历史教科书修改委员会成员时也谈到这方面问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已经引起俄罗斯当局对此的高度关注，甚至对当前国际局势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一　强调要对俄罗斯年轻人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教育

俄罗斯《知识社》负责人向普京总统报告，通过对14—24岁的俄罗斯年轻人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几乎不知道当代俄罗斯的英雄人物，不知道应当以谁为榜样。就是说，在当代俄罗斯年轻人心目中没有俄罗斯历史中的任何英雄形象，包括卫国战争中的朱可夫将军也很少人知道。更为遗憾的是，30%以上的年轻人不了解苏联卫国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意义。

普京听后承认，这个情况令人非常痛心，甚至感到可怕。早在2014年1月，普京就指出：中学历史教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使孩子们对俄罗斯历史的重大事实、对祖国历史杰出人物的事迹有清晰、正确的认识。他指出，过去不时在这方面出现问题，表现在人们时常有意无意轻视自己的先辈在过去年代所做的努力，或者轻视近百年来俄罗斯国家的存在。应当使我们的民众对俄罗斯国家存在上千年时间所做的一切给予客观评价。无论

如何不能夸大，更不用说以各种理由甚至无中生有挑衅我们的历史[①]。

普京总统高度评价俄罗斯《知识社》在向年轻人普及祖国历史知识方面所做的工作，承认过去俄罗斯在这方面甚至不如外国做得好，对此国家应当承担责任。普京向参加座谈的历史学家提出政治任务：要使青年一代通过历史学习增加对祖国的自豪感，要以正确的观点认识国家曾经经历的困难时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的前提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联领导人在战前的积极活动；以及对十月革命的评价[②]。

二　绝不容许歪曲俄罗斯历史，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

扎基罗夫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在俄罗斯文化各个领域，学校、出版物、影视作品、互联网甚至电子游戏出现大量对祖国历史进行虚假、歪曲的描述，有时是直接进行政治丑化的情况。他说，甚至祖国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如卫国战争、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关系、俄罗斯和邻近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都遭到歪曲，特别是西方的一些出版物，甚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已有定论予以歪曲。

普京认为，现在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社会变革，为达此目的，从政治地缘利益出发，必然要试图改写历史。普京强调，历史是一门科学，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它，绝不容许否定历史、歪曲历史。

普京指出，当前俄罗斯学校的某些教科书，如文学教科书所讲授的一些东西，不仅对我们国家、对我们人民，甚至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来说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如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价完全是另类的、歪曲史实的。那些有意贬低苏联人民在反抗法西斯斗争中作用的现象，都是思想领域的垃圾，应当绝对避免。[③]

三　关于苏德条约和苏联领导人战前活动的评价

奔萨大学教授维亚切斯拉沃维奇向普京汇报：他手里有一本英国学者

①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5 ноября 2014 года.

② Тамже.

③ Тамже.

所写的二战历史书。书中完全不提1941年德军准备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似乎（由于苏德条约）德军在1940—1942年主要制订的是进攻英国的计划，这样来贬低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

普京反问道：您那位英国同行为什么不提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签订协议后大言不惭地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然而连丘吉尔也认识到，由于条约的签订，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因为《慕尼黑协定》对侵略者的绥靖，普京强调是西方国家而不是苏联助长了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的气焰。

普京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在争论关于1939年莫洛托夫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似乎由于它导致苏联瓜分了波兰。可当时波兰在干什么？在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波兰同时也出兵夺取了捷克部分领土，然后招致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普京说，他不想在这里指责任何人，但当时对外政策的方式就是这样。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研究中，关于苏德条约的签订、苏联进攻波兰的评价一直是争论焦点，有人据此认为是“苏联、斯大林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所谓“重评历史”后，1989年8月18日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公开宣布苏德条约关于波兰的秘密协定是一个错误，引起8月23日在波罗的海三国出现大规模群众集会，抗议苏德条约的签订，由此开苏联解体风气之先。2010年2月在布拉格召开了由捷克议会上院和政府办公厅主办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罪行——史学家和法学家的观点”国际会议。会议发表声明，呼吁欧盟成员国应该立即执行欧洲议会于2009年4月2日通过的关于将8月23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日）作为全欧洲纪念集权和专制政权受害者纪念日的决议。

应当如何评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普京在与历史学家座谈中谈了两个看法：第一，由于当时苏联不想立即与德国开战，签订了这个条约。他说，难道苏联不想打仗就像一些人所说是干了坏事？第二，苏联也知道与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签订苏德条约）拖延战争爆发，因为需要时间使苏联军队装备实现现代化：它需要生产后来被称为“喀秋莎”的齐射火炮；需要生产新型的T－34坦克，而且不是一

①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5 ноября 2014 года.

点点，要能具备成建制装备苏军的上千万计的坦克大炮。那时候哪怕能够延长一个月、能够延长一天的时间都是宝贵的。

因此，普京把这称为“苏联领导人战前的积极活动”并要求应以“正确的观点”给以评价。至于对“那些完全出于政治目的对苏德条约的评价”普京称之为“无聊的空谈”。

四　欧洲战场苏联与盟国作用的比较

针对西方学者故意贬低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普京认为，搞清楚苏联和其盟国在二战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普京说，不否认苏联的盟国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如果要看对整个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应当从其对战争做出的牺牲、努力、重要作用等方面来比较。比如，德军在东线（苏德战场）配置了多少师团；在西线（主要针对英美等国）配置了多少师团。相应，德军在东线部署多少坦克、飞机、火炮，在西线部署了多少？普京认为，只要把这些数据列出比较，一切就很清楚了（按苏联史书说法：从 1941 年 6 月 22 日到 1944 年 1 月，德军共有 153—201 个师布防在苏德战线，大约占德军总兵力的 2/3；同时期德军在其他战线只配置了 2—19.5 个师。苏联军民共消灭了 73% 以上的德军官兵，75% 以上的飞机，75% 的坦克和强击火炮，这些占德军在二战损失的兵员总数、飞机、大炮、坦克总数的 3/4）。普京说还可以从为战争牺牲的人数比较来看对战争的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共牺牲了大约 35 万人，美国大约在 50 万人。尽管牺牲这么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还是不能和苏联为战争胜利牺牲了 2700 万人相比较的。①

五　首次把卫国战争的胜利与当时存在的（苏维埃）制度联系起来

普京曾经多次谈到当时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对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他曾说过：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

①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5 ноября 2014 года.

争的胜利。忽视这一事实是愚蠢的。他还说道：我们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谁怎么说，最终是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损失很大，现在谁也不能指责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战争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那么对我国来说其后果就会悲惨得多。因此，在普京支持下，俄罗斯采取了恢复“斯大林格勒”名称等一系列还原历史真相的措施。但普京很少谈及战争胜利与苏联体制的关系。

在2014年11月5日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时，普京认为可以谈谈二战胜利的政治原因。他说：“如果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不是那样严酷，而是处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我们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吗？肯定不可能。而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斯拉夫民族将从肉体上被消灭，不仅俄罗斯人，犹太人、吉人赛人、波兰人等等都将被消灭。”

的确，在“严酷的”体制下，社会一般要承受更大的代价，包括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但普京总统指出：对某些历史事件所付出代价的评估当然是重要的，如彼得大帝改革的代价、伟大卫国战争的代价等，但更为重要的是看到这些事件的后果和影响。也就是说，要看到战争取得胜利这一结果。

六　二战中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

近年来，东欧一些国家出现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潮流。集中在否定二战后期苏联出兵进入东欧国家的行动，苏联不再称之为“解放者”，而称之为“占领者”；认为苏军仅仅是把它们从一个独裁者手里交到另一个独裁者手里。《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通过决议，认为斯大林体制与纳粹主义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在东欧国家出现大批摧毁苏军解放纪念碑等现象；在乌兹别克、阿塞拜疆、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地，都发生一系列捣毁苏军纪念碑事件。普京特别批判了一些人的论调，这些人认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欧国家陷入斯大林体制的黑暗笼罩下。他说，如果德国法西斯在这些国家胜利了，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可以说某些国家将会不存在了。普京强调，今天特别需要做的是，要加强和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合作，共同做到以最为客观的态度评价历史。①

①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5 ноября 2014 года.

第六篇

民族篇

舒宾：影响苏联解体的主观因素

李瑞琴编译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舒宾，最近推出了他在苏联解体问题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苏联解体：主观因素的作用》。[①] 文章客观地描述、详细地分析了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历史环节中主观因素的作用。尽管作者的一些论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翔实的材料和研究证明，主观因素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说，苏联解体的原因通常被认为主要是民族冲突、外交问题、社会经济危机等客观因素。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第一，民族冲突首先发生在苏联周边，不是1991年12月决定苏联解散的莫斯科、基辅、明斯克三角区。苏联周边地区一直存在着民族冲突，在国家解体之前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历史地延续下来的1988—1990年的民族冲突，实际上起着稳定苏联中央的作用。因为历史地看，民族冲突可能会导致减少国家领土，但一般不会使它解体。第二，和冷战相联系的苏联的外部压力，在1990年同样很弱，冷战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第三，社会经济危机是影响国家局势的最严重的客观因素。但是同样必须注意的是，社会经济危机伴随着整个国家历史，并没有导致国家解体。1989—1991年的社会经济危机只有和一系列主观因素相联系，即和改革家的错误、和政治斗争的破坏性后果相联系时，才会导致国家解体。

文章丰富而冗长，论述全面而细致，为便捷把握作者的精神实质，现将文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

① Историчест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рии стран, *СНГ* 2. 2007.

一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推出

1990 年，苏联各共和国选举苏维埃代表，民族主义在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乌克兰西部都占了上风。但是，尽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格鲁吉亚在 1990 年年初就坚持独立，苏联其他地区的形势也只是更加复杂而已。俄罗斯绝大多数居民和政治家还没有任何独立于苏联的想法，也没有推出民主联盟等类型的口号。白俄罗斯的情形也如此。在乌克兰，“独立派”就是依赖于西方国家支持和获得基辅官僚好感的活跃的少数派。中亚的形势则相对稳定。由此，当时民族分离主义的危险性，远远达不到瓦解苏联国家结构的力度。有作者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力量就是民族主义运动”，其中必然包括“俄罗斯主权运动”。总体上这样说没有大错，但需要明确的是，“俄罗斯主权运动”并不属于民族主义运动，而是俄罗斯的民主运动利用了民族主义及另外的因素，引发了“俄罗斯主权运动”。这些运动起初都表现为民主和西方式的。因此，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被民主运动利用和控制了。

1. 形成了“民主派”和“爱国派”两个知识分子司令部

早在 1988 年，苏共反对派开始壮大，并同时形成了“民主派”和“爱国派”两个相互独立的知识分子司令部。前者认为，应该在国家框架内帮助戈尔巴乔夫控制党，利用戈尔巴乔夫成为“民主派”领袖；后者则赞成在苏联范围内放开和自治，但实际权力转向共和国一级的方案，重要的是削弱中央的权力。这是在 1988 年“熬出来”的俄罗斯思想，但还谈不上进行了脱离苏联的俄罗斯进程，只是在联盟内部放大了俄罗斯政权的影响。当时，虽然公民运动的影响逐渐扩大，但是反对派领袖通常并没有期待在第一次猛攻后苏共就能垮台。确切地说，反对派是期待改革首先成为类似于 1905 年的革命，几年后由于某种原因，再进入“1917 年二月革命”时期。1989 年内部的革命形势也像是 1905 年到“十月起义”前的情景：反对派在暗地里周密思考活动方法，自由主义代表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上级任命官员时还没有倒向这一阵营。

在苏联内部产生的俄罗斯国家自治的（关于独立的说法还没有出现）思想，既反对戈尔巴乔夫保留“自由帝国”的思想，也反对苏维埃社会制度，同时还防备着各共和国的自治主义。

2. 俄罗斯“爱国派”“抛出”瓦解苏联的思想

1989 年，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跨地区代表团”集会决议很危险，决议满足了将苏联改革为“主权共和国”自由式联盟思想的需要。而在 1989 年春天时，这一方案已经通过波罗的海沿岸和高加索国家为了自决而进行的团结一致的斗争反映了出来。1989 年中期，因为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主义运动，非正式组织内部出现了赞同关于少数民族主义运动是不可调和的观点，倾向于建立强大的单一制民族共和国。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内是否加强共和国政权的辩论变得消沉，“为苏联的毁灭画上句号”的“爱国派”复活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著名的“爱国派”领袖、作家拉斯普京发表了对反对派知识分子情绪有重要影响的演讲：“我们俄国，带着尊重的、理解的态度对待一切民族感情和民族问题，我们国家的人民和民族也是如此。但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的显著的积极性，使他们通过议会赢得了联盟修正案的出台。联盟修正案是否可以允许这些共和国脱离苏联，暂时我还没有答案。自然，你们会依据法律和良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作为援助者的俄罗斯被攻击了。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我想也许俄罗斯应该从联盟中出来。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的一切灾难均来自俄罗斯而指责它，或者如果俄罗斯的不成熟和愚笨拖累了你们的进步，也许俄罗斯脱离联盟更好？顺便说一下，许多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将来就像现在这样。”

这是第一次在高规格会议上出现的关于俄罗斯脱离联盟的言论。由此，瓦解苏联的思想不是西方“抛出”的，也不是“民主派”传播的，而是由俄罗斯的“爱国派”推出的。这个概念轻易地就使“处在各共和国的苏联人民对立起来”，并且也把俄联邦内俄罗斯族和非俄罗斯族居民联结起来，以反对苏联人民这一概念的一致认同。

3. 上级任命官员客观上成为“爱国派”积极的拥护者

“爱国派”开始狂热地加速扩展俄罗斯主权高于联盟主权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在上级任命官员中找到了同盟。1989 年 9 月 19 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在民族问题最激烈的辩论中，当发言者愤怒地揭露民族分离主义的危害时，苏共斯摩棱斯克州委书记 A. 弗拉先科声明，“国家中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处在金融被抽干、经济被分解的情况下”。如果从前向联盟进攻是从外围进行的，那么现在的打击来自最中心。原来，苏联帝国没有宗主国。国家的中心区认为自己是受压迫的，这样的状况是不能

继续下去了。这就是俄罗斯从自身“解放”出来的最初宣传。上级任命官员就以这样的方式对抗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尽管他们是从俄罗斯联邦的角度出发，认为俄罗斯丰富的地下资源绝大部分被侵占了，但是，这反映了上级任命官员的保守情绪，是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在 1989—1990 年选举前的运动中，有损于联盟利益的口号“为俄罗斯而斗争”被频繁使用。当俄罗斯政权有转向民族主义“反对派”手中的危险时，“民主派”便着手利用了“爱国派”的口号，采取了以波罗的海沿岸民族主义的方式，制定反对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的战略方针。在破坏苏联的事业上，保卫者和“自由主义者”变成了客观上的同盟军。

4. 俄罗斯中央政权的分离主义截获了爱国主义主题

正是与 1990 年选举的远景相联系，俄罗斯主权的问题被充分地提出了。选举的组织活动其实是为了各级政权的斗争，人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在俄罗斯的代表中，有人希望进行国家苏维埃的具体改革，哪怕是在局部范围内。有人选定“俄罗斯独立思想”，而有人只是想重温联盟代表的成就感，获得行政资源，进入媒体和社会关系网，进入新的民主派上级任命官员的圈子里。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联邦内“爱国主义”力量发生了保守性变化，俄罗斯沙文主义在俄联邦机构中获得了支持，并开始着手建立俄罗斯共产党，说服部分自由主义者和叶利钦周围的人，必须作为俄罗斯议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

民族主义则更加积极地利用着“爱国派”：“苏维埃俄罗斯恢复或者再建立原有的行政经济管理体制，将中止本已无法预计的联盟条约的建立，联盟机构将干涉共和国事务。”声称，在俄罗斯领土上，只有经过俄罗斯议会许可，联盟机关才能发挥影响。俄罗斯联邦经济核算要中止对另外共和国的补助。这种说法里含有使苏联瓦解的暗示。稍后，叶利钦和俄罗斯政权中心就领会了这个暗示。

“爱国派”和“民主派”当时都主张俄罗斯在经济方面的独立自主性，没有表现出使苏联必然瓦解的危险性。“爱国派”以更激进的方式建立了叶利钦与中央斗争的经济政治基础。但实质上，二者都犯有一个认识上的错误，即认为，巩固俄罗斯共和国政权以反对联盟，就是保存联盟的道路。在 1990 年，大多数的“民主派”以及大多数的“爱国派”没有考虑以苏联解体为目的。大部分精英认为，想要脱离联盟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民主派”和“爱国者”原来就属于一个体制，只是

“爱国派”的优势在于有民族主义作理由，并且他们能够称为民族主义运动。所以，“爱国派”的行为导致苏联解体只是间接的，是通过竞争对“民主派”政治家施加影响。对于“民主派”来说，爱国主义主题曾经是个战略问题，不属于“民族主义运动”。吸引“民主派”的主要是“战术层面的美好思想”，即反对“体制”能够得到权力。但是，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对苏联有致命危险。由此，俄罗斯中央政权截获了“民族主义运动”，利用爱国派、民主派、保守派而控制了事态的发展，使民族分离主义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成为主观选择和政治战术的成功结果。

二　地区化和西方化形成的社会危机

离心趋势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引发了经济危机

1990 年政治选举后，“民主派”控制住了政治局势。此前，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改革措施是反对机关本位主义、迅速加强地方当权者的力量（特别是他的“第二梯队”）、分解部门经济管理体系和增加经济主体独立性。这一缺陷明显的联盟改革方案有利于捍卫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但是，其地区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破坏性也同步渗透到毁灭国家的过程中。由戈尔巴乔夫选择和实行的改革方案，对国家的危害极其严重。联盟经济联系解体，政治、法律领域极度混乱，企业基金流向商业组织，导致了剧烈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预算赤字的增加和经济危机，自然推动着联盟的离心趋势。

离心趋势之二：破坏苏共的民主革命

在苏联大肆展开的民主革命，也增加了联盟的离心趋势。在俄罗斯，公民运动进入了和地区领导相冲突的状况。公民组织通常是全苏性质的，但它们与其说是在凝聚苏维埃，不如说是在分裂苏维埃。

对于苏共的破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激进民主派即自由主义者将苏共从管理机构中排挤出去，使共产党失去了垄断权力。由于共产党“是团结苏联的主要组织”，因此，激进民主派的做法“使苏联解体获得了奔腾状态的特点”。二是苏共自身积累的矛盾也破坏了自身。苏联解体“奔腾式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团结苏联的力量”——共产主义官僚内部出现了矛盾，这些矛盾在整个“停滞”时期都在积累着。还在 80 年代时，苏共已经不仅仅是承压结构，而且是主要的重量，这一重量压迫

着另外的结构，并破坏着它们，也破坏着自身。戈尔巴乔夫反对本位主义的改革方针，不是激化矛盾的原因，但是成了加强党的官僚机关竞争的信号。1990 年年末，局势愈加复杂，苏共的每一级政权都贯彻自己独立的活动方针，认为对自己不必要时，就改变最高指示。苏共作为社会关键的协调系统，力量的削弱对国家是有危险的。而这时，被点燃的激进派像保守派那样，开始抵抗改革，导致了苏共协调机构的瓦解。

苏共的力量被严重削弱，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没有创建苏共协调机构体制的另外模式，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戈尔巴乔夫想指望苏维埃，但又没有建立好协调苏维埃和总统权力机构的体制，新建立的苏维埃机构实际上是反总统的，在 1990—1991 年的条件下，无论怎样都没有促进国家的团结。这样，行政管理部门的资源和苏维埃组织中最积极的党的干部出现摇摆，不仅使反对派的力量得到加强，而且促使部分革新的执政领袖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公民运动领袖中寻找支持。

离心趋势之三：模棱两可的“主权”概念产生使联盟进一步衰弱

依照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经验，俄罗斯的“民主派”开始利用“主权”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已经获得了新的意义——最高地位，即在中央之上解决共和国和地区机关政权的问题。同时，“主权”概念包含着从“主权”向“独立”移动的可能性，表现为民族派和“民主派”结盟与中央进行斗争的形式。并且“主权”概念在语言表达上还不是独立，而是苏联民主改革的意思。各共和国领导利用民众对联邦运动、联盟和独立等各种概念理解上的缺陷，暗度陈仓。声称，主权包括了最广泛的权力，一直到独立权。模棱两可的“主权”概念产生了危险，新地位的正式承认使共和国获得了从苏联出来的正式权利。在俄罗斯 1990 年 6 月宣布主权后，各共和国都急速地圈起并扩张着自己的全权“主权”。尽管无论是乌克兰，还是白俄罗斯，都还没有提出退出联盟的问题，但它们的领袖已经有意用这个危险敲诈联盟机构。

各共和国领袖都以戈尔巴乔夫为榜样筹建了自己的总统封号，以保护自己免遭中央的意外撤职。以脱离中央的管束为目标，在经济计划中，共和国都加大了对本国权益的控制，联盟预算集中能力迅速衰弱，全社会经济系统危机不断加深。从 1990 年起，各共和国开始限制往联盟预算划拨资金。共和国还把抗议引向反对中央的官僚作风，使自己免遭攻击，防止自己对斗争的控制力衰弱。其实，导致苏联破产——这是美国在 1981—

1986 年间就试图达到但没有达到的结果。甚至石油价格的跌落，也没有像共和国官僚机构独立、私人资本依赖国家企业进行“原始积累”那样具有如此致命的意义。

离心趋势之四：西方化追随者和西方同盟形成，国际社会作用显著

如果说地区主义为了权益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过程的社会基础，那么俄罗斯领导的行为就是它运动的强力，这一运动强力的作用超出了地区分离主义的行为，带来的是对国家机构最核心的打击。从 1990 年开始，叶利钦毫无疑问地成为“民主运动”的领袖，成功率领了具有重大意义和最广泛群众的公民社会部分。西方化成了这一社会政治力量（区别于 1988—1989 年的公民运动）联合的思想。西方化思想的广泛传播表现出了一系列完整的结果：由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共产主义领袖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渴望攫取私有财产并将国家向着西方化推进；将苏联遭到的危机和西方国家良好的情况相比较，而不是和中等不发达的及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将苏联陈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和先进观念相比较。这些正好是西欧和美国所需要的。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已经不被认为是外部敌人，因此，以西方为榜样，“民主运动”的领袖成为西方国家的天然同盟军，俄罗斯领袖的行为获得了国际的支持！外部因素获得了新的意义：西方国家和西方化追随者的同盟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出现了，苏联如此的改革将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一支持，完全可以从政治力量的排列上消除联盟政权。

1991 年年初复杂的形势下，苏联的命运是否已经预先决定了？肯定的答复还是没有足够的根据。第一，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另外的共和国，地区精英们都在进行着权力的争夺，不只叶利钦这样。俄罗斯的“民主派”成为主权派的“先锋队”，但是对于激进的俄罗斯领导来说，直到 1991 年 8 月时，他们才有了很大的行动自由。第二，1988—1990 年的形势显示，联盟领土缩小已经不可避免但不会完全解体。当莫斯科、基辅和明斯克处在同一个国家的时候，“主权”还没有同独立混为一谈。

三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因素

按照传统，历史上客观因素较之主观因素更重要。前者象征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后者则是个别人的意志。但“大规模群众”往往只

是形成了平衡基础，当历史的天平开始晃动时，在这一刻一切都取决于个人。1991 年悲剧的结果取决于具体的步伐和那些精英们的个人决策，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等。

1. 关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力量对比分析

在 1990—1991 年的事件中，被称为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众多精英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两个要人的斗争，作者们通常注意的是叶利钦的“强力”和戈尔巴乔夫的“软弱”。然而，戈尔巴乔夫并不总是“软弱”，不然他不会干到那个官位。在管理机构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比叶利钦有力量一些，这不仅表现在 1985—1988 年间，而且甚至在 1991 年 8 月之后，局势已经不可救药时也是如此。在苏联的最后时刻，他的管理机构力量都使反对派担心。但是，在革命的条件下，这个力量转化成软弱性。戈尔巴乔夫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意识，他更倾向于劝说，用“圆滑”、折中的语言刺激被劝说者。叶利钦受到了激进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持，部分指望私有化的上级任命工作人员组织、金融的支持。叶利钦具有高效的激进活动才能，在紧张对抗中，采用激进的、简单的方法，能够动员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号召起大量的支持者。1990 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组织资源已经势均力敌，他们之间失去了妥协的机会，唯有互不信任在放大。进一步的政治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反感，而是社会力量的必然对抗。

2.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和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的犯罪

在研究 1990 年事件时，有关个人的主观因素，可以用“错误”和“犯罪”的不同概念表述。戈尔巴乔夫是“错误”，他的改革措施导致了 1990—1991 年联盟总统权力的急剧衰弱。他没有给予准备支持中央政权和改良联盟的力量以组织帮助，这是重大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力建立起复兴社会主义和保卫联盟的民主联合，却很快导致了苏联精英在社会中的完全孤立。尽管，一些文献有对戈尔巴乔夫有意识使苏联崩溃的控诉，但暂时没有得到证明，苏联总统有意识地破坏了原有的政权。

“犯罪”的术语更多地属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袖们。

克拉夫丘克在 1990 年 7 月担任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由此，乌克兰共和国内部各派力量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克拉夫丘克积极利用激进的“主权”讨论。1991 年上半年，克拉夫丘克一方面赞成革新联盟，另一方面在和许多激进民族主义者讨论时说：“需要公开说明：没有

联盟，没有共同的任务，没有共同的权力，没有共同的职能，没有总的中央机关。如果我们承认联盟存在，而它就存在，那么它就应该发挥职能。主要任务就是号召解决总预算。”联盟“应该以共和国的利益为基础，以共和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向中央选派全权代表。同时给予共和国全权代表以实现这些全权的经费。中央机关的组建要经由共和国参与。只有在些条件下，我们才将保存主权国家联盟”。由此，克拉夫丘克已经散播了其意识形态构想，明确“如果有什么意外”则独立实现乌克兰的利益。1991年1月29日，在电视节目《我们是谁》中，克拉夫丘克将乌克兰与法国仅在冶炼生铁和钢、生产糖等生产情况相比较后，得出结论：生产得越多，生活越恶化。乌克兰被掠夺了，如果乌克兰能独立，那么人民就能生活得更好。在联盟全民公决前夕，什么样的谈话就能激起什么样的反响。在乌克兰共产党保守派与反对派之间，克拉夫丘克随机应变，并加大力度地向民族主义移动。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决后，克拉夫丘克又做了广阔灵活的解释：“乌克兰人民不是简单地投票表决赞成联盟，而是投票表决赞成确定内容的联盟——赞成符合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的联盟，就是说赞成国家联盟。”1991年8月，克拉夫丘克已经无条件赞成独立。

白俄罗斯则和乌克兰一样，希望建立一种宽泛的主权国家联盟，同时不忘记保留独立的可能性。

纳扎尔巴耶夫在1990年时，虽然动摇于联盟前途的计划与巩固自己“领地”的利益之间，但总体来说，直到1991年12月他都在捍卫联盟。1991年5月，在新奥尔良，纳扎尔巴耶夫发表了充满热情的讲话赞成联盟：“所有共和国都确信，只身费力摆脱联盟必将有大的损害。应该商定我们将要在7月1日签署的联盟条约。坦白地说，人民在监督着我们。‘9+1’声明全世界都能理解。对于我们建立的关系，正常的人都将给予理解和支持。大家将联合起来，我们正是有着这75%的集中而抵制分散。”在6月激烈的讨论中，纳扎尔巴耶夫尽管再一次建议戈尔巴乔夫采取强制手段对待分离主义活动，但戈尔巴乔夫报以缄默。

这样，只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格鲁吉亚，从1990年起，退出苏联的过程带着不可逆的特点，其余共和国的立场确定于官僚组织的复杂斗争，并或多或少受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在与中央的斗争中，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资源，共和国的领导都从利己政策出发对待保存联盟的前景。

四　重新签署联盟条约的思想制造了致命危险

尽管不是全部，但在很大情况下，联盟的命运取决于联盟总统的立场。“民主派”和“爱国派”指靠俄罗斯权力中心，一些周边共和国采取的是独立方针。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犯错误的意义就是巨大的危险。戈尔巴乔夫为了将波罗的海国家留在苏联，采用了 1988 年由人民阵线和波罗的海国家共产党建议的联盟改革脚本（而在 1989 年，这个脚本已经不能满足民族主义领袖的需要了）。因此，1990 年接受重新签署联盟条约的思想，是对苏联合法性的最大破坏。

1. 重新签署条约的思想不具有必然性，却存在着致命危险

1922 年条约是依据苏维埃宪法产生的，对其进行重新修订不存在任何法律依据。为了保留波罗的海国家，1940 年曾经重新签订过有着模棱两可合法性的秘密协议，允许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有特别地位。在 1989 年 9 月时，戈尔巴乔夫宁愿忽视中央和各个共和国间的危机，执意把对秘密协议的讨论加入重新谈判的议程。在与共和国的谈判中，联盟中央最激进的敌人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权利，甚至连中央完全的忠诚者也是。

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改变航向的空间，共和国的领袖们现在结成了统一战线。在俄罗斯，叶利钦善于以慷慨的谎言和呼吁截获这些主动权，“能拿多少主权，就能掌握多少主权”。为了保住联盟，1990 年 11 月 24 日，戈尔巴乔夫只得在讨论联盟条约方案时作了重大妥协：改变苏维埃共和国主权联盟名称，讨论主权问题。“参加条约的每个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在本国领土上给予一切充分的国家权力。苏联是主权联邦制国家，由各共和国及现存国家政权自愿联合组成，其全权在参加条约中获得。”条约满足了共和国官僚们的物质要求。“共和国是土地的所有者，除了联盟存在所必需的部分国有财产以外，本国领土上所有地下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都属于共和国所有。”戈尔巴乔夫以这些妥协购买了主要的东西：保留统一领空和保障联盟机构的权力。

2. 重大妥协为建立单一制经济联盟制造了机会

对于政治精英，最重要的只是保留现有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但是，围绕权力如何划分的斗争必然会破坏这一重要联系。1990 年 12 月 10 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会上说：“很遗憾，划分权力的过程成了

摆脱控制的过程，具有公开竞争的性质。这是极其致命的现象，受其害，整个经济部门在瘫痪，统一的企业之间的联系受到干扰，国家基础和劳动纪律遭到破坏。”1990 年 12 月 11 日，叶利钦在俄联邦苏维埃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说：“我坚定和确信地说，俄罗斯无条件地拥护不以单方面原则为基础，而确实以每个共和国的自由意愿，以平等为基础的联盟。不是所有共和国都愿意参加联盟条约。当然也没有力量强迫他们。大约必须预先考虑到各种进入联盟的条件，在一定范围内能给参加者以可能性，在那里有彼此的利益，要预先估计到，不是立刻就能全面签署联盟条约，而可能首先在局部，也即从经济的联盟开始。”尽管戈尔巴乔夫预先警告：“不应该给人民这一假象，即只是保存经济联系，没有政治联盟也行。须知，独立派达到了目的，对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就是灾难。”但是，俄罗斯的领袖正是看到了单一制经济联盟构成国家的机会。

在这个阶段，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重要的是迫使所有共和国承认联盟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唯一国家这个框架自身存在的事实。这是防止“国际社会”承认各苏维埃共和国主权，防止国内问题和苏联边界问题变为国际问题可能性的关键所在。这种考虑迫使戈尔巴乔夫承诺，如果各共和国承认苏联只存在一个国际法主体，他将在其他方面做出重大让步。

综上，“蓄意消灭”苏联能够发生，但也能够不发生。显然，签署条约会加强俄罗斯“民主派”在联盟机构中的权力，他们感兴趣的是保存一个软弱的中央。当然，这是在还没有发生“8·19”事件，没有挑起独立阅兵和随后开始激进地改革联盟机构的情况下。到 1991 年 7 月 23 日前条约已经准备签署时，发生了“8·19”事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五 “8·19”事件客观上刺激了联盟解体

“8·19”事件后，俄罗斯政权中心迅速倒向叶利钦。波罗的海国家利用这一形势脱离了联盟。最激进的选择在于，“8·19”事件之后，克拉夫丘克与联盟拉开了距离，显示出有准备的重大退步。

首先开始的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攻击，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密集地灌输到社会意识中。在乌克兰流传着美国国会的荒诞说法，1932—1933 年的饥饿是莫斯科有意组织的种族灭绝行动，尽管证明这个命题的证据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至今还没有找到，但在思想混乱的形势下，这个使人反感的

观念，在电视上转播着，不能不在百万民众中产生影响。上级任命工作人员中的民族主义者参加了更加密切的民族主义运动联盟。知识分子建立的民族主义阵线获得了控制群众信息的方法，说服居民脱离苏联。“跨地区议员团”的行动加剧了社会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引发了政治混乱局势，社会舆论发生了急促变化，特别是乌克兰群众的情绪剧烈变化。1991 年 12 月，在乌克兰全民公决中，90% 的居民投票赞成脱离苏联。就像 1990 年俄罗斯领导曾刺激了主权主义那样，1991 年年末以克拉夫丘克为首的乌克兰领导人刺激了苏联的解体，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划分国界给联盟带来了沉重打击。

12 月 7 日，在明斯克，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袖签署了关于停止苏联“作为地理政治实体”存在的文件。三个政治家有效地完成了对苏联的消灭，宣布中止 1922 年的协议。同时，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对此负有责任（就像后来俄罗斯的改革家，认为先前的改革对于惨痛的“休克疗法”负有责任一样）：“目光短浅的中央政治家导致了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了一切社会阶层实际生活水平的悲惨降低。”

12 月 10 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建立独联体的协议，并宣布 1922 年建立苏联的条约无效。克拉夫丘克没有忘记让戈尔巴乔夫承担苏联解体的责任：“需要说，他在 1985 年就开始了破坏，而这个破坏过程的创始人众所周知。而我们，相反，三个伟大国家努力地联合，就是为了自己掌握局势，不给予一切国家机构在人民眼前解体以可能性。”12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和废除 1922 年条约（188 名人民代表“赞成”，6 名“反对”，7 名弃权），同时，俄罗斯联邦退出苏联的决议（“赞成”161 人，“反对”3 人，弃权 9 人）被通过。2 月 21 日，在阿拉木图，11 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加入独联体的宣言。宣言专门强调，联合体“不是国家，也不是建立在国家之上”。关于保存“共同经济领域”也成了幻想，现在只谈到了和欧共体、欧亚市场的联系。

叶利钦很快地向布什通报了发生的事，并且很快收到了国际社会承认消灭苏联的法令。西方伙伴还收到了最危险问题的担保声明：“独立国家联合体打算实行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方针。保证履行苏联的条约和协议中的国际义务，保证对核武器的统一控制和防止扩散。”建立独联体的协议、“停止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的客观事实”的协议“确定”

了下来。

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发生在居民相对平静的情况下，事件本身提出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只要看看在莫斯科 1988 年、1991 年 8 月和 1992—1993 年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就够了。1991 年 10—12 月间发生了许多集会，但参加者明显减少。如果说这一悲剧性结果的原因在于“人民默不作声”和有本事的政治家消灭苏联的倡议，那么他们的成功在于短期内、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建立了影响，发生了社会制度的变更而没有改变国家的界限。因此，对于改变社会制度，社会舆论已经准备好了，在苏共失败，苏联予以新名后，对于很大一部分居民来说已经是很自然的事了，但独联体完全是以新形式出现的国家。

1991 年，苏联解体的危机开始明显，它的命运已经是千钧一发。但 1991 年获得政权的领袖们宁愿剪断头发，使苏联的历史变得更细。他们的责任并不仅在于引发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这个事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而且使保存国家完整性的另外道路的选择消失。但是，如果主观故意早已存在，那么在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的过程就具有了不可逆的特点。

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侵略性”的作用

C. B. 契什科著　李琳编译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曾著有《苏联的解体》一书的苏联史研究专家谢·维·契什科近年发表《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文章[①]，澄清了“苏联曾是各民族的牢笼”“苏联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等错误观念，深刻剖析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动因，历史地梳理和回答了苏联解体中的相关民族问题。

本文认为，民族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侵略性”的思想体系。由于政治力量的分布及其力量的强弱，其作用是不一样的。自治的民族政策及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不会促成苏联解体，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动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战略，遭到了民族分离主义派的猛烈回击，波罗的海模式可见一斑。本文的结论是，在叶利钦领导下有步骤地从内部破坏苏联政权并积极支持其他共和国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俄罗斯激进主义分子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而苏联几十年间培育出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侵略性”的作用。

一　苏联不具有压榨其他民族的“帝国民族”特征

在西方苏联学的概念里，几十年来苏联被传统地定义为最后的殖民帝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这一定义开始出现在苏联作家的出版物中，随

---

① C. B. 契什科：《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的作用》，载《伟大强国的悲剧：苏联民族问题与解体》，莫斯科社会政治思想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468页。Чешко С. В.（Москва）. *Роль этно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 распаде СССР.* Трагидия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тв. ред. 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 / Сост. С. М. Исхаков.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2005. стр. 443 – 468。

着时间的推移和反苏主义规模的扩大，这种看法在持民主观点的学者和政论家中占据主要地位，甚至在西方学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帝国应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早在20世纪之初当它还是俄罗斯帝国的时候就应走向灭亡。

在民族问题上苏联政治有着怎样的特点？是否最终形成压榨其他民族的“帝国民族”？俄罗斯学者否定如此断然的论断，他们认为俄罗斯不属于典型的殖民帝国。历史学家季什科夫把俄罗斯称为“另类”的帝国，因为在他看来在俄罗斯没有帝国民族，不分宗主国和殖民地，不具有殖民帝国的基本特征。在“民族融合与繁荣”“以民族文化为外衣，以社会主义文化为实质”的概念背后蕴藏着发展民族文化的显著成效，这种民族文化推翻了“强制推行俄罗斯化论”的片面解释。如今，当社会上兴起一波反苏宣传时，当人们意识到“民族解放”口号带来的后果影响时，我们突然发现：苏联不曾是各民族的牢笼，也不曾是俄罗斯族的牢笼；苏联更不是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这里不根据民族出身给予各族人民不平等的对待。

对于民族政策体系，在苏联特定时期曾实施一套适宜的措施，它使得苏联各民族的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苏联民族主义的产生机制导致了多种社会群体的形成，它们的利益只有通过践行民族主义才能得以实现，同时这一机制也催生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从民族政策的角度看，苏联的社会体系就如同它的社会政治基础一样具有多样性和矛盾性。

民族主义是一颗还未启动倒数计时的慢性地雷。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民族矛盾和纷争导致了苏联的分崩离析。周期性复发的“阿布哈兹问题”几乎是民族冲突的唯一实例，况且这种冲突还没有上升到过激的形式。季什科夫公正地指出，在苏联没有发生当时像在其他国家发生的那种民族间公开的流血冲突，而那些冲突实质上可以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了。那么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二 自治的民族运动不会促成苏联解体，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动因

在苏联政治体系框架中民族主义没有公开地体现出来，不是一种有能力威胁到国家体制的独立意识形态或政治力量。其中原因或多或少受到苏

联早期历史和其成立前历史的影响，同时不排除一些基本的人类特性也导致了这种现象的产生。一些学者认为，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民族主义，甚至民族主义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那些仅仅出于民族团结信仰、遵循“异族欲亡我”原则而坚持民族主义口号的人，或是被迫屈服于民族主义口号压力之下的人，他们未必能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民族主义和任何一种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植根于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矛盾中。

通常情况下，民族主义首先与就业、物质财富分配、政治权利与地位、资源利用等领域的竞争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必须要有相互竞争种族之间的不平等，相反正是族际的竞争会以建立民族优势和不平等为目标。族际竞争实质上是相应民族单独社会经济和政治团体之间的较量，而非真正民族之间的竞争。正是这些团体成为民族主义真正的社会基础，制造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在同族人的意识中将其推广。

在苏联存在不少民族竞争的借口，这种竞争通常带有民族主义和族际冲突的色彩。费尔干纳屠杀，吉尔吉斯与塔吉克冲突，1989 年新乌津原住民对北高加索人的屠杀，1990 年奥什州乌兹别克与吉尔吉斯冲突，这全都是民族竞争的实例，这种竞争原则上与民族主义观念没有直接关系。培养了一批高学历高水平的非俄罗斯族干部是苏联政权取得的成就之一，他们中部分非俄罗斯族人具有排斥俄罗斯族的性格，但是当时没有人考虑这种“民族干部”过剩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些干部从社会需求角度看相对过剩，没有充分应用自己的知识才干，最重要的是对于所有人来说，缺少了既体面又有吸引力且薪酬丰厚的职位。这为族际竞争创造了土壤，导致了要把一些民族团体的代表从相应领域排挤出来。1987 年给予哈萨克斯坦青年进入哈萨克斯坦一流大学提供优惠以打击他族的提议，在社会舆论界引发了不小的共鸣。

显然，这种竞争并不存在于工业生产领域，哈萨克斯坦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都对这个领域不感兴趣。随着苏联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从事这一社会领域的多是斯拉夫人。这一突出问题清晰地揭示出了苏联人为加快工业化的弊端。加盟共和国当地民族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大地主、贸易劳工、服务业人员、个体部门代表、官员和知识分子。

实际上关于民族主义在影子经济、违法犯罪和黑手党组织中的作用还没有被深入研究。在改革年代，政权一贯把民族冲突和屠杀解释成黑手党

所为，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确凿的证据。理论上可以推测，地下财富作为资本的一种变体形式，如同劳务一样具有族际性。在当时，这自然是竞争的一个领域，它完全不拘泥种族形式。如今种族间犯罪集团的竞争已成事实，而它们对最大限度的国家一体化感兴趣，而不是国家的解体。可见这里的民族主义要特别地因情况而异，这也使得对民族主义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会更加困难。

苏联时期，在上述经济问题的背景下，首先讨论的是对加盟共和国资源的监管问题。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一领域出现了中央强制操控现象且民族矛盾集中，而且中亚加盟共和国指责中央财政预算没有给予它们社会发展足够的补贴。与此同时，关于苏联财政是否需要拨款支持中亚地区、中亚居高不下的出生率的问题，在中亚学者和莫斯科学者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中亚爱国主义者强调国家应该拨款支持，推卸这一责任意味着苏联对中亚加盟国家民族传统的忽视甚至被看作是种族灭绝的行为。在我看来，类似申诉的内幕特别明显。多子女问题被大肆渲染，也主要是为了榨取财政拨款。与此相关的就是围绕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单一作物棉花经营的讨论。中央被指责推行“棉花殖民主义”，它给这些加盟共和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损失。但是，显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共和国获得了苏联大量的财政支持，这些拨款是靠大量虚报棉花产量得来的，正是依靠这些，不但加盟共和国政府，而且整个农业区都得以供养。

我们可以提出苏联国家体制下相适应于各民族情况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类型：

第一，加盟共和国民族间的民族主义最为典型。这种民族主义针对建立和加强自己民族的特权地位并相应地抑制异族居民的需求。在共和国之外，这一类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是：相对中央政权而言争取更多的自治权，这被视作最普遍的目标，同时对各加盟共和国或多或少都具有根本意义。这种民族主义显著特征是具有明确的反俄倾向。很难说这是纯粹的仇俄主义还是仇苏情绪向俄罗斯族转移的结果，但显然这两点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

第二，获得自治地位的民族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许多自治区域体会到了第一种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如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卡拉巴赫马、卡拉卡尔巴基亚、巴达赫尚，上述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

一些共同的自然的基本特征，比如：至少在外在和形式上是俄罗斯的或亲俄的防御性质，而且忠于中央政权。这些联盟政权，俄罗斯和俄罗斯人被视为能够抵御共和国内“恐怖兄弟”的民族主义运动扩张的唯一方式。格鲁吉亚爱国志士不止一次地提出，希望在加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时，把民族自治转变为加盟共和国。卡拉卡尔巴基亚爱国志士在“改革”年代也提过同样的方案（卡拉卡尔巴基亚分别在不同的年份加入苏联和哈萨克斯坦）。类似的加入俄罗斯的方式也在南奥塞梯得以实施，巴达赫尚的爱国志士们也由于不满意将帕米尔高原附近的民族塔吉克化的民族政策，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了加入巴赫德尚的自治区，间接式地加入了苏联。卡拉巴赫的起义者们从众多摆脱冲突的可选方案中提出要么加入苏联，成立卡拉巴赫自治区，要么确立垂直的联合式权力体系。

区别开来这两种民族主义运动，可以肯定地讲，防御性的民族运动依然存在，而且很容易转变为侵略性的民族运动。在任何条件下，民族主义都是侵略性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政治力量的分布及其力量的强弱区分，一般而言，自治的民族及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不会促成苏联解体，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对苏联解体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　波罗的海模式与其影响下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彻底冲垮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战略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战略，或者说是改革战略的幻想，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内遭到了来自民族分离主义派力量的回击。在这次对立运动中，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运动起了关键作用。

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在苏联的构成中占有特殊地位。按照俄罗斯人的文化习惯，那里被视为“我们的内部欧洲”，也就是说是面向欧洲的窗户，是彼得一世亲自凿穿的，并通过它得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并接受欧洲文明的影响。特别之处还在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在加入苏联前的 20 年内一直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们比其他国家加入苏联的时间晚。它们的加入一直备受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的质疑，至今仍有学者争论这三国加入苏联是自愿的行为还是一种兼并行为。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运动，如同常见的各种各样不同指导思想的抗议活动一样，还停留在秘密形式或者更多是停留在

日常生活方面。后斯大林时期，一些以解放为口号的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也不会对国家政权造成威胁，但是却在人民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原则，使一些主张民族运动的政治组织构建并创造自己理论的活动合法化。这些政治组织开始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对各共和国的政权造成了很大压力。1987 年秋天，波罗的海地区共和国开始了这种合法的民族主义运动，当时由于要进行摩尔多瓦—里宾特洛甫公约签订周年纪念活动，而借机组织了很多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之后形成了多条民族阵线和民族组织，民族运动的理论体系也得以发展。

拉脱维亚的民族阵线是在 1988 年 10 月成立的。在 1988—1990 年间，也产生了一些民族运动组织，如拉脱维亚民族独立组织，拉脱维亚共和国国民委员会，拉脱维亚复兴党。当时，立陶宛这些具有民族运动性质的组织已经有很大势力，起主导地位的是“萨尤迪斯”，它在 1988 年 5 月产生，以实现“改革”为宗旨，于当年 10 月召开了成立大会。以实现立陶宛独立为宗旨的组织还包括“立陶宛自由里加”（1978）、立陶宛民族同盟“特劳京尼科莱依”（1989）等。在爱沙尼亚，“民族阵线”就是最大的政治反对力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和民族阵线一样或多或少具有传播性的组织，其中包括有“爱沙尼亚民族独立党”，还有类似于拉脱维亚的“国民委员会”，委员会在“社会开端期”曾提出过滤掉“非国民们”，即非爱沙尼亚人。

民族阵线的领导们努力将自己的组织宣布为全民性质的，而不是民族性的。这些民族组织的成员也不是来自单一民族的，这些政治组织的民族章程与其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也并非完全一致，然而这些民族阵线的定位和所要实现的目标却恰恰是民族性和民族主义运动性质，它们将脱离苏联视为共和国主权的独立。拉脱维亚“波罗的海 - 斯拉夫社会”组织领导人斯琴申科认为：俄罗斯文化在拉脱维亚只是非常浅的一层，而说俄语的人口是迫于想满足本身的文化需求才说俄语的，且说俄语的人口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文化价值。因此，说俄语的人口应当重新定位于说拉脱维亚语并且创造出高速发展的拉脱维亚文化。

波罗的海地区按照民族特性进行意识领域和政治团体划分活动的依据是社会差异。构成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当地工业基础的群体主要说俄语，很少遭受波罗的海地区文化移植，而且反对主权化自己的共和国。1989 年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演化为拒绝接受忠于“改革”的战

术演讲活动，并且拒绝接受“复兴社会主义”和拒绝接受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且形成了反苏的强硬立场。戈本人先被分离主义者利用，而当他们能实现自己的基本目的的时候，戈又成了他们的障碍。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种现象的典型事例就是立陶宛的共产党第一书记布拉扎乌斯卡斯。布拉扎乌斯卡斯开始被萨尤迪斯组织夸赞为民族领导人和民族英雄，后被“萨尤迪斯”组织给“消灭”了，被其贬到副总理的次要位置。波罗的海地区独立分子的政治战略重要部分是成立自己独立的共产党并且使其和苏共的关系联邦化。围绕这个问题，他们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及戈尔巴乔夫本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派领袖也主张：在苏联范围内各主权共和国应该有自己具有主权的共产党。

此理论的本质在于：要求各国共产党为本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掩护。因为如果没有各国共产党的掩护，民族运动者与莫斯科苏联的直接斗争会更困难，然而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在本质上已经是这些民族运动的共同组织者或者参与者。在开始的一段时期内苏共中央是鼓励各国共产党这么做的，苏共中央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民族运动加以控制。而结果是，这些各国共产党成了民族阵线一体化中的一员，因为民族阵营也许可共产党员的加入。爱沙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们甚至清理了共产党，并加入了民族独立分子阵营。而在立陶宛不得不采取措施分裂共产党，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共产党。在拉脱维亚，新一任的共产党领导机构在此理论的助推前是亲苏的，但在被鼓动之前共产党本身也已经遭到了国内政治一体化的严重侵蚀。

波罗的海激进化进程方向以及民族运动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民族运动领导机构被那些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极端分裂分子提供政治土壤的“摩尔人”取代了。类似情况发生在了萨尤迪斯组织内部以朗茨别尔基斯为首的转变为激进分子的一些组织的建立者和主要理论者。民族阵线领导人伊旺斯后来就曾经抱怨说，共和国的政权被一些没有责任心和不够聪明的人给霸占了。独立分子们的理论之一就是宣传各共和国经济独立理论，此理论主要是爱沙尼亚经济学家在 1988 年研究共和国经济核算制纲要时提出来的。此纲要是为呈现通过改革经济关系，使经济得以进步的模式和保证爱沙尼亚经济繁荣的手段。很快这个理论传到了爱沙尼亚之外并成了在国内经济领域的最新词汇。

《共和国经济核算制》理论的本质在于，使绝大部分苏联时期的企业重新归属于共和国政权，剩下的小部分为双方共同所属，并大幅度缩减共和国在苏联财政中的扣款比例，同时给予共和国自主开创外贸业务的权利。确立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海关界限，确立自身的货币单位等，也是对“核算制”的根本解释。在共和国经济核算制的问题上也发表有一些批判及反对的观点。有人指出：作为商品货币以及市场关系的主体应该是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应该是政权领域，也不是权力机构。在这场争论中，爱沙尼亚的学者承认，他们的经济核算制并非是“独立自主”，而是要求“经济主权”，是要求政治主权的步骤。

最后，波罗的海地区民族运动者打出了“回复共和国的国家独立性”的口号。他们打出此口号的理论依据是，他们的国家是被苏联兼并的。1989 年 5 月波罗的海地区全体大会宣布，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爱沙尼亚加入苏联不具备法律依据。

波罗的海模式为苏联其他共和国的民族运动者和独立分子树立了典型。当然，在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运动并不是“波罗的海地区的舶来品”，而是其自身发展的产物，是苏联全社会经济进程发展的产物。此外，来自波罗的海的影响可以从其他地区提出的口号、政治观念上体现出来。正是在波罗的海地区第一次形成共和国主权制和经济核算制等理念，并研究出了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其在语言和国民权力方面的政策。

波罗的海模式的影响是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的：通过波罗的海地区及俄罗斯理论家在中央刊物上发表支持波罗的海地区民族运动的文章；通过波罗的海地区议员们在各民族议会上和苏联最高委员会各次大会上的演说；通过与民族运动代表们的接触；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战线的积极分子向其他共和国宣传自己的理论，并多次拜访其他国家。

应特别指出的是，波罗的海地区有着特殊的历史命运、特殊的文化，是苏联框架内特殊的成分，对于改革有着更强烈的愿望。因此，该地区采取特殊的方式，可以超越其他国家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改革”的实验室。波罗的海模式从本质上也回避了其他国家的问题，其意义是：我们并不反对苏联和“改革”；我们所触及的地区只占面积广阔的国家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且我们的国家（苏联）并不会因为我们在苏联的国家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受到不利影响。事实上，波罗的海人会为建立民族主义的国际组织而真诚努力，并且他们明白，为实现自己的目

标，他们不得不获得苏联的支持，并最终造成了苏联的削弱。

四　苏联“民主派人士”助推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苏联“民主派人士”为波罗的海地区独立分子们提供了举足轻重的支持。在苏联的第一届民族议员大会上，民主派人士就已经准备联合一些力量与苏联中心和苏共中央进行斗争，并且已经分工：波罗的海代表们，除了一些“国际主义”者，都将自己的演说扩大到要求自己共和国独立的层面上，并且展开著名的“反迦太基宣传方案”，“民主派人士”就全民的政治事件进行讨论并拥护这一宣传。俄罗斯“民主派人士”接受了民族运动的主要观点，并且很快成为“倒苏”的最积极参加者。

国家的领导机关，除了出台一些固定的陈腐的“改革”框架下的口号，就没有能与“波罗的海－俄罗斯”联盟抗衡的东西。更令人惊奇的是：专家们曾不止一次地提醒过苏共中央，要警惕民族运动以及次数众多的且很有发展潜力的民族冲突的根源，防范其对苏共中央的威胁。甚至在突然爆发卡拉巴赫冲突（大约半年前就有人预言过该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后，一些切合实际的控制方案也被置之不理。显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领导团体已经深深受缚于传统的国际主义、民族友谊等的传统观念，就是不相信在国家内有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东西。至于“民主派人士”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则不能只以为夺取政权采取联合封锁的战略来解释，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由于对政治问题的不专业和出于对自由理念的追求，或者只是由于不懂民族主义和民主的不相容性。无论如何，几乎所有的在“改革”年代出台的有关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的或者无效的方案都被视为老的国家民族主义体系的方案。

苏共领导集体的立场在以下这些文件中得以体现：如《苏共第十九次全苏联盟会议决议》，苏共纲领性文件《在现实条件下党的民族政策》，在第二十八次苏共大会上通过的纲领文件《向人道主义化和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迈进》等。所有这些文件中，都无可争议地保证承认各民族和公民平等，承认允许民族主义的存在，承认各个主体间、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区的各民族间的族际关系。

比如，1989 年 9 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始终不渝地坚持不仅要将国家内部形成的民族关系纳入审议，也将各共和国及各主体的

民族间、全种族间以及各民族团体间形成的关系纳入审议》以及民族问题的《在原本意义上恢复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的方针。这里提到“在原本意义上”或许是因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相当具体的指示，但是问题在于，列宁对自决的定义不具备普遍性。列宁的原则指定是用来实现消除革命前存在的俄罗斯民族不平等及建立苏维埃国家的具体目标。

克服高度中央集权和一元集体制，保证共和国经济独立和政治形式上的民族自决被视为“实现民族关系”的主要方向。这里拥有所有或几乎所有实现分离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以上所提及的文件以最好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党的工作人员和党的科学的无能力，且在以上文件中相适应地评价了国家政治进程的性质，批判地看待了老朽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陈规旧矩和传统的消除原则问题的方式，以及应对现有政局的方针。

在当时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浪潮席卷全国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有新的民主民族政策观念来对抗以上两大主义时，苏联党的理论家和执行人员，似乎还都在遵循“政治原则上不可改变，‘列宁的民族理论’也不可改变”这个理念。

“民主派人士”的观点在原则上并不和苏共的决议相违背，只是他们的观点体现在了更为根本的形式上，也就是说，他们将民族自决纯化为了“直到独立”。问题不在于双方是谁抄袭了谁的理念。将民族作为社会和平秩序的主要结构成分的模式在理论上和心理上都占统治地位，不同的政治方针和方法论方针的支持者们站在了一起。爱沙尼亚追求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劳里斯京确认说：“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完全承认民族权力和完全主权的社会国家结构。”苏联著名哲学家布坚科也认为，应保障民族完全的权利，保障其权力占统治地位，包括获得无限制主权等类似的观点。“民族派人士”承认民族的“神圣权力”，至于如何分配莫斯科和加盟共和国权力的比重，只是反映在保留或消除苏联的不同的政治方针上，并非不同的方法论模式。

“民主派人士”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体现在第一届国家各民族代表大会的《苏联区际间民族议员团体行政方针》的纲领上。斯塔罗瓦塔夫在1989年9月16日于列宁格勒关于国家民主化运动的演说中更好地表达了这一立场。在演说中他直接表达说，民族是在苏联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础，因此民族的自决权应该被视为最“优先的”权力，“甚至比国家的主权理念地位还要高”。

五　苏联民族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同盟发起的武装政治行动最终摧毁了苏联

戈尔巴乔夫曾在《消息报》的采访中承认："我们和你们一起瓦解了苏联。首先，改革者在苏联国家和党的改革上延误了，并在经济上造成了混乱局面，人民开始不支持苏联和党的领导，这正好为那些利用了改革者们软肋的其他力量开辟了道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民族主义者的妥协与改革的拖延造成了国家的进一步分裂。

1991 年 3 月 17 日，戈尔巴乔夫曾尝试通过全民公决和通过新联盟合约的方式改革以保留住苏联，但是没有起作用。投票的内容包含的是重要的一些规章和原则：关于是否保留苏联；关于保留社会结构；关于联邦主体的主权性。所做的这一切本是为能取得积极的效果，但是由于表述不定性，各自都有权自行解释和理解。这样，投票刚一结束，乌克兰最高委员会主席就宣布，投票显示共和国居民渴望独立。"主权"的概念被完全曲解和搞混了，一些人理解为完全的独立，而另一些人理解为在苏联范围内有限的主权。因此，各加盟共和国关于主权的宣言和法律以及 1991 年 5 月 17 日的全民公决的结果都被随意理解。民族独立者们认为，应清理一元集体制，并不需要建立联邦制，而是清理掉国家本身，最好是在其废墟上再建立某种国家间的分散联盟。

民族分离主义促进了共和国的主权化，削弱了国家统治和国家经济，促进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从苏联分离，这三国为后来的一些共和国树立了脱离苏联的榜样。然而这并没有导致苏联的解体，这只是其局部的分离。苏联哪怕只剩下一个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也会依旧存在。危急时刻的关键话语权属于俄罗斯。俄罗斯的"民主派人士"对正处于复苏状态中的苏联彻底灭亡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俄罗斯的"民主派人士"由于自己的政治利益，不仅变成了其他致力于脱离苏联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同盟者，还成为摧毁整个国家（指苏联）最主要的实际力量。

俄罗斯非布尔什维克激进主义分子和加盟共和国民族精英们的民族主义分子联盟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的最大反对派，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完整性的最大威胁。反对派联合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夺取政权，相对于俄罗斯而言

是为非布尔什维克夺权，相对于其他共和国而言是为了民族主义者。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俄罗斯民族激进主义分子，在叶利钦领导下有步骤地从内部破坏苏联政权并且支持其他共和国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的俄罗斯激进主义分子，而苏联几十年间培育出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起了“战略性”的作用。1991 年 12 月苏联的解体，与其说是一些客观进程的表达，不如说是许多状况的汇合，这些状况最终导致了国内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同盟发起的武装政治行动。

皮霍亚：苏联的民族问题与解体

李琳编译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历史学家、苏联史研究专家 Р. Г. 皮霍亚（Пихоя Р . Г. ），发表文章《苏联为什么解体》[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基于大量历史档案材料，探讨“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作者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史的重大政治灾难。虽然80年代笼罩着全国的经济危机十分严重，但国家的巨大资源使人们相信能够成功地克服经济困难。可以确信的是：当时苏联国内没有任何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政治反对派别，它并不是由于某个唯一或最主要的原因而解体的。作者试图在历史和事实材料的基础上探讨苏联解体的全部原因、趋势和过程，认为是国家政权、政党、民族、内政、外交和经济、社会危机这些因素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产生“共振效应”，促使苏联解体。

一　苏联模式的历史问题

1. 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与民族自决权的内在矛盾

皮霍亚指出，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苏维埃政权在管理众多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民族因素、民族矛盾上升为反国家的突出矛盾。在1917年11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中宣布：

---

① Р. Г. 皮霍亚：《苏联为什么解体》，载《伟大强国的悲剧：苏联民族问题与解体》，莫斯科社会政治思想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422页。Пихоя Р . Г. *Почему распалс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Трагидия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тв. ред. 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 / Сост. С. М. Исхаков. —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2005. с. 404 – 422。

工农十月革命是在解放的旗帜下开始的，必须立即着手解放那些一直忍受着压迫和专制的俄罗斯人民，必须坚决、彻底地解放他们。新政权宣布，俄罗斯人民在分离、形成独立的国家前有自由的自决权。

1922 年前，苏维埃共和国就面临着怎样和民族地区建立关系的突出问题。1922 年 9 月 22 日斯大林给列宁写信："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状况：现有的中央和边疆关系，没有任何的秩序，完全是混乱的，让人难以忍受。这种混乱关系引起冲突、欺辱和愤恨，使所谓的统一国民联邦经济变成假象，全俄范围内各种经济活动都受到了阻碍或是瘫痪。在四年的国内战争期间，由于武装干涉，我们在民族问题上不得不展现出自由主义，我们在共产党中成功地培养了真正的、彻底的社会独立党人，他们要求在各个方面取得独立，要求谴责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干涉，认为那些干涉是来自俄罗斯的欺骗和虚情假意。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怎样才能不欺辱民族共和国人。而一年后，或许我们讨论的将是怎样才能使政党不会在此基础上破裂，或者是边疆区的民族力量能正式独立，而不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统一而工作。"

斯大林完全同意当时人民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雷科夫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内所有的政治经济作用应该是一致的、集中统一的，而独立只应该在文化和教育等方面进行宣传。

列宁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他依然坚持保留在《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中确立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的立场。他认为必须"保留并且加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点是确信无疑的。我们需要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为了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阴谋也需要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如果我们在东方出现的前夜，或是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现的前期，就因为对非俄罗斯人哪怕是一点点粗鲁或是不公正而破坏了自己的威望，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机会主义错误"。

这些政治争论的后果，确立了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享有退出苏联的自主权利。这样，在承认联邦主体主权和退出苏联权利的条约下，苏联产生了。在 20 年代，苏联沿着向单一制国家转变的道路迅猛发展。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成为实现中央集权的途径，随之阶级本质重于民族主义的原则、俄国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国际原则逐渐突出。政党国家权力垂直体系的构建未充分考虑民族特点，然而地方精英在实现自己作为联邦主体得到的法律权利上存在着潜在的危险。20 世纪末，中

央集权已真正实现，所有的民族反对派已被定罪为“国事罪”，同时在1936 年和 1977 年宪法中已正式确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结构。

2. 苏联民族政策的几个突出矛盾

不同的民族完全融合成一个新的统一的苏维埃民族共同体，是苏联民族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苏共二十五大上这样定义“苏联人民”：“我们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苏联人民，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牢不可破的联盟以及各民族和国家各地方间的友谊。”

这个概念的独特性不在于确定了国家属性、国家居民的公民身份，而在于它尝试在社会政治特点占优势的基础上赋予这个概念一定的民族特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家、哲学家鲁特科维奇写道：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社会关系体系下社会观点和民族观点的一致性。苏联民族是由社会主义民族、部落、民族团体构成的，其特点是民族、部落、团体、所有苏联人民的根本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致性。社会统一（也就是各阶级、社会团体、阶层的友好团结）和民族统一（也就是苏联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不仅反映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也反映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首先体现在马列主义理论的世界观，这种在劳动者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在本质上是国际主义的世界观。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是苏联民族统一的最高体现。

皮霍亚认为，这些政治理论方针的产生在当时是有其背景条件的：俄罗斯族的工人阶级对其他民族的帮助；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对立已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出现统一的趋势；俄罗斯文化的自然传播过程，经常被部分共和国居民认为是对自己文化的压制；“统一的社会共同体——苏联民族”特征的加强引起了反俄情绪；鼓励迁移，包括俄罗斯工人迁移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业企业，并没有促进国际教育，或是社会人口结构的平衡，而是造成了当时和后来最复杂的问题。

俄罗斯人民在此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得到权利，而且很多权利还被剥夺。这些被剥夺的权利分给了共和国内“名义上的各族公民”。吸引很大一部分联盟共和国居民留在苏联的因素是中央汇给共和国的补贴，这些补贴是巨大的。共和国间经济不平衡度逐渐增大。据官方统计，1975 年俄联邦在自己领土上所收的周转税剩余 42.3%、乌克兰为 43.3%、拉脱维亚为 45.6%、摩尔达维亚为 50%、爱沙尼亚为 59.7%、白俄罗斯为

68.2%、阿塞拜疆为69.1%、格鲁吉亚为88.5%、亚美尼亚为89.9%、塔吉克斯坦为99.1%、吉尔吉斯斯坦为93.2%、立陶宛为99.7%、乌兹别克斯坦为99.8%、哈萨克斯坦为100%、土库曼斯坦为100%。除此之外，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立陶宛、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100%的居民所得税进入国家预算中。

这种趋势反映在苏联1976年和其他年份的关于国家预算的法律中。对加盟共和国经济的基建投资速度使俄罗斯类似的指标提高了1—3倍。在一定意义上讲，1990年苏联境内各民族获高等教育程度的资料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在1万个人中有125个摩尔达维亚人、151个车臣人、163个乌克兰人、172个阿塞拜疆人、182个拉脱维亚人、188个格鲁吉亚人、190个俄罗斯人、207个亚美尼亚人、208个立陶宛人、212个印古什人、213个爱沙尼亚人、230个哈萨克人、257个犹太人、272个奥塞梯人、274个格鲁吉亚人、279个巴尔卡尔人、327个阿布哈兹人、354个布里亚特人。而当联盟中央无支付能力、无法为奉公守法的地方精英付酬时，分离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因此，在阶级和政党的立场下实现的苏联民族政策包括很多惊人的矛盾。

首先，是对加入苏联同时保留着退出苏联权利的共和国国家地位的认可及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共同体——苏联民族的单一制国家尝试的矛盾。这种政策在一定阶段引起了地区精英的不满。典型的代表就是1977年外高加索共和国在校订新的共和国宪法时，因试图删去“国语”这一概念而引起了群众性骚动。

其次，各国在共和国内拥有自己的制度，这种离心趋势的实现创造了政治法律和组织上的先决条件。

最后，对统一趋势的不满笼罩了苏联各个共和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包括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苏联出现了经济危机，苏联对共和国的财政补贴受到限制，这更加剧了各共和国知识分子对民族政策的不满。

3. 全民所有制的政治后果

苏联宪法规定，“苏联经济体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国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特有的财产包括土地、矿藏、水资源和森林资源。工业、建筑业、农业的基础生产资料、

运输工具、通信工具、银行、国家商业、公共事业和其他企业组织的财产都属于国家。此外，宪法还规定："任何人无权以个人发财为目的或是为了其他自私的目的使用公共财产。"

苏维埃体制的理论家们认为，全民所有制直接作用于社会阶层结构，社会主义的各个阶级和阶层都是权利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论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它丧失了阶级特征和阶级特点。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团体、阶层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并不断融合。劳动性质、职业的区别逐渐消失，社会变得越来越统一。

应当指出，苏联在创建社会同一性这条道路上取得了真正的历史性成果。其中不仅包括消灭以前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消灭非无产阶级阶层——贵族、神职人员、大批移民，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也包括实现农民农业生产集体化，使农民与个人财产及个人劳动所取得的利益相脱离。生产资料全民（国家）所有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对于集体农庄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以典型的国家封建主义形式将农民固定在集体农庄上。为了固定工作岗位，1937 年 3 月 17 日，通过了禁止集体农庄庄员不经政府允许，私自离开农庄的法律，1953 年前限制集体农庄庄园的法律体系一直有效，在个别地区这种制度甚至被保留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农业经济低速增长成为超经济强制体制所付出的巨大经济代价。农业成了苏联经济舰队中最低速的海船。苏联农业经济危机超过了国家总的经济危机，这迫使国家政治领导人从国外购买粮食，从而耗费了国家大量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国家对从国外购买粮食的依赖越来越明显，这是十分危险的。谷类饲料食物出口持续增长：在 1973 年购买了粮食生产产量的 13.2%，1975 年为 23.9%，1981 年为 41.4%。

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取消了生产者间的竞争。为了生产而生产，这是国家所有制带来的又一弊端。经济的社会需求部分，即消费品的份额占工业产品总量的份额持续下降。1928 年它占 60.5%，1940 年为 39%，1960 年为 27.5%，1980 年为 26.2%，1987 年为 24.9%。忽略经济利益和个人需求是全民所有制的不良影响。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治后果，有人提出应该在苏联经济中采用市场关系进行尝试，哪怕是最小的尝试，都遭到了严厉批评。而在现实生活中采用市场关系都因违反苏联《刑法典》

而被终止。

4. 苏联共产党精英政权的典型问题

苏联共产党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和有效国家政党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广泛存在于社会管理的各个阶层：学校、工厂车间、集体农庄各部门，甚至是中央政府各部、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加入苏联共产党是在军队、执法机关、国家机构和在所谓的“社会科学”领域里职务晋升的必要条件。

在数百万的苏联共产党中存在明确的职位等级。最高级别是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的部长会议，重要的各部，即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州委书记、边疆区委员会、联盟共和国、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也包括部长、副部长、部务委员会和联盟机构的成员。苏维埃机关、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部门、工业、科学、宣传和文化领域的最高代表是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和候选人。在此清单上可以加上掌握地方实权的阶层——州委、边疆区委员会、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下属部门管理人员。据皮霍亚估算，苏联共产党精英阶层人员在莫斯科不少于1000人，在整个苏维埃大约有3000人。在这3000人中包括大型企业厂长、地方军区和军队司令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等。这一时期精英政权的典型特点是闭关自守，它只是通过上级任命的方法不断扩大统治。

在一党制体系和对国家公民严格的政治行为监督的条件下，各个层级的选举，从镇苏维埃到苏联最高苏维埃，都只是所谓的形式主义。选举唯一可能的是一个候选人任一个职位，公民必须参与选举。精英政权的闭关自守，实际的不可撤任性和无监督性，持续控制政党国家的任命阶层，在勃列日涅夫管理时期被称为“对干部的关心”，引起了社会的极大不满。在国家机关内部、政党组织、社会中产生了诸多矛盾。

二　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

1. 浪漫主义的“共产主义”导致了社会信任危机

苏维埃国家致力于建立“光明的未来”，建立可预计和可感知的共产主义明天。共产主义到来的期限不止一次地被修改，在第二十二次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宣布：共产主义将在1980年前建立，这个理念被灌

输到涵盖整个苏联一代的小学、中等技术学校、政治形成体系下的大学的所有人的脑海中。然而在 1977 年新宪法中宣布：世界历史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在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

代替共产主义到来的是发达社会主义。从这时起，苏联社会的社会心理危机就已经十分明显。人们对光明未来的希望已经消失，而这种希望是苏联体系政治主张的重要部分，是传统社会空想观念的一部分。对社会主义优势的不断宣传引起了比较和对比。如果以前“部分的不足”可以成功地解释为是战争和帝国的包围的影响，那么对于战后的一代来说，老的论据已经失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对比。苏联社会所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浪漫主义的共产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潜在地不为民众所接受。

2. 失衡的计划经济与经济改革的失误导致了苏联经济破产

苏联的政治领导人未能利用好 70 年代国家发展的独特机会。当时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大幅度提高，价格上涨是由于近东地区（欧洲、日本、美国传统的原料基地）长久的战争冲突引起的。在西西伯利亚地区发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使苏联可以获得大量的额外收入。燃料在出口结构中的份额从 1970 年的 15.6% 上升到 1984 年的 54.4%，出口价款提高了 21.5 倍——从 18 亿外汇卢布上升到 405 亿外汇卢布，然而这些巨大的资源被以极其罕见的低效率耗费掉。为了使苏联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中国、日本保持军事平衡，巨大的资源被用于扩大军事工业。石油换来的美元用来购买国外的食品，维护政治体系。

苏共中央委员会 1969 年 12 月全体会议决定不进行经济改革。决议包括一些常见的决议：关于完善使用粮食储备和加强国民经济的经济体制；和破坏国家纪律、劳动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反对经营不善；加强纪律监督的号召；等等。国家越来越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在 1970 年到 1980 年期间，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量从 3.1 亿吨增长到 31.2 亿吨；天然气开采量从 95 亿立方米增长到 1560 亿立方米。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将燃料运送到西部，将所得的外汇用来为国家购买食物和高技术工艺的设备。

国家经济依赖于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这对于国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在 80 年代中期世界能源价格开始大幅度下降，这使苏联国家财政收入降低，国家出口额降低，经济和社会领域危机加剧。国家缓慢地，但越来越深地陷入经济问题的泥沼。

80 年代苏联社会各阶层、国家管理体系各阶层清楚地意识到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但如何进行经济改革还是不清楚的。安德罗波夫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尝试用行政方法解决经济问题，取得了暂时性的积极成果。人们希望戈尔巴乔夫能继续安德罗波夫的政策。苏共中央委员会 1985 年 4 月全体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表达了加速发展经济的观点，其中包括加快科技进步、改造国家汽车制造、生产新型汽车和设备、采用高工艺等。同时，大会提出分级管理经济、扩大企业权力、运用经济核算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明确集体和个人的责任和利益，宣布了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

在“十二五”计划期间（1986—1990 年）计划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 20%—22%，工业产品增长速度加快 21%—24%，农业经济增长 2 倍，并提出要在 2000 年前工业生产水平赶上美国。戈尔巴乔夫试图用管理苏联军事工业的方法管理国民经济部门；效仿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在部长会议中创建汽车制造局、燃料动力综合体管理局、化工局、社会发展局、工农综合体管理局；模仿军事验收，引入产品的国家验收，而这些改革尝试都因无效而遭到失败。

苏联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收支平衡是经济危机的外部表现。在 1981 年到 1983 年这个平衡的平均逆差大约为 13 亿美元，从 1985 年到 1989 年逆差从 78 亿美元增长到 251 亿美元。1991 年 6 月呈给戈尔巴乔夫的经济统计数据证明了财政预算的崩溃，苏联背负了大量的外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储备持续下降，甚至连必需品也满足不了。总统机关的工作人员通知戈尔巴乔夫：没有外汇资金从国外购买药品、医疗设备、粮食、仪器。外经银行已暂时停止支付以前签订的合同，甚至包括和法国、意大利、芬兰、塞浦路斯、美国的共产党的工业和贸易企业。

在 80 年代末，政府当局决定允许部分市场经济。在 1988 年 5 月通过了《关于合作社》的法律，这种经营方式开始迅速发展。在 80 年代末已经开始了潜在的工业企业私有化现象。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企业的法律使这种趋势合法化，以前的苏维埃经济特有的统一计划经济被彻底冲垮了。这样就出现了相当危险的矛盾——市场经济因素开始渗透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分配机构，不再是可操纵的。

财政金融领域的变化、商业银行网的建立冲毁了旧的计划分配体系。同时苏联财政经济体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中央集权制也被破坏。在共和国联盟内出现了加盟共和国银行，之后在自治州也出现了银行，并成功

地实现了独立于苏联中央银行的政策。

苏维埃联盟领导人在扩大的经济问题面前真的无能为力，领导人“意志力减弱”使得其失去了执行合理经济政策的机会。失衡的计划经济在 90 年代初，当苏联中央不得不与联盟共和国经济自给自足政策发生冲突时，达到极点。1991 年 5 月苏联经济破产在世界上已经是十分明显，只是苏联的公民还未察觉，因为他们当时正在为政治问题担忧。

3. 戈氏“外交新思维”的实质是“投降主义”

皮霍亚认为，如果说 1975 年签订关于暂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赫尔辛基协定》，标志着苏联取得外交巨大胜利的话，那么此后苏联外交领域进入了艰难时期：1979 年入侵阿富汗转变为艰苦的、不得人心的阿富汗战争，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不能再干预兄弟国家的内政；在和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基础上，为了积极进行外交，需要大量的资金。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没有资金和财力进行外交，为了尽力避免冲突，不得已提出了以反对武力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外交政策。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政党战友圈子里承认，建立在承认“全人类的价值”“没有武力和战争的世界”“为了保存文明进行对话和合作”的基础上的“新思维”政策是形势所迫的。1988 年 11 月 27—28 日苏联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总结发言。政治局委员担心，在戈尔巴乔夫允诺解除新的武装后，苏联的防御能力是否减弱等问题。叶戈尔·库兹明说：“老实说，我们现在都在回避这个问题（关于裁减国防项目预算），现在就连政党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应当首先使一切恢复正常。如果我们现在说，我们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多少用于国防，这将使联合国的行动失去意义。所以不管在哪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只有在那些将一半财政都用于军事的贫穷国家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不得不将在“新思维”被迫性下的外交政策，称为投降主义政策。在关于全人类价值的说法幌子下，苏联迅速失去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失去了同盟者，只剩下了竞争者和反对者。戈尔巴乔夫外交的肤浅简直使谢瓦尔德纳泽感到震惊。最重要的协议既不是用国际条约确立的，也不是用外交家常用的会议记录确立的，也没有签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和由于华沙条约解体而出现的苏联国家间的相互公约。时尚

做法——“不穿外套的会面”在戈尔巴乔夫的方案中变成了“无外交部成员的会面”。因此，在国家档案馆中没有近些年来苏联外交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创造了一种国际背景，使苏联的民族冲突国际化，推进了地方精英实现“分离权”。

4.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失误是“全民自由选举”

为了扩大改革的社会基础，寻找勃列日涅夫时期之后的新型管理人才，戈尔巴乔夫实施了人事政策的彻底改革，即在党内选举或是在议会选举中实行自由选举。1987 年 1 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确立了实行自由选举的政策。

到 1990 年时苏联共产党总共有 1920 万成员和候选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35.4%）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些人具备较高的政治活动能力。苏联共产党当时还拥有 43.3 万个基层党组织，79.9% 的基层党组织人数从 3 人至 45 人不等。当政党体系从上向下运作，赋予基层党组织以国家政策传播者的角色时，这个体系便是可操纵、受支配的。

在戈尔巴乔夫新的、可以实行自由选举的条件下，地方利益、民族利益、工会利益和区域利益被提到首位，多年来宣传的社会同一性不存在了。正是在聚集了最为活跃的政治人物的基层党组织内推举出了那些能以最好的方式维护这些利益的候选人。政党机构尝试恢复统治，但以失败告终。政党机构变得士气低落，也开始适应新的现实。

20 世纪初开始的第一次全苏联政党大会的代表是从苏联共产党基层组织中选举的，大会形成的政党纲领也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1988 年举行了第十九次全苏联政党大会，通过决议，要重建在 1936 年宪法中废除的人民选举代表，将其变为国家最高政权机构。事实上，这意味着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数百万的苏联共产党迅速瓦解为民族分裂政党和民族分裂运动。

苏联共产党内部情势急剧变化。选举动摇了国家任命官员的管理方法的基础，在 1986—1989 年间，82.2% 的区、市党委会的书记被更换，90.8% 的州委员会、边疆委员会和共和国政党机构的党委会的书记被更换。在 1989 年 4 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上，政党机构对自己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起论战，当时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反对者，然而在苏联共产党机构内的不满并未减弱，而是继续迅速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的共和国组织成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源头，为在苏联及其共和国内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后不久形成的“主权检阅”创造了条件。

由自由选举开始的政治改革是政权改革的继续。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考古学”、他的“恢复列宁时期的准则”的号召在恢复苏维埃大会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然而这些大会的代表已经完全是在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按照另一种选举准则选举出来的。

5. 民族自决权与过早的全民投票最终摧毁苏联

当改革削弱了国家政权，民族问题使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之中。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1986—1988 年在纳戈尔内 - 卡拉巴赫、阿布哈兹、南奥塞梯、雅库特、阿拉木图、杜尚别、费尔干纳、摩尔达维亚都发生了一系列民族分离事件。1986 年 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布成功解决了苏联的民族问题。在 1988 年 2 月苏共中央委员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到了苏联各民族和民众民族意识的增长，以及民族感的外在表现。

苏联最大的民族冲突扩展到外高加索，其原因是关于纳戈尔内 - 卡拉巴赫（阿塞拜疆领土上拥有自治州地位的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地位问题。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要求统一的浪潮在 1987 年已经开始，在 1988 年 2 月达到最大规模。与此同时，整个国家内迅速出现一些社会联盟组织，他们将维护历史传统、本国语言、辩论俱乐部等看作自己的任务，这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会联盟组织成了未来政治运动和政党的核心。

1989 年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公开选举为在整个苏联形成人民战线、民族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同时也使民族矛盾浮出表面。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内迅速传播，卢赫民族独立组织在乌克兰迅速壮大，卡拉巴赫运动在亚美尼亚迅速传播。苏联共产党在共和国内分裂，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共产党明确表示独立于苏联。从 1990 年起在苏联共产党内开始形成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

1990 年进行了联盟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很多共和国内大部分代表坚持通过了关于自己的共和国独立于苏联的国家主权的宣言。1990 年 3 月 9 日在格鲁吉亚，3 月 11 日在立陶宛，3 月 30 日在爱沙尼亚，5 月 4 日在拉脱维亚，6 月 20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6 月 23 日在摩尔达维亚，

7月16日在乌克兰，7月27日在白俄罗斯都通过了主权宣言。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权的宣言。

1990年3月15日人大代表非常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联总统，同时保留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位。苏联总统职位的出现是共和国的先例，这为政治主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苏联的分离过程被赋予了正式的法律效力。

面对日益扩大的国家危机，苏联领导人试图巩固正在解体的苏联。1991年3月17日进行了关于保留苏联的公民投票。由于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大部分居民没有参加这次投票，76%的国家居民表示支持保留苏联。可以确定的是，71%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同意保留苏联，但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居民、一半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反对保留苏联。

苏联内的主权化过程是从苏联国家政党结构和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地方精英的分离和公开对立开始的。在此过程中1990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成了标志性事件。这次选举为共和国创造了强有力的总统，开创了“主权检阅”（后来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批判这一制度）和未准备好的、过早的公民投票，将最复杂的问题——苏联的未来看作是政治冲突的主体、矛盾的源泉。

1991年政变使苏联共和国精英感到惶恐，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要求调查和惩罚那些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要求主权和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苏联政治机构的“主血管”——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破裂了。

乌克兰在1991年8月24日宣布正式独立，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在8月27日，阿塞拜疆在8月30日，乌兹别克斯坦在8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在8月31日，亚美尼亚在9月23日，塔吉克斯坦在9月9日，土库曼斯坦在10月27日相继宣布独立。叛乱分子摧毁了苏联共产党，摧毁了苏联国家体制最基本的制度。12月5日总统克拉夫丘克宣布，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乌克兰退出形成苏联的1922年联盟条约，苏联自此不复存在。

皮霍亚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每一步都造成了消极影响。自由选举破坏了官员任命制，使国家政体实际上变得不可控制；引进苏联总统的职

位，成为联盟共和国的先例，提高了联盟共和国的国家法律地位；决定苏联是否存留的全民投票为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退出苏联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七篇

苏联解体篇

是谁、是怎样摧毁了苏联？

——依据档案文献还原苏联解体过程

阿·萨宗诺夫主编　侯艾君编译

侯艾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从1991年至今，学界已提出种种观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僵化腐败、十月革命“原罪”、戈尔巴乔夫改革、民族问题失控、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等），每一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解体的背景，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在苏联解体20周年到来之际，一些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首次公布，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苏联解体问题。2010年，俄罗斯社会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萨宗诺夫编撰的《是谁、是怎样摧毁了苏联？——依据档案文献还原苏联解体过程》一书出版。该书作者曾亲自参与过当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参与了戈尔巴乔夫－卢基扬诺夫班子与1990—1991年间宣布了主权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团队的谈判筹备。新公布的文献资料可以进一步证实，苏联解体是苏联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联手（具体来说，包括西方政治家、西方情报部门、苏联国内的代理人等），最终将苏联摧毁。该作者在著作中整合了大量原始资料文献（约400份）：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等人签发的文件，此外，还有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总统，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等签发的文件。400份文件中，有三分之二是之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苏联解体进程。所有这些文件都可以表明：苏联解体并不是一个自然

的政治进程，绝不是寿终正寝，而是被苏联国内外势力摧毁的。具体来说，是苏联上层政治精英，包括苏联领导人上层；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许多知识界和政界的精英；等等）有意无意地与西方配合，最终将苏联搞垮。

从萨宗诺夫的文献集可知，苏联是被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上层，以及西方共同摧毁的。这些上层人士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雅科夫列夫等人；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民主派波波夫、索布恰克、穆拉绍夫、盖达尔、布尔布里斯等人。

一 1989 年俄罗斯民主派的分裂主义动向

到 1989 年，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与中央的斗争已非常尖锐，分裂主义趋势日趋明显。反对苏联的力量已经在蠢蠢欲动。1989 年 9 月 16 日到 18 日召开的莫斯科选民俱乐部联合会（МОИ）以及莫斯科选民协会（МАИ）会议上，莫斯科市长波波夫，以及穆拉绍夫、克莱科等人民代表提出了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进行无情斗争的措施，实际上已经在为夺取政权而密谋，并商讨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战术。

会议包括如下议程：

1. 讨论戈德良、伊万诺夫的情况。

2. 对“劳动者联合战线”的态度。

3. 莫斯科选民俱乐部联合会（МОИ）章程。

4. 莫斯科选民俱乐部联合会（МОИ）以及莫斯科选民协会（МАИ）联合的问题。

5. 给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的电报。（关于取消“劳动者联合战线”和“工人部队”）

Л. А. 波诺马廖夫发言：要研究各地区、各市乃至整个共和国的问题。要搞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推动将这些人提拔为候选人。选举出这些代表之后要保持联系，如果他们工作不能令人满意，那就召回。

Г. Х. 波波夫发言：现在局势已由危机转入灾难。体制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尤其是贸易体制已经不发挥作用。现在有一种危险趋势：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惊慌失措，主张牺牲民主，这会导致内战或专政。如果是进步力量获胜，要么是叶利钦专政，要么是波波夫专政，要么是戈德良专政；

如果是保守力量获胜，要么是戈尔巴乔夫专政，要么是利加乔夫专政，要么是雷日科夫专政。我们有机会获胜。但是保守力量将会强烈反抗。以前他们不相信，人民代表会有权利。现在已经与数十万人发生了冲突。必须考虑到俄罗斯联邦的每一个人民代表。他（指的是人民代表）应该明白，如果他不按照“跨地区小组”说的投票，那么，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完全掌控选举。开始将居民中的自己人选到选举委员会。

像以前一样，要将尽可能多的自己的人民代表候选人推到区委员会，然后取消候选资格。在“跨地区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人民代表联合会助选；“消息”出版社帮助办报纸；莫斯科“跨地区小组”提出叶利钦担任俄联邦总统；而叶利钦选择他应该在哪里。他将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在莫斯科挑选一个集会地点，取代卢日尼科夫和各区的集会场所。波波夫提出在两个方案中选其一：（1）波兰模式；（2）匈牙利模式（波波夫主张匈牙利模式）。

波波夫：要将商业系统彻底瘫痪到一无所获的地步，以造成民众的普遍愤怒；这样就会造成莫斯科的工人总罢工，然后完全实施凭卡供应制度。剩下的商品（供应卡之外的商品）按照成本价销售。

A. H. 穆拉绍夫：应该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开立第二个账户，资助“跨地区小组”。

A. H. 克莱科：应该争取废除州大会，候选人计划的第四十二条应该废除；最高苏维埃已完全是我们的，没有一部法律的通过不是依据机构的指令，因为最高苏维埃不允许；在多候选人的选举制下，少数派代表将得以通过。

Ю. A. 列维金：策略一，要限制商贸；策略二，清除区大会，因为他们有巨大的权力；策略三，将选举委员会完全变成一个技术性的委员会；策略四，对所有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做工作——每个人单独做工作。

H. B. 伊万诺夫：为了夺取政权，任何政治斗争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必须争取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实施多党制（除了种族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政党）。要巩固民主少数派的权利；明确权利；要成立一个援助“跨地区小组”的“联合会”基金会；把自己人安插到对手的选民俱乐部；如果十分之一的人提出问题，其余人反对，那就应该对问题进行公

决——这样做是不让人民代表大会运转。将代表构成问题提交全民公决，以免其继任 5 年。利哈乔夫地位的持续加强令人不安（40 天之后将公布戈尔巴乔夫在伊若尔工厂的会晤，这对利加乔夫有利）；必须改选政治局的全部成员；我们必须改变社会；必须尽快成立新的政党；必须尽快召开非常人民代表大会。

C. C. 奥波利欣（彼得罗夫区）称：支持“跨地区小组”，重视青年和工人。

扎列诺夫（“改革”委员会）：所有人都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党的机构。所有战线都与莫斯科选民协会联合。筹备全俄选民代表大会。

Б. Н. 鲁布佐夫（来自克拉斯诺达尔市，“匡特”非政府组织）：我带来了一堆文件，可以败坏人民代表斯科科夫的声誉。已经和外国记者谈过了。

沙巴特院士：人民对批评已经厌倦；必须改变看法。要用自己人填充对手的选民俱乐部。

法捷耶夫（来自无产阶级区）：我和两位来自西欧的政治活动家谈过，他们说，如果不联合起来，我们就输了。在选举运动中，不打架、不破坏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还会流血。谁会保护我们免受诉讼？谁会替我们支付罚金，保护我们不受法律制裁？

（主席团）：我们有钱，可以支付罚金。还有一个 30 名法官的名单，能够保护我们的落难者。不怕坐牢 15 天或 15 天以上的人会推动我们的事业。

C. E. 特鲁别：叶利钦、扎斯拉夫斯卡娅、萨哈罗夫已经成立了援助跨地区小组“联合体”的基金会。《人民代表报》和《选民之声报》紧密合作。

C. E. 伯克赛尔：莫斯科选民俱乐部联合会（МОИ）已经把有民主情绪的候选人搞清，支持几位候选人，表达各种情绪。要教育普通选民。争取同人民结盟。

格林科：（“民主联盟”，鲍曼区）要行动。不搞崇拜。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大厅里，在列宁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组织者的雕像下集会？

别列沃德内依·弗拉基米尔（来自哈尔科夫）：只支持那些主张私有制的候选人。好的共产党员就是没有权利的共产党员。

在莫斯科的塞瓦斯托波尔区，在区党委每周一次集合开会，筹备成立

各种政党（在民主平台代表大会之前成立）。

谢苗诺夫（“民主联盟”）：联合起来，因为“民主联盟”的制定者在自己的纲领和行动中都利用了“人民阵线”“俄罗斯人民阵线”和“莫斯科选民协会”。

伊萨耶夫（“民主联盟”）：“莫斯科选民俱乐部团体”（МОИ）应该警告人民代表们，如果他们通过了反动的法律，莫斯科就会爆发罢工，选举将遭到抵制。

亚历山大·阿布拉莫维奇：“天鹅绒革命专家”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新专家”俱乐部（捷尔任斯基区）。重要的是要对社会要求产生；这些社会要求将会提出罢工。要创造罢工的环境。引发产生社会要求的必要条件。立即往罢工地区送去一揽子决议（这是给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州和区都应该有自己的法律和宪法（也就是说，要把俄罗斯肢解为单独的几个国家）。把萨哈罗夫在《星火》杂志的发言作为基础（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

列奥尼德·格力高里耶维奇·施马特克：与上述同一个问题。

扎库尔卡耶夫：执行团结工会的战术。散发材料，塞入每一个邮箱[①]。

如萨宗诺夫所指出，这其实是对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宣布了内战。这份会议记录直到一个月后才到了戈尔巴乔夫手中，戈尔巴乔夫等人显然也明白这种危险性。戈尔巴乔夫责成梅德韦杰夫和克留奇科夫：“这说的是什么？请组织相关工作，予以查清。戈尔巴乔夫。1989 年 10 月 17 日。”这份会议记录能够证明这些所谓的民主派的反人民本质。

在 1989 年，苏共中央领导人曾私下谈论过莫斯科严峻的粮食形势。商店里没有面包，限时销售；粮店里货架都是空的。这些都是针对戈尔巴乔夫而人为制造的紧张局势，为了挑动苏联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的不满情绪，起来反对政府。同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城市的市长波波夫和索布恰克等人在国务委员会上请求戈尔巴乔夫帮助解决粮食问题，而实际上在某个地方，储存着大批粮食。后来，波波夫在电视访谈中曾承认，当年他曾致电加里宁州（特维尔州）领导人，不要发送肉类往莫斯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44 – 47.

科[①]。这些情况能够表明：民主派试图运用反人民的政策，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

二　1990年俄罗斯、乌克兰政治精英的分裂活动

1990 年 3 月 17 日，苏联就是否保持苏联而进行全民公决，公决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苏联国民都希望保留苏联；而与此同时，一些政治精英已经开始密谋摧毁苏联国家。

1990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开始了摧毁苏联国家的进程。1990 年八九月间，俄乌之间准备签署一份双边条约，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同戈尔巴乔夫的团队会谈时，诡称同意保留苏联，同时提出：要在俄乌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条约的前言中写上：“……发展独立国家的联合体。”俄乌的举措实际上已将苏联的基础摧毁[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无视苏联民意，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成为消灭苏联的倡导者。1990 年 11 月 19 日，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签署条约。按照该条约文本，该条约规定：“双方打算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国家间关系，互不干涉内政，放弃运用武力或经济压力的方法，用协商的手段以及其他国际法公认的原则和规范调节争议问题。”条约规定：

> 双方互相承认对方是主权国家，并有责任放弃可能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的行动；
>
> 住在一方境内的公民要想获得另一方的国籍，需要依据双方的国籍法，通过协议加以调节；
>
> 每一方都要按照国际人权规范，确保其境内的另一方的公民以及无国籍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自由；
>
> 双方将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环保、科学技术以及人文领域发展民族和国家间的平等互利合作并订立相关的合作协议；
>
> 双方互相承认并尊重对方现有的边界范围内的领土完整；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48.

② Тамже., с. 36.

承认必须建立集体安全体制，包括两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在平等基础上经由一些合作机制采取共同活动：在外交领域协作；在培育和发展共同的经济空间、全欧市场和欧亚市场、关税政策方面合作；管理交通通信体系，包括卫星通信和电话通信；在本国境内的环保合作——包括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的后果最小化，参与建立生态安全的国际体系；移民政策问题；与有组织犯罪和国际犯罪作斗争；

国家财产的法律地位、法人的财产和一国公民在另一国境内的财产问题，由相应的协议加以调节；

双方的经济关系通过赋予对方最惠国地位的协议加以调节；双方确保经济、贸易和科技关系的发展；具体的经济关系、商品交换机制以及联系和运输问题通过政府间协议调节；双方不能单方面采取经济措施，令另一方动荡或损害其利益；

交通运输问题的条件和规则通过专门的协议确定；

双方交换全权代表处的规则及代表处的地位由专门协议协调；

本条约不涉及缔约方对第三国承担的责任和与第三方签署条约，参加条约规定的双方共同活动领域和集体安全体制；

为了实现本条约，双方认为必须设立一个常设的议会间合作委员会；等等。本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如果在有效期满之前六个月，任何一方均未提出希望废止该条约，条约将自动延期十年[①]。

实际上，随着俄乌两个加盟共和国条约的订立，苏联中央已经被架空；而1990年3月17日通过的全民公决中体现出来的苏联民意已经被无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的做法表明：它们都希望尽可能多地给自己夺取权益。俄罗斯、乌克兰政治精英毁灭苏联国家的举动违背了苏联全民公决结果，违背、叛卖了苏联公民的意愿。就条约的内容来说，其实已经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签署的条约，这是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宣布独立后的又一分裂步骤，并通过俄乌两国条约而使这一事实强化。这一举措本身摧毁了苏联的基础。俄罗斯是最大的加盟共和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36 – 42.

国，是苏联的核心，而乌克兰则是最靠近西方的加盟共和国，工业基础雄厚，仅次于俄罗斯。两个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率先脱离苏联中央的控制，无疑会导致苏联的分崩离析。

三　1990 年 7 月底到 1991 年 12 月

在这个阶段，由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等人的过错，成为苏联总统制和整个苏联解体的重要阶段。1990 年 7 月底，主张保留苏联和反对保留者的斗争尖锐起来。以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任命的全权代表团为一方，以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两个共和国分别为另外一方，展开了多次谈判，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都表明自己坚决对抗苏联中央的意志和与苏联中央之间的严重矛盾。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方面看来，“中央”概念指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总统和苏联各部，试图瓜分其权力和设施；在谈判进程中，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遗余力地从苏联中央为自己争取更多权益。

俄、乌的做法甚至令其他加盟共和国感到不安（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它们看到，叶利钦试图取代戈尔巴乔夫，而俄罗斯联邦试图取代苏联中央，俄联邦方面试图破坏、分割统一的经济、外交、社会、政治、民事和军事空间，给自己争取最大的份额。俄罗斯联邦代表哈斯布拉托夫首先提出：应在新联盟条约中明确划分“联盟国家”或“加盟共和国”直接管理的对象（国防、国家安全、环保、核能），以及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共同管理”的对象：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国防工业和宇航领域、保护国界、税收、金融信贷政策等。同时俄联邦还提出中央应转交部分不产生新财产的财产[①]。哈斯布拉托夫主张联盟中央只管理个别部门，总统任期为 3 年。其表述的立场其实可以归结为：最大限度地剥夺联盟中央的权力，甚至使其陷于无权的地位；而且，在谈判过程中，加盟共和国方面的立场却越来越强硬。

一、苏联中央与俄罗斯的谈判及其后果。1990 年 8 月 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工作组磋商会晤纪要》中涉及的会谈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55.

成果：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组领导人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委员会主席塔拉泽维奇；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工作组领导人；还有库德里亚夫采娃是苏联人民代表，也是苏联科学院副主席，是联盟条约草案筹备的学术保障组的领导人。

双方同意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进行磋商；新联盟条约的筹备已经进入实际解决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共同努力，推动各个苏维埃共和国在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巩固国家统一；强调，必须考虑到，大多数共和国已经通过了主权宣言；在磋商过程中，讨论了未来新联盟条约的构想性、组织性问题和一些具体问题；讨论了俄罗斯联邦准备转交给苏联中央的权力；并强调说，这并非唯一的决定，而是方案之一；俄罗斯联邦工作组提出了苏联直接管理（在加盟共和国的监督之下）的设施和对象：环保；国防；国家安全；核能。共同管理的领域包括：航空和铁路交通；海军；国防工业领域和航空航天领域；加盟共和国边界防卫；关税；货币信贷政策。

同时还涉及了被管理设施的财产问题；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方面认为，转交苏联中央管理的设施不应该成为苏联中央所有；用于实现联盟任务的财产和资金仍然按照份额摊派（混合或合资的）。

此外，经过讨论，双方达成协议：提出的联盟条约的一些原则应该进一步详细研究：加盟共和国在国防领域的监督权，建立加盟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可能性；共和国在保障国家安全、参加边疆保卫方面的监督功能；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在外交活动领域的权力划分；共和国和苏联中央在权力和财产划分的关系问题（包括在能源领域）、制定联盟预算、建立全苏市场的法律基础；划分苏联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在保护社会秩序和司法方面的权限；等等。

双方同意就上述问题应该成立一个专家组；同时提出一种情形：中央未经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磋商，通过一些法律法规，触及加盟共和国的利益和主权；双方同意继续进行磋商工作[①]。萨宗诺夫本人也是苏联中央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方面和乌克兰方面谈判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这些谈判仅仅是确保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与苏联中央的关系没有马上尖锐化。俄罗斯和乌克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54 – 57.

兰都竭力褫夺苏联中央的权力和管辖对象。叶利钦则用一切手段，试图将戈尔巴乔夫取而代之，用俄罗斯取代苏联。叶利钦饕餮的胃口令其他加盟共和国感到不安，尤其是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在与萨宗诺夫交谈时表达了不安。

在谈判过程中，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都表示：不打算摧毁苏联，只是为其补充民主制成分，但是实际上已将统一的经济、财政、外交、政治、社会和军事空间摧毁。在谈判过程中，哈斯布拉托夫首先提出：在新联盟条约中要有一款“联盟和共同体管理对象”。其中要写入：“联盟国家同意联盟或共同体直接管理对象、管理权力机构是如下领域：环保、国防、国家安全、核能。”然后，共同管理的对象是航空和铁路交通、海军、国防工业领域、航天部门，联盟国家的国界保卫、海关、货币信贷政策。

在谈判过程中，哈斯布拉托夫还表达了一个想法：要有类似总行政部门的一个共同管理机构。总行政部门由譬如联邦制国家的总统领导；而总统由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议会选举，任期三年，无权连任；总行政机构由总统领导，包括在联邦内外主管国家间关系的国务秘书、对外联络部长、安全局长、交通部长、能源部长、农业部长、环保部长、国务部长——共同体总统的私人代表。这样的总行政部门可以编制预算，并在共同体的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这样就体现了叶利钦主张的给共同体总统留下个别部门作为管理范围的思想，实际上是使中央处于无权的地位[①]。而随着一轮轮谈判的进行，主权国家的立场日益强硬。这就意味着：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已经准备在近期计划中完全摧毁中央和联盟国家。

二、苏联中央与乌克兰方面的谈判及其后果。1990 年 8 月 13 日，以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的代表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表团进行谈判。乌克兰代表团领导人格里涅夫的发言表明了乌克兰方面对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的态度：强调这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并提出两条原则：其一，建立联盟的基础，不是自上而下地划分权限；其二，区别对待各加盟共和国。新联盟条约的首要基础是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入联盟的应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拥有主权的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具有一切主权国家机制的国家。它们是国际法主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59.

体，它们能够签署双边或多边条约，以将一国无法胜任的那些功能结合起来[①]。副总理福金强调说，必须研究一下联盟，一个没有垂直切割的国家组织；“他不是凌驾于共和国之上，不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而是在同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各共和国要真正决定一个最主要问题：中央应该是什么”[②]。接着福金的发言，格里涅夫将问题具体化为“要不要中央”的问题。就此，他特别强调：“……在这一计划中，经常发挥职能的中央管理核心是没有的……实质上，在这一计划中，也没有国家组织，因为在这种活动计划中，这种国家组织也不需要……”

福金还强调，必须在诸如划分财产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新成立的国家组织（假定称之为“联盟”）只是个虚拟的概念，“联盟”本身没有财产，但是，在各加盟共和国在向联盟中央转交一部分权力的时候，同时也就向其转交权力，令其有权享有一定部分的人民财产。

此外，“每个共和国无疑还应该有自己的军队，否则便不是国家；我们将确定未来联盟的功能。或许，国家预算的必需性也将下降。国家预算多半会变成某种类似支出明细表一样的东西”。柯秋巴表示：或许，宪法也已变得不再必要，如果条约——新主权国家条约——起草得正确的话[③]。主权国家在加入新联盟时，应该保留其自身的货币、财政体系和军事机器等[④]。乌克兰方面将其最初立场一直坚持到 1991 年 12 月 8 日：“主权国家加入《条约》，将带着自己所有的机制：自己的银行、金融、货币体系，军事机器等”；这些国家是国际法主体，能够订立双边或多边条约。为什么呢？这样做是为了让一些功能实现一体化：因为有一些功能是一国不能胜任的，如环保、宇宙开发、太空研究成果、战略防御和进攻等。在乌克兰代表看来，所谓联盟条约的意义就在于：主权国家授权联盟中央以完成上述功能的权力。

乌克兰方面的代表 B. M. 皮里普丘克认为，现有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代表大会成员、苏联人民代表自动成为未来的主权国家中的议会成员。B. M. 皮里普丘克在评价 1922 年的联盟条约时认为：在其存在的 72 年中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绝对强大的联盟中央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不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63.

② Тамже.

③ Тамже.

④ Тамже.

需要这样的联盟[①]。乌克兰方面还表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最危险的是利用税收……当然，我们都被原来存在的体制吓坏了，那是一个单一制国家的方案，我们至今还在与之打交道。"乌克兰的这些步骤其实是在逐步消灭苏联国家组织，摆脱联盟中央。乌克兰的立场写入了随后通过的《别洛韦日协定》中。在《独联体成立协定》的第十四款中规定：苏联机关在独联体国家境内停止活动。

三、苏联中央与白俄罗斯方面会谈及其后果。1990 年 8 月 6 日，白俄罗斯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之间进行磋商性会晤，白俄罗斯代表团以 В. И. 肖洛东诺夫和人民代表 В. Н. 扎布洛茨基为领导；苏联中央政府方面以 Г. С. 塔拉泽维奇为领导。

双方在一些原则和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双方都同意进行无先决条件的磋商；同意在扩大主权和权力的基础上，将新联盟改革为一个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同时，强调在筹备新联盟条约的时候，要结合当代现实和条件以及保持对 1922 年苏联成立时的条约继承性。

白俄罗斯代表团领导人 В. И. 肖洛东诺夫在第一次发言时表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一致赞同成立联盟。但是，条约不是与联盟签订的，改革后的条约将是主权国家的联盟[②]。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起草的条约草案中，包含着联盟条约的内容。同时，在草案的前言中强调了新条约对 1922 年条约的继承性，但是，强调要"对国家机制的深刻民主化"，筹备新联盟条约与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分配全苏和共和国财产的问题紧密相关。В. И. 肖洛东诺夫从一开始就强调：主权宣言是摧毁体制的宣言，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白俄罗斯来说，最主要的事情是：获得权力，明确白俄罗斯共和国在联盟中的国家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新联盟不能称为苏联[③]。

白俄罗斯方面坚持要严格地履行《主权宣言》的条款："……支配所有财产，土地和底下，解决白俄罗斯面临的主要的国家问题……我们可以授权中央，也可以通过监督，收回白俄罗斯授予中央的 32 项权力。"

对于正在发生的建立市场经济的进程，白俄罗斯表示："今天，叶利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64.

② Тамже., с. 54.

③ Тамже., с. 68.

钦和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强加意志，建立市场经济。正是他们两个人开始订立某些协议，各加盟共和国对此现象非常嫉妒。”这是表明白俄罗斯不愿意服从另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意志，同时也是对叶利钦向全苏联范围伸手争夺利益感到恐惧。В. И. 肖洛东诺夫称：“……莫斯科丧失了自己的权力，而叶利钦承担起来。”白俄罗斯主张对联盟的权力要区别对待，白俄罗斯的态度与乌克兰不同，主张给未来的联盟保留一些主要权力：联盟宪法、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保留边防和铁路部队，组织和管理海关，保留联盟中央组织国家安全和国防的权力、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保留保险、经济、社会基金等。但同时也提出要建立白俄罗斯的本民族武装力量[①]。

白俄罗斯的许多提议都得到支持，还有一些问题则需要在专家层面继续研究：苏联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法律文件的相互关系；法制基础；苏联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各机构法律文件方面争议的审核机制；苏联和白俄罗斯共和国财产分配，银行体系、联邦收入的调节问题；市场关系的法制基础的建立；苏联与白俄罗斯在外交和外贸活动、海关方面的权力分配问题；苏联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在国防工业管理方面的权力划分，以及组建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可能性；苏联国籍和白俄罗斯国籍的相互关系；苏联和白俄罗斯在司法、检察、社会秩序保护、与犯罪作斗争方面的权力划分；等等[②]。

但是，后来，在《别洛韦日协定》中，叶利钦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一起取消了苏联中央的一切权力，拒不承认戈尔巴乔夫有权担任苏联总统。

每谈判一轮，按照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及其团队的倡议单方面摧毁苏联的危险就不断上升。1990 年 8 月，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中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磋商活动，其实是各个加盟共和国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背着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在进行拆毁苏联的活动。连哈斯布拉托夫、格里涅夫（乌克兰代表团领导人）、普什卡什（摩尔多瓦共和国代表团领导人）等人也都不避讳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及总统办公厅的人们都意识到了，并试图改变他们的态度。苏联中央与吉尔吉斯代表团的谈判准备较为充分。吉尔吉斯代表团是唯一主张保留联盟中央，而且承认联盟是苏联继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М.，2010г，с. 69.

② Тамже.，с. 67.

承者的共和国；但它要求作为莫斯科的一个联邦区加入联盟，而且要有自己的财产和保留全部管理机构。并且基本上主张新联盟应该实施联邦制——但是，许多加盟共和国要求实施邦联制[①]。

四、其他共和国的态度。大致说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要求独立最为强烈，要求摆脱中央；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感情上升，否定当年苏联归并三国的合法性，因此，要求分离最为强烈。中亚 5 个加盟共和国则相对更愿意保留中央，留在苏联；高加索三国则态度又有不同。但是，随着苏联高层政治斗争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其他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也加入到了摧毁苏联中央的活动中。摩尔多瓦代表团领导人 В. С. 普什卡什认为，完全保留了每个主权国家的经济、政治主权的所有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各主权国家多边协议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中央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我们依据的一个公式是：这个公式应该是 X +0≠X，也就是说，不是 15 个加盟共和国加上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 X +0。只有这种办法才能够清理掉存在了几十年的体制[②]。这就表明：这些共和国完全不接受苏联中央和苏联总统。

中亚国家对“要不要苏联中央”的问题的态度较为正面。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与吉尔吉斯代表团的会谈准备非常充分，预先已经提交了己方的联盟条约草案给对方。吉尔吉斯可能是唯一一个主张保留联盟中央，而且承认其是苏联的法律继承者的共和国，但是，吉尔吉斯提出要有自己的财产、自己的领土（作为莫斯科联邦区），同时还要保留全部的管理机构。同时，吉尔吉斯代表团主张，应该在共和国之间的双边谈判的基础上寻求订立联盟条约。Н. И. 科尔涅耶夫指出，在与乌克兰代表团谈判的时候，他曾提出：应该通过一个《条约基础宣言》。乌克兰方面问：谁的宣言？我说：苏联。他们就不再听我的了[③]。

关于各共和国联合为联盟的形式问题，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的专家和领导人得出结论：必须优先考虑联邦，但是大多数共和国在与我们谈判的时候不希望建立联邦，而是坚持建立邦联，因此，为了立场不至于对立，我们不推动邦联，而是拯救联邦制成分[④]。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27.

② Тамже., с. 69.

③ Тамже., с. 70.

④ Тамже., с. 71.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代表表示：我们毫无疑义地支持联盟，而且只支持联盟；绝大多数我们共和国的居民都赞同订立联盟条约……我们提议各共和国都同意，我们联合为一个联盟，我们将保留这个联盟，将为了联盟的巩固而做出一切努力。

乌兹别克斯坦代表表示：所有 15 个加盟共和国都应该留在联盟条约内。

哈萨克斯坦代表 K. A. 阿卜杜拉耶夫则提出：哈萨克斯坦仅仅在经过改革的联盟的体系内代表自己，只有我们留在统一的联盟中发挥功能，才能确保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坚持的思想是：有强大的国家，才有强大的各共和国！另一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代表 C. C. 谢尔盖耶夫对其发言表示支持，称："我们依据的原则是：强大的强国和强大的各共和国。"新联盟的名称应该是"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各加盟共和国自愿地加入主权国家联盟，并委托联盟中央管理联盟内外的一些共同事务，各加盟共和国承认巩固联盟和联盟国家是自己的共同任务，各加盟共和国要对联盟的命运承担起责任[①]。

格鲁吉亚代表团也谨慎地表示支持保留联盟中央：格鲁吉亚人民对整个联盟非常认可，联盟具有非常友好的性质。

亚美尼亚对联盟中央的态度不同，但是与俄罗斯联邦领导人较为相似，主张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联盟"，一个"共同体"，赞同订立一个"新联盟条约"[②]；但同时主张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不应该是金字塔式的，而应该是横向的；而且不需要联盟宪法，联盟条约对于一个横向的共同体就足够了[③]。

还有一些共和国干脆不愿意参加谈判，而是表示：脱离苏联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是合法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打算对这个大国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已经不承认，在几十年时间里，自己曾经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爱沙尼亚共和国最为鲜明地坚持这种立场。8 月 2 日到 3 日之间，苏联中央与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全权代表"（只有爱沙尼亚如此称呼自己的代表团，并且坚持要这样做）。谈判持续两个阶段，于 8 月 30 日结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80.

② Тамже.

③ Тамже., с. 81.

束。爱沙尼亚坚持的讨论对象是："对 1939 年到 1940 年间波罗的海国家归并苏联进程的历史－法律评价。"爱沙尼亚代表坚持说，只有在详细讨论这一问题之后，他们才准备讨论爱沙尼亚与联盟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有意识地无视当年通过的《加入苏联宣言》。从谈判纪要可知，当时的谈判非常艰难。爱沙尼亚代表团的领导人是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努基斯，苏联中央政府方面的代表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格里钦科、司法部长雅科夫列夫等人。纪要中写道："有专家参与，在就苏联与爱沙尼亚关系的框架内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双方讨论了 1939—1940 年间爱沙尼亚加入苏联进程的历史－法律看法；爱沙尼亚方面依据的是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相关决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方面也表达了就该问题的立场；通过公开坦诚的讨论，在思索这些复杂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方面迈出了一步，这些事件需要进一步进行法律和政治分析。谈判将按照现有计划继续进行。"①

第一阶段谈判解决的是对联盟"赞成"或"不赞成"的问题，到 1990 年 9 月结束。按照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成员 H. H. 格里钦科、P. H. 尼沙诺夫等人对谈判磋商成果的总结，苏联政府方面算是摸清了各个加盟共和国围绕"要不要保留一个经过改革的联盟"的问题的各种不同态度。看起来，在官方看法中可以看出两种完全相反、相对立的趋势：一种是分离主义的趋势；另一种则是主张联合。

当时，俄罗斯、乌克兰等较大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对其他共和国的压力引起后者的不安，他们认为这是大加盟共和国对较小加盟共和国的霸权，不愿意受俄罗斯领导下的联盟中央的束缚；在新奥加廖夫的私下谈话中，这些加盟共和国的代表都担忧地谈及这些事实，担心俄罗斯会分割他们的主权。按照萨宗诺夫等人的判断，认为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同中央沟通时，已经有非常强硬的立场；不过，大多数共和国领导人也坚持必须在中央－共和国和共和国－中央关系的新基础上保留联盟国家；同时，要对许多权力进行重新分配，更多地向各个共和国倾斜，给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限；只有少数几个加盟共和国主张摧毁苏联中央（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波罗的海三国则通过自己的代表表示，拒绝留在苏联。他们认为苏联侵占了三国，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79.

当时三国是资产阶级国家，根本不愿意寻求红军的庇护，抵抗即将到来的法西斯德国对三国的侵略[①]。

1990 年，大批苏共中央工作人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雅科夫列夫的率领下前往立陶宛，之后他向苏共中央报告说，波罗的海三国的形势是民主和公开性的胜利，公开支持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人布拉扎乌斯卡斯及其分裂行动。

紧随着雅科夫列夫之后，戈尔巴乔夫也前往波罗的海国家访问，但是这次访问非常失败，戈尔巴乔夫未能说服集会人群，也未能达成协议。立陶宛领导人得到西方支持，急于摆脱苏联中央。一些立陶宛知识分子认为，雅科夫列夫于 1986 年 8 月赴立陶宛旅行发表的言论导致立陶宛今日的局势。

戈尔巴乔夫和卢基扬诺夫试图保留苏联统一国家的法制基础。在经过与一些加盟共和国代表团磋商谈判之后，开始了各加盟共和国专家的工作阶段。这些谈判堪称是过渡性的。因为当时只有俄罗斯联邦、塔吉克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共和国派出了专家。讨论的是一些能够令加入联盟的所有主体继续分离的问题：确保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独立；确定对加盟共和国和中央的权利划分；另一组专家得出结论：在新联盟条约中不建议写入成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是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为最高权力机构[②]。

比较有原则性意义的问题是：专家们建议保留苏联总统职位，由苏联公民中选举产生，任期五年；由各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组成一个总统委员会，总统担任总统委员会领导人。

财产问题成为绊脚石。加盟共和国将联盟中央实现自己职权所必需的财产转交给中央；运用的概念是：联盟和加盟共和国的“分摊财产”（долевая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和“共同财产”（совместная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加盟共和国和苏联国籍的问题——是实施联邦制，还是邦联制，或是有邦联制成分的联邦制，或是主权国家联合体，一直争论到 1991 年 12 月。

一些加盟共和国的专家从 1990 年 8 月 31 日开始工作。乌克兰、格鲁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79.

② Тамже., с. 91.

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最高苏维埃没有派出自己的专家。在专家们就相关具体问题签订的十项纪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中央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立场对立的趋势。据他们认为：联盟似乎是一个凌驾于加盟共和国之上的官僚主义中央，而加盟共和国是被剥削的边区，需要坚决捍卫、免受中央侵害。因此，在纪要中，有一个明显的宗旨是：只给中央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管辖范围，从而也就进一步促使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形成了一种观念：作为统一国家的联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苏联中央的代表证实，联盟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同于加盟共和国的共同利益之外的利益。联盟是国家的联合体，体现的是各个共和国的利益的总和。联盟条约的任务是：令这样一些问题增多——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共同的观点。中央的代表表示，支持联盟中央，同时也赞同在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就管理范围问题进行明确划分。关于国籍问题，所有专家都主张联盟的国籍和各个共和国的国籍同时保留。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联合国的成员国地位的问题。如果所有共和国都加入联合国，那么，联合国中将没有联盟的地位。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联盟的国际义务怎么办？

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专家磋商工作中感到满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专家们在研究新联盟的税收、预算、货币信贷政策时，并未蓄意侵害统一的联盟国家[①]。

第一阶段的谈判（围绕赞同或反对联盟的问题）结束，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各方继续协调立场；各个加盟共和国日益分化成为两派：分别是统一、强大的联盟国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此期间，国内经济日益恶化，因为国家群龙无首而经济受害深重。

叶利钦后来曾谈及，签订《别洛韦日协定》的目的在于改变政治气候，也让其他各加盟共和国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向他们表明：我们三个斯拉夫人加盟共和国已经列出了联合的示意图，不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摇摆、犹豫的机会[②]。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92.

② Стригин Евгений, Предавшие СССР, М., 2005г., с. 397.

四 各方“赞同”和“反对”保留联盟的斗争（1990年9月到1991年2月）

1990 年 8 月 27 日，苏联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已经受命，着手起草新联盟条约。总统令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批准。在莫罗佐夫卡、新奥加廖沃和克里姆林宫，代表各个共和国的专家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辩论。

在起草联盟条约前言的小组中，就各共和国与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展开辩论。到 1991 年 2 月，俄罗斯联邦的各个自治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矛盾尖锐，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允许俄罗斯联邦的一些自治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一起，参加联盟条约的筹备工作。12 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签署了条约草案，其中称条约为《关于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结果，遭到那些未签署条约草案的共和国代表的围攻。此前，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已经拒绝在对联盟的名称中用“苏维埃”一词。

2 月 28 日，讨论关于联盟条约何时生效，以及 1922 年条约停止生效或继续生效的问题的条款；当天发生了一件事情，非常有代表性。在主持人柯吉科宣布大会开始后，对爱沙尼亚代表切尔诺戈罗娃的资格问题产生了争执。柯吉科宣读了委任书：“跨地区人民代表与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委员会委派玛格丽特·亨利霍夫娜·切尔诺戈罗娃作为联盟条约专家前往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后，切尔诺戈罗娃发言称：如您所知，爱沙尼亚共和国于一年前 1990 年 8 月 1 日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在这份宣言中正式宣布：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并为实现真正独立宣布了一年的过渡期。跨地区人民代表委员会是为了反抗这一决定，由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组成，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并主张保留统一的联盟国家的立场。委员会是由 105 名最高苏维埃的人民代表中的 25 人以及其他城市苏维埃和共和国代表组成，已经得到授权。

但是，该人民代表的身份是代表爱沙尼亚共和国议会，还是代表议会代表中的社会群体？他既不可能代表整个爱沙尼亚共和国，也不能作为专家出席会议；最终，主席决定他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大会。这个情况表明：当时甚至在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反对新的联盟条约的力量也并非绝对多数。

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是一些具有原则性意义的条款：如何决定联盟国家制度；莫斯科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划分中央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限；等等。在苏联总统的联盟条约草案中的措辞是：

> 各个主权共和国作为条约的参加者，决定依据新的原则，在主权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中建设自己的关系；

而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各加盟共和国和巴什基尔、布里亚特、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卡尔梅克、达吉斯坦、北奥塞梯、阿布哈兹等自治共和国提出的文本是：

> 各个主权国家是条约的参加者，表达自己人民对改革联盟的意志，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

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楚瓦什、科米、马里、鞑靼、北奥塞梯、摩尔多瓦等自治共和国提出的备选方案是：

> 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
> 以各共和国宣布的《主权国家宣言》为依据；
> 决定以新的原则为基础，建设自己在主权国家联盟中的关系。[①]

参与条约筹备的专家表达的是自己所在共和国的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意志，坚持要建立单独的主权国家，用新联盟条约联合为一个邦联制国家，保留总统职位，但是其权力受到极大限制；而且，总统的花费需要每年批准。也就是说，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之后，将自己内政外交的一切条件都强加给中央，而新联盟国家的总统只是主权国家雇用来干活的。

此外，主权国家的权利完整性受到格外关注。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版本是：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06.

第五，各共和国独立地确定自己的国家制度、行政疆域划分、政权和管理体系。各个共和国承认，建立在人民代表制度基础上的民主制是共同的基本原则，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反对任何走向威权制和胡作非为的趋势。

而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和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科米自治共和国、乌德摩尔特自治共和国提出的备选方案是：

组成联盟的各个共和国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民族国家和行政疆域制度、划分以及政权和管理体系。各共和国承认：建立在人民代表制和各民族的直接民意表达基础上的民主制是共同的基本原则，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反对任何走向威权制和胡作非为的趋势。

各个共和国都希望直接与外国建立关系：各个共和国都是国际社会的全权主体。有权与外国建立直接的关系，与其交换外交、领事、商业等代表机构，订立国际条约，直接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不损害本条约参加者的利益，不破坏联盟的权利和国际义务。

各共和国和联盟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目标是：稳固的和平，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税收方面，也有很大争议：苏联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版本是：

第 8 条：税收

共和国独立地确定自己的预算，确定共和国的税收。为实现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权利，确定联盟的预算和税收，与各共和国共同决定份额，执行全联盟共同项目。

而各共和国的版本则是：

共和国独立地确定共和国的税收，确定自己的预算。

为了实现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权利，经与各共和国协商后，确

定税收的额度，以及各共和国用于全联盟共同项目应该分担的份额；其规模和用途，要考虑各个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每年通过联盟与各共和国的协议加以协调①。

在此期间，苏联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政治形势也日益严峻。西方国家表面上抚慰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支持他保持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的努力；但是却口惠而实不至，并不实际给他提供贷款。苏联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表现在“十二五”计划中规定的目标并未实现。粮食和住房计划并未完成，领导人解释说，必须重建国民经济才可以实现：需要从机器制造业、车床制造业开始，建立新一代机器和自动化生产线；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需要青年的热情。政府努力提高国民收入。在改善国民生活方面投入翻番，加快了住房和社会文化设施建设，提高了退休金、社会补助乃至所有预算单位的工资。工人和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了 42%，集体农庄农民的收入也增长了 43%。但是，货币收入的增长也就提高了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1990 年，住房、幼儿园、中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建设急剧下滑。这样，国家计划不能完成，对国民的承诺不能实现，造成了普遍不满，引发了许多抗议运动。仅仅在 1990 年的前 9 个月里，登记在册的就有 2300 家企业里爆发了 154 起罢工事件，参加者将近 100 万人。三分之二的罢工具有经济性质，15% 的罢工事件是政治性的，4% 的罢工是为了环保。7000 次群众事件中，大多数都伴随着对公共秩序的破坏。而且，一半以上的破坏公共秩序的事件都发生在乌克兰，还有大量的事件发生在阿塞拜疆。但是，国民依然对国家抱有希望，寄希望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功。但是，工资大幅度提高并未带来预想中的激动，而是令国民丧失了劳动积极性。

1990—1991 年间，戈尔巴乔夫改革第三阶段到来。国家领导人中开始发出要建立市场关系的声音。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签署联盟条约不仅没有推动所有共和国企业的经济联系的巩固，相反，导致了经济联系削弱，引起生产力下降和通货膨胀。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只依据自己的法律和决定，加盟共和国、企业和工业部门的领导人都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常常损害别人的利益。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07.

农业领域，国家的收购量下降。例如，1985 年国家的谷物收购量占总产量的41%，到1990 年就下降到了31%。1990 年农产品的总下降幅度达到2.3%。很好的收成却不能收割、保存和再加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变成了租赁合作社，到1991 年年初，成立了4.71 万家独立农场。

1990 年的消极结果无疑造成了对改革反感的人增多，他们感觉自己被蒙骗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整个政治形势，反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情绪增长，许多共和国里，分离主义已经发展为由数百个民族主义运动、政党、派别组织的公开活动。在此期间，出现了300 多个有自己纲领和平台的政党，在苏共内部形成了两个平台：一方是叶利钦，另一方则是戈尔巴乔夫和改革派。双方的斗争加剧了。1990 年3 月，许多地区进行苏维埃选举，选举结果表明：民主派政治家已经进入权力机构。选举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陷入危机的阶段。叶利钦在选举中获得了85%的选票。当时苏联科学院社会学所就国民对苏共的态度在莫斯科、塔林、阿拉木图、高尔基市、伊尔库茨克等地进行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29%的人拒绝回答“苏共还能执政多久”的问题；39%的人回答：还能待2 年；29%的人回答：还能待2 年到5 年；30%的人认为未来5 年生活会得到改善。49.5%的人认为，5 年前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20%的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担任领导人时期，生活改善了[①]。

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改革者在城市里获得极大成功；而保守派则在农村取得很大优势。很多地方甚至面临二次投票或者再次提出候选人。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清点最高苏维埃选举结果。450 个代表席位，选出了442 名代表，其中有将近100 名来自“鲁赫”“绿色和平”“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民主同盟”等组织的非官方人士当选。美国国务院对此结果表示满意，称苏联的选举是“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按照民意测验，戈尔巴乔夫仍然是苏联最受欢迎的领导人。在许多城市里对3000 人的民意测验表明，戈尔巴乔夫得到6.88 分，叶利钦得到5.69 分，利加乔夫得到2.67 分（满分是10 分）。80%的受访者赞同实行多党制。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10.

当时，尼古拉耶夫市的一批共产党员致最高苏维埃的呼吁书，其中要求通过一部专门的法律文件，保卫改革：避免无政府状态，结束对政权的侵蚀。呼吁书中指出：唯一的稳定性力量仍然是苏共。正因为如此，近来一些精明于政治的人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为掩盖，与各种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者努力将党从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意见多元化，而是集会－罢工的专政。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以及一些城市企业里的党组织书记。

波罗的海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局势仍然非常尖锐。立陶宛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在内务部、国家安全机关、海关、司法部、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停止共产党的活动的决议。

一位立陶宛领导人表示：一旦立陶宛退出苏联，共和国境内留下的苏联的全部设施都归属立陶宛，而无须对苏联做任何补偿。因为这些企业在其运营期间已经获得补偿，而且，立陶宛人曾经参加西伯利亚等地区的建设，无须对苏联发展立陶宛的贡献做出补偿[①]。

民主力量在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占据上风的形势令克格勃感到不安。克格勃的一些工作人员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出呼吁书，其中表达了对苏联国内危机性的政治局势的担忧：

> 没有一个思维健全的苏联公民能够驳斥改革的思想。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是与歪曲社会主义理想做法的斗争。但是，一些势力试图利用改革进程中的困难，他们的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摧毁我们的联邦制国家。他们利用政治蛊惑、恐吓、诋毁、讹诈以及道德恐怖武器，造成社会紧张、胡作非为和无政府局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行动客观上与西方特工部门和外国反苏中心的企图契合。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犯罪、影子经济在运转，其精于此道者已经获得巨大的物质和金钱手段，公然追求政治权利。犯罪组织和团伙与各级管理机构的腐败分子不断结合。族际关系不断尖锐化。
>
> 借助反社会分子之手，正在进行目的明确的、协同一致的行动，抹黑苏联武装力量、内务部和克格勃的机构和军队，以及法院和检察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11.

院工作人员，也就是那些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机构，这些都是对国家和社会安全来说最重要和最必需的保障。

呼吁书还强调："克格勃工作人员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命运的责任，将运用全部力量和手段，协助改革成就，进一步发展改革和公开性，推进进步改革。"①

1991 年春的一些事件对于试图保留联盟国家的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巩固或削弱都会产生影响。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雅科夫列夫团队在摧毁苏联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新奥加廖沃的谈判。1991 年 2 月，从表面上看，各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代表在莫罗佐夫卡疗养院似乎已经讨论了全部的问题，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口头上都表示赞同保留一个联邦制国家，在中央和各个共和国之间合理划分权利，但是，在签订纪要之后，一些领导人立即就开始显现出真正意图。在此阶段，苏联国内经济继续恶化，有 300 多个党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联盟条约方案。

2 月 1 日，苏联联邦委员会会议开幕。戈尔巴乔夫发言，强调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恶化，许多地区的民族冲突尖锐，号召各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亲自投身筹备联盟条约的进程中。

首先需要就各个共和国与中央之间的权力划分问题研究制定协同一致的立场，否则，法律大战将未有穷期。必须解除对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总统活动的封锁。在磋商过程中，大多数共和国代表都表现出停止摧毁苏联的意图。而在波罗的海共和国、外高加索、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西乌克兰爆发的冲突表明：希望摧毁苏联统一国家的人打错了算盘，他们原来以为自己单独能够过得很好。

为此，戈尔巴乔夫指出：为了讨论在苏联与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力划分问题，我想提出一个与传统的起草法律文件不同的规则。

我们应该继续保留国家的"动脉血管"，现在这些血管暂时还是完整的，但是，如果这些血管断裂，就会面临灾难。这些血管包括：信贷金融体系；统一的燃料－动力体系；交通；通信和信息。因此就产生下一组问题：共同市场；不互相矛盾的法律体系；协同运转的法律保护体系；军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12.

队，军队的编成和运用；对外政策，其形成和实施；在实施外交政策方面划分共和国和联盟权限必须考虑如下因素：联盟是其主体利益的总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国际法准则。在上述的基础上，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讨论授予联盟下述权利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确定全联盟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实际推行全联盟外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各共和国无疑有机会通过自己在联盟机构中的代表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影响，并积极参与政策的推行；

捍卫联盟和各共和国的主权，确保其国防、安全和领土完整，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保持国际安全；

确定国界，确定国家领土和疆界的机制，保卫领土和疆界，协调经由国境的人员、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的问题；无疑，任何一个共和国都应该参与确定经过其境内的国界线的机制；

联盟及其主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代表处：共和国可以也应该通过自己的代表，以及自己在国外的代表处和组织参与其间；

在国际关系中保护联盟和共和国、组织和公民的权益；

订立联盟的国际条约；联盟是国际法主体，是以共和国的名义行事的，既可以在其专有权限的问题上，也可以在与共和国共同权限的问题上订立条约；

确保联盟的国际义务在联盟全境得以履行；

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对联盟的条约承担责任，在并非联盟确保的情况下，由各共和国对共和国签订的条约承担责任[①]。

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波夫表示："我们基本上支持实施统一的金融、信贷和货币政策。我想有一幅明确的利用联邦预算资金的图景，共和国在利用黄金储备和钻石储备方面的角色。在实施全联盟项目的时候，应该确定一下在这方面对共和国予以资助的规则，应该符合加入联盟的每个共和国的利益，甚至应该对每个具体项目都应该确定一下一次性扣除的额度。总之，问题的实质在于：要有一个统一的货币信贷体系。当然，在一体化的条件下，可以横向地协作和垂直地转交主要功能。"[②]

车臣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多库·扎夫加耶夫表示：如果说石油综合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16.

② Тамже., с. 452.

体，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认为，这应该归联盟管辖。但是，我们当然应该共同地管辖这些问题。但是，总体上类似，属于联盟的功能的范畴[①]。

乌克兰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福金表示："我认为，这个文件的主要原则不会引起大的分歧，因为已经相当深入地研究过了，与独立宣言、主权宣言——实际上，所有共和国都已经宣布了独立和主权——基本上一致……大多数共和国都希望在关税事务方面扩大自己的权利。""重要的是要认真对待一些共和国就利用黄金储备和钻石的提议。这说的是与各共和国共同管理统一的燃料－能源体系、铁路、航空和海上交通。至于说燃料－能源体系，那么，原则上来说，中央仍然可以在履行这些功能方面有广泛的权利。尽管说，如您所知，我们也有建议，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自己的工作，让煤炭工业基本上仍属于共和国——也就是要让共和国的法律扩大到这一领域。"[②]

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

> 我们对这个联盟条约草案在本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认真地讨论过了，表示完全支持。我们将在联盟条约上签字。
>
> 我想提请注意以下一点。保存并与共和国协商黄金储备、钻石储备的利用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涉及我们，因为我们共和国是我国钻石的头号供应大户。我们也还将继续提供，因为我们明白：我们国家的钻石也占垄断地位。这是我们国家的财产。
>
> 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将采取行动，解决当时联盟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完成的交易行为，但是这些交易直接涉及我们共和国。这将如何在联盟条约中体现？
>
> 我仍然想要在联盟条约和本协议中指出，一些共和国按照长期合同提供了原材料，它们有自己的份额。
>
> 下一组问题，第七条关于财产。我们将在26日召开例会，提出财产问题，共和国境内的一切都是原来联盟各部和各级主管部门的财产，按照我们的方案，这些财产将宣布为共和国的财产。这里写的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453.

② Тамже., с. 117.

是：各个共和国都是自己的土地及其地下以及境内的其他自然资源，此外还包括一些国家财产的所有者——为实施联盟权利必需的财产除外。第二部分，都很难理解指的是什么。最后，《联盟条约》中应该指明，共和国在协调共和国境内所有企业、团体、协会、康采恩和合资企业等的经济活动的权力是专有权力。只有共和国有这样的权力。必须有所反映[①]。

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C. A. 尼亚佐夫发言："我们觉得，必须在随后的工作进程中，在草案中巩固：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在实现自己权力的时候要得到普遍同意。包括：通过联盟条约、联盟宪法、接受新的联盟成员；确定全联盟收入的编制原则，全共和国性质的收入的重要条款；在统一的货币单位基础上，推行协调一致的信贷和金融政策。"

尼亚佐夫认为，条约第五条的名称"联盟的权力"不确切；这样一来，联盟就不是国家的联合体，而是从各共和国分离出来的东西，或者凌驾于各个共和国之上的东西。应该将第五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共和国最高政权和管理机构在普遍同意的基础上共同实施的权力，包括：通过联盟条约、联盟宪法、接收联盟新成员、确定全联盟收入的原则；全国收入的重要条款；支出原则；建立在统一的货币单位基础上的信贷金融政策。第二部分包括：按照条约和宪法，交给政权和管理机构管辖的各共和国的权力和问题，包括第五条中表述的剩下的权力清单，考虑到第六条确定共和国参与行使联盟机构授予的权力，第五条就可以不必多余地强调。这些权力经过协商后行使或共同行使。此外，应该把第七点中有关联盟机关权力的内容清除："在文化领域协调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只有在各共和国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或三边合作条约才能够成功。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可以拿掉。第七条"财产"，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说的是：共和国是自己共和国境内的土地、地下乃至其他自然资源，乃至其他国家财产——除了联盟行使权力所必需的财产之外——的所有者，那么，我们认为是很好的。

除此之外，我们准备支持第二部分关于在共和国和联盟之间划分功能的所有原则，并准备就此问题签字。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456 – 457.

马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B. M. 佐金发言称：马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总体上赞成草案，一致支持签署全联盟条约的总体构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筹备和订立新联盟条约工作的基础，应该确定如下原则：要尊重各共和国的主权权利，包括组成加盟共和国的共和国的权利，以及他们参加签署联盟条约的权利；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他们的自决权和自治权；确保各族公民权利平等；人权优先于所有其他权利；认可全联盟市场，统一的货币，各个共和国在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方式多样性的条件下执行统一的社会经济政策。

我们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已经就划分联盟和共和国之间的权限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我要讲一下。我们认为，新联盟条约应该保障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法律地位，未经合法选举的国家政权机关的同意，不得运用武力解决内政冲突和族际冲突。这些原则应该在条约中得到反映。

对权利制定的这种看法就可以消除各主体与联盟之间产生的分歧，我们认为，确保国家安全、国防、通过联盟宪法、确定联盟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协调保护社会秩序的活动、同犯罪现象作斗争，以及其他一些协调性功能都应该属于联盟。草案中已经反映了：只有征得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同意才可以修改联盟权限的可能性，以及共和国同联盟之间及各主体之间签署政府间协议、规定经济协作的形式和机制的可能性。确保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联盟的外贸活动问题、经济发展、推行信贷金融政策、价格制定、国家燃料－动力体系管理、各类交通、社会政策等问题的权力都应该在联盟和联盟成员之间共同享有。同样重要的问题——尽管暂时还未提出，但是很快就会提上日程——是在联盟和加盟共和国之间，以及在加盟共和国和加入其间的自治共和国之间的财产和权力的划分问题。

我们觉得，加工企业和农产品企业，以及其他一些企业应该交给共和国。联盟企业和联盟－共和国共有企业应该建立在税收和合同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应该给各共和国自行决定上述企业活动条件，协调其活动，以及自主解决生产设施和社会设施的机会。必须在条约中指明一个原则：共和国是其境内土地、地下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者。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Н. И. 德蒙泰发言称：……至于说“联盟的制度”的第二部分，总体上可以说，我们赞同其主体部分，以及草案中提出和通过的内容。有一些具体意见：

第一条，联盟的成员资格。第一条的第二部分写道，共和国是条约的参加者，取代了“加入联盟”的字眼，代之以直接“组成”，下边也是这样的字眼。也就是说，“加入”就等于“组成”。接下来，在该条的第三部分说：如果一个共和国加入了另一个共和国，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应该由两个共和国之间的条约和协议进行调节。应该补充：“其他共和国（国家）可以在本条约的条件下加入联盟。”这是对第一条的意见。对第二条、第三条没有意见。

第四条第二部分应该改为：“各共和国有义务不允许在本共和国境内设置外国的武装部队和军事基地，签订协议和从事其他与联盟目标矛盾，或实施旨在违反其他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利益的行动。”①

Н. И. 德蒙泰列出了应该交由联盟管理的国民经济部门和共和国与联盟共同管理的国民经济部门的清单：

> 核动力和工业；国防工业；铁路、航空、海洋、干线、管道交通；交通建设；电子工业；电子机械工业；仪器制造；重型机械制造；煤炭工业；石油天然气工业；化学工业和石油加工工业；无线电工业；金融、货币体系；黄金储备；钻石储备；外贸活动设施；地质学；地质测量；医疗工业；冶金；航天研究；通信信息系统；能源；绘图学；气象学和标准化；车床制造；工具制造工业；利用自然资源和环保计划……这是联盟和共和国的共同活动。联盟和共和国共同管理。②

哈萨克斯共和国副总理 У. 卡拉曼诺夫发言：“……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联盟的权限应该确定为：仅仅是在自愿基础上，由各共和国授予的权利。现在，我认为，大概在大多数已发表独立宣言的加盟共和国里，像我们哈萨克斯坦一样，规定了实施外交政策时参加各种活动的权利……我们认为，必须将联盟的财产和共和国的财产划分清楚。如果不把联盟财产和共和国的财产划分清楚，我们也很难确定联盟和共和国的权利、权限……”③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465.

② Тамже., с. 118.

③ Тамже., с. 119.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各加盟共和国一直在为财产问题、权利划分、外交政策、税收、成立本国的武装力量和安全局等问题而争吵不休。至于说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等人，在谈判过程中，他们的立场表现得越来越不可调和，他们在对中央、苏联总统和保持苏联等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强硬。

在中央政府与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团在多棱宫的谈判之后，开始了与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专家们的谈判。这些专家代表们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保障各加盟共和国经济独立、确定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中央的管辖范围等，而这些问题使各加盟共和国进一步分道扬镳。还有专家表示，在新联盟条约中不设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是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此外，一些专家还主张：由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负责人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由苏联公民选举产生苏联总统，任期5年[①]。

五 “8·19”事件使苏联解体进程不可逆转

叶利钦等政治精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8·19”事件，进一步将苏联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该事件使苏联陷入灾难，而俄罗斯则借机坐大，为叶利钦统治时期的胡作非为开辟了道路。经过反复磋商，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戈尔巴乔夫指责苏共中央不作为，没能采取措施对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一些敌视苏共中央的反对派利用这一机会，组织起针对苏共中央的骚乱。戈尔巴乔夫签署命令，要求地方政府保护苏共中央的财产，但是，一些有组织的人群在苏共中央大楼前聚集，对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进行谩骂、羞辱和搜身，许多苏共中央保存的秘密文件也被洗劫，丢弃、散落在楼道里[②]。随即，戈尔巴乔夫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起准备了一份声明，该文件确定了苏联总统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自愿承担的一些主要职责，各方一致同意建立经济联盟；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作为集体领导机构，协调内外政策；拟通过新宪法；等等。但是，该文件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实际上是要求摧毁运转几十年的政治体制。由于形势变化太快，各加盟共和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91.

② Тамже., с. 145.

国领袖不断产生新的意见。1991 年 9 月 2 日，召开了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就该声明进行讨论和投票。一些代表认为，该声明通过也就意味着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终结，有人直指这是“叛变”，是搞“阴谋”。但是，投票结果，多数人支持该声明，索布恰克则表示：如果继续保留现有的联盟的机构，那就是在继续搞政变；斯坦科维奇表示：联盟已经不存在，也不能再将其复活。也有一些人士捍卫苏联和苏联宪法，但是人数不占多数，其中就包括俄罗斯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他发言称：摧毁苏联是危险的，必须尽快签署联盟条约。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建议：如果其他加盟共和国不支持该声明，就离开代表大会①。叶利钦等人不失时机地借题发挥，歪曲“8·19”事件的原因，将矛头针对苏联及其体制，直观地体现了要摧毁苏联的意图。叶利钦认为，“8·19”事件“是国内政策的后果，该政策导致了政权危机。为了保持反动机构已经做了一切。这就证实了一个真理：反动派和改革派是不可能站在同一行列的。联盟的机构对各共和国持急剧对抗的态度，不承认各个共和国的主权。中央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国家。当他明白，国家正在失控，决定诉诸暴力”②。

此外，叶利钦认为，“8·19”事件的原因还在于戈尔巴乔夫行为前后不一致，联盟中央的作用就在于“协调各加盟共和国的行动”，“而极权主义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逆的”。叶利钦提议：保留统一的经济空间，成立主权国家联合体作为联盟，建立在各种形式的合作基础上；在中央的监督下，保留联盟的武装力量；进行军事改革，大规模缩减军事支出；确保全国范围内的人权。俄罗斯将在平等和睦邻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关系。将是平等者中的平等者。必须抓住机会改革。抱着一些陈朽的理想不放是很愚蠢的③。而在叶利钦两次发言后，戈尔巴乔夫的发言竟称：“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在政策和方法上有过错误……应该依靠新生力量，更加果断地消灭保守的极权主义机构……”这似乎也就意味着：在此后的行动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准备在摧毁苏联国家方面联手行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 1991 年 12 月 8 日的《别洛韦日协定》的总彩排。1991 年 8 月 24 日，戈尔巴乔夫发布总统令：鉴于苏联部长办公室未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53.

② Тамже., с. 154.

③ Тамже., с. 155.

能履行宪法职责并采取必要措施挫败叛国阴谋，个别成员甚至还参与了阴谋，因此决定：解散苏联部长办公室，报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①]。

那些主张保留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则令叶利钦等主张解散苏联的政治精英感到警惕和担心，最终将其甩开，主导了苏联解体进程。中亚各加盟共和国都倾向于保留苏联中央，而俄罗斯政治精英则认为中亚是一个包袱。叶利钦等人意识到，必须将包括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在内的这些包袱甩开，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统治整个苏联比较艰难，而统治一个俄罗斯还是很有机会的。当然，应该说，最初俄罗斯也希望保持苏联国家的统一，继承对苏联全境的权利。1991 年 8 月 26 日，俄罗斯发表声明，试图作为苏联中央的替代者和继承人，叶利钦试图取代戈尔巴乔夫，充当苏联的拯救者，并对那些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发出威胁：如果他们不与俄罗斯结盟，就要与俄罗斯重新划定疆界，引起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担忧和反对，指责俄罗斯有“帝国野心”。但在当时，全社会在民主化思潮的影响下，叶利钦的类似言论不受欢迎，而且，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如阿法纳西耶夫、波奈尔等人）也对叶利钦的声明予以谴责。为了争夺权力，击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放弃了之前的方针，决意只做独立俄罗斯的领导人。

“8·19”事件成为分水岭，使苏联解体进程几乎不可逆转。在此事件上，俄罗斯领导人在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角逐中日益占了上风。1991 年“8·19”事件之前，戈尔巴乔夫－卢基扬诺夫政府班子试图竭力保留联盟国家的基础。各加盟共和国的绊脚石还在于财产问题。加盟共和国将一些苏联中央完成其职权必需的财产交给苏联。而且还运用了一个概念：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分内财产和共同财产。直到 1991 年 12 月底，各方还在为各加盟共和国和苏联的国籍问题争论不休：是实行联邦制，还是邦联制，或是有邦联成分的联邦制，或是“主权国家联合体”。

各加盟共和国专家代表从 1991 年 8 月 31 日开始工作。但是，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加盟共和国都没派自己的代表。在专家们就一些个别问题所达成的 10 份备忘录中，清楚地表现出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中央之间的对抗。他们认为，苏联已经成为凌驾于各加盟共和国之上的一个官僚主义中央，而各加盟共和国则成为被其剥夺的边缘地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82.

带，必须加以捍卫[①]。此外，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都主张将苏联中央的权限缩减到最低，以至于一些代表认为，作为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苏联中央的代表（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则表示，联盟中央代表各加盟共和国的共同利益，自身并无与加盟共和国不同的利益；但是，联盟中央也同意在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明确划分权限。此外，苏联中央感到满意的是：在此期间，这些专家们在研究税收、财政等方面问题时，并未蓄意侵犯统一联盟国家的权利。

几乎所有谈判者都同意：要将苏联国籍和加盟共和国国籍同时保留。但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加入联合国，那么，苏联的席位就不可能存在，苏联的国际义务也无从体现。在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束之后，统一联盟国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之间继续协调立场。

乌克兰的分裂行动加快。“8·19”事件令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感到恐惧：担心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回来后，其政治影响再次恢复。萨宗诺夫认为，在 1991 年 9 月 2 日到 4 日的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之间达成妥协，这是他们的策略性花招。退出苏联、摧毁联邦制国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政治精英早已既定的方针。乌克兰精英既畏惧叶利钦，也畏惧戈尔巴乔夫。

乌克兰的分裂行动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支持克拉夫丘克就乌克兰独立举行全民公决，并表示：如果乌克兰独立，美国可与其建立外交关系。1991 年 12 月 1 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90.32% 的公民同意独立。叶利钦看到乌克兰的举动有利于自己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斗争，也对克拉夫丘克表示支持。乌克兰就独立进行全民公决的第三天，叶利钦就发表声明，承诺支持乌克兰，以巩固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的战略同盟。有人提出，应该举行国务委员会、联邦委员会会议，并向全国转播，让人民能够判断每个人的真正立场，戈尔巴乔夫一度准备这样做，但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等人不愿意，威胁要离会。戈尔巴乔夫只好宣布停止转播。就是否建立联盟国家、是建立联邦还是邦联等问题，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矛盾越来越尖锐。

12 月 5 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盛大会议上，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普留希宣称：“今年 12 月 1 日作为乌克兰国家复兴的日子，不仅将写入乌克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91.

兰而且将写入全世界的历史。世界地图上出现了一个欧洲强国，她的名字叫乌克兰！”[①] 普留希等乌克兰领导人声称，直到12月1日之后，乌克兰人民才为自己争取到了做国家主人的权利。克拉夫丘克、普留希等乌克兰领导人愚弄、欺骗了乌克兰人民。在12月5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乌克兰领导人并未直接呼吁公民支持独立，而仅仅是呼吁公民支持《宣布乌克兰独立通告》（乌克兰领导人利用“8·19”事件加快了独立的步伐。8月24日，通过了《宣布乌克兰独立通告》）。克拉夫丘克及其团队解释说，《独立通告》只是对“8·19”事件国家政变的回应。他们还通过一份文件，提及了“笼罩在乌克兰上空的致命危险”，利用这一机会宣布独立，成立乌克兰独立国家。克拉夫丘克等乌克兰领导人无视1990年3月全民公决中表达的民意，宣称，12月1日举行的全民公决已经废除了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克拉夫丘克成为乌克兰的首任总统。而且，乌克兰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歪曲乌克兰在苏联时期的历史。例如，著名作家冈察尔称，乌克兰民族语言和文化都在苏联时期被摧毁了，民族的创造性力量都被肉体消灭，切尔诺贝利事件证明了苏联“对乌克兰人民的犯罪和极权主义体制的反人道性”。

俄罗斯、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玩弄手段，欺骗人民。乌克兰领导人继续愚弄乌克兰人民。克拉夫丘克在一次讲话时称：在乌克兰境内只有乌克兰宪法和法律生效，此外，克拉夫丘克要拥有本国货币和武装力量的要求都写入了《别洛韦日协定》。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都以承诺在独联体范围内保留统一的武装力量、统一指挥来欺骗人民。但是，这些都是权宜之计，目的是逐步摧毁苏联。

在制定新联盟条约草案的时候，叶利钦班子千方百计地宣扬，“没有乌克兰就不会有联盟条约”，实际上只是为了与乌克兰联手摧毁苏联。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之前，乌克兰、俄罗斯等领导人表面上似乎很关心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但实际上却在按计划逐步摧毁苏联，而广大人民被蒙在鼓里。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之后的第三天，叶利钦就声明表示支持，兑现了支持乌克兰的承诺，同时也巩固了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之间的战略同盟。

在与苏联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谈判、较量过程中，叶利钦的立场越来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56.

越强硬。在1991 年9 月27 日的一份《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上，叶利钦用笔做了多处涂抹、修改，可以证明其立场变化。例如："主权国家联盟因权利平等的国家联合而建立"，叶利钦将"因权利平等的国家联合而建立"字句勾掉；涉及统一的联盟税收问题的第七条被叶利钦悉数勾掉，予以否定；第八条"联盟宪法建立在本条约的基础之上，不应与其冲突"的字句也被全部勾掉；联盟总统的产生办法的内容也被勾掉；等等[①]。

1991 年11 月14 日，在新奥加廖夫开会讨论，由于立场分歧，戈尔巴乔夫甚至威胁要离会。随后叶利钦宣称，从12 月16 日起，将放开物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白热化，二人之间的恩怨深重难解，为此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在新奥加廖夫会谈时，叶利钦称大家都是"来向大汗屈服的"。

叶利钦坚持，联盟应该是主权国家联盟。

戈尔巴乔夫表示：主权国家联盟就主权国家联盟。我们需要决定一个主要问题：是否建立联盟国家？

叶利钦：有意愿建立联盟。

纳扎尔巴耶夫：具体是什么样的联盟？联邦还是邦联？

戈尔巴乔夫：联盟国家。我坚决坚持这一点。不这样做，我预计你们都会大难临头。

叶利钦：建一个联盟国家。

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了国家，我就不参加了。我可以现在就离开你们（站起来，收拾文件）。这是我的原则立场。没有了国家，我认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我不能同意任何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

舒什凯维奇劝说戈尔巴乔夫留下。

戈尔巴乔夫：请相信，我不打算觊觎总统的宝座，可以让你们中的任何一位登上总统位置。

叶利钦：我们就明确说吧，就是邦联。

戈尔巴乔夫：做决定吧。我不能对你们强制，你们都承担着不小的责任，甚至是更大的责任。

叶利钦：应该做的是：不能让乌克兰离开。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26.

舒什凯维奇：我认为，如果是邦联，他们会加入的。

戈尔巴乔夫则回应说："看到了吗，鲍里斯沙皇，如果真诚合作，一切都可以解决。"①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话表明了二人之间的个人恩怨非常深。

叶利钦咄咄逼人地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逼其让步，而戈尔巴乔夫团队则步步退让。新奥加廖夫进程之后，12月7日、8日、9日三天，叶利钦已经和其他两个斯拉夫国家的领导人开启了"别洛韦日丛林进程"。戈尔巴乔夫获知叶利钦将去白俄罗斯会见舒什凯维奇和克拉夫丘克，而叶利钦在临行前向戈尔巴乔夫解释说，"或许可以挤压一下克拉夫丘克，他就会好说话些"②。随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签署协议《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领导人声明》《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定》，签字者包括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布尔布里斯、凯比奇、福金等人，苏联解体的命运便无可挽回。这些文件称："就准备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走入死胡同，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成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经成为现实因素"；"中央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生产崩溃，实际上所有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都灾难性地降低了"。"注意到苏联范围内许多地区不断增长的社会紧张度，导致族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意识到自己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和对实际实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需求，我们宣布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各方于1991年12月8日签署协议。""由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对所有苏联成员国的加入都是开放的，也对其他赞同本协议原则的国家开放。"

"联合体各成员国打算推行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方针。确保对苏联的条约和协议的国际义务的履行，保障对核武器及不扩散核武器的统一监督。"③

但实际上，恰恰是叶利钦等领导人将谈判进程引入死胡同，从而开启其摧毁苏联的进程。戈尔巴乔夫有手段阻止这一进程，但他没有这样做。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63.

② Тамже.

③ Тамже., с. 166.

有人将叶利钦等人秘密签署文件、阴谋解散苏联的情况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文件中未提联盟政权机构和联盟总统"，并且写了"苏联的机构已经停止活动"；并提议戈尔巴乔夫动用阿尔法小组，将叶利钦等人软禁，然后由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争取人民的支持；否则，其他共和国也会签署类似的文件，苏联也就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总统，是宪法和国家完整的保障，但他却表示"我不能这样做"①。起初他还口头表示了反对："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可能由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的意志就可决定"，但是，这种异议显得很苍白。有人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中，类似密谋的行动，其密谋者都会被立即逮捕投入监狱，但是，当时的苏联中央已经脆弱到极点，戈尔巴乔夫缺乏对抗的意志和决心。当时有 500 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联名要求立即召开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未予回应；还有人建议逮捕叶利钦等三人，但是，戈尔巴乔夫未采取任何措施。12 月 12 日，面对记者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支持《别洛韦日协定》，我就必须承认它。作为总统我将尊重代表机关的意志……3 月 17 日曾举行全民公决，而我们现在却在反对人民的意志……我只想将人们解放出来，似乎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主要任务。连基督也没有看穿，会有犹大，而我还不是基督。"随后他又说：就如一块馅饼，被切开，大吃大喝……我对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我们在做一个选择，你选你的，我选我的②。实际上，在《别洛韦日协定》问题上，只有叶利钦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叶利钦并不打算对戈尔巴乔夫让步。甚至可以说，在 12 月 9 日到 27 日的日子里，叶利钦其实是在实施对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报复。

六　解体前夕的苏联民意

当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民的民意如何？"8·19"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曾责成萨宗诺夫成立一个信息分析中心，及时获知国内的民意情况，进行处理。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 4 天，戈尔巴乔夫每天都会收到上千封信。从 1991 年年初算起，共收到致戈尔巴乔夫的 299707 封信和电报，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64.

② Тамже., с. 174 – 175.

在苏联解体前的一个月内，10433 位苏联公民和 4414 位外国公民致信即将离任的苏联总统。在戈尔巴乔夫卸任前的 4 天内，每天收到上千封信。12 月 24 日一天内收到的信件和电报能够直观地表明苏联国民的情绪。一些人表示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或对他的感谢，但是，更多的是对他的失望和不满。

例如，格列梅奇内依（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来信：你白白地反抗了，退休吧。

B. A. 扎斯托林（辛菲罗波尔市工人）：必须就主权国家联合体宣布全民公决。人民被骗了，尤其是在乌克兰。

A. 兹纳托娃、B. 库尔班诺娃（鞑靼斯坦共和国，瓦西里耶沃市）：您曾经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和支柱。在您艰难的这些日子里，我们与您在一起。

H. Г. 沃罗比耶夫（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州，泰米尔套市）：世上是有神的。你认识到了，什么是自食其果。你的那些骗子同事把你变成了政治僵尸。等待他们的也是同样的结局。

在这方面西方会帮助您，但是应该多听听人民的呼声。

B. B. 祖宾科（卡拉干达市）：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被骗了。实际上是在苏联发生了军事政变。不要交出政权[①]。

H. A. 卡尔波夫（莫斯科州波尔舍沃市）：不管你如何强压俄罗斯，俄罗斯都将挺直，将对你严厉无情地审判；就像是审判布尔加科夫的将军赫鲁多夫一样。你还有时间忏悔。

Л. Ф. 瓦尔纳夫斯基（乌克兰卢甘斯克州，科穆纳尔斯克市）："12 月 21 日是一个比蒙古入侵还可怕的日子，叶利钦比法西斯还可怕。"

Я. С. 纳戈维琴（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先生！您背叛了誓言，摧毁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背叛了人民和军队。

A. B. 卡兹明科（莫斯科）：那些聚集在阿拉木图的人对您作为一个个人和政治活动家的权利的践踏，令我气愤。

И. Р. 乌索夫（圣彼得堡）：攫取到政权的那些昏了头的政客们早早地召开了对苏联的追悼会。伟大国家将不会按照在阿拉木图做出的幼儿园式的决定生活下去。千百万逝者的亡灵会保障，还有生者的意志。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76.

Н. Н. 索米娜（南萨哈林斯克）：我终身都在库页岛生活，反对将库页岛交出。

А. А. 普利亚德尼科夫（莫斯科市，一级残疾人）：请帮帮忙，弄到节日票证和糖票。

Ф. Х. 盖欣（涅夫捷尤甘斯克市）：这个独联体是帝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把主权给苏联，把经济自由给每个乡村和城市，把财产给苏维埃。

С. И. 希多连科（凯美罗沃市）：谢谢您所做的工作，我们和您在一起。

布哈罗夫（伊尔库茨克州布拉茨克市）：立即成立人民法庭，审判那些摧毁苏联的人。

В. П. 叶夫先科（伊尔库茨克州，下乌金斯克市）：我们如何生活下去？4 个月没有工作了，什么都支付不起，没什么可吃的，等待赡养的老人，市劳动安置局不关心这个[①]。

С. Н. 邓琴科（基辅）：基辅的所有食品店都是空的，4 天了没有任何米，没有橄榄油，没有面条和切面。

Л. Г. 莎莎耶娃（奔萨州，谢耳朵宾斯基区）：恳请您，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的三个孩子寄一些糖果。

И. В. 科罗列夫（列宁斯克市军人）：非常骄傲的是，我是苏联公民。您迫使我又拿起武器，重复南斯拉夫的方案[②]。

还有一些小孩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写信给戈尔巴乔夫的：

列娜·布隆杜科娃（伊尔库茨克州，乌斯特－库特区，亚速斯基镇，五年级学生）："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有 5 个孩子。我没有冬装和套靴。我们的妈妈挣得不到 240 卢布，爸爸收入也不高。因此生活很拮据。恳请您帮帮我们。"

列娜（12 岁，阿尔泰边疆区巴尔淖尔市）："我想向您提个问题：为什么国家如此糟糕？为什么，所有的地方都一无所有？要知道，我们想穿得好一些，年轻人尤其如此。有人有机会，而有的人没有：比如，像我们家，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为什么？为什么物价如此吓人？"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77.

② Тамже. , с. 178.

玛莎·波波娃（7岁，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松日河地区，奥尔忠尼启泽）："我是一年级学生。恳请您帮帮我们穿衣、上学。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们没有钱。我穿着一双破靴子去上学。我想继续学习。外边是冬天。我的妈妈在生病，爸爸被人杀死了，妈妈有两个孩子。"

斯维塔·科帕涅娃（彼尔姆市）："我病得很厉害，什么都吃不下。医生告诉我说，需要吃东西，需要提纯奶和香肠。可是到哪里搞到啊，现在只给老兵提供。我很羡慕。"①

有这样一封来信：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完全认同您对我国联盟国家命运的担忧。我是乌克兰族，在哈尔科夫学习过，在车里雅宾斯克曾经服役，现在住在卢甘斯克。我的亲叔叔和婶婶住在明斯克。我的堂妹住在哈萨克斯坦。这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最普通的情形。长大后，我认同自己是这个大国的公民。是好是坏，但就是如此。我感情上觉得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哈萨克族和格鲁吉亚人都有共同性，我接受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文化的教育。对于我来说，很可贵的是感到：莫斯科是我的首都，我来到了列宁格勒和利沃夫、沃罗涅日如回到自己的城市一样，不把这些城市分为俄罗斯的城市和乌克兰的城市。我还想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精神生活。

我们到底发生着什么？难道我们昏了头，认为分开会更好？我赞同独立，赞同主权，反对旧苏联，我投票赞同乌克兰独立，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独立后，我们就分崩离析。我不明白，为什么加拿大就应该比俄罗斯离我们更近！

局势是戏剧性的，在这个时刻，我想让您知道，您还有支持者，支持新联盟（无疑，应该是邦联）的人，请您不要垮掉，要继续表达人民希望统一的意志，而且，绝大多数我的熟人也都是这样想的。我也给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写了这样的信，请他做联盟的支持者。

丹尼奇，44岁②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78.

② Тамже. , с. 179.

还有一封国外来信：

尊敬的戈尔巴乔夫先生：

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您对西方至今没有对贵国改革提供必要的援助而反感，您反感您指派办事的那些人，也对叛乱之后出现的反应和疑虑反感。我们国家很多人对此也很反感。他们因那些为了自由和在苏联过上体面生活而献出生命的年轻人感到悲痛。与此同时，很多人也感到很高兴，您和您的家人能够经受住这些震荡，公开性和改革的思想如此深入贵国最好公民的头脑和心灵，因而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准备牺牲自身生命，最终，军队赢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胜利，没有对自己的人民开枪。

您通过缓和、裁军和信任措施的政策达到的目标，不仅仅是在我们大陆上的孩子们获得在和平、自由和幸福的条件下发展的机会，欧洲也会成长起来新一代年轻人，其中每个人不论其语言、文化和世界观，都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计划。在今天，这给所有有孩子并且也给所有为孩子们承担责任的人们带来了勇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达赛尔市中学老师和家长们[①]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收到的最后几封信是：

纳尔希相（埃里温市）：干干净净地倾诉一切吧，清洗自己的罪愆——如果说轻点。拯救自己的灵魂。甚至我早就猜中马耳他岛上的勾当了。我并不抱希望，但是不管好歹，请您不要错过机会。

Г. Г. 亚罗维科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萨彦诺戈尔斯克市）：苏联解体并非历史注定的，本来有另外的、更有效、更适合的发展道路。您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复仇，挥霍掉 2000 吨黄金储备，却把诚实的劳动者变成赤贫，令各民族之间陷入争执，血流成河？所有人都因改革而变得状况不好，除了那些从事影子经济的人。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错的，证实了：没有自尊心的自私自利，必将付出双倍的代价[②]。

---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80.

② Тамже., с. 181.

穆希塔里杨（莫斯科市）：由于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的分裂和您对社会主义的外行态度，社会民主党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他们自称民主派。从1960年起，工农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而您的政治观点如何，对于人民来说仍然是个谜。

Ю. 捷林切夫、В. 丘尔金、В. 安基波夫（列宁格勒市）：由于一群自称独立国家总统的人士声明解散苏联、降落其国旗，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ЦК РКРП）建议将国旗转交中央委员会保存。我们有责任在克里姆林宫上空将其升起。

Н. А. 沃加金娜（凯美罗沃市）：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醒您，您的辞职不论是否自愿，就如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自我解散、成立独联体一样，都是违法的，因为大多数人民都投票赞同保留统一的苏联。①

七　西方及其代理人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学界和社会流行关于西方反俄的“阴谋论”。有人认为，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其实都是犹太人的阴谋。当代有一个被锡安主义者控制的“幕后政府”，各国都有代理人——叶利钦政府中如基里延科、丘拜斯、涅姆佐夫、亚辛、别列佐夫斯基等人（以及许多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者）都是锡安主义者②。В. В. 日里诺夫斯基称：犹太人竭力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信息等领域，让全世界接受其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就是犹太人与俄罗斯民族斗争的工具；1991年，俄罗斯犹太人夺取了政权，叶利钦政府的多数成员都是犹太人；等等③。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都是犹太人主导下的悲剧，犹太人使俄国史按照同一图景一再重复，且充满灾难④。

1998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Н. И. 康德拉坚科在“库班河青年爱国主义同盟”制宪会议上发言，认为存在着世界性反俄阴谋：锡安主义政策。康德拉坚科列举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讲话：要在俄国培养“第五纵队”，使苏联人道德退化，崇拜色情、暴力、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181.

②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Загадка Сионских протоколов, М., 1999г., с. 416－419.

③ В. В. Жириновский, Иван, запахни душу!, М., 2002 г, с. 166, с. 99.

④ А. Севастьянов, Чего от нас хотят евреи, М., 2008 г, с. 103.

叛变等行为；唤起民族主义及对俄罗斯人的仇恨；等等；“只有极少数人能猜到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会让这些人处于无助的地位”①。

1995 年，美国作者皮特·施威泽尔的著作《胜利》俄文版在俄出版。该书作者运用采访苏、美高层、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大量访谈资料证实，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制定战略，在石油价格、苏联民族地区分离、阿富汗等问题上采取秘密步骤，促使苏联改革并走向解体。该著作首先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强调了西方长期以来对苏联实施的冷战，而冷战的目标就是消灭苏联。1990—1991 年间，苏联经济面临危机，由于国家没有了主人，苏联国内经济形势迅速恶化（生产下降，苏联中央对生产的集中管理和加盟共和国的生产供应被人为摧毁）。而这是按照叶利钦的意愿完成的，他宣布主权之后，将生产的垂直联系改为横向联系。美国政府借机对苏联施加压力。里根和老布什的顾问们认为，减少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实力和影响，令这些国家回到原来的“自由”和“独立”，是美国目标的一部分。美国的研究中心“海特里奇基金会”为布什总统提供决策，认为：

> 新政府应该针对组成苏联帝国的苏联各民族共和国的非殖民化制定长期战略，新总统首先应该称苏联为世界上最后一个真正的殖民帝国，然后应该对苏联国内的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力量提供稳定的相应支持。但是，美国可以从半数苏联国民那里获得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补偿可以预料得到的苏联官方的消极反应。②

此外，所谓“里根学说”（或称“解放学说”）中还有特殊条款，旨在摧毁苏联和欧洲、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措施、方法：“将美国与中东欧各国之间的外交和经济水平与后者遵守人权挂钩的‘分化政策’。这一政策推动了匈牙利和波兰的政治自由化；扩大了允许自由讨论的范围；对政治反对派的态度更宽容；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不太严酷。在美国的策略精心适应中东欧地区的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的过程中，美国应该鼓励主张政治独立的当地力量，争取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更广泛

① 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4－15, 1998г.

②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93.

地实现民族自决原则。”此外，美国还应该加强对中东欧地区的宣传渗透等；在1989年的倡议中还提出：建立支持中东欧民主运动的机制；停止对苏联的补贴性粮食出口；如果苏联继续干扰自由电台的广播，就不与其签订新的通信协议；成立储备货币基金，资助“自由欧洲”和“自由电台”的广播；美国劳联－产联应该负责培训中东欧的反对派领袖，教育部应该散发宣传品，揭示自决的好处；美国应与东欧反对派建立起更好的联系，以便协同行动；美国政府应该明确要求苏联政府进一步减弱对东欧的控制；支持东欧国家的罢工运动，同时对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独立工会遵守通行的人权规则，建立民主社会。此外，还应利用苏联的族群问题做文章；美国政府还应该制订全面的计划，应对苏联发生的重要事件，为实现这些计划应运用一切适合的手段；等等。美国政府尤其是在支持苏联国内的宗教复兴进程中充分运用了解放学说；而且特别重视对那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赴美进修、访学的专家的洗脑，招募和配置代理人，在1990年到1991年间的事件中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些代理人非常卖力地推行破坏性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为他们制定了行事原则和方法[①]。

西方在苏联的代理人则发挥了巨大作用。1991年6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称，苏联政治精英中充斥着大量的西方代理人，他引用了安德罗波夫在1977年写下的一张便条，其中谈及：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任务，试图招募苏联人作为代理人，经过培训，将其推到苏联政界、学界、经济界的管理层。但是，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安德罗波夫说的是美国的长期计划，而苏联解体如此之快，几乎打破了美国的原计划[②]。克留奇科夫怀疑雅科夫列夫已叛变，曾向戈尔巴乔夫报告此事，但是，戈尔巴乔夫未予理睬。

1992年，久加诺夫称：戈尔巴乔夫客观上正是西方的头号代理人[③]，甚至其发动的改革本身就是西方的反苏阴谋[④]。

有人甚至认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等人都被西方情报部门招募，执行摧垮苏联的使命。赫鲁晓夫是“亲西方间谍”，恶意地发

① А. А. Сазонов, 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 М., 2010г, с. 97.

② А. Шубин. Парадокс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Упущенный шанс СССР, М., 2005г, с. 307.

③ В. Журавлев,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85－1994г., М., 1995г, с. 250.

④ Р. С. Красилъников, Новые крестоносцы, ЦРУ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М, 2003г, с. 337.

起反斯大林运动，损害苏联的威望[①]；1966 年苏联成立了智囊团，他们使国家无法运用自身潜力[②]；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科是西方代理人，安德罗波夫成立了阴谋集团，以确保摧毁苏联[③]。雅科夫列夫 20 世纪 50 年代即已被美国招募为间谍，而西方再通过他，在他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时将戈尔巴乔夫招募[④]；叶利钦也是西方代理人，与舒什凯维奇、克拉夫丘克签署《别洛韦日协定》，阴谋摧毁苏联[⑤]。不能说是民主派接受和完成了西方的指令，但是，一些政治精英发挥的作用，确实与西方的战略目标具有某种一致性。1990 年，雅科夫列夫率代表团前往立陶宛，返回莫斯科后在苏共中央做报告说，波罗的海的事件是民主化、公开性的胜利，公开支持主张分裂的立陶宛领导人布拉扎乌斯卡斯的分裂活动。随后戈尔巴乔夫前往立陶宛，但他与群众进行对话未能成功。立陶宛领导人已经准备面向西方，摆脱苏联中央。此外，雅科夫列夫还有意曲解历史，毒化人们的意识，制造和加深社会危机。

按照萨宗诺夫的判断，西方代理人在苏联解体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摧毁苏联是在苏联的内外部敌人配合下共同完成的，是一股合力的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而且，应该强调的是：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苏联外部敌人对其采取了颠覆活动，到苏联解体时，西方国家原来对苏联运用的这些方法也都完全继承了。

其次，从 1991 年 8 月到 12 月发生的事件（从“8·19”叛乱到 12 月初，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的别洛韦日丛林密谋）乃是酝酿几十年的反革命活动的完成阶段。签署《别洛韦日丛林协定》是一个违法活动，从法律角度导致了 1922 年的联盟条约和苏联成立宣言被废除。由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发动了国家政变，社会政治面貌已经发生变化。

再次，在西方的协助下，叶利钦及其班子对国家强行实施的资本化、

---

① В. В. Вахания, Террор и заговоры в России (XIV-XXI вв.), М., 2007г, с. 191.

② А. П. Шевякин, разгро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http://zapravdu.ru/content/view/57/51/.

③ А. П. Шевякин, Загадка гибели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заговоров 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 М., 2003г, с. 79.

④ Тамже., с. 221.

⑤ Тамже., с. 239.

市场关系改革，几乎完全摧毁了苏联的工业、军队和中央集权管理体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施的道德规则是与俄罗斯民族和其他各族人民数百年来的道德传统相矛盾的，人为地将国民划分为超级富有的少数人和绝大多数贫穷的国民。

最后，西方和苏联的政治家将苏联被摧毁的进程进行伪造，称之为苏联“解体”，称之为“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客观进程”；但是，在萨宗诺夫的书中列举的1990年到1991年间围绕联盟条约进行的谈判留下的档案文件可以揭示：苏联内部势力——代理人、第五纵队——在西方（首先是美国）特工机构、外交官的支持下，旨在摧毁苏联而进行的协同行动。

例如，马特洛克的著作就坦白地谈及西方在苏联毁灭进程中发挥的颠覆作用。

马特洛克证实，在冷战几十年里，西方国家的大量苏联问题研究中心的对苏宣传，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几代外交官都发挥了破坏性作用。但是，尽管西方早就有摧毁苏联的计划和战略、战术，而苏联的最终解体，问题却主要出在苏联国内。也就是说，西方假手苏联人自身或相互配合将苏联摧垮。而摧毁苏联的主要工作仍然是苏联人自己完成的。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在摧毁苏联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消极的作用。克格勃领导人巴卡京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毁灭的罪魁祸首，但他的优柔寡断、左右摇摆确实促使苏联走向毁灭；但是，“在导致苏联毁灭方面，功劳最大的莫过于叶利钦。他既是摧毁联盟国家政权的思想家，也是执行人。为了客观起见，必须承认这一点”①。

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等人称为苏联这个“病人”的“主治医生”“手术大夫”。马特洛克在其著作中曾直抒胸臆地谈及叶利钦等人在苏联解体进程中的作用：“‘8·19’事件之后，叶利钦吓坏了，但逐渐清醒过来，着手毁灭苏联的政权结构。”②“……当叶利钦成功对抗，并将苏联消灭时，戈尔巴乔夫正在环球旅行，四处告贷……”；“……其他加

① Евгений Стригин, Предавшие СССР, М., 2005г, с. 393.

② Мэтлок Дж, Смерть Империи. Взгляд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посла на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2003г, с. 543.

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行动起来，终结苏联……”① 马特洛克称苏联患上了致命疾病，必须进行医治；在苏联的病症中，有一种病症是滥用权力，因而必须进行手术介入，必须由一些负责任的主治医生应对这一重大任务；马特洛克担心后苏联独立国家会遗传苏联的疾病，会出现类似苏联的品质恶劣的表现，甚至提议成立一个“权威医学专家组成的共同体”，对其进行观察。

2006 年 2 月，为纪念叶利钦 75 岁，俄罗斯国内的民主派和西方政治家对叶利钦大加恭维，马特洛克这样谈及叶利钦：“他在政治上是攻城锤。还是位外科医生，捅开了脓包”；随即问叶利钦：“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说说，你做到的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叶利钦回答：“我认为我做的主要的事情，是国家从共产主义独裁、一党独裁中解放出来，成为进一步变革俄罗斯的基础。俄罗斯变成民主国家。开始在民主的基础上生活。”

2010 年 3 月 27 日，在纪念戈尔巴乔夫改革 25 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由于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苏联被叛卖了。他们聚集在一起商量事情。最初是三个国家，后来是所有的国家……”“……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将叶利钦派到国际竞技场上……他是个危险的人，冒险家，很武断，很大胆，但他是个冒险家……”戈尔巴乔夫再次承认：“……苏联解体并非不可避免，我曾作为最后的保护人为保留苏联而战……苏联是我们自己毁灭的。这已经是我们的失算和错误。是我们的改革者们自己犯了错误……”②

马特洛克甚至表示：摧毁苏联的版本是在华盛顿写好的③。那么，面对叶利钦这样的“攻城锤”“外科医生”，戈尔巴乔夫能不能按照其他脚本行事？他没能展示自己的政治意志和应有的果断，这位苏联首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将苏联拱手相让，但叶利钦并没有接手，而是将其摧毁。

---

① Мэтлок Дж，Смерть Империи. Взгляд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посла на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М.，2003г，с. 542.

② А. А. Сазонов，Кто и как уничтожал СССР?，М.，2010г，с. 186－187.

③ Мэтлок Дж，Смерть Империи. Взгляд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посла на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2003г，с. 567.

结论

《是谁、是怎样摧毁了苏联？——依据档案文献还原苏联解体过程》一书披露了苏联解体进程的线索和全貌，其中还涉及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和细节。这些新刊布的档案文献为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和整个进程提供了更多的佐证，可以帮助我们将对苏联解体根源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苏联并非寿终正寝，而是由苏联国内外的反苏势力联手加以摧毁。正如亚·季诺维耶夫等人指出的那样，尽管苏联曾面临种种困难甚至危机，但苏联还有无限的潜力，她仍有相当的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能力，并非病入膏肓。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承认，苏联解体并非不可避免；而且，“是我们的改革者们自己摧毁了苏联”。但戈尔巴乔夫同时也为自己辩解：直到最后一刻我都在为保留苏联而斗争。

苏联解体始于俄罗斯、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向中央夺取更大的自主权，将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置于无权地位，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覆亡。

此前学界对苏联解体的详细情形了解较少，多是一些粗线条的线索，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深入、细致地还原苏联解体的进程：包括政治精英、民主派、民族主义势力、民族矛盾、持不同政见者、西方政治家和情报部门在此过程中运用的战略和战术、一些事实和数据等，在此基础上，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后果才能有准确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因此，继续挖掘苏联解体进程中的各种主要、次要的细节，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当然，至今为止，许多相关文献仍然不能全面得到，这是研究苏联解体过程的最大困难和障碍。一些公布的文献资料只是部分的真相。一些回忆录多半都从个人利益出发，为自己辩护。必须对不同立场、不同派别的当事人的文献去伪存真，仔细甄别和对照分析。

苏联道路不是历史的绝境*

弗·卡拉什尼科夫著　陈红译

陈红，（1971—　），山东省宁阳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出站博士后，莫斯科国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俄罗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众所周知，看待历史最好有一个时间距离，时至今日，再去回顾分析苏联社会发展道路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也会对其理解得更为深刻、全面。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西方和俄罗斯的统治阶层认为苏联解体至少有两点好处：其一，世界结束了危险的冷战，“恶的帝国”被强行纳入“民主的西方”；其二，共产党把俄罗斯带到了绝境，现在开始转向自由、民主、文明的发展轨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说法越发失去影响力。事实表明，世界在整体上并没有变得更安全，而且，俄罗斯以一些重要发展指标下降的残酷现实取代了所谓社会发展进步的承诺。工业和农业到现在都没有达到 1989 年的水平。社会分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程度较以往增加了 4 倍。从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采用的衡量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来看，俄罗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排名进入前 30，而现在落在 60 名的位置。这个数据完全具有代表性，因为它是在三个主要指标的基础上统计出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受教育水平教育程

---

* 本文选自 2010 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第 9 届普列汉诺夫报告会学术论文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1991：历史的绝境抑或是历史发展的前景》。作者：弗·卡拉什尼科夫，圣彼得堡国立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文化历史教研室主任。

度、人均预期寿命。

我们看到，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俄罗斯开放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它使俄罗斯变成西方发达国家的原料附属国，使得工艺和科学明显落后。更为可怕的是，俄罗斯因资本和人才的流失而逐渐失去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希望。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所产生的负面问题并非短时间内所能解决。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社会道德滑坡，国家和社会的国防潜力全面弱化。连那些激进市场化改革的拥护者也将苏联解体后的几十年称为灾祸不断、危机频发的年代。俄罗斯经济贫困的现实以及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迫使我们必须重新评价苏联的历史。持苏联是“历史绝境”“死路一条”等说法的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竞争不过市场经济，并将此作为主要论据。但是，这种观点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相比之下，苏联比西方的经济发展态势要好，尽管它当时所处的条件对其发展并不利。可以举两组数据来说明该问题：就人类发展指数而言，俄罗斯在 1913 年至 1990 年期间增长了 4.5 倍，而英国增长了 2 倍，美国增长了 2.3 倍。通常人们将苏联的经济发展进程同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经济发展进程进行比较，原则上这种比较在方法论上是不恰当甚至是不地道的。但是尽管如此，做这种比较也并没有得出对资本主义有利的结论。苏联比较分析领域首席专家博罗金的统计很著名，这个统计表明了苏联和美国国民收入的动态发展状况。

表 1　　年人均国民收入苏联/美国　　单位：美元

1951—1955 年	930/4200	1981—1985 年	3535/6825
1961—1965 年	1570/4600	1986—1990 年	4100/7275
1971—1975 年	2635/5900		

从以上数据可见，二战后苏联逐渐缩小了与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差距，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苏联年人均国民收入占美国年人均国民收入的 22%，而到 80 年代末期，这个数字已提高到了 56%，这说明苏联经济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对于这个事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极力掩饰，他们在自己的统计结果中通常考虑的不是实际商品生产的变动（国民收入指标）情况，而主要考察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商品和服务的变动情况。1970—1980 年，在西方国家，服务价格的增长速度

比商品价格的增长速度要快，以至于造成西方经济发展更富有活力的印象。

表 2　　苏联社会经济增长基本指标　　单位：%

年份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国民收入	41	28	21	17
工业	50	43	24	20
农业	21	13	9	6
劳动生产率	37	23	17	16.5
人均实际收入	33	24	18	11

从表 2 可以看到，社会经济增长基本指标在下降，经济发展速度变慢。不过，这个原因很明显。主要在于，苏联的经济逐渐转向粗放型发展道路。这样，如果国民经济部门年均就业人数提高 1.5%，那么，最后 3 个五年计划中这个增量分别为 1.3%、0.5%、0.1%。第二个原因和发展优先地位的转变紧密相连，所得利润的大部分用于增加消费，较少的部分用于发展生产。表 3 生动地表明资本投入和相关主要指标增长速度降低的情况。

表 3　　年均增长速度　　单位：%

年份	1960—1970	1971—1980	1981—1985
资本投入	7.6	5.1	3.7
工业	8.5	6	3.7
农业	3.3	1.2	1.1

居民生活水平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发展速度最快。1965—1985 年工人和职员的月工资平均从 100 卢布提高到 190 卢布。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庄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减少：在 50 年代二者之间的收入比例是 3∶1，80 年代是 10∶8。集体农庄的庄员开始每个月都有工资收入，退休金和奖学金额度有所提高，住宅建设持续进行，从 1965 年到 1985 年城市居住面积也在增加。已形成的经济能力使得国家有可能在保证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完成了另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形成

了核导弹的能力，这对任何情况下的任何侵略者都有很强的震慑力，使之可能遭受巨大损失。因此，1970—1980 年苏联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比较棘手的，但还远谈不上是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苏联后几十年的经验表明，苏联的经济有着很强大的稳定因素，但是，俄罗斯现在的市场经济却把苏联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潜力消失殆尽，一些严谨的经济学家都不否认这个观点。在此还需提及，在苏联解体之前不曾有一个严谨的经济学家预言苏联经济的崩溃，恰恰相反，20 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捷夫 1977 年出版了《世界经济的未来》一书，书中对到 2000 年的世界经济发展进行了预测，它对苏联经济的预言是非常好的。

如果谈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困扰百姓的实际经济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国内生产的商品质量越来越不能让百姓满意，因为在苏联信息日渐开放的条件下，人们了解了西方生产的产品质量，相比之下，感觉国内生产的商品质量不尽如人意；第二，高质量商品脱销，甚至是日常消费品脱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肉和肉制品）。

这些问题是由社会主义发展体制弊端造成的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使人想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生产的日用品质量很好，苏联百姓很愿意购买。这个问题也会使人想到今天市场化的俄罗斯，其生产的产品很多都逊色于进口商品。因此，国内生产的产品质量不高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体制弊端，而在于其他别的方面。如果谈到肉类的脱销，我们也可以说，无论是在民主德国，还是在波兰和匈牙利，都没出现肉类脱销的状况。在这些国家，为了把肉类的日常需求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通常把肉类价格定得比较高。换句话说，这些日用品脱销的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主义体制，而是具体的经济政策。

通常，资本主义激进的市场化改革者总举这样的例子为自己做证，证明改革的成功，即消除了苏联时期的商品脱销和与此相连的排得长长的队伍。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但是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更为重要：俄罗斯市场物品丰富靠的不是后苏联市场经济的活力，而是财政措施，即放开了以前排队购买的所有商品的价格，而这些商品大多数百姓购买不起。此外，俄罗斯商品柜台货品丰富的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市场对国外日用品市场开放，而这是拿什么来交换的呢？那就是石油、天然气、金属、森林等。同时，自由主义者经常说，苏联经济不可避免地依赖载能体出口，但是现在这种依赖要比以前增加好几倍。

苏联经济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并没有依靠后苏联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得到解决，相反却日趋严重。后苏联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得“苏联死路一条”等观点变成软弱无力的宣传神话，而且不仅暴露了其缺陷，同时也彰显了苏联道路的巨大潜力和永恒价值。如果把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主要指标相比较的话，可以说苏联所呈现的画面是令人欣慰的。甚至就是在 1990 年，大多数居民依然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1990 年国内共建设 6200 万平方米的住房，假如每年都按此数据计算，那么每年住房面积的增量是零，但是，坚持十年，这个数据就会总共达到 6.2 亿平方米。可是市场化后，这个住房建设面积明显降低（2000 年是 3000 万平方米），这样的住房，俄罗斯公民很难享受得起了。总之，后苏联的发展现状表明，苏联的道路不是历史的绝境。

阿·舍维亚金：《巨大的地缘灾难：苏联是怎样被摧毁的》*

徐海燕编译

徐海燕，汉族，法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独联体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的比较研究。代表作有：《独联体政治转轨：实践·反思·发展》《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哈萨克斯坦》等。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政治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红旗文稿》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苏联解体不仅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也是苏联历史的一个大谜团：没有遇到重大历史事件，没有遇到任何重大的军事失败，没有饥荒，没有自然灾害，却在短短几年内就被摧毁了！通过大量的解密信息进行分析后，作者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怎样摧毁了苏联？

本书的立意与主题

本书始终围绕这样一个前提展开，即苏联是如何被摧毁、瓦解的。作者认为，苏联解体是新型化战争的结果。

首先是摧毁苏联运用了新型的战略原则。摧毁、瓦解苏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苏联如堡垒般坚不可摧。虽然这一观点最初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 М. И. 加里宁在1934年11月提出的，但在西方，首先是美国，对苏联的评价也是大致如此。相关文献中常常会引用约翰·F. 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说的话："常规战中我们不能打败苏联。它是一座不可攻克

---

* А. П. Шевякин Как убили СССР.《Величайш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М, 2011.

的堡垒。我们要打败苏联只能通过其他方法：通过意识形态、心理学、宣传鼓动、经济等途径。”摧毁苏联需要发动一场非常规战争。谁该为发生的事情负责？“罪魁祸首是谁：是政权危机吗？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欲望，还是组织变革？都不是，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战争。”而美国在这场组织战中起到了“智能中枢”的角色。作者指出“与通常的战争相比——与其摧毁敌国的领土，不如将其保存……因此，发动 100 次战争并取得 100 次战争的胜利，这并不算是战争的最好结果。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胜的方式，没有围攻就占领别人堡垒，没有长期的征战就推翻敌国政权才是最好的结果。因此，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赢得一切战争的‘红利’，这就是战略性进攻的规则”。

其次是摧毁苏联的新型战争的特征。作者指出，如果单纯以“苏联是一个堡垒”为出发点研究苏联解体的问题，研究结论将会局限在安全领域。而本书向读者揭示的则是西方对苏联更为全面的、非常规的、新等级的战争——“组织战”，其主要特征为：这场战争的“战场”已悄无声息地转移到苏联高层首脑办公室里、协商会议和例行会议、全体会议和议会辩论中，甚至在官方场合之外的非正式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场合。通常也被称为非传统战争。

新型战争是由组织严密的控制系统来发动的。这种“战争”的实质在于，控制体系中应该实行必要的多样性规则：控制子系统的主系统应该与被动控制的子系统相适应。为了保证系统的动态平衡，必须使系统内部诸多管理组件与被管理的客体相互协调，子系统应该与主系统相互配合。违反了这一原则就会导致控制系统的自我毁灭。这一系统进行运作后，通过“培养的自己人”的帮助，制造管理危机，促使一些遗留尚未解决的问题逐渐尖锐化，通过信息 - 管理中心机制的回应，就可以完全消灭苏联。

再次是苏联最高权力体系被削弱是发动新型战争的前提。政治自由化“既成为发生改变的最重要因素，也是进行决策时的约束”。政治自由化对苏联极其危险。因为，苏联是一个独特的超级系统。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由一个中心（克里姆林中心）对 1800 万名党员，政党 - 国家管理机构，对所有的经济机构（企业、协会、组织、机构）、军队、警察等的直接管理。苏联政权的高度集权的客观现实，给予一种可能性的结果，即这个权力中心一旦被摧毁，整个体系就会被颠覆。作者指出，在最短的时

期内这个管理主体被攻击、被削弱，失去抵抗力，直至被毁灭，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一切与苏联所谓的“改革”无法脱离关系：“随意性、主观性导致了管理机构的经常性改革，无休止的重组都持续几个月使相关领域的管理陷入瘫痪，重组组织在真空状态下控制了大量的高素质专家的队伍。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期间进行过的重组数不胜数！”最终得到的结局是，1991 年 12 月 25 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厅时任总统戈尔巴乔夫签署了 УП3162 号《关于免去苏联总统最高军事指挥权并解散总统国防委员会的命令》，之后他把总统的象征——核手提箱交给了继任者 Б. Н. 叶利钦。

最后是在苏联政治体系的中心培养“代理人”破坏了苏共中央的权威。作者认为，苏联虽然如堡垒一样坚不可摧，但世界上并不存在“没有小人都出卖不了的堡垒”。解体前夕，政治自由化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破坏了苏共中央的凝聚力。作者指出，“干部要起到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能让这些干部处于由宗旨明确统一的组织内部下进行的”。敌对势力为实现苏联政治自由化的手段恰恰是让中央体系内存在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的官员、团队，来削弱苏共中央的权威。

作者认同当前有关苏联解体的一个观点，即苏联解体前夕的改革可以直接被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并对此加以补充两种观点：这种“革命”的欲望首先来自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的精英，来自他们内心强烈的自主控制与支配财富的欲望。地区精英们的行为是不一致的：一些人追求获得最大化的自主性；一些人则搭大家的顺风车，不要求太多（自主），但也不能太少；一些人相当满足于现状；而一些人到最后才参与到联合行动中，从没有想到过置身于新联盟条约之外；等等。

书中对 М. С. 戈尔巴乔夫与 Б. Н. 叶利钦在苏联被摧毁进程中的作用进行评论。М. С. 戈尔巴乔夫和 Б. Н. 叶利钦对苏联被摧毁应承担法律责任，作者对此毫无异议。但作者同时认为，苏联被摧毁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智力问题，甚至原则上一开始就没有解决方案。仅仅进行构想或许就需要启动全世界最优秀的智力力量。对于 М. С. 戈尔巴乔夫与 Б. Н. 叶利钦这两个大脑贫瘠的人（前者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法律系和农业学院的经济系，后者毕业于建筑系）是否具有相应的智力和能力来摧毁苏联，他又表示怀疑。

遗憾的是，当时苏联只有极少的政治家意识到了“自由化”的危险

（如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他认为苏联政治体系的自由化现象是一场“针对政府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其最终目标是瓦解国家政权）。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心，苏联解体前夕，各共和国失去了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他指出，“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如果东欧国家背离不可避免，波罗的海三国和高加索地区，以及其他斯拉夫共和国等可能会与联盟中央解除关系，但如果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联盟中央，那么，联盟还是有可能保存哪怕在几种区域的形式中”。

国外势力瞄准的目标

要证明毁灭苏联的建议是从国外渗透进来的很难，但可以做到。同从前一样，主要有一点：一些研究中心清楚这些破坏自组织机制的活动原理。

曾有一门学科叫“克里姆林宫学”（kremlelogy 或写成 kremlinology），它实质上属于苏维埃学或苏维埃理论的一部分。比如，兰德公司常常提到克里姆林宫学方法。后来学者们研究的是苏联管理系统的削减方案，而不仅仅是至今还不断有人乱写的轮值总书记们的健康状况。

与苏联知识分子不同，克里姆林宫学学者确实活在自由世界里，他们总是能反反复复纠缠苏维埃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冷战活动家一开始就研究苏联的权力和管理体系，尤其是用“克里姆林宫”来代指的领导层。苏维埃学家中有一位叫拉什的人，他的著作中对苏维埃组织做了很好的描述：“组织的任务”。已定规划要求专制机构秩序完善，不会在规划完成阶段内部发生冲突。如果沿袭下来的权力体系在此阶段运转无效，那么危机会导致一些人或党团强制夺权，组织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加入权力的斗争。斯大林权力体系的特点是，组织不能脱离他而存在。赫鲁晓夫权力体系虽然反映了他的强硬个性，但他的这种权力体系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本质上这种体系同斯大林专政初期所推行的体系有共同之处。如果现在由个性完全不同的人（像赫鲁晓夫和斯大林一样）来领导这种体系的话，可能不管是哪个有经验的专政者都会这么做。除此之外，这种权力形式还表现出了自身的韧性。原因是在推行斯大林社会革命和赫鲁晓夫社会改革时它都成了有效的工具。对于斯大林来说，要解决的组织问题也包括在实现他构想的过程中保证国家权力体系的完好无损。上文已经提到，居于权力体系中心的是“党的机器”（党组织）的统

治权。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接近权力利用的就是“党的机器”。“党的机器”不仅是斗争的纲领性手段，还被赫鲁晓夫选为制定战略和专政的工具。尽管赫鲁晓夫频繁地推行行政改革，尝试各样的管理苏联社会的方法，但党的机器不仅保持了独立，而且还对其他管理机构加强了影响。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被邀请到党的组织，以提高党组织从上到下监控经济官僚主义的能力。改变方针的新趋势巩固了国家主要经济领域，但是党中央也相对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1958 年之后，政治警察代替了已经升职的国家安全机构人员负责领导地方机关工作人员。党加大了对军队的控制，增加了领导组织的数目，以保证党的书记处对复杂混乱系统的直接领导。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内部对这些人的行为做过总结：一个统计爱好者算过，从 1917 年 10 月到 1988 年，西方的政治学专家、新闻工作者、军队人士、简单的苏维埃问题爱好者就提出了 500 多种摧毁苏联的方案。今天我想要指出 60 年代提出的一种方案。这种方案不仅在当时，在当今的政治学家中间流传也都相当广泛……西方对苏联的军事胜利因为代价巨大而不可行。击溃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最可靠的方法是摧毁支撑苏联的三大支柱：党、军队和克格勃。

不可能的悲剧还是在苏联发生了。究其原因是苏联领导人遵照西方操纵者的指示亲手毁了苏联。

组织战的实质

有别于其他形式的斗争，组织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夺权或者摧毁组织机构，并以摧毁对方最具威胁性的子系统为前提。战争的预备期结束后开始的是活跃期。在活跃期，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会引发其他一些组织被破坏。在战争胜利后，战败的一方会被要求继续废除一些机构，以不使其组织实力重新凝聚。

简单地可以将其称为“断送一个国家”。不像常规军事侵略的一蹴而就，这种断送是缓慢的、分步骤的，不是在领土占领上，而是在功能上。今天是这个组织的功能被摧毁，明天是另一个。国家管理体系中会出现黑色漏洞。

“改革”是这类现象的特别举动，类似的还有像“意识行动——这是

一种以心理为形式，以文明为内容，以信息为手段，协调良好的，迷惑对手、偷换对手价值观取向的大规模行动”。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继续了赫鲁晓夫时期未完成的事业。管理体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为什么 20 世纪 80 年代重复“组织洗牌”有可能呢？这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进行认真分析，没有详尽研究所发生的事情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没有对那些从最温和到最强硬的用语给出评判，没有对以后如何避免给出建议。

部门间的战争

解体的潜在可能性根源于任何一个整体中最关键的部分。任何国家都会把国家机构划分成各个部门，“整个国家眼看着被分解成各个部门的领地，而且这些部门只有自己的局部利益。苏联变得有点像个橙子：从表面看起来是个华丽的整体，剥开皮看到的却是一片一片的，它们要么是不同的部门，要么是不同的加盟共和国”。

对于发生在苏联的可以称为：改组、对等消灭。

一切都开始于第一阶段，打着机构要摆脱勃列日涅夫时期蔓延开的官僚主义的口号将其清理。那个时候就执行了一定范围内的官位等级改革，这种改革方针很危险。如果斯大林时期的清洗首先从个别企业的老专家和官员开始，高层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大约在 1937 年被清理了的话，那么 1982 年开始的清理贯穿了整个体系。把这种情况比作好似潜水艇超越了规定的潜水深度也很恰当，结果是把对组织的清理同消灭混淆了。党的机构丢了这场部门间的战争，它只需要搬离办公的地方。

“另一个合理的想法”发起内部争执；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可以批判整个苏联共产党。这也不难理解，一切都会根据愿意被清算、纠正。

就像可以向苏联克格勃发布逮捕令，逮捕那些犯了错的军官甚至将军，或是他们自己的领导。但是，对整体机构采取行动是绝对不行的。

那些用不同方式来解释世界的苏联哲学家曾多次写过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矛盾（列宁批准他们写的，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制度下消失的只有对抗，矛盾依然会存在），当然，他们并不能从所有层面来描述莫斯科部门中各个机构间的矛盾。

但国家后期的矛盾大多是人为制造的，且在高层领导中播下了不和的

种子：政治战术有时候被称为“权力中心的游离”战术。这一点在人为形成两个政权并存期加剧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之间的斗争时期鲜明地表现出来了。那个时候权力完全转移到了最高苏维埃，苏共中央会事实上被孤立，而议会的掌权稍纵即逝。戈尔巴乔夫立即建立了新的过渡时期的权力形式，出台了所谓的“新奥加廖沃进程”。

如此看来，党和苏维埃的组织武器对准的是武器的掌握者。由此“分而治之”的世纪准则开始应验。

心理战：对准一党至上

苏共第二十七届代表大会的前夕就开始了对机关的讨伐。军队中党的干部成了民主报刊最痛恨的对象。不可否认，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官员是众多反面形象之一。

政论文中开始（把苏联）与西方的管理体系比较：说在西方公务员都是通过考试才能上岗，而且还要定期测验。西方民主国家的部长们不能在立法机构任职，原因很简单：“自己写歌自己唱”的规则会导致恶性循环。事实也证明，部长可以不是技术型专家官员，但一定要是政治家。如果我们不存在这一点，那一切事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了。“肥差”一定会让自己人来干。于是就有了腐败、贿赂、礼尚往来和毫无根据的特权。

媒体对读者使出的狂轰滥炸奏效了。媒体在某些领域有了一些权力，而读者很难区分反苏宣传中那些批评是公正的。结果就是像人们常说的：连孩子带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Г. Х. 波波夫抛出了一个概念模糊的专业术语“行政指令体系”。仔细想的话这个概念没有实质含义。这个词被媒体赞为精神权威，甚至缩写成了“АКС”。好像这个词能解释苏联体制似的，开始使用起来，又好像是苏联独创，能事先决定苏联人民生活似的。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有行政指令的“断层”，且无一例外。军队、教会、斯韦什尼科夫合唱团——所有这些事物同其他事物一样都有自身的行政指令表现形式。反苏思想家深思熟虑后将行政指令体系简写为АКС，他们是想表达在任何“文明的”国家不可能有行政指令体系之说，发挥作用的只有经济杠杆。这也真有点愚钝了——任何银行、公司，国家部门就更不用说了，其内部都运行着按层级设定好的“行政指令体系”

[9. 第 38—39 页]。

媒体将高层和党员干部称为党阀，将普通党员称为共党分子和/或者赤化分子。

一切人和事不断地抹黑，要求提交纽伦堡一类的法庭审判（此时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希特勒时期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相提并论）。

此外又添了几出闹剧：时而是叶利钦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抗议性的转变，时而是导演 M. 扎哈罗夫用摄像机记录下来的焚烧党员证的场面，又时而是 P. 梅德韦杰夫对《论据与事实》挑衅性的提问，即苏共对苏联时期的所有不幸负有全部责任时，给出的糟糕透顶的回答，等等，诸如此类的一切都在冲击着人们的意识，破坏着党和社会成员的团结，导致了党员纷纷退党。

“党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口号早已支离破碎，也已经不符合现实状况了。

从 1987 年解雇了 1 万名警察来看，戈尔巴乔夫时期改组的主要对象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关。

人民开始选择站在这些“受害者”一边，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即早就对党机关的人员，更直接地说，就是对机构的领导者有意见了：国家应该是由一些懂行的人担任领导。不懂行不仅仅是因为缺少学习的动力，更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懒惰和愚钝。进行生产、实际操作这些人都不行，但在党的机关不需要懂行。因此，战后党的机关成了又懒又自傲的蠢人梦寐以求的地方。这些蠢材还真都一窝蜂地挤进去了。

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心理战。把某一个官员作为目标，集中火力地对他施加影响，最终将其异化。

苏联共产党

摧毁苏共是组织现象。摧毁是人为推动的，目标明确而迅速。因为苏共的特点就是数量庞大，它作为凝聚剂支撑着苏联体系。苏共发挥最重要、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整合体系——保证政治体系内部的完整和一致，否则政治体系就会漏洞百出。党章关于社会主义化的规定是其整合功能的重要部分，也是其扩大队伍的政治特权。

苏联是个地域广阔的国家：横跨十多个时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绵延数千公里。受公路、铁路不通畅和极端气候的影响，中央和各居民点的

沟通更加困难。极端气候把辽阔的疆土（实际上大部分是农业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也是）分成了一年中不同的时节。政治体系的维持对于政府来说是一大难题，对于之前的帝国统治者来说情况也是如此。驻扎在全国各地、纪律严明的军队作为辅助可以确保忠诚，确保中央指示的贯彻。这是可能的，斯大林统治下也曾这样。也不是一定必须要依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

加之苏联居民之间存在差别，这也就威胁了社会的完整性。苏联各民族人民在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宗教、历史、经济方面彼此各异；一些严谨的观察家认识到所谓的“苏联人民”只是传说罢了。他们因民族不同，价值观也各异。共产党作为政治制度的中心，是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上可以统筹这些群体的工具——事实上共产党也在力图使自己在社会中更具代表性（共产党该作为先锋队）。这实际是苏联独一无二的象征。最终，苏共统一的组织作为强有力的杠杆平衡了苏联的联邦国家结构。虽然除俄罗斯联邦以外（俄罗斯联邦有自身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所有的联邦共和国内都有不同的党组织，但苏联国家指出党不是联邦组织。党有自身的章程、纲领、党员证，自治共和国和联邦共和国的党组织是苏联区域性的组织。

这也就意味着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隶属于中央机构，是中央机构的代表，因此政治中心能实施罗名制用人制度，并把人员派往全国各地。政府内特定的领域——尤其是文化和教育方面也由共和国政府任命；法律上存在的差异反映了地方传统和需求的差异。但是自上而下由民主集中制贯穿起来的统一的党机构确保了没有一个共和国或者民族团体会偏离莫斯科中央政权确定的路线。考虑到国家地理和社会差别，党避免不了要充当这种角色。

事实上这里也有很多机会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形式和方法。虽然党的工作有许多不足，但正如我们所见，由于党所扮演的角色，它密切了同其他的部门的关系［3.92. 第102—103页］。

分裂统一党的活动是从托洛茨基时期照搬过来的，并按步骤开始。然而苏共机构过于庞大不能顷刻间就支离破碎。于是决定不从整个机构，而是从各个共和国机构层面着手。二十七大上通过了允许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纲领性文件。

于是这个过程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也不是立刻就达到了目的。直到 1989 年 12 月 7 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才取消了宪法第六条。1989 年 12 月 19 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上宣布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1989 年 12 月 25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试图讨论这一问题。会议决定继续对这一问题加以研究，之后又召开了一次全会，但什么用都没有，立陶宛共产党依旧一意孤行。

既然党的角色被写入宪法，那么就必须将其从中删除。于是开始了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的过程），让人无法理解。直到 1990 年 3 月 11 日苏共中央全会根据 M. C. 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决定宪法不再保障苏共专政这一进程才结束。

有人曾指出过这样的问题：俄罗斯联邦是唯一一个没有自己政党的加盟共和国。于是，共和国媒体顺势大加附和。但是冠冕堂皇的背后却存在彻底分裂的危险。两者当选其一：要么保留党，要么保留联盟。

1989 年 6 月 19 日是俄罗斯党代会的第一天。会议从 M. C. 戈尔巴乔夫的发言开始，之后又有人发言作副报告。6 月 20 日大会决定“将俄罗斯党代会改成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6 月 21 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决议》。之后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宣言》和大会《致各联邦共和国共产党书》。22 日通过了《致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书》。23 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第一阶段工作会议闭会。第一阶段选举了俄罗斯联邦党中央委员会 153 名委员和第一书记 И. К. 波洛兹科夫。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在 9 月 4—6 日举行。同意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行动导向为苏共二十八大文件声明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和苏共章程。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新章程，其中二十二条允许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有自主权。简直再好不过了！设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最高领导机构来领导 1000 万名共产党员原则上为同民主派斗争的成功提供了机会，但却没有兑现并发挥作用。

那个时候一些苏共党员开始退党。退党的动机也不尽相同：那些不想留在党内的人同叛徒一起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支持保留社会主义的人在二十八大确立市场方针后退了党。另一些是受到污蔑中伤的人。因此，退出苏共队伍也成为苏联政权不断受到颠覆的指示器和苏共衰落的晴雨表。

直捣苏共倾覆的最后一个法案，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 1991 年 7 月 20 日签署的关于暂停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活动的总统令。该法

令是1991年8月13日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主题。党的附属机构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改编则相对简单，采用的是传统的方法。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曾是最大的组织。共青团在全盛时期成员达到高峰，约有4000万人。事实上，青年全体没有特别的划分，但共青团队伍作为标杆，青年们对它心生向往。此处有很多地方容易受到批评。区－市委员会的领导不再参与政治。共青团通过了关于这些机构的经济结算活动的决议，同时设立了青年人科技创新组织（HTTM）。除此之外，为了领导发展，面向未来，共青团领导都是很积极的年轻人，着手开始工作。这是E. K. 利加乔夫很擅长做的事，他总是把自己直接参与的事情理想化，即使地方上惊慌发来关于共青团解散的信件，他也没有打算要停止HTTM的活动，而且在共青团二十大上提出要禁止时还对此予以捍卫。

他坚决捍卫“共青团经济”的税收优惠是值得称颂的地方［3.94. 第8页］。也由此掀开了社会经济新的一页：社会主义成分被侵蚀，出现了资产阶级——后来被称为寡头的人也是由此出现。英雄一时的苏联列宁主义共青团平和地解散了，1991年10月初最后一次共青团代表大会——二十一大上自行解散成了各加盟共和国组织。

苏联列宁少年先锋队是被亲西方势力和与西方童子军有勾结的组织摧毁的。

党的政权开始过渡到国家政权。

党的纪律

当我们现在逐步研究机构的自我解体的原因时，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可能？而且还是如此之大的规模？不管有多蹊跷，第一个原因就在于官员的依附性和执行性。苏共以党的纪律为大，上级的指示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且级别越高执行强度越大。

对于一些新人来说“在苏共中央机构中的转变……（过程）相当痛苦……，不仅仅是因为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也是因为这完全是另一种关系规则，从指导员到中央总书记所有职位级别服从要求严格。老广场和其栖息者按照只有他们自己清楚的规则和习性生存，命令执行得无可指摘。

多年来党全面领导社会生活形成了建立在严格的纪律和服从且几乎无障碍的基础之上的机构制度……

不得不承认，苏共中央机关及其工作对于抑制自傲，培养组织性和纪

律性来说是一所好学校，能把握分析国家内部事件的进展。然而代价也不小。换个角度来说，它剥夺了工作人员高度的自主性，使其不再有首创精神。中央机构中更看重服从性和执行性”［22. 第 68—69 页］。

党的纪律在“老广场”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我有位认识的人是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他一点都不愚钝，还很正派。前不久他跟我说，如果在 1986 年的寒冬把他们列队召集到涅瓦河桥上并命令他们一头跳下去，即使看到了涅瓦河上厚厚的冰，他们还是会毫无怨言地跳下去的。”

人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苏共解体落幕的时候 A. H. 雅科夫列夫公开谈到了这一点：“应当从内部开始着手。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通过集权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集权制。我们做到了。”

这就是苏共政治机制的实质。

当今有没有组织战争？

不幸的根源在于外在所强加的标语性概念，它们至今还留存在多数人的意识里：我不支持苏联的行政命令制度，更不拥护他的专制管理体制，我相信要破坏现有的管理体制，首先要各个击破，再分部分构建新的混合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内要有限度地将市场和非市场（行政）调节结合起来。我们的改革设计者从根本上破坏了现有的管理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新的、适宜的制度［1. 第 76 页］。况且他还是控制论学院士！严谨的学者不会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诚然，如果人们没有“组织战争”这一专有名词的概念的话，也就不会有事实上的行动了。

要是有人从“改革”中作总结的话那肯定不是我们的管理干部，而是如何给我们带来损失并加以运用的人——美国的现代组织者。

国际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严重解体，结构都变得涣散。东欧的共产党完全被消灭，而在西欧则被清除了。也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但它们在选举中都落败了。主要不在于它们力量弱小，而在于这些已不是本来的面目，群众觉得不真实，加入的积极性不高。如果不推翻列宁时期的组织制度，那它们未必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

很多人会问：我们有未来吗？我们是否还能建立起伟大的国家——哪怕不是国土上强大，而是实力上强大？然而，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成熟地在新层面上重新学习管理体制；能否迅速找到有能力在新条件下管理的人才（而现在他们被一些泛泛空谈的人掩盖了起来）；是否能找到国家

与社会共存的新形式:“社会里的许多人过去依赖,将来还会受制于国家自身的组织形式。发布原则并不复杂……制定一整套保证相关原则现实性和行动性制度是需要意志、诚实、精力和时间的任务。有时候常常会被设立或描述这样或那样的国家制度所局限。然而由于每个国家制度组织规范定义的现实性,主要还在于这个制度如何运转,也就是说融入社会并对特定的现象产生影响。

现实性和行动性是组织制度中主要的部分。如果从这一点来评价已经完成的工作的话,则会留下双重印象。在俄罗斯联邦,重要的国家管理部门有将近100万个岗位,它们存在于各级(联邦内、联邦主体内、地方自治内)、各种不同的大的国家机构。你剥夺不了它们在法规和行动上表现出的管理积极性。然而当你看到社会进程的管理水平时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国家机构多数情况下的运转是无效的,既没有涵盖也没有达到人们的特定目标。没有抽出时间进行组织调整或者其内部没有包含必要的力量。”

巴纳林和他的《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

郭　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后，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一　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巴纳林个人简介

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巴纳林1958年10月30日出生于苏联，当代俄罗斯政治学家，心理学副博士，政治学博士，军事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外交部外交研究院教授，[①] 俄联邦独联体事务专家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克格勃属下的奥廖尔军校，1976年加入克格勃，后进入列宁军事－政治科学院学习并获得心理学部的金质奖章，1991年作为苏联军事科学院的毕业生代表受邀在克里米亚参加毕业典礼并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接见。[②]

苏联解体后，巴纳林1999—2003年在俄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情报分析部门工作。2006—2007年任俄罗斯航天局新闻秘书。1993年获得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军官在新设施条件下活动的心理因素》，1997年获得俄联邦总统下属的俄罗斯公共行政科学院的政治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信息—心理保障》。[③]

巴纳林参加了1998年在奥地利举办的国际会议，首次提出对美国可

---

① http：//publ. lib. ru/ARCHIVES/P/PANARIN_ Igor'_ Nikolaevich/_ Panarin_ I. N. . html.

② http：//detectivebooks. ru/book/25370770/？ page = 1.

③ https：//ru. wikipedia. org/wiki/Панарин，_ Игорь_ Николаевич.

能崩溃的假设。2005 年 2 月，他提出了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宣传制度改革作为国家外交政策宣传和信息战的首要举措，并提出建立俄罗斯的公共外交委员会，2008 年 12 月提出成立俄罗斯信息安全服务委员会，进行信息方面的反间谍工作。他还建议将“俄罗斯之声”和“俄新社”纳入外交部，并建立在独联体、欧盟和美国境内活动的俄罗斯非政府组织。

巴纳林始终利用各种渠道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他参加了在全球各国举办的相关会议，参与许多当代俄罗斯主要电视电台播放的新闻和时事节目录制，如参与俄罗斯第一频道、PTP、HTB、TBЦ、Рен-TB、今日俄罗斯等电视节目的录制，参与的广播节目主要有俄罗斯之声、俄罗斯收音机、莫斯科回声、玛雅克之声等[①]。从 2009 年 5 月 20 日开始巴纳林在“俄罗斯之声”开设每周固定的个人专栏广播节目“世界政治”,[②] 对当代世界的尖锐和紧迫问题、对策和俄罗斯的现实发表个人评论。

巴纳林先后写作了大量关于信息战的著作，如《信息战与俄罗斯》《信息战与政权》《信息、外交、心理》《信息战的技术》《信息战：在巴什基尔的胜利》《信息战与外交》《信息战与第三罗马》《信息战、公关与世界政治》《为了未来俄罗斯的信息战》《美元的崩溃和美国的解体》《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苏联的崩溃》《危机后的世界，接下来是什么?》《信息战与沟通》《俄罗斯的克里米亚与美国的崩溃》等。[③]

二 信息战的代表作——《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苏联的崩溃》

《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苏联的崩溃》一书是巴纳林的信息战系列著作之一，该书于 2010 年由圣彼得堡的彼得堡书屋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分析当前的俄罗斯国内外政治形势入手，认为当代正在进行的是针对俄罗斯和普京个人的信息战争，此战是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策划的系统信息战争。由当代而追溯历史，从信息战的角度解析苏联的解体。

《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苏联的崩溃》一书共分为 14 章，每个章节

① http：//publ. lib. ru/ARCHIVES/P/PANARIN_ Igor'_ Nikolaevich/_ Panarin_ I. N. . html.

② https：//ru. wikipedia. org/wiki/Панарин，_ Игорь_ Николаевич.

③ Ibid.

篇幅不一，有的章节字数并不多，甚至有些内容太过简单。作者一开始从信息战的理论开始入手，分析了导致苏联解体的信息战中交战双方的诸多重要人物，如斯大林、凯南、丘吉尔、洛克菲勒、里根、戈尔巴乔夫等分别在信息战中的表现，认为正是来自英美的外部力量和苏联内部的“第五纵队”的联合作战才导致了苏联的解体。①

书中提出的第一个重要观点是：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的起止时间为 1943 年到苏联解体②，即第一次世界信息战进行了 48 年，英国是发动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的主要倡导者，丘吉尔是总导演，其目的是希望保存英国的世界威力和巨大的版图。作者提出，人们通常习惯认为，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起源于丘吉尔 1946 年春的富尔顿演讲之后。但事实不是这样，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始于 1943 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和库尔斯克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之后，1943 年 8 月 20 日在加拿大魁北克进行的英－美会谈中就开始了针对苏联的信息战，当时丘吉尔首次提出德国法西斯军队应该尽量在东方继续阻拦俄国军队。但当时的结果对英国来说是令人失望的。在第一次世界信息战开始的三年后，1946 年大英帝国殖民体系分崩离析。这样，1891 年研究制订的建立全球不列颠帝国的战略计划没有实现，原因是最高统帅斯大林的专业精神和最好的苏联特务部门“锄奸部”的工作。③

巴纳林肯定了丘吉尔在信息战的战略上的精心安排，他认为丘吉尔制定的反苏信息战的意图很简单：通过进行特殊的和秘密的信息行动影响法西斯德国的决策过程，达到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单独媾和并将法西斯德国军队的一切力量用于与苏联的厮杀。巴纳林认为这是信息战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开的和秘密的信息活动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信息战的导演经常会试图掩饰自己的真正意图。因此在魁北克会议上提出了两个计划，众所周知的“霸王”作战计划取得了优先地位。但另一个计划就鲜为人知了，它的目标是未被打败的德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转向对付俄国。因此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计划应该是与西方强国勾结，破坏西部战线，在诺曼底登陆时给予援助，保证盟军快速经过法国、德国，进入他们遏制苏联军队的战线。

---

① http：//fanread. ru/book/8327810/？ page = 38.

② http：//zerkalov. org. ua/node/5595.

③ https：//topwar. ru/19515-pervaya-mirovaya-informacionnaya-voyna-1943 – 1991. html.

与此相应，英美应该进入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索菲亚、维也纳、贝尔格莱德……因此德军在西线应该不是简单退让，而是有计划地向东运动以便加强那里的德军防御体系。该计划的某些组成部分（诺曼底登陆时的援助，保证盟军快速通过法国）实现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行为可能就是与在法国的以埃尔温·隆美尔为首的德国将军们被收买有关。[①] 因此巴纳林认为该阶段信息战的目标就是组织特殊行为形成报纸上的大量长期的操纵性的评论，形成对待英美盟军行为的一定的看法或态度，尤其是针对苏联的虚假报道。让这些评论影响信息战对手——斯大林和苏联军政领导的心理，让他们认为开辟第二战场有利于降低苏联的损失。巴纳林认为，当时的情境是：不管盟军是否开辟第二战线，苏联都能够在柏林结束战争。即根本就不需要第二战场，它的意义仅在于减少损失，缩短战争期限，建立二战后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合作的基础。而且这种观点在伦敦和华盛顿都得到了支持，因此英美领导人在魁北克会晤并讨论了与苏联战斗的秘密计划，甚至是利用德国法西斯军队与苏联战斗。巴纳林还指出华盛顿的国家图书馆现存的一份资料证实，魁北克会议讨论了美英与纳粹将军们结盟的行动问题以便协调反对苏联的共同军事行动。[②] 书中认为，1943 年开始的信息战的初级阶段最终失败得益于斯大林对付信息战的强大能力。

书中还详细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认为反对苏联的系统的和有针对性地进行的全球信息战争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外因是外部的信息战对手从 1943 年就开始进行精心的策划并实施瓦解苏联的措施，内因则是苏联自身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特务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反对苏联的信息战最终能够成功只是因为反对苏联的信息战的学说经常不断变化，这取决于苏联在国际关系变化中的反应。在斯大林元帅死后，赫鲁晓夫不仅没有认清外部威胁，也未能及时和正确对待对付外部威胁的有效的特务部门。巴纳林回顾了俄罗斯的历史，甚至认为伊凡雷帝时期的俄罗斯特务机构是最有效的。从 17 世纪开始，为俄罗斯特务机构培养人才的体制就出现了问题：因为 18—19 世纪的宫廷政变有很多次都是因为异国情报机关（首先是英国的）而发生。巴纳林认为，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

① https：//topwar. ru/19515-pervaya-mirovaya-informacionnaya-voyna-1943 – 1991. html.

② Ibid.

成功地在 5 年的时间内恢复了过去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疆土并建立了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特务机构功劳巨大，1939 年重新收复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来又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回归。但在斯大林死后开始进行的特务部门的改组不利于苏联的强大。1991 年苏联解体后至今也没能重建欧亚的统一。

该书还有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苏联时期的最高领导人出现了问题。赫鲁晓夫破坏了为反间谍机构活动提供保障的斯大林体制，逐渐导致了苏联工作人员中“薄弱环节”的出现，使得西方特务机构的力量得以渗透到苏联的权力机构中。巴纳林认为，对于苏联的对手来说信息战的最大成功就是选举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当选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克格勃的战略败局，但同时也是信息战对手的胜利，他们提拔了不列颠的走狗——戈尔巴乔夫。①

巴纳林还认为，凯南在战后制定了针对苏联的信息战的主要方向——实施秘密的信息行动影响苏联在政治精英更替时期的过渡阶段通过决议的体制。作为多次到过俄罗斯的美国情报机构的能手，凯南详细分析了英国情报机关在组织操纵俄国通过决议的过程中进行信息行动的经验，因为历史上正是英国的情报机关军情六处将萨佐诺夫送上了俄罗斯帝国 1910 年的外交部长的位置，正是这位外交部长竭尽全力让俄国加入了它完全不需要参战的一战。巴纳林认为，凯南正确地判断出苏联政权交接过程中的复杂和艰难：“在列宁死后展开了剧烈的国内政治斗争。英帝国在苏联领导中安插的内奸是布隆斯泰因－托洛茨基。但在与英帝国势力的斗争中获胜的是受到民族－爱国主义力量支持的、俄国情报机构最优秀的代表斯大林。列宁的去世是这种转变的第一步，对苏维埃国家造成了 15 年的致命后果。斯大林的死亡或退休将是第二次转变。”② 但在分析了英国情报机构的经验后，凯南得出了有独立思想的建议，开始为斯大林死后苏联内部政治斗争的新的第二阶段做准备，以期实现针对苏联的信息战的战略目标。

巴纳林认为，正是凯南开始了“反斯大林”的战略信息行动，其手段是破坏我们伟大国家的历史的过去和现状的威信。在苏联内部的政治斗

① https：//topwar. ru/19515-pervaya-mirovaya-informacionnaya-voyna－1943－1991. html.

② Ibid.

争中得到艾伦·杜勒斯秘密支持的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的行动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赫鲁晓夫是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信息战的理想对象。正是赫鲁晓夫的类型影响了后来挑选苏联领导的候选人都是有利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因此，挑选出的戈尔巴乔夫是与赫鲁晓夫相似的人物。因此苏联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苏斯洛夫）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战略错误，这导致了在针对苏联的信息战过程中的根本转变。在克留奇科夫领导下的苏联克格勃（1988—1991年）是不能抵抗伟大国家的解体的。而国家非常委员会是戈尔巴乔夫保持自己个人权力的最后尝试。因为在1991年9月初应该采取措施解除他的党和国家的权力。①

三 《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在当代俄罗斯的影响

巴纳林无论在书中还是在诸如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体中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目前的俄罗斯面对的世界局势十分复杂，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们正在进行着针对俄罗斯和普京个人的系统信息战，因此必须建立有力的信息对抗机构——俄罗斯总统下属的国家信息－思想委员会。

该书在俄罗斯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网络对该书也大量转载。俄罗斯社会各界评论之声极多，既有普京强国战略的支持者对该书的赞美之词，认为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媒体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对国家、政府的否定性宣传不利于俄罗斯的繁荣稳定，当今俄罗斯正在经历信息战，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就是明证，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防历史重演；也有大量的反对者批评该书作者的“怀旧”情绪，认为巴纳林还沉浸在苏联“帝国”的美梦中不能自拔，完全是荒谬的。

总之，这本书在俄罗斯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让我们从新的角度即以信息战为切入点对苏联解体进行更加多维度的解读。

---

① https://topwar.ru/19515-pervaya-mirovaya-informacionnaya-voyna-1943－1991.html.

久加诺夫论“8·19”事件*

康晏如编译

从改革到政变

20年前，以苏联副总统Г. И. 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它号召同胞们关注祖国命运和苏联人民的命运，当时我们伟大祖国正面临致命的威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包括：О. Д. 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В. А. 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В. С. 帕夫洛夫——苏联总理，Б. К. 普戈——内务部部长，В. А. 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А. И. 季贾科夫——苏联工业国营企业和联合公司、建筑、交通与邮电协会主席，Д. Т. 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部长。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主导的社会生活民主化政策，本应成为国家加速发展的工具，结果却走入绝境。这一政策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实行一套表面的、远离现实和缺乏深思熟虑的措施。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针成为一种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的掩护，而这种改革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针对苏共和苏联社会政治体制的谎言和诽谤以及经“重塑”的大众媒体发出的浊流，妨碍了人民认清“民主派”的言行矛盾。一些人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吸引选民们，承诺“真正”的民主时代就要到来，将从“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际上，改革的“设计师”既痛恨党，也痛恨苏维埃。在关于全人类价值观的蛊惑人心的陈词滥调之下，等待苏联公民的完全是

---

* Зюганов Г. А. Над пропастью во лжи. 20-летие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в СССР. Горбачев дал согласие на введение ЧП, но сам объявлять о нем не желал. http://kprf.ru/rus_soc/95824.html.

另外一种命运：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社会经济体制和建立在苏联人民所陌生的道德精神价值观之上的另一个社会。

1989年5月开始的人民代表大会跨地区议员团的行动表现出“民主派”更加反动的趋势。正是跨地区议员团承担起“第五纵队”的角色，不仅在意识上和物质上支持内部的反革命，还从内部支持反苏力量。正是跨地区议员团推动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背叛行为，正是它在内部捣鼓着最肮脏和荒谬的无稽之谈，诋毁苏维埃体制，展开对俄罗斯杰出政治活动家列宁和斯大林的无耻诽谤。

大多数代表真诚地关心国家命运，但他们对反革命发起的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协调一致和疯狂的攻击毫无准备，对Ю. 阿法纳西耶夫、А. 索布恰克、Г. 斯塔罗沃伊托娃、Г. 波波夫和其他几十个议员团发言人毫无戒备，这些人的厚颜无耻超越人类无耻之极限。

反苏力量曾利用打压和恐吓战术布下声势浩大的工作。例如，1989年9月，在莫斯科选民联合俱乐部的秘密会议上，波波夫指示自己的同谋者：“我们有机会胜利，这需要每一个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力量。代表应该清楚，如果他不是按照跨地区议员团指示的投票，那么他在这个国家将无法存活。”由此可见，在自己圈内不一定要完全披上民主的外衣。

90年代初空荡荡的商店——并非如不调和的反对派现在喜欢高谈阔论的那样是苏联政权政策的结果，他们以为人们的记忆都很短暂。我们清楚地记得，“民主派”如何亲手造成商品的全面短缺和不稳定的局势，又如何将自己的无耻计划变为现实，关于此，雷日科夫也回忆过，“商店货架上空荡荡的”，他写道，“而在港口上停泊着载满了食品和消费品的船舶，有人愿意参与卸货，却被用钱打发走了。铁路出现堵塞，实际是有人封锁了国家铁路。田地里的庄稼和蔬菜烂掉，果园里的水果腐坏。国内一切瞬间坍塌下来：全面的短缺，犯罪率上升，民族关系尖锐，罢工。实际上国内经济和政治生活开始动荡。这对谁有利呢？对那些毫无顾忌地一味损害国家政权威信的人有利，对那些觊觎政权的人有利，结果政权瘫痪。从此，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为了以后‘民主派’能顺利夺取政权，电视上不断重复同样的画面：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但是现在，那些‘独立的’大众媒体的掌权者却羞于讲出商店被掏空的原因……在国内，暴民夺取了政权”。

类似事件接连在多起民族冲突的背景下爆发，这必然会导致悲剧的结

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 1991 年 8 月 18 日通过的《告苏联人民书》中沉痛宣布，人们过去曾有的积极性和希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怀疑、冷漠和失望。各级政权都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政客们令社会不再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开始灌输对国家所有制度的强烈蔑视，本质上国家成了不可控的。

正如在《告苏联人民书》中宣布的那样，利用所获自由而出现的极端势力，采取了消灭苏联、毁灭国家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政权的路线。政治冒险主义者建立起道德政治恐怖态势并试图以人民的信任作为盾牌，他们并不认为，被他们谴责和分裂的民族关系是建立在人民的广泛支持基础上，并经过多个世纪的历史检验的。那些本质上颠覆了宪法体制的人，应该在母亲和父亲们面前为民族冲突而牺牲的生命负责任。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克服深刻而全面的政治危机、民族对抗的危机和混乱与无政府状态的危机视为自己的任务，这些危机威胁着苏联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威胁着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威胁着自由和我们民族的独立。

人民在 1991 年 3 月进行的全苏联全民公决中就保持联盟与否的意见应得到支持，人民的意见清楚而无争议：76% 的公民支持保留苏联。这一重大结果甚至是在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的 6 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拒绝参加表决的情况下得出的。无尽的洗脑没有用——苏联人民敌视分裂自己伟大祖国的行为。

整个行动都是为了阻止苏联解体和制止建立取代苏联的某种联盟——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的签署。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派”班子当时正在所谓的新奥加廖沃进程中准备新的联盟条约。将于 8 月 20 日签署的秘密起草的条约方案中，一切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都不见了，我们的国家被定义为“民主国家”。

毫无疑问，该条约推翻了我国的宪法体制，必然导致统一国家的消失，通过这样的条约意味着背着人民进行反苏政变。

然而，戈尔巴乔夫所倡议的《新奥加廖沃条约》被另外一种，即叶利钦所筹划的更为反动的政变阴影所笼罩。在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权的过程中，他极力想要更快更凶狠地消灭苏联，要知道叶利钦能迅速战胜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条件就是苏联的解体。为此，叶利钦派最大限度地利用了 1990 年 7 月 12 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言宣布俄罗斯法律高于联盟法律。

我当时就确信，经过20年现在仍不怀疑，俄罗斯获得的主权是一个撬棍，迟早会撬开苏联所有的内部边界。遗憾的是，许多俄罗斯共产党党员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及时看清这一决定预示着什么后果。无疑，仇俄分子的猖狂、众多的怨恨和国内的混乱都对这一决定的通过产生了影响。然而不应忘记，大多数邻居当时处于与俄罗斯居民一样的贫困状态，应试图理解他们，忍受埋怨。要知道俄罗斯与其他的共和国对抗并不明智，特别是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对抗。类似的论点当时几乎没人理睬，情绪化盖过了理智思维。连锁反应很快接踵而至，众所周知的“各主权国家的阅兵式”开始了。

被奸细挟为人质

想要厘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时已形成的非比寻常的政治现实并不容易。1991年夏天到来之际，在苏共组织框架内最终形成了独立和无法调和的两个党派：操纵者与卖国贼一派，强国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一派。二者分裂的进程不仅仅像戈尔巴乔夫常说的刚刚“开始”，而是早已“发生”。

国内，普通群众政治倾向的分裂深化，而且人们选择相信那些简单化的和粗陋原始的克服深远经济发展危机的纲领。在此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共产党员并信任“民主派”，他们真诚地相信，所有积聚的问题可以在500天内解决。军队的思想动荡加剧，已经结束的阿富汗战争被大肆利用来诋毁军队的信誉。

真正的共产党人被迫卷入与优势明显的势力一方的斗争中，这一势力被背叛的苏共上层全部动员起来，在自己周围筑起环形防御。“民主派”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波波夫、索布恰克、沙塔林、沃尔斯基在1991年6月初发起新一轮猛烈攻击，宣称要发起民主改革运动。遗憾的是，苏共中央没有做出合理而有建设性的回应，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天宣布了如下消息：苏共领导人“不排除党员在民主改革运动框架内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可能性，如果该运动宣称的目标能够被其行动实践所证明的话”。这样的“实践证明”不允许须臾片刻，谢瓦尔德纳泽在当选为民主改革运动组织委员会主席后立即宣称退出苏共。

鉴于雅科夫列夫不急于摘下自己的面具，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替他这么做了。1991年8月1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其公开演讲的问题后，

作出“鉴于其行为违反了苏共章程并旨在分裂党，认为雅科夫列夫不能继续保留苏共党员身份”的决定。大多数共产党党员评价这一决定为首个不可避免的报应。

然而在“八月事件”前夕，党内健康势力的思想立场越来越模糊，因而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苏共或者其他任何信仰社会主义的力量能够扭转事态。

清楚的是，在为保卫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能力打击修正主义者和叛徒的共产党人表现出超出许可的忍耐，经常采取错误的妥协和合作，时常误解党的纪律。因此戈尔巴乔夫才能稳坐在自己的位置直到一切崩溃为止，上演了一出摧毁苏联和苏共的戏剧。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行动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都可归咎于上述状况。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党政人士，早已无望地丧失了战略创意，没有战略创意想要达成任何积极成果都显得很天真。而且更困难的是，实际上在那一历史时刻想要扭转社会舆论已无可能，“民主派”在雅科夫列夫大众传媒的支持下事实上完全掌控了局势。

1991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苏共历史上最后一届中央全会非常平静地召开了。尽管国内局势极其紧张，之前叶利钦发布了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苏共中央委员仍要把党内“摊牌”一直拖到年底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再一次表现出不可容忍的惯性的力量，而且是在每一天拖延都是向死亡靠近的时刻。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8 月 19 日的文件性质完全符合当时的气氛和政权高层的相互关系。不难发现，在文件中没有描述任何现实中应为国家困境负责的个人或者势力，也没有号召劳动者为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而参与某一具体行动。“战术”如此奇怪，可以说完全没有对群众的组织工作，结果自然也看不到在首都和其他城市有任何重大的有组织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失误是远离人民，他们没有想到让人民支持自己的行动，甚至没有提出发动罢工、游行、集会的问题，而这些行动才能够让群众抵制“民主派”。担负起恢复国内宪法秩序的责任的那些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以为，一切问题依旧可以由高层干部的重新配置成功解决。

问题还在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对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人的政

策的态度不明朗。很长时间他们都处于一个班子并支持戈尔巴乔夫，其中一些人非常冷静地洞察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危险性，知道这些改革与国家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摆脱发展危机的任务无任何共同点。对苏联正急速滑向资本主义、国内正在确立资产阶级专政很难视而不见。然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像许多苏共其他诚实的领导人一样，并无勇气坚决并及时地中断戈尔巴乔夫的狂欢。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与戈尔巴乔夫的亲近，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个人对他的忠诚，希望他终能幡然醒悟并阻止国内局势继续恶化，这导致委员会成员沦为他人最终实现瓦解苏联和苏共意图的工具。在对党政一把手的纵容下，自由民主派高层得以成功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把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涂抹为20世纪最恶劣的政治挑衅，国会纵火案和基洛夫刺杀案在其面前都黯然失色。

策划和挑事、起诉被推举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和发动公众积极行动的，都是同一些人。他们当中许多向紧急状态委员会大发雷霆的人，在“八月事件”前两周还签署了实行紧急状态的一般程序。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计划，除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我们并不怀疑委员会成员对人民的忠诚，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被无耻地“暗地”利用了。同样，他们由于自身行为的优柔寡断和立场的令人费解，使几千名共产党员及支持他们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备受打击。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一行动经过长时间的精密筹备：要知道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说出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是在1991年2月。当然，雅科夫列夫在春夏两次“警告”“国家政变”不可避免并非偶然，最后一次是在8月17日。幕后阴谋的高手总是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渊博知识并模仿一切真实进程布下背景。2010年5月18日在接受《独立报》的采访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А. И. 卢基扬诺夫强调，有些情况大家都长期缄默不语。例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成立的，相应的成员也是戈尔巴乔夫开会确定的。这次会议于1991年3月28日召开，卢基扬诺夫出席了会议。当时提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准备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秩序的法律，而克格勃的几位将军起草告人民书。一切就是这么实施的。

现在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前夕，即8月18日，星期日，О. 巴克拉诺夫、В. 博尔金、О. 舍宁、В. 瓦连尼科夫和Ю. 普列

汉诺夫去福罗斯拜访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 8 月 4 日提前飞去福罗斯度假）和征得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他们采取坚决行动了。他们的态度众所周知，这就是要预先得到戈尔巴乔夫对于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许可并推迟《新奥加廖沃条约》的通过，因为这些条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要知道，经过一系列修改，最后的条约草案于 1991 年 7 月 23 日在新奥加廖沃进行了讨论。根据三组专家的结论，这不仅意味着联邦国家的原则被放弃，还意味着要建立的甚至不是邦联制，而是荒谬的“国家俱乐部”。这一方案在很多方面缺乏逻辑，杂乱无章，自相矛盾。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看来，新的联盟条约应由将在 9 月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福罗斯会面的参与者一致回忆道，戈尔巴乔夫听了他们的话，摆了摆手说：“你们干吧，你们见鬼去吧！”这一事实被法庭记录。没有对戈尔巴乔夫采取任何封锁措施：要知道一共去了 5 个人，而他大约有 100 人保护着。法庭甚至后来证实，当时一切通信设施都正常运行着。

瓦连尼科夫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的态度：他同意实行紧急状态，但他自己不愿宣布实行。

预先决定的结局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意味着什么？是政变、阴谋或篡政？要知道，正是这些关于“八月事件”的说法最符合自由民主派的心愿，后者希望在历史中如此诠释这一事件。

应该弄清问题本身。如果这是阴谋，阴谋者未必会自愿跑到戈尔巴乔夫身边，即跑到一个将要被谋反掉的人身边。政变意味着打碎一切国家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方案支持保留苏联和现存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政变。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为了保护现存体制，即使想象再丰富，也很难说这是篡政。

大概，还是卢基扬诺夫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性质的描述最为准确：这是一些国家领导人一次绝望的、组织不力的拯救联盟的尝试，是一些相信自己会得到总统的支持、相信总统会拖延签署联盟条约的人们的一次尝试，因为条约一旦签署，就意味着苏联在法律上正式瓦解。

1991 年 8 月 21 日夜，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议上，绝大多数与会者决定不向叶利钦分子盘踞着的最高苏维埃大厦进攻。军队开始从莫斯科撤离。白天，巴克拉诺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亚佐夫，还有伊瓦什

科和卢基扬诺夫又飞到福罗斯去见戈尔巴乔夫。这一天，苏联总检察长H. 特鲁宾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委员提起刑事诉讼，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出关于解除戈尔巴乔夫权力不合法的决定。

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和此前飞到福罗斯的叶利钦分子们，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飞抵莫斯科。克留奇科夫在机场直接被逮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逮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根据调查者的意见，与其一起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与委员会积极合作的人，其中包括О. С. 舍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Ю. А. 普罗科菲耶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В. И. 瓦连尼科夫——军队将军、陆军总司令、苏联国防部副部长，В. И. 博尔金——苏共中央总务部主任。随着А. И. 卢基扬诺夫被逮捕，8月29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际上彻底解散。所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地方领导就地解除职务。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事件结局已被预先决定。但这一结局不仅对在亚纳耶夫领导下采取行动的人是悲剧，对我们全党都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明，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资源的健康部分实际上完全枯竭。国家的主要角色转到那样的政治势力手里，他们利用人们渴望变好的愿望投机，狡猾地操纵了人们的意识，将人们推入长久的贫困与不幸中，直到今天。这是民族悲剧。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本质和道德本性最终在8月那些日子暴露了出来。从福罗斯回到莫斯科后，他放弃党，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这样他证实了自己在苏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上所有行径的背叛性质，向叶利钦发出了自己投降的明确信号，开启了俄罗斯历史上最反动、犯罪最猖獗的制度。

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意味着，叶利钦集团能够取得对联盟中央的胜利，使其高于联盟之上。从1991年秋开始，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甚至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在俄罗斯地域内得到了高于苏联宪法的全权。

叶利钦通往权力的道路被扫清。本质上，他不再隐藏自己最终让苏联消失，从法律上、政治上解散联盟的阴谋。再公平的历史学家只能将这一目的视为叶利钦的政治野心。对叶利钦来说，与成百上千万人的命运相比，成为梦寐以求的俄罗斯统治者意义大得多。

《别洛韦日协议》是苏联瓦解进程的逻辑结局。这一协议于1991年

12 月 12 日签订，3 天之后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直接批准。我们要指出，绝大多数议员赞成通过协议。

最近研究者更经常地提出以下问题：苏联的迅速解体是否存在客观的，首先是经济的原因？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者”及各色“民主派”如此喜欢引用似乎无法解决将苏联击溃的危机和停滞现象。

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商业学院下属的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莱昂·阿隆认为，没有任何重要的原因导致苏联迅速灭亡。他指出，1985 年，苏联拥有众多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到 1985 年，没有任何一个关键经济指标表明苏联会迅速滑向灾难。从 1981 年至 1985 年，苏联国内总产值增速与六七十年代相比稍慢一些，但仍达到平均每年 2% 的速度。从法国大革命起就一直被认为是衡量未来革命危机爆发迹象的指标之一——预算赤字，在 1985 年也不到国内总产值的 2%。尽管预算赤字增速到 1989 年已经接近 9%，但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同时，1985 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速大于 2%，而工资，甚至考虑到通货膨胀，在接下来的 5 年，直到 1990 年，仍继续增长，平均速度为 7%。

尽管总体状态非常严峻，但正像威尔士大学教授彼得·拉特兰强调的那样，“慢性疾病最终不一定导致死亡”。俄罗斯政治和经济领域著名专家安德斯·奥斯伦德指出，从 1985 年到 1987 年，局势“还不那么悲惨”。

被西方研究者加以论证的观点再一次表明，以苏联 80 年代后半期至 90 年代初的进程为基础，对国内宏观经济和社会政治氛围的严肃分析被冒险主义、唯意志论、个人野心、完全的外行、政治家对“新浪潮”的无知所代替，其中后者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呈几何级数催生出来。

……尽管“八月事件”之后苏共状况严峻，但仍是叶利钦掌握俄罗斯绝对权力和肆意妄为的主要障碍。

叶利钦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戈尔巴乔夫无条件的投降，其急切的行动意欲明了。8 月 23 日和 25 日，他就下达了关于暂停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晚些时候，11 月 6 日又宣布禁止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并没收其财产。从 8 月就开始了对党的机构所在地进行强盗式的洗劫，“民主派”在那里造成道德恐怖气氛。可疑人物四处横行，党的档案被暗中洗劫。患寻宝狂躁症的叶利钦分子们又挖掘文件，试图寻找“党的黄金”的踪影。

然而“民主派”失算了。他们没能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打倒在反动派进攻和统治的艰难时期的劳动者的主要支柱——共产党。人们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不害怕恐怖、镇压和欺凌，没有对党的使命产生丝毫困惑，奋起保护共产党。在宪法法院，得益于党的工作者、积极分子、议员、学者和广泛的社会大众的努力，党被成功捍卫。

党在宪法法院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法庭宣布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组织行动具有合法性，它们有权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这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3年2月的重建开辟了道路。我党在能够保持党内秩序和组织性的情况下被迫后退。在反动势力借助背叛和谎言的工具架起了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向俄罗斯野蛮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过渡桥梁的条件下，劳动者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斗争工具。

保存党的战斗力，有能力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和展开斗争——这是对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集团留给共产党人的失败和教训进行思考的主要成果。

第八篇

《斯大林全集》新译文

编辑说明

本摘编中的文稿选自俄文版《斯大林全集》第14、15、16、17和18卷。所选文章是各种中文版本《斯大林全集》《斯大林文论》和言论摘编中未被刊载的。本摘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的“言论摘编”项目中的初步成果之一，先行印发听取专家学者意见。由于项目经费有限，本摘编只进行了一次校对，错误和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为了能更好地反映文章全貌，在此次编辑时没有进行大量的删改，尽可能保留原文内容。

本摘编分为8个专题，专题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译文主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吴伟。

一　斯大林论党内工作和政治问题

本节翻译、校对者为：
赵旭黎　余　哲　袁再旺

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米·基洛夫和波·古·姆季瓦尼的电报（1921年10月28日至29日）

巴库，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
梯弗里斯、姆季瓦尼
副本：菲加特纳

我们收到了一封发自巴库的由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署名的电报："清党让一些人民委员有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在各个县城，大量被开除者以前都是警察和土匪，他们都是穆斯林，许多人担任领导职务。为了避免必然会有的争执和不公，希望委派一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对电报进行讨论之后，决定：命高加索分局委员姆季瓦尼立刻动身前往阿塞拜疆就地解决和清党有关的争执，由于阿塞拜疆的共产主义运动刚刚起步，需要遵循的原则是，在清党之时要对穆斯林共产党员采取最大限度的温和与宽容态度，一步步将可耻的前警察和土匪从党内剔除。

彼·扎卢茨基
斯大林
列宁

《弗·伊·列宁：无人知晓的文献》，1891—1922年，第481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卷宗号2，目录号1，案宗号21660，页码3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信(1923年1月17日)

致：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瞿鲁巴同志
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同志
(关于托洛茨基同志1923年1月15日的新信)

一些实际意见

1. 托洛茨基同志在信中提到，“独立的副职委员会”是中央的一个领导性和联合性机关。我肯定地说，任何似乎是领导性机关的独立的副职委员会，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存在过。只有一个财务委员会，它是中央的一个联合性机关，但是，不管从其组成成员来看，还是从工作性质来看，都和托洛茨基所想象的副职委员会没有任何共性。

2. 两年前个别政治局委员曾经就改善我们的计划经济事业之问题向政治局提出或说过这个事，现在托洛茨基同志重新提到了这个问题。这里，在提到我的提议之时，他指出，这一建议是我在批评托洛茨基同志的再次提议之时顺便提出的。我应该说明一下，在提交本人的提议之时，我主要指的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实践，尤其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渐转变成实际上的领导机关的财政委员会的实践。我认为，财政委员会的实践证实了把劳动国防委员会从协调机构变为领导机关的必要性。正因如此，我建议对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组成做一定调整并撤销财政委员会（参见我1月6日的信）。两年前，国家计划委员会（1921年2月正式批准成立）还未能完全形成一个能够工作的机构，当时既没有副主席，也没有财政委员会，显而易见这些机关都没有开展工作，我已经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说那是托洛茨基同志两年前提出的建议，正如他本人确认的那样。我一向反对诉诸过去，因为这不仅给工作带来了不必要的因素，而且让人们回忆起以前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争论，以及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以前某些中央委员会委员涉及对苏维埃政权稳固性的怀疑的争论。比如，我就记得，托洛茨基同志一年半前曾对我们政治局委员深信不疑地说，“苏维埃政权的末日将近”“布谷鸟已经开始叫了”等。把所有这些记忆都唤醒，难道能够解决现在与改善我们的计划经济事业相关的所有问题吗？我对此非常

怀疑。

3. 列宁同志从来没有提议由托洛茨基同志来监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正确的。但是我在信中并没有肯定这一点。我在 1 月 6 日的信中提到："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同志的提议），让他专门负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事务。"任何人都很清楚，括号内所说的"列宁同志的提议"指的是上一句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而不是括号后的第二句话。因此，斯大林的说法哪里"有错"了？我再明确一下，列宁同志提议的是委任托洛茨基同志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而让托洛茨基同志来管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我个人的意见，而不是列宁同志的建议。

4. 列宁同志是否向政治局提出了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建议，就让我们从下列文件中来判断一下吧。

a）致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同志

鉴于李可夫同志在瞿鲁巴到达后（将于 9 月 20 日到达）要去休假，而医生对我说（当然，如果病情不会恶化），我 10 月 1 日前夕才能返回工作（最初要有所节制），我认为不可能把现在的所有工作都推给瞿鲁巴同志一个人，因此我建议再任命两个副主席（一个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一个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也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在我的参与，当然还有政治局这个上级机关的参与下，来分配他们两人的工作。

1922 年 9 月 11 日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政治局委员电话投票：

"我同意"——（斯大林）

"我坚决反对"——（托洛茨基）

"同意"——（李可夫）

"我弃权"——（托姆斯基）

"我不反对"——（加里宁）

"我弃权"——（加米涅夫）

b）摘自 1922 年 9 月 14 日的政治局会议笔录，No. 26

听取提案	表决情况
16. 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列宁同志的建议）	a）采纳列宁同志关于任命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两位副主席的建议。 b）中央政治局遗憾地确认，托洛茨基同志坚决反对此项任命。政治局建议，瞿鲁巴到达之后，加米涅夫同志开始履行副主席的职责。 c）在瞿鲁巴同志到达之前，让加米涅夫同志休假。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从这些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a）托洛茨基同志曾声明，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副主席的提议“从未提交政治局”，这是完全不准确的（参见托洛茨基的最后一封信，第3页）；

b）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副主席的建议并不像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在“列宁同志返回工作岗位后几周”才提出的，而是在返回工作岗位之前就提出了。

问题的实质

1. 我认为，本人关于撤销财政委员会和把劳动国防委员会从部门间的协调性机关变为凌驾于各部门之上的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性机关的建议，是一项主要建议。

2. 除了副主席之外，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财政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位代表都可以加入劳动国防委员会，我并不反对这一点。

3. 我认为，副主席的数量不应像托洛茨基所建议的那样有所减少，而应有所增加。还应任命两位副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和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同志（副主席的工作实践证明，托洛茨基同志提议的一位或两位副主席不足以完成所有工作）。

4. 我同意，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做出结论或者制定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而把劳动国防委员会变成计划经济唯一的领导性和联合性机关。

5. 我反对由一人来兼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请参见我第一封信中所陈述的理由。

6. 我建议由托洛茨基同志专门掌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同意列

宁同志提出的副主席之间工作的分配方法。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却说，这种方法（把某个人民委员部置于某个副主席的监督之下）好像降低了相关人民委员的责任感，对此我不能苟同。但是鉴于因此问题而引发的种种分歧，我并不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或是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我认为有必要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即便只是作初步的讨论。

中央委员会委员约·斯大林

1923 年 1 月 17 日

萨哈罗夫 B. A.《列宁的“政治遗嘱”：历史事实和政治传言》，第 663—665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案卷号 275，页码 4—6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文集序言（不迟于1925年）

本书是一本文集，收录了作者 1917 年 3 月至 10 月间的文章和发言。所有重要的保存下来的文件都被文集收录。只有 1917 年 8 月至 10 月间作者在《真理报》《工人之路报》的“评论”和“报刊综述”栏目发表的针砭时弊的短评和小文章没有收录，因为我觉得，这只会增加书的篇幅，和主要文章相比，实际上也不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新东西。应该说的是，我很长时间甚至连十月革命前时期的主要文章都没有决定要发表，因为我很清楚的是，例如，和《列宁文选》第十四卷相比，我的这些文章不会引起读者百分之一的兴趣。总之，当党从列宁那里获得了如《列宁文选》第十四卷这样的遗产之后，还出版某些作者的文章和发言究竟还值不值得？如果我现在终究还是决定出版这本文集，那么这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尤其由于最近的讨论，党员对十月革命的兴趣异乎寻常得高。我认为，对于那些想研究十月革命的同志们来说，这本文集可以成为有用的材料。

文集中的所有材料都是由托夫斯图哈同志搜集的，没有他的帮助这本

文集不可能问世。出版时，这些资料当然没有做改动，只是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的7月全市会议上和党的六大上对《政治报告》做了某些修辞上的校正，作者此前将之遗漏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文集出版时并未为此进行专门的修改。

这里有两条必不可少的意见。第一条意见涉及的是文集中的前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反映的是我们党大部分党员在和平问题和苏维埃政权问题上产生的某些动摇，众所周知，此事发生于1917年3月至4月间。这是一个旧的观点被彻底破除的时期。直接推翻政府的旧纲领现在已经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现在已经不能去立即推翻与苏维埃联系在一起的政府，因为当时谁想推翻临时政府，谁就应该同时推翻苏维埃。但是，也不能推行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因为这个政府是帝国主义政府。当时党需要重新定向。那些曾经被沙皇专制主义关到各地监狱和流放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刚刚有可能从俄国的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研究制定新的纲领，他们还不能一下子就搞清楚新局势，这不足为怪。在寻找新的方向标的过程中，党当时在和平问题和苏维埃政权问题上半途而废，这也不足为怪。因此，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让全党一下子就走上新道路。我曾经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发言中提到过一次，当时我和大部分党员都赞同这个错误观点，到了4月中旬，我们支持列宁的《四月提纲》之后，就放弃了这一观点……

《保卫祖国，保卫斯大林!》

莫斯科专版，1997年，第4（8）期，第1页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26年9月16日）

5）与克鲁普斯卡娅的谈判不仅现在不适合，并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个分裂分子（见其十四大上关于“斯德哥尔摩”的讲话）。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党的统一，那就应当对她这个分裂分子进行打压。不应该同时搞两个对立的目标，既与分裂分子作斗争，又与他们谈和。这不是辩证法，而是胡说八道和束手无策。我们并不排除，明天季诺维也夫会提出声明，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没有原则性”，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曾经“表示”愿意和季诺维也夫（通过克鲁普斯卡娅）组成一个

“集团”，而季诺维也夫却“愤怒地拒绝了这一不能容忍的讨好行为”，等等诸如此类的。

6）关于《八月集团》，你完全正确。应该将伊里奇的几篇文章，而不是一篇，重印一次，同时讲述一下该集团产生的历史。一定要让索林登场，你和布哈林的讲话也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书信集，1925—1936 年》，第 88—91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5388

注释：1926 年 10 月 5 日，《真理报》发表了莫洛托夫在联共（布）中央县级党员干部培训班开幕式上的发言。发言中指出，党内出现了一个反对派集团，该集团将“从梅德韦杰夫和施略普尼柯夫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各派”都联合起来，并可与 1912—1914 年的“八月集团”相提并论。莫洛托夫在他的讲话中用整整一章介绍了“八月集团”的历史。在该章的结尾，莫洛托夫肯定地说，这一“‘集团’遭受到了和孟什维克相同的命运，而布尔什维克党却在与其进行的斗争中受到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的领导力量”。1926 年第 18 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转载了列宁关于“八月集团”的文章，并发表了索林的一篇题为《八月集团》的文章。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26年9月23日）

2）如果托洛茨基“大呼小叫”，还想着“公开孤注一掷”的话，那他可就麻烦大了。他很可能现在就得离开政治局，不过这还要看他的表现。问题在于：要么他们应当听党的话，要么党应当听他们的话。很明显，如果党让后者（第二种）成为可能，我们的党就将不复存在。

3）至于斯米尔诺夫，因为已经对他提出过警告，只好开除他的党籍了，哪怕是暂时的。

4）我认为，全会不能“回避”梅德韦杰夫的问题。可能你有办法“回避”此事，那就告诉我你的办法。

5）你说，势必将在代表会议上提出关于反对派集团的问题，看来你是对的。不过，跑过头也没有必要，最好先看看这一集团现在如何表现。

6）你和布哈林关于八月联盟问题的讲话稿要加快进度，我认为，没什么好等的。

《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书信集，1925—1936年》，第93—95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58，目录号1，案卷号5388

注释：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一项决议，因从事派别活动，解除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1926年9月8日，因从事派别活动，弗·米·斯米尔诺夫被开除出党。11月26日，在声明承认个人错误之后，他又恢复了党籍。

1926年10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因参加反党活动，前“工人反对派”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韦杰夫受到严厉谴责。

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信（节选）（1927年9月23日）

2）反对派不但没有平息，而且恰恰相反，加强了自己的派别工作。不超过两周前，反对派编了一本小册子（他们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纲领》），要求将之印刷（这是9月3日发生的事）并立即展开讨论。其实，这是一个新党的新纲领。我们拒绝了他们，并禁止传播该小册子，直至下次全会研究这个问题为止。《纲领》以及政治局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答复，分发给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但是反对派却在秘密传播《纲领》……9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寻找军事阴谋家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叫谢尔巴科夫的人（无党派人士，工厂主之子），在他那里发现了反对派的非法印刷厂（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其他反对派分子也直接卷入其中）。还搜查了某些小的（无人知晓或不大出名的）反对派分子，逮捕了一些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两天

之后，收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沙罗夫写的一封厚颜无耻的信，他们在信中承认自己是“印刷厂的组织者”，并“要求释放被捕者”（被捕的只有无党派人士）。结果出现了某种类似于“米亚斯尼科夫集团”或者“工人真理”之类的组织。我们以政治局和中央监督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发出了一份《关于揭穿托洛茨基分子非法印刷厂的通知》，并决定把与印刷厂有关系的“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开除出党。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两人的问题暂时延期解决……这就是我们这里的情况。这件事暂时还没有见报。对于此事，你有什么意见？

你的科巴

1927 年 9 月 23 日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信件集（1912—1927 年）》，第 347—348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3345，页码1—3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29年8月21日）

2）关于阿塞拜疆。应当全力支持吉卡洛，因为他基本上都是对的（多少保留了一些有工作能力的当地老干部）。联共中央委员会解除了米尔佐扬的职务，而阿尔塔克和莎图诺夫斯卡娅却将此视为了自己的胜利，同样，沙茨金也把党对右派的胜利视为自己对斯列普科夫分子的胜利。这真是胡闹，愚蠢！阿尔塔克和莎图诺夫斯卡娅都应被遣回莫斯科的共产主义研究院（他们是早先被派往那里出差的，而现在他们《按照巴库积极分子的决议》又从那里回到了巴库）。别指望他们会给巴库带来好处。又能指望他们什么呢——这从克拉斯内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巴库的愚蠢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共青团真理报》又一次管闲事！）。应当既让布尼亚特－扎杰留任，又让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留任。所有阿尔塔克和莎图诺夫斯卡娅式的工作人员都抵不上一个布尼亚特－扎杰。我们不得不把巴吉罗夫（尽管他以前犯过错）任命为阿塞拜疆契卡主席：如今，在阿塞拜疆农村中，穆萨瓦特分子和伊蒂哈德分子这两股势力抬头，而他是唯一一个能对付他们的人。这个问题很严肃，所以不能忽视。

我可怜（非常可怜）卡苏莫夫。他是最好的工作人员之一，将来能成为一位大人物。我有一个请求：如果我不在场，就不要解决他的去向问题。

3）关于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不领导各民族中央委员会。他们也没有能力领导各民族中央委员会。应该彻底整顿并改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这个问题很复杂，所以不得不拖到秋天了。

4）伊·尼·斯米尔诺夫的“声明”是一种卑鄙的行为。他希望能免除自己的第58条罪名，然后到莫斯科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因此，对这个人决不能做任何让步。

5）你说布哈林落马了，这是对的。很遗憾，但这是事实。也好，——所以，这是“命运”。只是有些奇怪，他还指望用那些“小伎俩”来欺骗党。真是一个在政治上倾向于替立宪民主党辩护的无原则性、不能成事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随他的便吧……

1929年8月21日

约·斯大林

《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书信集，1925—1936年》，第144—148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58，目录号1，案卷号5388

致维·鲁·缅任斯基的信（1930年10月2日之后）

缅任斯基同志：

10月2日的信和材料已收悉。拉姆津的口供很有意思。我认为，他口供中最有意思的部分要数总的武装干涉问题，尤其是武装干涉时间的问题。原来，原本计划在1930年进行武装干涉，但推迟到了1931年或者甚至是1932年。这很有可能，也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这是直接从里亚布申斯基、古卡索夫、杰尼索夫和诺贝尔集团那里得来的消息，该集团是苏联国内及侨民中现在最具实力的社会经济集团，不仅资本最为雄厚，而且与英法政府的关系也最为密切。也许会觉得，劳农党（劳动农民党——编者）或者“工业党”或者米留可夫“党”，似乎才是主要力量。

但这是不对的。主要力量是里亚布申斯基—杰尼索夫—诺贝尔等集团，也就是说，是“工商党”。而劳农党、“工业党”和米留可夫“党”不过是给“工商党”跑腿的小角色而已。不但如此，从“工商党”那里获得的关于武装干涉时间的情报更有意思。众所周知，关于总的武装干涉的问题，尤其是武装干涉时间的问题，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

由此我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a）把武装干涉及其时间问题作为劳农党、“工业党”的头目，尤其是拉姆津的新（以后的）口供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之一。1）1930 年为什么推迟了武装干涉？2）是不是因为波兰还没有准备好？3）也许是因为罗马尼亚没准备好？4）可能是因为那些边境缓冲国还没与波兰合拢？5）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至 1931 年？6）为什么“可能”推迟至 1932 年？7）诸如此类等等。

①追究“工业党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为拉里切夫案件负责，让他们读完拉姆津的口供之后，再就这件事严审他们。

②要严审格罗曼，据拉姆津供述，格罗曼有一次在“联合中心”宣称“武装干涉推迟至 1932 年”。

③严刑拷打康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亚诺夫这几位先生，他们狡猾地掩盖了“武装干涉的意图”，但他们（无疑！）就是武装干涉分子，要就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严审他们几个（像米留可夫一样，康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亚诺夫也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他们曾去米留可夫那里“会谈”过）。

如果拉姆津的口供在其他被告（格罗曼、拉里切夫、康德拉季耶夫和 K°等人）的口供中得到证实和具体化，那这会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重大成功吗？因为我们会把以这种方式得到的材料以某种形式作为共产国际各小组和各国工人的财富，我们会掀起反对武装干涉分子的最广泛的运动，达到瓦解并消除未来 1—2 年间的武装干涉企图的目的，这对我们相当重要。明白吗？

此致

敬礼！

约·斯大林

《共产党员》，1990年，第11期，第99—100页

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全宗号2，目录号9，案卷号388，页码270—271

注释：1930年10月25日，在听取了斯大林《关于利用武装干涉破坏分子的口供》的报告之后，政治局通过了如下决议：

“①认为，在把破坏分子关于准备武装干涉的口供作为法院的中心问题之后，必须尽快把反革命联合中心交法院定罪。

②组建由李维诺夫、伏罗希洛夫、斯大林、缅任斯基和克雷连科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审查破坏分子关于武装干涉的口供，在报刊上发表。”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1937年10月12日)(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

安德烈耶夫：现在转到议事日程的第二个问题。斯大林同志有话要说。

斯大林：根据全体会议议事日程第二项，也根据政治局的建议，我提出几个问题请党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并提出建议。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央委员会组成的问题。六月全会（指1937年6月23—29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编者）结束之后一直到本次全会召开之前，在此期间，我们有几名中央委员被开除和被捕：泽连斯基原来是沙俄时期的密探，还有列别杰、诺索夫、皮亚特尼茨基、哈塔耶维奇、伊克拉莫夫、克里尼茨基、瓦列伊基斯共八个人。审查过所有材料后，检查过资料后，发现这些人原来都是人民的敌人。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建议公布这个消息。

众人：对，公布。

斯大林：有16个中央候补委员在此期间也被开除和被捕：格林科、柳布琴科自杀了，耶列明、杰里巴斯原来是日本间谍，杰姆琴科、卡雷金纳、谢苗诺夫、谢列布罗夫斯基原来是间谍，舒布里科夫、格里亚金斯基、萨尔基索夫、贝金、罗津戈利茨，原来是德国、英国和日本的间谍。

众人：哎呀！

斯大林：还有列帕、吉卡洛和普图哈，共 16 个人。

在审查过这些人的资料后，发现这些人也是人民的敌人。如果没有问题，也不反对，我请求公布这个消息。

众人：赞成。

安德烈耶夫有人建议赞成政治局的提议。没有反对意见。

众人：没有。

安德烈耶夫：赞成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的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斯大林：根据我党的实践，如有人脱离中央委员会，或者是因为逝世，或者是因为被开除了，中央委员通常是由候补委员来递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所以，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这样做也是合理的。我们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是在代表大会上产生的，正如你们所知，名单上的人名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而是按照得票数的多少排列的，并不是按照字母顺序的。

中央政治局认为，前十位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是合理的。那这些人都是谁呢？

帕霍莫夫是水路运输人民委员，获得的票数是最多的。在他之后在代表大会上获得高票的有：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伊萨耶夫，斯大林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斯莫罗金，你们所熟知的布柳赫尔，还有同样为你们所知的布尔加宁，在军事部门工作的布林，你们同样应该熟知的库利科夫和洛佐夫斯基，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巴基罗夫，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负责钢材的马卡罗夫。10 个人。

众人：对。

斯大林：政治局建议通过关于把这些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的决议，他们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获票数最多。

安德烈耶夫：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赫鲁晓夫：我想对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做一些补充。我想不按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按得票数量的那种方法来推荐同志，我推荐的这些人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所熟知，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人从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普拉姆涅克——顿涅茨克州委书记，最大的州委会，大家也都很了解这位同志。梅赫利斯——主管《真理报》，是中央候补委员。米哈伊洛夫——沃罗涅日州委书记，他从事的是最为繁重的工作。乌加洛

夫——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他已经在如此庞大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很久了，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也已经在工作中证明了自己。我提议把他们几个候补委员也转为中央委员。

安德烈耶夫：全体会议希望怎么办……

众人：投票吧。

安德烈耶夫：分别投票表决政治局的提议和赫鲁晓夫同志的提议……

一人：不是提议，而是补充。

安德烈耶夫：或者与修正意见和补充意见一起来。

众人：一起来。

安德烈耶夫：那就将政治局的提议和赫鲁晓夫同志的补充意见一起表决。赞成这个提议的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没有。谁弃权？没有。一致通过。

斯大林：本来可以把所有这些候补委员都转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我们完全有权利这么做，但是，第一，这没有任何必要；第二，中央委员会不能没有后备力量，不能没有候补委员。因此，可以只限于已通过的这个决议。

第二个问题。关于政治局的组成。政治局建议把叶若夫同志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建议批准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众人：对。

安德烈耶夫：有什么建议吗？

众人：投票吧。

安德烈耶夫：谁赞成通过政治局的提议，即把叶若夫同志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请举手。谁反对？没有。谁弃权？没有。一致通过。

《30年代斯大林的政治局》，第157—159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2，案卷号628，页码157—119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2年10月16日)

这样，我们就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开得很好，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已经完全一致了。但是，我们并非如此一致。还有一些人不同意我

们的决议。

有人问：我们为何要大幅扩充中央委员会？难道还不清楚，中央委员会需要注入新的力量吗？我们这些老同志都会相继离世的，但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要把我们伟大事业的接力棒交到谁的手中。谁能把这个接力棒向前传递下去？为此需要更为年轻的忠诚的人和政治活动家。那培养政治和国务活动家又意味着什么呢？为此需要更加努力。要培养出国务活动家需要 10 年，不，15 年的时间。

但这里光有愿望是不够的。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在实行党的总路线、战胜各种企图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敌对机会分子的日常工作中，才能培养出思想坚定的国务活动家。我党培养的有列宁经验的政治活动家，需要在斗争中粉碎这些敌对企图，并在实现我们伟大目标的过程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我们应该提高党及各级党委会的作用，这还不明显吗？列宁教导我们要改善党的群众工作，这个可以忘记吗？所有这些都要求往我党的指挥部——中央委员会注入年轻的新鲜力量。遵照列宁的指示，我们已经这么做了。这就是我们扩充中央委员会的原因。而且，党自身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解除那些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的部长要职。关于这一点，能说点什么呢？我们解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的部长职位，并用一些新人来接替他们。这是为什么？原因何在？部长的工作是一项男人的工作，需要有更多的精力、更具体的知识和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解除那几个功绩卓著的同志的职位，并任命一些更能干、更富创造力的人来担任他们的职务。这些人都很年轻，身强力壮，劲头十足。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从事领导工作。

至于那些著名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他们仍然还是著名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我们把他们都调任为部长会议副主席。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少副主席了。

如果我们谈及我们事业中的团结一致，那就不能不提到几个著名政治家的错误行为。我指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

莫洛托夫是一个忠于我们事业的人。只要招呼一下，毋庸置疑，他会毫不犹豫地为党献出生命。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他的不当行为。莫洛托夫同志，我们的外交部长，在“沙尔特廖斯甜酒”的作用下，同意英国大使

在我国发行资产阶级报纸杂志。为什么？为什么要同意这样的事？难道不知道吗？资产阶级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向苏联人民传播资产阶级刊物——这将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是多不靠谱的一个举动啊，如果这么做了，那将会对苏联人民的社会思想和世界观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会削弱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加强资产阶级思想。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的第一个政治错误。

莫洛托夫同志把克里米亚让给犹太人的建议还不够愚蠢吗？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他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怎么能这么做呢？是什么原因让莫洛托夫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国有犹太自治区——比罗比詹。难道这还不够吗？就让这个共和国自己发展吧。莫洛托夫同志就不应该成为犹太人非法索要我们苏维埃克里米亚的辩护人。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的第二个政治错误。莫洛托夫同志的表现不像是一名政治局委员应有的表现。我们也坚决不接受他臆造出来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极其尊重自己的夫人，以至于我们刚要就某个重要政治问题通过政治局决议，热姆丘任娜同志很快就已经知道了。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纽带把政治局与莫洛托夫的夫人热姆丘任娜及其朋友连在一起了。但她身边的朋友却是不能信任的。显然，政治局委员是不允许有这种行为的。

现在，来说说米高扬同志。你们看到没有，他反对提高农民的农业税。我们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是何许人也？他在这里有什么不清楚的？

庄稼汉是我们的债务人。我们与农民结有牢固的同盟。我们已经把土地永久性地拨给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就应当向国家偿还约定的债务。因此，不应该同意米高扬同志的观点。

阿·伊·米高扬在讲台上引用一些经济统计数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斯大林（打断了米高扬）：这就是米高扬——又出来一个弗鲁姆金。你们看，这样一个浅显易懂的原则性问题，他自己都糊涂了，却还想把我们也搞糊涂。

维·米·莫洛托夫在讲台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辩解和证明自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是斯大林的忠实学生。

斯大林（打断了莫洛托夫）：胡说八道！我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们所有人都是伟大列宁的学生。

斯大林接着说道，此次全会应当解决一个组织问题——选出党的领导

机关。他建议选举大大扩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来取代政治局。选举程序非常特别。斯大林从自己的弗伦奇式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然后宣布："比如，可以把下列这些同志选入苏共中央主席团：斯大林同志、安德里安诺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伊格内季耶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科罗琴科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库西宁同志、马林科夫同志、马雷舍夫同志、梅利尼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米哈伊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别尔乌辛同志、波诺马连科同志、萨布罗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切斯诺科夫同志、什维尔尼克同志、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他开始宣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名单，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兹韦列夫同志、伊格纳托夫同志、卡巴诺夫同志、柯西金同志、帕托利切夫同志、贝可夫同志、普扎诺夫同志、捷沃相同志、尤金同志。之后，斯大林又从自己的弗伦奇式上衣的侧边口袋里掏出了另外一张纸，说道："现在是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例如，可以把下列这些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秘书处：斯大林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伊格纳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哈伊洛夫同志、贝可夫同志、波诺马连科同志、苏斯洛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共提议将 36 人选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同时，他还强调："除安德烈耶夫外，政治局的全体老委员都在这份名单上。关于尊敬的安德烈耶夫同志，大家都清楚他的状况：完全聋了，什么都听不到了，也不能工作了。还是让他治治病吧。"

有人在座位上说：应该选斯大林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不！请解除我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格·马·马林科夫在讲台上说道：同志们！我们应该一致同意并一致请求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一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拉·帕·贝利亚也支持这个提议。

斯大林在讲台上说道：中央全会上是不需要掌声的。应该理智地、认真地解决问题。我请求解除我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我已经老了，连文件都看不了了，还是另选一个书记吧。

斯·克·季莫申科说：斯大林同志，人民是不会理解的。我们万众一心，选举您当我们的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此外不可能有其他决定。

所有人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支持季莫申科。斯大林久久地站着，看着大厅里的人，然后挥了一下手，坐下来。

叶夫列莫夫·列·尼：《凭借斗争和劳动之路》，斯塔夫罗波尔，1998年，第12—16页

注释：叶夫列莫夫·列昂尼德·尼古拉维奇，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代表，著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2005年11月16日，与作者对该记录进行了核定。

二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和政治经济学

本节主要翻译、校对者为：
赵旭黎　袁再旺　余　哲　崔庆刚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信(1923年1月24日)(绝密)

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我认为，在我和托洛茨基同志通信交换意见之后，可以得出某些结论，在中央委员会各委员解决有关我们调控机关的问题之时，这些结论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

1）调控工作应当集中到哪里，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是按照我1月17日信中提到的原则进行整改后的劳动国防委员会？我建议将劳动国防委员会作为这样的机关，它的成员包括各个副主席，加上财政人民委员，加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再加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理由如下：a）副主席将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中占多数，从地位来看（不是从素质来看）这些副主席不是部门性的，而从非部门的和全国的角度来看，为了协调某些委员部的工作，非部门性也是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b）各副主席之间将分工对各委员部的工作进行监督，这样，各副主席将最直接地了解各委员部的工作。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看，中央进行正确领导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就是须有非部门性的人进行这样的了解。

我论断的依据并不是托洛茨基同志“两年前”所写的信件，那个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刚刚成立，而财政委员会和副主席还尚未出现，我的论断是从这些机关的实践中得出的。

这一实践给我们证明了什么呢？

首先，这一实践证明，主要由专家组成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发展并没

有超出劳动国防委员会辅助机关的范畴，仍然在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准备材料、制定任务。为此，作为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其本身也是人民委员会的下属部门）的一个部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否应当转变成为我们各委员部的实际领导机关，不必经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批准就做出决定呢？不，这是不行的。

其次，这一实践证明，现在大多数成员都是各部门代表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并不能胜任调控的任务，因为各部门的代表自然都倾向于本部门的利益，这一情况让进行全国性调控成为不可能。

最后，这一实践证明，由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在调控方面的无能为力，领导权实际上转移到了苏维埃决议并未规定的财政委员会的手里，该委员会由三名副职人员和一名财政人民委员组成。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或者将财政委员会合法化，撤销劳动国防委员会，或者撤销财政委员会，把劳动国防委员会作为计划经济唯一的领导机关，使它从人民委员会的部门间协调委员会转变成为高于部门的领导性的委员会。

在以前的信件中我已经提及过，我认为后一种是当前唯一合理的选择。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信件中，我并没有发现对这一选择的重要反对意见，同样也没有看到有关将国家计划委员会转变为领导机关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2）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副主席的权利与义务并不明确的观点（参见托洛茨基同志1月20日的信件）是不正确的。副主席协助人民委员会主席改正各委员部的缺点，并从计划经济的角度出发，统筹各委员部的工作。副主席是主席的助手。副主席的权利与义务是明确的。既然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在去年秋天的信中认为必须设立四个副主席（李可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瞿鲁巴），那么我认为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此外，副主席的实践证明，当我们的领导干部疲劳虚弱之时，一个或两个副主席是无法胜任工作的。并不是说他们要主持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而是首先要熟悉各委员部的当前工作现状。

3）需要一个乌克兰人当副主席，不是让他当乌克兰人民委员，因为那就不得不再设立白俄罗斯人民委员、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等，这样显然是行不通的。联盟人民委员会

的组成中需要一个乌克兰人当副主席，他和其他副主席一样都拥有全权，是真正意义上的副主席。托洛茨基同志问，这位副主席将替代谁呢？很显然，替代的是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了。为何乌克兰人不能成为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副手中的一员，主管联盟的几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比如负责对外关系（外交人民委员部加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呢？

4）我在前一封信中援引了列宁关于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提议，是为了说明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这一提议（好像）并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政治局 9 月 14 日的记录证实，这一提议在政治局进行了讨论，且是在政治局委员电话投票时托洛茨基同志坚决反对当副主席之后才通过的。在去年 9 月份托洛茨基同志手头就有这些记录，如果他发现了政治局做得不对，他当然能在长达 4 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全体会议上提出异议，或是要求重新讨论。但是他不知为何没有这么做。很明显，这里不关斯大林什么事。

5）至于诉诸过去和毫无必要地挖掘旧文件，则任何人都非常清楚，托洛茨基同志在把过错推给别人。只要看一看他最近一封信所附的分发到中央委员会各委员的旧文件，好像就能第三次证实这一点。

6）我想，应该由说转到做了，最近几天需要将通信中涉及的问题拿到政治局里进行一番讨论。

1923 年 1 月 24 日

中央委员会委员约·斯大林

萨哈罗夫 B. A.《列宁的“政治遗嘱”：历史事实和政治传言》，第 669—671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案卷号 276，页码 2—5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26年9月16日）

合作社及地方和中央的收购部门普遍违反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党的指示，关于此事的报道在报刊（尤其是经济类报刊）上铺天盖地都是，这

给我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暗中帮助耐普曼的这些明显的罪犯和工人阶级的其他敌人实际上并未受到惩罚，这正在瓦解整个经济和苏维埃机关，把我们的指示变成空，将我们这个党变成空壳子。这些坏蛋们表面上“接受了”党的指示，可实际上却嘲弄这些指示，如果我们不想被这些坏蛋俘虏，就不要再忍让了。我提议责成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察院）：

1）立即将破坏收购价格政策的人免职并交法院定罪，公布这些罪犯的姓名；

2）立即将破坏居民日用工业品销售价格政策（调低零售价格）的人免职并交法院定罪，也将其名单公布；

3）向全党通报，这些破坏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将毫不留情地与他们进行斗争。

我在全力坚持我的这一建议，也请你们大家都接受这一建议。记住，没有这些措施，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役，而却迎合了那些占据在我们的收购和合作社机关中的耐普曼分子。没有这些措施，就要命了。

《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书信集，1925—1936 年》，第 88—91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5388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26年9月23日）

莫洛托夫同志：

你 9 月 20 日的来信已收悉。

1）关于工资问题，你们干得好像还不错！重要的是，底层人民能得到一些实惠。尽管总体而言石油工人已经拿得不少了，不过要是能再给他们涨点工资就更好了，但如果现在没有可能性，那就只好先放一放，尽管巴库人有抱怨。

1926 年 9 月 23 日

约·斯大林

《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书信集，1925—1936 年》，第 93—95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5388

注释：1926 年 9 月 20 日，政治局通过了政治局工资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建议仅给在生产部门工作的工人增加工资。还通过了应当增加工资的工业部门的清单（煤炭、矿石、金属等工业部门）。9 月 30 日，政治局认为，可以提高部分石油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

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信（节选）（1927年9月23日）

1）关于合理化你自始至终都是对的。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师和普通工人派到美国和德国去。在这件事上舍不得花钱太不应该了，并且也是一种犯罪。如果能让阿廖沙参与到这件事中来，哪怕是在文学援助方面，那也是干了件很好的事。文学援助是我们首先需要的——否则就不会让人们振作起来，首先应该在报刊上阐明（系统地阐明）合理化的本质、特征、形式和好处，以便能够得到工人，然后是群众的支持。没有这个什么也干不成。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信件集，1912—1927 年》，第 347—348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3345，页码 1—3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29年8月21日）

6）政治局采纳了关于粮食收购的建议。这很好，但我认为这还不够。现在的关键在于对政治局决议的执行。不用去证实，各收购组织（尤其在乌克兰）都会绕过这一决议。但我接下来担心的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会对政治局的决议一无所知，决议会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部”

受到耽搁。因此，需要对各收购组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全俄集体农庄协会等组织做如下要求：

①把政治局命令的副本下发给这些机关各自的下属机关，以执行政治局的决议。

②每两周（一周一次更好）定期汇报一次决议的执行效果。也应该让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参与这件事。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和粮食收购前景的（米高扬可能会认为，如果决议通过了，那他的粮仓中就会有1.3亿普特的应急储备粮）。而我却认为，我们的粮食收购目前并不顺利。你自己判断判断：8月上旬我们只完成了计划的15%。就算我们在中下旬完成的份额不是15%，而是20%，这也仍然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担心这个不顺利的进度会成为我们今后收购的基调。而今年的粮食收购——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方面——如果在这上面搞砸了，那一切就全砸了。如果您不冷酷无情、铁面无私地向那些人施压，迫使他们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那失败的风险就会增加。

7）请重点关注乌拉尔的石油问题。原来，当时决定一年内只建10座钻塔。大部分钻井设备都是撞击式的，而不是回旋式的，这也就是说，钻探的进程将会是惊人的缓慢。这说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乌拉尔石油公司的“上司”——阿塞拜疆石油公司和格罗兹尼石油公司对在乌拉尔开采石油的态度与伊曼纽尔·诺贝尔（诺贝尔的侄子——译者）当初对乌赫塔的看法如此相似。真不像话，这是在犯罪。依我看：①应当把乌拉尔从那些想要抵制乌拉尔石油开采的“上司”手中夺回来，然后立即组建一个专门的“乌拉尔石油”托拉斯；②必须将格罗兹尼石油公司这个“上司”派来的破坏分子多布伦斯基（好像是多布伦斯基）解职，赶出乌拉尔（你们拿去吧，穷人，我们没有用），然后任命一位有经验的共产党石油工作者当“乌拉尔石油”托拉斯的领导人；③应当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于本年内建成40—80座带回旋式机床的钻塔。如果不采取类似这样的措施，这一事情就会停滞（或者，甚至会荒废），我们在乌拉尔就不会有任何实际勘探活动。

又及关于棉花委员会。据消息称，棉花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那帮人（尤其是棉花委员会那些人）不相信政治局关于扩大棉花五年计划的决议是正确的，并企图在实际工作中搞砸这一决议，以证明自己才是对

的。如果确有其事（我认为，这件事有很大可能是真的），那就必须承认，棉花委员会的这种“想法”是一种最卑鄙无耻的破坏活动，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总之，应当认为，马马耶夫在棉花委员会领导人的职位上干不长了。他也许能够破除棉花委员会的那些陈规陋习，但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因此，中央委员会打算现在就向棉花总委员会增派一些新的有威望的工作人员，这是完全正确的。富什曼可能会适合做这件事。还有，如果哈里通诺夫能老实干活，他大概也会很合适。沙敦茨也非常不错，但谢尔戈却坚决反对。因此，最好由赖因霍尔德代替沙敦茨管理棉花总委员会。应该由其他作用相同的工作人员代替富什曼和哈里通诺夫来管理工农检察院。

1929 年 8 月 21 日

约·斯大林

《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书信集，1925—1936 年》，第 144—148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5388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
（1930年8月底—9月初）

维亚切斯拉夫：

最后一封信收悉。

1）毫无疑问，我赞成把集体合同的签订时间由 1 月改到 10 月。此事不宜拖延。但是，完全不需要为此召开中央全会。

2）我反对把中央全会改至 10 月初进行。要想把全会改至 10 月初进行，就应该在 9 月中旬（最迟）拿出控制数字。显然，在这一时间之前是不可能完成的。此外，问题不在于全会，也不在于全会无数的新决议。不但如此，问题也不在于那些新的“宣言”和“号召”：每一期《真理报》都有“宣言”“号召”。如今，问题在于切合实际的日常监察，检查执行情况。只要我们还不能把检查执行情况安排好，我们的经济机关和工

会组织，也就是说计划执行情况会搞不好的。我认为，如要提前举行全会，最大限度就是把全会改至10月底进行，但前提只有一个，即各苏维埃机关要在10月初就把控制数字全部准备好。

3）你忽视了市镇协会条例及报刊上的相关宣传。你要考虑到，这个破条例被人描述成了新条例，并强烈要求与“旧”条例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与农业劳动组合条例相提并论。如此一来，该（新的）市镇条例的核心内容就是极力为个体经营者创造“改善本人（个体）经济状况”的机会。真是一派胡言。现在，我们集体农庄运动的浪潮正在不断高涨，而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合作社中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却想回避有关集体农庄的问题，着手“改善农民个体经济”！我认为，右派们偷偷抛出了一个有关市镇协会的条例，就是在进行某种报复，而中央委员会的人却因工作繁忙而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这个诡计。

4）关于对全会议事日程的意见，我已经通过密码电报告诉你了。我认为，如果中央全会不就普遍问题做出一般性的决议，而是听取几个最糟糕的经济部门人民委员部的总结（总结!）报告，事情才会取得成功。现在，工人的供应问题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么，全会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应当对消费合作社进行大换血，并消除其中的官僚作风。应当检查肉类供应，整顿相应的经济部门。因此我才对议事日程提出了建议。

《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书信集，1925—1936年》，第206—208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58，目录号1，案卷号5388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30年9月1日）

2）我们需要大量的筑路机、面包厂及洗衣店的设备。对于我们的工厂来说，生产这些设备很简单，而且也完全可以胜任。但却没人去做这些事（都认为这是“小事”），因此我们只好花费外汇。乌汉诺夫要做这件事，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却不让他做，这个委员会简直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自己什么也不做，也不让别人做。应该结束这个乱七八糟的局面了。请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一问题，并责成乌汉诺夫（莫斯科苏维埃）

立刻着手生产面包厂、洗衣店（以及筑路机）设备。不得不提供一些资金支持。但是，如果我们想把事业向前推动，就需要这么做。

《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书信集，1925—1936 年》，第 209—210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5388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节选）（1931年8月30日）

3）看来，您是迫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铁管一事的压力，尤其是主管公用事业的人也在施压并要求进口。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都是不对的，因为：①在中央委员会就 32 年控制数字所做的指示中，严格规定了 31 年的金属进口量，而至于 32 年，规定其进口量应低于 31 年的数字，然而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想要推翻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议时，您却对其随声附和；②有传言称，无须在今年付款，——这些都不可信，因为，32 年和 33 年我们的外汇将会比今年紧张（美国正在竭力倒空我国的外汇储备，力求彻底破坏我们的外汇形势，而美国现在是金融界中的主要力量，也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因此，我们应当节省外汇，这不仅是为了 31 年，也是为了将来；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不但没有向本部门的工作人员施压，让他们多炼生铁，反而向国库施压（也就是说，向国家施压，向工人阶级施压），强迫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外汇资源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职员们的无能、因循守旧和官僚主义埋单。

卡冈诺维奇同志，事情就是如此。

4）因此我认为，绝不姑息那些为了本部门员工的安逸而企图挥霍工人阶级外汇资源的人（和部门）。

5）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可以通过政治局布置，如果国家计划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对此提出要求的话。

6）对那些想要通过海洋运输石油的人们做出让步，就意味着让整个交通部门瘫痪。现在决不能做此让步。

7）就让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对水运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监管，强迫这两个部门工作。这两个人民委员都受

缚于各自的机关，尤其是鲁希莫维奇，他那官僚式的自负正是交通人民委员部在布尔什维克式的处事方法方面的落后和保守的另一面。

8）不需要任何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提前恢复个别旧富农权利的法令。我就知道，小市民和俗人中的那些蠢货们一定是想钻进这个老鼠洞。请把这个问题推迟至秋天。

9）我看了布哈林的讲话记录（速记记录）。很空洞，脱离了生活，是非布尔什维主义的讲话。他的讲话同时也是一次没有技巧的、小儿科般的尝试，他妄图把纲领的《提纲》提供给那些在一系列经济问题和工人补给方面反对联共中央委员会的前右派分子。这个布哈林同志真是个怪人！他为何要耍这个把戏啊。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把布哈林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技术宣传部的领导人，不是为了让他去做一些关于技术宣传及其必要性的讲话，而是为了让他去组织实际而具体的技术宣传活动。如果他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那我们只好再另寻他人。

如果布哈林问到，或者是情势所需，您可以告知布哈林，这是我的意见。

好了，就写到这儿吧。

约·斯大林

8月30日于索契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年》，第71—72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81，目录号3，案卷号99，页码12—14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节选）（1931年9月12日）

卡冈诺维奇同志：

您好！

您的来信收悉。

1）您的那些用来证明政治局钢材进口决议的正确性的论据是经不住批评的。问题不在于计算国家“欠”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多少钱，而在

于有人强迫让您接受按钱计算，而不是按吨数计算（已被政治局通过）……把所谓的外汇委员会、所谓的对外贸易部等都连累进去了。从与进口相关的整个事件中必然可以得出最少两个结论：a）外汇委员会是个废物，不是国家机关，而鲁祖塔克也配得上这废物机关的主席；b）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不维护国家利益，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一点好处，总之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已经彻底腐朽了。

2）给您寄去一份有关我们经济机关对进口金属的很不像话的恶劣态度的《消息报》剪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企图通过进口金属来掠夺国家的外汇资金，而已经为车里雅宾斯克建筑联合企业进口的金属实际上成为无主财产，因此这些金属都被浪费掉，并差不多拍卖一空。一群罪犯流氓！我提议：a）把《消息报》的简讯提交政治局讨论；b）责成《真理报》（现在总是写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核查该事，并写一篇关于“共产党员”对待国家进口商品的无赖态度的社论；c）一定要把罪犯送上法庭并对其进行严惩。

祝好。

约·斯大林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100—101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81，目录号 3，案卷号 100，页码 112—113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节选）（1932年6月15日）

3）你们那关于石油问题的议论还不错。在《真理报》提到的新油田之外，一定要补充说，东方还有一个石油产地——雅库特。我把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关于雅库特石油的相关信息发给您。我认为，斯塔罗瓦托夫的指示不是没有理由的。除了有关石油的议论之外，我认为雅库特的石油（那里有石油）对我们来说也是上天的恩赐，是宝贵的财富。对这件事要特别关注。

4）不喜欢丘巴尔和彼得罗夫斯基的信。丘巴尔进行了“自我批评”——为的是再从莫斯科得到数百万普特的粮食，彼得罗夫斯基则扮

演了一个伪君子，说他为“联共（布）中央指示”而牺牲了自己——为的是达到缩减粮食收购计划的目的。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不可取的。如果丘巴尔认为，进行自我批评不是为了动员乌克兰的资金和力量，而是为了得到外部“支援”的话，那么他就错了。我认为，给乌克兰的已经不少了，没必要再给粮食，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拿出粮食了。这件事中最糟糕的是——科西奥尔的沉默。他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他知不知道丘巴尔和彼得罗夫斯基的信？

5）我认为，不应该对个人农民的播种汇总表进行修正。这样将会更好。如果您和莫洛托夫坚持要修正的话，那么在万不得已之时才可以修正，但不是10%—15%，至多是5%—8%。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年》，第168—169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81，目录号3，案卷号99，页码62—63

注释：1932年6月12日《真理报》刊登了一份材料，“斯捷尔利塔马克是新的世界石油产区，巴库、格罗兹尼和迈科普的绝大多数石油产品都供出口”。材料中报道说，巴什基尔发现了一个新的“储量最为丰富的石油基地”，因此有可能将靠近港口的南方地区（阿塞拜疆、北高加索）储藏的资源都用来出口。随后的几天，几乎每天都要刊登有关加紧开采新油田的消息。看了斯大林的信之后，6月20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报道了一些新的石油产地，其中也包括雅库特的石油。6月21日在《真理报》上又刊登了一份内容丰富的有关“雅库特的石油”的材料。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电报（1932年6月22日）

致莫斯科，联共中央，波斯克廖贝舍夫

卡冈诺维奇阅

一、如果中央全会定在8月初召开，那么会议日程就可以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即粮食收购问题和商品流转问题，也就是指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的贸易问题。另外，很明显，如果这月底召开书记会议，并在会上解决粮食收购问题的话，那么8月初召开全会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如果全会推迟到 9 月份的话，那就可以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供应人民委员部关于苏联贸易进展的总结报告；第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工业合作社关于开展日用品生产的总结报告；第三，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关于黑色冶金工业发展的总结报告。

二、必须在《真理报》发一篇关于春播活动结果的社论。社论中应当强调一点，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汇总表有力地证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农业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因为今年个体经济成分的比重不到 20%，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部播种面积所占比重超过了 80%。社论中还应当严斥所有的资本主义走狗、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右倾分子，要告诉他们，劳动人民的敌人将苏联拉回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已被彻底粉碎，苏联已经最终走上了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苏联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斯大林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187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卷宗号 558，目录号 11，案宗号 77，页码 83—85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维·米·莫洛托夫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32年6月24日)

1932 年 6 月 24 日

致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

1）你们第三季度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基本建设上投入资金太多，你们这样做会威胁到整个事业，也容易使重工业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产生腐败。你们为什么推翻了你们原来的决定，没有把资金控制在第二季度的范围内呢？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对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基本建设投入过多资金，并以此建立对新建设的迷信之时，你们扼杀的不仅是迷信，甚至还扼杀了经济工作者合理使用已建成企业的简单而普通的愿望。举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哈里科夫拖拉机厂、莫斯科汽车公司和汽车制造厂为例。建设的时候满腔热情，当然了，这是好事。但是，当这些工厂开始运

作，必须要对它们合理使用之时，人们的热情消退了，更喜欢躲到一旁。自然，这以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方式让国家陷入窘境。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有对新建设的迷信（这很好），但却没有对合理使用现有工厂的迷信（这很不好，也相当危险）。当你们给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基本建设投入过多资金的时候，也在工业中强化了这种不正常的危险状态。因此，你们给新的粮食困难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个我就不提了……

2）我坚决反对将290万卢布外汇投给普梯洛夫工厂，用于将拖拉机车间改建为汽车生产车间。我们的外债本来就很多，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学习一下如何节约外汇。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使用自己生产的机床，那就再等一年，等我们有能力生产这些机床了再说，着什么急呢？还不清楚，我们有没有生产2万辆别克汽车需用的钢铁，这个我就不提了。我们的拖拉机厂和汽车厂都缺少钢铁，谁又能保证一年以后我们现有的工厂和普梯洛夫汽车厂就有足够的钢铁呢？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中对此根本没有任何保证。

3）政治局已经决定，让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交一份报告，介绍一下为莫斯科汽车公司、汽车制造厂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建立保障性冶金基地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在哪儿，什么时候能交上来？暂时就是这些。

问候大家！

约·斯大林

1932年6月24日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年》，第190—191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卷宗号81，目录号3，案宗号99，页码71—76；卷宗号558，目录号11，案宗号740，页码82—83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维·米·莫洛托夫的信（1932年6月26日）

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问题。他认

为，不管是在采购农产品方面，还是在销售城市工业产品方面，特别是在农村，消费合作社的作用应该提高（合作社的“中介”作用），这是正确的。他还认为，应当废除合作社国家采购的功能，合作社应该把精力集中到收购地方的和分散性质的产品上，这也有可能是正确的。需要研究的问题仅仅是，没有合作社，国家采购组织能否完成采购任务。舍博尔达耶夫还认为，应该免除消费合作社的各种“没收”以及许多过重的苛捐杂税，这种观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认为舍博尔达耶夫在收购价格（农村）和销售价格（城市）问题上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让合作社按照自由价格去收购农产品，恐怕我们的收购工作将会被彻底破坏。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还必须得提高国家收购价格。但是今年这事连想都不用想。本来可以宣布低价格的国家采购为国家赋税和差役，但是如果不取消农村的直接税，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此外，即使研究完这个问题之后，发现它是正确的，我们无论如何今年都不能完成这一程序。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不能取消国家在价格上对合作社的一切监督和调整。显而易见，合作社必须按照国家价格进行采购，并且只有在采购完成后（1933 年 1 月 15 日）才被允许按高于国家价格约 5% 的价格进行收购和购买。

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在城市销售价格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我并不反对合作社按照平均议价或者甚至按照议价在农村销售城市的商品。但是我反对合作社因为想得到“正常的”利润而提高城市的销售价格。我反对这么做，是因为这将会意味着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的提高。我们需要布尔什维克式的合作社来当城市和农村的中介组织，也需要具有高利润的合作社。

当然，无论如何不要因为舍博尔达耶夫同志报告中的某些极端的观点而对他进行指责。相反，应该对他进行赞扬，因为他坦诚而适时地提出了一个已经相当成熟的问题。更何况，他报告中提到的大部分实际建议都是完全正确的。

暂时就是这些。

问好！

约·斯大林

又及：刚刚收到您 1932 年 6 月 23 日的来信。

现答复如下：

1）可以限于在乌克兰再增加一个地区（顿巴斯地区）的机关。

2）粮食出口方面，我建议大大缩减罗森戈尔茨的计划（第三季度）。

3）我认为，还配不上花钱让巴别尔出国旅行。

约·斯大林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年》，第197—198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81，目录号3，案卷号99，页码81—87

注释：页边写有斯大林评论的舍博尔达耶夫报告保存在政治局备忘录的原件中，这是因为，1932年7月10日政治局审查了他的报告并责成日用必需品委员会研究制定决议草案。参见：1932年6月26日给舍博尔达耶夫的电报。

关于巴别尔的出行，1932年6月23日卡冈诺维奇在信中写道："……马·高尔基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允许巴别尔短期出国。虽然，我已经转达了，我们怀疑其合理性，但是他却每天都给我打电话。看来，高尔基对此的反应有些激烈。我知道，在这种事上，您对他特别关心，所以我就此事向您通报一下，并询问一下您，该怎么办……"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节选）（1932年7月17日）

3）已经看过全苏棉花会议决议。我不同意农业人民委员部关于扩大播种面积的方针，尤其是扩大国营农场"二五"期间的播种面积。农业人民委员部想将国营农场的棉花种植面积由今年的16.8万公顷提高到1937年的41.5万公顷。这是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数字疯狂而幼稚的痴迷。这一扩大意味着要为国营棉花农场的巨大亏损（不可想象的成本）和可能的国营农场劳动力紧缺（不仅是现在，将来会更严重）付出几亿卢布支出的代价。谁会需要这样龌龊而幼稚的想法呢？集体农庄的工人多，国家投资更少一些，而棉花还便宜好多倍，扩大这种集体农庄的面积岂不更好？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二五”计划末将国营农场的面积扩大到（至多!）25 万公顷。要想拥有能给集体农庄提供新的高产棉花样品的具有技术装备的国营农场示范基地，这已经足够了。剩下的面积交给集体农庄。

我还认为，“二五”期间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包括集体农庄的面积）的总计划也应从 340 万公顷至少减少到 300 万公顷。现在的问题不在扩大棉花种植面积，而是如何提高产量，改善耕作条件，培养干部。工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这上面来。我们需要的不是面积本身，尽管面积确实扩大了，而是棉花，更多的棉花。

4）总之，应当说，农业人民委员部作为主管经济的一个人民委员部，没能经受住考验。地方上的工作人员讥讽农业人民委员部，认为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说，农业人民委员部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盲目而粗略地（尽可能盲目，尽可能粗略!）扩大种植面积（包括所有作物），尽可能多地向政府要钱（钱越多越好!）——所有这些都是打着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旗帜干的。至于提高产量、改善农耕条件、减少开支、建立经济核算等问题，农业人民委员部即使附带着做一下，也是为了心灵的安慰！这时，农业人民委员部不明白，当他们盲目地扩大种植面积和不加审查的大量拨款时，工作人员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和愿望去改善工作和提高产量，他们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件事。不但如此，农业人民委员部对工作质量和提高产量问题相当不重视，他们至今还不清楚，从经验和科学的角度讲，什么肥对什么作物是必需的，如何施肥等问题（这是事实!）。这一切的结果便是，一方面开支很大且使用了大量机器，另一方面土地耕作质量恶化及经济效益极低。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险，可以瓦解我们的国营农场，可以败坏我们集体农庄并使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个赔本的组织。

需要：

1）反对盲目扩大集体农庄和（尤其是!）国营农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面积；

2）应当立即迅速地将农业人民委员部及其工作人员的全部注意力转移到改善耕作土地、提高产量、培养和提高干部队伍，机器拖拉机站日常事务的干练领导等问题上来；

3）需要系统且认真地教育，反复教育我们所有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

班子和工作人员，让他们成为机器拖拉机站的固定工作人员；

4）应分散我们机器拖拉机站的管理权，保证我们的地方机关有一定的管理权；

5）应当减轻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将该委员部中所有的粮食及畜牧业国营农场划入某个人民委员部，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留下所有集体农庄以及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生产的全部产品，把机器拖拉机站系统作为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重心，机器拖拉机站是集体农庄，也就是农民（私人的）农业经济的支柱。

我认为，为了使农业摆脱当前的管理困境，采取这些措施以及类似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就此搁笔。祝好！

约·斯大林

1932 年 7 月 17 日

附：刚刚收到瓦列基斯关于改善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信件，信很好，建议也是正确的。

瓦列基斯关于农民退出集体农庄的消息可以暂时不分发给我们各州的工作人员。这些退出是暂时的现象，对之不必大肆宣扬。

约·斯大林

请将此信交莫洛托夫一阅！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231—233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81，目录号 3，案卷号 99，页码 91—104

注释：1932 年 8 月 8 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棉花会议》的决议："1）认为，关于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的棉花会议的计划定得太高。2）委托农业人民委员部研究尤其是通过提高产量扩大棉花生产的问题。"

1932 年 7 月 23 日政治局基本同意了瓦列基斯关于改善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建议。决议交由莫洛托夫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进行最终的修订。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维·米·莫洛托夫的信（1932年7月20日）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

因为机要通信员马上就要走了，时间关系，故同时给你俩写信。

1. 基本建设投资一定要至少缩减 5 亿—7 亿。不能缩减轻工业、黑色冶金业、交通人民委员部。所有其他方面（甚至包括部分军事）的开支，尤其是国营农场建设等必须大力缩减。

2. 我反对到国外购买船舶，给有色冶金（铜、锡、铝、镁、金、锌等）企业购买设备比这要强得多。

3. 最近盗窃现象时有发生。首先是盗窃铁路运输货物（损失了几千万卢布），其次是盗窃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财产。组织盗窃的主要是（被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和其他企图动摇我们的新制度的反社会分子们。按照法律这些先生们被视为普通盗窃犯，会被判入狱 2—3 年（形式上！），但实际上过 6—8 个月就被大赦释放了。对这些先生们实行的这种制度，不能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只会鼓动他们参与实质上的反革命“工作”。继续忍受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我建议颁布法律（取消或废除现行法律），该法律应：

①从法律意义上将铁路货物，集体农庄财产和合作社财产定义为国有财产；

②如侵吞（盗窃）上述类别财产，至少判处十年监禁，一般都应判处死刑；

③取消对这种“职业”的罪犯实施大赦。没有这些（或类似的）残酷的社会主义措施就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规则，而没有这种规则就无法维护和巩固我们的新制度。

我认为，颁布这样的法律刻不容缓。

4. 毫无疑问，集体农庄贸易法令在某种程度上会让富农分子及投机商人活跃起来。前者会竭力让集体农庄庄员不安并唆使其退出集体农庄。后者会乘虚而入并企图操控贸易运作。显然，我们应当彻底铲除这些败

类。我建议委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及其地方机构：

①严密监视农村，所有积极宣传反对新的集体农庄制度的人，积极宣传退出集体农庄思想的人，都要剥夺其权利并将其送入集中营（个别的）；

②严密监视集市、市场及所有投机商和转售商，只要他们不是集体农庄庄员（对于集体农庄庄员的投机商最好交由集体农庄的同志审判会处置），就剥夺其权利，没收财产并送入集中营。

没有这些（和类似的）措施便不可能巩固新的制度和新的苏维埃贸易。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及从属部门应立刻着手准备自己的人力并研究敌人。采取行动还要再过一个月，不会早。

5. 我曾写信给你们，谈到过改组农业人民委员部及组建新的人民委员部的事。我认为，如果你们同意我的建议，可以在秋季时将此事付诸实施，现在先做一些准备工作（挑选领导班子成员等）。

祝好！

约·斯大林

1932 年 7 月 20 日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235—236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81，目录号 3，案卷号 99，页码 106—113

注释：1932 年 7 月 23 日，政治局成立了一个由古比雪夫任主席的委员会，专门研究降低建设成本问题。委托该委员会“制定出降低建设成本的实际措施草案”，以及将第三季度基本工程的拨款缩减 7 亿卢布。在 7 月 26 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古比雪夫提交了相关决议的草案。经费缩减涉及所有部门，但缩减最多的是重工业（缩减 4.05 亿卢布）。代表各主管部门的委员会成员曾试图抵制。比如，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皮亚塔科夫认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经费缩减的最大上限是3.1 亿卢布，并一直坚持这一点。正在休假的奥尔忠尼启则也发电报表示抗议。但是，8 月 1 日政治局接受了古比雪夫的建议。用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包括军工业）的投资额缩减了 4.05 亿卢布，农业人民委员部（包括国营农场缩减 0.8 亿卢布）共缩

减经费 1.5 亿卢布。为了安抚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 1932 年 8 月 2 日给他写了一封信："关于缩减投资：朋友，我们也是被迫这样做的，财政状况迫使我们只能这样做…… 我们曾给咱们的重要朋友写过信，他认为缩减 7 亿卢布左右的经费是完全正确和及时的，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参阅：《1932 年 7 月 24 日致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维·米·莫洛托夫的信》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不迟于1932年7月24日）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同志：

1. 如果有人对我提议颁布法律以阻止合作社、集体农庄财产及运输货物失窃有反对意见，——请这样进行解释。如果资本主义没有宣布私有制原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没有将私有财产作为神圣的财产，如果破坏私有财产的利益要不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资本主义没有为保护私有财产建立起自己的私有制国家，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战胜封建主义，也不会发展并巩固起来。如果社会主义不宣布公有财产（合作社财产、集体农庄财产、国有财产）是神圣且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战胜和埋葬资本主义成分和个人唯利是图的习惯、经验以及能够动摇新社会基础的传统（是盗窃的基础）。如果社会主义不竭尽全力保护合作社、集体农庄和国家的财产，不击垮反社会的资产阶级富农分子侵吞公有财产的野心，社会主义不可能巩固和发展新的制度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此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法律，这个空白需要填补。新的法律可以命名为，比如：《关于保护公有单位（集体农庄、合作社等）财产和巩固公有（社会主义）制原则的法律》。或其他类似名称。

如果建议被采纳，请寄来（初步的）法律草案。

2. 在给你们的回信中我有一次曾提到，除交通人民委员部、黑色冶金业、轻工业外，所有其他部门都需要缩减投资 5 亿—7 亿卢布。为避免误会特在此说明，我所说的轻工业还包括食品工业（制糖业、罐头业等）。

祝好！

约·斯大林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年》，第240—241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81，目录号3，案卷号100，页码137—140

注释：在文件第一页上方有题词："同意——莫洛托夫、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

1932年7月24日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签发了一封密码电报：

"索契。斯大林同志收。现已拟定出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决议草案如下，使用了您信中的一些表述。

鉴于最近铁路运输货物及合作社、集体农庄财产盗窃现象日益频繁，并且这些盗窃事件都被富农、被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的人及其他反社会分子利用，企图以此来动摇我们的新制度，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做出决议：

1. 将铁路运输货物、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视为国有财产。

2. 作为对盗取铁路物资以及盗取合作社及集体农庄财产的司法惩罚措施，采用最高的社会保障措施——枪决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如情节轻微，可改为不低于十年的监禁并处没收财产。

3. 取消对犯有此种罪行的犯人实行大赦。

4. 委托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司法机关负责对这类案件尽快进行审理。

请告知您的意见。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维·米·莫洛托夫的信（1932年7月24日）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

第一点　如果外高加索人已经下达了新计划，则不必废除他们的决定，因为废除后各地会出现混乱，这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如果还没来得及下达计划，那我完全支持你们的决定。无论如何，对外高加索各部门的完全不能容忍的擅自行动提出警告后，需要强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第二点　我们制定的在全苏无条件执行粮食收购计划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不得不对乌克兰遭遇特殊灾情的地区给予例

外。这不仅从公平角度说是必需的，而且还因为乌克兰的特殊情况，同波兰接壤等。我认为，应该将遭遇灾难地区的集体农庄的收购计划减免一半，而对个体劳动者则减免三分之一。这意味着要减免 3000 万或 4000 万普特粮食。此事不是现在需要做，而是 8 月中旬或 8 月末，以使越冬作物的播种活动能够更加活跃。或许，对外高加索地区也需要给予特殊照顾，但规模不要超过 100 万普特。

斯大林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241—242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1，案卷号 78，页码 79—81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1932年7月25日)

卡冈诺维奇同志：

您好！

1）昨天我给你写了封密码信，提到要减免乌克兰遭遇特殊灾情的集体农庄及个体劳动者的部分粮食收购计划。或许，在书记会议（6 月末）和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进行讲话之后，我的建议让您（及莫洛托夫）感到有些奇怪。但是，这里其实没什么奇怪的。6 月末（书记会议）和 7 月初（乌克兰党代会）是组织粮食收购和安排人手执行粮食收购计划的时期。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各州委书记的面在这个时期谈论缩减计划（哪怕是以例外的形式），意味着会使乌克兰的人心彻底涣散（就这样已经人心涣散了），使各州委书记产生混乱，并中断粮食收购。6 月末 7 月初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到了 8 月中旬或 8 月末的时候，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段时间内，首先，庄稼未来的收成情况已经明朗（已经搞清楚了！），全苏的情况无疑会很好；其次，党和苏维埃的力量已经动员起来，为完成计划已经做好了安排；再次，这段时间进一步了解了乌克兰事务，发现有必要通过减免部分计划来帮助乌克兰的集体农庄；最后，8 月末（我坚持认为 8 月末或至少 8 月下半月）是通过提供援助来推动冬作物播种和整个秋季劳动的最佳时期。

我认为，缩减3000万普特的粮食收购足以解决这件事，最多4000万普特粮食。乌克兰人可能会要求，将这一数字在所有集体农庄中进行分配，或者要求也给个体劳动者提供和给集体农庄一样的援助。如果有这样的请求，应予以拒绝。应当只援助受灾的集体农庄，平均减免计划额的50%，对于个体劳动者，则只减免计划额的1/3，或者甚至1/4。

2）格林科的便笺我已读过。他（和马里亚辛）有些夸大，还有部门的片面性等。但总的说，格林科及其工作者们是对的，应当支持他们。

祝好！

斯大林

1932年7月25日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年》，第244—245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81，目录号3，案卷号99，页码115—119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的电报(1932年8月5日)

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收

主管农业的（高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在工作中的主要不足（当前）在于组织性质方面的缺陷。农业人民委员部的组织缺陷，拖拉机中心和机器拖拉机站的组织缺陷，为机器拖拉机站及国有农场培养干部工作上的缺陷，在力量配置上的缺陷，全苏集体农庄协会及其地方机构的烦冗——这都是组织缺陷。很多人认为，组织问题不值一提。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制定出正确路线之后，组织问题便是决定性的问题，因为组织问题意味着正确的路线能否得到贯彻和执行。

如何解决和消除这种拥有正确路线，但却缺乏正确而有组织的贯彻执行之间的不协调状况？

必须要：

1. 将谷物和畜牧业类的国营农场从农业人民委员部分离出来，划归

另外一个人民委员部，而农业人民委员部主要负责集体农庄的工作。

2. 将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和机器拖拉机站按照主要作物类型（谷物、棉花、甜菜、亚麻等）区别开，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技术熟练的工人聘为带薪的固定工人。

3. 加强机器拖拉机站各州部门的作用并保障州党委可以对其进行实际监督。

4. 使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人，不仅成为技术人员（懂拖拉机等农业机械），而且成为农学专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等，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善于跟“庄稼汉”打交道。为此应：

①将当前培养我们并不需要的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学员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和地方共产主义高等学校改造成新型的农业学校，能为我们培养可以管理国营谷物农场各部门以及集体农庄和畜牧业国营农场的畜牧场的现代化的具有经济素养的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区党委书记和区执委会主席；

②使这些（莫斯科和地方的）农业学校能容纳 1.5 万—2 万名学员，学员从各机器拖拉机站的队长、副站长、区党委和区执委会的骨干、各集体农庄协会的工作人员等中间进行选拔；

③组建这些学校的学制要求：区党委和区执委会书记的学制为三年（设有更广泛的政治纲领），其他人学制为两年，文化程度低的人额外还要有六个月的预科（即两年半学制）。

5. 自上而下取消全苏集体农庄协会这个已经没用的体系，将其工作人员转到农业人民委员部及新成立的主管国营农场的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把区党委、区执委会、机器拖拉机站和区土地部门作为影响农村的主要组织手段。

6. 在主管农业的两个人民委员部中组织进行详细的和非常专业化的指导工作（在农业的所有领域）。

就此搁笔！祝好！

约·斯大林

1932 年 8 月 5 日

又及雅科夫列夫同志到我这来了，他也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我也跟他

谈了一系列问题，他会就此向你们口头转达。

约·斯大林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年》，第262—263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81，目录号3，案卷号99，页码125—131

注释：1932年10月1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将谷物和畜牧业国营农场从农业人民委员部系统中分出，组建苏联谷物和畜牧业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和整个土地部门系统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服务并领导集体农庄”上面。决议规定改造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中建立一系列各部门专门的机器拖拉机站中心。1933年1月，斯大林的建议最终形成了文件，当时成立了机器拖拉机站政治处。根据1932年11月29日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全苏集体农庄协会、共和国、州和地区的集体农庄协会被撤销。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1932年8月11日)

卡冈诺维奇同志：

您好！

8月9日的信已经收到。

1）关于保护公有财产的法令当然很好，它很快就会生效。打击投机分子的法令也很好很及时（也很快就会颁布）。但所有这些还不够。中央委员会还应给各级党组织和司法刑罚机关下达专门的指示信，以传达这些法令的内涵精神及其实施的方式。这是完全有必要的。请告诉我，我们需要让谁来起草类似的指示信。我很快会回到莫斯科，然后看看。

2）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谷类饲料的使用和内燃机车的问题，等我回莫斯科后我们再谈。

3）现在最重要的是乌克兰的事。乌克兰此时的形势糟透了。党的各级组织表现得不好。听说，乌克兰有两个州（好像是基辅州和第涅伯彼

得罗夫斯克州）有 50 个左右的区党委表示反对粮食征购计划，认为它不切实际。据确切消息，其他区党委的情况也不乐观。这像什么？这不是党，是议会，是对议会的滑稽模仿。他们这是想替代党来管理这些地方。柯秀尔不是在领导各区，而总是徘徊在联共中央委员会的指令和各个区党委的实际要求两者之间，他已经陷入绝境了。列宁说得对，一个在关键时刻没有胆量知难而上的人，就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苏维埃各级机构的工作也不好。丘巴里不是真正的领导人。国家政治保卫系统的情况也不好。在像乌克兰这样一个既大而又特殊的共和国里，列坚斯不能胜任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领导工作。

如果我们不马上着手对乌克兰的情况进行调整，就有可能失去乌克兰。你要注意到，毕苏斯基没有马虎大意，他在乌克兰建立的间谍机构要比列坚斯或柯秀尔想象的强大许多倍。你还要注意到的是，在乌克兰共产党（50 万名党员，嘿嘿）党内存在不少（的确不少!）腐化分子、自觉和不自觉的佩特留拉分子，此外还有不少毕苏斯基直接派来的间谍。只要情况一变糟，这些人马上就会在党内（以及党外）开辟一条战线，与党进行对抗。最糟糕的是——乌克兰的领导人看不到这些危险。

不能再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了。

需要：

①撤掉柯秀尔，由您顶替他去乌克兰，保留您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

②此后，把巴利茨基调到乌克兰担任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或者驻乌克兰全权代表，因为好像未设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的职务），保留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职务，而让列坚斯任巴利茨基在乌克兰的副手；

③之后再过几个月，用其他同志顶替丘巴里，比如格林科或其他人；调丘巴里去莫斯科当莫洛托夫的副手（可让柯秀尔任联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④你本人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乌克兰变成苏联真正的堡垒，变成真正的模范共和国。在此事上要不惜花钱。

没有这些措施及类似的举措（稳定乌克兰的经济、政治，首先是边境地区等），我再说一遍——我们会失去乌克兰。

对于这些您怎么想？

这件事要尽快着手去办，——一到莫斯科就立刻办。

祝好！

约·斯大林

1932 年 8 月 11 日

又及关于巴利茨基和列坚斯的问题，我已经和缅任斯基谈过。他同意并坚决拥护这件事。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273—274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81，目录号 3，案卷号 99，页码 144—151

注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1932 年 8 月 7 日关于保护国有企业、集体农庄、合作社财产及加强公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决议”的实施细则于 9 月 16 日得到了批准。此细则明确了应按 8 月 7 日颁布的法律治罪的犯罪行为，确立了盗窃者的分类及各类别的相应惩罚措施、案件的审理程序和调查的期限等。该细则的目的之一是缓和法律异常残酷（所以导致实践运用时有困难）的制裁。尤其是，对于惯偷实行枪决，但对社会主义财产的小偷小摸则不在其列。细则中还含有绝密部分，通过时加盖有“特别文件夹”字样，其中规定了简化的批准判决程序。

1932 年 11 月巴利茨基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驻乌克兰特派员（斯·弗列坚斯此时仍为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人）。1933 年 2 月巴利茨基正式接替列坚斯担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乌克兰全权代表。

关于取消凭证配给制（1934年11月2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取消凭证配给制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其目的首先在于，我们想要加强货币经济。我们要在苏维埃条件下加强货币经济，发展商品流通，用商品流通制度或政策来代替现在机械的产品配给制度或者政策，后

者考虑的不是某个地区的需求，也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抽象的人。现在不考虑消费者，就是分给你多少多少商品，多少多少面包——拿啊，要是不拿——反正也会没有了。这一原则要改改了。我们已经接受了商品流通的观点了，但我们必须还得有两个立足点，那就是坚持考虑人民的需求，坚持接近消费者。我们现在没有考虑消费者。给你发放口粮了——过吧，至于活得好坏，随你的便。当时我们粮食短缺，所以才执行了这一原则，现在这一原则应该改变一下了。

我们应该通过货币经济在一切经济活动以及各个领域中大力发展商品流通。商品流通不仅是商品交换。我们还应该加强货币经济。

货币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尽量利用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经济手段之一。这一经济手段还远远没有为我所用。这一手段非常灵活，我们需要它，然后按我们的意愿去改造它，使之能够为我们服务，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发展商品流通、开展苏维埃商业、加强货币经济——这就是我们着手进行改革的主要目的。

我们的工业组织得不错，可以生产各类产品和商品；我们的农业组织得也不错，可以生产各类农产品。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要在这些产品中建立一种联系，也就是形成城乡之间的交换。然而，如果没有商品流通，也没有买卖，在我们的条件下建立城乡交换将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党内有个别“左”倾分子认为，立马就可以进行产品交换。这很愚蠢。个别同志也多次打算这么去做，但每次都碰壁了。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只能通过商品流通来实现工农业的结合、城乡之间各类商品和农产品的交换。我们处于这一阶段，但我们却远未利用好这一阶段。只有我们将这一阶段彻底利用好之后，才可以提出产品交换这一问题。通过货币经济，我们才利用了商品流通不到三分之一的潜力，商品流通的这些潜力可使那些工农业产品不再被白白扔掉，而是能送到消费者手中。商品流通是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必要的联系环节。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这个阶段，在此阶段，如果我们的确想要推动我们的经济（我指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我们就需要发展商品流通。

取消粮食产品和谷米的凭证配给制（显而易见，我们同样还要取消土豆、糖和布匹的凭证配给制），这也就意味着，在城乡结合、商品结合方面，机械盲目而形式主义的配给制和口粮配给制走到了尽头。我们的商业机构应当顾及个别地区和个别消费者的兴趣、需求和愿望，这既指获得

一定数量的商品，又尤其指的是这些商品的质量。这就是说，商业组织不是在和抽象的消费者，而是在和具体的消费者打交道，这取决于所处的州和区，取决于工业和贸易部门。只有当我们的商业机构学会尽可能地考虑到每个区及每个州的特点，建立起最庞大的商品销售网之后，我们才能尝试提出从商品流通过渡到不要货币的产品交换的问题。当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连商品流通三分之一的潜力都没有利用到的时候，再去谈消灭货币经济，用产品交换替代商品流通，就意味着是在说傻话，这些都完全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的。

那么，之所以取消凭证配给制，正是为了在苏维埃条件下扩大商品流通，加强货币经济，首先和主要的，恰恰是为了在没有资本家和投机商的情况下经商。凭证配给制损害了商品流通的基础，它用简单分配代替商业，而没有考虑市场价格，完全没有考虑。该制度把商品流通的所有机会都弄得乱七八糟，因此，影响我们在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以及城市产品和农村产品之间建立起正常的、切合实际的有机联系。

人们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当权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而且拥有这样的生产能力，现在却抓住资产阶级旧的经济手段（商品流通）不放。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利用过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手段也已经不止一两个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凭证配给制了，那么我们就会尽量运用货币经济中最有生命力的这一手段。这才是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么，我再重复一遍，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品流通，建立城乡联系和商业联系，也为了在我们的环境下加强货币经济，因为如果没有货币，商品流通将难以想象，我们首先要消灭的就是凭证配给面包制度，因为面包是基本商品，面包能带动所有其他商品的改革。我们也正是要从这一环节开始改革。

这就是这次改革的首要意义和基本意义。

第二，我们进行这次改革的意义，就是要把降低所有商品和产品的价格这一政策作为改革的现实基础，真正的现实基础。那么，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各地方的每个商业组织都在拼命加价。如果说这是个难事，那么所有人都想通过涨价来解决这个难题。应该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确切地说是结束价格政策上的混乱局面。改革的意义在于，我们开始把降低所有商

品和产品的价格这一政策作为改革的现实基础。这个改革就是要降低粮食的价格。拉祖莫夫同志曾在此讲到了口粮的配给价格。拉祖莫夫同志，难道配给价格就是价格吗？大约一年半之前，我们莫斯科黑面包的配给价格是每公斤 12 戈比，而市场价格却比这个高出很多倍。配给价格无论如何也没有考虑市场价格，因为说实在的，这并不是价格，而是国家对工人阶级的馈赠。这是工人阶级的配给口粮，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配给价格就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就纯粹的经济意义来说，它不是面包的价格，因为市场不认可它。后来我们先是把黑面包的配给价格涨到了每公斤 25 戈比，之后又涨到了每公斤 50 戈比。而按照议价，黑面包的售价是 2 卢布。那么，当时市场（外运面包的农民们）认可什么呢，认可配给价格吗？当然不是。他们认可的是市场和议价价格——面包价格围绕议价价格波动，或略高于议价价格，或略低于议价价格。如果想知道究竟什么才是面包价格，那就到市场或者是议价商店里去问一下。这就是价格。至于说配给价格——这并不是价格，没人会认可它。没有人。而如果说面包的议价价格是 2 卢布或是 1.5 卢布，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价格降到 90 戈比，降到 1 卢布 10 戈比等。而只有在远东，因为那里不产面包，所以面包需要从外面运，由于运输条件不佳，因此当地的面包价格将会在 1 卢布 30 戈比到 1 卢布 50 戈比之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开始实施当下切合实际的面包降价政策。我们从面包开始进行降价是因为它的价格是在市场中形成的，市场不认可它的配给价格，配给价格不是它的真正价格，而只是针对我们工人阶级的一项阶级性政策。便宜收购面包，再便宜卖出去，实际上就不是在卖了，而是在送。我们就应该这样去理解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改革的目的就是我们要从面包开始，实行切实有效的降价政策。今后，我们会降低面包和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看吧，从 1 月份开始我们的面包买卖将不再实行配给制，它的市场价格也会下跌。农民现在是怎么卖面包的，到那时又会怎么卖——到时可以对比一下。面包的市场价一定会降下来，而农民会首先降价的。所以，我们要首先从面包开始，实行降价政策，之后，我们还应该把这种政策推广到其他各个领域。

价格领域过去那种胡乱涨价的情况应该不会再出现了。改革把降价政策作为行动的依据，降价政策首先会从面包开始，之后再推广到其他产品。

无论是从畜牧业角度来说，还是从解决肉制品问题的角度来说，这对

于我们都很重要。只有在面包降价之后，当农民们明白用粮食养牲畜卖肉要好过卖面包的时候，农民才会开始从事畜牧业。只有在降价之后，在面包降价之后，面包生产才会得以好好发展，而且将会开始从销售面包转向销售肉类，也就是说，开始从面包消费转向牲畜饲养，真正的牲畜饲养。因此，面包的降价政策会间接地形成一个好的结果——为畜牧业的开展形成现实基础，因为粮食也是服务于畜牧业发展的。

第三，改革的目的是从根本上铲除面包投机的可能。在生活中，如果面包有两个或三个不同的价格时，投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价格政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对此研究甚少。我们以前把煤油以每公斤 10 戈比的价格卖给机器拖拉机站，而他们通过合作社卖给农民的价格却是每公斤 70 戈比，机器拖拉机站的员工们当然会投机：以每公斤 10 戈比的价格买进煤油，再以每公斤 70 戈比的价格卖出。但当我们实行煤油统一价之后，煤油投机行为就停止了。这里的情况也是同样如此。如果面包议价价格是每公斤 1 卢布 50 戈比，而工人买面包却只需每公斤 50 戈比，那么他们自然就会想要卖掉一部分。即使每公斤只卖 1 卢布，也赚 50 戈比。工人们就是这么干的。我不会怪罪他们，因为本身有两种或三种价格的这个制度，会让最老实的人都去卖面包，就这样不断周转。这就是凭证配给制的腐朽所在。以列宁格勒为例，凭经验你就能知道当地有很多先进的工人；如今，在那里的议价面包要比以前少卖十分之九左右，比哈尔科夫卖得都少，虽然那里的人口比哈尔科夫多一倍。这是什么原因？是工人在和国家竞争：他们卖的配给面包要比国家卖得便宜得多，以至于人们对议价面包的需求量不大了。这种现象到处都有，遍及莫斯科及其他各大城市。这种制度使小规模的投机行为得以复苏，而这种小规模投机行为又为小的偷盗行为与所有的偷盗行为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也为各种（无论是大规模的还是小规模的）投机行为创造了条件：既然我在这里便宜买进面包，再到那里高价卖出——我就能从中赚钱。取消凭证配给制就意味着在某一地区范围内实行面包统一价。同种面包在该地区内不会有两个或三个不同的价格。

在每个地区内，同种面包的价格都应该是一样的，是统一价。这样投机就会变得很困难。这也是此次改革的另一个意义所在——让投机行为变得难以实施，从而不让工人中的那些老实人去投机。

这就是经济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我之所以指出这些，是因为好像不

是所有同志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为什么要取消凭证配给制。

这将会对我们商业组织的现状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很显然，将来应该清理我们的商业组织。不应该还像以前那样了：给你确定了一份口粮——想要不想要随你便，要是不要，那就没了。

新制度势必会提出有关面包质量的问题——它应该是新鲜的，早晨就应该送来。这会引起很多抗议，各种各样的抗议，但我们打算“狠狠打击”一切商业组织，如果它们还不打算停止与抽象的人做生意，还不考虑那些将按照真正价格用钱购买面包的、活生生的人的话。

因此，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使用的货币一定会流通并流行起来，这样货币经济一定会得到加强。毫无疑问，卢布的汇率将变得越来越稳定，而稳定卢布就意味着稳定了我们所有的计划和经济核算制度。

如果没有多少还算稳定的卢布汇率，任何经济核算制都是不可想象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我也不是说卢布的汇率就是绝对稳定的，但如果我们想要进行经济核算，想使我们的计划不再是形式主义的，而是切合实际的，那么卢布的汇率就应该或多或少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好处，这也是我们从改革中得到的第四个好处。这是巨大的经济好处，它会创造不计其数的成果，这对于我们全部的经济、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工农业体系的建立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将是一个巨大的好处。

第五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商业组织会得到清理，他们的工作会开始认真一些，他们最终会开始尊重消费者，承认消费者是真正的人——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好处。如果商业组织学不会尊重我们的消费者，不把他们当人看，学不会尊重他们经常会聊到的工人和农民，那么我们的产品交换不会有任何基础。

国家银行的一些员工议论说，这次改革会让我们获得金钱收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是胡说八道。好像我们真会得到 20 亿甚至 30 亿卢布似的，这是不可能的。财政人民委员部统计得出，人们认为工人过去买多少配给面包，将来还会买多少。这是不对的。过去，配给面包使得工人和公职人员可以把自己的亲戚召集到一起，然后虚报他们的凭证，把一半的面包卖给他们。现在，不再有两种价格了，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召集自己的亲戚了。如今，需要用钱买了。他们花钱会比以前节省，买得也少了。

以那些工业城市为例，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基辅以及巴

库等城市，这些地方都或多或少拥有一批熟练工人，这是一群有品位的人，他们都很会生活，收入颇丰，但他们买的面包就比以前少，因为现在需要用钱来买，而不像以前是馈赠。所以，我们在这点上是失败的。从配给价格的角度看，面包价格是在上涨，但是，首先，我们会对此进行补偿，尽管不是全部补偿，——至少补偿3/4，其次，工人买的面包开始减少，这是我们的缺点所在。而我们的银行人士却认为，工人还会和以前一样买那么多面包。这是不对的，他们会比以前买的少。

那么谁会比以前买的多呢？那些过去生活在外省，得到的不是800克面包，而是更少，于是补充购买的议价面包的工人和公职人员。现在他们得到好处了，因为过去他们要花1.5卢布，而现在只用1卢布或90戈比。他们买的会比以前多，但是价格却要比议价面包低。过去，这些人靠议价面包生活。而现在，他们购买面包的量也许会比以前多一倍，但价格却很低，1卢布或者90戈比。我们的改革又多了一个缺点。

我们还需要补偿经济作物的生产者，关于这一点我就不提了。

在此，我们会赢得什么，又会损失多少呢？一般来说，是禁止任何人对此进行提前估算的，所以说，有人猜测这次改革能够给我们带来经济好处，我认为这是不可信的。

就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和莫洛托夫讨论过。我也把所有说我们将会得到好处的材料给他看了，但当他看过材料之后，也说那是胡说八道。

市场上将会发生哪些改变，在消费者身上又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将如何购物，又将买多少——现在还很难说。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靠议价面包生活的外省消费者买的面包会比以前多。国家也许会从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但也可能得不到利益。在这里就别猜测了。

现在来谈谈那些在面包烤制方面落后的地区。比如乌拉尔，伊凡诺沃州，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是落后的。同志们，这很糟糕啊。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弥补。卡巴科夫同志曾在此做过一个报告，报告称没给他这个东西，没给他那个东西，等等。卡巴科夫同志，我们这根本没人给，都要自己拿，要学会拿。更何况你们是在乌拉尔。要知道，以你们的资源，建设一座中型的面包厂或面包房，就是小菜一碟。看到了没，你们倒是把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建起来了，但却不组织烤面包。这就是说，对乌拉尔地区工人的关心不够。

总而言之，应当说，不管在乌拉尔做什么事，所有人都说，那里对工

人的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关心。怎么样，直接被惊呆了吧，那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啊？太恶劣了！这种生活多可怕，简直是中世纪式的。卡巴科夫同志，不应该这样生活。以乌拉尔的工业提供的那些资源，如果你们想要，你们可以拥有比资源更少的莫斯科更多的面包房和面包厂。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1，案卷号 1118，页码 42—63

关于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谈话（1952年2月15日）

问：您的《经济问题评论》（以下简称《评论》）可以发表了吗？能把您的《评论》用于教学和文学活动吗？

答：我的《评论》还不能在报刊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草稿还不为广大读者所知，该草稿只分发到了有限几个人手中。关于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讨论会是非公开的，对此我们的民众也是不知情的，讨论会的过程也没有见诸报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表我的《评论》，大家会感到不解的。

除此之外，在报刊上发表我的《评论》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我担心的是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权威性。这本教材具有世界意义，其权威性应该是极高的。如果读者能在教材中初次得知我的《评论》中提出的那些新观点，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基于这些想法，不能在报刊中引用《评论》里的句子。怎么能引用这一尚未发表的文献中的句子呢。但如果你们中有人喜欢我《评论》中的某个观点，那就让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讲讲吧，就当是他自己的观点，我是不会反对的。（大家都笑了）

《评论》可以广泛应用于讲座、课堂和一些基层组织中。如果印的册数不够，还可以加印，但目前就是不能在报刊发表。等教材出版了，再过一两年，届时我的《评论》也就能发表了。到时候，也可以把它收编入《全集》的当前这一卷中。

问：我们的生产资料是商品吗？如果不是，那又如何解释经济核算制在各生产资料制造部门中的应用？

答：不能把我们的生产资料看作是真正的商品。生产资料不是那些流

入市场，谁想买就能买的消费品和食物（如面包、肉等）。我们自己分配生产资料。这不是广义上的商品，也不是存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那种商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才是商品。

我们的经济核算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中所用的那种经济核算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行的经济核算制会导致亏损企业的倒闭。而我们的企业可能是非常盈利的，也可能是完全亏损的。但我们的亏损企业不会倒闭。如果一家企业无力支付所购买的生产资料，届时该企业将会依靠财政预算来支付这些生产资料。我们的经济核算制是为了监督，为了核算，也为了平衡。采用经济核算制是为了监督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表面上，我们的生产资料被认为是商品。属于商品流转领域的是我们的消费品，而并非生产资料。

问：把生产资料称为“特殊商品”是否正确？

答：不正确。如果是商品，那所有人就都应该对其进行买卖，谁想买就能买。“特殊商品”这一表述是不合适的。这里的价值规律是为了结算，为了平衡，为了核算，为了检验作用的合理性。

问：资本主义普遍危机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是同一个概念吗？

答：是同一个概念。我要强调一下，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是其整体上的危机，因为我们通常只会考虑一个国家。现在，为了评价资本主义的状况，我们就不能只考虑一个国家，而应该从整体上去考虑资本主义体系。以前，我们只从英国这一个国家的情况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现在，不能再这么做了，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些国家要依靠其他国家才能蒸蒸日上。在这种情况下还应当考虑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局限性。例如，在消除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之后，美国就处于了良好的状态之中。美国本希望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把生产提高一倍，但结果是生产并没有提高一倍，设想落空了。美国一个国家走到前面去了，而其他国家却都后退了。但是情况并不稳定，他们的相互关系将来还会发生变化。对于决定资本主义的命运来说，单独一个国家不可能具有代表性。只考虑一个国家是不对的，应该从整体上去考虑全部资本主义。我强调的是：世界体系，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只考虑一个国家。

问：可否认为，教材草稿的《建议》中所列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章的提纲是正确的？

答：我赞同《建议》中所列的提纲。

问：过去，有部分苏联国民收入被称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那现在又该如何称呼这些部分？

答：“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与“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这两个概念都已经不适合我们的经济情况了。就社会主义经济而言，有必要分清一些概念，比如：为自己的劳动和为社会的劳动，自用产品和社会产品。以前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被称为“必要劳动”，现在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为自己的劳动”。以前有关我国经济的劳动被称为“剩余劳动”，现在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为社会的劳动”。

问：在苏联，用价值规律的“作用限制”概念取代价值规律的“改造”概念是否正确？

答：科学规律是不能创造、消灭、废除、改变和改造的。应当尊重规律。如果我们违反规律，就会遭受惩罚。在我们中间流行着一种观点，即规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观点不仅在经济学家中很常见，在那些实践家和政治家中也同样如此。这是不符合规律本质的。关于改造规律的论点——这是背离科学的，是某种庸俗作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不能被改造的。如果可以改造规律，那也就意味着可以废除规律。如果科学规律可以被改造和废除，那也就意味着“所有一切对我们来说都不算回事了”。应当尊重规律，掌握并利用规律。可以限制规律的作用范围，这一点在物理和化学中都有所体现，也适用于整个科学领域。不应该说改造规律，而应该说限制规律运用的范围。这样才会更准确，更科学。

教材中不允许有任何差错。我们是面向全世界出版这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届时，国内外都将会使用这本教材。

不是我们在限制规律，而是当前的客观条件在限制规律。当规律的作用范围被限制时，规律就会显出另一种模样。我国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是受限制的。价值规律已不完全是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样子。不是我们改造了它，而是我们凭借客观条件限制了它。

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了私有制，而劳动力又不是商品。这些就是导致价值规律运用范围受限的客观条件。价值规律在我国受到了限制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如此，而是因为有必要这样，也存在产生这种限制的适宜条件。这些客观条件促使我们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

规律是客观过程的反映。规律是客观作用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展

现了因果间的相互关系。如果给出作用力的某种相互关系，给出某种条件，那必然就会得出某种结果。这就是那些不能不考虑的客观条件。如果缺少了某些条件，那与之相对应的结果也会发生改变。与资本主义比，我国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没有私有制，劳动力不是商品），所以就会是另外一个结果了。不是我国的价值规律被改造了，而是它的作用范围受到了限制。

问：如何理解苏联的利润范畴？

答：我们需要一定的利润。没有利润我们就不能建立储备资源，没有积累，就不能保障国防任务，满足社会需要。很明显，这里有为自己的劳动和为社会的劳动。

利润这个词本身是很肮脏的。最好有另外一个概念。然而，是什么概念呢？或许是纯收入。我们的利润范畴隐含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内容。我国不存在资本的自发流动，也不存在竞争规律。我国也不存在资本主义的最大利润规律及平均利润率规律。但是没有利润，就不能发展我们的经济。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讲，有最小利润就足够了，但有时候，即使没有利润，我们的企业也可以依靠其他企业的利润来运转。我们自己分配我们的资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那些盈利的企业才能生存下去。我国却是非常盈利的企业、盈利不多的企业与完全亏损的企业都能生存。在最初几年中，我们的重工业并没有产生利润，后来才开始盈利。在最初几年中，重工业企业本身也需要资金。

问：在教材草稿的《建议》中提到的关于苏联货币与黄金关系问题的经济讨论会上，大多数参与者的观点是否正确？否定这一关系的少数派的某些拥护者是否断言，在《与1951年11月的讨论会相关的经济问题评论》中也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答：您读过《建议》吗？我在评论中说过，关于其他问题，我对《建议》没有意见。也就是说，关于我国货币与黄金关系问题，我赞同《建议》中的提法。

问：讨论会的个别参与者提出，苏联应该彻底取缔级差地租，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答：就级差地租这一问题，我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

问：苏联货币与黄金的挂钩是否意味着黄金在苏联是货币商品？

答：我们以前很缺黄金。后来情况好转了，我们就转而以黄金为基

础。我们实施这一路线就是为了让黄金成为货币商品，我们也一定会达到这一目的。目前，黄金的开采费用依然高昂，但我们正在把这一费用降得越来越低。我们一定会达到我们的目的：黄金会以商品的身份出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会用纸币来兑换黄金。现在，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这一情况。

问：苏联的国家财政是不是经济基础或者国家政治的上层建筑？

答：这是上层建筑或经济基础吗？（笑）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总是有很多不切实际的争论。有些人甚至把苏维埃政权都归为了经济基础。

如果抛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抽象特征，那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社会主义所有制出发。因此，我们的预算是完全异于资本主义预算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预算，而与我国预算相比，其国家预算所涵盖的范围要窄得多。我国预算包括了国民经济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它反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状况，而并非只是直接的国有财产。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预算。因此，在我国国家财政中，经济基础成分占优势地位，但其中也有上层建筑成分，例如，行政管理支出就属于上层建筑。我们的国家是国民经济的领导者，我们的预算不仅包括管理机关的支出，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支出。预算有上层建筑的成分，但经济成分占优势地位。

问：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渐转变的整个过程中，农业劳动组合将会一直存在，而农业公社只属于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这种观点对吗？

答：一个无聊的问题。很明显，劳动组合会变成公社。当农户服务于个人需求的功能消失之后，公社就会出现。不应该急于实现农业公社。要想向公社转变，还需要解决大量问题，如建设好的食堂和洗衣店等。当农民自己确信转向农业公社是合理的时候，农业公社就会出现。与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相适应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很可能是公社。劳动组合要求商品流转，至少目前，劳动组合不允许产品交换，尤其是不允许直接分配（产品交换仍然是交换，而直接分配是按需分配）。只要还有商品生产和买卖存在，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因素。劳动组合与买卖联系在一起，而直接分配要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才会实现。农业组合何时才能发展成公社，这很难说。目前，商品生产依然存在，我们需要克服它。当公社出现的时候，也不能准确地说是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即使是说，没有公社就不可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转化，也是很冒险的。

不能庸俗化地想象向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过渡过程。不会有任何“进入”共产主义的特殊方法。我们会不知不觉地一步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进城”——“门开着——进吧”。目前，一些集体农庄的女庄员们已经坚持要摆脱家务劳动的束缚，把牲畜转交给集体农庄，以便从农庄那里得到肉奶制品。但是，目前还没有不接受家禽。这只是个别事件，是未来的萌芽。现在，农业劳动组合绝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枷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劳动组合会逐渐向公社转变。我们不应该在此划分一个明显的界限。

集体农庄生产应当逐渐向全民生产靠拢。这里有很多复杂问题。应当让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养成更多考虑公益事业的习惯。目前，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集体农庄不想了解其他任何东西。现在还没有地区规模或州规模的集体农庄联盟。在此，是否应该自上而下建立一个统计城乡产品的全民经济机关？这件事应该从国有企业及集体农庄的产品清算开始，然后再开始分配产品，但初期只分配剩余产品。应当设置不用于分配的资金和用于分配的资金。应该让集体农庄庄员们逐步养成考虑全民利益的习惯。但是，这是一条漫漫长路，在此不必着急，也没什么可着急的。我们的工作进展得不错，目标正确，方向明确，所有的道路也都已指明。

问：为什么在《与1951年11月的讨论会相关的经济问题评论》中，术语“货币经济”要加引号呢？

答：既然有商品流通，就应该有货币。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银行在内的货币经济促使劳动者破产，人民沦为乞丐，剥削者发财致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和银行都是剥削制度的工具。而我国的货币经济却不同寻常，它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我们的货币和货币经济都是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而服务的。我国的货币经济是我们已经掌握了的一门工具，我们使用它是为了社会主义利益。加引号就是为了不混淆我国的货币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经济。价值和价值形式这两个词我没有加引号。货币就属于这两个问题。在我国，价值规律决定了很多事情，它间接影响生产，直接影响流通。然而，我们限制了它的作用范围，它不会导致破产。对资本家来说，最难的就是社会产品的销售以及把商品转化为货币。销售的实现非常艰难，伴随着劳动者的破产。而我们的销售却很轻松，很顺利。我们的货币和银行还有其他功能。

问：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的法令的内容是什么？

答：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法令与计划之间是有区别的。根据法令及其条款本应该顾及的东西，计划是可以不考虑的。例如，如果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汽车，但同时却又没有计划生产相应数量的薄钢板，那汽车制造厂在该年度中期就应该要推迟生产了。如果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汽车，但却又没有计划生产相应数量的汽油，那么这也同样意味着上述部门之间的联系遭到了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有计划、成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法令就会真正起作用了。当没有违反这一法令时，它就会静静地待着，但却不知它在何处，它无处不在，但也无处可寻。一般来说，所有法令都是在受到侵犯的时候就会起作用，而不会出现逍遥法外的情况。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法令揭露了各部门之间的不协调。该法令要求国民经济的所有成分都要相互适应，并在相互适应中成比例地发展。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法令弥补了计划中的缺陷。

问：应该如何理解苏联当前的基本经济任务？在确定这个任务时，我们是需要根据 1929 年资本主义的人均产量来定，还是需要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水平相比较，例如，就美国来说，由于经济军事化，其现在的生产水平要高于 1929 年？报纸和讲座中经常认为，达到 1946 年 2 月 9 日讲话中所指出的生产规模，意味着苏联基本经济任务的完成和进入了共产主义第二阶段，这种想法对吗？

答：根据人均产量的清算方法仍然还是有效的。人均产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标准，我们也再无别的标准，依旧保留了这一旧标准。不应该根据 1929 年的生产水平来定经济任务，而应根据现阶段的水平生产来定。我们需要再次清算。应该把我们的人均产量与资本主义国家现阶段的数据作比较。

［博同志插话道（A. B. 博尔戈夫是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学术秘书——编者）：不应该挑对我们有利的。应该根据真实数据。］

我 1946 年引用的数据并不意味着基本经济任务已经解决和进入第二阶段了。在达到这些生产数据后，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这将保护我们免遭意外和危险，不再害怕敌人的进攻和资本主义的进攻。但是，完成 1946 年讲话中提出的任务并不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共产主义第二阶段。有些同志太急于向共产主义第二阶段过渡了。如同不应创造规律一样，我们也不应过分加快这一过渡的过程。还会编造出一个共产主义的第三阶段。标准依旧是旧的标准，而我们应该拿现阶段的数据与那个更富裕的国家相

比较。这才是奋力向前。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第395—364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58，目录号11，案卷号1267，页码4—17

注释：参加谈话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有：拉·帕·贝利亚、尼·亚·布尔加宁、拉·莫·卡冈诺维奇、格·马·马林科夫、阿·伊·米高扬、维·米·莫洛托夫、尼·谢·赫鲁晓夫，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有：А. А. 阿拉克良、З. В. 阿特拉斯、А. В. 博尔戈夫、В. Я. 瓦西里耶娃、列·马·加托夫斯基、А. Д. 古萨科夫、Г. А. 科兹洛夫、И. И. 库济明诺夫、И. Д. 拉普捷夫、Л. А. 列昂季耶夫、Н. И. 柳比莫夫、М. В. 涅奇金娜、К. В.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А. И. 帕什科夫、В. И. 佩列斯列金、М. И. 鲁宾施泰因、Д. Т. 舍皮洛夫、П. Ф. 尤金。

该文件还保留了另外一个版本，是参考各位与会者的会议记录，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得来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83，目录号1，案卷号8，页码103—114）。该版本与已发表版本的主要差别有以下几处：

在第3段中，即以“除此之外”开头的那一段，第一句话之后有这样一句话：“人们认为，教材的所有内容都是由斯大林决定的。”

在第10段中，即以“答：不正确。如果是商品……”开头的那一段，第四句之后有这样一句话：“价值规律通过销售消费品影响生产资料的生产。”

在第16段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与‘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这两个概念……”的下一句是这样的：“难道那些用于教育和国防的产品就不是必要产品了？难道工人不关心这一点吗？”

最后，在第37段中，即以“集体农庄生产应当……”开头的那一段，在第6句话中，“建立”这个词之后还插有一些词组：“一个由工农业经济代表组成的清算城乡产品的全苏经济机关。”

三　斯大林论共产国际和各国党

本节主要翻译、校对者：
赵旭黎　袁再旺　崔庆刚

对格·叶·季诺维也夫提纲的几条意见（1923 年 8 月 20 日）（高度机密）

对格·叶·季诺维也夫提纲的几条意见

1. 不应该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表提纲。应当在某个时期内严禁俄罗斯同志在德国报刊上发表本人有关德国革命的带有指导性质的文章。应当千方百计避免让人有理由认为，革命是由俄国“操纵”和“煽动”的。必须只能通过德国共产党并以其名义行动。

2. 提纲中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里指的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直接指明，工人政府的口号只是带有统一战线思想的宣传性口号，一般来说，该口号的最终形式（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是不能实现的，即使万一该口号得以实现，那这种政府也是瘫痪的、紊乱的政府，因其软弱性在短时间内注定必然会倒台。应当明确地告诉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得不单独夺取德国政权。

3. 提纲中指出，当前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政府，这是正确的。但是应当不断地让群众明白，这一政府将不是国会的一个机构，而是苏维埃的一个机构，经苏维埃批准成立并对其负责。在最近一次革命高潮之时，就应当组织成立地方苏维埃。在像萨克森这样的地区，很可能现在就可以开始组建苏维埃。需要说明，如果没有地方苏维埃这个工农政府的据点和组织基地，那么工农政府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4. 德国共产党人能否保持政权，有可能保持政权的主要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提纲中要么根本未提及，要么很少提及。提纲主要阐述的是，

应该并且可以夺取政权。而事实上，保持政权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德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础。这一点是这份提纲的主要缺陷。众所周知，列宁同志在号召俄国共产党人起义之时，他的所有论据都集中于“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政权”这个问题上。由于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这一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5. 应该在提纲中直接而清楚地说明，德国的工人革命意味着法国和波兰（或许还有其他国家）与德国之间有可能发生战争，或许最好的情况便是德国被封锁（禁止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输入粮食）。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现在就应该制定出对策。这个问题在提纲中被掩饰过去了。

6. 应该在提纲中清楚明白地说明，德国革命以及我们给德国的粮食、武器、人员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这意味着俄国和波兰，也可能和其他边境缓冲国之间会发生战争，因为显而易见，如果不能取得至少是对波战争的胜利，我们就不仅不能运送粮食，还没法与德国保持联系（指望在德国发生工人革命的情况下波兰能保持中立，并让我们可以通过波兰走廊和立陶宛进行过境运输，这就是在指望奇迹发生；需要说明的是，拉脱维亚也是如此，英国则更甚，该国禁止从海上运输）。关于我方对德国革命进行军事支持的其他理由，我就不再说了。如果我们真想援助德国——我们确是这样想的而且应该援助——那我们就应当认真而全面地备战，因为最终这关系到将会建立一个苏维埃联邦，以及最近一段时期世界革命的命运。在提纲中这个问题也被掩饰过去了。

7. 应该制定出德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具体经济规划。

8. 以后阐述其他不太重要的意见。

约·斯大林

1923 年 8 月 19 日

《史料》，1995 年，第 5 期，第 117—118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号 3，目录号 20，页码 71—74

注释：这是对格·叶·季诺维也夫的提纲提出的几条意见，分析德国的形势和共产国际对此的策略。

文件上有标注：“由梅赫利斯同志亲自交给了收件人（卡·伯·拉狄

克、阿·伊·李可夫、列·鲍·加米涅夫、扬·埃·鲁祖塔克）。1923 年 8 月 20 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12月2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开得不错，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得到一致通过（来自意大利的一名“左”派共产党人弃权）。我们的反对派都是傻瓜，鬼怂恿他们去厮杀，还真的就厮杀了。鉴于加米涅夫的无赖发言，我在闭幕词中不得不提醒他关于发给米·罗曼诺夫的电报。加米涅夫进行了“反驳”，说“这是谎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费奥多罗夫向政治局提出了“反驳声明”，并要求将其登报。我们就将这一声明刊登在了《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同时刊登了中央委员会的回复以及能在政治上扼杀加米涅夫的文件。我们认为，加米涅夫已被开除，他不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好了，就到这儿吧。其他的面谈。握你的手。

科巴

1926 年 12 月 23 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5388，1925—1936 年，页码 96—97

注释：1926 年 12 月 5 日傍晚，加米涅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会议上作了如下声明：“昨天斯大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说，好像我在二月革命后没过几天就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发过电报……

当时列宁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都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我们是从《统一报》上得知这一流言的。当时该报的头目是臭名昭著的叛徒和恶棍，后来成为君主主义者的阿列克辛斯基。在他的领导下，《统一报》在那些天中对全体布尔什维克以及我们每个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进行了疯狂的污蔑……我们大家都认为，来自外省的针对我本人的流言纯粹是一场庸俗无聊的诽谤，因此我们就写了几行字进

行辟谣，经查明，尽管我当时作为流放犯也在西伯利亚县城的那场集会上发了言，但是以集会名义发出的那封电报是违背我的意愿的。

这场流言过去之后两个周，根据列宁的提议，我在四月会议（1917年）上和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一起被选进了我们党的第一个合法的中央委员会，当时没有一个人，其中包括斯大林，想到要赋予这场流言以任何意义，这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从那时起的十年间，没有任何人胆敢再次提起这次流言。

共同工作了十年后，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再次提起这个事，并以此作为进行斗争的论据，这也就是在以最残酷的方式谴责自己。”

鉴于这一指控，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观点很有意思，他原是社会革命党人，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外交官，1930年滞留西方。在评价加米涅夫时，他这样写道：“他是艰难时世的典型人物。他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主义者，在党内他总是代表孟什维克一派。他从来就没有坚定的特点。还在战争期间他就差点放弃自己的理想（这里指的是对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审判，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当时加米涅夫公开不赞成党关于祖国战败的口号，因此‘受到’了流放，而当时其他人都去做苦役了。——编者）。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西伯利亚，那里的人们还认为，米哈伊尔会成为皇帝的时候，加米涅夫匆忙召集当地资产阶级开会，会上他担任主席，拥护首位立宪君主。后来也同样积极拥护临时政府。返回之后，他进入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他在这里装模作样地表明，对于代表像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不太体面的政党，他甚至有几分羞愧，但是他却竭尽全力力求说服布尔什维克。只要能达成有利可图的妥协，并哪怕是和政权沾上点边，他准备做任何让步。在工人中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基层，从来没有人喜欢过他。关于他和暗探局有来往的恶意流言不断。然而党内高层的‘老布尔什维克们’认为，在此艰难时世，他刚好是他们需要的那种人。他的周围聚集了莫斯科的李可夫及其亲信，以及加里宁。已经背叛列宁的季诺维也夫刚回到俄国就追随着他。总之，未来的党内‘反对派’的路线和人物当时就已经初见端倪。”（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斯大林：民族革命的先驱》，莫斯科，2003年，第148—149页）

毫无疑问，上面摘录的这一段是片面的，但是对于那些并不知道加米涅夫在1914—1917年间都有什么活动的人来说，通过这段文字无论如何

还是能够评判他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斗胆推测一下，几乎十年之后提起的这件小事非常能说明问题，与其说这是由于加米涅夫参加前面提到的投票之时所处的环境非常模棱两可，还不如说这是由于，一个无法预测立场的人做出这样的政治行动当然是合乎情理的。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节选）（1932年7月17日）

卡冈诺维奇同志：

您好！

1）关于明岑贝格和“帝国旗帜”分子的便笺我已经读过了。不应该让共产国际卷入这件事。在不让德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卷入这件事的同时，德国共产党应该同意局部作战协定，条件是保证德国共产党组织掌握领导实权。不要与奥托·鲍威尔有来往：不管他以何种“共产党人”身份自欺欺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是一个社会沙文主义者。如果他想分裂第二国际，那就让他以自己的个人力量随便去分裂吧。

2）要是能把第二国际关于远东战争威胁的决议刊登在《真理报》上就好了！该决议虽卑鄙（反对他国帝国主义者却对本国帝国主义者避而不谈，爱好“和平”，但并不支持直接保护苏联等），但矛头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从任何方面来讲，这对我们苏联都是有利的。作为对问题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推脱，该决议（如果刊登）应当受到批判，但是由于该决议从宣传武力干涉（考茨基的立场！）向宣传有利的中立和道义上保护苏联迈出了一步，——应当认为，该决议是社会民主工人大众对第二国际施压的结果（对失去群众的恐惧迫使第二国际稍微改变立场）。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231—233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81，目录号 3，案卷号 99，页码 91—104

注释：“帝国旗帜”分子——“帝国旗帜”军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于 1924 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民主党及中央党倡议建立，旨在保护魏玛共和国免受左翼和右翼激进主义影响。该组织成员 20 年代末已达到 100 万人。

致约·布罗兹·铁托、爱·卡德尔及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4日）

铁托、卡德尔同志：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你们的回信以及经铁托和卡德尔同志签署的1948年4月13日南共中央全会决议收悉。

很遗憾，与贵方之前的文件相比，这些文件（尤其是铁托和卡德尔同志签署的这份文件）不但没有意味着有丝毫改善，反而把事情搞得更乱，更加加深了冲突。

这份文件的语气只能被评价为“傲慢”，这尤为引人注意。从这些文件中看不出他们想要查明真相，看不出他们想要诚实地承认自己错误，并承认有必要克服这些错误。南斯拉夫的同志们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而是按照小市民的观点来接受对他们的批评，也就是说，他们把批评看作是一种侮辱，认为这损害了南共中央的威信，打击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自尊心。

为了摆脱他们把自己置身于此的这种不利境地，他们采取了一种“新”方法——不管自己的错误有多明显，都毫无来由地全盘否认。联共（布）中央1948年3月27日信中曾经提到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文件，遭到了矢口否认。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显然不明白，凭空否认事实和文件这种幼稚的方法不可能让任何人信服，只能让人微微一笑。

1. 关于召回驻南斯拉夫的苏联军事顾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3月27日的信中解释了召回苏联军事顾问的理由，已经告诉你们，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材料是建立在这些顾问控诉南斯拉夫工作人员对驻南苏军及其代表持敌对态度的基础上的。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全盘否认这些控诉的真实性。问题出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要相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那毫无根据的论断，而不相信苏联军事顾问的频繁控诉呢？理由何在？苏联几乎在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派有军事顾问。不得不强调一下，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我们驻这些国家军事顾问的任何控诉。这正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在这些国家没有任何因苏联军事顾问在当地的工作而导致的争执。而出现这类控诉和争执的就只有南斯拉夫

一个。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因为苏联军事顾问在南斯拉夫是被一种特殊的敌对环境包围着的。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推脱说，为供养苏联驻南军事顾问支出了大量经费。他们同时指出，若按第纳尔（南斯拉夫货币单位——译者注）来算，苏联将军的薪水是南斯拉夫将军薪水的 3—4 倍。他们认为，这一情况会引起南斯拉夫军方人士的不满。但是，第一，南斯拉夫将军除了薪水之外，还有一系列其他实物补贴方面的保障：房子、供应品、食品等。第二，这些苏联将军在南斯拉夫所得的薪水与他们在苏联所得的薪水是完全一致的。很显然，苏联政府不会同意降低那些被派往南斯拉夫的苏联将军的薪水。

也许，对于南斯拉夫的预算来说，用于苏联将军的开销太过沉重，但在此情况下，南斯拉夫政府本可以事先向苏联政府提出建议，由苏联政府承担部分费用。毫无疑问，苏联政府会同意的。而实际上，南斯拉夫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没用通过友好途径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开始侮辱我们的军事顾问，开始称他们为寄生虫，开始损害苏军的威信，只是在围绕苏联军事顾问营造了敌对氛围之后，南斯拉夫政府才向苏联政府提出建议。

显而易见，苏联政府不能容忍这种情况。

2. 关于驻南斯拉夫的苏联文职专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 3 月 27 日的信中已经解释了从南斯拉夫召回文职专家的理由。在此次事件中，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依据的是驻南斯拉夫苏联文职专家们的控诉及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的通报。从这些消息中可以看出，苏联文职专家，如联共（布）驻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代表尤金同志，他们实际上都处在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机关的监视之下。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信中否认了这些控诉和消息的可靠性，并让我们相信，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机关没有监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人。但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要相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毫无根据的论断，而不相信苏联人的实际控诉，顺便说一句，还有尤金同志的通报呢？苏联政府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都派有许多文职专家，但在这些国家，我国专家没有丝毫怨言，与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没有丝毫的隔阂和误会。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这些误会和冲突只发生在了南斯拉夫？也许，正是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在南为包括尤金同志在内的苏联人制定了一套很特殊的制度？

显而易见，苏联政府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所以不得不从南斯拉夫召回

本国的文职专家。

3. 关于南斯拉夫外交部的韦列比特及其他间谍。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声明，他们两人在会见莫洛托夫同志时，“对于韦列比特”的怀疑，不外乎“指出说他们对韦列比特并不完全了解”。而其实，在与莫洛托夫同志的谈话中，这两位同志提到过，有人怀疑韦列比特是个英国间谍。看起来非常奇怪，铁托和卡德尔同志认为把韦列比特开除出外交部就是要他的命。为什么不能既把韦列比特开除出外交部，又不杀死他呢？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就保留韦列比特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职位的原因发表的声明也同样很奇怪：原来，之所以没有免除韦列比特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职位，恰恰是因为正在对他进行审查。正因为在对韦列比特进行审查，所以就没有比免除他上述一职更好的办法了。居然如此善待一个与苏联势不两立的英国间谍，这种不正常的好意从何而来？

但是，韦列比特并非外交部机关里唯一的间谍。苏联代表曾数次告诉南斯拉夫领导人，说南斯拉夫驻英国大使列昂季奇是英国间谍。但令人不解的是，不知为何这个老奸巨猾的英国间谍至今仍然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机关里。

苏联政府知道，除了列昂季奇之外，南斯拉夫驻伦敦大使馆还有三名工作人员在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只是还没有确定他们的姓名。苏联政府可以为此声明担负全部责任。同样令人不解的是，为何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在南斯拉夫表现得如同主人一般，而他的那些数量不断增长的“情报员”却依然逍遥法外？

同样令人不解的是，残害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刽子手涅季奇的亲戚朋友们如此轻易地就进入了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

如果南斯拉夫政府还是一味地固执，不愿清除外交部机关里的间谍，那苏联政府将拒绝通过南外交部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公开通信往来。

4. 关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及苏维埃国家。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1948年4月13日的信中写道：“我们认为，作为大使，他（苏联大使）没有权利要求任何人告诉他我党的活动。这不是他的工作。”我们认为，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这个声明本质上就是不对的，是反苏联的。可见，他们把苏联大使这个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中代表苏联共产党政府的共产党员干部与普通的资产阶级大使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通官员同等看待，而这些资产阶级国家官员的任务是破坏南斯拉夫的国家基础。真是难

以理解，铁托和卡德尔同志怎么能够如此荒唐。他们是否明白，如此对待苏联大使就意味着否认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他们是否明白，苏联大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和将南斯拉夫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友好国家的代表，他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经常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员讨论他们感兴趣的所有问题？怎么能对这种简单而普通的小事进行怀疑呢？当然，如果是站在与苏联友好关系的立场上。

为了让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知道，必须要说的是，与南斯拉夫的模式正好相反，我们不认为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是一个普通官员，也不把他与资产阶级官员等同看待，不否认他“有权利要求任何人告诉他我党的活动”。成为大使之后，他仍然还是共产党员。我们还会把他当作同志和共产主义活动家。他有很多熟人和朋友是苏联人。他是否“搜集”有关我党活动情况的材料？可能是在“搜集”。那又怎么样，让他“搜集”去吧。我们没有理由向同志们隐瞒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为了克服这些不足，我们自己也会将之公布于众。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同志如此对待苏联大使，这绝非偶然。南斯拉夫政府的基本立场导致了他们的这种态度，由于政府的这种立场，南斯拉夫领导人通常看不到苏联与英美在对外政策上的差距，将苏联与英美的对外政策等同看待，他们认为，南斯拉夫针对英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就应该对苏联也实行同样的政策。

1945 年 5 月底，铁托在柳布梁纳的讲话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这次讲话中说道：

“人们都说这场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我们并不要求这场战争有个公平的结局，我们只要求每个国家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想为别人的账单埋单，我们不希望成为别人手里找零的硬币，我们也不愿意卷进与划分势力范围相关的某种政治斗争当中。”

铁托是因为的里雅斯特问题才这么说的。众所周知，在苏联迫使英美在领土上做了一系列让步之后，英美和法国一起拒绝接受苏联要求把的里雅斯特转交给南斯拉夫的提议，并出动驻扎在意大利的他们的军队占领了的里雅斯特。因为在把的里雅斯特转交给南斯拉夫的问题上，苏联已经用尽了其他所有的办法，所以除了以的里雅斯特为由对英美发动战争，并使用武力占领的里雅斯特，苏联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当时，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应该知道，苏联刚刚结束了一场大血战，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动一场新的

战争了。但这一事件无论如何还是引起了南斯拉夫同志的不满，这在铁托同志的讲话中也有所体现。铁托同志在柳布梁纳的讲话声明，南斯拉夫“不想为别人的账单埋单”，“不希望成为别人手里找零的硬币”，以及南斯拉夫不想“卷进与划分势力范围相关的某种政治斗争当中”，这一声明不仅针对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还针对苏联。在此，铁托同志对苏联的态度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没有任何不同，因为他并没有强调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

铁托同志的这一声明居然没有遭到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反对，我们认为这个反苏声明就是南共领导人对苏联进行诽谤性宣传（在南共党员干部的小范围内进行）的基础，他们诽谤苏联已经蜕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并企图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屈从于苏联；我们还认为这个反苏声明就是南共领导人对联共（布）进行诽谤活动的根据，他们诽谤说联共（布）已经“蜕变”，联共（布）企图“通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来征服其他党派，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

当时，苏联政府不得不让南斯拉夫政府注意，铁托同志的这个声明是不容许的。之后，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马上进行了解释，但其解释未能让人满意，所以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萨德奇科夫同志就收到了苏联政府的指示，命令他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声明，1945 年 6 月 5 日，萨德奇科夫同志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了如下声明：

“我们认为，铁托同志的讲话是对苏联的仇视和攻击，卡德尔同志的解释也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的读者只能这样理解铁托同志的讲话，因为不可能解释成别的。请告诉铁托同志，如果他再次以这种方式攻击苏联，作为回应，那我们将不得不在报刊上对他进行批判，宣布不同意他的言行。”

正是铁托同志针对苏联的反苏立场导致了那些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大使的那种态度，使得他们把苏联大使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大使们相提并论。

看得出来，南斯拉夫领导人仍然想继续坚持这种反苏立场。但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此时应该明白，坚持这种立场也就意味着否认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意味着背叛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他们还应该考虑到，如果继续坚持这种立场，他们就无权要求苏方给予物质及其他方面的援助，因为苏联只向自己的友邦提供援助。

为了供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参考，我们不得不强调一点，我们发现只在南斯拉夫才有这种针对苏联大使和苏维埃国家的反苏立场，我们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友好的和无可指责的。

想要提醒一下，现在在各个方面都拥护铁托同志的卡德尔同志，三年前对铁托同志在柳布梁纳发表的上述声明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下面就是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萨德奇科夫同志，就他 1945 年 6 月 5 日与卡德尔同志进行的一次谈话向我们进行汇报的内容：

“6 月 5 日，也就是今天，我把你们吩咐我的事都告诉了卡德尔（铁托还没有回来）。这对卡德尔产生了很大影响。考虑一会儿后，他说道，他认为我们对铁托讲话的评价是正确的。他也同意，苏联不能再继续忍受这种做法。卡德尔说，在当前这个对南斯拉夫很可能相当艰难的时刻，对铁托声明的公开批判会给他们带来严重后果，所以他们会努力不让这种声明再出现。但是，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苏联将完全有权进行公开批评。这样的批评会让他们受益的。卡德尔请我向你们转达他的谢意，以感谢你们的及时批评。据卡德尔说，这次批评能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水平。对 3 月份政府宣言中的政治错误的批评也是非常有用的。卡德尔相信，这次批评只会有助于提高政治领导工作的水平。

在试图（非常谨慎地）分析错误的原因时，卡德尔说，在消除共产党和人民解放战争组织内部的派别活动时，铁托当然有很大的功劳，但他有时却能够把南斯拉夫看作是一个自给自足、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的国家。现在，党内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作为组织中心和政治中心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并不存在。卡德尔说，我们偶尔也会碰面，随机通过一些决定。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保留。工作作风很不好，工作中缺乏集体领导制。卡德尔继续说道，我们希望苏联能把我们看作是未来的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而不是别的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国家的代表，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看作是全联盟共产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从南斯拉夫将来会成为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前景出发。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直接而公开地批评他们，给他们提出建议，帮助他们把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推上正确的方向。

我答复卡德尔，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而真实情况就是，南斯拉夫是一个独立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你们应当而且能够独立

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你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一定会为你们提出必要的建议。我们和南斯拉夫签订有一些条约，何况还有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拒绝对你们提供建议，当你们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帮助你们。每当我向莫斯科转达元帅的请求时，我总是能迅速得到明确的答复。但是，你们只有在通过某些决议或者做出某些声明之前去征求意见，才有可能得到这些建议，这些建议也才会是有用的。”

我们不会着重强调卡德尔同志粗浅而错误的论断，即他认为南斯拉夫将来会成为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共产党也会成为联共（布）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卡德尔同志针对铁托同志在柳布梁纳的反苏声明以及南共中央委员会的糟糕现状所发表的那些批评性意见。

5. 关于吉拉斯同志的反苏声明、侦察部门及商贸谈判。在3月27日的信中，我们陈述了吉拉斯同志在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反苏声明，他当时说，好像苏联军官的道德水平要比英国军官的道德水平低。吉拉斯同志之所以发表这个声明，是因为几名苏联军官在南斯拉夫做出了一些不道德的犯罪行为。我们把吉拉斯同志的这个声明定为反苏声明，正是因为吉拉斯同志是一个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两三个军官的犯罪行为，他就忽略了社会主义苏军和资产阶级英军的根本区别——苏军解放了欧洲各族人民，而英军的任务却是压迫世界各族人民，而不是解放他们。

铁托和卡德尔在1948年4月13日的信中声明，吉拉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声明说道：“还是在1945年，铁托就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对此进行了解释，当时同意这个解释的不仅有斯大林同志，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

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他们，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这个声明与实际情况不符。

当时，在发给铁托同志的电报中，斯大林同志是这样回应吉拉斯同志的声明的：

“我明白贝尔格莱德解放之后你们的处境很艰难。你们应该知道，为了帮助你们，苏联政府不顾巨大牺牲和损失，做了一切有可能做到，甚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这个情况让我大为吃惊，个别红军军官和战士的个

别事件和错误被你们推到整个红军队伍身上。不能这样侮辱一支帮你们赶跑德国人的军队，一支在与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浴血奋战的军队。‘哪里都免不了有害群之马’，这句话不难理解。但如果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就侮辱他所在的整个群体，这种行为就很不正常了。吉拉斯同志及那些没有阻止吉拉斯的人都认为，在道德方面英国军官要好于苏联军官，如果红军战士知道这个情况，会因为这种不公正的指责而感到愤怒和痛苦。”

这个反苏声明没有遭到南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反对，我们可以在这个反苏声明中，发现南共领导人进行反对苏联红军及其驻南代表的诽谤性活动的原因，这也正是我们召回我方军事顾问的原因。

那么，与吉拉斯同志相关的这一事件当时是怎么收场的？这一事件最终是这样解决的：吉拉斯同志同南斯拉夫代表团一起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同志表示了歉意，他请求斯大林同志忘掉他在南共中央会议上所犯的那个令人不快的错误。

可见，事情完全不像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所描述的那样。

遗憾的是，吉拉斯同志的这个错误看起来不像是偶然。

* * *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指责苏方，说苏方好像在招募南斯拉夫公民到苏方的侦察部门工作。他们写道：

“我们认为，苏联侦察部门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招募我国公民，这是不对的；我们只能把这看作是意图损害我国利益的行为。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国家安全机关都对此表示过抗议，并警告说，我们不会允许此类事情的发生，你们这样做，就是倒行逆施。招募的对象有我们的军官、各级领导人，同时还有那些仇视新南斯拉夫的人。”

我方声明，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这个论断满怀着对苏联驻南斯拉夫代表的仇恨和攻击，与事实完全不符。

要求那些在南斯拉夫工作的苏联人时刻保持沉默，守口如瓶，不与任何人说话和交谈，这很不正常。这些苏联代表都是政治觉悟很好的人，而不仅是被雇用的一群工作人员——只是为了一定的薪水，而无权知道南斯拉夫发生了什么。自然，他们开始和南斯拉夫公民进行交谈，仔细询问，想要得到解释，等等。必须要成为不可救药的反苏分子，才会将这些谈话看作是企图招募人到侦察部门工作，并且还是那些对新南斯拉夫“持敌对态度”的人。只有那些反苏人士才会想到，和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相

比较，苏联领导人对新南斯拉夫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问题的关心程度要低许多。

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只在南斯拉夫遇到了这种盲目指责苏联人的行为。我们觉得，这些针对苏联人的难听的指责是杜撰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那些监视驻南苏联人的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机关的行为做辩解。

有必要提醒一下，那些到访过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同志，通常可以完全自由地在苏联的各个城市旅行，与我国人民见面，并可与他们进行自由交谈。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对他们进行过任何限制。吉拉斯同志在最近这次访苏期间，在莫斯科逗留一段时间之后，又去列宁格勒待了几天，同苏联的同志们进行了交谈。按照南斯拉夫的行为模式，关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材料只能从党中央和政府的领导机关获得。可吉拉斯同志仍然还是在列宁格勒地方党组织那里搜集了材料，而不是在苏联国家机关。吉拉斯同志在那里做了什么，搜集了哪些材料——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他不是为英美或法国的情报机关搜集材料，而是在为南斯拉夫的领导机关搜集材料。而如果这是真的，我们认为这没有丝毫不体面，因为南斯拉夫同志可以在这些材料中找到很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吉拉斯同志不会说，他受到过哪怕一丁点儿限制。

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苏联共产党人在南斯拉夫享有的权利就应该少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苏联享有的权利？

* * *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4月13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出了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商贸关系问题，他们说，克鲁季科夫同志拒绝和南斯拉夫的同志们继续进行商贸谈判。我们曾数次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解释，克鲁季科夫同志反对那个把罪责归咎于他的声明。同时，我们也向他们解释过，苏联政府没有提出与南斯拉夫中止商贸谈判和商贸活动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并且我们再也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了。

6. 关于南共中央政治局在南斯拉夫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政治路线。我们在信中已经谈到过，南共党内体现不出阶级斗争的政策精神，导致城乡资本主义成分迅猛增长，而党的领导人却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将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根据地予以否认，并把我们的那些带有原则性的论断看成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侮辱，回避说出问题的实质。他们的证据仅限于声明南斯拉夫发生了彻底的根本性的社会变

革。但仅有这个是完全不够的。他们否认了资本主义成分得到加强以及农村的阶级斗争因此变得尖锐化这个事实，在南斯拉夫当前的形势下，出现上述这种情况的源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阶级斗争好像不会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越来越尖锐化，而是会逐渐消亡，一直在鼓吹资本主义成分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理论的布哈林式的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

没有人可以否认苏联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必要性，这些社会变革正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而，联共（布）从来没有根据这一事实就得出结论，说我国的阶级斗争减弱了，或者没有资本主义成分增强的危险。列宁在 1920—1921 年曾经强调，“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十五年里，我党的议事日程中先是一直关注在农村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措施问题，然后就是消灭富农这最后一个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的问题上，忽视联共（布）的经验，这为南斯拉夫增加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因为社会主义不能只在城市和工业领域建设，农村和农业领域也需要建设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回避阶级斗争和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问题，这不是偶然现象。不但如此，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讲话中几乎一直对农村的阶级划分问题避而不提，他们把农民阶级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动员党员去克服那些与农村剥削成分增长有关的困难。同时，就南斯拉夫农村的政治情况来看，人们没有任何权利沉湎于盲目的乐观和轻易的和善之中。现在，南斯拉夫的土地没有实现国有化，还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买卖和雇佣劳动等，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教导党去遮掩阶级斗争和容忍阶级矛盾，因为这样一来，党就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困难面前缴械投降了。这表明，南斯拉夫共产党被从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和布哈林那里借来的资本主义成分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麻痹了。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个别重要领导人在工人阶级领导作用问题上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这也不是偶然现象。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承认工人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作用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宣传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观点。只需要指出 1946 年

11 月铁托同志在萨格勒布发表的下列声明就足够了（1946 年 11 月 2 日的《战斗报》）。

“我们没有对农民们说，他们是我们国家最强有力的依靠力量，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获得他们的选票，因为实际上这就是他们的作用。”

这个观点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违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欧洲，也包括人民民主国家，最先进的和革命最彻底的阶级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农民阶级。至于农民阶级，大部分农民，也就是贫农和中农，是能够与工人阶级结盟的，或者他们已经与工人阶级结盟了，但这里发挥领导作用的依旧是工人阶级。可与此同时，铁托同志的上述言论不但否认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还宣布所有农民，这意味着也有富农，才是新南斯拉夫最为坚实的基础。因此，铁托在这个讲话里表达的观点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政客的观点，但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

7. 关于南共中央政治局在党和人民阵线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我们在上封信中写道，在南斯拉夫，人们认为主要领导力量不是共产党，而是人民阵线，我们还写道，南斯拉夫领导人实际上是削弱了共产党在党外的人民阵线中的作用，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这种原则性错误，在 40 年前的俄国，孟什维克也同样犯过。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对此表示否认，他们肯定地说，人民阵线的所有决定都是党的决定，但是他们认为，在此没有必要强调，某个决议是被党的某次代表会议通过的。

但南斯拉夫同志们最初的错误正在于此，他们不愿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展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决议，以防让人民知道是党在领导人民，而不是相反。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共产党是组织劳动人民的最高形式，要高于任何其他组织，其中包括高于苏联的苏维埃，高于南斯拉夫的人民阵线。党之所以高于所有这些劳动组织，不仅是因为党把最优秀的劳动者都吸收到了自己的队伍中，还因为党有自己独立的纲领和独立的政策，并以此为基础领导其他所有劳动组织。与此同时，南共中央政治局却害怕把这些直接公开地大声告诉工人阶级和全体南斯拉夫人民。南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如果政治局将来不强调这一点，届时其他党派也就不会有借口去展示自己的威力和开始活动。显而易见，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认为，用这个小把戏就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可以欺骗阶级，欺骗历史。但所有

这一切都是幻想，是自欺欺人。如果存在敌对阶级，那他们之间就会存在斗争，而如果存在斗争——那么无论合法与否，这种斗争在各党派的活动就都会有所反映。

列宁说过，党是工人阶级手中最重要的武器。领导人的任务就是让这一武器处于战备状态。由于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收起了党的旗帜，在人民面前回避提出党的领导作用，因此，他们这是让工人阶级的武器变得锈钝，是在削弱党的作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可笑的是，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居然认为这种小把戏就能让敌人放弃斗争。正因如此，才必须要让党时刻准备与敌人进行战斗，不让党松懈，不隐藏党的旗帜，不以下面的方式去麻痹党，即：如果不让敌人有借口，停止斗争，敌人就会停止组织自己合法和不合法形式的武装力量。

我们认为，共产党作用的削弱在南斯拉夫做得太过分了。这里指的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阵线之间的关系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视而不见的是，加入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有各种各样的带有阶级范畴的人士，如富农、商人、小企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其中包括某些资产阶级党派。出现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的只有人民阵线，共产党及其组织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在人民面前公开出现，这个事实不仅降低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且破坏了党这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因为党必须通过公开的政治活动、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纲领，来获得人民越来越多的信任，以自己的影响力争取广大的劳动群众。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忘记了，只有在与敌人的公开斗争中，党才能成长和获得发展，他们也忘记了，南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些小把戏是不能替代与敌人的公开斗争的，要知道，这种斗争对党的干部们来说是一种磨炼。南斯拉夫共产党曾经声明，除人民阵线纲领外没有别的纲领，对这一声明的错误性顽固不承认的事实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已经远远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党的那些观点。由此，我们发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取消主义倾向有增长的危险，这同样也会威胁到共产党自身的生存，最终让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有退化的潜在危险。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肯定地说，孟什维克关于将马克思主义政党溶解于非党的群众组织之中的错误发生于 40 年前，因此这一错误与南共中央政治局的错误没有任何关系。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大错特错了。毫无疑问，这两个错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有关联的，因为，正如孟什维克于 1907 年所做的那样，40 年后，铁

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也同样削弱了马克思党派的作用，同样否认党是高于其他一切大规模劳动组织的最高形式的组织，同样也将马克思主义政党溶解于非党的群众组织之中。区别仅仅在于，孟什维克在1906—1907年犯了错，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伦敦的代表大会上批判了他们，之后便再也没有重犯，而南共中央政治局却不顾眼前已有的显而易见的教训，在40年后又把孟什维克的这些以前的错误从坟墓中挖了出来，把这些错误当作是自己关于党的新理论。这一状况不会减少南斯拉夫同志们的错误，反而会让他们的错误继续加深。

8.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危险状况。我们在第一封信中曾经说过，虽然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政权已足有3年之久，但现在仍然处于半合法状态，以后也是这样。我们还提到，南共党内没有党内民主，没有选举制，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都是通过增补，而不是选举产生的。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把所有这些都凭空否认了。他们写道："在南共中央委员会中，增补产生的委员并不占大多数，在1940年12月秘密举行的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该次会议拥有代表大会的全部权力，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31名南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这些人中，有10名中央委员和6名候补委员在战争中牺牲了，此外还有两名中央委员被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因此南共中央委员会现共有26名中央委员，其中有19名中央委员是在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7名中央委员是增补产生的。"

这一消息完全不符合事实。从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在1940年10月，而不是12月召开的第五次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了22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和16名候补委员，而不是31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1940年10月底，华尔特同志（铁托本人）就此问题从贝尔格莱德报告说：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10月19日至23日召开了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全国各州选举了101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22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有2名是女性，还选举了16名候补委员。表明意见完全一致。——华尔特"

如果选举产生的22名中央委员中有10名牺牲，那就应该还剩下12名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而如果这12名中央委员中再开除了2名，那就只剩

下 10 名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了。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说，中央委员会现在还有 26 名委员，据此，如果这个数字中再减去 10 名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那也就意味着，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还剩下 16 名增补产生的委员。

由此可以得出，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都是增补产生的。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身上，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那些地方领导人身上，他们都是由上级任命的，而并非从基层选举产生的。

我们认为，当共产党是执政党并且有机会完全合法的时候，这种组建党的领导机关的方法就只能被称为是党的半合法状态，而这种组织形式只能被称为是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

在此情况下，通常不开会或者秘密开会，这是完全让人不能容忍的，因为它破坏了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入党工作是远离工人秘密进行的，这也是让人不能容忍的，因为入党工作应当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把党与工人阶级及所有的劳动人民联系起来。

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足够尊重自己的党，就不会允许党内形成这种状况，就会在夺取政权之后，也就是 3 年前，马上建议党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共产党可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行改组，并以完全合法政党的身份开始活动。

显而易见，党内现在缺乏领导机关的选举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上级任命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会有党内民主可言的，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更不用提了。我们知道，党员害怕说出自己的意见，害怕就党内的形势发表批判性意见，因此大部分党员都保持沉默，以使自己免遭镇压。国家安全部部长兼任中央委员会主管干部问题的书记，或者如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所称呼的那样，兼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书记，这个事实也不应认为纯属偶然。显而易见，党员和党的干部受到了国家安全部部长的监视，这是让人绝对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例如，茹伊奥维奇同志刚在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说自己不同意南共中央委员会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回信草案，就马上被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可以看出，南共中央政治局没有把党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有权表达自己观点的组织，而是把党看作是一个游击队，而游击队员是无权研究任何问题的，他们就应该不加反驳地满足军队长官的任何要求。我们把这称为是在党内推行军事领导方法，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马克思政党的党内民主原则。

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当时也企图在联共（布）施行军事领导方法，

但列宁领导的党对他进行了谴责和猛烈抨击，军事领导方法被抛弃了，党内民主制作为党的建设方面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得以重新确立。

我们认为，对于党的生存和将来的发展来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内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越快解决党内的这种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制度，对南共和南斯拉夫人民民主共和国就越好。

9. 关于南共中央领导人的骄傲自满情绪及他们对待自身错误的不正确态度。从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所写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仅完全否认南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中存在某些错误，还否认南共干部这个小圈子曾对苏联进行过污蔑性的宣传，污蔑苏联“蜕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等等。他们认为，这里的所有问题都在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有关南斯拉夫形势的情报不准确。他们认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成了茹伊奥维奇和赫布兰格散布的不准确的污蔑性情报的牺牲品，如果没有关于南斯拉夫形势的不准确情报，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就不会有误会。这样，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问题不在于南共中央委员会的错误，也不在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这些错误的批评，而在于茹伊奥维奇和赫布兰格同志用不准确的情报欺骗了联共（布）。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惩罚了赫布兰格和茹伊奥维奇两位同志（1948 年赫布兰格被捕并在监狱中遇害，茹伊奥维奇于 1948 年被捕，在铁托监狱中坐了 10 年牢。——编者），那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也就是说，他们找到了整个事件的祸根。

我们不相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本人会相信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他们把这一说法奉为真理，这就说明，他们认为这一说法是让南共中央政治局摆脱由于自身原因也陷入其中的不利局势的最轻松的方法。他们编造这套乍看上去很幼稚的虚假说辞，其目的不仅想把苏南关系恶化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卸到苏联身上，还想顺便污蔑一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说他们热衷于搜集任何“有倾向性的”和“反党的”情报。

我们认为，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这种态度，以及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南斯拉夫同志错误的批评意见的这种态度，不仅是轻率的、虚假的，而且还是极其反党的。

如果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想要查明真相，如果这个真相不会让他们感到难堪，那他们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a）为什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形势的情报都是准确无误的，没有

引起这些国家共产党的任何误会，而在南斯拉夫同志们看来，我们关于南斯拉夫形势的情报就是有倾向性的和反党的，并引起了他们的反苏活动以及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敌对情绪？

b）为什么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在进一步地发展和稳固，而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却恶化了，并且还在继续恶化？

c）为什么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都声明拥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3 月 27 日的信件，谴责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所犯的错误，而南共中央政治局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并因此被孤立起来了？

所有这些都是偶然的吗？

要想揭发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错误，根本就不需要依靠个别同志提供的情报，如茹伊奥维奇和赫布兰格两位同志的情报。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只要了解一下南共领导人的官方声明就绰绰有余了，如铁托、吉拉斯、卡德尔及其他同志发表在报刊上的声明。

我们声明，苏联人没有从赫布兰格同志那里获得任何情报。我们声明，在茹伊奥维奇同志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的谈话中，只涉及南斯拉夫领导人反苏错误讲话全部内容的十分之一。对这些同志的镇压不仅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迫害，是与党内民主制不能共存的，而且还证明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反苏立场，正是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与苏联大使的谈话看作是一种犯罪行为。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的同志们企图将导致苏南关系恶化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卸掉，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些同志不愿意认清自己的错误，他们计划在将来继续实行针对苏联的敌对政策。

列宁曾说过：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

很遗憾，我们必须指出，南共领导人拒绝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以最粗暴的方式破坏了列宁的这条原则性指示。

同时，我们必须强调一点，与南斯拉夫领导人不同的是，法国和意大利两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个方面表现出了高水平，因为他们在九国共产

党代表会议上老实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认真改正了错误，这样他们就帮助各自的共产党稳固了党的队伍，教育了党的干部。

我们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之所以不愿意老实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认真改正错误，是因为南斯拉夫领导人过于骄傲自大所致。在取得一些成绩之后，他们就被冲昏了头，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一样。他们不但骄傲自大，还宣扬自己的骄傲自大，他们不明白，骄傲自大可以断送这些南斯拉夫领导人。

列宁曾经说过：

“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很遗憾，我们应当指出，南斯拉夫领导人并没有谦虚的品质，他们继续因自己的成绩（成绩可并不太大）而骄傲自大，把列宁的这句名言置于脑后。

铁托和卡德尔同志在信中提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绩，他们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以前承认这些功绩，而现在却好像在隐瞒这些功绩。这当然是不对的。没有人能够否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绩。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必须要说的是，比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的功绩丝毫也不少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绩。但是，与总是嗡嗡地在众人耳边说大话的南斯拉夫领导人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表现得很谦虚，没有大肆宣扬自己的成就。

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革命前，法国和意大利两国共产党的功劳不但不小于，反而要大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现在的成绩要小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不是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某种特殊的素质，而主要是因为在南斯拉夫游击队司令部被德国伞兵击破之后，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遭受严重危机的时刻，苏联军队前来援助南斯拉夫人民，击败了德国侵略者，解放了贝尔格莱德，并由此为共产党执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遗憾的是，苏联军队没有向法国和意大利两国共产党提供这种帮助，也不可能向他们提供这种帮助。如果铁托和卡德尔同志注意到，这一情况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他们就会较少宣扬自己的功绩，表现得也会更加得体和谦虚。

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不谦虚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他们甚至把一些根本不可能归他们所有的功勋都记在自己头上。比如，军事科学问题。南斯拉夫领导人确信，他们用新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战争学进行了补充，

根据这个新理论，战争应该被看作是正规军、游击队和人民起义三者行动的联合。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理论却像世界一样古老，因此不会为马克思主义战争学带来任何新东西。众所周知，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1917—1920 年），布尔什维克采用了联合正规军、游击队和人民起义三者行动的策略，当时采用的范围要比南斯拉夫后来采用的范围大得多。但布尔什维克却从来也没有说过，他们采取的这样一种军事行动方法给马克思主义的战争学带来了某种新东西。他们从没说过类似的话，因为早在 1812 年的俄国，库图佐夫元帅在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就已经成功地使用了这一方法，远远早于布尔什维克。采用这种方法的库图佐夫元帅仍然没有自认为这就是创新，因为在库图佐夫元帅之前，西班牙人还是在 1808 年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就开始采用了这一方法（“游击队员”）。结果，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的那个战争学里的新东西，其实已经有 140 多年的历史了，而他们加到自己头上的那个功劳其实是西班牙人的。

除此之外，还必须要记住，某些领导人过去有过的功绩并不能排除他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可能。托洛茨基当时是有革命功绩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联共（布）就会对他那极其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视而不见，正是这些错误后来把他推到了苏联的敌对阵营。

* * *

铁托和卡德尔同志在信中建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派一名代表前往南斯拉夫，到那里调查苏南意见分歧问题。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调查某些事实，而是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众所周知，拥有自己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九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知道了南苏意见分歧的问题。不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知道这一问题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建议在最近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

维·莫洛托夫

约·斯大林

1948 年 5 月 4 日，莫斯科

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托

米利切维奇·普，《小心——修正主义》，第 64—88 页

致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信（1948年5月22日）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贵党于1948年5月17日和1948年5月20日由铁托和卡德尔同志签署的两封信已收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些信件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那些最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1948年5月4日给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已经指出了这些错误的危害和危险。

1. 铁托和卡德尔同志在信中写道，他们自我感觉“相当不平等，因此不可能同意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研究本问题”，接下来他们暗示说，似乎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让南斯拉夫领导人陷入了这种不平等境地。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一主张中没有一句是真话。在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中，没有任何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不平等现象，也不可能有这种现象。

众所周知，在组建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之时，各国共产党都遵循一个不容置疑的原则，即每个党都应当向情报局提交自己的工作报告，同时，每个党都有权力批评其他党。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根据的就是这些原则，当时在1947年9月的会议上，代表会议听取了无一例外所有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遵循的原则是，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同样的相互批评的权力，正是那时，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工作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式的严厉批评。

众所周知，意大利和法国的同志们当时不但没有对其他国家共产党批评他们错误的权力提出异议，恰恰相反，他们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接受了这一批评，并为自己做出了必要的结论。大家还知道，和其他党一样，南斯拉夫的同志们也利用这次机会批评了意大利和法国同志工作中的错误，他们和其他党一样，也没有认为，批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之时，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破坏了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平等权利。

但是，为什么现在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做出了如此剧烈的转变，要求废除共产党情报局的现有制度？这正是因为，他们大概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应当在共产党情报局中拥有特权地位，他们在情报局的现有

地位与他们自身不相称，他们有权批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其他国家共产党却不能批评他们。但是，这种道德（如果可以把这称为道德的话）与平等没有任何关系。这无非就是南斯拉夫同志们的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南共能获得其他国家共产党所没有的、也不可能拥有的特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一个原则，没有这一原则，共产党情报局就不可能开展工作：各国共产党有义务向情报局提交自己的工作报告，有权利批评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南斯拉夫人拒绝向情报局提交自己的工作报告，拒绝听取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批评，这就意味着他们侵犯了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平等权利。

2. 和上封信中一样，铁托和卡德尔同志在 5 月 17 日的信中再次声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似乎是基于错误的情报才批评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错误。

然而，南斯拉夫同志却没有用任何证据来证实他们的这一声明。这样，他们的声明就成了一句空话，对于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批评，我们没有收到具体的答复，虽然铁托和卡德尔同志在信中写道，他们不会因为对原则性问题的批评而退出。也许，南斯拉夫同志只不过不知道，用什么来为自己辩解？

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南共中央政治局意识到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但却企图将此事瞒住南共党员，让党员产生误解，于是就杜撰出一种他们没有犯错的说法，把自己犯的错误嫁祸于那些好像是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提供了错误情报的清白的人们；要么就是南共中央政治局确实不知道，这些错误已经让政治局偏离了马列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承认，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在是太无知了，竟然连马列主义的这类问题都不知道。

3. 铁托和卡德尔同志拒绝回答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公开提问，顽固地强化自己的错误，还不想承认和改正错误，他们信誓旦旦地说，会用行动来证明他们依然忠于苏联，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等人的教导。当这一切都发生之后，我们没有理由再相信这些口头承诺了。铁托和卡德尔同志已经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做过很多承诺了，但后来都没有兑现。根据他们信件的内容，尤其是最后那封信，我们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了。南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铁托同志应该知道，通过近期日常工作中的反苏和反俄政策，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去动摇苏联共产党

及苏联政府对自己的信任。

4. 铁托和卡德尔同志抱怨说，他们已经陷入了困境，所有这些事件的后果对南斯拉夫来说相当严重。这当然是对的，但铁托和卡德尔同志以及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一道把自己的威信和野心置于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之上，他们需要为此负责。他们非但没有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承认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顽固地否认了这些对南斯拉夫人民非常危险的错误。

5. 铁托和卡德尔同志声明，南共中央委员会拒绝出席共产党情报局为研究南共党内形势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如果这是他们的最终决定，那这就意味着他们不知如何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样，他们就是在默默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害怕出现在兄弟党面前。而拒绝参加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就意味着，南共中央委员会开始走上破坏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之路，意味着南共中央委员会如今正准备让南共和南斯拉夫人民去背叛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统一战线。因为共产党情报局是统一战线的党的基础，这种政策会导致背叛劳动人民的国际大团结事业，导致转向仇视工人阶级事业的民族主义的立场。

不管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是否参加会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都会坚持在共产党情报局的下次会议上研究南共党内形势问题。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同志请求将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改到6月后半月举行的建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声明同意。

维·莫洛托夫

约·斯大林

1948年5月22日，莫斯科

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托

米利切维奇·普，《小心——修正主义》，第89—92页

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民族主义往何处去

1948年6月通过的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内形势》的著名决议指出，最近几个月以来，早先处于潜伏状态的一些民族主义分

子控制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决裂，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

各国共产党，整个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都一致赞同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内形势》的决议。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承认，现在的南斯拉夫领导人，也就是铁托集团，正在通过自己的民族主义政策帮帝国主义者的忙。这是在孤立南斯拉夫，削弱南斯拉夫。

铁托集团是否从这些事中吸取了应有的教训？

铁托集团是否已经明白，民族主义政策令南斯拉夫丧失了以世界各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这一情况已经导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孤立，导致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内外地位的削弱？

铁托集团是否已经明白，他们已把党和国家带入了困境，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与民族主义决裂，重新回到各国共产党的这个大家庭？

不，铁托集团没有吸取应有的教训，而且看来，他们也不可能明白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

正好相反。对于兄弟共产党以及整个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对铁托集团错误进行的同志式的正确批评，铁托集团通过贝尔格莱德报刊回以恶毒的谩骂，挑起对相邻民主国家人民的民族仇恨，广泛镇压、逮捕并杀害那些敢于怀疑铁托集团民族主义政策正确性的共产党员及非共产党员。就在不久前，铁托的副手著名的兰科维奇派几名间谍，杀死了南斯拉夫解放战争英雄、解放运动时期南斯拉夫前总参谋长、南斯拉夫军校校长、南斯拉夫军队上将阿尔索·约瓦诺维奇同志。他之所以被杀死，是因为怀疑铁托集团民族主义和恐怖政策的正确性。正因如此，南斯拉夫的人都公开说“铁托集团已退化成为一个政治杀手集团”。

可见，铁托集团并不打算承认并纠正自己的错误。确切地说，他们是害怕了，没有勇气承认错误，因为要承认并纠正自己的错误是需要勇气的。更糟糕的是：该集团“因为恐惧”而逮捕并惩罚任何一个敢于谈及他们错误的人。

列宁说过：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

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

显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铁托集团归为列宁所说的那种英勇、真诚、热爱自己的党的领导人行列。

1948 年春，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铁托集团主要的民族主义恶行出现了。铁托集团拒绝出席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与兄弟党一起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内情况，从此刻开始，铁托集团公开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尽管屡次建议铁托集团派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会议，像其他国家共产党在上次会议上做过的那样，在会议上陈述己方的观点，——但铁托集团却断然拒绝参加会议的工作。显然，铁托集团并不珍惜与各国共产党，其中包括与苏联共产党的友谊。这是与各国共产党国际主义统一战线的公开决裂。这是与国际主义决裂并转向民族主义的道路。

贝尔格莱德的《战斗报》确定地说，铁托及其同伙捍卫反帝统一战线。这自然是用来欺骗“普通人”的谎话。实际上，当铁托集团就连和南斯拉夫邻国的共产党都不能在一个大家庭中和睦共处的时候，他们还有什么反帝立场可言。

应当认为，铁托集团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卑鄙而虚伪的反列宁主义表现是第二个可以证明其民族主义恶行的基本事实。那些天真的人们期待着代表大会会在与各国共产党友好相处的旗帜下进行，在加强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反帝战线的口号下进行。但是，实际上事与愿违。实际上，铁托集团把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对邻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国家反帝统一战线的战场。这是一次动员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及其共产党、反对苏联以及苏联共产党运动的代表大会。

当然，在南斯拉夫公开谈论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运动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因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都坚决捍卫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结成的联盟。因此，铁托集团耍了个小伎俩，他们决定用热爱苏联、与苏联友好相处以及苏联在解放运动中的伟大作用等冠冕堂皇的话来伪装自己的这一反动运动。事情甚至发展到了铁托的同伙建议斯大林也投入这一卑劣运动，承担起保护铁托集团的民族主义免遭苏联及其他民主国家共产党批评的职责。贝尔格莱德报刊的工作人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搞出了最出人意料、最荒唐可笑的“闪转腾挪”，其目的就是为了向南斯拉夫人

民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证明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行动是次要问题，而与苏联所结的“结盟”和“统一战线”才是铁托集团最为关心的问题。而事实上，铁托集团在这些日子里已经与帝国主义站到了同一阵营当中，污蔑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共产党——这对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来说是件高兴事。与帝国主义者们的统一战线取代了与各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并强化了铁托集团的民族主义政策。

那些《战斗报》的政治杂耍演员要求各国共产党停止揭发铁托集团的错误，给该集团予以信任和支持，否则这种反铁托集团“运动”就可能会给南斯拉夫带来严重损失。

不，先生们！各国共产党既不能信任，也不能支持铁托集团的民族主义政策。这一状况完全可能会给南斯拉夫带来损失。但不应把这归罪于各国共产党，而应归罪于铁托的民族主义集团，是他们与各国共产党决裂并向各国共产党宣战。

那些《战斗报》的政治杂耍演员们自己应该明白，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能并存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他们应该明白，在共产党内部，马列主义是不可能容忍民族主义及这种倾向的，不论以何种形式，马列主义都有义务摧毁民族主义——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各民族的自由和友谊，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建设。

列宁说：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

在资产阶级政权已被推翻的情况下，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企图利用民族主义这一毒器来恢复旧的秩序。

鉴于此，斯大林说道：

“民族主义倾向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政策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策的一种适应……民族主义倾向反映出‘本国’民族资产阶级企图……恢复资本主义。”

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不仅打击了反帝统一战线，还首先打击了南斯拉夫本国的利益，无论是在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内政策方面。

铁托集团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民族主义导致他们与国际劳动者革命运动

统一战线的决裂，导致南斯拉夫丧失最忠实的盟友，导致南斯拉夫的自我孤立。铁托集团的民族主义使南斯拉夫在其外敌面前缴械投降。

铁托集团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民族政策导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媾和政策，导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联合”成统一的“民族”战线，导致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导致剥削阶级有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导致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士气消沉。铁托集团的民族主义会使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其内部敌人面前缴械投降。

一年前，当铁托集团还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还与兄弟党合作之时，南斯拉夫依靠以国外共产党为代表的那些最亲近的盟友们，自信满怀，奋勇向前。这还是不久之前的情况。但当铁托集团转向民族主义道路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剧变。在铁托集团与各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决裂，并开始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人民民主国家之后，南斯拉夫开始失去自己最忠实的盟友，在面对内外敌人时也被孤立起来。

铁托集团民族主义政策的可悲下场就是如此。

每个共产党员都一清二楚显而易见的东西，铁托集团却不明白。该集团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各国共产党之间兄弟般的团结一致，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友谊，与苏联的合作和友谊——这是人民民主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发展和繁荣的主要条件，是这些国家民族自由独立，免遭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保证。

随后，那些《战斗报》的政治杂耍演员们肯定地说，对铁托集团的错误批评已经演变成了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运动，反对南斯拉夫人民的运动。

这当然是不对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反对南斯拉夫人民的运动。如果进行反对南斯拉夫人民的运动，那根本就是犯罪的行为，他们的英雄功绩可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还知道，南斯拉夫各民族人民都坚定支持与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统一战线。他们不会为铁托集团的民族政策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视为我们的忠实盟友。

整体来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进行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运动。我们清楚地知道，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大部分党员还在坚持维护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友谊，维护与苏联及其共产党的友谊。毋庸置疑，南斯拉夫共产党大部分党员身上还存有国际主义的传统。我们也知道，南斯拉夫共产党大部分党员并不赞成铁托集团的民族主义政策。我们知道，正因如

此，这些人遭到了铁托集团及其间谍机构的残酷镇压。

这个“运动”不是从整体上反对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而是反对铁托集团的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认清铁托集团的错误，肃清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民族主义政策。

最后，那些《战斗报》的政治杂耍演员肯定地说，铁托集团是不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分开的，它代表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

这也是不对的。一年前，铁托集团可能代表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大多数。但这是一年前的事。现在，当铁托集团与各国共产党决裂以后，当他们与所有邻国都决裂以后，当他们转投到了民族主义阵营以后——现在铁托集团就已经不代表党内大多数了。现在，铁托集团成了铁托派，他们只获得了党内少数党员的信任，却利用国家机关来镇压党内大部分国际主义党员的意志。铁托派已经脱离了党，因为他们把党交给刽子手兰科维奇去监督，因为他们在党内制定了残酷的恐怖制度，包括镇压、大规模逮捕和暗杀活动，等等。实际上，铁托派现在正与本党开战。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如果铁托派不能用一贯的民主方式，而只能被迫采用大规模的镇压手段来维持党内秩序——这就意味着铁托派早已失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大部分党员的信任。

铁托派代表的只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少数党员，他们依靠的不是党的信任，而是南斯拉夫的行政警察机关。

中央委员

《真理报》，1948 年 9 月 8 日

四　斯大林论军事工作

本节主要翻译、校对者：
袁再旺　崔庆刚　赵旭黎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不晚于1932年7月15日）

卡冈诺维奇同志：

您好！

（请读完致莫洛托夫的信）

1）伏罗希洛夫到我这来过。我们在下面几点上达成了一致（当然，决定性意见还需要政治局来做）：

a）1933年军费预算（包括全部在内，其中包括1933年给红军战士和指挥人员提高薪资）应该在50亿—60亿卢布之间，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能达到60亿。克里姆提醒我，两个多月前我曾经说过，有可能让这个数字达到70亿。但是我没有同意他援引的这句话，我说，现在形势不同了。

b）总参谋部呈交的战时扩军计划（1933年）定得太高，高得离谱了，对国家来说负担很重。这一计划需要修改，要最大限度地缩减。

c）1932年和平时期军队人数（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提出）过于庞大（达100万人）。总参谋部忘了，在所有国家，军队机械化都会导致军队人数的减少。而按总参谋部的计划，结果却是，我军机械化应当导致军队人数增加。真是荒谬绝伦，这表明，对于以机械化为基础改编军队，我们的人是多么束手无策。我知道，军队改编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但是，那就需要，第一，确定这一过渡时期的持续时间，尽量将其缩短。第二，在通过有关军队人数决议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另外一项有关随

着军队机械化进程的发展不断缩减军队人数的时间表的决议。如果没有这样并行的决定，总参谋部关于 1932 年军队人数的计划就不可能通过。

d）关于战斗训练的决议（总参谋部领导人、炮兵、海军）很不具体，需要修改。应当这样来编写决议，即能够保证革命委员会按照各个条款，按照具体的条款检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多少个靶场，什么时候会建成等）。

e）关于克里姆林宫学校的问题，还是按照保留现状的原则来办，即撤销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

2）看来，乌克兰的情况不太好。只有卡冈诺维奇可以代替科西奥尔，看不见其他候选人。米高扬不合适：他不但去乌克兰不合适，甚至连供应人民委员这个职务都不合适（笨手笨脚的，没有纪律性的“宣传员”）。但是现在不应该把卡冈诺维奇派到乌克兰（不合适！）：我们这样会削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不得不等待一段时间。至于丘巴尔，可以暂时把他留在那里，看看他会如何工作。

3）给您寄去外国记者巴斯谢赫斯所写的一篇文章，他对苏联经济政策进行了最无耻的诋毁。巴斯谢赫斯是《新自由报》的记者。他当时卑鄙地写到了木材工业的强制劳动。我们本想把他从苏联赶出去，但是由于他的悔过，就留在了苏联。后来，他又卑鄙地写了关于经济核算方面的文章。但是，由于我们的愚蠢，忽略了这些龌龊事。现在他对债务和集体农庄贸易变得敏感起来。而我们却像白痴一样沉默着，忍受着资本主义小老板的这个兔崽子的诽谤。布—尔—什—维—克，嘿嘿……

建议：

a）在《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版面上对这个资本主义的废物进行诽谤；

b）在这之后，过一段时间，把他驱逐出苏联境内。

就写到这里。祝好！

约·斯大林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224—225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81，目录号 3，案卷号 99，页码 167—174

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时的讲话（1938年1月20日）

斯大林：同志们，我们人民中当然有不少英雄好汉。我想说，我们有很多人才、天才和高手藏在某个角落里。但毫无疑问，他们总有一天会大显身手的。这么一看，我们苏联人民的英雄好汉就有很多。我们只知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这些人有的出现在工业领域，是斯达汉诺夫式的英雄好汉，有的出现在农业领域和航空领域，因为这涉及一些记录。但是，有一个部门涌现出英雄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所有部门，这些英雄在武装干涉时期闻名全国，当时我们苏维埃国家被敌人全面包围，据说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发动进攻，后来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干涉者都被赶进了海里。这么来说，这个首次涌现出英雄好汉的部门就是军事部门！为我们国内战争的英雄们干杯！（与会者为国内战争的英雄而热烈欢呼。“乌拉！”和“国内战争的英雄们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党和政府领导人欢迎布琼尼、叶戈罗夫、沙波什尼科夫、戈罗多维科夫、库利克等同志。）

总之，让我们为那些为苏维埃国家的生存而斗争的战斗英雄们，为国内战争的英雄们而干杯！这些英雄是第一批英雄，现在我们都不提他们了，但这些人马上就会让我们谈论起他们，我们也为这些英雄干杯！

为国内战争的英雄们干杯！（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 * *

奇卡洛夫：同志们，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17年10月25日推翻了资产阶级资本家政府（斯大林——“对”）。

现在，我们距那个意义深远的日子已经有20年之久了。在这20年的时间里，有不少苏联英雄曾走到这个桌前，主席团的桌前，有不少斯达汉诺夫式的工作者曾走到这个桌前，斯大林刚刚提到的那些还会大显身手的国内战争英雄们也曾走到这个桌前（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但在这些英雄中，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刚才没有被提及，也只有这个人的名字刚才被忘记了。这个名字是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核心，是我们共产党和无党派联盟的核心，也是我们共产党的核心，我们党最高机关——政治局的核心，这个名字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名字（与会者发出热烈的欢呼向

斯大林同志致敬）。

＊　＊　＊

斯大林：同志们，我没有要求发言，但你们既然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再说几句（响亮的掌声）。

在我称之为国内战争英雄的那些人之后，——我首先是爱他们的。在国内战争英雄之后，我最爱我们的飞行员（热烈的掌声向苏联飞行员致敬）。同志们，请你们一定原谅我，因为这是我的弱点（赞成的笑声、响亮的掌声）。我可以做任何让步，但是我绝对不允许让我们的飞行员受委屈（所有与会者大声赞成）。

为我们的雄鹰们干杯，为飞行员们干杯，为那些在战争时第一个迎战，却最后一个撤退的人们干杯！为我们的飞行员们干杯，为我们喜欢和关心的那些飞行员们干杯！（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奇卡洛夫：无论什么时候，也不管在谁的面前我们都绝不退缩）。

斯大林：奇卡洛夫错了。军队需要撤退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列宁曾经教导我们，——列宁这个男子汉，我们连他的左手小指头都抵不上，他就是一个全身用不锈钢铸就的男子汉，——列宁曾经教导我们，只学会进攻但却没有学会撤退的军队就不是一支好军队。同志们，任何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是什么人？是那些第一个投入战斗，却又最后一个撤退的战士！（响亮的掌声）

只学会进攻却没学会撤退的军队是会被歼灭的。只学会进攻却没有学会撤退的军队就不是一支好的军队。同志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要在军队方面遵循我们的导师列宁遗训的原因了。而空军在军队中又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国内战争英雄我最喜欢飞行员的原因。同志们，这件事你们是知道的。你们知道，我装出一副老虎的姿态，就是为了不让我们的飞行员受委屈。我们应该给予飞行员一切，要知道他们是独自一个人在天空，要让他们有战斗情绪。

为我们那些第一个投入进攻，却又在必要时刻最后一个撤出战斗的飞行员干杯！（赞成的喊声）

奇卡洛夫同志，我认为我们已经彼此了解了。

同志们，为我们的飞行员干杯！（“乌拉”的高喊声、响亮的掌声）

我们所有人，我们全体人民都热爱飞行员，关心飞行员，关心自己的

这些儿女们。

同志们，为飞行员干杯！（又响起了更热烈的掌声）

＊　＊　＊

斯大林：同志们，尽管有使你们彻底讨厌的危险，我还是想再讲几句。

每当出现不明确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尽量把这些问题公之于众。比如，关于一般英雄的问题，关于空军英雄的问题，关于那些在别国作战和进行军事演习的我们的英雄的问题。但是，同志们，问题并不仅局限于空军一个领域。如果回顾一下战争史，那么大型的军事冲突都是怎么解决的？

早期当然没有空军。空军是什么？空军阻击敌人，打乱敌人的计划和动员计划，引起敌军的恐慌，从精神上摧垮敌军。这一切都很好。但要想彻底击败敌军还需要什么呢？最终，拥有一支优秀炮兵的部队才能在战争中彻底击败敌军。

拿破仑在战争中是靠什么取胜的？我向你们保证，是炮兵！1870 年德军是靠什么在色当击败法军的？我向你们保证，还是炮兵！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德军又是靠什么击败法军或俄军的呢？我敢向你们保证，是炮兵。德军在凡尔登是如何被击败的？是靠法国人的炮兵。我向你们保证，炮兵是很伟大的。为了使骑兵、步兵和空军取得胜利，我们需要炮兵。没有炮兵就没有军队，也就没有胜利！没有好的炮兵就不能巩固战争的胜利果实。

这不，你们说到了西班牙。但是那里不光只有空军，那里还有炮兵，炮兵也做了相当多有意义的事情，在与意大利和德国炮兵的作战中进行了一些实验。

谁主管这事呢？就是他（指格·伊·库利克——编者）。他想藏起来，但我还是应该让他在你们面前露个脸。

为了使我们的炮兵成为一流的炮兵，为了使它能够强过德国炮兵，强过日本炮兵，强过英国炮兵，干杯！（高喊声“乌拉！”）为了使我们的炮兵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些远离国土的地方都能取得成功，都能向世人展示我们世界第一炮兵的风采，干杯！（斯大林同志的祝酒词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高呼：“苏联炮兵万岁，苏联炮兵世界第一！乌拉！”）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1，案卷号 1121，页码 1—11，21—22

注释：上面的讲话是根据 A. A. 哈通采夫的记录整理的。下面的讲话是根据 P. П. 赫梅利尼茨基的记录整理的。

我想讲讲国内战争的英雄们。他们曾经为保卫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敌人包围的苏维埃国家而进行过武装斗争，为这一时期的英雄们干杯。我特别喜爱这些英雄们。为那些最先成为英雄的人干杯，还有些英雄我们现在都不提了，但我们很快就会谈论起他们，为这些英雄干杯。我们所有人都喜欢他们，推崇他们。这些可爱的苏联人，我称他们为国内战争的英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会大展身手，但除了他们之外，我最喜欢的是飞行员。请你们原谅一下我的这个缺点（热烈的掌声）。只要能让他们不受委屈，我愿意做出任何的让步，我会像老虎一样站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

飞行员们总是不停地投入战斗，总是第一个面对面遭遇敌人，总是第一个发动进攻，如果需要的话，又总是最后一个撤出战斗，同志们，为飞行员干杯。

为我们对飞行员的热爱干杯，为我们能随时随地关心他们干杯（热烈的掌声使斯大林同志很久都不能继续讲话）。

我不得不抓紧了，由此可见，我已开始日渐衰老。还有一句祝酒词必须要说。在劳动英雄和斯达汉诺夫式的英雄中有一群人——一群英雄，在此刻之前我们还没有说起过他们。我是指我们在西班牙和中国的那些人（“乌拉”的喊声）。

我们在西班牙的战士们教西班牙人民如何与法西斯作斗争，并教会了他们一些方法，让我们为这些战士们干杯（掌声，“乌拉”）。实际上，他们是在异国的土地上与德意法西斯及其武器装备进行斗争（“乌拉!!!”）。

我认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进行这样的战争更为轻松、更为划算（掌声）。

我们还有些战士在中国教中国人民如何打败敌人，但还没有教会中国人，让我们也为他们干杯。

如同庄稼人那样，我认为，与其待在苏联，不如去中国与日本法西斯作战（掌声，“乌拉”声）。

为我们那些提前进行训练的人干杯。乌拉!!!

同志们，你们有理由说你们已经腻烦我了。

刚才，我们不仅为国内各行各业的英雄而干杯，也为那些身居国外的英雄而干杯。这都很好，但战斗并不只关系到一个空军，在现代战争中，解决问题也不仅仅依靠空军。这是不行的。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炮兵一直在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相比较而言，空军是相对不久之前才出现在战场上的。空军总是第一个在后方与敌军开战，他们引起敌人的恐慌，从精神上威胁敌人，但要想最终击溃敌军，战胜敌人，这个还不够。无论过去和现在，炮兵都是决定胜利的因素。拿破仑靠什么取得胜利——靠他的炮兵。1870 年法军在色当被击败——靠的也是炮兵。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靠什么击败法国和沙皇俄国——是炮兵。在凡尔登法军是靠什么击败德军的——是炮兵。我向你们保证，要解决战争中的主要问题，炮兵才是那最重要的一个兵种（掌声，“乌拉”）。

我们在此谈到过西班牙战争，谈到了我们同志从中获得的一些经验和结论。炮兵在那里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希望，我们的炮兵可以证明自己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流的炮兵（掌声，“乌拉”）。

同志们，我还有两句话要说，我不会有什么奇谈怪论。

同志们，有一些欧洲老牌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还有一个不太古老但却很强大的国家——日本。我会提到一个相当有趣的历史事件。

这些国家认为，如果它们可以招募几个其他国家的活动家，并把这些人变成自己人，那么它们就可以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代数，但我会把它转化成简单的算术。

英国想要在苏联政府人员中拥有自己的间谍，收买他们，并通过他们来影响苏联的生存和发展。同时，英国还想在日本、德国和法国的政府人员中也能拥有自己的间谍，并且已经拥有了。

德国想要在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政府人员中拥有自己的间谍，并且它现在就有这样的间谍，通过这些间谍德国可以知道这些国家在干什么，并调整这些间谍的工作以对自己有利。

日本也想在各国都能拥有自己的间谍，特别是在我们苏联。

以所谓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为例，该党一半以上的成员都是被英国用钱收买的间谍。

用一句俄罗斯谚语来评价就是："上帝啊，帮我们摆脱'朋友'吧，至于敌人，我们会自己摆脱的。"

想想吧，我们国内当权的人是英国、德国和日本的间谍。李可夫、布哈林及其他人是日本、德国和英国的间谍，在即将进行的审判中，我们很快就会让你们看到这一情况。

想象一下，如果是这些间谍任职于苏联政府部门，那么苏联政府的政策就会按照这些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意图和利益来出台。

众所周知，英国需要阿塞拜疆和巴库的石油。德国觊觎乌克兰和顿巴斯，法国觊觎格鲁吉亚，日本觊觎滨海边疆区。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是如何制定政策的。

我没有提到美国，它位于另一个半球，所以我就不提它了。

我们政府是由人民选中的人组成的，这个政府很难被收买，也很难威胁这个政府说，要么你按我们吩咐的做，即实行我们的政策，要么我们就揭穿你。

我们都很富有，于是那些贪婪的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开始注意我们了。我们到底有什么手段来和他们作斗争呢？彻底铲除他们的间谍，彻底铲除他们，这就是我们作斗争的手段。

（热烈的掌声，"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

现在，无论你们在哪里工作，都要努力警觉起来。这很好，一个人是经济工作者，另一个是生产部门的工作者，第三个是合作商店的工作人员，第四个是做买卖的，第五个是宣传人员，第六个是飞行员，第七个是战士，他们都时刻在为战争而准备着，但不能等到战争来了再准备，事实上是在还没有战争的时候就需要准备了（掌声）。我们有一个戒备机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可能会错过某些东西。他们为了我们保持着警惕。他们应该随时随地都保持警惕。

（掌声，"乌拉"声，"叶若夫同志万岁！"）

同志们，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我向你们道歉，因为这也许会闹得很不愉快，但却很有必要（掌声）。

为全联盟的戒备机构干杯，为肃反工作人员们干杯，为那些最年轻和最年长的肃反工作人员们干杯。我们有数万肃反工作人员——他们都是英雄，他们从事的工作微不足道，却有益于国家。为青年、中年和年长的肃反工作人员们干杯。（掌声。"乌拉"声和"叶若夫同志万岁！"）

……同志们，不要着急，着急是件坏事，静静地坐着，要平静下来。我提议为所有肃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叶若夫同志干杯。

（热烈的掌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58，目录号11，案卷号1121，页码12—15

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帕帕宁科考队员时的讲话（1938年3月17日）

同志们，奇卡洛夫同志是一个有能力、有天赋的人，这样的人不仅在苏联很少见，就是在全世界也很少见（掌声）。相信我，在西方，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都创造不出这样的英雄来。

这事很有意义。帕帕宁和他的科考队在冰上经受了巨大的危机。之前我们不理解这件事，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从极地漂出的冰会被冲到格陵兰岛岸边，如果冰上有人，他们就都会死掉。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后来知道了后，都使劲打了一个哆嗦。施密特却说没有任何危险。我们就都抨击他，说这是不对的。他想在3月底开始航期。但我们说：那可不行，不好意思，你现在就开始吧。挪威人找到我们，说要给我们提供帮助。这算什么帮助，简直荒唐之极！他们说，格陵兰的海岸上有我们的渔民，如果帕帕宁他们在那里靠岸的话，这些渔民能够帮助他们。我们对他们说：谢谢帮助，请帮一些你们能帮的忙吧。有个飞行员，也许就是个大骗子，他建议飞过这个地区，然后提供帮助。我们对他说：请吧，帮帮我们吧。但我们自己知道，这些浑蛋——请原谅我说得粗鲁——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真正的帮助。他们只是假装帮助我们。哪里谈得上这些外国人所说的好处和利益？如果真的有好处和利益，那到时倒真能帮点忙，但只能是没有风险。如果有风险，到时就会损失资金和人员。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为了面子上好看，我们说感谢，我们会尽一切可能来关注那些帮助我们的人，但同时我们会动员我们的同志们，就说——帮帮忙啊。一艘破冰船出发了。不够？再派一艘。这艘出发了。还不够？再派第三艘。这艘也

出发了。仍然不够？那就派第四艘。（热烈的掌声）

这会花非常多的钱，对此，欧洲人和美国人并不理解。但我们认为，四个天才正遭受不幸——那就一定要解救他们。这价值几何——没有一个欧洲人和美国人能估算出来。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评估一个人的价值。只有一个目的：利润、好处和利益。但是，一个人虽默默无闻，却是一个躲在安静环境中把一切都颠覆的大英雄，如何评估这个人的胆量和勇气，这价值多少卢布，价值多少资本，——没有人知道这一点。而我们却决定：不管花多少钱，使用多少破冰船都要救人。施密特同志，你们的破冰船都陷在了北方（笑声），陷在了你们不该陷在的地方。乌里扬诺夫第一个出发了——真是个男子汉，是个老练的水手！他有一艘小船，小船在那里会如何颠簸——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施密特对他说：你照顾一下船舷。可是他却对这个船舷满不在乎，那里坐着人，四个英雄。

那么，同志们，为了欧美的利润、好处和利益标准被我们埋进棺材干杯。为了让人们学会如何去评价那些可能默默无闻，但却是无价之宝的勇敢、有才、有能力的人干杯。以前谁知道希尔绍夫、帕帕宁和克连克利？当时知道克连克利的还算多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他们价值多少钱？美国人也许会说："嗯，两美元。"（都笑了，掌声）法国人也许会说："一万法郎！"法郎不值钱。而我们会说：英雄是无价之宝，他们都价值数十亿。

为以前一直默默无闻，而现在却世界闻名的我们的英雄们干杯，为帕帕宁科考队员们干杯！

为了我们苏联人民在西方人面前、在法国人面前、在英国人面前不再卑躬屈膝，也不再对他们阿谀逢迎，干杯！

为了我们苏联人民最终掌握评价人的价值的新标准，为了我们不再以卢布和美元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干杯！美元是什么东西？什么也不是！为了我们苏联人民学会根据人们的功勋来评价一个人，干杯！那什么是功勋，它又值多少钱？没有哪个美国人，没有哪个法国人，也没有哪个英国人能告诉你们，因为他们只有一种评价——美元、法郎、英镑。只有我们苏联人民才明白，人的天赋和勇气就值千百亿可鄙的美元、可鄙的法郎和可鄙的英镑（斯大林的话被全体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淹没了）。

我的讲话还没有结束。奇卡洛夫同志说过——"情愿为斯大林而

死”。奇卡洛夫同志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是一个天才（奇卡洛夫：愿为斯大林而死!）。请原谅我的粗鲁，有些人总认为我很粗鲁，——任何傻瓜都能去死（都笑了，掌声）。死亡自然是很沉痛的，但也不是那么难。我们中也有些人自杀而死，但他们却绝非英雄。

我想提议为那些想要活着（鼓掌欢呼），想要尽量活得长久的人们干杯，为我们事业的胜利干杯!

奇卡洛夫：我代表所有苏联英雄向斯大林同志保证，我们会如此奋斗的，即使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奇卡洛夫把所有与会的苏联英雄们都召集到一起）。

斯大林：为老中青英雄的健康干杯，为那些愿意比我们这些老头儿活得长久的年轻人的健康干杯!（掌声）

奇卡洛夫：与会者中没有人想比斯大林活得更久（赞成的喊声）。没有人可以从我们身边夺走斯大林，我们也不允许有人从我们身边夺走斯大林。我们可以勇敢地说：如果要肺——我们会把肺献给斯大林，如果要心脏——我们会把心脏献给斯大林，如果要腿——我们会把腿献给斯大林。

斯大林：您多大了?

奇卡洛夫：我的心脏要比您的健康，我要把心脏献给斯大林。

斯大林：你到底多大了?

奇卡洛夫：三十三岁。

斯大林：亲爱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党员和党外的同志们，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党外人士中的布尔什维克要比党员中的好得多!我现在58岁了，马上就59岁了。奇卡洛夫同志（打趣了一下）三十（希）三岁了（嘈杂的笑声）。那么，亲爱的同志们，我建议你们不要给自己定一个为某人而牺牲的任务。这是个无聊的任务。尤其是为像我这样的老头而牺牲。最好的方法就是活着和斗争，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斗争，在工业领域、农业领域、文化领域和军事领域进行斗争。不要牺牲，要活着并打败敌人（热烈的欢呼）。

为了那些给予我们这些老头儿、老太太们足够尊重的人们干杯，但你们不要忘记，应该离开这些老头儿老太太们继续前行。为那些正在前行的人们干杯，为我们勇敢、坚强、有才干的同志们干杯!为三十（希）三岁的奇卡洛夫干杯!（笑声、喊声和掌声）

＊　＊　＊

我把施密特的祝酒词稍稍改动了一下。改动的地方是，莫洛科夫同志是诸多朴实而平凡的英雄中的一个，他们害怕光环，害怕热闹，害怕那些突然到来的对他们的同情。我提议为莫洛科夫同志干杯，不仅因为他是英雄，而且因为他不要求名声显赫，是个朴实而平凡的人（热烈的掌声）。

＊　＊　＊

为那些在舞台上表达人民感情的人干杯。为莫斯克文干杯！（把莫斯克文拉到自己身边："现在他落网了，却并不会离开我们。"）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干杯！值得为他的健康干杯吗？（莫斯克文：值得）为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干杯！值得为他的健康干杯吗？（莫斯克文：值得）为艺术剧院干杯！为莫斯克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干杯，还有所有那些通过剧院来努力表现苏联人民情感，表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情感的人们，我们也为他们干杯（斯大林同志的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淹没了）。

＊　＊　＊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党员和党外的同志们！大家都希望马上安排他们去工作——就是帕帕宁和他的那些人。我认为，需要给他们十几天的休息时间。让他们休息 8—10 天，然后才能安排他们去工作。你看，我们现在就有些这样的人——你一来，马上就安排你去工作。这是不对的，不对。我提议为了让我们的同志们——帕帕宁和他的朋友们——能够心无旁骛地休息 8—10 天而干杯，10 天过后，人们再讨论一下让他们怎么办。理解一下吧，他们已经忍受了 9—10 个月没有妻子的生活。请原谅我说得这么直接。就他们几个人，还有一只叫韦肖雷的狗，只能和狗说说话（都笑了）。所以，我建议给他们大约 10 天的休息时间，让他们在这段时间不再有什么负担。

帕帕宁：斯大林同志，谢谢您对我们父亲般的关怀。

斯大林：什么父亲般的？我是共青团员！（赞许的笑声）可能他才是我父亲，我可不是他父亲（笑声）。

他们必须休息大约 10 天，之后我们再讨论。帕帕宁不会反对，而我们也都同意。

帕帕宁：我们也可以去做任何工作，哪怕明天也行。

斯大林：所有这些就是说说而已，你们不要相信他。我了解他。我问

过帕帕宁妻子，她说："要休息十几天，这是最低限。"（都笑了）与帕帕宁相比，我当然更相信她。先让帕帕宁科考队员休息十来天，然后再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1，案卷号，1121，页码 25—30，全宗号 71，目录号 10，案卷号 130，页码 105—110

在红军军事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谈到了红军最近三四年来发生的变化，法国败亡的原因，为什么英国失败，而德国却取胜，以及德国军队是否真的不可战胜。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祝贺你们完成了学业，并祝愿你们在工作中取得成绩。

同志们，三四年前你们离开了部队，现在你们返回队伍后，会发现认不出部队了。现在的红军已经不是几年前的那支队伍了。

a）三四年前的红军是什么样子呢？

主要兵种是步兵。步兵用的武器有，每开一枪后都要重新装弹的来复枪，轻、重机枪，榴弹炮和初速达每秒 900 米的大炮。飞机的速度是每小时 400—500 千米。

坦克的装甲很薄，只能抵挡住 37 毫米大炮的攻击。

我们一个师的总人数达 1.8 万人，但这还不是一个师的战斗力指标。

b）现在的红军变成什么样了呢？

我们改造了我们的军队，给军队装备了现代化武器。但首先要说的是，从战斗经验来看，很多同志夸大了哈桑湖战役和哈勒欣河战役的意义。在这里，我们遇到的不是现代化军队，而是老式军队。不把这些都告诉你们，就是在欺骗你们。

当然，哈桑湖战役和哈勒欣河战役也都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其积极作用就在于，我们在这两场战役中都战胜了日本。但我们重建军队的真正经验却来自于俄芬战争和西方的现代化战争。

我刚才说过，我们拥有一支装备有最新武器的现代化军队。我们的军队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呢？

以前红军有 120 个师，而现在有 300 个师。师的规模比以前小了，但更为机动灵活了。以前一个师有 1.8 万—2 万人，而现在是 1.5 万人。

我们有 1/3 的师都是机械化部队。虽然不说，但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每 100 个师中有 2/3 是坦克部队，1/3 的是摩托化部队。今年，军队会拥有 50 万辆拖拉机和卡车。

我们坦克的外观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所有的坦克都是薄装甲的，而现在这样是不行的。现在，装甲的厚度需要是以前的 3—4 倍。

我们有可以攻下前线的一线坦克，也有护送步兵的二、三线坦克。

坦克的火力也得到了提升。

关于炮兵：

以前我们非常喜欢榴弹炮。现代战争带来了改变，炮的作用得到了提升。在抵抗敌军的工事和坦克时，需要大炮直接瞄准射击，并对炮弹飞行的初速要求比较高——要达到或高于每秒 1000 米。

目前炮兵部队在我军中占有重要地位。

空军：

以前，飞机的理想速度是每小时 400—450 千米，现在这已然落后了。我们现在拥有足够多的速度为每小时 600—650 千米的飞机，也可以生产足够多的这种飞机。这都是一线飞机。战时，这些飞机将会首先投入使用。这些飞机将会为我们那些相对较旧的伊 - 15、伊 - 16、伊 - 153（海鸥）和高速轰炸机开辟道路。如果我们首先使用这些飞机，那就会打败敌人。

如果拥有好的指挥人员，但却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那就有可能输掉战争。以前我们没有重视火箭炮这样的虽然便宜但很有价值的武器，轻视了它们。现在，我们装备有各种口径的现代化火箭炮。

以前我们没有摩托化部队。现在我们已经组建了这样的部队——摩托化骑兵，我们现在拥有足够多的摩托化骑兵。

为了掌握所有这些新型武器装备，指挥新型军队，需要一批精通现代兵法的指挥员。

这就是红军发生的变化。你们到了红军部队之后，就会发现部队发生的这些变化。

我本来不想说这些的，但我们的军事院校落后于现代军队的发展。

c）我们的军事院校落后于红军的发展。

斯米尔诺夫同志曾在这里讲过话，谈到了毕业生，谈到了教授他们战斗经验。我不赞成他的说法，我们的军事院校还落后于军队的发展。

他们还在用旧式武器装备进行训练。有人告诉我，炮兵学院还在用3英寸的大炮训练。是这样吗，炮兵同志们？（转向炮兵。）学校已经落后于军队的发展。空军学院还在用那些老式的伊－15、伊－16、伊－153（海鸥）和高速轰炸机进行训练。不应该用这些老式武器装备进行训练。用老式装备训练，这就意味着培养的学员都是落后者。

大纲也加剧了这种落后局面。因为，要想练到新东西以及用新的方式训练，就必须改变大纲，但要达成这个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按照旧大纲来训练要轻松得多，操心和烦心的事也要少得多。我们的军事院校应该而且可以以新的武器装备为基础重新修订对指挥人员的训练，并利用现代战争的经验。

我们的军事院校落后了，这种落后是合乎规律的。我们应该消除这种落后现象。

你们回到部队后，将会见到一些新东西。为了减轻你们的负担，我刚才谈了一下军队的改造情况。

为什么法国会败亡，而德国却会取胜呢？德国军队真的不可战胜吗？

你们从首都返回部队后，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会问你们，现在发生什么事了。你们曾在军事学院学习，你们那里距离高层更近，请讲一讲，你们那都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法国败亡？为什么英国失败，德国取胜？德国军队真的不可战胜吗？指挥官不应该只会发号施令，这远远不够，还应该善于和战士们谈心，向他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他们谈心。我们那些伟大的统帅总是和士兵紧密相连。应当像苏沃洛夫那样做。

有人会问你们，为什么欧洲彻底变样，为什么法国败亡，为什么德国会胜利，原因何在。为什么德国的军队更好？德军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组织情况都更好一些——这是事实。这又作何解释？

列宁说，只有失败的军队才会好好学习。列宁的这个思想也适用于民族。只有失败的民族才会好好学习。德国军队在1918年被击败过，他们就很好地吸取了教训。

德国人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自己失败的原因，找到了一些可以更好地组织、培养和武装本国军队的方法。

德军的军事思想向前发展了。他们用最新的武器装备来武装军队，并

教授新的作战方法。

总体来说，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军队的优良武器装备可以比较少，军队的组织也可以比较差，但一定要有较多的同盟国。

这正是因为，只有失败的军队才会好好学习——德国借鉴了过去的经验。

1870 年，德国人击败了法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只在一条战线作战。

德国在 1916—1917 年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为什么法国人就没有从 1914 年至 1918 年的战争中学到任何东西呢？

列宁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对缺点视而不见，沉迷于自己的成绩，吃老本，被胜利冲昏了头，那么党和国家就会毁灭。

法国人就是被胜利和自满冲昏了头。他们错过和失去了自己的同盟国。法国人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功。他们军队的军事思想没有向前发展，还停留在 1918 年的水平。军队得不到关心，也没有精神上的支持，出现了瓦解军队的新的说教。对待军人非常蔑视，认为当军官就是失败者，就是下等人，没有工厂、银行、商店，被迫去军队。那时候，就连女孩们也不会嫁给军人。只有在如此蔑视军队的情况下，军事机关才会落入甘末林（甘末林·莫·居，1939—1940 年任法国陆军总司令——编者）和艾恩赛德（艾恩赛德·威·埃，1938—1940 年任英军总参谋长——编者）这样对军事了解不多的人的手中。在英国，人民对军人的态度也是如此。军队应当受到人民和政府的关怀与爱戴——军队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在这里。需要关爱军队。当一个国家出现这种思想的时候，军队就不再可靠，也不再会有战斗力。这种事就发生在了法国。

为了做好战争准备，不仅需要有现代化的军队，还要在政治上做好战争的准备。

什么是在政治上做战争准备？在政治上做战争准备，就是要有足够数量的可靠盟国和中立国。德国在发动战争时完成了这一任务，而英国和法国却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这就是法国败亡与德国胜利的政治和军事原因。

德军真的不可战胜吗？

不是的。世界上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不可战胜的军队，只有差的、好的

和更好的军队。德国发动了战争，并且在摆脱《凡尔赛和约》压迫的口号下赢了第一阶段的战争。这个口号当时很受欢迎，也获得了所有抱怨《凡尔赛和约》人们的支持和赞同。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德国军队用的是不同的口号。德国把摆脱《凡尔赛和约》压迫的口号换成了侵略性的口号。

在侵略性和掠夺性战争的口号下，德军是不会取得成功的。这种口号非常危险。

当拿破仑一世以解放农奴为口号发动战争时，他得到了支持，有了众多盟国，取得了胜利。

当拿破仑一世转向侵略战争时，就树敌太多，遭到了失败。

德军现在进行的战争的口号是征服他国、让其他民族臣服于德国，因此口号的这种变化是不会给德国带来胜利的。

从军事角度看，不管是德军的坦克，还是大炮和飞机，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部分德军士兵刚开战时的那种热情现在正在失去。

此外，德军中还出现了吹牛和骄傲自满情绪。德国的军事思想没有向前发展，不仅武器装备落后于我国，美国也开始在空军方面超越德国了。

那德国又怎么会取得胜利呢？

1. 德国之所以取胜，是因为德军从战败中吸取了教训，进行了改组，改变了旧的价值观。

2. 德国之所以取胜，是因为尽管英法在上次战争中获胜，但却没再寻找新的方法，没有学习。法军曾是欧洲大陆最厉害的军队。

这是德国在一定时间之前走上坡路的原因。

但德国现在是打着征服其他民族的旗号在作战。

那个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旧口号把对《凡尔赛和约》不满的国家都联合了起来，可是德国的这个新口号却让这些国家离开自己。

就军队今后的发展来说，德军对进一步改良武器装备失去了兴趣。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最理想的、最好的、最不可战胜的。这是不对的。

因为军队是每天都需要提高的。

任何一个有自满情绪存在的政治家和活动家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就像法国会大难临头一样。

再次祝贺你们，并祝你们成功。

在招待会上的第一次讲话

请允许我举杯祝酒，为我们各军事院校的领导干部、指挥官、教员们，为我们结束学习现代化技术装备领域的落后局面而干杯。

为什么会形成落后局面呢？第一，因为对教员们来说，教授自己熟知的旧技术装备会比较轻松。而要想教学员们学习新的技术装备，教员们必须亲自了解和学习这些新装备。需要重新学习。各军事院校还在用旧的大纲训练。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在于，我军的供给部门没有向军事院校提供新型的武器装备。为了学员们的学习和结束军事院校的落后局面，必须向我们的学员提供这些新型技术装备。

在招待会上的第二次讲话

为炮兵的健康干杯！炮兵是最主要的兵种。炮兵是现代战争之神。炮兵可装备于各个兵种：步兵、坦克部队和空军。

为坦克兵的健康干杯！坦克是有装甲保护的可移动炮兵部队。坦克上的大炮的口径可以达到 130 毫米。

为航空兵的健康干杯！空军有两个兵种。远程航空兵——这是空袭后方的空军部队，是打击游击战、进行佯攻的空军部队，但这一兵种并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近战航空兵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部队，以前它们的作用被低估和轻视了。这里指的是与炮兵、坦克兵和步兵直接相互配合的空军部队，说的是歼击机部队、强击机部队和俯冲机部队。

为骑兵们的健康干杯！

我们稍稍裁掉了一些骑兵，但现在，骑兵的作用却非常大，我们还有不少骑兵。

在现代战争中，骑兵的作用非常大。在突破敌人的前线之后，他们可以扩大战果。他们可以追击撤退的敌军部队，插入敌军突破口。特别是他们肩负着一个重任，那就是追击撤退的炮兵部队，不给炮兵机会选择新的发射阵地并在阵地上进行休整。

为我们的通信员的健康干杯，为我们光荣的步兵战士的健康干杯！

刚才我在这里没有提到步兵部队。现代步兵部队就是装甲兵、摩托化兵和坦克兵。

关于自动步枪的意义。

一个配有自动步枪的士兵就相当于三个配备普通步枪的士兵。

在招待会上的第三次讲话

坦克部队的一位少将讲话。

他举杯提议为斯大林的和平对外政策干杯。

斯大林：——请允许我修改一下。

和平政策保障了我们国家的和平。和平政策是一件好事。我们只是暂时实施防御政策——直到我们重新装备完军队，直到我们给军队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而现在，当我们的军队得到了改造之后，当为军队提供了应对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之后，当我们变得强大之后，——我们就需要由防御转向进攻了。

在进行防卫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发动进攻，即由防御转为进攻的军事策略。我们必须以进攻精神为指引，重新调整我们的训练工作、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报刊工作。红军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而现代化的部队就是进攻型的部队。

维什廖夫·奥·维：《1941 年 6 月 22 日前夕》，莫斯科，2001 年，第 176—182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3808，页码 1—12

注释：1941 年 5 月 5 日斯大林对军事院校毕业学员的讲话，当时是严禁做记录的，该讲话从最一开始就被用来进行反苏宣传。企图证明苏联有侵略性的那些希特勒分子及他们的同伙把苏联准备攻击法西斯德国的原因几乎就归结到这个讲话上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一直都在斯大林的讲话中寻找命令苏联军官执行相应计划的证据。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周，个别军官被德军俘虏了，他们在德国人的授意下对这次讲话进行了“回忆”，这些“回忆”把“以武力来扩大社会主义战线的新时代的进攻”等此类提纲都归罪于斯大林。维什廖夫·奥·维对现有这些记录（尽管严禁做记录，但是还是有人进行了记录，其中包括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维·亚·马雷舍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格·季米特洛夫）都进行了分析和对比，结果仍然怀疑这种解释是虚构的。斯大林知道，可怕的战争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到来，他试图用最为谨慎的方式来让红军的中坚，让这些很快就会承受敌人空前打击的人们知道这一点，让他们相信，德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必然会被击溃，尽管我们可能会暂时失利。与此同时，还必须全力避免，不给别人任何理由说自己有军国主义和侵略倾向，这一点斯大林无疑成功做到了。

斯大林讲话最后部分的记录还有一个版本是由参加会见的人员 Э. 穆拉托夫（毕业学员之一）记录的，该版本非常有意思。作为对坦克部队将军（他号召“为和平干杯，为斯大林的和平对外政策干杯，为制定这条政策的人干杯，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干杯”）所说的不合时宜的祝酒词的尖锐回应，该版本的感情更为充沛，但是对于那个关键问题：苏联准备进行最积极的进攻性防御，却更为克制：

“这位将军什么也没明白。他什么也没明白。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一直在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反对企图瓜分世界、奴役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我们也总是支持旨在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战争，支持旨在把人民从殖民主义压迫和资本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革命战争，支持旨在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最为正义的战争。德国想要消灭我们这个在列宁共产党领导下、由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想要毁灭我们伟大的祖国，毁灭列宁的故乡，毁灭十月革命的成果，杀死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民，再把幸存下来的人变成奴隶。只有与法西斯德国开战并赢得这场战争才能拯救我们的祖国。我建议为战争干杯，为战争中的进攻干杯，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干杯。”（叶梅利亚诺夫·尤·瓦：《斯大林：在权力的巅峰》，莫斯科，2002 年，第 199—200 页。）

五　斯大林论外交

参加本节翻译、校对者：
余　哲　袁再旺　赵旭黎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29年8月21日）

1）关于英国。李维诺夫是不对的。李维诺夫不想明白，亨德森是用有关（所有！）争端问题解决办法（不仅仅是谈判）的问题代替了程序问题。同意这个，就会抹杀我们的外交成果，唆使敌人反对我们，把我们逼进死胡同。在亨德森发表了声明，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做出回应后，无论多夫加列夫斯基再进行什么谈话，它们（这些谈话）都会被描述成是实质上的谈判，这样我们就会表现得极为愚蠢。我认为，不必把问题从主席团移交至中央执委会例会，因为如果亨德森能放弃自己的观点，问题就可以由主席团来解决，如果他不放弃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由中央执委会例会（绕开主席团）悄悄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主席团全体会议”就是中央执委会例会。那么，你“强调把事情从主席团移交至中央执委会例会”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1929 年 8 月 21 日
约·斯大林

《约·维·斯大林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书信集，1925—1936 年》，第 144—148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5388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30年8月底—9月初）

5）最好委派欣丘克前往柏林。他是一个经济工作者，与在经济方面并不内行的苏里茨相比，他去那里更合适。土耳其对我们很重要，苏里茨在那里十分受欢迎。我认为，把他从那里调离是错误的。粮食出口部门也会找到合适人选的（弗里德里希森、齐尔曼诺夫现在都是粮食出口部门的副手）。只要有粮食，粮食出口就会进展顺利。

《约·维·斯大林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书信集，1925—1936 年》，第 206—208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5388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30年9月1日）

维亚切斯拉夫：

请（暂时）注意两件事。

1）波兰人一定在组建（如果还没组建成的话）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联盟，意在与苏联进行战争。我认为，在他们建成这个联盟之前，他们是不会与苏联开战的，——那么，一旦这个联盟得到保障，他们就会开战（就有了战争的理由）。为了确保我们对波兰—罗马尼亚人和波罗的海人的回击，我们必须创造一些必要条件，以便至少扩编（如果开战的话）150—160 个步兵师，也就是说，要比我们现在配备的步兵师多出（至少）40—50 个师。这就意味着，我军当前和平时期的人员必须由 64 万增至 70 万。不这么“改革”就不能保证（如果波兰人与波罗的海人结盟）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右岸的防线。我认为不应对此有丝毫的怀疑。恰恰相反，如果进行了这样的“改革”，我们苏联的国防就一定会所向无敌。但“改革”需要大量资金（更多的“弹药”、更多的装备、增派指挥人员、增加支出用于被服和食物供应）。钱从哪儿来呢？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增加伏特加的产量。应该抛开虚幻的羞愧感，

直接追求最大限度地增加伏特加的产量，以保证更实际、更重要的国防事业。伏特加的生产原料已经储备好了，那么，现在就得考虑这件事了，将其正式列入1930—1931年的国家预算当中。请注意，民航的迅猛发展也需要大量资金，为此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伏特加。

约·斯大林

《约·维·斯大林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书信集，1925—1936年》，第209—210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58，目录号1，案卷号5388

注释：1930年7月2日政治局否决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提高伏特加价格的提议。9月15日政治局做出了如下决定：

①鉴于城市和农村的伏特加都明显短缺，以及因此导致的排队和投机的增长，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以急速提高伏特加的产量。委派李可夫同志亲自对本决议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

②通过1930—1931年酿造9000万桶酒的计划。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节选）（1931年8月30日）

卡冈诺维奇同志：

您8月26日的信收悉。

1）您为何对帕捷克转交给李维诺夫的（互不侵犯）条约的波兰方面的草案只字未提？这个事很重要，几乎能够决定（未来2—3年的）和平问题，因此我担心，李维诺夫迫于所谓的“社会舆论”压力会把这事简单归结为无稽之谈。要密切关注这件事，并让政治局对此予以特别监管，尽量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此监管到底。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向“反波兰”的普通小市民习气屈服了，哪怕有一分钟忘却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那都是很可笑的。

2）有关梅日劳克和向法国订货的事怎么样了？事情为什么没动静

了？为什么所有的订单都给了德国和英国，却不想给法国人订单？

约·斯大林

8 月 30 日于索契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71—72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81，目录号 3，案卷号 99，页码 12—14

注释：1931 年 8 月 23 日波兰驻苏公使帕捷克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递交了互不侵犯条约草案。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对签署该条约的前景持怀疑态度。波兰通讯社报道此事之后，8 月 27 日和 28 日苏联报刊发表了塔斯社的报道，驳斥了关于恢复谈判的事实。8 月 28 日，李维诺夫也在柏林做了类似声明。8 月 30 日，在收到斯大林的信之后，政治局承认这些言论是错误的。斯大林不止一次重新提到了这个问题（参阅：9 月 5 日和 7 日给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政治局开始对此问题进行监管。在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1932 年 7 月 25 日苏波互不侵犯条约签署。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1931年9月7日）

卡冈诺维奇同志：

您好！

1）帕捷克的条约草案以及加拉罕与帕捷克的“会谈”已收悉。现将两份文件悉数归还。看来，加拉罕在“会谈”期间表现得很愚蠢、很不体面。加拉罕不明白，在与法国人发生那件事之后（一个半月前塔斯社的驳斥文章），没有一个国家会主动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是怕同“反对派”发生“不愉快”。加拉罕不明白，波兰人试图与我们开启条约谈判，但却希望在表面上看来，谈判并不是由他们发起的。加拉罕不明白，对于我们来说，谈判最终是由谁发起的，这是无所谓的，只要能签订我们需要的条约就行了。就这样，加拉罕非但没有抓住帕捷克及其草案所提供的机会，反而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推开了帕捷克，把事情搞砸了。至于帕捷克的草案，那是丝毫不亚于法国人最初的那个草案，众所周知，后者

正是我们与法国人谈判的基础之一。

我很清楚，加拉罕和李维诺夫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要想弥补这一错误，必须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顺便问一句，帕捷克的草案为什么递交给了加拉罕，而不是李维诺夫或者克列斯京斯基？一定要查明这件事，并告诉我。

祝好。

约·斯大林

《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年》，第88—89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81，目录号3，案卷号99，页码21—23

注释：在加拉罕与帕捷克8月23日的谈话记录中，加拉罕说道："他在离开时说道，他仍然希望他的会谈能对条约事宜的发展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我马上对他说道，我不认为这能成为推动事情向前发展的一个动力，因为他转交给我的东西没有任何新意，只能肯定的是，我们未能就此达成一致"。

参阅：《1931年8月30日给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节选）（1932年6月15日）

1932年6月15日

卡冈诺维奇同志：

你好！

6月12日信已收悉。

1）将兹纳缅斯基正式召回是很不合适的。需要（立刻）叫他来做个人汇报，和他详细谈谈，然后无论如何都要解决问题。

2）在所有有关苏美关系的"谈话""谈判""通报"及"声明"中，应当认为，兰开斯特的出现、他想搞清楚银行要求的借款条件和偿还方式是最有意思的现象。希望梅日劳克、皮达可夫和卡尔曼诺维奇和他详细谈谈。

至于波普、布利特和其他人，也要亲切（记住乌克兰话：亲切点!）和周到地对待。这些先生们提到了“共产国际”，作为回应我们也要提到这样一些事实，如我们已经与法、德、英、日建立了外交关系。要告诉这些美国先生们，当我们看到德、英、法、日各国人士早已认识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分歧，而美国人却没有达到这种认识之时，苏联人民是多么沮丧。

我认为，暂时不用派我们的人去美国“考察”。

《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168—169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81，目录号 3，案卷号 99，页码 62—63

与英国掌玺大臣安·艾登的会谈记录（1935年3月29日）

会谈是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同志的办公室进行的。与会者有：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里特维诺夫同志和迈斯基同志。英方出席会谈的有：艾登、英国大使丘斯顿和英国外交部国际联盟办领导斯特伦克。会谈持续了将近 1 小时 15 分钟。

在大家致过贺词后，艾登开始讲话。他讲话的内容大致如下。

艾登：我有责任代表英国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今天为我提供与苏联各位领导人见面的机会。我认为英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将会有助于增加两国政府间的相互理解，同时也有利于提高英苏关系水平，巩固世界和平。英国政府实行的政策是和平政策。该政策与国际联盟紧密结合，并以国际联盟准则为依据。英国政府相信，苏联政府也一定会奉行和平政策的。除此之外，苏联政府也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这就为我们两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我借此机会来澄清一个误会，该误会看起来在苏联流传甚广。贵国的很多人都认为，英国政府正在搞某种阴谋来反对苏联，并且还怂恿其他国家来一起反对苏联。我应该代表英国政府坚决声明，这种猜测是毫无根据的。英国政府想要的只是和平。因为我们的政府明白，在当今条件下，任何大的战争都不可能是局部的、与世隔绝的。所以，英国政府认为，

苏联的完整、不可侵犯以及它的成就是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希望苏联政府也能站在同一立场上，即认可大不列颠帝国的完整、不可侵犯及它的成就。

斯大林：如果不是恭维话，那这些话是很好的。

艾登：日内瓦会谈之后，里特维诺夫先生就已经非常了解我了，他可以证明我在这种条件下是不可能说恭维话的。

莫洛托夫：我可以向掌玺大臣先生证明苏联政府实行的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苏联不渴望有新的领土，也不渴望什么征服占领。苏联正忙于国内的和平建设，它渴望能与各国维持最好的关系。任何针对大不列颠帝国的侵略阴谋都是苏联政府的异己。

艾登：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此详细叙述柏林谈判的内容，因为我认为里特维诺夫先生可能已经把我们那些会谈的内容报告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先生了。如果能听到他们两位对当下的欧洲局势及对调整该局势方法的意见，那对于我来说将是非常的重要和宝贵。

斯大林：首先，我想向艾登先生提一个问题——艾登先生怎样评价当下的国际形势？是否认为局势非常危险或者不是非常危险？

艾登：我认为当今的国际形势令人担忧，但它却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虽然现在的困难很大，但是欧洲各民族还有很多时间去克服这些困难。

斯大林：那么，如果与1913年的国际形势相比呢——现在的形势怎样，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艾登：我认为是更好了。

斯大林：您为什么会这么想？

艾登：我之所以这么想有两个原因。第一，现在有国际联盟，而在1913年却还没有。国际联盟的能力是有限的，但相关的国家还是有机会在日内瓦讨论问题，哪怕是讨论有关即将出现的危险的问题。第二，1913年，广大的欧洲民众根本没有想到有战争，他们甚至没有料到战争的危险是如此之近。但战争晴天霹雳一般地发生在了他们身上。现在是另外一种局势。全世界的社会舆论都清楚地明白战争的危险性，也考虑到了这种危险性并与之作斗争。如今，广大人民也都是和平主义倾向的。您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斯大林：我认为现在的局势要差于1913年。

艾登：为什么？

斯大林：因为在 1913 年只有一个战争危险策源地——德国，而现在却有两个——德国和日本。

艾登：但你们最近不是好像正在调整与日本的关系吗？由于贵国政府采取的明智政策，世界这一区域的战争危险有所减轻。

斯大林：我不是仅指苏联的边境安全。问题会涉及更广的范围：日本接下来的意图是怎样的？总之，它打算干什么？从这点来看，远东的局势让人非常担心。您所指出的国际局势的某种改善只是暂时的。这就是一个间歇，这个间歇会一直持续到日本将满洲消化掉为止。一旦将满洲消化掉，日本在最近 3—4 年间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倾向和意图，就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艾登：您对日本的侵略意图深信不疑吗？

斯大林：暂时还没有任何事实可以反驳这个结论。同时，有事实让我们担忧远东地区状况的恶化。事实上，日本已经退出了国际联盟，并公开侮辱国际联盟准则，当着世界各国的面撕毁了本国签署的国际条约。这很危险。1913 年，日本还属于那些尊重自己在国际文件上签名的国家。而现在的局势正好相反。这种政策预示着，什么好事都不会发生。

艾登：那么欧洲又会怎么样呢？

斯大林：在欧洲，德国已经让人相当担心。该国也已经退出了国家联盟，正如您告诉里特维诺夫同志的一样，德国没有表现出想要重回国际联盟的愿望。德国也公开、当众撕毁了国际条约。这是危险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怎么可以相信德国签署的各种国际文件呢？德国政府反对东方互助条约，这是你告诉里特诺维夫同志的。它只赞同互不侵犯条约。但又怎么保证如此轻易就撕毁自己国际契约的德国政府会完全遵守互不侵犯条约。没有任何保证。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为了维护和平我们需要更实际的保证，这个保证只能是东方互助条约。那么，事实上这个条约的实质是什么呢？现在有我们六个人在房间里，设想我们之间是有互助条约的，再设想一下，例如，迈斯基同志想要进攻我们中的某一个人，会是什么结果呢？我们大家会联起手来打败迈斯基同志的。

莫洛托夫（开玩笑地）：所以，迈斯基同志现在表现得很谦虚。

艾登（笑）：我非常明白您的比喻。

斯大林：东欧各国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其中的一个国家是互助条约的成员国，却遭到另一个条约成员国的进攻，那么其他的各成员国都会赶来，竭尽全力帮助前者。在当前的发展阶段，这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最简单方法。

艾登：那么，对互助条约您有什么想法——与德国签署还是不签署？

斯大林：和德国签署，当然要和德国签署了。我们不想包围任何国家。我们不希望孤立德国，恰好相反，我们希望与德国友好相处。日耳曼人是一个伟大而英勇的民族。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一点。这个民族不该被《凡尔赛和约》禁锢这么久的。日耳曼民族早晚会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的。我方不是《凡尔赛和约》的签约国，所以与那些签约国相比，我们可以更自由地评价这个条约。我再重复一遍，像日耳曼如此伟大的民族是本应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的。然而，他们挣脱《凡尔赛和约》束缚的形式和情形却是如此，这会引起我们的严重担忧，所以，为了防止出现某种不愉快纠纷的可能，我们现在就需要某种保护。这种保护只能是东方互助条约，当然，如果有任何可能，也要和德国签约。艾登先生，您刚去过柏林，印象怎样？

艾登：我想用一句英语格言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满足但却不高兴。我满足的是局势明朗化了，但我不高兴的是，由于这种明朗化我们才相见了。

斯大林：我同意您的观点。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如今，柏林里都是些怪人。例如，大约一年前，德国政府提出，提供给我们2亿马克的借款，我们都同意了，也开始谈判了——这之后，德国政府竟然马上开始散布谣言，好像是说为了制订攻打法国的计划，图哈切夫斯基和格林克秘密见面了。难道这就是策略吗？这是小伎俩。或者说就是现在——里特维诺夫同志对我说，在柏林的时候，一直有人用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来吓唬您。不是这样吗？

艾登：是啊。希特勒曾经声明，你们红军的强大和从东方攻打德国的威胁让他很不安。

斯大林：您知道吗，德国政府同时还表示，他们可以向我们供应一些产品算作债务，这些东西甚至都不方便公开说，——是武器，化学品等等。

艾登（不安地）：怎么？难道德国政府同意为你们红军提供武器了？

斯大林：是的，同意了，我们可能近日就会签署债务合同。

艾登：这太惊人了！在希特勒对另一个人说有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时候，这一行为并不利于证明希特勒的诚意。

斯大林：非常正确。难道这就是策略？难道这就是一个重大决策？不是的，柏林里的人都是一些手法不高明的小人。

艾登：我非常高兴能从您的口中及莫洛托夫先生那里得知您坚决站在和平的立场上，并完全支持集体安全体系。大不列颠和苏联——两国都是国际联盟成员国，两国政府对局势基本问题的看法竟如此一致，这为两国在日内瓦的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斯大林：是啊，很好。我们加入国际联盟完全不是为了耍手腕，但我们明白，国际联盟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威信，甚至连巴拉圭都敢嘲笑它。必须要加强国际联盟的地位，而为此互助条约又是必不可少的。

艾登：我会向我国政府报告这次会谈，当知道贵国计划在欧洲，也可能是其他地区的共同安全体系下进行合作的时候，我国政府一定会非常满意，对此，我深信不疑。

至此，会谈结束。之后，莫洛托夫同志邀请所有与会人员到条案旁喝了一杯茶。快走到条案旁时，艾登注意到了挂在墙上的苏联大地图，然后说：

“地图真漂亮，国家真大！”

斯大林开玩笑地答道：

“国家是大，但困难也很多啊。”

艾登看看地图上英国所在的位置，然后添了一句，你看，英国完全就是一个小岛。斯大林同志看看英国说道：

“是啊，是个小岛，但好多事情取决于这个小岛。如果这个小岛告诉德国：不给你钱，不给你原料，也不给你金属，——欧洲和平就有保障了。”

对此，艾登一句也没有回答。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18 卷》，莫斯科，1973，第 246—251 页

接见英国大使斯·克里普斯(1940年7月1日)(绝密)

克里普斯首先着重强调了首相信中提到的某些问题，并逐个分析这些问题。

克里普斯强调，这封信的意思是英国希望能和苏联拥有良好的关系，这点在信中是显而易见的，但特别之处在于这封信还表达了英国想要和苏联建立良好商贸关系的愿望。

接下来，当话题转到英国当前提出的任务时，克里普斯又一次引用了首相的信件，并指出英国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英国不受德国的侵略，同时还要保持欧洲的均势。这也是英国在远东的政策，英国也想要在那里保持均势。英国理解苏联在本次战争中实施的当前政策——保持中立的政策。

克里普斯接下来说道，从法国被打败的那一刻起，欧洲局势就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又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不便。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保持与苏联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就成为英国的主要任务之一。众所周知，英国和土耳其之间有个条约，该条约现在很有分量，根据这个条约英国可能会被迫走上这样一条路，在这条路上英国和苏联的利益可能会出现交叉，这是一个大家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英国想要避免的一个情况。

如同克里普斯所指出的那样，这就是迫使他之前和（主席）总统谈起希望在苏联的领导下可以在巴尔干地区看到局势稳定的原因。由于巴尔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英国政府就是现在也认为，如果可以的话，交流一下对于未来的看法是非常有益的，这样就不会让英国猝不及防，也就不会产生之前所提到的意见分歧。

克里普斯引用了首相的信件，他认为政治关系是第一个主要问题，也是进行商贸谈判的基础。克里普斯认为，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因不可预知的情况，在东南欧可能出现任何争执之时，商讨避免（预防）出现这种局面的手段。

克里普斯说，他没有说什么可说的了，问斯大林同志就首相信件的内容还有没有问题。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没有问题，但就所提出的问题想要发表一下自己

的观点。

斯大林同志从个别问题开始，谈到了自宣战时起的苏德关系问题。斯大林同志说，如果首相先生想知道我们和德国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没有为了与英国作战而和德国结成同盟。我们之间只有互不侵犯条约。

在谈到均势问题时，斯大林说道，我们想改变欧洲旧的反苏均势。众所周知，从谈判结果看，英法在此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此乃苏德相互接近的原因，这种接近也是在上面提到的那些范围内进行的。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恢复均势，特别是针对苏联建立均势，那我们会说，不可能同意这个观点。

斯大林同志表达了一种观点，即问题是否涉及欧洲或者任何其他大洲的均势，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任务。

当谈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希望在苏联领导下建立巴尔干地区秩序的问题时，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说明苏联是没有这种意图的。苏联没有控制巴尔干地区的企图，而且还认为这种企图是轻率的、危险的。

接着，斯大林同志转到了主要问题——德国在欧洲的霸权。

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现在谈论德国称霸欧洲还为时尚早。打败法国——这并不意味着称霸欧洲。要想称霸欧洲，就必须有制海权，而德国现在却没有制海权，将来也未必会有。欧洲如果没有水路运输，没有殖民地，就不会有矿产和原料。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就从客观上证明，谈论有称霸欧洲的危险还为时尚早。

至于有意称霸欧洲的这些主观证据，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声明，在他与德国代表进行的一切会晤中，他都没有发现德方有称霸全世界的这种愿望。

克里普斯对斯大林同志就苏德关系问题的解释表示满意，这也使人们能很好地理解苏联的态度。

对于均势问题，克里普斯发表意见称，他认为，英国政府认为不可能恢复旧的均势。毫无疑问，会有人问，应当有怎样的均势。首相的观点是——应该存在某种平衡，但无论如何不能是某一种力量的霸权。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完全正确的。

克里普斯又回到了巴尔干问题，他道歉说，没有正确地说明这个问

题，并解释道，他指的不是苏联有想要统治巴尔干的企图，而是指如果没有一个强大邻国在某些方面进行领导，促进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并把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相互之间联合得更为紧密，那么在这种情况建立均势是困难的。克里普斯认为，因为之前形成的传统友谊，苏联和土耳其在此问题上在巴尔干地区都有巨大的利益，他们很有可能对当前局势起到稳定作用。

克里普斯声明，英国对当前的局势感到非常担心，因为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签有条约，一旦巴尔干地区发生冲突，英国就会被动地履行这个条约。英国认为，既然德国现在石油产品短缺，那么，为了获得更多的石油产品，就有德国入侵巴尔干和近东的危险。

就制海权的问题，克里普斯表示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的看法，并认为这是德国称霸和德国当前局势之间道路上的基本要素。

关于西欧，克里普斯认为，除了英国，再没有别的力量可以预防德国霸权的实现。

斯大林同志提醒克里普斯，说他忘了美国。

克里普斯答道，美国尚未声明，它打算向欧洲派遣任何援助力量。

接下来，克里普斯说，在当前局势下，充分利用一切机会防止大英帝国及其自治领地和美国的商品流入德国，这已经成为封锁德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提到有关德国希望称霸欧洲的问题时，克里普斯说，他没有机会见到德国人并和他们进行交谈，但他却有机会读到了他们所写的东西。除此之外，根据英国秘密部门获得的情报，他（克里普斯）有了一个定论，那就是希特勒不仅希望称霸西方，还同样希望称霸东方。现在，克里普斯读的是一本名为《希特勒对我说》的书，希特勒在书中讲到了自己对世界霸权的看法。最近一周来，戈林在柏林又不断重复了所有这些关于东欧的观点。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并不总是相信那些大肆宣扬的东西，因为根据经验他知道，如果他们大肆宣扬，那这就只是一招军事计策。斯大林同志说，他不排除纳粹分子中有些人会谈论起德国要称霸全世界。斯大林同志又说道，但我知道德国也有些相当聪明的人，他们明白，德国现在还没有实力称霸全世界。

斯大林同志说，他还不会幼稚到相信某些领导人就无意称霸欧洲和全世界发表的某些口头声明。我把这两种霸权归为一种，因为没有称霸世界

就不可能称霸欧洲。斯大林同志又说，但如果我继续相信德国主要领导人无意于称霸欧洲，那么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他们现在还没有实力称霸全世界。

提到巴尔干，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对罗马尼亚的要求仅限于那些已经发表了的声明。苏联对罗马尼亚没有任何要求。

当然，斯大林说，不排除意大利和德国想要保障罗马尼亚对本国的石油供应，但在我看来，罗马尼亚本国并不反对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认为，无论多么强大的力量作为领导者进入巴尔干地区，都很有可能在那里陷进去。

趁此机会，克里普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强国的领导，某国在巴尔干地区是否有以这种方式陷进去的危险。

斯大林同志答道，原本可以非常轻易地在巴尔干地区建立秩序。只要开进军队并说："够了。"但这就不是领导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侵占。苏联不打算采取这样的行动。

斯大林同志转到了关于土耳其的问题上。

关于土耳其可以说些什么呢。我们与土耳其的关系不错，但他们土耳其人经常玩弄政治，搞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鬼名堂，这都让人很难猜到他们想干什么。

至于意大利和德国对近东的企图，斯大林同志认为这些企图并非是不可能的，但在这点上很多方面还要取决于土耳其的态度。会有什么动作，土耳其又会让此事向什么方向发展，都很难预料。

克里普斯答道，如果伊斯坦布尔感觉有危险或者有改变博斯普鲁斯海峡或黑海现状的危险，那么土耳其人自然会有动作。如果英国有机会为解决这个问题做点什么，那么英国会很乐意去做所有能做的事。

斯大林同志转到了关于巴尔干的问题上。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我认为，把军队从西线调往巴尔干，这对德国来说没有意义。罗马尼亚很多人都说，由于地中海在进行战争，罗马尼亚都无处可以输送石油了。罗马尼亚会把石油卖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因此，未必就有理由把兵力转移到巴尔干来。

至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那几个海峡，在此问题上，土耳其会有什么危险呢？很可能，这个危险是土耳其捏造的，该国想以此搞出一些新的鬼名堂。如果谈到的不是捏造的危险，而是现实的危险，那么莫洛托夫同

志的发言就应该会让土耳其人完全放下心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非常好，是因为我们都无意进攻彼此。对于最后一次谈判，我应该直言相告，我们和土耳其人没有谈妥，谈判破裂了，彼此都非常不满意。

斯大林同志说，在最近一次到访期间，萨拉焦格卢根本不想谈及那几个海峡，因此我想，我们的关系有待改善。如果英国有意尽力改善关系，我们不会反对。

克里普斯答道，就这个问题他会和政府联系的。

在谈到关于商贸谈判的问题时，克里普斯说，英国在谈判中应该特别注意德国的封锁问题，但同时英国希望尽一切努力给苏联的经济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东西。

克里普斯提出一个问题，即英国能否认为两国关系已经足够友善，可以相信英国的商品不可能落入英国敌人之手。

斯大林同志答道，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苏联依据的是估算的剩余物资，但这并不是说，苏联总体来说可以把这些剩余物资运到国外。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我们都缺乏镍和铜；我们根本连一点橡胶原料都没有。苏联的锡也不够本国生产之需，车床也不够。如果我们进口我们短缺的商品时，英国人每次都会认为这些商品是供德国用的，那这是不对的。斯大林同志说，在和德国签订的合同中，我们没有责任向他们供应各种有色金属，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有责任向德国提供完成我们在德订货必需的那种有色金属。举个例子，苏联不久前从德国购买了一艘未造完的巡洋舰，还要买些炮兵的装备、车辆和一些空军装备。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用有色金属来交换。当然，我们并不会完全保障德国的有色金属供应，而只是部分供应。

斯大林同志说，他应当坦诚地说，苏联向德国供应有色金属，为的是德国能生产专门供应苏联的产品。而如果德国人没有答应向我们提供上述武器，那么我们就不会和他们签订任何合同。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一情况有碍于苏联和英国之间签订商贸协议，那么我要说，协议是不会签订的。简单来说，我们和德国签订了合同，根据这个合同我们应当向德国供应部分有色金属，以完成我们的订单，因为我们也缺少必要的有色金属，所以就很清楚了，部分国外进口的金属将流向德国。我们不能违反与德国或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合同，所以在谈判的时候英国应该考虑我们所说的情况，如果英国认为大体上可以考虑的话。

斯大林同志说，我当然也可以承诺说，哪怕一俄磅进口商品也不会流向德国，但这个承诺是不诚实的，当然，克里普斯先生需要的也不是这种承诺。所以我就公开讲出全部事实。

克里普斯答道，如同任何别国一样，只要有东西出口国外，英国就有一些人怀疑。更何况还有专门处理这一问题的经济封锁部门，利用一切机会防止商品进入德国并为其所用。同时，英国没有任何计划要阻止苏联在它想要的地方完成本国的采购。

克里普斯说，虽然他没有本国政府的指示，但他认为，谈判不会有任何难以克服的困难。

会谈结束时，克里普斯承诺会从政府获得指示，并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希望只要米克扬同志有空，在这个极其有益的会谈结束之后就可以和他开始谈判。

波特鲁巴奇记录本次会谈。

《外交学报》，莫斯科，1993，第 74—77 页

注释：上面发表的这篇会谈之所以进行，是由于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被任命为英国驻苏联大使。克里普斯是议会左翼少数派的成员，他以反法西斯观点而著称，1939 年被驱逐出工党政府，他支持有共产党参与的反希特勒统一战线。当伦敦方面挑选接替如此重要职位的候选人时，他们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些。从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就克里普斯候选人的问题，他与全权代表迈斯基进行了多次磋商，结果英国人不得不以大使的身份派遣克里普斯赴苏，而不再是以之前的“肩负商贸调研使命”的名义前往。（“苏联政府对克里普斯表示赞同，但他们想让他成为大使……”）

这里当然不涉及个人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好恶。1940 年 5 月底，维·米·莫洛托夫就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任命哪个人为驻莫斯科大使是英国政府的事情”，——但如果认为“某个‘左翼’活动家”比较受欢迎，这就不对了；新大使须是“真正代表英国政府观点的人”，这要重要得多。在这一极其复杂的时期，苏联政府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代表英国利益的内行的全权负责人。1939 年夏天的情况实在太令人难忘，那时派

来莫斯科进行谈判的英国人都是些二流人物，他们在谈判还没开始之前就把谈判给彻底搞砸了。

那时，英方要比苏联对谈判更感兴趣。后来，克里普斯回忆起，他带到莫斯科的那些提议的内幕是“极力迫使他们（苏联）帮我们摆脱困境，之后我们就可以抛弃他们，甚至与现在包围他们的敌人结盟”。英国总司令部对这些提议的评价更为坚决：作为“制造俄德冲突”的一种方法（参阅：戈罗杰茨基·Г《致命的自我欺骗．斯大林与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莫斯科，2001，第33—34页，49—50页）。

如同速记记录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斯大林在德苏冲突前夕确实试图与英美建立稳固的公务联系，但他却相当谨慎，表现出极为克制的态度，这显然令那些想“借他人之手火中取栗”的猎手很失望。

致乌共(布)利沃夫州委书记列·斯·格里休克的电报（1940年7月3日）

副本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和布尔米斯坚科。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已经获悉，利沃夫政府机关允许那些针对波兰人民的过火行为，不向波兰难民提供援助，限制波兰语，工作中也不录用波兰人，因此波兰人不得不冒充乌克兰人或其他民族。警察机关的表现尤其不公正。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命令你们把下列任务作为自己的职责，即尽快消除这些和其他与此类似的过火行为，采取措施在乌克兰和波兰劳动人民之间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建议你们召集一些比较优秀的波兰人开个小型会议，了解一下他们对过火行为有何抱怨，把这些意见记录下来，然后在制定措施改善与波兰人关系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些意见。

现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号89，目录号48，案卷号6，页码1

发给约·布罗兹·铁托的电报(1944年2月9日)

1. 如同那个著名的英国人（温·丘吉尔——编者注）一样，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也赞成南斯拉夫统一，但是只要仍然存在两个

政府（一个在南斯拉夫，另一个在开罗），统一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废除包括德拉查·米哈依洛维奇在内的开罗政府，并且该政府应当提供一份有关花费巨额人民资金的详细报告。

2. 英国和其他盟国应当承认，位于南斯拉夫的政府，即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政府是唯一的政府，并且该政府应当遵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制定的法律。

3. 如果彼得国王能接受所有这些条件，并且可以理解在南斯拉夫解放之后，将由人民来解决南斯拉夫的君主制问题，那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届时将不会反对与他进行合作。

我们的意见就是如此。

请即刻确认接收。

吉连科·尤·斯：《斯大林—铁托》，莫斯科，1991，第 182—183 页

注释：简单点说，温·丘吉尔的建议就是，在征得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的同意之后，把国王彼得二世归还给南斯拉夫。在得到此建议，并且把德·米哈依洛维奇也给牺牲掉之后，约·铁托决定向莫斯科征求意见。1944 年 2 月 6 日，在发给格·季米特洛夫的无线电报中，铁托请求他能告诉自己斯大林对待国王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命运问题的态度。过了三天，季米特洛夫在确认收到铁托“关于彼得国王”的电报之后，向铁托转达了“大家的意见，包括您要求的那位同志的意见”。（参阅：吉连科·尤·斯：前引书）

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一行的谈话记录（1947年7月9日）（秘密）

莫斯科市

参加会谈的有约·维·斯大林同志、维·米·莫洛托夫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哥特瓦尔德、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司法部部长德尔蒂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秘书长亨德里赫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霍拉克。

斯大林同志问哥特瓦尔德，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

哥特瓦尔德答道，他们想要讨论三个主要问题：

1. 关于参加 1947 年 7 月 12 日巴黎会议的问题。

2.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与法国的条约问题。

3.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与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的贸易谈判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询问了一下哥特瓦尔德，以确认他们想要从哪个问题开始讨论。

哥特瓦尔德答道，最好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斯大林同志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从巴黎回来后过了两三天，南斯拉夫就问我们，他们该怎么办，应不应该参加 7 月 12 日的巴黎会议，他们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说他们考虑不参加这个会议了。后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又问了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起初认为，最好建议他们前去参加这次会议，并当场破坏这次会议。后来，收到我们各位大使发来的材料之后，我们由此确信，这次会议是打着贷款援助欧洲的幌子，来组建某种反对苏联的西方联盟。那么，我们就果断决定，并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所有人，说我们拒绝参加 1947 年 7 月 12 日的会议。

让我们吃惊的是，你们决定参加这次会议。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就是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两国间的友谊问题。不管是否出于本意，但客观上你们是在帮助孤立苏联。你们看，会发生什么事。所有与我们有友好关系的国家都不参加这次会议，捷克斯洛伐克也与我们有友好关系，但却要参会。这些国家就会认为，由此可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与苏联的友谊并不深厚，既然该国如此轻易就被拉拢到了孤立和反对苏联的一方。这会被认为是反对苏联的胜利。我们及我们人民不会理解这个的。你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决定，应当拒绝参加此次会议，你们这样做得越快，那就越好。

马萨里克请斯大林同志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获悉，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是依赖于西方的。工业部门的代表认为，参加会议可以不错过一个获得贷款的机会，这是合理的。与此同时，波兰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向我们声明，他们也决定参加这次巴黎会议。结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关于参加 1947 年 7 月 12 日巴黎会议的决议获得了所有党派的一致同意。

马萨里克接下来继续讲道，他赞成参加这次会议，对此，他不打算推

卸自己的责任，但他请苏方考虑到，他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都无意用参会来做任何有损于苏联的事。最后，马萨里克请求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能改善一下他们的处境。

莫洛托夫同志向马萨里克指出，你们参会这事本身就是在反对苏联。

马萨里克答道，他、政府、所有党派及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都无意也不会做任何反对苏联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不怀疑你们对我们的情谊，但客观来看，事情却正好相反。

德尔蒂纳说，他代表他所属的党派及他个人声明，如果我们的决定是在与苏联作对，那我党不想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连为我们与苏联作对的行为找出一个借口这样的事，我党甚至都不会去做。与此同时，德尔蒂纳请苏方考虑到，是与除苏联以外的其他斯拉夫国家不同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60% 的进出口都依赖于西方各国。

斯大林同志指出，捷克斯洛伐克与西方存在贸易逆差，因此捷克斯洛伐克不得不把外汇向西方输出。

德尔蒂纳说，他指的是进出口总量，他还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人民认为，由于 1947 年，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之间的贸易急剧下降，而如果我们不参加这次会议，就不会获得贷款，因此我们就会降低我们的居民生活水平。在讲话结束时，德尔蒂纳请求苏联帮助他们摆脱现状，加大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往来。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需要一些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例如，石油工业管道、窄轨铁路钢轨、车辆等，因此我们可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是说，可以签订有利于双方的贸易合同。

哥特瓦尔德说，捷克斯洛伐克向西方大量出口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产品，而苏联暂时还没有购买过这些产品。

斯大林同志说，怎么不买，我们会买的。

哥特瓦尔德请求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这样来写公报，即能够看得出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来访的结果是，苏联会给我们什么东西。

马萨里克和德尔蒂纳请求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帮助他们，想出一个拒绝参加巴黎会议的措辞。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看看，保加利亚当时是如何措辞拒绝参会的，你们彼此商量一下，用必要的措辞说出拒绝参会的理由。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与法国的条约问题，斯大林同志说，就贝奈斯的声明来看，好像我们苏联反对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的友好互助条约一样。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但是我们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条约不要差于和苏联、南斯拉夫和波兰签订的条约。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关于如遭受侵略应立即给予援助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应该立即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它是个小国。

斯大林同志接下来说道，他不明白，作为侵略国，为什么德国的那些附庸国（像奥地利、匈牙利等国）要比德国本国还好。历史告诫我们，不一定要让德国本国成为侵略国，德国也可以在自己附庸国的协助下成为侵略国。因此，苏联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签订的条约要不差于和苏联、南斯拉夫和波兰签订的条约。

马萨里克说，在接见法国大使德让，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与法国的友好互助条约问题时，法国大使直接对他声明，与苏法条约的内容相比较，捷克斯洛伐克对法国的要求更多。

斯大林同志承认，在苏法条约中确实没有关于在遭受侵略时应立即给予援助的条款——这是由于我方的疏忽，但我们计划对该条约的这一部分做一下修改。然而，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却有关于在遭受侵略之时双方立即提供援助的条款，也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哥特瓦尔德说，他还有一些小问题想问，之后，他会就此写信给斯大林同志的。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

会谈结束时，斯大林同志提醒哥特瓦尔德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所有成员说，今天，也就是 1947 年 7 月 10 日，务必要对参加巴黎会议予以拒绝。

马萨里克说，他们明天会讨论这个问题，只有在傍晚前才能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这件事应该立即去办。

代表团感谢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接见，感谢他们必要的建议，并承诺会按约定去做这些事情。

记录人：博德罗夫

《俄罗斯档案文件中的东欧，1944—1953，第一卷，1944—1948》，莫斯科－新西伯利亚，1997，第 672—675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全宗号 45，目录号 1，案卷号 393，页码 101—105

发给约·布罗兹·铁托的电报（不早于1947年8月12日）

斯大林发给铁托同志。

苏联政府认为，把本国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间无限期条约的态度告诉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兄弟国家，这是本国的职责所在。

苏联政府认为，两国政府犯了一个错误，无视苏联政府发出的警告，签订了这个条约，并且还是无限期条约，直到和平条约生效。苏联政府认为，两国政府的仓促行事减轻了英美反动分子工作，让他们可以有更多借口加强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以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

当然，苏联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有结盟关系，因为苏联与南斯拉夫签有关于结盟的正式条约，这和正式的联盟条约是起同样作用的。但是，苏联政府应当警告的是，对于那些未与苏联政府协商就签订的对外政策领域的重要条约，苏联政府不会对其承担责任。

吉连科·尤·斯：《斯大林—铁托》，第 326—327 页

关于莫里森先生的声明

莫里森先生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到两类问题：对内政策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

1. 对内政策

莫里森先生肯定地说，苏联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

莫里森先生大错特错了。苏联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拥有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言论、出版、人身和结社自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和农民俱乐部，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和农民报纸。就工人阶级的组织性而言，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达到像苏联那样的程度。众

所周知，苏联的整个工人阶级，几乎所有工人都参加了工会，所有农民也同样都参加了合作社。

莫里森先生知道这些吗？他显然不知道。不但如此，看来他也不想知道这些，——他更喜欢从那些根据苏联人民意愿被驱逐出苏联的俄国资本家和地主老爷们的控告信中获取资料。

在苏联，那些人民的敌人以及被革命推翻的地主和资本家是没有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的。没有自由的还有那些未能改造过来的小偷，国外情报机关派来的破坏分子、恐怖分子、杀人犯，那些刺杀列宁，杀害沃洛达尔斯基、乌里茨基、基洛夫，毒害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罪犯们。所有这些罪犯，从地主老爷和资本家到恐怖分子、小偷、杀人犯和破坏分子，他们的目的都是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恢复人剥削人的制度，让这个国家沾满工人和农民的鲜血。监狱和劳改营就是为这些先生们而存在的，并且只为他们而存在。

难道莫里森先生要让这些人得到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吗？难道莫里森先生认为，苏联各族人民会同意给这些先生们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吗，也就是说会同意给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吗？

莫里森先生对那些与言论、出版自由等相比有更深意义的其他自由权利避而不谈，也就是说，他一点也没有谈及人民有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不受经济危机、失业和贫穷的自由。莫里森先生也许不知道苏联人民早就有这些自由权利了？要知道，正是这些自由才是其他一切自由权利的基础。是不是因为莫里森先生害羞地没有谈到这些基本自由权利，是不是因为尽管工党已经在英国执政达6年之久，但遗憾的是英国还是没有这些自由权利，英国工人仍然处于资本家剥削制度的压迫之下？

莫里森先生肯定地说，工党政府是社会主义政府，该政府监管下的无线电广播不应受到苏联方面的屏蔽。

很遗憾，我们不同意莫里森先生的观点。在工党当权后的最初阶段，本来可以认为，工党政府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后来，工党政府却与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区别很小，都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保障资本家们的巨额利润。

实际上，英国资本家们的利润在逐年增长，而工人工资却没有丝毫变化，而且，为了维护这种反工人的剥削制度，工党政府用尽了一切手段，直至迫害并逮捕工人。难道能把这种政府称为社会主义政府吗？

本以为，工党上台之后，会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行不断降低大众消费品价格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善劳动者的物质条件。但现在英国却没有这些，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家利润增长，工人工资停止增长，大众消费品价格上涨等。我们不能把这种政策称为社会主义政策。

至于英国对苏联的无线电广播节目（BBC），众所周知，该节目在多数情况下都致力于鼓励苏联人民的敌人恢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显而易见，苏联不可能同意这种反人民的宣传，况且这还是对苏联内政的干涉。

莫里森先生肯定地说，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是一种专权，因为它只代表一个党，即共产党的政权。如果这么认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英国工党政府也是一个垄断政府，因为它也只代表一个党，即工党政权。

但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首先，苏联的共产党人并非单独活动，而是与党外人士联合起来；其次，在苏联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产党实际上是唯一一个反资本主义的人民政党。

在最近的 50 年中，苏联各族人民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俄国存在过的所有主要党派：地主党派（黑帮分子）、资本家党派（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党（右派“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富农保卫者）和共产党。在苏联革命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族人民把所有的资产阶级党派都抛到了一边，并做出了利于共产党的选择，他们认为这个党才是唯一一个反地主、反资本主义的政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显而易见，苏联各族人民完全支持已在战火中久经考验的共产党。

莫里森先生能拿什么来与这一历史事实相提并论？莫里森先生是不是在想，为了那个令人怀疑的反对派游戏，应当扭转历史的车轮，恢复那些消亡已久的党派？

2. 对外政策

莫里森先生肯定地说，工党政府坚持维护和平，不会对苏联造成威胁，北大西洋公约是防御性的，不是侵略性的公约，如果英国走上军备竞赛之路，那也是因为它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二战后苏联裁军不力。

莫里森先生的所有论断都毫无正确性可言。

如果工党政府确实是维护和平，那为什么拒绝签署《五大国和平公约》，为什么反对裁减所有大国的军备，为什么反对禁止核武器，为什么还要迫害那些坚持维护和平的人们，为什么不阻止在英国进行战争宣传？

莫里森先生希望人们能相信他的话。但无论是谁，苏联人民都不可能

相信他的话，苏联人民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宣言。

莫里森先生断言，苏联在二战后裁军不力，他的这一观点也是同样站不住脚的。苏联政府已经正式声明过，苏联政府已让32个年龄段的军人都复员了，目前苏军规模已与二战前的和平时期几乎持平，相反的是，英军和美军的规模则比二战前增加了一倍。但他们还继续拿这些毫无根据的观点来与那些无可辩驳的事实相提并论。

或许，莫里森先生希望苏联连用于国防的军队都不够？军队一向是国家预算的一个大负担，因此，如果没有外来的威胁，苏联人民是愿意撤销正规军的。但我们在1918—1920年有过教训，当时英国、美国和法国（与日本一起）侵犯了苏联，企图把乌克兰、高加索、中亚、远东、阿尔汉格尔斯克边疆区从苏联分裂出去，并在三年间一直折磨我国，——这一教训教导我们，苏联至少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正规军，以便保卫本国独立，免遭帝国主义侵略。历史上从没发生过俄国人侵犯英国领土的事件，但却发生过一系列英国人侵犯俄国并占领俄国领土的事件。

莫里森先生肯定地说，俄罗斯人拒绝与英国在日耳曼问题和欧洲复兴问题上进行合作。这是个十足的谎言。恐怕就连莫里森先生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声明吧。众所周知，事实上拒绝合作的不是俄罗斯人，而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他们知道俄罗斯人不会同意在德国恢复法西斯主义，也不会同意把西德变成侵略的根据地。

至于复兴欧洲经济方面的合作，苏联不但没有拒绝这一合作，反而还亲自提议要在平等和维护欧洲各国主权、没有任何外来强制、没有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制、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对欧洲各国奴役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合作。

莫里森先生还肯定地说，共产党是通过使用暴力手段在人民民主国家获得政权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从事对暴力行为的宣传活动，他的这一观点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只有那些意在诬蔑共产党的人才会允许自己提出这样的观点。

众所周知，共产党实际上是通过普选获得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这些国家的人民抛弃的自然是那些剥削者和国外情报机关的各种间谍。但这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

至于说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那么只有那些一点都没有分寸的人，才会相信，情报局是在从事对暴力行为的宣传活动。共产党和工人党

情报局的文献已经发表出版了一部分，还有一些马上出版。这些文献尽人皆知，它彻底驳斥了那些对共产党人的诽谤谣言。

总而言之，需要说的是，暴力手段和暴力行为并不是共产党人的方式。相反，历史告诉我们，恰恰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和外国情报机关的各类间谍采用了暴力手段和暴力行为。而这种例子可以顺手拈来。就在不久之前，伊朗总理、黎巴嫩总理和外约旦国王在短期内都被暗杀了。所有这些暗杀活动都是为了暴力改变这些国家的制度。谁杀了他们？或许是共产党，是拥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人？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本身就很可笑，对吗？莫里森先生更熟悉内情，也许他能帮我们搞清楚这个问题吧？

莫里森先生要我们相信，北大西洋公约是防御性条约，而并非以侵略为目的，恰恰相反，该条约是以反侵略为目的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该公约的发起者为什么没有建议让苏联也加入这个公约呢？为什么他们还与苏联断绝了往来？为什么他们要背着苏联秘密签订这个公约？难道苏联还没有证明自己能够并且愿意为抵抗侵略而战吗，例如，抵抗希特勒和日本的侵略战争？难道苏联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比公约参与国挪威还要差吗？说得轻些，如何解释这一令人诧异的不当言论？

如果北大西洋公约是防御性的条约，那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同意苏联政府的提议，在外交部长理事会上讨论该条约的性质呢？众所周知，苏联政府曾提议要在外交部长理事会上讨论该理事会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所有条约。英国人和美国人害怕说出这个条约的真相，并拒绝讨论北大西洋公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北大西洋公约含有一些关于侵略苏联的条款，该公约的发起者们又不得不向舆论隐瞒这件事呢？是不是因为工党政府已经同意把英国变成美国用来进攻苏联的军事航空基地了？

正因如此，苏联人才认为，北大西洋公约是意图侵略苏联的条约。

英美统治集团在朝鲜的那些侵略行径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英美军队一直在折磨那些热爱自由与和平的朝鲜人民，毁坏他们的城镇，杀害老人、妇女和儿童。我们能把英美军队的这些流血事件称为是防御行为吗？谁能断言，英军在朝鲜是在保卫英国不受朝鲜人民的侵犯呢？把这些都称为是军事侵略会不会更确切一些呢？

让莫里森先生指出哪怕是一个曾向和平居民开枪的苏联士兵，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士兵！那就让莫里森先生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英国士兵在

朝鲜杀害和平居民？为什么英国的士兵要远离祖国牺牲在异国他乡呢？

正因如此，苏联人民才认为当今的英美政客们是新世界大战的挑唆者。

《真理报》1951年8月1日

注释：莫里森先生，自1951年3月起任英国外交大臣。

与阿根廷大使雷奥波利多·布拉沃的会谈记录（1953年2月7日）

斯大林问道，大使有多久没来苏联了，莫斯科在此期间有没有变化。

布拉沃答道，他已经四年没来苏联了，感到莫斯科的变化非常大，正在进行着宏伟的建设事业。

布拉沃接着说道，阿根廷总统庇隆委托他向大元帅斯大林转达诚挚的问候，并委托他告诉斯大林，阿根廷希望能与苏联加强联系，特别是发展双方的商贸关系。

斯大林说道，对此，我方不会反对。

布拉沃声明，能拜访大元帅让他感到万分荣幸和快乐，这次拜访也会让他铭记一生。

斯大林指出，接见各国大使是他的职责和义务。他问布拉沃，什么会成为阿根廷和苏联之间的贸易对象，阿根廷想在苏联买什么东西，阿根廷又能卖给苏联什么东西。

布拉沃答道，阿根廷外交部向苏联大使列扎诺夫转呈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有阿根廷想从苏联购买商品的清单，以及阿根廷可向苏联供应商品的清单。阿根廷首先想从苏联购买石油钻探设备、石油以及农业机械。而阿根廷方面可以提供皮革、毛织品、植物油及其他商品。

斯大林说道，苏联政府会考虑这一提议的，他还说，苏联对其与阿根廷的贸易很感兴趣。

布拉沃说道，他自幼就对苏联感兴趣，并读过一些有关苏联的书籍，因此，他个人有兴趣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对于苏联所进行的大规模建设及苏联在工业化方面所达到的巨大成就，布拉沃表达了自己的钦佩之情。

斯大林说，强迫人民去建设是不可行的，但苏联人民却是自己想要去建设，这就减轻了建设事业的负担。

布拉沃指出，阿根廷总统庇隆也开展了本国的独立运动。

斯大林问道，难道阿根廷目前还不是独立国家吗？

布拉沃答道，阿根廷是一个独立国家，但之前，国内有很多国外的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它们控制了阿根廷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庇隆总统开展了外国企业国有化运动，已经把一些外国企业收归国有了，尤其是铁路、港口、电气工业、城市交通、屠宰冷藏联合企业等。布拉沃声明，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自由。

斯大林同意这一点。他说道，美国人很清楚，谁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谁就会控制该国家的独立。如果阿根廷能确立本国经济的独立，哪怕是逐步确立这一独立地位，那对阿根廷也是件好事。这对阿根廷会是件好事。

布拉沃说道，现在，庇隆及其拥护者正是这样做的：获得经济独立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独立。他声明，阿根廷希望加强与苏联的文化联系，以及体育方面的联系。

斯大林赞成这个提议。他指出，以前西班牙人都是优秀的运动员。他还问道，阿根廷的体育是否非常强。

布拉沃答道，阿根廷的足球很强。阿根廷希望能派阿根廷足球队到苏联来，同时也希望苏联能派自己的足球队去阿根廷。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他还问到了阿根廷的国语。西班牙语是不是国语？

布拉沃确认阿根廷的国语就是西班牙语。

斯大林说道，他记得，几年前阿根廷的外交部长是蒲拉穆格利亚，同时他还指出，高加索有两个村庄的名字也叫蒲拉穆格利亚。

布拉沃确认蒲拉穆格利亚确实做过阿根廷的外交部长。他说，蒲拉穆格利亚现在是大学教授。

斯大林说，在西班牙战争时期，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是帕斯库阿。他发现，帕斯库阿这个姓在高加索也很常见，他说道，高加索各民族和西班牙民族的语言有某些相似之处。

布拉沃同意这个观点并说道，他计划今年夏天去一趟高加索，因为他觉得，高加索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他们国家的民族风俗习惯很相似。

斯大林指出，很久以前，许多民族就躲进了高加索山区以逃避敌人的迫害。后来，这些民族的后裔就像地质层一样一代代地保留了下来。到目前为止，高加索还有巴斯克人、萨尔马特人和阿尔瓦人的后裔，同时还保留着一些业已消亡民族的后裔。因此，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高加索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开始研究高加索民族构成的学者，一定会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例如，在达吉斯坦有3—4个彼此为邻的峡谷，但生活在其间的民族却操着不同的语言，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话。

斯大林问大使，墨西哥的经济独立状况怎么样？

布拉沃答道，他认为，由于墨西哥极其依赖美国，该国不能自由发展。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

布拉沃说道，现在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都在开展经济独立运动。阿根廷人民对苏联非常有好感，因为他们把苏联视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先锋。一个40人的阿根廷代表团参加了各族人民维护和平大会，其中有来自不同政党、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职业的代表；也有工人。这个代表团中有15人访问了苏联。这15个代表还拜访了大使，并告诉大使，访苏和参观莫斯科企业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参观斯大林工厂的汽车装配车间之时。

斯大林说，以西班牙为例，英美的实力就在于当西班牙首先关心天主教的时候，他们却在极力发展自己的工业。他还指出，要想实现独立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业。

布拉沃完全同意这一点。他说，正因如此，他们才在阿根廷为争取经济独立而战，而且，他们已经在这件事上取得了一些成绩。

斯大林说，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实现独立。

布拉沃说，今年阿根廷的工厂首次为本国农业提供了自产的拖拉机和卡车。

斯大林问道，阿根廷有没有石油？

布拉沃答道，有石油，但油井钻探设备不足。

斯大林问道，有没有石油开采业的专家？

布拉沃答道，有这样的专家。同时他还指出，阿根廷的石油工业已经实现国有化，收归国有了。

斯大林说道，这很好，非常好。

布拉沃事先说，他的以下声明是非官方的，然后他说道，英国在几年前吃阿根廷的肉类是免费的，因为当时的屠宰冷藏联合企业、铁路和舰队都归英国所有，为了向英国出口肉类，阿根廷甚至不得不进行补贴。

斯大林问道，以后还会继续这样吗？

布拉沃答道，以后不会这样了，因为铁路、屠宰冷藏联合企业和港口现在都归国家所有了；但他还指出，阿根廷现在的车辆和铁路设备匮乏。

斯大林说道，我们会为阿根廷提供车辆和机器。

布拉沃表示感谢。

斯大林请他向阿根廷总统庇隆转达自己的谢意，以感谢庇隆总统的问候，并祝愿阿根廷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获得成功。

布拉沃表示非常感谢。他说，他会立刻把这些报告给庇隆。

斯大林说，我们在过去的年代，在沙皇制度下，比如列宁格勒的整个工业和整个波罗的海舰队都使用的是英国的煤炭，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因为我们把英国人赶跑了。因此他们就抨击我们。

对此，布拉沃表示同意。

斯大林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喜欢欺压别人。应该结束这种情况。

布拉沃说，幸好所有的国家都在开展民族独立运动，英国人很快就只能待在自己家里了。

斯大林说，就让他们待在自己的家里吧，而我们也无意侵犯他们的家园。

布拉沃认为，现在，由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英国已不会再决意侵犯别的国家了。

斯大林：不，英国还会侵犯这些地区：马来亚、非洲及其他地区。他指出，英国在比利时和荷兰也有很大的利益。他还指出，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可能会遭到英国的敲诈，但这样的地区正在逐年减少。

布拉沃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希望这样的地区能尽快完全消失。

斯大林说：每一个民族，哪怕是最小的民族，都想过自己的生活。

布拉沃完全同意这一点。他说，每个民族都有这种愿望。

斯大林说，拉丁美洲的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他指出，拉丁美洲国家也许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南美洲合众国的组织。

布拉沃说，幸好拉丁美洲各国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正在进行联合，阿根廷在争取经济独立方面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斯大林说，拉丁美洲国家应当建立某种联盟，这是为了自己的实际目标和经济建设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组织反抗。他还问道，拉丁美洲国家想建立这种联盟吗？

布拉沃说，拉丁美洲国家好像有这种愿望，但只要任何一个国家一开始为经济独立展开斗争，美国就会在报刊上掀起反对该国的敌对运动，并极力指责该国忠实于共产主义，依赖苏联。

斯大林说，这只会暴露出美国领导人是缺乏智慧的，他们有很多钱，但脑袋里的东西却很少。同时他指出，美国历任总统向来不喜欢思考，而更喜欢利用“智囊团”的帮助。他还指出，尤其是罗斯福和杜鲁门曾有过这样的智囊团，看来，这两位总统认为，如果他们有钱，就不需要智慧了。

他问道，大使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布拉沃说，他没有别的问题了。他想声明的是，他有机会向大元帅斯大林致敬，这让他感到无比的自豪，为此他也深表感谢，这次访问他会终生铭记。

斯大林答道，如果将来有必要的话，他还会再次接见大使，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布拉沃说，看到大元帅斯大林身体健康、开心愉快、精力充沛，他很高兴。

斯大林问道，他凭什么能让您如此高兴，他能给阿根廷带来什么好处？

布拉沃说，不仅共产党员，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关心斯大林，所有人都想知道他，都在打听他，读他的著作，也遵循他的主张，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斯大林指出，大使的话显然是言过其实了。

布拉沃说，他的话都是真心的。

斯大林说，他不怀疑他的真心，但其他国家的人们夸大了他的作用。只要有人称赞，就会有人响应，然后，所有人就都开始称赞。

布拉沃说，无论怎样，他都深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被如此频繁地谈论，除了斯大林。

斯大林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有人称赞他，也有人抨击他。比如丘吉尔。

布拉沃再次感谢能让他这么荣幸，他说，他非常高兴能给他这个与大元帅面谈的机会。

这次会谈就此结束，历时 40 分钟。苏联外交部部长安·亚·维辛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谈。

此次会谈由维辛斯基同志与科洛索夫斯基同志记录。

《独立报》，2003 年 3 月 4 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1，案卷号 250，页码 3—11

六　斯大林论中国问题

本节主要翻译者、校对者为：
赵旭黎　余　哲　袁再旺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26年9月16日）

莫洛托夫：

你好！

9月12日的信已经收悉。

1）与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科普之间的误会已经彻底消除了，这很好。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断送我们的政策，这些人就会被张作霖和日本人俘虏，而我们同样也会被这些人所俘虏。顺便说一句，张作霖的实力就在于，他现在知道（科普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已经向他解释清楚了），我们不会进行军事干涉，就是在半年前，我们当时也没想进攻哈尔滨，因此他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厚颜无耻地将“这事”出卖给日本人或者（尤其是）英国人，以换取这种或那种援助。秘密就在这。科普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由于多嘴多舌）将我们的外交机密告诉了张作霖，说我们只想吓唬吓唬张作霖，并不打算为中东铁路而战。他们想用温和和藏不住秘密来收买张作霖和日本人！在这件事上，他们还有分裂性的目标，这一目标是按照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路线，在李特维诺夫的协助下制定的，关于这一点，我就不提了……

2）现在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张作霖将仅仅局限于刺杀活动，在这段时间，事情还发展不到夺取中东铁路的程度。张作霖和假手张作霖的日本人（还有英国人）在摸索和试探我们的反抗力量。正因如此，现在本来不必召回加拉罕。但是，仅仅是因此而已。因为我感觉，加拉罕已经完全陷入了冯玉祥和其他中国“军阀”的阴谋诡计之中，从我们对中国

政策的实质来看，他现在是一个负面人物。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势必将明确提出关于中东铁路和张作霖的问题。

……

目前就是这些。握你的手！

1926 年 9 月 16 日

约·斯大林

《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书信集，1925—1936》，第 88—91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558，目录号 1，案卷号 5388

注释：冯系，即冯玉祥将军的支持者。1925 年，苏联代表和冯玉祥建立起联系，当时冯玉祥的部队控制着中国北方的很多地区，1925 年年底攻占了天津。冯玉祥自称是国民革命的拥护者，许多苏联军事顾问被派来中国，听从冯玉祥的指挥，同时苏联也给了他很多资金援助。1926 年冯玉祥在中国国内外的各种势力之间随机应变。

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节选）（1926年9月23日）

8）关于中国，别再放任加拉罕了，——他会把这事搞砸的，真的。他已经过时了，因为他曾经是，并且一直都是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全权代表，作为一个极其肤浅和目光短浅（就革命视野来说）的人，他现在没法理解，将来自己也不会理解新发生的这些事件，在如今中国和世界的新形势下，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完全适应不了这个职位。而胆量、蛮横、自负和傲慢他样样不缺。这些才是尤其危险的。加拉罕永远也不会明白，汉口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了……

好吧，握你的手。

1926 年 9 月 23 日

约·斯大林

又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就联合抗议炮轰万县问题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出公开呼吁，我不相信这是正确的。结果是，我们不仅没有必要地刺激了总委员会，还刺激了保守分子。需要这样吗？最好选择别的更加有效的方法。

《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书信集，1925—1936年》，第93—95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58，目录号1，案卷号5388

致克·叶·伏罗希洛夫的信（1931年11月27日）

克里姆：

你好！

信已收到。有关日本的事件很复杂和严峻。看来，日本不仅打算占领满洲，而且还企图通过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人马来占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然后再用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人组建中国政府（与南京抗衡）。不但如此，日本会把手伸向我们的远东，也很可能伸向蒙古，不排除这种可能，甚至很有这个可能，其目的就是用增加新地盘来满足自己安插在中国的代理人的自尊心，靠让苏联吃亏来弥补中国人的损失。

今年冬天，日本可能不会进犯苏联。但明年它可能就会做这种尝试。长久盘踞满洲的愿望把日本推上了这条路。但除非日本能成功使中苏结仇，否则就不可能长久盘踞满洲。为此，日本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帮中国封建主夺取中东铁路，占领蒙古和远东沿海地区，并让那些完全听命于日本的代理人上台执政。

通过实施这一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希望：

①防止日本和中国华北地区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染”，②使中苏两国间相互接近失去可能，③在大陆为自己建立广阔的经济和军事基地，④依靠此基地准备与美国的战争。如果不实施这一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应该会感到自己身处险境——美国正在军事化，中国正在进行革命，苏联正在快速发展，并急欲向海洋进军，而日本就夹在这几个国家中间（我觉得，日本人会认为，再过两年，当苏联在远东把一切都准备妥当的时候

就已经晚了）。

实施这一帝国主义计划要取决于一系列条件。我认为，①如果其他帝国主义大国（首先是美国）不反对日本（目前看来，希望很小），②如果中国的抗日运动和抗日军事行动没有迅速高涨起来（现在看来，希望也很小），③如果日本没有突然爆发大的革命运动（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迹象），④如果我们不马上采取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和非军事预防措施，那日本人就能实施自己的计划。

日本人装作很满意李维诺夫的声明和我们的中立。他们还向我们提议，要签署准备已久的邮政协定（如广田弘毅所说，“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的关系并不差”）。我们同意了。他们提议开启关于鱼类捕捞的谈判（抱着同样的目的）。我们也同意了。但如果相信日本帝国主义者“友谊”的真诚，那就太天真了。这一切都是他们需要的伪装，是为了麻痹我们，同时，也是为了在那些“大国”面前炫耀与我国的“友谊”。当然，我们也没有放过在波兰面前显示我们与日本“正常”关系的机会。近日，我们借帕捷克和李维诺夫进行一次会谈的机会，立刻向帕捷克声明，我们认为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已经开始了。帕捷克支支吾吾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但这帮不了他，因为第二天就发表了塔斯社关于谈判已经开启的声明。帕捷克只好接受这个事实。谈判正在进行，尽管很难说会有什么结果，但鉴于远东发生的事情，即使只是与波兰进行谈判的这个简单事实，也会让我们受益匪浅。

当然，这些都还不错。但是，现在这并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准备远东的防御。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一领域做一些事情了。但这个不值得一写。最好等你来了再说吧。很遗憾，你现在不在莫斯科。是不是很快就要来了？

握手。

你的斯大林

1931 年 11 月 27 日

《苏联领导人书信集，1928—1941 年》，第 161—163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74，目录号 2，案卷号 38，页码 48—51

七　斯大林论文学艺术工作

本节主要翻译、校对者为：
赵旭黎　袁再旺　余　哲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便函(1922年7月3日)

政治局全体委员：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持亲近我们的年轻诗人，以此将他们拉拢过来，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适时的。我认为，某些“无产阶级思想家”（波格丹诺夫和其他人）曾经大量写过和谈过的苏维埃文化（指狭义）的形成现在才刚刚开始。在新的舞台上，倾向于苏维埃政权的年轻诗人和作家与各种各样的反革命派别和集团进行了斗争，看来，这一文化应当产生于两者斗争的进程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将有苏维埃思想倾向的诗人团结到一起，在这一斗争中支持他们。我认为，将年轻作家团结起来的最合理的方式，比方说，就是组建独立的“俄罗斯文化发展协会”，或者其他类似组织。试图将年轻作家安排进书刊检查委员会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机构的做法，只能让年轻诗人感到反感，把事情搞砸。这种协会的会长一定要委派无党派人士去干，但需有苏维埃思想倾向，比如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物质支持，其中包括津贴（表现为可以接受的某种形式）在内，都是绝对必需的。

为了明确该问题，附上宣传鼓动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同志对我的相关征询的答复。

约·斯大林

《史料》，1995 年第 6 期，第 133—134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号 3，目录号 34，案卷号 185，页码 5

致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节选）（1931年9月12日）

3）美国作家辛克莱先是给哈拉托夫寄来一信，随后又给加里宁写了一封，信中请求能对辛克莱和爱森斯泰德（文中如此。此处应指谢·米·爱森斯坦——编者）（从苏联叛逃的“我们的”著名电影工作者，托洛茨基分子，如果不是更糟的话）已经开始从事的某事予以支持。看来，爱森斯泰德（文中如此。——编者）想通过辛克莱骗我们。总之，这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我建议：a）在我回来之前先把这个问题搁一搁；b）在中央委员会大体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建议哈拉托夫和加里宁不要给辛克莱回信。

祝好。

约·斯大林

《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的书信集，1931—1936 年》，第 100—101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81，目录号 3，案卷号 100，页码 112—113

注释：1929 年夏，谢·爱森斯坦前往美国，然后又去了墨西哥，在美国作家厄·辛克莱及其妻子的资助下，开始拍摄电影《墨西哥，万岁！》。尽管辛克莱的资金大大超支，可是爱森斯坦却没有拍完电影，也没有考虑返回苏联。这位美国作家已经不能再继续投资了，因为谢·爱森斯坦是苏联著名导演，他便向苏联领导人提出请求，补偿自己的部分支出（2.5 万美元），以便能继续拍摄电影。在因国家实施加快工业化而导致的最为严厉的外汇节约制度之下，对于全苏电影制片联合公司和苏联政府来说，辛克莱的信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外。由于爱森斯坦后续的创作计划还完全不明朗，更不用说还怀疑他会不会再回到祖国，因此，苏联政府不会承担无论是现在还是后续的用于他的电影的外汇开销。斯大林在 1931 年 11 月 21 日发给辛克莱的电报中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见本卷）。

与爱森斯坦吵架之后，辛克莱拒绝继续向他提供帮助，并把墨西哥的

材料都保留在了自己的身边。爱森斯坦别无他法，只好返回苏联。不久，他被选中参加首届作家代表大会，是电影导演中唯一入选的，出席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了不少作品。（参阅：格罗莫夫，《约·维·斯大林：艺术和权力》）

还可参阅：《1932 年 6 月 4 日写给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电影《生活规律》会议上的发言的速记记录未经修改稿(1940年9月9日)

现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我想说一个与阿夫杰延科的书不相关的问题，即对文学的态度问题。有一种对待文学的态度是真实和客观。这种真实和客观的态度是否意味着，这种态度可以和应该是不偏不倚的——只不过像画画和拍照一样？那又能否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想要成为真实客观的人的文学家与照相机等同看待？绝对不能。也就是说，真实性和客观性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而应该是活生生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会同情某个人，也会不大喜欢自己作品中的某个主人公。也就是说，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普列汉诺夫说过，文学不可能没有倾向性的，当理解了这点之后，可以得出结论，文学应当服务于某种环境、某个阶级、某个阶层。所以文学不可能是某种照相机。不应该这样去理解真实性。文学不可能没有激情，文学会同情某个人，憎恨某个人。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文学，也就是说从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角度。

要求文学作品为我们塑造敌人的所有主要形象，这是对还是错？错的。有不同的写作手法——果戈里的写作手法或者莎士比亚的写作手法。他们的作品都有著名的主人公——反面的和正面的。读莎士比亚、果戈里或者是格里鲍耶多夫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带有反面特征的主人公。所有的反面特征都会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我比较喜欢另一种写作手法——契诃夫的写作手法，他的作品中没有主人公，只有一些普通人，但却反映了生活的主流。这是另外一种写作手法。

我比较喜欢的手法是不把敌人的形象塑造成恶魔，而是塑造成一种仇视社会但又有一些人性的人。即使最卑鄙无耻的坏人也有人性，他喜欢某

些人，尊重某些人，也愿意为了某些人而牺牲自己。他的身上就有某种人性。我建议把敌人塑造成这种样子，强大的敌人。我们大声抱怨的时候，又有什么优点呢——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进行阶级斗争，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突然被打死了。敌人们也经常大声抱怨，说他们并非如此软弱。难道就没有厉害的人吗？为什么不描写一下布哈林呢，无论他是怎样的恶魔，他还是有些人性的。托洛茨基是敌人，但他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毫无疑问，应该把他描写成一个具有反面特征，但同时也有优秀品质的敌人，因为毫无疑问，他是拥有这些优秀品质的。

问题绝不在于阿夫杰延科把敌人描写得都很正派，而在于他没有注重描写我们的同志。我们需要真实性，完全合乎要求地去描写敌人，他们不仅具有反面特征，而且也有一些正面特征，比如在反对社会时所体现出的顽强、始终如一和勇敢。这些特征很招人喜欢，为什么不刻画一下？问题不在于阿夫杰延科同志把敌人描写得比较正派，而在于他把那些打败敌人、率领国家的胜利者都搁在了一旁，用的笔墨不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才是主要的不客观和不真实。

我们在此多次讲过，不要纵容那些年轻的新作家，不要过早地提拔他们，因为他们会因此而晕了头，变得堕落。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也不应主张在职业文学中搞某种行会习气。出现过这种事：一个学徒可能很有才，但这里规定了期限。帮手可能比师父要高明得多，但既然规定了期限，他就应当做完。之后会有人打他一耳光，然后他就成了师父。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这是说的什么话，宣扬这种高论？如果年轻作家中出现了一些人，其天赋和才能不逊于某些老作家，你们怎么办，会压制他们吗？你们这样会摧残这些有才能的人的，他们的天赋是上帝赐予的，他们也想成长。你们应该让他们成长，应该关心他们，要像园丁照料花草一样去照顾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打破这种行会习气。应当结束这些行会惯例，否则就永远也不会提拔到人才。

以我国最优秀的将领苏沃洛夫为例。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农奴主和贵族，本身还是伯爵，但实践告诉他，需要打破某些常规，于是他提拔了一些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人。也正因如此，他才围绕自己组建了一支能摧毁一切的军队。有人不大喜欢他，因为他打破了行业陈规。“他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统帅，但是，他有一个如此高贵的家族，在宫廷里也有很好的人情关系，也很讨人喜欢——人们怎么会不喜欢他？”然而，他提拔了一

些默默无闻的人，打破了行业陈规。因此人们不喜欢他，但他毕竟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有才能的人和一批好的统帅。

如以列宁为例，也是如此。列宁是怎么锻炼干部的？如果他只看到那些在党内领导干部职位上干了10—15年的人，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但却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如果他那时没有注意到这点，没有打破党龄的陈规，那早就完蛋了。

文学、党和军队——所有这些都是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不等老细胞死去就需要更新某些细胞。如果我们一直等到老细胞死了后才去更新细胞，那么我们就会完蛋，我向你们保证。

我赞成针对提拔年轻人的这些变动，但不准限制人、不重视人。

这条意见与我们这里经常提到的成千上万的拟鲤（苏联最常见的淡水鱼类之一，通常长不大。——译者注）有关，因为很少有岁数大的拟鲤。当然，拥有一批老文学家当然是好事，这是不可多得的，是宝贝，但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们党内也有一批老同志，他们的心从来都没有见老，还可以接受一切新鲜事物，但这样的老同志也同样太少了。如果你们仅仅以他们为基础建立文学阵线，仅仅依靠这些永远也不见老的老同志，——不见老的这种老同志是有的——那么你们的队伍就不会很庞大，也不会长久，因为这些老干部，他们终究会死的。由此就有了关于新作家的问题。我们在此曾经提到过拟鲤，成千上万的拟鲤。我们党内也有一些平庸的人，名不见经传，中央委员会对他们也只是或多或少知道一点，暂时没有任何出众之处，但却很有才能。这种人是有的，要多指导和培养他们，他们中通常会出来一些优秀的工作人员。我们大家都曾经是平平常常的人，有人一次又一次地改正我们的错误，需要指出的地方也给予指出，于是从平常的拟鲤成长为不错的工作人员。我们这的拟鲤非常多，因此不应当忘记他们，而应当培养这些拟鲤，而不是说他们是为了出头。不能这么做，这非常欺负人。对这些人的培养及挑选工作应该要有耐心。如果20人中能挑出一个来，那就很好了。届时你们就会有一支完整的文学家队伍。我们的国家很大，所以我们也应该有很多文学家。如果一个人很有天赋和才能，那就应该提拔他，帮助他向上发展，甚至可以破格提拔。有时候，不破除一些东西就不会有任何结果。

关于万达·瓦西列夫斯卡亚。为什么会喜欢她的作品？她的作品中有许多平凡普通的人，不起眼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却很好地反映了生活，

都是作者精挑细选的。我不认为她是最出色的女作家，但我认为她相当有才华，写得也很好，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把她给埋没了。她自己也不往上爬。你们读完她的作品，就会发现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我们有很多有才华的著名人物。哪怕是以潘费罗夫为例。他有个好职位，但是当这个人努力提高自己水平的时候，他总的来说还是会写作的。这个潘费罗夫是个名人，但我向你们保证，万达·瓦西列夫斯卡亚将来能超过潘费罗夫，可现在没人理她，她被认为是外国人，可却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现在谈谈阿夫杰延科同志。我已经说过了，要明白问题不在于他有什么错，也不在于他把敌人或者我们敌人的朋友的形象描写得极其正派，不是恶魔，而是有着每个人都不会没有的某些良好品质的人。如果你仔细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即使是最坏的下流货也有一些好的品质。他可以为好朋友牺牲自己的性命，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把敌人描写得太好，而在于那些揭穿这些敌人的人并不是苏联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例如，我们曾有 2500 万—3000 万人挨过饿，粮食不足，这不现在开始过得好了。我们党内的敌人是这么盘算的——把这个送给德国人，这个送给日本人，我们这辈子土地足够了。但我们所做的却正好相反，我们不会送给别人任何东西，相反，我们会扩大社会主义战线。难道这不好吗？难道从世界各种力量斗争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不好吗？我们扩大社会主义建设战线，这是对人类有利的，因为我们把立陶宛人、西白俄罗斯人和比萨拉比亚人从地主、资本家、警察及其他恶棍的压迫下解救了出来，他们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幸福。这是从各国人民的角度来看的。而如果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的斗争来看，这也有巨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在扩大社会主义战线，缩短资本主义战线。

在阿夫杰延科的作品中，应该去战斗的这些人物，却被描写成衣衫褴褛、平庸和无知的人——这些人怎么能打败敌人呢？阿夫杰延科的全部错误都在于，他没有注重描写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兄弟，对他们用的笔墨不够。他非常了解敌人，和他们相当熟悉，甚至可以把他们描写成带有正面和负面两种特点的人物。但他却不了解我们的现实。真是难以置信，——他不了解因此就没有注意到?!

下面谈谈《生活规律》这部电影。为什么用“规律”——没有解释。您想干什么？“这就是你们，布尔什维克先生们，无论你们怎么解释，生

活规律确实存在，以我对爱情的理解看，这种爱情也终会如愿以偿，因为有生活规律”。他缺乏把这个说到底的勇气，但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却明白，爱情是什么。

奥格涅鲁博夫是好样的，是个勇士，因很多人的愚蠢而牺牲了。一下子就表决了。有这样做的？英雄牺牲了，天才们进入了一个受到约束的环境，我们的衣衫褴褛者和已经牺牲了的英雄的环境。简直有点像那个被环境扼杀的恰茨基。

描写我们的人时用的笔墨不够。在这里，他违反了要服务于某项事业的原则。感觉他支持某些人，又不支持某些人。我想知道，他支持自己书中的哪个主人公？无论如何，不会是布尔什维克。不然，为什么他在描写真正的人的时候用墨不够呢？奇卡洛夫一家和格罗莫夫一家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总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因为要有产生英雄的环境。为什么在描写好人时用墨不够？为什么没用笔墨来描写不好的品质呢？为什么在描写建设新生活时又用墨不够呢？为什么没用笔墨描绘生活呢？因为他不支持这些。

你们会说我言过其实了。我倒是也想搞错，但是我认为，他未必会支持布尔什维克。

比如在 1934 年。要知道那时有人帮他改正了错误，都是同样的错误。后来，1938 年又有人帮他指出并改正了错误。可无论如何他还是我行我素。他的这个阵营日渐壮大，而我们的阵营却退居次要地位。还说，我是无产阶级出身。唐璜也不是出身于花花公子。唐璜曾经是个……怎么会这样顽强？

有部名为《生活规律》的电影。同样用了许多笔墨。怎么会这样？这是个错误吗？不，这不是错误。一个过于自信的人，为人们描述生活规律——差不多就是专门教育青年人。规律！这个错误始于 1934 年。如果当时没有警告他，没有指出他的错误，那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但那时有来自中央委员会的警告和《真理报》的评论，而他却仍然继续干自己的事。

揣测他人的内心——我不会去干这事，但我也不想成为幼稚的人。我认为，他是敌人的残余势力——萨尔基索夫、卡巴科夫的人——所以他和敌人颇有相似之处：“我生活在一帮蠢人之间，无论如何我的作品都能通过，没人会注意到，我会拿到钱，谁需要的话，会明白的，让那些蠢货都

见鬼吧，就让他们还做自己的傻瓜去吧。”

《电影艺术学报》1993/1994. 第 20 期，第 104—114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77，目录号 1，案卷号 907，页码 72—82

注释：阿夫杰延科·亚·奥，苏联作家和电影编剧，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我爱》的作者，1936 年根据这部小说拍摄了一部电影。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944年1月31日)

多夫仁科同志写了一部名为《战火中的乌克兰》的电影剧本。

客气地讲，这部电影剧本篡改了列宁主义，篡改了我们党在基本和根本问题上的政策。多夫仁科的这部电影剧本包含有最拙劣的反列宁主义性质的错误，这是对党的政策的公开攻击。

任何一个读完多夫仁科的剧本《战火中的乌克兰》的人都会肯定地说，事实就是如此。

多夫仁科为自己的这个剧本所写的前言虽然篇幅不大，但非常能说明问题。这篇前言中有这样几句话：

“如果由于我的感受、疑惑或者误解太过激烈，我的见解实际上成为不合时宜的，或者和其他见解相比较，我的见解太过痛苦，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如此。”

不难看出，他写这篇前言的目的。看来，多夫仁科清楚地知道，从政治的观点上来看，他的剧本远非都是令人满意的。显而易见，如果他那部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作品被人揭穿，他便试图用这个不成其为理由的推脱来保全自己。

首先，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多夫仁科的电影剧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中本应全面展示列宁主义的胜利，以及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红军是如何成功地把当今的乌克兰从德国侵略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的，但书中对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却只字未提。

这并非偶然。

说这并非偶然，是因为多夫仁科修正党的政策，批判党所做的消灭苏联人民阶级敌人的工作。众所周知，党的这项工作是在列宁主义精神的指引下进行的，与列宁的不朽学说完全一致。

多夫仁科这部电影剧本中的主人公扎波罗热茨向准备审判其在德国占领期间担任村长工作的游击队员们说：

“‘你们已经习惯了阶级斗争，就像酒鬼习惯了家酿酒一样！哎哟，阶级斗争会让我们都走向死亡的！打死我吧，求你们了，打死我吧，来呀！让克劳兹上校高兴去吧。请维护路线的纯洁性吧！’

‘我们彼此都极力想要智胜对方，无论是铁扫帚，还是烧红的铁，都要全部一个一个地彻底铲除，然后再以此来嘲笑和挖苦敌人。只要路线是纯洁的，哪怕地上空空如也都无所谓！嗬，就让德国人开心一会儿吧，赶紧超额完成我们的自杀任务吧！打死他这个败类！’

‘闭嘴，傻瓜！……我不了解现在的阶级斗争，也不想去了解。我只知道祖国！人民在牺牲！我是德国工人和农民的奴隶！’扎波罗热茨突然喊了起来，令人感到恐怖。‘我的女儿也是奴隶！开枪吧，阶级纯洁性的维护者！哎，你到底怎么回事？’”

因此，多夫仁科在此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他企图诬蔑党的政策，诬蔑党消灭富农阶级的全部实际行动。对于每个共产党人和真正的苏联人来说，像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和党的路线的纯洁性这些概念是非常神圣的，而多夫仁科却放任自己嘲笑这些神圣的概念。

多夫仁科想不到这个对所有苏联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普遍真理，如果我国没有消灭剥削阶级，那么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就都不会如此强大、如此有战斗力、如此统一，就如同他们在当前反对德帝国主义的艰难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多夫仁科不明白，现在的卫国战争同时也是阶级斗争，因为，强盗般凶猛的帝国主义者侵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征服、毁灭苏联体制，奴役并消灭我们的人民。正是这种情况，而非任何其他情况，导致仇视工农的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势力，而在战争期间与德国侵略者这个我们凶残的敌人站到了一个阵营。别人我不知道，反正多夫仁科应该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佩特留拉分子和其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站在德国侵略者一边来反对乌克兰和全苏联人民。这些背叛祖国的卑鄙叛徒，这些苏联人民的叛徒，在杀害我们的儿童、妇女和老人时，在毁坏我们的城市和村庄时，一点也不逊色于德国人。他们已经

完全投靠到了德国恶棍那里，成了乌克兰人民的刽子手，并积极作战以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我们的红军。如果多夫仁科立志要写真实的作品，那他就应该在自己的剧本中抨击那些叛徒们。但看起来，多夫仁科好像不能容忍这个事实的存在。否则，多夫仁科在电影剧本中并没有揭发这些背叛乌克兰人民的卑鄙叛徒的真面目，这该如何理解呢？他们在多夫仁科的作品中没有出现，就像这些人不存在一样。多夫仁科的勇气还不够，他还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将这些叛徒钉在耻辱柱上。

接下来，多夫仁科还胆敢批判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和实际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为了苏联人民、红军和我们国家能为眼下的战争做好准备。

在多夫仁科的电影剧本中，集体农庄庄员库普里扬·胡托尔诺对自己的几个逃兵儿子说：

“‘你以前保卫沙皇，从没逃跑！你对谁宣过誓？’他转向帕夫洛问道。

‘现在没有上帝！’逃兵儿子喊道。

‘你瞎说，有上帝！有祖国！’

‘根本没有谈到这个，教的都是阶级。所有人又都跑了’，帕夫洛肯定地说。

‘我不让你们跑！我以前保护过沙皇，没退缩过，可你们却不能保卫自己的政权。’

‘装甲太薄了，爸爸！’”

“装甲太薄了”这句话在多夫仁科的电影剧本中出现了好几次。

多夫仁科编造出这句话是为了说明：“苏联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苏联人民也是手无寸铁的。”

多夫仁科不明白那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事实，那就是德帝国主义者们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就是：侵占别国土地，奴役其他民族，在战争开始前很长时间，就逐渐让本国经济和军队为侵略战争做好全面准备，在开战前几年就把本国工业都转到军工轨道上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准备，也不可能准备去侵略别国土地，奴役其他民族，没有准备，也不可能准备去发动侵略战争。应该能够看到这个区别，如果用诚实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事，就不难发现这个区别。

但在希特勒德国突然的、背信弃义的进攻面前，苏维埃国家绝对不是

手无寸铁的。这是因为，我们在这点上遵循了列宁的遗愿，他生前警告我们党和人民，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早晚会进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所以我们应该对残酷的战争做好准备，做好为保卫祖国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准备。所以我们已经为这次防卫战争做好了准备。当然，准备这场防卫战争之时，我们不可能像希特勒德国那样充分，他们是根据征服全欧洲的标准建造了本国的军队和工业，甚至不仅仅是征服全部欧洲国家的标准。在发展我国的军事力量和国民经济的时候，我们的党和苏联政府是如此的深谋远虑，当时，党和政府让苏联国家和苏联人民对这个战争有所准备，以使他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能够面对面地经受得起德帝国主义战车的全力攻击，能遏制住数以百万计的装备很好的敌军侵略部队的进攻，然后，动员人民的力量，把经济转到军事轨道上来，成功地击退侵略者，并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

已历时两年半多的卫国战争的教训告诉我们，在所有没有侵略目标的民族中，即使与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强国相比，实际上我们国家和人民也是对反德帝国主义战争准备最好的。事实就是如此。如果多夫仁科立志要写真实的作品，那他就应该在电影剧本中提到这个。但是，原来多夫仁科不能容忍这个事实的存在。

列宁后来警告我们说，苏维埃共和国应该为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进攻做好准备。列宁是党的领袖和导师，是我们民族的智者，是一个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专家，为了应对将来战时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他为党和国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由于业已形成的历史环境，当然，首先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我们才能及时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刚刚出现的组建反苏军事联盟的图谋，并使日本、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当前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原本会与我国敌对，而现在这些国家却没有加入敌对我国的阵营，而是和我们一起组成了军事联盟来抵抗德帝国主义。众所周知，德帝国主义是最有掠夺性、最阴险恐怖的，是帝国主义里最坏的一种。英美的资本家把德帝国主义强盗般的掠夺性视为威胁本国的最直接的不安全因素。我们党正确地注意到了这个形势，并通过巧妙的对外政策保障了强大的反希特勒国家联盟的建立，英国和美国与我们在同一阵营里对抗德国人。这样，我党的列宁主义方针政策就在这里取得了胜利。

如果多夫仁科想要写事实，那他就应该把这些写上。但遗憾的是，真

实性并非是多夫仁科的创作特点。因此，他更喜欢的是掩盖这个事实，不但如此，他更喜欢批判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

多夫仁科在这部电影剧本中批判了我党的集体农庄建设政策。对此，他的描写让人们有一种感觉：好像是集体农庄制度扼杀了人们的人格和民族自豪感，削弱了苏联人民的力量和坚定性。在多夫仁科的这部剧本中，集体农庄女庄员赫里斯佳成了一个意大利军官的情妇，当面对游击队员的审判时，

“‘我知道，我不可能从这里活着出去了。’她手抚胸口：‘不知因为什么，这里有人告诉我，我的死期到了，说我所做了不该做的坏事和犯法的事，说我没有你们所说的民族自豪感、荣誉感和人格尊严。告诉我，哪怕在我临死前告诉我，为什么我就没有这些东西呢？人们啊，这些东西究竟在哪里！我出身清白……为什么却成了一个没有自尊、没有尊严的下流女人呢。为什么战前你们在我们这里主要以工作日和公担（重量单位——译者注）来衡量我们少女的美德呢？我是民族主义者？我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里，多夫仁科否定了一个简单而毫无异议的事实，那就是集体农庄制度不仅使苏联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精神上更加强大，如果没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不可能顺利作战。想象一下吧，如果农村中的富农保留了下来，而集体农庄却没有。每个人都知道，粮食和工业用的农业原料在相当的程度上都会集中到富农的手里。他们就会迫使我们接受食品和原料的任何投机价格，让军队和工人中心没有面包，没有粮食。富农们就会极力用饥荒来扼杀人民，给苏维埃政权背后来一刀。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那只是因为，我们把多夫仁科看来非常崇拜的那些富农作为一个阶级给消灭了，并成功地建立起了集体农庄。

多夫仁科不明白，他也不想搞明白，只有集体农庄才能真正地解放苏联妇女。正是由于集体农庄的存在，苏联的妇女们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主人，是社会主义国家享有充分权利的自由公民。多夫仁科所嘲笑的工作日让妇女成为真正的人。正是由于工作日的存在，妇女们在经济上不再是家庭和丈夫的附庸了。她们大量工作日都在挣钱，在经济上已经独立了。这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而不是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空谈，尽管资产阶级政客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如此努力地研究妇女解放问题。

接着，民族主义遮蔽了多夫仁科的意识，以至于他看不到对所有人都

显而易见的我党通过发展人民的自我政治意识、提高其文化水平所作的这项极具教育意义的工作。有人用带有成见的、反列宁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党和国家所做的极具创造力的有进步性的伟大工作，只有这种人才不会注意到苏联人民的团结性、政治主动性、政治意识和文化水平的空前高涨，这种局面的形成只有在我们共同成功的基础上才会成为可能。

多夫仁科写道：

“他们已经习惯了常见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受不到禁令和征召的庄严性，他们漠不关心的性格还达不到可以理解历史进程的高度，而这段历史就是号召他们去参加那场非凡的大规模战争。没有人可以成为他们的榜样——他们那些光荣的历史前辈、伟大的战士们成不了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那些家乡的革命英雄们成不了他们的榜样，因为农村不缅怀这些英雄们。在命运的首次打击中，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誓言，因为‘神圣的’这个词汇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精神上是赤手空拳的，是幼稚的，是目光短浅的。”

多夫仁科用一个德国军官的话，用敌人的话如此评价苏联人民：

“这个民族有一个无法遮掩，也从来没有掩盖过的致命弱点。即使是为了共同利益和崇高利益，这些人也不会宽恕彼此的意见分歧，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能力。他们没有国家意识……你知道吗，他们不学历史。这太奇怪了。他们已经在否定上帝、个人财产、家庭和友谊的反面口号下生活了25年！民族这个词在他们那里只剩下了形容词的意思。

他们那里没有永恒的真理。所以他们中才会有那么多叛徒……这就是灭亡他们的秘诀。我们没有必要全部消灭他们。你知道吗，如果我和你都机灵点的话，他们会自相残杀的。”

随后，多夫仁科没少对这部剧本下功夫，以便证明这个评价的正确性。

多夫仁科怎么可以用如此荒谬绝伦的话来诋毁苏联人民呢？

在批判我们党和国家关于人民教育的工作的同时，多夫仁科并没有停止歪曲乌克兰的历史，其目的就是诽谤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

在多夫仁科的电影剧本中，遭受德国压迫的乌克兰农民彼此交谈道：

“‘是的，据说，历史上某个时候，也有人不止一次地压迫过我们这种人。’

‘是谁啊？’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哦，他是个大坏蛋！战前，他的马刀就挂在切尔尼戈夫的博物馆里。那里还有一幅很大的题词：“这是残害乌克兰人民的、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马刀，正是博格丹扼杀了人民革命。”那把马刀被放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他的 12 幅肖像画却被锁在地下室里，从不示人。据说，那些肖像画能让人们产生疑惑！哎哟!’”

电影剧本的主人公扎波罗热茨说道：

“我们是那些糟糕的历史学家吗？我们不会彼此宽恕吗？我们的阶级斗争书中没有表现出民族自豪感吗?”

还用说吗，所有这些都是对事实真相的厚颜无耻的嘲笑。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正是苏联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妥善保护了乌克兰民族及苏联所有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

多夫仁科还污蔑我们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以及红军的领导干部，把他们塑造成了野心家和追求私利、脱离人民的蠢人。

多夫仁科这样描写我们的领导干部：

“他们中有很多都是毫无用处的人，连什么是民族悲剧都不知道。发育不全的普通人的关系，无聊的形式主义，麻木不仁的主管部门，或者只是人类想象力的缺乏和愚蠢的利己主义，所有这些都让他们乘坐国家的汽车从伤员边上穿过。

‘同志们，可怜可怜吧！……’伤员们乞求道。

‘站住，要不我就开枪了啊!’伤员罗曼·扎波罗热茨喊道：‘站住!’

‘哎哟，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这么差劲?’一个被打断腿的小伙子哭诉道：‘指挥官同志，多宏伟的纲领啊！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可您倒是看看，我们都什么样儿了！把伤员都他妈给送回去吧，求您了!’——他哭了起来。

那些车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飞驰而过。”

他这样描写红军的领导干部：

“‘爸爸，我们的将军完蛋了！自杀了，他妈的，大地母亲没有接受他!’

我们都慌了。

‘去找团长!’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被鬼捉走了吧！’

‘快去追啊。’

‘爸爸，桥都被炸毁了。我们都不会游泳啊。’”

他这样描写苏维埃工作人员：

“他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秘密文件、秘密事件、秘密命令、决议和决议。这提高了他在市民眼里的地位，也让他在多年间都特别受尊重。他通过这些让自己的土头土脑和傻里傻气成了机密，也让自己对人的极度冷漠成了机密。和任何萎靡不振、无精打采的人一样，他缺乏想象力。他已经适应了自己的岗位。老实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唯一保密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愚蠢——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让它成了机密。”

“他不爱别人。他只爱自己和上级的指示。”

多夫仁科说，被德寇夺取的苏维埃政权得到恢复之后，我们“……想必已经既不会再有教师，也不会再有技术员和农艺师了。战争会把他们都赶走。剩下的将只有侦察员和法官。他们回来的时候，会像狗熊那样健康，还有充足的经验！”

多夫仁科不会看到，也不想看到那个毫无异议的简单真理，即我们党、苏维埃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们与苏联人民血肉相连，他们就战斗在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第一线，在红军和游击队里忘我而英勇地战斗着。多夫仁科在这里也不能容忍这一事实。而事实就是，苏联人民信任并爱戴我们的军官和将军，以及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就是人民之中最优秀的人。顺便说一句，这就是苏联苏维埃制度毫不动摇的主要力量源泉之一。

多夫仁科在剧本中，反对苏联政府的军事政策，造谣中伤我们的领导干部，批判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和集体农庄制度——同时，他还批判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多夫仁科写道：

“教导所有的人都要温和顺从……所有的人都力求谨小慎微。不能争斗，也不能反对！只有一种手段——写密信互相告发，都见他妈的鬼去吧！不管是谁，都会变。这不，终于都过去了，而法官们却在前面等着。”

多夫仁科怎么会如此大胆和无耻，也许是既大胆又无耻，竟然说出这种话？当谈到列宁主义和我们党的理论的时候，多夫仁科应该对之脱帽致

敬，而他这个富农的应声虫和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却允许自己攻击并篡改我们的世界观。

多夫仁科在电影剧本中造谣中伤乌克兰人民。其实我们老早就知道，乌克兰少女是多么纯洁、优雅和高尚，顺便说一句，整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文学都提到了这一点。而多夫仁科又是如何描述乌克兰少女的？

乌克兰少女奥列夏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坦克手，她冲这个陌生人说了这样几句话："'听我说。'奥列夏说道：'和我一起过夜吧。马上就要天黑了。可以吗，听到没有？'

她放下桶，走到了他跟前。

'我还是一个少女。我知道德寇明天或后天就来了，他们会对我进行折磨和凌辱。我很害怕。求你了……就让你来吧……和我一起过夜……'"

多夫仁科在乌克兰的哪个地方见过这样的女孩？难道还不清楚，这就是在污蔑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妇女。

多夫仁科的电影剧本中所表现的公开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苏联人民不能容忍，也是不能接受的。

多夫仁科这样写道：

"请记住，无论我们今天会在哪条战线上战斗，无论斯大林把我们打发到哪里——北方、南方、西方或者是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会为乌克兰而战！

你们看，就在我们面前，乌克兰在战火中冒出滚滚的浓烟，我们蒙难的祖国！"

"'我们要为世界上的无价之宝——乌克兰而战！'

'为乌克兰而战！'战士们轻轻叹了口气。

'为乌克兰而战！为诚实的乌克兰人民而战！为欧洲几百年历史上唯一一个本国土地上无人丧生的四千万人民而战。为这个被分裂了的、受尽折磨的民族而战！'克拉夫钦纳沉默了一会儿，他好像没有继续说，而是在大声地思索：'请问，我们这些乌克兰人民的儿女们可以在这几百年间不鄙视欧洲吗？'"

很明显，此类观点多么没有说服力和错误。如果多夫仁科想说真话，那他就应该这样说：不论苏联政府把你们派往何方——北方、南方、西方、东方——请记住，你们是在和苏联所有兄弟民族团结在一起战斗，保

卫我们苏联，保卫我们共同的祖国，因为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保卫苏维埃乌克兰。只有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作为独立国家的乌克兰才能得以保留、发展壮大并繁荣起来。

多夫仁科不能容忍事实的真相，所以他就把一切都颠倒黑白。但天无绝人之路，多夫仁科不明白的那些东西，乌克兰劳动人民却非常明白。在我们漫长战线的每个地方，都有乌克兰人在同敌人英勇作战。同敌人作战时，他们的表现都很优秀，因为他们知道，为苏联而战就是为自己的祖国乌克兰而战。多夫仁科不明白的事情，他们却明白：苏联的所有民族都在为乌克兰而战。在此斗争期间，战争第一阶段被敌人占领的乌克兰的那些州都获得了解放。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苏联各族人民在军事上的团结合作，如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白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和摩尔达维亚人、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等。

如果根据多夫仁科的电影剧本来评价战争，那么参加卫国战争的只有乌克兰人，而并非是苏联各民族的代表。也就是说，多夫仁科在此又与事实不符了。他的剧本是反苏联的，明显表现出了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局限性。

多夫仁科的电影剧本《战火中的乌克兰》拥护的是乌克兰狭隘民族主义的观点，它仇视列宁主义，仇视我党政策以及乌克兰人民和全苏联人民的利益。

多夫仁科企图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来批判和训诫我们党。但多夫仁科的这些不满又从何而来呢？他反对我党的政策，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全苏联人民的利益，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答应他，乌克兰人民也同样不答应他。只要把多夫仁科的电影剧本刊登出来，让人们读一读，苏联人民就都会远离他，并让他彻底消失。这是因为，多夫仁科的民族主义理论的目的是削弱我们的力量，解除苏联人民的武装，而多夫仁科胆敢批判的列宁主义，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理论的目的却是在对敌斗争中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立场，战胜苏联各族人民最邪恶的敌人——德帝国主义。

《电影艺术》1990 年第 4 期，第 89—95 页

八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

本节主要翻译、校对者：
袁再旺　赵旭黎

致列·鲍·罗森菲尔德的信(1916年2月5日)

亲爱的朋友：

你好！

你的信我还是一封也没有收到。格里戈里曾向我问及“有关民族问题一书的写作提纲”，对此，我做以下回答。目前，我正在写作两篇长文：1）发展中的民族运动，2）战争和民族运动。如若把以下五篇文章编成一本合集，那么，你写给苏连的信中提到的那个出版社很可能就会出一本“有关民族运动（或问题）理论”方面的书。这五篇文章分别是：Ⅰ）我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单行本），Ⅱ）尚未发表，但已同意发表的“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长篇文章（即你曾向阿维洛夫打听过的那篇文章），Ⅲ）上次写的那篇文章的附录部分（我现在还存有草稿），Ⅳ）发展中的民族运动，Ⅴ）战争和民族运动。《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大家已经很了解了，现在要做的只是对其（小册子）再稍加补充。而《关于民族文化的自治》一文，至少伊里奇和格里戈里也已经看过了。“附录”则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批判了安（“安”即 H. H. 诺尔丹尼亚——编者）的文章。《发展中的民族运动》（该文我即将写完）的写作提纲是这样的：1）民族压迫的各种形式，2）民族运动的产生*，3）民族运动的兴盛**，4）民族运动的衰落***，5）帝国主义和民族运动，6）总结。

《战争与民族运动》的写作提纲是这样安排的：资本积累的持续增长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基本需求。这一需求积累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便是以输出

工业资本（货币资本输出，尤其是商品资本输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明显）为主。作为政治表现形式的帝国主义。经济概念的阶段。“民族国家”旧限制的破产，这些限制被打破和建设“多民族国家”的企图。因此有侵略企图并发生战争（俄国和其他那些主要输入货币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农业国一样，为了其他目的并基于对现代战争并不典型的其他原因，有侵略企图）。因此，交战各国经常诉诸于那些应当被纳入某个国家的民族的本能。所以才相信民族解放无疑能引起民族运动，而不管那些赌徒先生们是否愿意。与吞并原则相违背的是，民族自决权原则盛行。发现一些小“国”有弱点（经济及其他方面），于是，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建立紧密国家联盟的思想流行。中小国家完全独立存在是不行的，以及民族自治思想的挫败。“民族本能”力量显示出来，建立某个民族占优势地位的民族区域的思想流行。一方面，国家的联合在扩大和加深，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民族地区却有自治权，已与资本主义新时期不相符的旧的政治框架的不断扩展情况就是如此。

这就是说这些都是自发发生的，是不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无产阶级的意志，它应当表现为，宣布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建立民族区域自治，为建立欧罗巴合众国而进行斗争，也就是说，为争取正在扩展的旧框架拥有最民主的形式而进行斗争。这样一来，如果合集这样行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本合集已经几乎准备好了。如果不行，那就让伊里奇和格里戈里再详细写写，也就是说，让他俩给出一份详细的订单，——如有可能，我会尽量去做一切我能做的事。

我给格里戈里和其他人的回复就是这样。我本想亲自给伊里奇写信的，但又想到，你似乎有更为可靠的途径接触这些身居国外的朋友，因此，请你把这封信转寄给他们吧。

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材料，我这里所存甚少。哪怕是能有自第一期开始的全部《民族问题》也好啊。——但哪里能够弄到啊？给俄国写过信，但是什么时候能把书寄过来？通常会给寄吗？

再写点什么呢？我过得还是和以前一样。握你的手。

约瑟夫

摘自 B. Д. 莫恰洛夫档案

注释：列·鲍·罗森菲尔德——列·鲍·加米涅夫，苏连——苏·斯·斯潘达良，格里戈里——格·叶·季诺维也夫。

通过直通电报与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波尔什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州机关的巴金斯基的谈话[1917年11月17(30)日]

在直通电报机旁的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波尔什和布尔什维克党州委会委员谢尔盖·巴金斯基。

波尔什：我党想要弄明白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对民族问题的总体看法，尤其是乌克兰问题。和整个中央拉达一样，我党也认为中央政权应该是由国家全部的、有秩序的民主制度构成，我们还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是社会主义政府。对于乌克兰来说，乌克兰中央拉达是地方最高政权机关，乌克兰的政体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与俄国整个国家机构的关系是联邦制。将成立乌克兰立宪会议，以制定乌克兰共和国宪法，并最迟定于 12 月 27 日进行立宪会议选举，1 月 9 日立宪会议将开始工作。我党认为，目前，根据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协议，可以在一定的框架下确立俄罗斯共和国的联邦体制。我党还认为，在政府工作的共同纲领下，地方共和国政府应该参与到民主制中央机关的组建中来，而新的中央政府在自己的工作中应该依靠民主制中央机关。在纲领中除了和平、土地等问题外，还应该包括一个观点，即承认根据国家中央政权所成立的共和国和这些共和国政府。

因此，我党想知道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是如何看待以下这几点问题的。该委员会是否在原则上承认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拉达是乌克兰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否承认中央拉达在管理和立法范围内有解决地方经济、政治和民族文化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权力。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从你们那里了解一些信息，即把所有民主制度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中央机构一事现在情况如何。期待你们能答复这些问题，然后我会提出一些实际的、亟待人民委员们解决的问题。

斯大林：我来回复。我是人民委员会政府全权代表。至于布尔什维克党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请看一下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如果您想要听一下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对民族问题的看法，我愿意为您

效劳。

波尔什：很高兴能听您讲。

斯大林：回复。您所提的问题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解决范畴，而是属于中央政权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央政权由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得到不久前刚刚召开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承认。该政权对民族问题的观点是这样的：承认各民族享有充分的直至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民族自决权。民族意愿由全民公决或者是民族立宪会议来决定。若民族意愿对联邦共和国有利，那么政府不能有任何反对意见。这是每个民族的权利，而政府也会尊重他们的这项权利。与其他州的政权一样，边疆区的政权应该属于全部的工农兵代表，其中也包括拉达的组织。在这方面，中央拉达和人民委员会有达成协议的广泛余地。因此，中央拉达和人民委员会双方代表之间举行会议将会是合适的。至于自治权，比如乌克兰的自治权，应该是充分的自治权，是不受制于人民委员的自治权。禁止上层有任何监视乌克兰人民的行为。对于政权及组建政权的问题，可作如下解释：

11 月 15 日夜间，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不久前在农民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完成了合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将加入政府机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自己排除在了民主革命同盟之外。

十分之九的前线军队都支持人民委员会，并于 11 月 19 日之前停止了军事行动。这也就意味着各条战线的休战。我们已向联盟各使馆发了照会，但还没有得到回复，预计将于 11 月 19 日进行休战谈判。我想了解以下几个问题：贵党的这个观点是否就是中央拉达对所有问题的观点，尤其是对民族问题的观点？您是代表中央拉达呢，还是说只代表贵党？

我还想告诉您，根据与人民委员会的协议，今天，中央拉达彼得格勒分会的代表们带来了乌克兰珍贵的民族遗物——旗帜等物，这些东西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从乌克兰人手中抢走的，而今天此行的目的就是把它们再带回乌克兰。

我想问问您，贵党和中央拉达对乌克兰各地方苏维埃的态度是怎样的？您和地方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是否有联系？在我告诉您人民委员会对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看法后，人民委员会能否期待中央拉达的友谊？

波尔什：我是我党的代表，而我党在中央拉达中又处于领导地位。同

时，我还是总书记处的成员，也是劳动总书记。总书记处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由中央拉达成立于 11 月 1 日。我个人的观点是：在我之前所指出的那个方面上，作为全国权力源泉的中央民主机构，其组织与中央拉达的友谊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能的。我们与地方布尔什维克组织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布尔什维克地方上的州委员会坚持召开乌克兰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州代表大会，以重新选举中央拉达成员。根据人员组成，我们认为中央拉达就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些代表都是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而且最近的一次士兵代表大会于今年的 11 月 1 日才结束，这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从四百万人中选举产生的。同时，我们还认为，确定要进行乌克兰立宪会议的选举，让这次代表大会变成了多余，该代表大会将会成为总书记处工作中的障碍，也将会成为匆忙进行中央拉达 11 月 7 日发布的宣言中大体拟订的社会经济改革事业的障碍，可能，你们也知道这个宣言。这些相互关系让乌克兰甚至连非乌克兰所有的民主组织都变得急躁起来，让它们不能安心工作——总在等待基辅也发生莫斯科那样的事件。至于您之前所说的中央拉达彼得格勒分机关，中央拉达一直与它们有联系。我好像已经回答了您提出的所有问题？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了，那么请允许我向您提两个实际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彼得格勒军区的乌克兰军队，特别是彼得格勒的乌克兰军队希望能被调往乌克兰，但是，根据代表团的声明，彼得格勒有人阻止他们这样做。能否请您给予协助，以满足他们完全合理的要求？第二个问题：——由于纸币缺乏，服务于前线和后方的国家银行的地方机构以及工业都感受到了货币流通中的巨大困难。这种状况导致工业中，尤其是在甜菜制糖这类季节性行业中产生了最为严重的麻烦，更不用说缺钱可能会在工人中引起骚乱，和公职人员一样，工人们也无钱可用。因此，请求协助给国家银行驻乌克兰所有分部提供合乎实际需要的足够数量的货币。发报完毕。

斯大林：回复。针对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经总司令同意，数千乌克兰士兵将于今天或明天出发返回乌克兰。不用说，在平时，乌克兰士兵的驻扎地应该是乌克兰。但是战争会使事情变得复杂化，没有军方相关部门的允许，军队中任何民族团体自由转移的次数不得不被降至最少。我把这个当作原则来讲，但我也知道任何原则都有例外。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今天就会报给人民委员会，我一分钟也不怀疑，人民委员会会采取它能

够采取的一切措施。

谢尔盖·巴金斯基：期待您的提问。

斯大林：基辅的情况怎么样了？

谢尔盖·巴金斯基：政权掌握在中央拉达手中，中央拉达认为，不可能把政权转交给各地方苏维埃。这使我们非常怀疑波尔什同志的一个观点，即中央拉达就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坚持要尽快召开全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们认为，乌克兰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政权不能交给乌克兰中央拉达，边疆区的政权应该归边疆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地方上的政权归各地苏维埃。

昨天，卢甘诺夫斯基同志从哈尔科夫来了，他说中央拉达在当地与苏维埃展开了斗争。局势非常紧张，但是我推测，波尔什同志所说的关于可能重现莫斯科事件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同中央拉达进行过正式的联系，与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关系也还没有全面破裂，这两个党派在基辅苏维埃的代表们反对实行转交政权的政策，即他们反对把权力转交给苏维埃，即使是地方苏维埃也不行。无论如何，都应当承认局势是很严峻的，并应当认真商讨一下当前的局势。我的意思就是尽快召开工兵代表苏维埃州代表大会，同时也要尽快与哈尔科夫州一起召开我们的州党代表大会。皮亚塔科夫同志去找过您了吗，他告诉你事情的详细情况了吗？

斯大林：我已经从他那里得知了有关基辅的全部消息。我俩都认为，成立边疆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完全必要的。我们都不能理解波尔什同志对代表大会思想的不信任态度。我们认为，你们基辅人、敖德萨人、哈尔科夫人、叶卡捷琳娜斯拉夫人等都应该着手召开这种代表大会了，当然是和中央拉达一起。但是，如果中央拉达拒绝与你们在此领域合作，我们也感觉这种可能性不大，那么我们就自己成立代表大会，而不需要拉达的参与。苏维埃政权是应该被地方接受的。这是一个我们不可否认的革命信条，我们不能明白的是，乌克兰中央拉达怎么能够反驳这个信条呢？近日，季诺维也夫同志会去找您，到时您将有机会和他详细谈谈您所感兴趣的问题。暂时就这些了。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谢尔盖·巴金斯基：是的，我还有一些事要说。您在发报机旁吗？我们每天都非常需要从您那里获取关于事态情况的加急电报，这些电报都需寄给《无产阶级思想报》，并寄一副本给工人代表苏维埃，因为我们这份

大报既为我们州服务，又为两条战线服务。最好能给点钱，哪怕是借25000 多卢布的报纸流动资金，要是能定期从你那里得到消息的话，办报无疑也能抵补我本人的开销。

斯大林：我今天会把你们对报纸的建议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你们什么时候召开州的苏维埃代表大会？

巴金斯基：这个我说不上来，还是请我们州的苏维埃委员会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吧。

斯大林：好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巴金斯基：尤里·皮亚塔科夫同志去找您了吗？

斯大林：是的，他现在就在我这里。

巴金斯基：他是不是很快就又要返回基辅了？

斯大林：他会在彼得格勒停留一下……再重复一遍我们共同的观点——尽快在乌克兰召开边疆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维埃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利问题上不允许有丝毫的让步。我不能想象会有另外一种成立边疆区政权的方法，也不能想象会有另外一种政权形式。我不能理解拉达对苏维埃政权思想的不信任态度。

巴金斯基：之所以有这种不信任态度，是因为不管从结构上还是从组成上看，拉达都远不是一个民主的机构。

斯大林：应该就是这样。还有一点也可以说明这点，那就是中央拉达上层在不过问当地居民是否愿意成为乌克兰人的情况下，就要把越来越多的新省份都纳入自己的辖区。

我们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当地民众自己通过民意调查、全民公决等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央拉达并没有做这个工作，而是很随意地由上层决定吞并了这些新省份，也就是说，是它自己揭露了自己本身并非一个民主组织。顺便说一句，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建议通过民意调查的方式来解决地区归属问题。发报完毕。

巴金斯基：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斯大林：再见，同志。

巴金斯基：再见。帮我向所有的同志们问好，尤其是列宁同志。

斯大林：我马上就会向列宁同志、皮亚塔科夫同志和其他同志转达你的问候的。我要走了。再见。

巴金斯基：再见。

波尔什：——请斯大林同志留在发报机旁。说中央拉达不民主的观点是与事情的实际情况相违背的，也与中央拉达的政策相违背，这些政策自第一次在全部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领域中出现以来就一贯如此。中央拉达的组成中也没有“资格分子”，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早已离开拉达了。从劳动者开始，边疆区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人都加入了拉达组织。在拉达的成员当中有200多位农民代表，他们都是在由各州农民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还有150多个工人代表、150多个士兵代表，其中这150多个士兵代表是在最近的一次士兵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另外还有边疆区所有党派的近70个党代表。如果你想知道中央拉达详细的人员组成情况，我明天就会发给您。关于中央拉达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纲领，巴金斯基同志避而不谈。对此我也一直避而不谈，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文件和专门的报告来告诉您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必要情况。关于中央拉达上层决定把一些省纳入乌克兰一事，我应该声明一下，您完全错了：在中央拉达宣言发布之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和赫尔松省的农民代表大会已经声明，赞成加入乌克兰。还有，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和敖德萨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也已经表示赞成加入乌克兰。全部情况就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2000年第1期，第3—5页

乌克兰中央国家社会联合组织档案馆，全宗号57，目录号2，案卷号486，页码76—84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4—18卷版本及其翻译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副研究员欧阳向英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共1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根据1964年俄文版翻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1956年4月间出版。或许由于名为“全集”，很多人不知道它收录的斯大林著作并不全。2006年，《斯大林全集》俄文版已经推出第18卷，而2011年14—16卷的增补也全部完成。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对斯大林研究的深入和争议不断涌现，文集的完整性和研究的系统性成为新问题。

一　版本情况

1946年，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着手编辑《斯大林全集》，计划出16卷，斯大林在世时前13卷全部面世，由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出版，出版地为莫斯科。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下令终止出版，并销毁了已制好版的其他几卷。根据第1卷《出版说明》里的预告，第14卷为1934—1940年的著作，第15卷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6卷则为卫国战争期间的著作。

20世纪60年代美国胡佛研究所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后三卷，不过对这几卷的内容作了重大调整。原计划收入第15卷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没有全文采用，只取其中斯大林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将其放到第14卷，第15卷则改为卫国战争期间的著作，第16卷也改为收录战后的著作。

尽管发生了苏东剧变，俄罗斯左翼学者一直没有放弃对斯大林文集的

研究和续编。由理查德·科索拉波夫任总编辑，工人大学对胡佛版各卷内容作了较大的增补，于1997年十月革命八十周年之际推出14、15、16这三卷，莫斯科“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只印行两千册，一两个月内销售一空。此后于2004年和2006年，俄罗斯先后编辑出版了第17卷和第18卷，分别由苏共中央科学方法委员会编撰、特维尔“北方王冠”科学出版公司出版和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赫列博尼柯夫工人大学联合编撰、“联盟”信息出版中心出版。第17卷主要收集了斯大林从1895—1932年的诗歌、书信、电报等，第18卷则查漏补缺，增补了以前未收录的1917—1953年间的讲话、报告、书信、电报、谈话记录、批示、命令等，也有个别文章在前面卷次中有收录，但此卷录入了不同版本。与此同时，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赫列博尼克福工人大学对1997年出版的第14、15、16卷的内容作了调整和增补。修订版仍由理查德·科索拉波夫任总编辑，第14卷收入1934年3月到1941年6月战争爆发前的著作，篇目增加了1.6倍，已于2007年由“联盟”信息出版中心出版。第15卷分三部分，卷1收录1941年6月到1943年2月的文章，卷2收录从1943年2月到1944年11月的文章，卷3收入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9月的各种著作和文献，比1997年版内容增加了10倍，也于2009—2010年出版。第16卷分两部分，卷1收录1945年9月到1948年12月的文章，卷2收录从1948年12月至1952年战后重建和苏联经济发展期间的文章，以及附录和备注，均于2011年出版问世。第15和16卷由莫斯科ИТРК出版社出版。

二　翻译状况

对《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4—18卷，中央编译局没有翻译，目前也无翻译计划，所以没有中文版，但一些篇目，大多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通信等被收录在1984年中央编译局翻译、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还有一些文章被收录在内部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从第14—16卷，再到资料性很强的第17—18卷，我们没有完整的中译本，从三个角度来说有些遗憾。一是从翻译的角度看，我们已有翻译基础，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的一些大块头的文章都翻译过了，但篇目并不完整，也缺乏统一的版本依据；二是当前国内外

对斯大林的争议很多，即使单纯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缺乏系统而权威的一手资料，来回应林林总总的观点；三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斯大林研究、苏联模式研究对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从 1995 年开始，对斯大林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与如何评价斯大林及其著作有关。

评价斯大林及其著作，核心是“实事求是”。毋庸讳言，个别偏激的人“反斯必反毛”，反对苏联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这样的说法和做法我们当然不赞成，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从感情出发去美化斯大林，或者回避斯大林犯过的一些错误，甚至把他的某些片面思想也说成是真理。就像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对我们的观点未必完全赞同一样，今天的我们也不必完全赞同前人的观点，更不能墨守成规。苛责前人是不必的，必须把斯大林还原到他所在的时代和具体的国情中，放到整个的国际背景和路线斗争中去考察，才能认清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义是怎么回事。对马恩列斯的著作持科学的、批判的、继承的态度，才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与时俱进地研究和看待经典著作，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全集和选集的定位不同，《斯大林全集》难免收入一些研究价值不是很高的作品，包括一些题词、贺词和缺少实质内容的通信往来。“全”和“精”始终是一对矛盾。另外，《斯大林全集》的编辑基础毕竟是公开发表或档案保存的文献，如果我们能组织力量，对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进行系统的翻译和整理，则不仅可以推动斯大林研究，更可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解决“明”和“暗”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另一对矛盾。无论如何，对《斯大林全集》的翻译研究不应急功近利，也不能削足适履。要正确认识《斯大林全集》的文献和历史价值。